

香港北星出版社

王力遺稿

王力反思錄

(上)

王力著

ISBN 962-86438-1-9

A standard one-dimensional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62-86438-1-9.

9 789628 643813

ISBN: 962-86438-1-9

定價：(上、中、下冊) HK\$ 386

策劃：石岩

責任編輯：李濟

裝幀設計：曾義

出版發行：北星出版社

作者簡介：

王力，原名王光賓。（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國作家協會首批會員，發表過《晴天》等著作。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五七年起，是在毛澤東、鄧小平等直接領導下的「秀才」，意識形態評論文章的主要作者，中共中央釣魚臺寫作班子即思想庫的主要成員。理論家，國際問題專家。文革前曾任中聯部副部長，《紅旗》雜志副總編輯。文革開始時，中央常委和書記處決定王力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任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作為替罪羊被打倒，宣布王力「請假檢討」，實際被隔離。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被送入秦城監獄，囚禁十四年半，未被起訴，于一九八二年一月恢復自由。

王力是橫跨文革前及文革初兩個歷史時期，在這兩個時期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會議的人。王力直接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決策的經過，並且直接聽毛澤東講述中美關係、朝鮮戰爭等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內幕。掌握着不少別人都不知道的第一手材料。

（注：本「作者簡介」除生平年月外，均系王力本人所作。）

王力遺稿

王力反思錄
(上冊)



王力
著



著名畫家裘沙為王力畫的肖像



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王力任中共赴越南顧問團宣傳文教組組長時在叢林中與胡志明主席合影。王力（左第一人），胡志明（左第二人）

一九四七年王力（左第三人）在渤海區黨委與戰友合影。在門口坐着的是其愛人王平權，門口站立的小孩是其子王魯軍



王力反思錄

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抗法援越期間，王力在叢林居所前留影。





一九六二年王力與「九評」寫作班子的助手們在釣魚臺合影。左第三人為王力。



一九六五年訪朝期間王力（右）與秘書李鑫在金剛山合影。

一九五六年王力任訪拉美、非洲藝術
代表團副團長時在埃及金字塔前留影。



王力反思錄

王力與朝鮮駐華大使在釣魚臺合影。
右第一人為王力，中間為朝鮮大使。





一九六二年中蘇莫斯科會議期間中共代表團成員漫步莫斯科街頭。
在第一人為王力。



一九六三年布加勒斯特中羅
會談，雙方代表團成員步人會場。
右第一人為康生，右第二人為鄧
小平，左第三人為伍修權，左第
二人為王力。



一九六三年中羅會談。右前第一人為鄧小平，
右前第二人為王力。

王力的岳父王翔千是中共第一代共產黨人。

他和王盡美、鄧恩銘成立了山東第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黨的「一大」之後，他們建立了山東省第一個黨支部。王盡美任黨支部書記，鄧恩銘為組織委員，王翔千為宣傳委員。



王力出秦城監獄後，兄妹三人分別三十年後第一次合影。中間為王力。左為妹妹王光安（早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任四川省省機械廳廳長，現已離休）；右為弟弟王光譽（早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擔任中學教師，九九年病故）





山东莒南县沈家峪山。
抗战时期山东八军医
后方医院所在地。曾
年和他弟弟路镇加
出生地。路镇病故后
也埋葬在这里。

王力和平权一九九〇
年三月又访向了这里。

一九九零年三月王力及其夫人王平權重訪抗日時
期山東軍區後方醫院所在地。照相地點是二兒子路鎮
埋葬地點。下圖為王力手迹。



一九八八年王力全家福照片。



長子王魯軍在書房合影。
一九九五年王力與



一九九六年十月
二十七日王力子女在
告別儀式上向父親告
別。中間為長子王魯
軍，右為長女王海君。
左為二女兒王洪君。

生游在沂蒙山少
前風雨急還要向生
祝魯軍兒五十歲生日

王力
平叔
廿四年五月九日

目 錄

(上冊)

自序

第一部 要留清白在人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王力患癌症后的遗嘱 (一)

(三) 打倒王力之謎 (一)

(四) 敗「王力是康生的人」 (一)

(五) 對《聶榮臻回憶錄》關於所謂「二月逆流」的問題的說明 (三十六)

(六) 對陳再道《武漢七·二零事件始末》幾個問題的說明 (四十六)

(七) 就所謂「八·七講話」問題評「劍橋歷史叢書」 (五十六)

(八) 澄清其他幾個問題的真相 (七十九)

(九) 簡短的結語 (九十二)

第二部 上書文選

一、前言	(九十五)
二、文選四十五篇	(九十八)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九十八)
毛澤東談羅榮桓	(一百一十三)
毛澤東談鄧小平和我對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看法	(一百一十六)
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談話和我的看法	(一百二十)
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	(一百三十三)
毛澤東談整風審幹和遵義會議	
——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幹問題的說明談起	(一百四十四)
毛澤東對臺灣問題的看法給我的啓示	(一百六十一)
從文革痛苦教訓中看社會主義的法的精神	(一百六十五)
對外路線也要清除極左影響	(一百七十)

關於陳伯達 ······ (一百七十三)

不可沿用文革的辦法處理文革中犯錯誤的人 ······ (一百七十六)

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來之不易 ······ (一百七十九)

出獄前的兩封信 ······ (一百八十二)

「三和一少」、「三降一減」的由來 ······ (一百八十八)

整黨應接受文革教訓 ······ (一百九十二)

清除精神污染要有政策界限 ······ (二百零一)

過猶不及，一分爲二，全面看人，糾正極左 ······ (二百零三)

牢記歷史教訓，戰略轉移不可動搖 ······ (二百零五)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反對自由 ······ (二百一十三)

不必用「政治紀律」的提法 ······ (二百一十九)

黨的組織工作和紀檢工作必須改革 ······ (二百二十一)

關於對原四野和其他老幹部從寬處理問題致鄧小平的一封信 ······ (二百二十三)

同現代企業相聯系的家庭工人問題 ······ (二百二十六)

政治經濟學不能分割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 ······ (二百二十九)

自由王國與必然王國 ······ (二百三十一)

科技絕不能一邊倒	(二百三十四)
從山東農業發展中看到的問題	(二百三十六)
政策與科學	(二百四十)
每年都應有一個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和一號電影	(二百四十二)
白雲觀怎麼辦？	(二百四十四)
黎玉應徹底平反	(二百四十六)
從廊坊市看發展鄉鎮企業的道路	(二百五十四)
不必提中國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	(二百五十六)
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不科學	(二百五十九)
市場是發展商品經濟的前提和表現形式	(二百六十四)
實行改革開放的文物政策	(二百六十九)
贊裘沙的《魯迅世界》畫展	(二百七十三)
二次手術前的一個建議	(二百七十五)
醫院改革之路	(二百七十七)
對十四大的一點看法和建議	(二百八十二)
中國的改革與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	(二百八十四)

探索改革新思路——以股份制、信用制、

和銀行制為樞紐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 (二百九十四)

歷史捉弄人 (三百一十九)

(中冊)

第三部 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 (三百六十三)

第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發動 (三百六十七)

一、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 (三百六十七)

(一) 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三百六十七)

(二) 學術批判和五人小組 (三百六十九)

(三) 四清問題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 (三百七十二)

(四) 《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 (三百七十六)

(五) 毛主席批評《二月提綱》和彭真 (三百七十九)

- (六)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過程 (三百八十三)
(七) 政治局擴大會通過《五·一六》通知 (三百八十八)
(八) 田家英之死 (三百九十二)
(九)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 (三百九十六)
(十) 關於《大事記》的一些情況 (三百九十八)

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發動

- (一) 毛主席為什麼重視聶元梓的大字報 (三百九十九)
(二) 文革小組成立初期和工作組問題 (四百零三)
(三) 八屆十一中全會 (四百一十一)
(四) 起草「十六條」的過程 (四百一十二)
(五) 十一中全會的人事變動 (四百一十五)
(六) 「生活會」批評劉少奇 (四百一十七)
- ## 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第一個浪潮
- (一)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 (四百二十)
(二)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中央工作會議 (四百二十二)
(三) 毛主席的思想和陳伯達的講話 (四百二十六)

(四) 林彪的講話	(四百三十)
(五) 劉少奇的檢討	(四百三十一)
(六) 鄧小平的檢討	(四百三十三)
(七) 中央工作會議以後	(四百三十六)
(八) 主要矛盾和主要對象問題上的分歧	(四百三十七)
(九) 紅衛兵問題上的分歧	(四百三十九)
(十) 組織形式、工作方法上的分歧	(四百四十六)
四、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工廠農村	
(一) 安亭事件	(四百四十九)
(二) 工交座談會和工礦十條	(四百五十五)
(三) 江青和陶鑄的衝突	(四百六十三)
(四) 政治局擴大會批評陶鑄	(四百六十八)
(五) 「生活會」批評陶鑄	(四百七十一)
(六) 公開批判陶鑄	(四百七十五)
(七) 中央專案組的建立	(四百七十七)
(八) 農村文化大革命	(四百七十九)

五、一九六六年各方面的大變動

(四百八十三)

- (一) 四個元帥講話 ······ (四百八十三)

- (二) 紅衛兵的變化 ······ (四百八十六)

- (三)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講話和我的一些看法 ······ (四百九十一)

- (四) 書記處和政治局名存實亡了 ······ (五百零七)

- (五) 文革小組的人事變動以及性質和作用的變化 ······ (五百一十四)

- (六) 中央專案組的形式禍害無窮 ······ (五百二十四)

- (七) 各省市的變化和毛主席的部署 ······ (五百三十二)

- (八) 許元梓去上海的一段公案 ······ (五百五十二)

- (九) 國務院各部的狀況 ······ (五百六十四)

第二部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高潮

(五百七十五)

- 一、一月份上海奪權 ······ (五百七十五)

- (一) 毛主席支持上海市告人民書，口授人民日報按語 ······ (五百七十七)

- 并決定由王力代替陶鑄 ······ (五百七十七)

- (二) 文匯報奪權 ······ (五百八十二)

(三) 解放日報奪權	(五百八十三)
(四) 王力在新華社的講話	(五百八十四)
(五) 上海的緊急通告（陳丕顯簽署）和綜合報道毛主席都批了	(五百八十九)
(六) 中央給上海的賀電	(五百九十二)
(七) 上海十萬人大會奪上海市委的權	(五百九十三)
二、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五百九十五)
(一) 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公開號召奪權的正式文件	(五百九十六)
(二) 周總理立即接受毛主席關於奪權的指示	(五百九十九)
(三) 毛主席說奪黨權、政權、財權的本意和後果	(六百)
(四) 大民主是無產階級性的嗎？	(六百零三)
(五) 所謂「王力煽動奪權」	(六百零五)
(六) 周總理傳達的毛主席這段話後果很嚴重	(六百零六)
(七) 「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是從哪裏來的？	(六百零七)
三、奪權的綱領性文件——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	(六百零九)
(一) 肯定上海奪權，并規定奪權的性質和目標	(六百一十)
(二) 毛主席說不怕亂並不是容忍無政府主義	(六百一十三)

(三) 解放後歷次大的政治運動都是極左 (六百二十一)

(四) 第一次公布毛澤東關於在文革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理論 (六百三十一)

(五) 公安六條是毛主席要搞的 (六百三十五)

(六) 支左決定是毛主席指定王力起草的 (六百四十三)

(七) 支左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 (六百四十六)

(八) 毛主席提出支左，後來走向自己願望的反面，
發展到要武裝左派，另建第二武裝 (六百五十)

(九) 軍委八條命令主要是林彪根據支左決定提出和制定的 (六百五十二)

(十) 歷史學家把八條說得那麼好是不對的 (六百五十七)

(十一) 「聯動」和它的所謂後臺周榮鑫以及「聯動」的綱領 (六百五十九)

(十二) 伊林滌西的反對林彪的大字報 (六百六十九)

四、毛主席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右又反「左」

(一) 炮打張春橋事件 (六百七十三)

(二) 處理合同工、臨時工問題是毛主席糾「左」的一個典型 (六百七十九)

(三) 毛主席批評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制 (六百八十六)

(四) 在反對無政府主義中毛主席稱贊孟繁華 (六百八十九)

- (五) 國務院鬧得很厲害，毛主席說這樣不行 (六百九十二)
- (六) 周恩來批評陶鑄說的除毛澤東、林彪外都可以懷疑 (六百九十四)
- (七) 防止極左派妨害團結大多數 (六百九十七)
- (八) 一系列糾「左」的措施 (六百九十九)
- (九) 徐向前談軍隊的兩個司令部 (七百)
- (十) 四清不能否定，春耕不能耽誤 (七百零六)
- 五、實行三結合，才能既不右又不「左」 (七百零七)
- (一) 不實行三結合的奪權，就不承認 (七百零七)
- (二) 王力的工作任務就是最快最準確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七百零九)
- (三) 陳毅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並不反對文化大革命 (七百一十五)
- (四) 保護王任重，周恩來執行的是毛澤東的命令 (七百一十九)
- (五) 上面的講話說明了什麼？ (七百二十二)

第三部分 文革第一年

- 「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七百二十五)
-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 (七百二十七)
- 「七百二十九」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七百三十二)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七百三十三)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后	(七百三十六)
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七百四十四)
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和批判陶鑄	(七百五十一)
中央專案組	(七百五十七)
農村「文化大革命」	(七百五十八)
全國全面階級鬥爭與奪權	(七百六十)
所謂「二月逆流」	(七百七十)
一、火是毛主席自己點起來的	(七百七十一)
二、文革小組批評會和陳伯達要自殺	(七百七十二)
三、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事件	(七百七十五)
四、張春橋和江青利用這件事無限上綱，向毛主席告狀	(七百七十七)
五、急轉直下，風雲突變，由反「左」變成了反右	(七百八十一)
六、所謂「懷仁堂事件」的直接後果	(七百八十二)
七、「反革命復辟逆流」問題	(七百八十三)

八、懷仁堂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的批評會 (七百八十四)

中央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 (七百八十七)

所謂「對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的革命大批判」 (七百八十九)

四月六日的「十條」和重新公布《五·一六通知》 (七百九十二)

後來所謂黨的「基本路線」是怎樣來的 (七百九十七)

一九六七年五一節前後的領導機關情況 (七百九十九)

武漢七·二零事件前後 (八百零一)

王力的所謂「八七講話」 (八百一十三)

江青打倒王力和總理當時的態度 (八百一十七)

其他十件事提問的回答 (八百二十五)

(下冊)

第四部 王力談毛澤東

毛澤東培育了一代人 (八百二十九)

毛澤東時刻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 (八百三十)

實踐之樹是常青的 (八百三十三)

毛澤東時刻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 (八百三十五)

毛澤東不保守	(八百三十六)
毛澤東相信「懷疑一切」的格言	(八百三十九)
毛澤東「批判一切」的科學態度	(八百四十)
毛澤東喜歡和而不同，不喜歡同而不和	(八百四十三)
過猶不及和兩條戰線鬥爭的「偏」與「正」	(八百四十六)
毛澤東反對「打倒一切」	(八百四十八)
毛澤東談遵義會議	(八百五十)
毛澤東說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骨氣	(八百五十三)
毛澤東與《資本論》	(八百五十五)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看法	(八百五十七)
使毛澤東經常睡不着覺的問題	(八百五十九)
劉少奇談毛澤東	(八百六十二)
「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毛澤東提的	(八百六十九)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貌似真實的謊言	(八百七十二)
劉少奇宣傳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以及政治和組織路線	(八百七十三)
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	(八百七十七)

羅榮桓、林彪、康生、王稼祥談毛澤東 (八百七十九)

毛澤東國際戰略決策和國內戰略決策變化的原則 (八百八十三)

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制約因素 (八百八十八)

朝鮮戰爭 (八百九十三)

越南問題 (八百九十六)

不能抓住思維矛盾運動中的一個片斷，

研究毛澤東和他同別人的關係 (九百零二)

(一)「文革」初期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鄧小平 (九百零四)

(二)毛澤東對王稼祥 (九百零四)

(三)毛澤東對朱德和陳毅 (九百零五)

(四)毛澤東對周恩來 (九百零五)

(五)毛澤東對胡喬木、田家英和王力 (九百零六)

把毛澤東同劉少奇的矛盾追溯到建國前后是不對的 (九百零八)

毛澤東是肯定劉少奇天津講話的 (九百一十二)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矛盾時限規定為「八大」是不對的 (九百一十七)

毛澤東設想的「國際休戰時期」及其變化 (九百二十四)

一九六二年的兩種不同意見不等于兩條路線的鬥爭 (九百二十七)

毛澤東對「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批評 (九百二十八)

「四清」運動中毛澤東同劉少奇的矛盾及其發展變化 (九百三十二)

毛澤東創辦《紅旗》，鄧小平是第一個編委 (九百三十九)

人民公社和「烏托邦」 (九百四十二)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同

公社錯誤的理論是相通的 (九百四十八)

毛澤東決心創立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學派 (九百五十三)

社會主義建設也有在反對蘇聯教條中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九百五十六)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照搬蘇聯教條的表現 (九百五十八)

毛澤東為什麼不同意反冒進？ (九百六十二)

中國三代領導核心是社會主義新學派的

創立者、繼承者、發展者 (九百六十二)

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九百六十五)

計劃體制和兩個部類的比例關係 (九百六十九)

中國工業布局問題 (九百七十)

國防工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 (九百七十二)

國家、集體、個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生產關係 (九百七十二)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九百七十四)

中國的民族政策不同于蘇聯 (九百七十五)

中國式的特殊形態的多黨制 (九百七十六)

分清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九百七十八)

學習一切民族和一切國家的長處 (九百七十九)

社會主義新學派哲學和理論的基本原則 (九百八十二)

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原則不能丟 (九百八十六)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同蘇聯保守的教條相反的方法 (九百八十七)

八屆三中全會正式修改主要矛盾的提法 (九百九十一)

南寧會議的歷史作用 (九百九十二)

南寧會議與《工作方法六十條》 (九百九十五)

反對黨八股思想的新發展 (九百九十九)

《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 (一千零零二)

成都會議是創立新學派的繼續 (一千零零四)

附

錄

王力與文物 (一千零六十)

- | | |
|----------------------------|----------|
| 八大二次會議前后新學派思想的發展 | (一千零零八) |
| 武昌會議是毛澤東「壓縮空氣」的會議 | (一千零一十三) |
| 北京會議繼續反「左」 | (一千零一十七) |
| 第二次鄭州會議正式提出糾「左」的方針 | (一千零一十九) |
| 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繼續糾「左」 | (一千零二十五) |
| 廬山會議把反「左」變為反右是方向錯誤 | (一千零二十八) |
| 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理論和社會根源 | (一千零三十三) |
| 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接力棒 | (一千零三十五) |
| 爲社會主義唱挽歌的人，必然成爲遺囑執行人 | (一千零三十九) |
| 我研究毛澤東的現實目的 | (一千零四十七) |
| 突出宣傳領導核心是歷史的必要 | (一千零五十) |
| 毛澤東與鄧小平 | (一千零五十五) |

要留清白在人間
——『死不了』贊歌一束（王平權）
王力簡歷
——《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出版后記（王魯軍）

自序

《王力反思錄》終於出版了。這是我被打倒二十六年的痛苦的反思的記錄，是我十多年來帶病寫作的心血的結晶，也是我對中國文革史的研究作出的一點貢獻。

這部書總名叫《王力反思錄》，分為三部：第一部《要留清白在人間》，主要是澄清江青們對我的誣蔑和他們所散布的一些流言蜚語。這些流言蜚語直到今天還有人以為是真實的。本書第二部是《王力上書文選》，內容是我從秦城到現在歷次送給中央領導人的一些信件和文章。其中有我對文革中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和對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的分析和探討，

有我直接聽到的而却鮮為人知的毛澤東的一些重要談話，以及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有我結合過去痛苦教訓而提出的對當前和今後中國改革的一些看法和建議。這些建議有的已被中央接受，有的由中央印發，在一定範圍內傳閱過，但從未公開發表。

第二部的最後一篇《文革第一年》，是我應訪問者的提問所講述的文革初期親身經歷的一些重要情況，但它還不是正式的王力文革回憶錄。正式的王力文革回憶錄將作為《王力反思錄》的第三部在將來出版。

讀者要讀一部書，當然首先要了解書的作者。我這個人，海內外很多人都知道。可是有人所聽到和知道的，可能是江青們所編造的謠言和有意散布的迷霧。現在通過這部書，可以使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王力。

也有人說，王力對文革中所犯的錯誤沒有認識，沒有檢討。這也不是事實。我從一九六六年六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參加中央文革小組，到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江青們打倒，歷時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就被關在秦城監獄，達十四年之久。在參加文革的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裏，我犯了嚴重的錯誤。我已經作了一百多次檢討，還將繼續檢討。

我在一九八三年給中央的報告裏說：

「我作為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上，脫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我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闡述者之一。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兩次講話中的詞句編輯起來加以系統化，成爲一段有名的語錄，後來被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爲黨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實踐已經證明這個基本路線是錯誤的。

我還提出了所謂「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階段和第三個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爲標志」的錯誤觀點。

理論上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黨內和人民中所造成的混亂，其危害性和長期性，是難以估量的。由於理論上的錯誤，導致黨在一系列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敵我界限。在我參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時間裏，黨中央指導運動的重要的指示、決定、通知、社論和文章，我幾乎都參加了起草。我參加起草的這些文件和文章所提出的政策原則，今天看來大都是錯誤的，正確的很少。「雖然這些文件和文章大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爲具體的執筆者也有嚴重的責任，我不能也不應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主席。」

「當時我對林彪、江青、康生等的不正常活動缺乏認識，我同他們之間雖有鬥爭，以至不能爲江青所容忍，并受到他們的殘酷迫害，但是，我這些鬥爭是無力的，同時，我也執行了他們的一些錯誤指示和意見。」

我表示：「祇要一有可能，我就要向由於我的言行而受到傷害或株連的同志當面賠禮道

歉。我也要向由于我的影響而在不可控制的群衆自發運動中受到傷害的同志道歉。一

在以後所寫的文章裏，我對自己的錯誤以及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認識上不斷有所提高。在《歷史捉弄人》一文中，結合馬克思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進一步認識了文革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在本書第三部即正式的《王力文革回憶錄》中，我還將繼續檢討自己的錯誤，繼續探索和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慘痛的經驗教訓。

需要說明的是：（一）我沒有參加專門迫害老幹部的「中央專案組」，他們所幹的迫害老幹部的事，沒有我的份。（二）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後，在「把工人農民武裝起來」、「武裝左派」的號召下，發生了普遍的、嚴重的武鬥，那時我已經早就被關起來了。（三）文革持續了十年多，在這期間我被關了九年。關我的人主要就是江青。在我被關起來時，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還沒有形成。我不可能去追隨兩個集團。讀者可以在這本書中看到這些歷史事實。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感謝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等對我的關懷和積極的評價。這為我提供了繼續為祖國和人民進行研究工作的條件。鄧小平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指出，他認為王力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寫的東西「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

感謝二十多年來對我表示理解和關懷的許多老戰友，許多親友和憐居們。劉少奇夫人王

光美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見到王力時就說：「你是替罪羊，也是受害者。」原出版界主要領導人王益在看了王力提供的部分真實材料之後說：「王力問題是很清楚的，長期拖延不解決，是不可理解的。」原人民日報總編輯李莊用了一天時間十分仔細地看了我的兩個材料之後，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在致我的好友周保昌的一封信裏寫道：「我完全相信王力同志寫的。我相信他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的真誠，佩服他在信中所表現的巨大說服力。在此之前，我對他的印象是很不好的。這印象完全來自「十年動亂」初期的傳言。所謂「衆口鑠金」。透明度低表現在各個方面，為什麼有關負責方面不能為這樣的同志作出正式說明、澄清呢？當然，也可能有更深層的考慮，或工作太忙沒有顧上，就不是我所能想到的了。總之，這是一個應該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還要感謝中國文革史研究的開拓者，最早把文革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並且取得成果的原國防大學黨史研究室負責人之一王年一。他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王力，對待我提供的史料，並且作了具體的分析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世界知名的中國文革史專家、美國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特別重視王年一先生的研究成果，並且積極推薦出版王力的著作。在這裏，我也對麥克法誇爾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專業作家葉永烈在一九八八年冬見到了我，得到了一些真實的第一手史料，他第一個突破了禁區，在報刊書籍上陸續公開加以透露，使人們多少知道了一點王力的歷史和現狀。

在這點上，他起了積極作用，我對之表示感謝。

最後，我感謝在國內外為出版和發行這部著作付出辛勤勞動的出版社的朋友們。

但願這部著作能為我的偉大的祖國和人民起到有益的作用。我歡迎讀者對這部書提出各種科學的批評意見。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

(上冊)

第一部

要留清白在人間

(一) 王力患癌症后的遺囑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患了賁門癌，在上手術臺前，因為死亡的可能性很大，我留下了遺囑和遺言。這是匆促的，也是膚淺的，深刻的反思當時是來不及了。不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中總有值得思考之處，現在將它印出來供領導同志參考，但願能對黨和人民有點用處。

我已確診患賁門癌，定于國慶後手術。我現在象健康人一樣身心壯實，人從一出生開始

便同死亡作鬥爭。這種鬥爭，貫穿在生命全過程。一旦死亡來到，生命便結束了。於是，人便發生性質的變化，由人變化為非人，由有生命的人轉化為無生命的灰燼。作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有幾點意見報告中央：

第一，如果不能戰勝死神，我就不請求中央重新討論我的組織結論問題了。雖然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兩案辦公室是在沒有同本人核對事實的情況下提交書記處討論的，因而是違背黨章的。而且我當即向常委申訴，至今並未得到批駁，因而還是懸案。我不要求死後重新討論了，這是因為那時我已不可能在黨的一個組織中履行義務和權利了。虛名毫無用處。我也一般不贊成死後追認為共產黨員的做法，因為這對死者無用，使生者寒心，對黨的影響也不好。

第二，我的遺體提供醫學解剖之用。

第三，我的骨灰不必浪費一個骨灰盒，也不必撒到遠處去浪費旅費，就便撒在我現在居住的小區的一顆松柏樹下，以提供一點磷肥。

第四，包括親友在內，都不必向遺體告別。與其留下死尸的印象，不如留着以往活人的印象。

第五，包括親友在內，都不必舉行任何悼念活動。親屬們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人民的事業，便是對死者最好的悼念。

第六，除親友外，其他人如無工作必要，一律不要到醫院探視，以免浪費比黃金還寶貴的時間。

一個人的歷史，是自己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不是任何帶着偏愛或偏惡成見的組織或個人封的或貶的。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不要輕易地稱一個人爲什麼家什麼家，還要加上偉大最偉大之類的形容詞，因爲這要得到歷史的承認，得到世界的承認。我們也不要隨意地辱罵一個人，特別是經歷革命戰爭的老戰士。那種「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祇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江青二十年加一個月以前打倒王力時叫喊的，這是極端主義的做法，絕不可取。「是人三分對」，這是蔣介石最反動時期毛主席對他的評價。馬克思主義者對任何事任何人都必須採取歷史的具體的分析態度。

我這一生做過不少錯事。但是，有兩條是至死不悔的：第一是選擇共產主義作爲自己的信仰，并爲之奮鬥終生；第二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爲推進全面的改革而奮鬥，力求盡一點微薄的力量。祇要我一息尚存，絕不會改變我的革命的樂觀主義本性。

(二) 打倒王力之謎

海內外許多人都關心「打倒王力之謎」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武漢七·二零事件以後在天安門廣場上受到一百萬人歡迎的、紅極一時的人，一個月以後，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就被打倒了。用當時美聯社的一句話來說，「中國一顆大明星，一天之內殞落了。」這成爲一個謎。下面就來揭開這個謎。

首先，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所犯的錯誤，要永遠檢討，終生檢討。
我的錯誤主要表現在：

我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不能不負有一定責任。我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錯誤理論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闡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兩次談話中的詞句編輯起來加以系統化，成爲一段有名的「語錄」，這段語錄後來被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爲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

期的「基本路線」。實踐已經證明它是錯誤的。

我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階段和第三個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為標志」這一錯誤觀點的主要提出者之一。

我在理論上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黨內和人民群衆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亂，其危害性是難以估量的。

由於理論上的錯誤，導致黨在一系列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敵我界限。在我參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時間裏，黨中央指導運動的重要的指示、決定、通知、社論和文章，我都參加了起草工作。（那個專門整老幹部的「專案組」辦的事情與我無關，因為「文革小組」成員祇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一「專案組」之外。）我參加起草的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則，今天看來大都是錯誤的。即使有的在當時起了某些積極作用，但是，因為是在戰略錯誤的前提下寫成的，因而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雖然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為具體執筆者也有嚴重的責任。我不能也不應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主席。

可是，我的這些主要錯誤，在一九六七年當時不但不是錯誤，而且是正確的東西。不但不是罪，而且是功。那麼，為什麼還要打倒王力呢？

這個謎底我自己是很清楚的。其實，當時人所共知：王力是被江青打倒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王力問題就正式公布了。三月十五日，「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發表極其重要的講話」，江青說：「王（力）關（鋒）問題就是我們搞出來的。」姚文元說：「是江青同志搞出來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長發表重要講話」，江青說：「過去中央文革班子本來就是劉鄧定下來的，有個別壞人隱藏起來了，幹了一些壞事，我們不知道，後來我們把他端出來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大會上，在公布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罪行」時，同時由江青發明了一個叫王（力）、關（鋒）、戚（本禹）的新名詞，而且說，楊余傅是王關戚的後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兩點半，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首都軍民十萬人大會上，江青講話說：「自從去年五月間，發生『左』傾冒險主義（或者叫極左、形『左』實右），他們的頭面人物叫王、關、戚。他們是劉鄧的黑爪牙，他們是劉鄧安插在我們革命隊伍中的釘子！所以我們把他們端出來、挂起來了。」「這些壞蛋都是中央文革端出來的。」（陳伯達：都是江青同志端出來的。總理和其他首長：對！）

康生說：江青同志講了，王、關、戚是「中央文革中反對中央文革的劉、鄧分子」。「王力是什麼人呢？他是一個國民黨，他是執行鄧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線的積極分子。」

他在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軍會議上就實行劉、鄧的「三和一少」路線。」「江青同志先把王力、關鋒，後將戚本禹揭露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功績，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重大功績。」

周總理說：「王、關、戚確實是劉鄧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時候，他們參加當時的文革起草小組，而正是現在的中央文革幾位領導人親自把他們覺察出來，把他們端出來。」（葉群高呼：學習江青同志的鬥爭精神！）

上面的引文都充分說明，打倒王力是江青搞的。所以在這裏必須首先講一講王力同江青的矛盾，和江青爲什麼要打倒王力。

早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初，彭真、王力等到杭州去見毛主席。正題談完後，彭真同志提出，現在報上的學術批判問題值得研究。彭真同志提了個頭，王力就把對學術批判的一些直感性的意見向毛主席提出。王力的意見是說：第一，現在輕易地把學術性問題提到政治，動不動戴上個大帽子，這對百家爭鳴不利。一棍子打死了，不許在學術上發表不同觀點了。第二，今天點名批判這個，明天點名批判那個，弄得學術界人人惶惶不安，沒有一個界限，也沒有樹立幾個標兵，這樣不好。另外王力向毛主席提出，京劇改革我是贊成的，現代戲也很好，但我不贊成傳統戲都不要演了，傳統戲還是可以演吧？鬼戲也不能一律禁止，也不能說鬼戲都不好了。王力還說：主席，你不是提議編了個《不怕鬼的故事》嗎？爲什麼古鬼可以，古人

寫鬼可以，今鬼就不可以呢？莎士比亞不是有個哈姆雷特嗎？為什麼洋鬼可以，土鬼就不可以呢？王力的話說得不那麼好，毛主席生氣了。我知道闖了禍了。可是毛主席還不是完全不接受意見。毛主席最後說了兩句：一句是：江青是有點「左」。（這是針對傳統戲、鬼戲問題談的。）第二句說：學術批判的確要有一個界限，要樹立幾個標兵。郭沫若、茅盾、範文瀾、翦伯贊四個人不準批。這件事，使江青對王力恨之入骨。所以在文革開始時，王力沒有被毛主席和江青承認為文革小組成員。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以後，王力才算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員。江青說：「留一個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因為當時黨中央重要的秀才統統打倒了，中央起草文件完全是生手也不行，所以說要「留一個王力」。王力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過是個留用人員。當時有一個專案組，是專門整老幹部的，是江青管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專案組。這說明江青一開始對王力就是不信任的。

在毛主席、江青從外地回北京前，即七月下旬以前，王力不管在文革小組以外還是以內，都是在黨中央少奇、小平同志正常的領導之下工作的。這一界限要搞清楚。毛主席和江青回北京以後，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小組辦公機構建立以後，王力正式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還當了幾天辦公室主任，可是這辦公室主任沒有當幾天，八月、九月、到十月、就被江青撤換了。十一月就同江青正式衝突了。

衝突的主要原因是王力堅持應該按原來的常委名單發文件，就是說發常委的文件還要發

給劉、鄧。更重要的是，八月份江青、張春橋動員王力批鄧。本來是毛主席決定開生活會（常委、文革小組成員及蕭華、楊成武參加）批判劉少奇。可是當時江青發動、林彪同意，把目標轉移到對鄧，以鄧為主。江青說，劉少奇一張大字報就打倒了，現在主要危險是鄧。由葉群出面動員蕭華、楊成武發言，由江青、張春橋出面動員王力、王任重兩人發言，揭露鄧。可是在會上王力仍是一言未發，引起江青的痛恨。

在一系列問題上王力不大聽江青的。拿江青的話說：「你這個王力，我不找你，你從不找我！」「你的眼裏就沒有我江青！」凡是江青提出些意見，下什麼指示，王力都要問：是你的意見還是主席的意見？是主席的，我們執行。有時她說是毛主席的意見，但王力認為不對，就對江青說：主席不是指示過嗎？同這個意見不一樣！那時王力也能找主席。所以江青最討厭王力。

江青最痛恨的是王力經常提醒主席：你不是講過小平同志怎麼好嗎？不是要把劉、鄧分開嗎？人們傳說王力經常在主席那裏講小平同志的好話，這是事實。王力不是用自己的語言講，而是用主席的語言講。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武漢，王力同毛主席單獨談話時，毛主席又大講小平同志的好話。毛主席在武漢還說不贊成對劉、鄧、陶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說這樣勢必發生武鬥。王力回北京後把毛主席談話記錄整理出來送常委和文革小組。後來江青布置戚本禹、八三四一部隊對劉、鄧、陶夫婦進行武鬥，王力批評江青，質問為什麼違背主席

指示？又把毛主席這一段話單獨抄出來送戚本禹，叫他送江青。江青非常不高興。她把王力看成是心腹大患，非除掉不可了。

除了王力對鄧的態度外，江青很不滿意的第二個問題是王力支持周總理。好幾次周總理受到圍攻（例如攻擊周總理一九六七年五一節還考慮劉、鄧、陶上不上天安門的問題），都祇有王力替周總理講話。這一點江青也非常痛恨。七·二零事件發生當天，周總理第二次飛武漢，有兩個任務：一個是部署把毛主席護送到上海，第二是營救王力。周總理對王力那麼親密，又是擁抱，又是貼面，又是流泪，江青聽說後很不高興。王力回北京後，鄧穎超大姐來看王力，贈送了禮品，江青就把自己同周總理的矛盾乘機發泄出來，大罵：「王力！鄧穎超來幹什麼！她把統一戰綫統到中央文革來了！」王力說：每天有好多人來看望我，爲什麼鄧大姐就不能來看望我呢？我同她吵了一架，在很多問題上王力支持總理，這裏就不一一說了。將來在文革回憶錄中再詳細說。

武漢事件後，王力同江青的矛盾表面化了。王力在第一綫，親身體驗到下面的種種情況，因而對武漢事件後江青們的一系列作法，王力都表示了不同意。王力不贊成機場盛大歡迎，說這不正常，不要開這個先例。天安門百萬人大會，全國游行示威，王力反對，認爲很反常。江青說：「這不是因爲你王力打傷了，是爲了毛主席。」這樣王力就不好再說了。我心裏當時就很擔憂，很沉重：毛主席被迫從武漢轉移到上海，蒙受他作爲偉大領袖以來空前的耻辱；

而王力並無大功，却獲得非份的史無前例的榮耀。這絕不會有好下場。當然我沒有想到風雲變幻得這麼快。在天安門城樓上王力又對江青說，這樣作法要考慮後果，會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引起衝擊軍隊的風潮。在京西賓館鬥爭陳再道、鐘漢華，王力又不贊成。王力認為不能追究他們的責任，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中央文革也有責任。在鬥爭會上，王力雖是主要當事人，但一句話未講。總理要王力發言，王力還是沒有發言。一句話也沒有批評陳再道、鐘漢華。陳再道的回憶錄也說，會上人人要表態，但是他舉不出王力說過一句話。他不知道王力還寫了條子給會議主席，說中央開會要他們彎腰不好，這也是武鬥。江青把條子撕了，還瞪了王力一眼。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漢，毛主席召集了一部分人開會，包括總理。講到武漢把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陳再道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時，王力插了話，說第一個把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漢，是江西，是中央文革小組批的。主席要我回去把中央文革批示再給他送來。七·二零後我回到北京，對江青等人說，主席要看中央文革過去批示把江西一個大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的原件。當時江青很不高興，說主席不是看過了嗎？王力說，主席還要再看。這個文件是他們決定對江西一個大的群衆組織採取專政措施的指示，簽名的是陳伯達、康生、江青，主要是江青的主張。毛主席看過這個文件以後，要文革小組公開檢討。江青爲了這件事對王力更加不能容忍。

江青等人的一系列作法，王力都反對。事件發展很快就證明了王力的反對是正確的。果然到處衝擊軍隊，全國很亂了，奪槍事件也發生了。江青爲了推脫責任，就反過來把事情賴到王力頭上，說王力反軍亂軍。

武漢事件後，海陸空軍各部隊和地方大小單位，每天都有大量電報，「向王力同志學習，向王力同志致敬」。還拍了電影，王力的一邊是林彪，一邊是總理。其實這都是江青他們搞的。要拍電影時，王力就是反對的，而且拒絕參加審查這電影。但電影還是拍出來了，放映了。這樣就把王力抬成了大明星，這又使江青懷恨了。江青說，王力的威信大大超過我江青了。她不能容忍。

江青向毛主席告了惡狀，說七·二零事件後，王力以爲天下不是毛澤東的，是王力的了。這句話，原來是江青對康生私下說的，後來又在鬥爭大會上說的。這是笑話，王力不過是個秀才，給中央作點秘書性工作，一輩子都是做意識形態工作，別無他求。可是這話犯了毛主席的忌諱，他相信了。毛主席說，要查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江青對康生說，我早就一眼看出王力是壞人，要康生查一查。康生一聽江青說王力是壞人，連夜不睡覺，調了王力的檔案，第二天就向江青證明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別人不懂得歷史，康生應該懂得。王力是黨派到東北軍作地下工作的，我所在的部隊是萬毅部隊，萬毅是共產黨員。康生明明知道，但是他昧着良心說王力是國民黨特務。所謂蘇修特務，就是因爲莫斯科裁軍會議時王

力同安德羅波夫談過一次話。當時安德羅波夫是蘇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聯絡部部長，王力是書記處派的中聯部的負責工作人員，這是兩黨聯絡部負責人的對話，而且還有幾位同志在座。當時安德羅波夫並不是克格勃頭子。王力怎麼能成爲蘇修特務呢？江青還說王力是「五一六」頭子，組織和操縱了反革命陰謀集團。總之，江青爲打倒王力，不擇手段。她說：「就是無辜的，也要這麼定！」

康生歷來會整人，自從成了江青的附庸以後，這方面的才能更加發揮了。祇要江青懷疑一個人是壞人，康生就連夜查檔案。第二天就證明這個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這次江青要整王力，康生嚇破了膽，三天沒有吃飯，他怕牽連到自己，所以昧着良心證明王力是壞人。整王力之前，在釣魚臺十六樓會議室，江青和康生從走廊走過來，一面走一面說話，聲音很大，說的正是準備怎樣整王力。這時王力因爲在武漢腿打斷了，坐着輪椅，到外面透透空氣回來，在會議室的門後邊，等着人來抬上樓。江青和康生的談話，王力都聽到了。康生說王力是在蘇北參加革命的，蘇北的黨是「紅旗黨」，是假的。又說王力是華東局的幹部，「華東局沒有一個好人」。說王力姓國不姓共，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還說王力的老婆王平權家裏是一「窩黑貨」，王力的老丈人王翔千是「叛徒」。這是胡說。王翔千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他是一九二零年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在濟南主編晨鐘報的。康生還說王平權的大姐王辯也是「叛徒」。這也是胡說。王辯也是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一九二三年入團。一

九二四年入黨，在莫斯科是鄧小平的同班同組的同學。王平權兄弟姐妹六人都是老黨員，怎麼成了「一窩黑貨」呢？還有王願堅，是王平權的堂弟，康生也說他是文藝黑綫上的人。王力的歷史是很清楚的，每一段都有人證明，每次運動不管多麼「左」，都沒有審查出王力有歷史問題。康生居然說王力是國民黨，而且在全國散布這謊言。

康生和江青都是近視眼，沒有看見王力，所以他們的說話王力都聽見了。後來他們說要叫王力，王力說我在這裏！江青就說：王力！你什麼時候入黨？我說，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歲時入團，一九三九年三月不足十八歲入黨，沒有候補期。江青把桌子一拍說，不跟你談了。我就回去了。

兩天以後，就在釣魚臺開「生活會」鬥爭王力。這時他們內定的罪狀是作爲敵我矛盾，特務、現行反革命、「五·一六」頭子。鬥爭王力的主要發言人就是康生。他和江青背後談的話沒有在會上講，因爲那些話太站不住腳了。他講的是編造出來的罪狀：

第一，所謂「毀我長城」。

康生、江青把王力在武漢事件後所反對的，他們自己的一些作法，反過來歸罪于王力，說王力「毀我長城」。事實上王力是「保衛長城」的。周總理在批評陳再道的會議上說，王力每次講話都是保衛軍隊的，包括北京衛戍區。康生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講話把矛頭指向衛戍區，王力向總理遞了條子，這個條子在會上傳閱了，也給當時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

看過。條子說不能搞衛戍區，北京的軍隊不能搞亂。康生要打倒李鐘奇，王力說不能打倒。四月四日總理要王力出面講話，也就是這個精神。康生把由於他們的錯誤造成惡果歸罪於王力。陳再道也說王力是替罪羊。王力一直反對江青康生等人對部隊的一些作法。反對的人反而成了有罪的人，搞亂的人反而成了正確的人了。

第二，所謂「反對周總理」和所謂「八七講話」。

康生攻擊王力的第二條罪狀，叫做「反對周總理」。這也是顛倒黑白的。王力在總理幾次受到圍攻時，一直站在總理方面，總理也對王力很好。所謂「八七講話」，是這樣的：中央文革規定八月七日接見外交部群衆組織姚登山等人，臨時因為別人都去出席晚會，祇有王力一人負傷在家，就讓王力接見，主要是了解情況，聽稟報，王力沒有系統地發表什麼講話，祇有一些插話。他們把插話穿到一起，成為「八七講話」。有些重要內容他們沒有整理進去。例如王力說：「任何群衆組織祇要是反對周總理的，就要同他們劃清界限。」這句話他們就沒有整理進去。要給陳毅加點壓力，是毛主席的意思。王力的插話是根據毛主席的調子講的。差不多是主席的原話。毛主席說過，我一定要保陳毅，但先要紅衛兵給陳毅加點壓力。還說，群衆喊打倒就讓他們喊嘛！檔案裏可以查到，毛主席在八月中旬，還說他贊成群衆喊打倒陳毅，以後保陳毅也要靠群衆。我理解主席的意思不是真要打倒陳毅，群衆喊喊可以。所以我才那樣講。姚登山等說：我們不是真要打倒陳毅，祇是給他加

點壓力。什麼時候毛主席要保陳毅，我們立即擁護。我說：不是真打倒，這個態度好。要報告總理，讓總理也放心。這些話他們也沒有整理進去。江青因為控制不了局勢，就把「反總理」的罪名轉嫁到王力頭上。康生把江青等人對總理的作法，對外交部的作法，賴到王力頭上，瞎說王力是野心家，想當總理。這是胡說。

第三、「反對中央文革」。

康生攻擊王力的第三條，是說王力怎麼反對中央文革的領導人，反對陳伯達、康生、江青。他們羅列了好多罪狀，說我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我覺得我當時覺悟還沒有那麼高，還沒有明確地反對他們這三個人，祇是對他們一些不對的作法，經常提出些不同意見而已。這就叫「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

以上這三條就成為全局性的意見，也就是作為「五·一六」頭子的罪名。

第四，王力是「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黑幹將。

康生攻擊王力的第四條，就是說王力是老右，老修正主義。特別罵王力是劉、鄧、王（稼祥）「三和一少」的黑幹將。說莫斯科裁軍會議是王力去的，王力寫反修正主義文章是兩面派，并不是真反修，他自己就修，就是「三和一少」、「三降一滅」，是王稼祥的黑幹將。說王力不但在國際問題上是「三和一少」，而且在國內問題上也是右。不論國際國內，都是修正主義的一套。

這樣，康生就把王力罵倒了，一無是處。其他人每人都罵一通。

會上祇有周總理爲王力說了幾句話。當吳法憲攻擊王力，說火燒英代辦處是王力的罪名時，總理插話說，火燒英代辦處的問題沒有王力的事。並且說，這事爆發的導火線是因爲外交部群衆組織參加領導時，搞了個四十八小時的通牒。（當時英國在香港抓了幾個中國記者，我們來了個四十八小時通牒，限英國政府在四十八小時內釋放，否則就要採取措施。）總理說這件事王力不知道，是總理簽發的，沒有來得及請示主席。（火燒英代辦處時，王力正打斷了腿，不能出門。康生、陳伯達去了，勸阻群衆，要他們撤退。北京的群衆組織可以聽話，但有些外地來的流竄分子，根本不聽，局面控制不住。那時王力正在請假養傷，也不管中央的宣傳工作，報紙上怎樣報導這件事，也同王力無關。）另外有人提出外交部群衆組織要總參派一個營逼近香港，這件事王力要負責。總理也插話說，這事不能要王力負責，王力不知道。

最後江青總結說，王力是鄧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綫上的人。宣布對王力的處理是「請假檢討」。實際上是從此被關起來了。

最後總理說，也要聽一聽王力本人意見嘛！總理說這句話後王力哭了。打倒這麼多年，就哭過這一次。王力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就是主席叫王力辦第一個學習班，把武漢部隊的幹部、湖北省委的幹部集中到北京學習，這件事情王力不能管了，希望確定由誰辦下去。當

時確定由謝富治辦下去。

會一直開到八月三十一日凌晨，同時打倒的有關鋒。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就被江青關起來了。

一散會，就叫王力搬家。這是第一次搬家，搬到釣魚臺二號樓，不許帶東西，沒有電話，切斷了跟外界的聯繫，周圍有崗哨，從此就失去了自由。他們編造的大量誣陷之詞，在社會上廣為傳播，大字報滿天飛，國內外反映都很強烈。

他們誣陷王力是一五·一六一頭子。

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和九月五日，就先後在接見北京和安徽的群衆組織的時候宣布，北京「有這麼一個反革命組織，叫『五·一六』……真正幕後的人都是很壞的人。」九月八日姚文元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就正式宣布了。這篇文章主要矛頭不是對陶鑄，重點是在文章後面的那段話。其中有「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達到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文章主要矛頭是針對王力了。

大字報滿天飛以後，九月十日左右，總理在二外群衆組織會上宣布對王力問題的幾項原則：第一不許貼王力的大字報；第二貼了的要覆蓋；第三王力問題的處理由中央負責，不要下面群衆組織來搞；第四對王力問題不要無限上綱。九月十四日向王力正式傳達毛主席

對王力同志的幾句話：「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毛主席這時對王力還是同志相稱，不象江青、康生把王力當作敵人。因此就產生了王力上不上天安門的問題（這是聽我身邊的護士說的）。這時，毛主席、周總理對王力的態度同江青、康生有性質的不同。可惜一直就按江青、康生定的性來處理了。天安門沒有上，繼續關着。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陳伯達、張春橋和王力談話，叫王力再搬一個家，把王力交給衛戍區了。王力被送到西山一座別墅，在那裏被關着。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春節前夕，來了幾個穿軍裝的，說中央決定叫你再搬一個家。這是第三次「搬家」。這就裝到囚車上了，沒戴手銬，送到秦城監獄去了。這樣在秦城一直關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春節前夕，才從秦城監獄出來，送到中組部招待所。

江青在秦城對王力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

王力在秦城受到迫害和虐待，是最慘無人道的。特別是頭五年，五年不放風，最初不給任何帶字的東西看，包括毛主席語錄本。每天二十四小時有一個人從門上的小洞裏看着王力。五年睡覺不許翻身，必須面對着那個小洞。睡的床是兩條凳子支着一塊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白天還不許坐在褥子上，祇能坐在木板上。要坐在一定位置，哨兵從洞裏可以看到。飯不給吃飽，更受不了的是祇給極少的水喝。毛主席不許專案組審訊王力，王力一直不知道究竟爲什麼被關到監獄，更談不上有任何法律手續了。十年家裏不知道王力是死

是活，人在何方？

特別殘酷的是，江青他們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擋起來，使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時用喇叭放噪音，不給看病，還強迫灌一種藥，吃下去使你造成幻聽幻視。我還記得，有一次喇叭裏，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聲說：「這次運動，除王力一人外，一個不殺。」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是現行反革命！」反復廣播。我憋了三小時，最後高呼：「王力從小就是共產黨！現在爲了黨的利益，爲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據最高指示，王力宣布承認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我擁護槍斃王力，這是爲了革命的需要，這個犧牲是必要的。」我反復高呼三遍，然後就走向刑場。一天在喇叭裏宣布槍斃多少次，每次宣布槍斃，王力就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唱國際歌。然後又宣布不槍斃了，顯然江青要把王力折磨死，至少要把王力的大腦破壞。他們害怕王力知道的事很多，對他們不利，所以採取這種世界上法西斯也很少有的野蠻辦法對待王力。

五年以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下旬，劉建章（出獄後曾任鐵道部長）的夫人探監以後，把秦城不許喝水等情況寫信報告毛主席。毛主席批了：你們這些法西斯辦法是哪裏學來的？要改正，看管人員對關着的人，要樹立爲他們服務的觀點。周總理也批了，要向每個被關的人傳達，聽取意見，向中央報告。總理說還要親自檢查。一九七三年元旦向我傳達以後，生活待遇有了改善。但是，因爲在徵求意見時，本來每人祇準講五分鐘話，王力講了半小時，表

示堅決抗議，提出不僅秦城管理辦法是法西斯；沒有任何法律手續，沒有宣布任何理由，把王力送進監獄，一關就是五年，同家屬完全斷絕音信，這作法本身是不是法西斯？這又是從哪裏學來的？王力抗議的矛頭是對江青、康生的，說他們的作法就是法西斯。所以，從一九七三年毛澤東指示反法西斯以後，王力在政治上依然受到江青、康生的迫害和摧殘。現在有人竟然說王力積極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團，這連起碼的邏輯和歷史的常識都沒有了。王力早在一九六七年就被打倒了，那時根本就沒有林彪反革命集團，在王力打倒兩年以後，「九大」還一致通過林彪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在林彪叛逃後，江青反革命集團才逐漸形成。那時王力已經被關起來七年多了。康生去世時，還被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來問題爆發了，成為主犯，但黨中央從來沒有說有什麼「康生集團」。既然在王力被打倒前這些集團都不存在，王力又如何去「積極投靠」他們呢？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江青、康生之所以要打倒王力，是因為王力和他們有矛盾，是因為他們自己把局勢搞亂了，所以要拿王力作替罪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遇見王光美同志時，她握着我的手說：「你是替罪羊，也是受害者。」陳再道的回憶錄也說王力是替罪羊。

王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王力從來沒有被起訴，從來沒有被依法剝奪過政治權利。王力享有完全的公民權。王力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是受到神聖的憲法保護的。王力對於任何侵

權行為和誣陷，是有權訴諸輿論和法律的。

我相信，江青們往王力身上潑的污水，總有一天會洗刷幹淨，還王力一個清白。

我在《王力詩詞》中附了于謙的一首詩：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我是一棵叫做「死不了」的小草。旱不死，澇不死，踩不死，壓不死，害不死，病不死。在人民和祖國的泥土中生根，在人民和祖國的陽光和雨露下生長，不但活下來，還不停頓地把小花獻給人民和祖國。

王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忘記爲黨工作。就是在秦城也是這樣。一九八一年春天，才開始給紙筆，王力就向黨中央領導人寫信，提出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多方面的建議。不少建議已被黨中央采納。鄧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對王力的評價是：「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爲黨工作的。」一九八二年離開秦

城後，王力研究黨中央如何發展馬列主義問題，這時期王力更是經常向黨中央提建議。這種工作一直持續到現在。即使在患晚期癌癥時，在上手術臺前後，在宣布病危時，都沒有間斷。王力一共寫了幾百萬字。這次選編了《王力反思錄》，溫故以鑒新。過去的教訓，是今後的借鑒。這也是我個人在坎坷的道路上的足跡。但願這些用心血寫成的東西，能够有助于鼓舞人民奔向美好的未來。

（三）駁「王力是康生的人」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違背歷史又違背邏輯的說法

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打倒一個人，就要說這個人是某某壞人的人。這種說法現在還有市場。據說，現在又有人說王力是康生的人了。王力根本反對把黨的幹部分成爲是誰的人

的說法。根據這種說法，就會出現違背歷史又違背邏輯的奇談：文化大革命開始，說王力是彭真的人。後來打倒劉、鄧、陶，又說王力是劉、鄧安在中央文革的釘子，是鄧小平的人。後來打倒楊、余、傅和蕭華，又說楊、余、傅和蕭華是王力的後臺。打倒陳伯達，又說王力是陳伯達的人。打倒林彪，又說王力是林彪的人。打倒四人幫，人們都說，你是被江青打倒的。現在江青倒了，你的問題該解決了吧？我說不一定，還得看。果然又說王力是江青的人了。這樣我就成了五朝元老，打倒一個人，就說我是他的人；說一個人是好人了，就說我反對他。過去不是一直說我反對「康老」嗎？現在因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打倒了，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實在連不上，于是又說我是「康生的人」了。甚至公然違背黨中央的歷史決議，制造了一個「康生集團」的新名詞。制造者忘記了，康生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底壽終正寢時，還被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哪裏來的康生集團？如果我是「康生的人」的話，我那時也就不會被打倒了。我看，「王力是康生的人」這句話，要加幾個字：「王力是受康生迫害的人」。

駁「王力是康生提拔的」

有人說，王力是康生從延安就開始培養提拔的壞人，一直提拔到中央文革。說這話的人不知道，王力沒有到過延安。在抗日戰爭時期，王力主要在山東工作，羅榮桓同志對王力是了解的，并且評價很好。

還有人說，王力是一九四七年山東渤海區黨委土地會議的時候就被康生一手提拔起來，一直到參加中央文革。這又說的不對頭了。一九四七年康生到了渤海區黨委，當時王力是華東局在渤海的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還挂了個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名義。這同康生無關。當時康生找過王力一次，是因為王力寫了一本當時很著名的小說，叫《晴天》。當時描寫農村土地問題的小說還祇有這一本，各根據地都翻印了這本書，毛主席也看到了。毛主席很欣賞這本書。康生找王力，就是告訴王力說毛主席很欣賞這本書。康生說他也很欣賞這本書。在渤海區王力僅僅同康生見過這一次面，談過這一次話。這次見面，我記得還有曹軼歐、徐冰、張曉梅、于光遠、毛岸英在座。這時，康生搞他何家坊的調查研究，王力搞王力的土改工作團，各人搞各人的。渤海區黨委土地會議是鄧子恢等同志主持的，康生是後來參加的。至于康生在會上起了什麼作用，我不知道。因為我是集中力量搞試點工作，這個會議雖然通知我參加，我並沒有參加。因此說康生在這個會上提拔了、利用了王力，這不符合事實。如果說康生那時就預料到二十年後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因此從那時就提拔王力了，那更是荒唐可笑的。王力擔任渤海黨委宣傳部長、區黨委委員的時候，康生是魯中南區黨委書記，同王力毫無工作關係。解放後，王力在上海，在華東局工作；康生留在濟南，主持山東分局工作；同王力也沒有任何工作關係。一九五零年康生就養病了，王力一九五三年底被中聯部派到越南胡志明那裏當宣傳文教顧問組長了；一九五五年十月份王力回國，仍然是在王

稼祥同志領導下工作。到一九六零年二月參加莫斯科華沙條約國會議的時候，才同康生有工作上的接觸。

同蘇共爭論中王力康生的工作關係

人們議論得較多的是，在同蘇聯論戰和談判的過程中，王力同康生一直是在一起的。這問題又要把它分清楚。參加在莫斯科開的華沙條約國會議，這個名單是黨中央確定的。成員有康生、劉曉、伍修權，秀才是王力。王力是作為中央的秀才去的，并不是康生提名的。王力在一九五七年寫了幾篇重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欣賞。同一年，王力就參加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篇文章的整理和發表的工作。一九五八年創辦《紅旗》雜志，毛主席同王稼祥等同志商定要王力參加創辦《紅旗》，作為主管國際問題的編委。《紅旗》創辦後，王力、喬冠華、姚溱（主要是王力），用于兆力的筆名，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王力當時是黨中央寫國際問題文章的主要秀才之一。布加勒斯特會議，彭真同志是團長，協助彭真的，原來定的是王稼祥，因為他身體不好不能去，臨時要康生去的。一九六零年王稼祥一直養病，因此每次同蘇聯打交道，都是康生代替王稼祥去的。這一段并不是康生主持中聯部工作，所以同王力並沒有領導被領導的關係。同蘇聯及其他共產黨的論戰，寫了八篇文章，第一篇是《列寧主義萬歲！》，最後一篇是《再論陶裏亞蒂同我們的分歧》，從一九六零年一直寫到一九六三年，當中還插了個對蘇共《通知書》的《答復書》，這些也

都沒有康生，因為康生負責編毛選，編毛選的班子，毛主席要王力參加，稼祥同志不同意，說國際共運中要寫一系列文章和文件，王力不能離開，熊復可以去。這樣，熊復參加了康生主持下的編毛選的工作，王力一直在寫國際問題的文章和文件。這當中王力有半年多時間不在北京，因為毛主席要搞「六十條」，在湖南調查研究，在廣州定稿，王力參加了。這也同康生沒關係。一九六三年四月開始在杭州起草「二十五條」（關於國際共運總路線的建議），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協助主席的有陳伯達、王力、範若愚。在定稿時，毛主席在武漢找了一些領導人，其中有康生。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八月開始寫《九評》（九篇同蘇共公開論戰的文章），康生才到釣魚臺八號樓主持這工作。康生主要做了寫文章的組織工作，每一篇文章都是小平同志拍板，送主席及其他常委，毛主席最後定稿。

「三和一少」的來源

又有人說，是康生同王力一起反王稼祥的「三和一少」。這件事要把它說清楚。因為「三和一少」是一個大問題。這問題開始時同康生沒有關係。首先醞釀這個問題是一九六零年春天，王力在廣州參加起草六十條，當時稼祥同志在廣州養病，王力向稼祥同志匯報了湖南農村的嚴重情況：因為大躍進、大煉鋼鐵、搞公共食堂，砸了農民的鍋，有的地方餓死人。王力把這些情況向稼祥同志匯報後，他很難過。他說我們革命這麼多年，取得政權不容易，現在農村以至全國問題這麼嚴重，我們應該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把農民問題以至整個國家

經濟搞好，現在搞得沒有飯吃，餓死人，我們對不起老百姓。稼祥同志談話時哭了。然後我們談到了爲集中把國內問題搞好，在國際上應當採取緩和的政策，也就是說同美國等國不要搞那麼緊張，同蘇聯等國也不要搞那麼緊張，同印度等國也不要搞那麼緊張。國內那麼困難、又窮，對民族解放鬥爭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不應該把人民的血汗那麼慷慨地送人，這不叫國際主義，因爲中國如果搞不好，政權不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是最大的損失。我們談得很投機。我當時談到我對國內問題的一些主張，稼祥同志不完全同意。我說應該參照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適當退却，很多問題應重新考慮。現在是跑得太快了。（後來稼祥同志曾說：「說我右的話，有的秀才比我還右」，就是指這個。）從一九六一年起，稼祥同志醞釀了一系列意見，他首先同少奇同志作了交談，少奇同志同意他的觀點。他曾經在一九六二年用黨內通信的形式向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同志寫了一封信。發這封信時，在中聯部部務會議上給大家看了，他要劉寧一、伍修權二位同志也簽上名，因爲他們都是中央委員。當時劉、伍簽了名。稼祥同志把一系列意見搞了一些文件，主要是參加國際會議的「宣傳口徑」和「活動方針」的問題。最高峰是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軍會議，稼祥同志提出方案，主持起草講稿。代表團的團長是茅盾，副團長是康永和。在這個班子出發前，書記處開會，完全同意稼祥同志提出的方針和方案。小平、稼祥二同志又提出並決定要王力去參加，作爲中國黨的代表同蘇共進行談判。王力提出要中辦翻譯組組長閻明復一起去，所以在莫斯科採取的方針，就是

一九六一年開始醞釀的一系列緩和的方針的實施，也就是少奇同志一九六零年底同赫魯曉夫達成的協議：不要先公開吵架，而是先經過中蘇兩黨內部協商，然後跟主要兄弟黨協商，然後才拿到群衆會上去。這次莫斯科會議第一次實行這個協議。王力同安德羅波夫進行了交談，達成了些協議。雙方觀點當然有差異，各人堅持各人的立場。然後開兄弟黨會議，王力參加，還有康永和、區棠亮。康永和發言。然後在公開會議上茅盾講話。會議沒有最後開完，王力和閻明復就回去了。王力和閻明復一回到北京機場，小平、彭真、稼祥三位同志就在懷仁堂等着聽取匯報。三位同志完全支持王力的工作，也就是支持稼祥同志的方案，支持少奇同志和赫魯曉夫的協議。閻明復同志認爲在他所參加的群衆會議中，這是最成功的一次。但是這次會議闖了禍了。後來毛主席不同意稼祥同志一系列的方針作法，他把稼祥同志的主張歸納爲：對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爲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爲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持要少。這就是「三和一少」的來源。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

毛主席把國際上的「三和一少」同國內的「三自一包」相聯系，形成了「黨內出現新的右傾思想」的這種概念。這是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之前形成的。這個概念的形成，對黨的歷史發展，對中國的歷史發展，起了極大的、也是極壞的作用。在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

批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有四個人：「三自一包」主要是陳雲，附帶田家英；「三和一少」主要是王稼祥，附帶王力。在這個會議上，陳雲同志請假，其他三個人到會了。由於毛主席在黨內的威信、地位，所有的人都接受毛主席的意見。稼祥同志和王力馬上按照毛主席的方針，重新考慮在國際會議上的作法，起草了一個參加日本關於禁止原子彈會議的方案，還是用參加莫斯科裁軍會議的原班人馬，但是方針按照毛主席的方針，對蘇聯以及所謂修正主義國家和黨的代表，針鋒相對，就是要吵架。按照這個方針，在禁止原子彈會議上作了個典型試驗。當時認為這樣就好了。對王稼祥和王力來說，通過這次會議是改正錯誤了。

毛主席要外事小組組長陳毅同志作一個反「三和一少」的國際問題的報告，在北戴河會上講，調劉寧一、廖承志、孔原、喬冠軍，也加上王力，來起草這個報告。稼祥同志實際上也參加了。在會議上，少奇、小平同志都沒有發言。這件事康生沒有參與，因為他在編毛選。毛選四卷出版以後還要編五卷，還要編劉少奇選集。

當時，田家英因為「三自一包」受到批評，王力因為「三和一少」受到批評，我們二人不約而同都去找康生。當時在我們心目中康生參加黨中央的領導比較早，同毛主席說得上話，他又是超脫的，編毛選劉選，沒參加國際國內實際工作。我們兩人都希望他能出來講幾句話，對陳雲、王稼祥二位同志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康生不理，說他不管這事，拒絕去找毛

主席，他對我說，在書記處會議上看到你們搞了那麼多文件，什麼「宣傳口徑」，「國際會議的新方針」等等，當時就大吃一驚，覺得不對頭，難道我們黨出了什麼大問題了嗎？他這是事後諸葛亮。因爲在那個會上，他並沒有發言。所以這件事同康生沒關係，他不願意去找毛主席，也就算了。

九月份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把北戴河的思想又講了一番，兩番話都是強調階級鬥爭。在北戴河講的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在十中全會講「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後來整理成爲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基本路綫的，就是北戴河同十中全會的兩次講話。在十中全會上，并沒有公開批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沒有批評陳雲、田家英、王稼祥、王力，但精神還是那樣的。

外事小組開會批評王稼祥和王力

在十中全會期間及以後，經過毛主席批准，用中央外事小組名義開會批評王稼祥同王力，主要是王稼祥。會議是在外辦開的，由廖承志主持。這個會議着重批評莫斯科裁軍會議，以及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並且經過書記處討論通過的一系列文件。這個會議有簡報，可以查。還有一種絕密的簡報，祇印七份，發給最高領導同志，現在檔案裏還有，也可以查。這個會稼祥同志沒到會，王力每次會都到了。在會議總結之前，王力發言，作了自我批評。王力在這個會議上一句話沒批評王稼祥，把錯誤都說成是王力自己的。更沒有往上推。這都有檔案

可查。

十中全會上，增補了幾個書記處書記，有陸定一、康生、葉劍英。當時增補康生，并沒有說代替王稼祥。康生還是編毛選劉選。十中全會並沒有對王稼祥怎麼樣，但是外事小組開會的簡報送給王稼祥，他就沒法工作了。簡報送毛主席及其他常委，毛主席及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都覺得稼祥同志沒法工作了。稼祥同志被批評後，同蘇聯打交道每次都是康生作爲主要助手，少奇、小平、彭真、恩來同志分別當團長。正式要康生管中聯部，是到毛選、劉選可以放一放的時候，也就是到一九六三年了。康生兼管中聯部後，他還是中央理論小組組長，他還是搞理論批判爲主。正因爲一九六三年以前康生並沒有主管中聯部，也並沒有到釣魚臺主管《九評》，所以這一段王力同康生並沒有正式的、經常的工作關係，祇是臨時性地一起參加代表團。

康生主管中聯部和國際共運后同王力的工作關係

一九六三年以後，康生負責主管中聯部以及負責主管對蘇聯批判文章的這一段，康生是王力的頂頭上司。但還要說明：這一段王力也不是完全在康生領導下工作，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和書記處的同志經常直接布置王力的工作。過去搞人民公社六十條，一搞就是半年。以後還參加搞工業七十條。康生到釣魚臺八號樓和主管中聯部時期，王力還到杭州參加協助毛主席起草農村十條（即前十條）。以後又協助毛主席起草二十三條。這些文件都是搞了很長時

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小平同志要考查三綫，王力也去了。在考查三綫之前，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問題，少奇同志在會上表揚過王力，認為是搞理論工作的模範，理論同實際結合，一有時間就下去跑一跑，作調查研究，又要讀書。會後王力就到三綫去了。後來這個調查被打斷了，小平同志臨時飛上海參加批判羅瑞卿的會去了。但是王力還是把小平同志在三綫考查中的主要觀點整理成文字，這也有檔案可查。此外，周總理的每次重要報告，包括政府工作報告，王力也都參加起草。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王力所參加的黨中央的這幾件大事，也都同康生沒有關係。這一段康生除主管中聯部外，還主管學術批判。學術批判王力沒有參加，康生搞的那一套究竟怎麼樣，我沒有發言權，祇是有一些直感上的意見。

這一時期王力擔任中聯部副部長，但實際上沒有管多少中聯部的工作。

文革中康生的變化

為了說明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康生同王力的關係，必須要分析一下，康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謂「二月逆流」）以前同以後，有很大的變化。

在這以前，康生對江青的關係，還是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的。在延安，江青在康生領導的社會部工作過。江青的歷史康生都知道。江青在會上公然說：這個「老」，那個「老」，我一概不承認，我祇承認一個康「老」。所有的人叫江青都叫江青同志，唯獨康生直呼其名——江

青。

在文革開始以前及剛開端的時候，康生對少奇、小平同志還是尊重的，小平同志也知道，第一次打倒鄧，沒有康生的事。那時他還把主要精力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還抓他那個理論小組辦公室的工作。

在文革小組，他祇是顧問。當然他不滿意這個顧問的地位，這一點他同陳伯達有矛盾。陳伯達是組長。不過陳伯達一開始就是傀儡。他剛當文革小組組長不久，在十一中全會上，他就宣布自己不過是劉盆子（西漢末年農民起義，找了個放牛的作皇帝，此人叫劉盆子），意思就是傀儡。文革小組的事，主要是江青管。

康生同江青在開始時是有矛盾的，而且在聶元梓問題上發展到直接衝突的地步。曹軼歐不同意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就被江青捧得那麼高。曹軼歐是作為理論小組的工作組在北大工作的，大字報的事她知道。曹軼歐說，大字報不是聶元梓寫的，主要是楊克明寫的。楊克明找聶元梓署名，聶先是拒絕，後來才同意。因為聶元梓是哲學系總支書記，所以她的名字才寫在前面。聶元梓不能算這張大字報的領銜人。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十一中全會前夕，毛主席和江青回到北京，正式成立文革小組辦公室，要王力兼辦公室主任，要戚本禹、穆欣、曹軼歐三人作副主任。不久，由於曹軼歐同聶元梓的矛盾公開化，江青就要王力去同康生談，不要曹軼歐作副主任了。江青說這是毛主席

的意見，王力祇好執行。江青還叫我要不要說是毛主席的意見，也不要說是江青的意見，要作爲我的意見來說。我很爲難。當然說得很委婉，說曹大姐身體不好，不必擔任副主任了。當時康生對王力非常不滿，拍了桌子，罵開了。後來他也知道不是王力的意見，是江青對毛主席說的，也就算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會前，王力和關鋒去請康生主持會議時，康生拍了桌子，說要批評就要批江青，都是她一個人搞的，陳伯達被她逼得要自殺了！十六日懷仁堂會議，康生也是被張春橋告了狀的。

可是，這次事件發生以後，林彪把譚震林罵江青是「當代中國的武則天」的信轉給毛主席之後，毛主席發了大脾氣，大罵了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罵得很厲害。散會後康生說，我同主席相處這麼多年，從來沒見主席發這麼大脾氣。他說他不能向江青傳達，祇能告訴江青的秘書，什麼時候江青起床，他就去向「江青同志」報告。從此，他同江青的關係，對江青的態度就變了。從此以後不是江青找康生，而是康生找江青了。康生從此以後變成江青的附庸了，一切問題都以江青的意志爲標準了。

康生歷來會整人，自從成了江青的附庸以後，這方面的才能更加發揮了。祇要江青懷疑一個人是壞人，康生就連夜查檔案，第二天就證明這個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打倒王力，也正是江青斷定王力是壞人，康生就連夜查檔案，證明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和蘇修特務的。所以

王力不但不是「康生的人」，而是受康生迫害的人。

（四）對《聶榮臻回憶錄》關於所謂

『二月逆流』的問題的說明（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光明日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發表了《聶榮臻回憶錄》中的一節：《所謂『二月逆流』》。

所謂『二月逆流』是『文革』中一個重大事件，我當時知道內情，有責任向黨作一概括匯報。

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開會，就突然宣布打倒陶鑄的問題，批評陳伯達。重要的話有：『陳伯達！你是

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陳伯達，過去專門在劉少奇和我之間進行投機！」「不是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接着批評江青說：「你這個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裏祇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沒有別人的事！」

二、這次會上，我注意到，毛主席雖然沒有指名，但是面對着林彪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有事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毛主席還說：「總理除外，有重大問題，他是向我報告的。」

三、這次會上，毛主席做了兩個決定：第一，由王力負責立即把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調來，開文革小組會議，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江錯誤問題，祇準在他這裏和文革小組會上講，不準在別的場合講。第二，以後在這裏開會，增加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和葉群。

四、會後陳伯達找王力說，那個（打倒陶鑄的）會，是江青組織的，事先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是從被窩裏被叫去講話的。他還對王力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早已決定要自殺了，他已經查了書，拉法格自殺以後，列寧還參加追悼會紀念他，說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王力勸他不要自殺，要請示總理幫助。後來總理到了釣魚臺十四樓，找陳伯達談了幾小時，陳伯達才打消自殺的念頭。

五、二月十二日上午，張春橋、姚文元抵京，毛主席要王力到機場把他們直接接到游泳

池。同時通知戚本禹參加（因原定要戚參加籌建「北京公社」）。主要談了「上海公社」要改名問題，要黨的領導問題，要寫一篇「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章問題，還叫王力向張、姚詳細傳達陳、江錯誤和開會批評他們的問題。

六、二月十四日下午，文革小組在釣魚臺十六樓開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會，王力約關鋒一起到八樓去催康生到會，康生拍了桌子，說：「都是江青搞的！陳伯達給他逼得要自盡了。」關鋒請求說：「康老，可不能發火喲！要顧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這次會，江青說是病了，不參加。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判陳伯達，一句不批評江青。張春橋還特別說，主席的批評，對陳伯達是品質和路線的大問題，對江青祇是作風問題，小節問題。康生不發言，宣布散會，說以後再開吧！張、姚表示要十七日回上海，好快點把公社改成革委會。

七、二月十六日下午，總理在懷仁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例會，這次通知議程是討論經濟問題（不是聶文中所說的「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同志主持，每兩三天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在我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之前，總理一次未主持過常委會。）到會的有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以上政治局正式委員依次坐在總理右首，坐北朝南。其他有謝富治（候補委員）、余秋裏、王力，坐在對面。張春橋、姚文元因經濟問題同上海有關臨時參加，也坐在朝北的這邊。聶文中所列舉的出席人名單

中，有四個人並未出席這次會議，即聶榮臻、谷牧、關鋒、戚本禹。在坐位上也並沒有如聶文所說的「兩軍對壘、陣線分明」。聶總是記錯了。他老人家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執筆者根據臆測和傳說來描寫，這就不符合事實了。還有一個插曲：陳伯達不敢坐在原來位置上，一個人躲到後邊桌子角上去了，總理命令他還坐在原來位置。

八、這次會議沒有開始討論原定的議程，總理就宣布散會了。副總理們（除謝富治）和老師們對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評，你一句，我一句，持續三小時。最尖銳的是陳毅，他直接指向林彪（不指名），也批評到了主席。陳總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怎麼樣了？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又怎麼樣了？」最激烈的是譚震林，他最恨江青，也反對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和華東的所作所為。（會議開頭就是從上海打倒陳丕顯問題和汛期要漁船停產鬧革命問題同張春橋頂撞而引起的。）徐向前嚴厲地拍了桌子，提出：還要不要解放軍？葉劍英、李先念都提出原則性的批評意見。李富春未發言，唯有謝富治不斷說：「譚老板，不要這樣，不要這樣。」王力沒有發言，我是同意老前輩們的意見的，有我寫的下述《必須正確對待幹部》的《紅旗》社論為證。

九、會後，姚文元發起，說：「今天是一場大的鬥爭，王力，你要站穩立場。」張春橋說：「明天我們要回上海了，主席說過，臨走前要再見我們三個人，今天的事要報告主席，我們先對對情況。」我說：「可不能隨口亂講，要如實，要準確。」這次對情況我記下了一

個文字要點（這不是後來的「記錄」，也沒有用任何文字形式「上告」。）因此，聶文所說「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當天……整理了一個記錄，上送告狀……」并無此事。

十一、張春橋說：先找江青。在十一樓江青那裏，張春橋夾叙夾議地講了一通，江青的「病」立即好了。江青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總理、康生、陳伯達是在路線鬥爭中動搖，祇有謝富治一個人是站在正確路線一邊。」江青立即拿起電話，要徐業夫報告主席：張、姚就要回上海了，請主席今晚接見。過一會，主席通知，叫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立即到北京廳來。

十一、在談完正題之後，張春橋向毛主席報告懷仁堂會議情況，他大體上是照着「要點」說的。開頭毛主席聽了祇是笑，說到陳總的話以後，再也不笑了。張春橋突然告了總理一狀：第一，說李先念講打倒幹部是從十三期《紅旗》社論（二）開始的，總理也對這篇社論沒有送給他審查不滿。毛主席說了氣話：「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送常委審查喎！」第二，張春橋又說：「主席還記得去年總理送的一個文件嗎（三）？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裏燒一燒。打倒幹部，是他們這些人搞起來的，總理還說這個文件很好哩！」毛主席對張說：「你把這個文件馬上找出來，送給我再看看。」

十二、毛主席最後說：「現在是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幹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經

濟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鐵路。一因張、姚要回滬，主席叫王力告訴林彪、周恩來和文革小組。這時，毛主席又心平氣和了。我說：我根據主席和總理最近反復講的幹部政策，寫了一篇社論，叫《必須正確對待幹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過沒有？毛主席說：「你馬上再直送一份到這裏來，不要經過陳伯達。」我又說：「請主席考慮，我以為重要社論經過總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處的。」我回去後就立即用王力、關鋒的名義把社論送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後，給王力、關鋒寫了一封信，請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和審查這篇社論（有檔可查）。這篇社論審查前，陳老總緊拉着我的手說：「這篇文章好得很，祇要這樣，大家都不會有意見了。」

十三、我要根據主席指示把上述情況向總理作報告。那知張春橋和姚文元奉江青之命，推遲一天回滬，由張春橋對總理進行了談話。江青說那就不要我說了。後來我還是找了總理。總理告訴我張春橋跟他談了。總理還對我說：去年那個文件，主席壓下以後，為什麼不給我打個招呼？我說，當時主席是叫陳伯達報告總理的，我不知道陳伯達為什麼沒有報告。主席同時叫王力告訴余秋里、谷牧。我是當天就請余秋里到釣魚臺十六樓去講的。谷牧出差了。

十四、我要向林彪報告，江青說必須經過她。二月二十日下午，江青約我和她同車到京西賓館，叫我在那裏等着，她先到林彪那裏去了，然後又來接我去。我向林彪的報告，同向總理講的內容一樣，葉群作記錄。林彪祇說了兩句說，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

另一句是：「陳伯達祇是一個書生。」我談完以後，江青叫葉群派車把我送回去，她自己留下了。這晚江青回中南海。當時我不知道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直接了當地稱江青是「當代的武則天」。（譚震林給陳伯達的那封暗示罵江青的信我是看過的。總理也看過。）我祇是直感到空氣緊張，即使在「文革」亂世中，我也從未見過這樣詭秘行動。我預感到江青和林彪要策劃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十五、當天，二月二十日下半夜，即二十一日凌晨，康生突然來到我的房間，說：「我知道你還不會睡，先告訴你。我剛從主席那裏開會回來，出了大事了。我從來沒見主席發這麼大脾氣。立即找陳伯達、關鋒、戚本禹（不在）傳達。等江青起床後，我單獨去跟他談。」主席召開的這次會到會者有：葉群（代表林彪）、周恩來、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謝富治。主席召開的這個會我未參加，我所聽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是康生的傳達。（我所記憶的間接材料，文獻研究室已向我詳細調查，因此不講了。）按照康生的記錄，毛主席罵人確實很凶。這次會議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由周恩來、李富春同陳毅談話，由李富春、李先念、謝富治同譚震林談話，由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同徐向前談話。

十六、從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總理主持，在懷仁堂斷續地抽空開批評會。到會人有：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謝富治、余秋里、王力（這是二月十

六日到會者），新參加者有江青、葉群、關鋒、戚本禹、谷牧、蕭華、楊成武、汪東興。因爲許多人新到會，總理叫王力整理一個二月十六日的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清樣由總理和康生審定修改（有檔案可查）。總理叫王力先在會上讀一遍，核對情況。祇有陳老總提出，有一句話他沒有講，要求刪掉。總理說，講是講了，不要刪了。這樣就定稿印發了。陳老總這句話不刪，歷史更證明他正確。這才是現在檔案中的《記錄》。署名是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會議情況不必說了，祇說一點，本來沒有李富春的事，但他主動承擔責任，說副總理們的意見，都是在他家裏議論過。因而他被康生攻擊爲「俱樂部主任」。這次會上，以康生和謝富治罵人最凶。

十七、會議期間，發生了青海軍區司令員趙永夫下令開槍打死打傷群衆的事件。（林彪先說「打得好」，以後又賴到葉劍英頭上。）陳伯達送一個關於天津小站所謂的「反革命復辟」的材料給毛主席。毛主席批了：「現在從上到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陳伯達把這句話發展成爲「從上到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一直到四月中旬，毛主席還是肯定這個錯誤口號的。到了四月二十日前後，毛主席想剎車了。毛主席在會上講：「究竟有沒有這個從上到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張春橋立即打斷毛主席的話，說「當然有」。毛主席就沒有繼續講下去了。會後，陳伯達發起寫一篇《紅旗》社論，叫《堅決打退反革命復辟逆流》。我說：「按我的理解，主席是在考慮根本沒有這個逆流。」陳伯達堅持說「有」。我說：「我

不寫，你自己主稿吧！反正要送主席審查。」這篇社論是第一次也是我經歷的唯一的一次，被主席壓下不發了。毛主席找了我，說今後《紅旗》社論要經過總理主持的文革小組會議通過，總理不能決定的，再送給他看。因此，我祇知道毛主席早已否定了什麼「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了。至于後來為什麼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大講什麼「二月逆流」，並且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那時我已被江青和康生關了兩年，當然就一點也不知道了。

十八、聶文引用毛主席語錄作為「二月逆流」的結論，說：「『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語錄。這實在不能說句句是真理。戚本禹已被判刑十八年，而「五·一六」是鄧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宣布要「落實政策」的群衆問題，怎麼能扯到一起呢？這個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中捏造和定性的，老帥們又怎麼可能在半年以前就預先去對付他呢？「王、關、戚」一詞，是江青等人制造出來的，現在的黨中央從來不這麼說，為什麼又扯出來呢？這些，分明是江青橫行時代為轉移目標而散布的流言。今天以毛主席語錄形式發表，對黨、對毛主席的形象、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都不利。文章一字不提老師們和副總理們是對付江青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實在是一個不小的疏忽。

十九、懷仁堂事件發生以後，最嚴重的政治後果是：第一，江青以文革小組名義向總理

奪了黨權，公然要總理祇管政府工作，要象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與此同時，公然向總理奪了對各省市自治區建立革委會的領導權。第二，江青在文革小組內獨霸一切，陳伯達早已是傀儡。從這以後，康生淪為江青的走卒，過去一直是江青去找康生，此後都是康生去找江青了。江青多疑而狠毒。從此，祇要江青懷疑誰是壞人，康生當晚就親自查檔案，證明此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王力早已預感到自己是江青首先要鏟除的對象。江青最恨王力的地方，還不在于最後關王力時她所說：「你這個王力，我不找你，你從來不找我」，而主要在於王力對鄧小平的態度。江青最恨鄧小平。

二十、聶總在文中引用他自己所說的話，我雖未當面聽到，但我知道是確實無誤的，而且聶總的正確意見被毛主席接受了。可是釋放「聯動」的功勞却被江青竊取了。聶總是正直的，他早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大會上，就慷慨激昂地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保護科學家，令人難忘。

注：（一）這是當時致黨中央領導人的一封信。關於所謂「二月逆流」的詳細情況和分析將在王力文革回憶錄裏講。

（二）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發表的《紅旗》十三期社論，公布了毛主席提出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社論剛一發表，周總理就表示不同意，總理對我說：他去找毛主席，主席用英文祇說了一句話，他對主席說：「我懂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間，國務院副總理和各口負責人開會，部署文化大革命，會後寫了《紀要》，其中有「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裏燒一燒」的提法。這個文件被毛主席壓住未發。張春橋等人抓住這個整周總理，逼使總理多次檢討。其實，據我所知，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裏燒一燒，或者叫做來一次「反修防修大演習」，讓所有幹部都要「表演一番」，首先是毛主席提的。

(五) 對陳再道《武漢七·二零事件始末》

幾個問題的說明（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我寫了一封關於陳再道同志寫的七·二零事件文章問題的信，雖然已是歷史，但是：一、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重大事件，我是重要的當事人之一，有責任向黨提供真情。

二、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祇要一個人被打倒，就可以任意地罵他而不必對歷史負責。這是一種比延安整風時要反對的黨八股更壞的文風。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已經不斷反對這種文風。甚至提到法律的高度。但這種歪風還不可低估。我提到的陳再道同志的文章還是比較嚴肅的。我不是對人，而是向中央建議，在整風整黨中，也要反對一種先戴帽子然後羅織罪狀的八股。否則，主觀主義和派性就有藏身之所，就會出偏差。

三、黨是我的賢母。「曾參殺人」，謠傳得多了，曾母也會一時相信的。但終究會弄清楚的。

陳再道同志在政協《革命史資料》第二期上寫的《武漢七·二零事件始末》，又在《中國老年》上連載兩期。文章涉及毛主席、周總理和當時的黨中央。因陳同志不知道當時中央的內情，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實。這樣大的問題，不宜用個人名義作爲野史公布。傳播出去，對黨不利。

第一，陳文說：「王力的『四點指示』，什麼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爲工總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聽到這些，武漢軍民肺都氣炸了……」其實，這四點根本不是王力的指示，而是中央在北京確定的方針。王力既未參加制定，又未傳達，而是總理代表中央講的。（我當時的記錄稿及在秦城時要我作的清稿都交給了中紀委。）

第二，七月十三日晚，總理打電話到重慶，要謝富治第二天趕到武漢，說是有緊急任務。

總理沒有也不能在電話裏說是去「負責主席的安全」。謝請示總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隨行的紅衛兵一起去，總理同意。在總理作了決定之後，王力因主席交代的赴西南的任務未完成，才打電話給關鋒，詢問爲何改變計劃？是什麼緊急任務？關鋒說：「任務在電話裏不能講，你去就是了。」陳文把事實次序顛倒了，說王力「連夜和關鋒通話，他們密謀後，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總理考慮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于是同意了。」其實，謝、王、余去武漢時是秘密的，更末打着「中央代表團」的旗號。（現在活着的知情人可能還有七人。）

第三，謝富治要從重慶來的人同他一起上街看大字報。但是絕沒有「指定要劉豐帶路」。王力那時根本不知道有個劉豐。陳文中所引用的王力同劉豐的對話是虛構的。

第四，不是「在湖北大學門口」，而是在測繪學院門口，謝、王被群衆認出來了。這不能根據猜測來斷定是「有意識地……公開身份」。當時該校的群衆組織（三司）就用高音喇叭廣播了，各派都貼出了歡迎標語。我立即報告了總理。總理說「這也有好處，群衆正在亂猜爲什麼東湖賓館的燈亮了，現在就說謝、王、余來了，倒可以掩護主席。」總理並當即親自布置正式通知軍區支左辦公室，請他們發通知。總理是很周到的。其實，連王任重同志都知道。他還給我寫了信。

第五，要群衆組織都離開據點，各回本單位，不許武鬥，這是總理爲了保衛主席安全而

決定的措施。并不是七月十七日專門對待百萬雄師一派的。七月十五、十六兩天，對被承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首先是這樣講的。不僅如此，還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給軍區，這點陳文沒有提到。到了七月十八日，總理和我就不能再這樣講了。因為主席提出了「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可查對我當時的記錄）

第六，陳再道同志的文章中說：「我對主席說：『中央文革有威信，解決武漢問題，希望中央文革能講話。』」這句話大體上是這麼說的。陳同志還說了：「現在群衆是聽中央文革的。」可是，陳文中下面的話就完全弄錯了。陳文說：「王力認為我這是在將他的軍，滿臉不高興，氣呼呼地說：『百萬雄師就不聽中央文革的！』」其實，這句話不是王力說的，而是毛主席說的。主席接着陳的話說：「這要看什麼人，我看百萬雄師就不一定聽中央文革的。」（可查對我當時的記錄）

第七，陳文說：「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關鋒、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已經批準公布了。」王力有什麼資格去同林彪合伙炮制中央軍委的命令呢？事實上，這十條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葉群記錄的。由秘書送關鋒斟酌文字，關鋒歷來害怕江青懷疑他背着江爲林辦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當時對這十條原封未動。王力祇提一點意見，即在前邊要肯定解放軍支左成績。十條命令是中央軍委發布的，又是在全國城鄉張貼的，上邊又有「毛澤東」的名字。陳文的這種說法，對我黨我軍在群衆中的影響不利。

第八，陳文中提到并引用的八月八日的《中央首長接見武漢造反派代表談話紀要》，所說這些「中央首長」，人們都知道是總理、康生、謝富治、王力。陳文說成是：「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吳法憲和黃永勝」。這個紀要既然涉及總理，根本不能引用，更不能改換人名。何況吳、黃那時根本不在中央工作。這樣作會使群衆對黨講話的信用產生懷疑。

其他不必一一列舉了。

經過七·二零前後的直接接觸，我當時就認為陳再道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我雖然在公開言論上和行動上必須執行當時主席和中央歷次的並且不斷改變着的統一口徑，但是：

第一，匯報七·二零事件的是謝富治，我因負傷未參加。我在內部會上沒有講過陳同志壞話。

第二，我表示過不同意和不理解機場歡迎和開百萬人大會。江青等人說，這不是爲了你們，是爲了主席。我當然沒有話好說了。我不贊成拍電影，并且拒絕審閱影片。

第三，在鬥爭陳、鐘等同志的會上，陳文說：人人都要表態。但是王力這個當事人却一言未發。而且叫我發言時，我還是不發言。陳文也沒有舉出王力講過一句話。陳同志還不知道，我還寫了一個條子說：「中央開會，叫他們彎腰不好。」總理把條子交給江青，江青把條子撕了，瞪了我一眼。

第四，在七·二零事件發生前夕，軍區起草了公開檢討，交給我修改。我說，錯誤沒有

那麼嚴重，因此改輕了。當時軍區的有關同志表示很滿意。

第五，謝富治回京後同我交談說，我同你相處一個月，真沒有想到，中央文革還有你這麼右的人。（當時謝對我說這話時，并不是惡意。）

第六，在七月十八日主席召集的會議上，我向主席提出：第一個把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漢，而是江西，是中央文革決定的。主席還批評過，這樣大的事沒有請示。主席叫我回去以後，要把這個文件再送給他看，要叫中央文革作公開檢討。這個對群衆組織「要採取專政措施」的批示件，上面有陳伯達、康生、江青三個人的親筆簽名。爲此，江青對我恨之入骨。

七·二零事件的主要教訓是什么？

第一，主席先是惱火，加上林、江的煽動，說了一些氣話。後來冷靜下來了，他所作論斷接近實際：「他們是以王力爲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這就是說，一不是反革命叛亂，二不是「兵諫」，三不是住到「賊窩」裏頭去了。但是主席始終沒有來得及認識，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是有不對的地方，是應該改變的。

第二，七·二零事件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群衆性的對於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情緒的爆發。即便是毛主席這樣偉大的領袖親自坐鎮，只要是違背民意的事，也是要碰大釘子的。可惜那次事件並沒有促使他老人家考慮這個根本性質的問題。

第三·七·二零事件以後採取的「非常措施」，會不會引起連鎖反應，這是我當時就擔心並提出的。其惡果，人們都看到了。江青們反而把這點嫁禍于王力。用陳再道同志的話來說，王力做了替罪的小爬蟲。其實，真正的教訓主要還不在這裏，而是林彪利用了這個事件，在軍隊中排除異己，重用親信，從而逐步在中央內部形成了林彪集團，并逐步掌握了黨政軍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這才是最慘痛的教訓。

在中紀委和政法部門看到了我所作的七月十八日主席和總理的兩份談話記錄以後，那就不再追究王力個人在武漢事件問題上的責任了。當然，我應當檢討屬於自己的錯誤，并承擔應負的責任。這就不在這裏講了。

附：參考材料

王力同志在武漢鋼二司紅水院歡迎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見北大《火車頭》特二十八期，七月二十七日印)

王力按：這是七·二零前夕我在武漢水院歡迎會上的講話錄音記錄稿。大體上是準確的。因為人們以訛傳訛，說王力講了一篇很壞的話，并作為我的一大罪狀，所以特將它一字不改地公之于眾，讓大家了解真相。這個記錄整理時還刪去了兩句話。一句是：「你們要擁軍，要真擁軍，不要假擁軍，要擁護軍隊，擁護陳司令員。」一句話是：「要團結百萬雄師，他們

是有群眾的組織，沒有一百萬，也有十幾萬人。」為什麼刪去這兩句呢？大概因為這是七月二十七日即七·二零事件以後打印的，那時陳再道司令員和百萬雄鷹的領導人已被當成敵我矛盾了，所以他們整理記錄時就把這兩句話刪掉了。但錄音中還可以查到。

親愛的同志們，戰友們：（熱烈掌聲、口號聲）

剛才謝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講話，他已經代表了我們，把我們的話都講完了。你們贊成嗎？（笑，贊成！）同志們是否贊成謝富治同志說的那些話？（衆：贊成，呼口號：堅決擁護首長的講話！堅決按中央首長的指示辦事！）第一，不是首長；第二，沒有指示。（衆大笑）我們都是老百姓！毛主席派我們來是當小學生的！第一是來問候你們，第二是來向你們學習。（歡呼，鼓掌）在武漢地區就地解決問題。（掌聲，歡呼聲）我們相信武漢的問題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聲）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的。（掌聲）中央解決武漢問題排隊是排到最後，但是解决一定能解决得最好！（長時間經久不息地鼓掌、歡呼聲、口號聲此起彼伏）為什麼一定能很好地解决呢？因為我們武漢地區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長時間、暴風雨般的掌聲、歡呼聲、口號聲。）我們堅決地相信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同志們，一定能够自己擔負起解決武漢地區問題的責任。（熱烈鼓掌）同志們，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定不移地支持武漢地區革命派的同志們。（長時間熱烈掌聲、歡呼、口號聲，連呼：「我們想念毛主席！」）無產

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受壓抑、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長時間熱烈掌聲，有節奏的歡呼聲、口號聲）這（種）現（象）叫它一去不復返！（長時間有節奏地歡呼：「我們想念毛主席！」）要翻過來！（暴風雨般的掌聲）同志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又向同志們提出要求，就是要求同志們一定要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的道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地解放自己。（掌聲）同志們，這不是策略問題，也不是一時的措施，這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根本保證！（熱烈掌聲，口號聲）這也是同志們能够把毛主席這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紅旗永遠高高舉起的一個最重要的保證。（長時間的掌聲、口號聲）我們必須懂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我們是受壓制、受排斥、受打擊，這種現象把它翻過來！（作翻手手勢）（長時間熱烈掌聲，有節奏地連呼：「下定決心，為工總翻案！」）我們絕不能夠對別的人，別的同志，對別的階級兄弟，對群衆採取反壓制、打擊、報復，我們決不能採取這樣作法。（長時間鼓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受一點壓迫有好處！（衆喊：好！長時間熱烈鼓掌）我們不能够因為個人受打擊，我們就動個人的情感。同志們，我們不能動個人的情感！我們動階級的情感！（長時間熱烈掌聲）祇要同志們牢牢地記住毛主席的這個教導我們武漢問題能够解决得好！（長時間熱烈鼓掌）

為了創造解決武漢問題的有利氣氛和條件，剛才謝富治同志作了兩條建議，第一是停止

武鬥；第二是坐下來學習（掌聲）。冷靜下來，好好地學一學毛主席天才地創造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我們要用毛主席的這個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想一想這一年多來的鬥爭，總結一下，檢查一下，正確地認識武漢的形勢，正確地抓住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的主要問題，緊緊地抓住主要矛盾，緊緊地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掌聲）正確地認識和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檢查一下我們在這一段時間內，我們所提的口號，哪一些是正確的，哪一些是不怎麼正確的；檢查一下我們處理兩類矛盾的方法，特別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有沒有什麼不正確的地方。（掌聲）這叫作學習，學習就是鬥爭！（掌聲）學習就必須聯繫實際，就必須帶著問題學，就必須抓活思想，就必須解決我們武漢地區以及我們每一個團體當前面臨着的主要問題。同志們，（要用）正確的態度對待人民解放軍！同志們，我們要把毛主席今年四月強調地提出的「擁軍愛民」的這個旗幟（口號）舉起來，好不好？（衆：好！長時間鼓掌、口號聲）同志們，毛主席提出「擁軍愛民」的口號（是）不是在平時提的，不是每年春節那樣的一段的「擁軍愛民」，而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軍隊介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口號提出來的。這個口號指導着我們正確地認識形勢，正確地認識矛盾的性質，正確地提出口號，正確地處理矛盾的方法，特別是正確地處理人民解放軍同無產階級革命派之間的關係問題。（掌聲）在

這一方面，軍隊的同志犯了錯誤，祇要他檢討改正就好了。（長時間鼓掌）檢討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了。（長時間鼓掌）我們相信武漢地區的問題（能够很好解決），怎麼樣解決，我們還要專門地找同志們的代表和各方面的代表，聽取同志們的意見，向同志們學習。（鼓掌）今天，我們主要的是來向同志們問候問候。（鼓掌）

注：（一）這是當時王力致黨中央領導人的一封信，鄧小平同志曾批示給政治局全體同志參閱。關於七·二零事件的詳細經過和分析，王力將在文革回憶錄中談。

（六）就所謂「八·七講話」

問題評「劍橋歷史叢書」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日）

現在風行中國的「劍橋歷史叢書」中，《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

命》第一篇：《文化大革命：混亂中的中國》第三章裏說：「這年（一九六七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漢，造就了新英雄王力（儘管是暫時的）。權力很快衝昏了他的頭腦。他選定外交部為行使權力的部門之一。八月七日，他發表了講話。這是他和姚登山對外交部和陳毅發出的最後一擊。隨後的兩周內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中國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亂。」劍橋歷史叢書是世界著名的。這卷的主編是哈佛大學研究中國文革史的專家麥克法夸爾教授，這章的作者也是嚴肅的學者。可惜對中國文革史，外國學者很難研究清楚，因為他們祇能根據書報上發表的那些混亂的和不確切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推斷來寫。好在我這個當事人還沒有死。過去我還一直沒有講過這個問題，現在我來講一講。

在國內，所謂「八·七講話」，也成爲我的最大的罪狀之一。《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說，王力八月七日「發表講話，煽動奪外交部的權」。王力上了黨史，「八·七講話」成了重要的一條。所以我要把這講話記錄全文和有關材料找到，看一看全文以後，把它說清楚。我談一個問題，從來都要把當時全部能找到的講話、文件、報紙、雜志等等材料，加以研究，這樣我才有可能想清楚當時的歷史背景，系統地把六、七、八三個月特別是八月的歷史背景說清楚，把「八·七講話」中，有些話是誰講的，來源于什麼，是什麼意思講清楚。可是現在我的身體狀況，還不能把全部、大量材料都找來看。我找了十年，都沒有找到一份當時的講話記錄全文。現在找到一份「八·七講話」記錄，我覺得很重要。雖然他們記得不

完全，有片面性，有利于自己一派的就誇大或強調，不利于自己那一派的就淡化或不記，雖然有這些毛病（當時任何群衆組織都有這些毛病），盡管如此，這總是原始的記錄，可以反映當時毛主席及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文化大革命以及外事口問題的一些基本態度和看法。現在就這個紀錄本身，及我所記得的、或者明顯的能查得到的材料和我直接經歷的事實，來說一說。

首先談談文化大革命當時的形勢和八·七講話的背景。

第一個問題：當時整個文化大革命是什麼形勢呢？按毛澤東的看法，當時形勢很好。按他的劃分，文化大革命一年發動、一年勝利、一年處理善後。當時正是第一個一年結束，第二個一年開始，是勝利的階段。表現在一個一個省、一個一個部門，建立起領導班子。為什麼派王力、謝富治到西南？就是要就地解決問題，把領導班子變成當時認為的革命的領導班子。為什麼毛澤東本人要去武漢？就是要就地解決武漢的問題，怎麼解決呢？一個主要的方面叫大聯合。當時群衆組織主要有兩派，一派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派，一派是所謂保守派，也有中間的，不是歸于前者就是歸于後者。毛主席為什麼說形勢很好呢？他認為當時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革命派已經占了優勢，能够團結群衆，已經成為絕大多數，所以本來要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到中央來談，六月下旬改為中央派人到地方上去，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去解決。中央各部要一個部一個部地去解決。要大聯合，就是要變成統一的，不是兩派對立。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衆都團結起來，聯合起來。但是要注意，毛主席非常強調，非常明確堅定地要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他認為否則就是大雜燴，不能叫革命的大聯合了。所以，一個省一個省、一個部一個部，都要這樣子解決。這就把一月份的那種奪權變成無產階級革命派真正的掌權。掌權的基礎是大聯合，大聯合要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這樣就產生依靠什麼、依靠哪些群衆組織的問題。武漢也是如此，毛主席說要團結「百萬雄師」，但不是以他為核心，它只是團結的對象。（周總理說「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這個我沒敢說。我祇說它是有群衆的組織。）每一個地方都面臨着這樣的問題。要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要教育他們，以他們為核心，把別的派團結過來。

解決問題的另一個方面，要建立領導班子。兩個三結合，一個是老、中、青相結合，一個是領導幹部、部隊代表同革命群衆組織代表相結合。群衆組織要參加領導班子，而且要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體。領導幹部也好，部隊也好，自己本身都要是革命派，不能是保守派。總的來說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體的領導班子。毛主席也強調要有老的領導幹部參加，凡是沒有老幹部參加的一律不承認。這又產生了搶領導幹部的問題，一派搶這個，一派搶那個，一派拉這個，一派拉那個。領導幹部中，也有的依靠這一派，有的依靠那一派。把這些背景弄清楚，就會懂得「八·七講話」為什麼那樣提。「八·七講話」貫穿這個精神，貫穿當時毛主席同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基本的指導思想。這是當時的第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毛主席本人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特別明確的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開始，直到一九六七年，他着重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右又反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開始他比較注意反左。文化大革命全過程他都是反右為主，但他還是不斷提出反左。可是他的特點，每次都是以反左開始，以反右告終。表現在二月更清楚。是誰先反左？是毛澤東，不是幾位副總理和元帥。是毛澤東先提出要批評陳伯達、批評江青。二月十日就提得很尖銳了。然後才有幾位副總理和元帥順着主席的反左反下來了。結果沒有反幾下，馬上變成反右，變成「反對反革命逆流」了。批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一直到三月十八日，叫他們請假檢討。我認為在這過程中毛澤東受了專案組所提材料的影響。（專案組裏沒有我，江青不要我，文革小組的人都在專案組，祇是不要我。另外加上謝富治、汪東興、楊成武、葉群，他們是專案組，專案組是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是對毛主席負責的。我祇知道其中一些情況。）專案組把劉少奇說成是判叛徒、工賊、內奸，說成敵我矛盾；把鄧小平說成逃兵，拉出××來寫信證明，毛澤東這才暫時同意了打倒劉鄧的口號。（本來他一直講鄧的好話，後來也還是講劉、鄧要區別。）陶鑄的親哥哥揭露陶鑄是叛徒。因此毛主席同意了打倒劉鄧陶的口號，而且定為敵我矛盾。四月一日戚本禹批評劉少奇的大文出來了。批判材料是×××提供的。劉少奇同×××在吃飯桌上講的，×××揭露了。後來我才看到他寫給江青的一封信。這個過程發表文章時我還不知道。文章是毛主席直接要戚本禹寫的，沒拿到中央文革。當時我主管宣傳，沒

同我商量，毛主席定了以後才交給我廣播的。

兩條戰線鬥爭，既反右又反左，反左沒什麼勁，一個勁還是反右。到四月下旬，毛主席已經要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恢復在毛主席那裏開會的資格，五一節要他們上天安門。五一節毛主席作出團結的姿態，常委除劉、鄧、陶外都上天安門。但是五一節早上和晚上毛主席却採取了特殊作法，要到群衆中去，早上要到中山公園，晚上看煙火，敞篷車從群衆中經過，車上沒有陳雲和朱德；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當然都沒有。祇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六個常委，其他常委都沒有。另外加上中央文革的人，還有葉劍英、葉群（謝富治在維持秩序，沒有參加）。這是為了表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這幾個人，以這些人為核心，其餘是團結對象。

五一節總還是表現了個團結姿態，可是我認為，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月、八月三個月，從六月份開始，極左作法又來了，特別表現在對外工作中。外事方面，一些想法、提法、作法，到達頂點。文化大革命本來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但却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當成推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思想和浪潮，而且把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同我們的外交政策混淆了，這也違背了毛主席自己的一貫的國際戰略。這種國際戰略老早就有，而且是對的，比如兩個統一戰線的思想，第一個統一戰線是被壓迫和新獨立國家，第二是除美、蘇之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歐國家，可以建立第二個統一戰線，最高限度地孤立美國同

蘇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來是毛主席提出和堅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衝淡了。在全世界到處樹敵，無一處不樹敵。

這一點我本人是有懷疑的，但沒有形成明確的觀念，總覺得毛主席有道理，自己跟不上。我也不是完全不提意見，我提的意見他有時聽，有時不聽。比如我不贊成毛主席讓流亡在中國的外國黨領導人參加中國文化大革命。他們參加，是解決中國的問題呢？還是解決他本國的問題呢？我明確表示不同意。毛主席還說要一視同仁。我說至少要內外有別。我認為讓外國人參加文化大革命這個作法禍害無窮，這個作法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把他他們國內的問題，在我們文化大革命中來提出。他們國家革命中的問題，誰是誰非的問題，怎麼能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來提呢？他們共產黨的革命口號，怎麼能在中國提出，而且在我們報上登呢？這件事我明確地提過意見，在毛主席那裏我也提過，康生接見中聯部同志時，我還是說要內外有別。為了揭露劉少奇，就把我黨歷史上處理東南亞各國革命的極端機密的內部文件，都交給他們來批判，這種做法是非常錯誤的。

六月份康生主要根據他們所揭露的東西，把「三和一少」改為「三降一滅」，就是說投降蘇修、美帝和各國反動派，撲滅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三降一滅」的口號得到毛主席批準。後來也正式寫到「九大」的政治報告上面了。有人說這口號是我提的，我沒有這個資格。我曾經被認為「三和一少」的幹將。但這時常委議了而且毛主席做了決定以後，我當

然要接受這口號，而且要傳達這口號，反對「三降一滅」。我沒有鮮明地反對。但直到最後，我沒有同意發表反「三降一滅」的一篇文章，我也没有同意把劉少奇的這些材料印成灰皮書，發給全黨。

我認為，外交戰線上的不對的作法，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就有，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就相當地嚴重了。

從一九六六年十月份開始，國際上全面緊張，首先同蘇聯發生了直接衝突，我們使館到人家大街上去貼大字報，然後東歐、蒙古、東南亞，全面緊張。非洲從加納開始，人家驅逐我們使館。港澳也是，首先澳門，紅衛兵的一套在港澳搞起來，也許是自發的，但我們報上支持。老早就對英國提出抗議，一九六七年六月提出最嚴重抗議。抗議沒有斷。不斷抗議後，到八月二十日採取了嚴重的外交行動，即向英國、香港當局提出最後通牒，限定四十八小時內一定要撤銷對三個報刊的停刊令，要宣布無罪釋放十九名新聞工作者，如果不這樣做，要承擔一切後果。這是直接原因。後來發生了包圍英代辦處、放火、搶東西，這並不都是紅衛兵幹的，是有壞人，也不是中央文革組織的。那時我不在現場，陳伯達、康生都到現場，用大喇叭叫他們撤退。北京有組織的紅衛兵還能聽，外地流竄來的人他不聽。所以發生了火燒英代辦處的事件。

後來鬥爭我時，吳法憲提出火燒英代辦處要王力負責。周總理說：火燒英代辦處的事王

力不知道，他沒有責任。周總理說：直接的導火線是最後通牒，這個通牒是外交部搞的，送給我（周總理）看過的，我沒有來得及請示主席。沒想到發生嚴重後果，事實也就是這麼個過程。最後也不知道是誰搞的。群衆一亂了，控制不住局面。陳伯達、康生的確是去了，還有別人。我打傷了腿，沒有去。高音喇叭到處喊，都不聽。後來有人歸罪于我，是毫無根據的。

外交部的局面，六、七、八三個月的確是失去了控制。這同王力無關。有一次喬冠華到中央文革來，提出一個文件，上面也用了毛主席語錄。我不同意，我說外交部文件是給外國人看的，用毛主席語錄幹什麼？六、七、八月份外交關係上「左」到驚人程度，不能再「左」了，這都同王力無關。

第三個背景，是毛主席給江青的信，提出兩個問題，一個要武裝左派，一個要群衆專政。它反映了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看法同部署。信是用鉛筆寫的，開頭是：江青，然後說同意林彪看法，現在形勢很好。林彪在此以前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前面說形勢很好，後面主題是奪槍問題。林彪信上說奪槍問題很嚴重，必須發布命令禁止奪槍。毛主席的信是針對這點說的，前面說同意形勢很好，這是套話，但他不同意後面林彪關於奪槍的話。毛主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他分析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這個分析多麼嚴重！他原來說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隊，現在說部隊主要領導骨幹支持右

派。他說當前文化大革命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

七月十八日（就是七·二零前夕）毛主席在武漢同我們的一次談話中就有此思想。現在都說是因為江青提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其實江青的文攻武衛口號在後，是七月二十一日，而毛主席七月十八日就講：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這話又是針對周總理同王力的，因為周總理同王力主張，在毛主席在武漢期間，叫武漢各派群衆組織把槍都交出來，由軍區保管。這是為了毛主席的安全。首先是我提的，總理同意。所以我首先到「三新」（華中工學院），叫他們不要武鬥，要把槍交出來，然後才叫百萬雄師交出來。當時兩大派表示同意，後來這也成了我的罪狀。七月十八日後，毛主席有了這樣的最高指示，說要他們武裝起來。毛主席還誇鋼工總修工事很好，說他還要去看看。從這封信裏還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裝。這種思想一直繼續到很長時間以後。我沒有參與建立第二武裝這事，我被關起來了。後來發展到非常嚴重，部隊發槍給群衆。這是最高指示，我不能阻攔，我也得傳達，對武漢我也傳達了。但我也說祇能試點。上海也要發槍，我對張春橋說祇能試點，如果一下子把槍都發了，控制不住怎麼辦？後來全國都發槍，大規模武鬥才開始。這是王力打倒以後的事了。毛主席八月四日寫的信，還得傳達、布置、試點、訓練幹部，辦學習班，得要相當長時間，而我在八月底就打倒了。

毛主席在信中提出的第二個中心是群衆專政。有些單位沒有實行群衆專政的，還要到實行了群衆專政的單位去學習。毛主席說要解決誰專誰的政的問題，就是說，如果不實行群衆專政的話，就是走資派來專了群衆的政。這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八·七講話」中提到這問題時，我說「這是專政」。我還沒有傳達毛主席的群衆專政的話，祇是說「這是專政」，即他們專你們的政。而且，他老人家在信上居然講：北京有些單位基本上就是這樣作的。這就是說過去抓人、私設公堂等都是對的了。過去我們起草過文件，也是根據他老人家的意見起草的，禁止武鬥、禁止私設公堂、禁止打砸搶抄扒，現在有些單位這樣作，成了群衆專政了。

上面所說的這兩條，後果都是非常嚴重的。毛主席八月四日的信，五日林彪主持會，就要貫徹執行。周總理也參加了。老實說當時大家都矇了，但都得表示擁護，都得這樣作。這是第三個背景。

第四個問題，外交部的問題。現在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說八月七日王力「煽動奪外交部的權」，這個根本不對。外交部之所以不能控制局面，同王力沒有任何關係。「八·七講話」以前，我從來沒有插手外交部的事，但是我知道外交部同其它部一樣，是受了一個文件的影響，這就是十一中全會後，有那麼一個文件，說要把所有的幹部都放到火裏燒一燒。在毛主席那裏議論時我不同意這個方針。我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一個是中聯部，康生的做法是對的，他宣布劉寧一、伍修權、趙毅敏，三人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這三位都還可以繼續領導

中聯部的工作。（還有廖承志，他也挂過中聯部副部長。）如果說所有幹部都燒，從劉寧一燒起，統統都燒，那怎麼行？可外交部不但都燒，而且把駐外大使都調回來燒。第二個例子是二七機車廠，所有班組長都燒。那怎麼行？毛主席同意了我的意見，表了態，說不能這樣。毛主席要陳伯達告訴總理，要我告訴余秋里和谷牧，說不能這樣做，後果很嚴重。新華社科長以上全都打倒了，到我接手時，祇剩了一個王唯真。我向毛主席要「尚方寶劍」，不許再打倒王唯真了，用最高指示宣布：「王唯真要有職有權。」新華社一天也不能停止運動。可是外交部却癱瘓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文件外，第二個原因是國務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布置的普遍奪權。這是有文件可查的，當時說不要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了，奪過來以後再說。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到運動後期再分，先分就受限制了。所以，外交部奪權是一月十八日就發生了，成立了監督小組。怎麼能說八月七日才由王力號召奪權呢？

後來毛主席、周總理說，我也說，這樣子不行，要規定哪些能奪，哪些不能奪，哪些部門不許奪，特別不能讓外單位的人來奪。如部隊、公安部、財政部、外交部、計委、經委、人民日報、新華社、紅旗雜志、廣播電臺、解放軍報，都不能奪，特別不能讓外邊的人來奪。那時中宣部、《紅旗》雜志有外面來的人要來奪權，我去了，批評了他們，把外面來的

人驅逐了。

外交部失去控制，主要領導人不能控制局面，這決不是「八·七講話」造成的，早已如此。

八月份普遍要建立領導班子，這也不是王力號召的。這是毛主席的意圖。這個班子要經中央批准。毛主席準備一年時間把所有的部和省的領導班子建立起來。「八·七講話」後，外交部搞了個領導班子的名單，要我批，我退還給他們，我說外交部是總理管的，請你們送總理。他們送了總理，總理送了毛主席，毛主席也沒批。他們提的領導班子中要羅貴波、徐以新、董越千；不要姬鵬飛、韓念龍、喬冠華。毛主席說外交部的造反派要三弱、不要三強。這個領導班子名單毛主席也沒批。

我在八月七日以前從來沒有找外交部的人談過。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特別是六、七、八三個月的情況，我不了解。因為六月份我到西南，七月份我在武漢，回來後負傷休息。這次談話完全是偶然要我去談的。那天晚上中央文革的人都有事出去了，我一個人負傷在家，所以我才叫我談的。

這次談話主要是兩個任務：一個是了解一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第二個任務是要了解外交部一個群衆組織的情況，這個組織叫「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他們寫了一封信給總理同中央文革的負責人。因為八月七日以前關鋒、戚本禹講過外交部的問題，（謝富治也

講過話，祇有我沒有講。」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說關鋒、戚本禹的講話不對，尤其集中說戚本禹的講話不對，同總理不一致。中央文革認為這很嚴重，是挑拔總理和中央文革的關係。他們需要馬上了解這個組織是個什麼組織，這封信是什麼背景。那天晚上中央文革他們都有事出去了，就叫我來談。中央文革他們認為戚本禹對，給我的任務一定要保護戚本禹。還要保護總理，說總理也對，說總理同中央文革沒有分歧，在對陳毅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這是中央文革的統一口徑。當時社會上所謂保守派攻擊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認為這封信同他們是同一個思潮，集中攻擊中央文革，特別是攻擊戚本禹。當時所謂的攻擊中央文革的，大多數是攻擊戚本禹，可是這次我的任務就是得說戚本禹對，我當時也沒有認為戚本禹不對，因為這些話不是戚本禹說的。他說的「群衆喊打倒陳毅讓他去喊吧」，是毛澤東的話。我當然得說戚本禹對，我如果說戚本禹不對，那麼毛澤東不是也不對了嗎？另外還要說周總理也對，反對周總理不對，誰反對周總理，絕對不允許。涉及實質問題的就是這個，我就得這麼去說。我的基本任務就是這個。

這些話本來應該他們自己去說，或者比我更高的人去說，但是那天晚上他們都有事出去了，我腿打斷了不能出去，而且他們認為七·二零以後王力威信最高，所以他們認為王力來說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陳伯達、江青、康生來說了。這樣陰差陽錯就成了王力去說。其實我一個月不在北京，外交部情況我沒有調查研究，我來說不適宜。這是大事，涉及戚本禹，涉

及總理，涉及外交部，不應該叫我去說。可是那天祇有我在家，就叫我去說了。該怎麼說也不能由我定，他們定了怎麼說我就得怎麼說。我根本不是去發表一個講話，我也没有發表一個講話。祇是在問他們情況當中，我作了一些插話，要我表些態，我就表了一些態。這個狀態當時還用文字表達出來，就是八月七日或八日，我親筆寫一封信給姚登山等人，很短，這是我的正式態度。這封信他們公布了，周總理看到了，看後他說他放心了。

現在來看「八·七談話」本身。記錄的前面一段談武漢問題，這段大體準確，但不完全。關於這個問題的話不是王力的話，差不多全部是毛主席的話。講完武漢問題以後，就問外交部群衆組織「革命造反總部」的情況。我沒有說什麼。我事前奉命說它是保守組織。江青暴跳如雷，說它是保守組織。

然後就是打倒陳毅的口號問題。他們那天來得晚，就是因為批評陳毅的會開得很晚。我問批評陳毅大會的情況，他們講了他們的看法，這地方我的插話他們記得不準確。他們自己對陳毅的態度，記得也不準確。他們說他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資派，有大量三反言行，是敵我矛盾，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等等，這是他們在敘述這個會，不是他們在我這裏向我這樣講。在這問題上我的插話他們沒有記。我的插話的基本精神是不同意他們的說法。但不能明確說不同意，祇能說：是嗎？是最大的走資派嗎？是敵我矛盾嗎？你們喊打倒陳毅的口號，是真的要打倒陳毅嗎？他們回答說，「不是真要打倒陳毅，祇是要給他一

點壓力」，這些話記錄上沒有寫。（大約是他們顧慮到如果他們的話告訴陳毅，陳毅又以為沒啥了。）下面才接上「至於將來對陳毅的處理，毛主席、黨中央決定了我們堅決服從。要不然就接不上了。」

我知道毛主席的底。毛主席跟我單獨談過，說他這一輩子要保兩個人，一個是朱德，一個是陳毅。這是他井岡山的老搭檔。同時我又對陳毅比較了解，在山東我是他的老部下。陳毅是我很喜歡的一位領導人。我知道聯絡站他們的底牌不是真要打倒陳毅，祇是要給點壓力，如果中央有指示，他們馬上擁護。這點他們說得幹脆。順着他們這個話，我才說：這個道理（是指他們說的對陳毅不是真打倒，祇是給點壓力，中央有指示立即擁護）你們跟總理談過沒有？我還說你們要報告總理，讓總理放心。可是他們在這個記錄中間又加了一句「要與陳毅血戰到底」，下面才說王力說「這個道理你們跟總理談過沒有？」這就不對了，好象我說「要與陳毅血戰到底」的話是好的，這大約也是他們鬥爭策略的需要，還要壓壓陳老總。

陳老總我當時沒法再保護他，不能說不讓群衆給他壓力。因為他老人家太直爽了，不顧場合。他在飛機場當着幾派群衆組織就說：「我過去的檢討是假檢討，是江青逼着我檢討的。」當時這麼公開說怎麼能行呢？這不祇是江青的問題。本來他的書面檢討毛主席已經批了，說很好，而且說要別人向他學習，要蕭華「學習陳毅同志的態度」。這樣本來就過去

了，你心裏不服，怎麼能在飛機場當着各派群衆組織那麼說？毛主席無論如何不能容忍。這是七月裏的事情。陳毅二月在懷仁堂會議也是講得最尖銳。毛主席聽張春橋匯報時，原來是當笑話聽的，聽到匯報到陳毅的話時，毛主席變了臉，再也不笑了。後來毛主席發了大脾氣，說要改組中央文革，「江青、陳伯達槍斃，康生充軍，叫陳毅來當組長，徐向前、譚震林當副組長，力量不够就請王明和張國燾回來，再不够就請美國、蘇聯都來」等等。三月十八日陳毅又作了檢討，毛主席特別派江青代表毛主席到陳毅家去看望陳毅。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向我兒子打聽，說「我爸爸又犯錯誤了，不知怎麼樣？」我說沒有大問題，毛主席不會怎麼過分地對待他的，請陳老總放心。他說的話過重，不分場合，但不要緊。八月七日我對聯絡站的同志說他們的態度（不是真要打倒陳毅）是好的，是對的。但是這些話他們沒有整理進去。

打倒陳毅的口號，也不是戚本禹就敢這麼說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康生向毛主席請示緬甸問題，問能不能提打倒奈溫的口號？毛主席明確表示：「群衆提打倒奈溫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提。」毛主席又說：「中國群衆喊打倒朱德、陳雲、陳毅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喊就是了。」我領會他的意思這幾個人不是真要打倒的，他講過朱德、陳毅他要保。群衆喊喊口號是可以的。

對陳毅加點壓力，這個精神是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八月十二日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

專家時也表示他贊成「打倒陳毅」，還說「我對陳毅也沒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他點壓力。」還說「將來保陳毅也還是要靠紅衛兵」這可以在中聯部絕密文件中查到。可見他們到外交部門口安營扎寨這些事毛主席早已知道。我不知道。當時翻譯叫範承祚，他說毛主席對陳毅問題的說法同王力的講法是一致的。我說你說反了，不能這樣說，祇能說王力是根據毛主席的精神講的，很多是毛主席的原話。

我的講法有一點地方是同總理不大一致。總理是見到打倒陳毅的標語就不許進會場，不許喊打倒陳毅的口號，戚本禹說群衆可以喊，我也這麼說，這是有點不一致。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不知為什麼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向總理傳達。如果傳達了，總理也不會那樣說。但對陳毅不是真要打倒，祇是給點壓力，這基本態度是一致的。李富春講得比我還重，有記錄可查。（可能也是八月七日左右）他說：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打倒陳毅！他是常委，這話他講就不應當了。

我同總理還有點小的不一致：我不主張開大會時陳毅不上主席臺，下面擺個桌子，讓他坐在下面，象公審似的，這不好，應該上主席臺，大的地方沒有不一致。

「八·七講話」記錄上關於紅衛兵辦外交的話，他們記得不對。我不是說：「紅衛兵就不能辦外交？」我是說：能處理紅衛兵問題的人就能辦外交。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說能處理紅衛兵問題的人就能辦外交。他是從反面說的，他說：對紅衛兵那

麼害怕的人，辦外交就能辦得那麼好？毛主席也不是說紅衛兵就能辦外交。姚文元率領紅衛兵出國到阿爾巴尼亞，也算是紅衛兵辦外交了，但也不是要紅衛兵來領導，還是要姚文元來領導。這句話我當時沒有更正，因為更正了這一句，就等于說別的話都是準確的了。他們的記錄是注明「未經本人審閱」的。

關於「攀險峰」問題，聯絡站對它有看法，認為它是保守組織，所以他們就這樣整理。這不是我原來的意思。我說有人看到它的政治主張，說它還不錯。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說它還不錯，我能說它錯嗎？毛澤東的意思是象它這樣的組織要算革命組織。他沒有明確說，我理解他的意思，「攀險峰」應該承認是革命組織。同外交部保守派比起來，它是革命的一派。同聯絡站比起來，至少在對總理的態度上，比聯絡站正確。盡管他們不同意喊打倒陳毅的口號，那是因為總理也不同意喊嘛！他們擁護總理沒有錯。聯絡站對總理的態度是不對的，中央文革要他們檢討，他們也作了檢討。「攀險峰」也不是說不批評陳毅，祇是不同意喊打倒的口號，不同意戚本禹，這沒有什麼。你說祇是加點壓力，他說不需要這樣加壓力，這是方法問題。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已經被中央文革定為保守組織，聯絡站要把「攀險峰」同總部聯到一起，我不同意。我認為「攀險峰」應該承認它是革命組織。我說「攀險峰」是不是那麼保守，是不是中間的？中間可以是這一邊，也可以是那一邊。我是傾向于這一邊的。聯絡站帶着派性來整理記錄，這一段基本上不符合我當時的意思。記錄上

大量的話是他們講的。

兩大派要以革命派為中心，要三結合，要動班子，這都是當時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這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動班子不是說都要打倒，是要建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王力的講話反映了當時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就是：一個是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的大聯合，一個是以革命派為主體的三結合。有些重要的話他們沒有整理進去。如他們說外交部的部長祇畫圈，不幹事，我還是駁了一下，我說外交部情況我不了解，但我了解一個人，就是喬冠華，他同我共事多年，他就不是祇畫圈的人，他都是自己動手起草東西。這些話他們當然不會整理進去，因為喬冠華也在他們打倒之列。他們是監督小組，掌權不掌權的問題，不是語言問題，這時已到了真正掌權的時候了。不但是外交部，所有地區和部門無一例外，要真正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體來掌權，所以都要強調權的問題，強調專政的問題。「有點權才有威風」，這不是我的話，毛主席講過，林彪也講過。這是開玩笑的話，是說沒有權，光奪些大印有什麼用？毛主席講過黨、政、財、文的權都要奪。《紅旗》雜志關於奪權的評論員文章是毛主席的思想，王力、關鋒執筆的，毛主席批了「很好」。

人事權問題。我一直反對十三級以上幹部的子女才叫革幹子女。我不贊成工人就不能作幹部。我當時的話主要指趙小壽問題，陳老總還寫了詩稱贊他，外交部既承認他在蘇聯作得對，但又說不能當幹部使用，因為他是司機（兼工作人員）。我說人事也要監督。人事權沒

有就什麼權都沒有。我說最大的人事部門——組織部的權不是也奪了嗎？「二十多歲就可以當部長」，這是毛主席的話。鄧小平當領導時才二十多歲。

過去叫監督小組，八月以後就要建立領導班子了。外交部搞了個領導班子的名單，送給我，我叫他送總理。中聯部也搞了個領導班子的名單送給我，我也退回了，叫他們送康生。

「打倒劉鄧陳」的口號，這句話原來是戚本禹說的。他也是代表中央說的。我是奉命保護戚本禹。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認為祇能說「打倒劉鄧陶」，不能說「打倒劉鄧陳」，說「打倒劉鄧陳」就是大方向錯了。這裏還有一個背景：我在武漢單獨跟毛主席談時，我不同意劉、鄧、陶並列，毛主席講了一大堆鄧小平的好話，說「劉、鄧要區別。將來開九大時，劉還是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鄧小平至少還是常委，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我有這個底，所以我根本不同意「打倒劉鄧陶」這個口號，我覺得雖然喊了這個口號，毛主席心目中也不是真正要打倒鄧。戚本禹怎麼理解，中央文革怎麼定的，我不知道。叫我表態我就得表態。我也不盲目的，我也覺得可以吧，劉鄧陶都不一定真打倒，何況劉鄧陳呢？毛澤東的意思是，群衆喊就讓他喊去吧！

有一點說的不清楚的我再說一下：周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是在毛主席那裏說的。這個記錄記得不對。二月裏陳毅請假檢討，那時毛主席說要抓幾件事（軍隊、幹部、地方、鐵路煤炭），沒提外交部。中央文革在議論時（有總理參加）說：外交部現在陳毅請假檢討，要

王力過問一下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是要我去管外交部的業務。這事是陳伯達對毛主席講的。總理也在。陳伯達沒講清楚，說：我們議論，要王力幫外交部研究些國際問題。毛主席說：難道這還有什麼問題嗎？當時並沒有說要叫王力過問外交部業務，但是從此以後，周總理就叫外交部把所有重要文件都送王力一份。這同當時中央文革議論的也不對。我根本不可能過問外交部的事，因為那時我是意識形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接待群衆差不多每天都是東方紅，回來還要處理稿件，怎麼能管外交部？我說主要你們自己搞。中央文革當然要管，不一定是管。記錄裏這些話他們沒有整理進去。他們不願意我說我不可能管外交部的事。人們傳說毛主席要王力過問外交部，更是沒有的事。

最後說明一下對總理的態度。這個記錄大體整理了一點，但不全，我保護總理的話更多，他們沒整理進去。我特別講任何群衆組織祇要是反總理的，都必須同它堅決劃清界限。我反復講這點，而他們整理得輕描淡寫。總理看了講話後要秘書來問張根成，王力同志是不是講了這些話，我叫張根成答復說：是講了，不是一個講話，祇是一些插話，他們整理得有些片面。特別是關於總理的問題整理得不清楚。後來總理又看到八月八日的一封信，總理說那我就放心了。第二天「六·一六」（群衆組織）又要同他們聯合反對總理，姚登山打電話問朱庭光，說「六·一六」看了講話後要同他們聯合反對總理，姚登山明確地告訴他們，王力同志對保護總理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堅定的，任何組織都不能反對總理。任何群衆組

織，祇要反對總理，都必須堅決同它劃清界限。（「八·七講話」說「六·一六」對總理的態度是不對的，要改，就是指這事。）朱庭光問我，我說答復得很對。第二天姚登山又有事問朱庭光，我說外交部的業務和運動要請示總理，不要找王力。他們搞了個領導班子名單，我也鮮明地說我不管，你們請示總理。

他們在外交部門口安營扎寨，我不知道。那時我還不在北京。

後來江青在所謂王力八·七講話問題上大做文章，那祇是作為借口，拋出王力作為替罪羊。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到過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沒有說什麼，因為講話中那些過份的話，就是他的原話。後來毛主席同意江青打倒王力，主要是因為他相信了江青告的狀：「王力以為七·二零以後天下不是毛澤東的了，是他王力的了。」而且毛主席叫「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江青和康生又證明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組織者和操縱者。這樣毛主席猶豫了兩天後，才同意先把王力打倒一下再說。江青們故意鬧得滿城風雨，障眼的迷霧二十六年未得澄清。

附件：

毛主席對打倒陳毅的態度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電話傳達，戚本禹記錄。檔案館保存。）

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對外賓說：

「外交部問題，對陳毅我也不那麼高興。但找一個外交部長不那麼容易。」（問翻譯，你是哪一派？翻譯說是打倒派。）首長笑了，說「我贊成，但最後不打倒。他一月檢討，二月翻案，才搞起一個反陳的高潮。誰叫他推翻。……對陳毅這樣的人，我，林總，總理有什麼辦法，還是要靠紅衛兵。要保他，使他能當外交部長，也得靠紅衛兵，靠紅衛兵教育他。」

（七）澄清其他幾個問題的真相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說王力伙同關鋒，「寫了《紅旗》十三期社論」，「提出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全國迅即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踢開黨委鬧革命，批鬥老幹部的高潮。」這是不能成立的。

這篇社論的底稿雖然是王力的手迹，但社論的指導思想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并不是王力提出的。在十月中旬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和十位常委都就此問題作了發言。這有檔案可查。過去有的審查人員查了檔案後也說：「這個關係全局的口號，不可能是由王力提出的。毛主席和十位常委也不可能響應王力的號召。」

這個口號的背景主要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開會提出：「相當長的時間內，就是從八月三日到九月，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的堅定性和徹底性。（有檔案可查）」當時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徹底批判劉少奇同志的「錯誤路線」。並且認為當時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同志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毛主席決定，要在林彪的國慶講話和《紅旗》社論中提出這個問題。《講話》由陳伯達、王任重、張春橋起草。社論由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在《講話》中原來定稿時用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在上天安門講話之前，陶鑄、王任重、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加上一個「對」字，成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十月一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張春橋向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不通。毛主席說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句話被當時的報刊作為毛主席語錄引用，並已經編入毛主席語錄本了，怎麼會是王力提的呢？

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的《紅旗》十三期社論草稿，原來用的是一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十月一日晚上毛主席做了明確的決定之後，王力才根據毛主席指示改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爲此，這篇社論推遲到十月三日晚上才廣播的。

周總理看到《紅旗》社論後曾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祇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麼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問了以後，周總理告訴王力說：「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三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

第二、關於「不要怕亂」和武鬥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說「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揚不要怕武鬥，不要怕亂。」有的引用了王力在記者站講的話。這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這些引文，從未同本人核對，沒有確實可靠的根據。

記者站，即文革小組的快報組，其成員主要是從軍隊抽調的團以上的政工幹部，任務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反映「文革」中的動態。因此，毛主席和常委會有什麼新指示和新意圖，王力都要向他們傳達、吹風。這是中央給王力的任務。對他們規定有嚴格的紀律，不準把中央機密文件外傳，更不準參加和幹預下面的運動。發現有違紀者，立即調離。因此，說王力的「這些謬論，通過記者站在各地廣為散布，煽動了武鬥，製造了混亂」是不可能的。

當時祇有個別人違反紀律，已及時作了處理。因為記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機密部門，所以王力在記者站內部傳達的話，都不能成爲王力的罪狀。

不能把「不要怕亂」同「不要怕武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爲一談。所有列舉的王力的話，雖然根本沒有核對過，但也並沒有一句說「不要怕武鬥」。

至于「不要怕亂」問題，那是毛主席反復堅持的觀點。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主要問題是對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是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一九六七年四月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毛主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全面內戰。」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說：「北京也在分裂爲兩大派，打亂架，亂就可以亂出名堂來。」七月十三日，毛主席說：「南京街上鬧得很厲害，我越看越高興，鬧得三派那麼多人，反對內戰，反對武鬥！這很好嘛！」七月二十八日，毛主席說：「一年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有點亂，這裏亂，那裏亂，沒有什麼關係。象武漢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來，就好解決。」我列舉的這些，都是現在還有文字可查的。王力所傳達的是毛主席的指示，祇有不足，並無過頭之處。

王力不但每次講話都要提出，而且在參加起草的文章和文件中，不斷提出不許武鬥。重要的有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用北京市名義發出的《重要通知》和六月六日的中央《通

令》，都提出要禁止武鬥，糾正打、砸、搶、抄、抓，要依法制裁和懲辦凶手，這也都是根據毛主席指示起草的，經過毛主席簽字的。武漢七·二零事件後，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主席發出指示，說當前「文革」的中心任務，一是要武裝左派，二是群衆專政，這以後才發生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武鬥。這時，上面說的《重要通知》和《通令》都不適用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國各地貫徹執行，後果很嚴重，但是，王力已經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底被關起來了。

在不怕亂的問題上，王力也不斷提請毛主席考慮加強紀律性和團結的宣傳。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毛主席和王力有幾句對話，有文字可查：王力說：對於訓服工具論要批判。但也要講自覺紀律。主席：同意。團結和服從都是有條件的。王力說：擁軍愛民不是一般的軍民關係，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不能把軍隊搞得灰溜溜的，這是我們的王牌。要反復地講，要正確對待保守組織。這個問題過去講得不少，現在還要講，要做工作，要團結，不要把各方面的關係搞得那麼緊張。主席：同意。（軍隊中）年紀大的、年紀中的、年紀小的，也要三結合；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轉載的上海《文匯報》社論的編者按，是王力寫的，直送毛主席當面同意發的，有檔案可查。編者按提出：「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這是擺在無產階級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課題。一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熱衷於極左的詞句和口號，在思想和行動上表現出極端的狂熱性和自發的盲目性。」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

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上面最後引用的毛主席的這句語錄，就是這次同王力對話時講的。反對小資產階級派性，堅持無產階級黨性的口號，也是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建議後見報的。正因為王力一貫堅持這些意見，才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銳。

第三，關於全面奪權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說「一九六七年上海「奪權」後，王力接連煽動全面奪權。」還說，「一月十九日王力在人民日報社講話說：「一九四九年以來，有些人變成資產階級」，「這次要徹底打碎舊的機器」，「在一切部門、一切領域，凡是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的權，都要統統把它奪過來。」」

這裏要說明，王力的這段話，祇不過是當時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復述而已：

第一，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說：「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已經考慮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謂舊的國家機器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奪權」之後，毛主席又說：「爛掉了的單位，他們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專政。這些單位的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已經開始創造並將繼續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構的新的組織形式。」這是有文字可查的。

第二，周恩來同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中傳達說：「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奪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這也是有檔案可查的。

僅拿這兩段話同王力的話作對比，可以證明王力的話祇有不足，并無過火。

還有一種說法，說，「一月二十二日，王力、陳伯達共同炮制《人民日報》社論，鼓吹「有了權就有了一切」，要「內外聯合，兩面夾攻，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秩序」。上面的那段話澄清了，這段話的性質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第一，「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句話是林彪的名言。林彪當時是一副統帥」。

第二，社論中這句話不是獨立的一句口號，而是有上下文的。原文是「革命群衆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千條萬條，歸根到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力，就沒有一切。」可見社論的意思不是指的個人權力，而是指的人民群衆掌握政權。這本來是毛澤東思想的一貫觀點。祇是應用到「文革」的奪權中，就成為荒謬的觀點了。但是，這不是王力首創的，更不能斷章取義，作為王力的罪狀。

第三，這篇社論不是王力起草的，是報社編輯部根據前幾天陳伯達在工人座談會上的講

話整理的，王力閱後，又送陳伯達定稿的。因此，更不應追究王力的個人責任。

還要說明，有一說法，說「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在陳伯達授意下，王力主持起草並發表了題為《放手發動群衆，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文章，提出『奪權鬥爭絕不能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而必須採取革命的辦法……』他們把這段話無限上綱，加上了『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帽子。

第一，必須說明，當時的『奪權』，並不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發生的那種自下至上的奪權，而是黨中央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四清」中發出的奪權鬥爭的指示所說的，由上級黨委派工作組去改組下級黨委。

第二，這件事發生於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常委和書記處工作的時期。這種工作組的工作，曾經被批評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劉鄧路線」，但是從來沒有人把這條路線說成是「反革命」。為什麼有人竟然把所謂「劉鄧路線」下發生的事說成是一「反革命」了呢？這實在是很不對的。

第三，寫社論配合江渭清為首的江蘇省委打倒匡亞明，當時是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做出的決定，并不是出于「陳伯達的授意。」

第四，這篇社論是在陳伯達主持下，由當時總政宣傳部副部長錢抵千等三人起草的，并不是王力主持的，也不是王力起草的，更不是王力「發表」的。祇是因為社論寫好之後，陳

伯達要去上海開會，臨時要王力看看，修改一下，最後還是陳伯達定稿的。這怎麼能成爲王力的罪狀了呢？

第四，「三和一少」、「三降一減」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說王力「陷害王稼祥、伍修權等同志，支持中聯部「造反派」奪權。」關於王稼祥同志的問題，王力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貼王稼祥同志的大字報是錯誤的。王力已經作過一百多次檢討，今後還要永遠檢討，但絕不是「誣陷」。

第一，現在有人遲至一九八四年還以爲「三和一少」路線是錯誤的，于是硬說是王力「誣陷」了王稼祥。現在實踐早已證明這個所謂「三和一少」路線是正確的，是王稼祥同志提出和推行的。所以根本談不到「誣陷」。

第二，一九六二年我代表團參加莫斯科裁軍會議的方針，是王稼祥同志提出的。並且經過鄧小平同志主持的書記處討論通過的。王力和閻明復從莫斯科回國後，鄧小平、彭真、王稼祥三同志立即聽取了匯報，他們一致認爲，預定的方針是正確的，并且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有人却仍然認爲代表團在莫斯科會議上的方針是錯誤的，因此又說這不是王稼祥同志決定的，而是王力「誣陷」的。這樣倒反而把王稼祥同志的功勞，說成是王力的功勞了。

第三，王力的大字報執行康生的「集中批判王稼祥」的指示，是錯誤的。可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王力個人是難以頂得住的。加上康生還說是爲了下保劉（寧一）、伍（修

權）、趙（毅敏），使中聯部工作能按步就班地進行，同時也避免往上涉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所以王力才聽了他的話。王力在大字報中曾提出，劉寧一、伍修權、趙毅敏、廖承志同志是反對「三和一少」的。這句話，後來編大字報選輯時把它刪去了，王力並不知道。

第四，王稼祥同志醞釀「三和一少」的全過程，王力知道得很清楚。稼祥同志曾同少奇同志做過長時間的交談，小平同志對稼祥同志的觀點和做法也完全支持。這些內情，王力不但在大字報上沒有提，而且在任何場合也從來沒有「揭露」過。

第五，王力不但知道毛主席爲什麼不滿意王稼祥同志，爲什麼一定要批判他一下，而且知道毛主席最後還是一定要保稼祥同志過關的。王力知道這個底，才寫了大字報。這鑄成了大錯，但無陷害之意。

對待伍修權同志，王力也是有錯誤的。但是，王力的錯誤，決不是「誣陷」的性質。誣陷伍修權的是林彪，貫徹林彪意見的是康生。那時中聯部文化大革命是康生管，王力不管。王力也有錯誤，王力已向伍修權同志道歉，并得到了他的諒解。

王力早在一九六零年起就主要是爲書記處和常委起草文件和文章，對中聯部部內的工作管得很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中聯部的業務和運動都是康生管，王力不管。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主席要王力擔任中央宣傳組組長，接替陶鑄同志的工作以後，王力更不可能管中聯部的事。說「實際上篡奪了中聯部的領導權」，這不合事實，也不合邏輯，因爲在「文革」

中，中聯部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康生手裏，在王力打倒之前，劉寧一同志一直是中聯部的主要領導人。所以根本不存在篡奪問題。

第五，所謂「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

王力不知道有「軍內一小撮」這個詞。武漢事件後，討論對「七·二零」事件的宣傳口徑時，康生提出來：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康生給在上海的汪東興打電話，要汪東興報告毛主席，請毛主席批。毛主席批了。于是武漢事件的宣傳，就用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王力這時因為腿被打斷，請了假，沒有工作，這個時期的宣傳工作不是王力管的。這時報上出現了一系列「黨內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這同王力無關。八月十二日，毛主席才有了新的指示，說「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不策略，接到這個指示後，王力雖然不管宣傳，但還是告訴宣傳單位，以後不要再用「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了。可見此事不應追究王力的責任。

人們又說，一九六七年一月王力伙同關鋒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提出徹底揭穿黨內軍內一小撮。這個宣傳要點還拍成照片，鉛印的名字有王力、關鋒、唐平鑄、胡痴，簽名的祇有胡痴一個人。這件事王力不知道。為什麼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這時王力剛被任命為中央宣傳組組長，唐平鑄、胡痴是成員，關鋒是總政副主任、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林彪委托關鋒管解放軍報。王力知道，過去不管誰領導中央宣傳部工

作，從來不管解放軍報，這個宣傳要點王力連看都沒看過。關鋒提到過這件事的過程，說這個要點是根據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寫的，但沒有說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認為這問題即使胡適簽了名，也不應追究責任。而且這問題還應該進一步研究。因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等等。《五·一六通知》的這一段話，是毛主席加的。這不是說得更厲害嗎？怎麼能責怪後來的這個宣傳要點呢？怎麼能把責任推到四個人身上呢？況且王力根本不知道，這問題不能叫罪狀。

還有人說，一月十二日和十四日，王力伙同關鋒炮製了兩篇解放軍報社論，公開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反動分子，煽動「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猛烈開火」，一個一個揪出來，把他們徹底鬥倒、鬥臭、鬥垮，致使在軍內外掀起一股揪軍內一小撮的逆流，使軍隊領導機關受到衝擊，幹部被游鬥，造成了軍隊的混亂。這說法不符合事實，因為王力根本不管解放軍報，中央宣傳組不管解放軍報。王力一月八日剛剛被任命為中央宣傳組組長，任務很繁重，各個宣傳單位的事情很多，特別是新華社和廣播電臺正出了問題，王力怎麼有空去管呢？江青在打倒王力的時候，捏造了這個材料，說王力「反軍亂軍、毀我長城」。他們自己把軍隊搞亂，毫無根據地賴到王力頭上。

今天不應該再重復江青的謊言。

第六，所謂「給四川二挺翻案」

有人還在流傳說王力「支持劉結挺、張西挺翻案，奪權，搞亂了四川。」這是早在一九八零年已被審查人員否定了的，今天又翻出來攻擊王力，更是不應該的。

一、當時審查人已對王力宣布，經查對檔案，為劉、張二人翻案問題，涉及中央一些主要領導人，不應追究王力的責任。我很清楚，主要是涉及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王力接見「二挺」是江青根據毛主席指示布置的。接見後，王力向江青寫的報告，使用的語言祇能按照當時通用的口徑，但內容是緩和的。最後也不過是建議黨中央成立一個調查組罷了。第二天給江青的報告，也是回答她提出的「主席要查，開除劉結挺黨籍，最後是不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批的」。王力查了檔案，如實報告「鄧小平、彭真、楊尚昆批的。」有人把正常的工作關係，描繪成爲私人關係，并把王力向黨中央的建議，說成是「向江青獻策」。王力的兩次報告，江青都轉給周恩來同志了。周恩來同志批示：「同意王力同志的意見。」這怎麼能由王力個人負責呢？

二、一九八零年審查時就已弄清楚了：（一）王力無權爲「二挺」翻案。（二）王力是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打倒了。王力打倒之後，四川省才成立革委會，劉結挺才擔任副主任。（三）王力打倒了將近兩年之後，才開「九大」。劉結挺還當選爲中央委員。

張西挺還當選爲候補中央委員。如果是王力個人爲他們翻的案，他們怎麼沒有跟王力一起被打倒，反而高升了呢？

三、還有一種流言說，「在王力等人的策劃和支持下，劉、張上臺以後幹了大量壞事，給四川省和宜賓地區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在四川省革委會正式成立，劉張上臺之前，王力就被打倒了。他們在四川幹了什麼事同王力何幹呢？王力關在秦城，怎麼能去策劃和支持他們呢？

（八）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大量事實證明，現在社會上誤傳的所謂王力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期間，積極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團，參與制造反革命輿論、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和篡黨奪權、亂黨亂軍的陰謀活動之類的說法，是很不對的，是把王力的錯誤的性質從根本上弄錯了。

第一，王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政治錯誤，教訓是沉痛的，應引為終生鑒戒。但「文化大革命」是我黨的一個歷史悲劇，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做的事，雖然是錯誤的，但不應着重追究個人責任。王力所作所為，并沒有違背黨的紀律，更沒有違犯法律。

第二，王力早在一九六七年就被打倒了。那時根本就沒有林彪反革命集團。在王力打倒兩年以後，「九大」還一致通過林彪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既然在王力被打倒前根本不存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王力又如何去「積極投靠」呢？

第三，在林彪叛逃後，江青反革命集團才逐漸形成，毛主席提出「四人幫」這個概念時，王力已經被關起來七年多了。王力又如何去「積極投靠」當時根本不存在的江青反革命集團呢？

第四，康生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去世時，一直到十一大，還被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來他的問題爆發了，成為主犯，但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有什麼「康生集團」。王力又如何去「積極投靠」它呢？

第五，當時發動打倒王力的，主要是江青。當時的三個常委周總理、陳伯達、康生都在正式會議上宣布：「王力問題是江青同志端出來的。」康生是江青的主要幫凶。王力是受江青、康生迫害的受害者。

第六，江青康生等鬥爭王力時宣布的罪狀，說「王力是鄧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線

上的」。是「劉、鄧安在中央文革的釘子」。難道今天這還成爲罪狀嗎？他們把王力關起來的理由，是因爲康生和江青誣陷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頭子。這純屬誣陷。現在社會上流傳的關於王力的許多罪狀，大部分還是江青等人二十多年前制造出來的，我以爲這是必須加以澄清的。

第七、江青、康生等人對王力的迫害時間最長，達九年之久，迫害和摧殘的手段是最殘酷的，駭人聽聞的。現在有的不明真相的人不但不給王力平反伸冤，反而說王力「積極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團」，這既違背歷史又違背邏輯，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這裏還說明一個重要的事實：王力沒有參加專門迫害老幹部的「中央專案組」。這個專案組是江青直接掌握的。她宣布中央文革成員除王力一人外，都參加這個專案組。王力沒有參加這個專案組，所以一些迫害老幹部的事，王力都沒有參與。

第二部

上書文選

一 前言

物極必反。中國文化大革命把極左錯誤推向極端，就必然走向反面，自己否定了自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新歷程，是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毛澤東思想合理內核不但繼承了而且得到了發揚。毛澤東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執拗的意向變

成為現實，破除了迷信，提高了自覺，剔除了空想，發展了科學。毛澤東探索和試驗的成功和失敗，都是寶貴遺產。失敗是成功之母，如果中國沒有過去那麼大的失敗，也許不會有今天的這麼大的成功。

歷史是一面鏡子。溫故是爲了鑒新。溫故是爲了溫習歷史的得失和成敗，不是爲了炫耀，也不是爲了悲愴，不是爲了吹捧，也不是爲了辱罵，而是爲了作爲今天的借鑒，作爲未來的借鑒。沒有歷史，就沒有理論。沒有理論，就沒有方向，就會像沒頭蒼蠅一樣，亂碰亂撞。就會重犯錯誤，甚至會重蹈覆轍。

我從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特別是從一九六八年初關進秦城以後，就開始反思。我直接接觸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是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這十年正是中國歷史教訓最深刻最重要的年代。我個人的教訓也是最痛苦的。我從一九八零年才開始發紙筆。一有紙筆，我就把自己反思中的一得之見寫下來，用信或者文章的形式，呈送給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等同志，提供黨中央參考。本書的書信文章，全部都是從我的這些東西當中挑選的。這些文章，提出了各方面的新問題和新建議，但幾乎都是以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作爲依據的，所以這是我的一個溫故鑒新的記錄。說得不對的地方，歡迎批評指正。這祇是一家之言。因爲許多是自己親歷而別人沒有親歷過的事，自己親自聽到而別人沒有親自聽到的問題，所以把這些東西公之於世，對於偉大的人民和偉大的祖國向美好未來邁進，可能有一點用處。

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文革第一年》，是一九八三年王力的一個談話紀錄。因為這個紀錄稿已在國內外流傳，有些被引用，有些被抄襲，有些被歪曲。所以本人必須正式公布這個材料，以正視聽。這個記錄是很簡略的，提問和整理者又是從特定角度出發的，難免帶有片面性。王力的正式的文革回憶錄，將作為王力文革反思錄的第三部在將來出版。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

二 文選四十五篇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王力按)這兩封信是王力被關在秦城時寫的。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有的觀點帶局限性，現在不做修改了。這個問題，隨着實踐的發展，我的認識不斷深化了。這些在此後寫的文章中陸續有所反映。

(一)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黃克誠同志《關於對毛主席的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傳達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提出的原則，并作了解釋，我完全擁護。

黨中央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綫、方針、政策之所以是正確的，是因為回到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主要是同一「左」傾思路路綫徹底決裂了。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是從正確的起步走向極端而陷入迷誤的。最初，毛主席把一個嚴重的抉擇提到黨的決策人面前：如果跟着蘇聯走，我們就要丟掉馬列主義，成為附庸，喪失革命成果；走我們自己的路，就要準備承擔很大的民族犧牲。感謝毛主席，同時感謝其他主要決策人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小平、彭真等同志和黨中央，我們選擇了後一條路。今天看來已經成爲自然。但是，當時作這樣抉擇，是很不容易的，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是要有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膽略的。如果不走這一條路，後果將不堪設想。那樣，我國將變成東歐（除了南斯拉夫，後

來又除了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和蒙古。不僅我國人民的苦難，而且世界人民的苦難將不堪設想。從一定的意義上，一九四九年，我國並沒有百分之百地獨立，雖不是衛星國，但受到並非平等的黨和國家關係的束縛。中蘇同盟條約包含不平等的因素。中蘇談判，毛主席一肚子氣，不僅是因為斯大林不接送，而且貫穿在談判過程中。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徹底決裂，贖買旅順口，取消蘇聯在新疆的特權（不算中蘇談判中的外蒙古問題），我國才百分百的獨立。毛主席日夜思索的最大問題就是：一、走中國自己的路；二、防止出現蘇聯那樣的「復辟」問題，即防止黨和政府同人民的鴻溝，由官僚主義化發展到成為人民的對立面。毛主席從這兩個命題出發，部分地脫離了他終生堅持的唯物辯證法，走到自己願望的反面；走自己的路走到了三年大冒進的困境；為防止赫魯曉夫式的復辟，而不斷發動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出現了林彪、「四人幫」以「左」的形式部分的、暫時的復辟。毛主席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悲劇。應象劍英同志說的令人痛心，而不應激憤。毛主席的錯誤要講清楚，要改正，黨中央正確地做到了。毛主席提出的走中國自己的路的命題沒有錯，他迷誤了，沒有能够正確解決，現在黨中央正確解決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終於在付出沉重的代價之後解決了，這是主體。小平、克誠同志都強調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很擁護。舉一個例子，我記得一九六三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漢的一次談話中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和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就看到北京的報上提出

了「躍進」。這是違背唯物辯證法的。躍進，就是質變；沒有量變，怎麼有質變呢？我一回到北京，報上就出現了「大躍進」了。什麼「三面紅旗」，這是三元論。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元論，祇有一面紅旗，就是總路綫。」這次談話，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姚溱、範若愚和王力參加（我整理的記錄全文在「文革」中被沒收）。我還記得一九五八年十月，喬木同志就向我傳達毛主席反對浮誇風和「共產風」的意見，要我帶《紅旗》雜志幾個人到河北省安國縣做調查。可見「大躍進」的錯誤，不能算毛主席一個人的。當然，正如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說的：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應當負責的是我。

我多次聽毛主席說：「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我沒有發展馬克思主義」。我以為這是科學態度。這與我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有關。毛主席雖然貢獻了十大關係、農輕重等論點，但沒有觸及勞動二重性（商品二重性）這個政治經濟學樞紐問題，這個既是價值法則又是有計劃按比例法則的核心問題。毛主席去世時，身邊還擺着《資本論》，說明他還在探索這方面的問題。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總路綫，現在看來是不能體現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作為背景來說，要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自己的道路，這本是好心，但是斷言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國完全是照抄蘇聯的一套，是爬行主義，則不合實際情況。實際上那時恰恰比較好，并不慢，是既汲取了蘇聯的好經驗，又結合了解放前後自己的經驗。總路綫是反冒進的產物。總路綫及其解釋反映了經濟指導思想這個主體的錯誤。正如毛主席所說，其他包括「大躍進」和人民

公社都是派生的。少奇同志早已不同意把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編入他的文集。現在中央抓住了糾正經濟建設「左」傾指導思想這個主體，其他問題將迎刃而解。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他晚年最嚴重的錯誤。毛主席的動機確是爲了防止出現他所以爲的蘇聯的「復辟」。悲劇正在於他直到去世，還以爲這是爲黨爲人民爲全人類作了一件堪與中國革命勝利相媲美的偉業。他未對中國作具體分析，就簡單地以蘇聯作歷史類比，認定中國已經出現了赫魯曉夫，直到基層都有復辟現象，并且確定一個不科學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毛主席把許多好同志當作敵人，并不是從個人恩怨或爭權奪利出發，而是階級估量錯了。爲什麼搞「叛徒」？毛主席又是從以日共作簡單的歷史類比而形成的主觀概念出發的。文化大革命是從根本上錯了。理論、路線、政策、方法都錯了。據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直接接觸，即使那時也不能說毛主席完全拋棄了唯物辯證法，他對待事物的態度還是經常表示：第一、「不一定」。他並不輕信。凡事要問一個「爲什麼？」第二、「還得看」。要看兩方面，因爲在戰略上錯了，雖然在戰術問題上講辯證法，作過一些就當時的歷史情況來說是好的決定，如大聯合，三結合，三支兩軍，抓革命，促生產等，但不能改變全局。文化大革命後來的發展，和我當時聽到的毛主席的設想，有很大的不同。那時毛主席的設想是搞三年，一年發動、一年勝利、一年處理善後。毛主席同意把少奇，小平同志等一大批老革命家列入「走資派」，當作主要革命對象，主要矛盾，敵我矛

盾，後果是嚴重的；但是據我從毛主席多次談話中理解，他並不認為這個界限是固定不變的。他說，到了處理善後時期，少奇同志還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小平同志要保留在政治局和常委，大多數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以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彭真同志已被誣陷為「叛徒」，不能在中央委員會了，但在處理善後時期，不能抹煞他對黨的貢獻，至少要保留黨籍，安排工作。後來看到九大的文件，使我大吃一驚，當時我直覺是，很不符合毛主席原來的想法，有的他一直反對的提法也寫進了黨章。九大，是黨的歷史上最壞的一次代表大會。我推測毛主席的心情也不會是愉快的。因為每當出現如「四個偉大」的提法時，他總是說「我心裏很不舒服」，但還是容忍了。

十大，小平同志等一批老革命家選進中央，很明顯，這是毛主席的主張。但是，十大的思想路線是繼承九大的。十一大記載了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成果，但還受兩個「凡是」的束縛。三中全會，其偉大意義相當於遵義會議，是我黨的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四中全會，相當於瓦窑堡會議，批判文化大革命和二十多年的錯誤。中央工作會議，相當於延安整風，在中央並號召全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抓住了主體，同「左」傾思想徹底決裂。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解決了馬列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不但對我黨，而且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具有不可估量的偉大意義。

對毛主席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是一個對待馬列主義態度的根本問題，是一

個關係我國人民命運和前途的根本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我黨將犯歷史性的大錯誤。感謝黨中央，這個問題處理得既有原則又合情合理，既有膽略，又有分寸，是成功地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對待斯大林問題的經驗教訓。堅持毛澤東思想，這是武裝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並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的最銳利武器。很明顯，毛澤東思想是一門科學，它不包括任何人的錯誤思想，也不包括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思想；同樣很明顯，它包括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切具有獨特貢獻的正確思想，也包括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思想，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黨建問題和法學問題上的正確思想。毛澤東思想充滿活力地發展着，以至無涯。

(二)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

七月一日，看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完全擁護。

這個《歷史決議》，將同七大以前的那個《歷史決議》一樣，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撥亂反正，開闢新勝利的道路。

這個文件肯定並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也概括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包括政治經濟學，因為不屬於這次總結的範圍）的大綱。

這個文件是有意識地使用並表達辯證法的範文，對一切問題都是持分析態度，區別不同的性質，得出正確的結論。

這個文件是推進我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指針，也是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要。它的價值不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減弱。

這個文件對我教育極大，我將長期學習它。現在祇講一個問題：對毛澤東同志評價是實事求是的。這個主要方面，我完全同意，這裏就不說了。在學習這個文件以前，我對毛主席晚年的嚴重錯誤認識不足，我總是想為他掩蓋。這不是科學態度。那時我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點，我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向中紀委寫報告時已經認識到，但是我把這個都說成是我的錯謬，為毛主席的錯謬思想尋找馬列主義根據的，不是林彪、不是江青、也不是康生，他們三人祇管篡權和整人，而主要是陳伯達和王力。初步成章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章，雖然都由陳伯達領銜聯署，毛主席或恩來同志定稿，但我是主要執筆者並提出理論觀點的。因為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是一九六七年

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專門向我提出來，叫我按照他的思想研究和寫作的，我祇是順從毛主席的思路而不是獨立進行科學的研究。因此，當我看到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沒有這一條時，我反而認為這是毛澤東的「新發展」，並且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這個提法經毛主席定下來了。因此，我也確實負有嚴重的責任。

毛主席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是對馬列主義的教條化和誤解。「文革」開始時，我知道得很清楚，而看來直到最後，基本上還是這幾條：

第一，列寧說的：「資產階級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祇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階級就必然存在着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

本來，按照毛澤東思想，中國的資產階級同俄國不同，不但民主革命時期，而且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都具有兩面性。何況，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

但是，毛主席從一九六二年起就愈來愈陷入迷誤。「文革」後，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在一次常委會上（那時少奇、小平同志還出席）毛主席對着陶鑄同志說：「你怎麼到了一九六二年，還講資產階級兩面性呀？」他否定了自己歷來對中國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本來到一九六二年應當是革命性的一面更多了，而他却認為成為革命對象了，而且在黨內各級領導中都有代理人，這種復辟反復辟性的鬥爭，要一直進行到共產主義實現以前。

第二，列寧說的：「小生產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毛主席沒有區別合作化實行的前後，而且，列寧說這話的時候，還沒有國營和供銷合作的商業網去領導和聯合個體經濟。毛主席並且進一步認為，這種新資產階級在黨內各級領導中也都有代理人。

以上這兩條，成爲主要根據。「文革」初期，毛主席叫我給他查出列寧這兩個論點的原文，并把書交給他。後來，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來華，要向他們提出「文革」的理論根據，毛主席又叫我查出列寧這兩個論點的原文，以後并交給了阿黨。

第三，列寧說的：「蘇維埃機關職員也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本來，按照毛澤東思想，中國和蘇聯不同，我們是在已經有了相當於國家規模的解放區，又有強大的無產階級軍隊和幹部隊伍的基礎上建立新中國的，而俄國革命成功時既無軍隊，又無根據地，祇能大量利用舊機構。而且，這屬於列寧的片言祇語，不屬於列寧主義的原理。

以上這三條，加上國際聯系和影響，第一次提出，是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發布的我黨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綫的建議》，即「二十五條」上，這個文件是陳伯達、王力、範若愚協助起草，最後由毛主席召集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討論，并分別徵求金日成、長征等意見後定稿。當時是爲了批判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今天看來，雖然當時就不確切，還無大害。到了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把這三條發展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就開始嚴重了。到了作爲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那就是對列寧

主義的歪曲了。

第四，馬克思說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并用新形式代替它」。這個原則根本不適合對待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決定向全國廣播北大一張大字報時，却教條主義地運用這個原理，說這是北京公社宣言，要用公社這種新的社會政治形式代替被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篡奪了的那一部分舊機器。（這是陳伯達向我傳達的，可能不能準確地表達毛主席原話，但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發表的紅旗社論，寫上了這個觀點，毛主席批了「寫得很好」。）當然，毛主席始終說祇是部分的，可是對所謂「被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和單位的估計，又那麼多，在實際上是各級普遍奪權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毛主席改變了用公社形式代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理論，他並不認為是把馬克思的這個論點應用錯了，而祇是因為怕涉及到外國的承認問題，所以決定普遍用所謂「革命委員會」的形式來代替政府。

第五，斯大林說的：《聯共黨史》上有關整掉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拉狄克等的論述。

斯大林把那時的政治局成員大部殺掉了，把中央委員會和黨政軍以及各地方的主要領導骨幹的相當一部分人抓起來，也殺了不少，這種肅反擴大化，是斯大林的嚴重錯誤。本來，毛澤東同志一直是持批判態度的。毛主席還根據蘇聯的教訓和歷次「左」傾路線的教訓，制

定了中國黨的正確政策和制度。毛主席還對後來的蘇共的一個領導人說過，這些人不但不該殺，而且還留在中央和政治局裏就好了。可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毛主席改變了自己過去正確的觀點，他認為斯大林這是在實踐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在臨終前也開始吞吞吐吐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弄得不好還會出現復辟，祇是沒有系統地解決這個理論問題。這段發表在《人民日報》和《紅旗》社論《偉大的歷史文件》上的有關的話，就是毛主席親自寫的。這就是說，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倒是對的了，而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却是缺點。實際上相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會動亂更大。另一方面毛主席的好處是他雖然沒有堅持「大部不抓」，但始終堅持「一個不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反復說，我黨七大後犯了三大歷史錯誤，其中第二條就是殺了一個王寶山。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原則，連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壞不了。我從報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沒有一個是槍斃的，全國槍斃了四位烈士，絕不是請示過毛主席的。

我雖然祇參加了一年多一點的「文革」，但是我當時所知道的毛主席的理論根據的基本點，十年並沒有變。後來增加的內容大概有兩點：一個是所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按勞分配、商品、貨幣、工資。一個是馬克思總結的一八四八——一八五零年法蘭西階級鬥爭提到的社會主義不斷革命論，那時馬克思總結的是布朗基的社會主義，雖有參考價值，但被張春橋用作全面專政的理論根據。前一條有毛主席語錄，後一條不一定是毛主席提的，祇是

編入了當時毛主席號召學習的馬列關於資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語錄，這離開馬克思主義更遠。因此《決議》所得出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實踐中的錯誤，《決議》作了高度科學的概括，恰如其份，我祇親歷了三段中的第一段第一節。我向黨中央補充提供幾點情況：

一、「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專案組」，不是一個組織，名義上都是直屬常委領導，實際上都是祇對毛主席個人負責。「中央文革小組」是公開的，所以就臭名遠揚，而實際上「中央專案組」更壞，後者不但掌握超過今天中紀委的權力，而且直接掌握超過國家公、檢、法的權力，決定整人、揪鬥、隔離、逮捕，都是這個「專案組」幹的。而且，全國都有「專案組」，比蘇聯契卡的特權還大。加以「文革小組」到九大就結束了，而「專案組」延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我看遲遲不能平反冤假錯案，除了指導思想問題以外，這個「專案組」的組織形式，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障礙。三中全會已經宣告，永遠不要搞「專案組」了，這確是我黨歷史上的沉痛教訓。現在《決議》通過了，當然不必加了，但是作為我黨今後的鑒戒，還是值得反復引起全黨注意的。

二、群衆專政。這是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給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本來形勢亂得够嗆了，他却說，他同林彪的看法一樣，形勢很好。本來根據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報上還

是不斷反對打、砸、搶、抄、抓，更反對私設公堂。北京市的通告，也是毛主席批準的。但這封信却說，現在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就是群衆專政，北京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我因為不久就被關了，沒有經歷怎麼貫徹執行的。但是，後來從揭批查運動中揭露的材料得知，全國普遍成立了「群衆專政隊」，打、砸、搶、抄、抓、關、刑訊等大盛了，當然這包含着壞人利用的因素。我不主張向黨和人民傳達毛主席這個錯誤。但是，建議黨和政法機關在處理這類幹部和案件時，要考慮到這個因素，能從寬的宜從寬處理。

三、武裝左派。也是在這封信中，毛主席很錯誤地認為全國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支持右派，因而當前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另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本來毛主席一直是反對武鬥的。可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在武漢召集恩來同志等和武漢部隊負責同志談話時却提出了「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你們要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七月二十一日，總理和我還在武漢，江青提出了「文攻武衛」，顯然這是她自己搞的，沒有人向她傳達毛主席的意見。事實上也是文攻武衛的口號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我向中央提供這個情況，主要是建議：如果是因為傳達了毛主席「武裝左派」而由部隊發槍，組織什麼「民兵小分隊」并造成武鬥的，祇要不是別有用心，一般不應追究負責人的責任，參加武鬥而造成傷亡的，祇要不是有意殺人傷人的，不應適用於《刑法》。

唐初政治家魏徵在總結歷史上開國者的教訓時說：「善始者實繁，克終者實寡，豈取之

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不幸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開國領袖也沒有避免這個悲劇。

撥亂反正任務之所以艱巨，主要在於區別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而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犯嚴重錯誤時，也還有閃爍着光輝的思想。錯誤思想夾雜正確思想，都是我國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歷史時代的產物，而且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我國的社會意識和習慣。因此，這件區別工作，象斷指再植那樣，需要進行縝密的分析和縫合。《歷史決議》成功地完成了這歷史任務，成了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文件，我們沿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前進，就將無往而不勝！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任何一次社會倒退，必然以社會進步作為補償，這本來說的是一個自然的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然而我們偉大的黨却能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自覺地把挫折轉變為社會進步的開端，我為有這樣的黨和黨中央而自豪。

毛澤東談羅榮桓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羅榮桓傳記》編寫組潘天嘉同志來向我採訪。據稱，書的第一冊已出版（我未看到），第二冊關於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在山東的建樹，也已基本定稿，內容是以戰功為主（草稿我也未看到）。從過去報上發表的回憶文章看來，一般都不知道羅榮桓同志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偉大作用。

這個問題，毛主席同我談過兩次。一次是一九六一年的廬山會議以後，他約我和姚溱同志一起同他談心。他老人家說要了解一個幹部，至少要同他談半天話。當我談到山東黨的歷史時，毛澤東大講了羅榮桓同志。第二次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同毛主席一起去向羅榮桓同志遺體告別，事後他同我和康生談話。因為我所有的筆記、整理後的紀錄、手稿，在十八年前

都被那個專案組沒收了，至今無影無踪，所以，我祇能憑記憶，把毛主席當時所講的使我終生難忘的話整理出來。下面是毛主席的原話：

一、凡是我倒霉的時候，羅榮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鄧小平也差不多。
二、羅榮桓的品格，用十句話概括，無私利，不專斷，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開，放得下。同我一輩子共事的人，祇有羅榮桓，再還有鄧小平。

三、山東祇換上一個羅榮桓，山東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東的棋下活了，全國的棋也就活了。山東把所有的戰略點綫都搶占和包圍了。祇有山東全省是我們完整的、最重要的戰略基地。北占東北，南下長江，都主要依靠山東。

四、羅榮桓在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地區，做好了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事業。

五、羅榮桓到山東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東全部拿過來。就想到爲把全國拿下來盡義務。

六、山東是執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範。羅榮桓一到山東，就在誰領導誰，誰團結誰，誰統一誰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堅持正確路綫。

七、羅榮桓在山東，一直抓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什麼是中心？就是發動群衆，依靠群衆，武裝群衆。少奇同志到山東，支持的就是羅榮桓。

八、敵人蠶食了，是面向根據地，還是背向根據地？羅榮桓的翻邊戰術，不是戰術，是戰略。他掌握山東局面以後，敵人越蠶食，根據地越擴大。

九、羅榮桓是執行上級指示的模範，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見的模範。百團大戰不能說都對；但是，羅榮桓不參加百團大戰，集中力量搶占山東的地盤，這很了不起。羅榮桓領導的整風，把主要目的放在從檢查領導思想作風開始，到改進領導思想作風結束，重點是端正路綫。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搶救運動」。這很難得。

十、羅榮桓最守紀律。連高崗都說，羅榮桓是黨內的聖人，不敢去找羅榮桓亂說。從高饒問題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羅榮桓、鄧小平、陳雲。

以上是我所能够記憶起來的毛主席的原話。但願我的全部記錄和文字手稿，能象被沒收的照片一樣，也可以找到，歸還給我，那就好了。在羅榮桓同志領導下工作的那段時期，我擔任分局黨刊《鬥爭生活》編輯，整風時任分局總學委秘書。羅政委經常教育我們：「對中央指示，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正式講話和文章，中央黨報的重要社論，都要先認真讀三遍。然後，聯系實際去思考。在實踐過程中，還要對照檢查，重新學習。有了經驗和不同意見，要及時報告和請示。中央才有可能再把正確意見集中起來。中央批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注：本文原為致黨中央的信。十二月初，胡耀邦批示給總政閱，供參考。同時批示有關

部門去查找「王力同志的筆記」，「還給王力同志本人為好」。本文一九八九年曾在《人物》雜志上發表。

毛澤東談鄧小平和我對十三屆

四中全會的看法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擁護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和多項決議，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我學習了鄧小平同志的幾次講話和四中全會有關文件，受到很大的教育。下面是一些學習心得和建議：

一、十年的實踐，證明了鄧小平同志在新的歷史轉折中，作出了偉大貢獻，繼承和發展

了毛澤東思想，這使我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武漢同我單獨談話時對鄧小平同志作的極高的評價。他說，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劉鄧的口號，接着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祇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出來。不管是小平、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掌舵，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這一段話，我過去沒有完整地引用過。現在事實又一次證實了毛主席的評價。所以我在第二代領導核心向第三代領導核心交接的時候，特別整理出來報告中央。

二、十三屆四中全會發布的文件和決議，建立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向全黨全國人民表明，今後將全面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并把二者緊密結合起來。我贊成江澤民同志對這個問題的精闢論述。祇有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才是生動活潑的，不斷發展的，內容豐富的，有生命的原則。祇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才是有方向的，有軌道的，有前途的，有勝利保證的改革開放。二者不可缺一，也不可割裂開來。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十年來，鄧小平同志始終注重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兩個「凡是」的極左思潮，

反對那種僵化的、保守的、固步自封的、閉關自守的、阻擋時代車輪前進的傾向；同時又及時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反對那種不敵我的、不辨方向的、不辨道路的、崇洋媚外的、從另一極端開歷史倒車的傾向。我在一九八一年寫過這一問題的學習體會，為中央所印發。小平同志時刻提醒全黨，不能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不能拋棄兩條戰線的鬥爭。我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致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到這一學習體會，強調如果拋棄兩條戰線的鬥爭，如果祇反右不反左，就會重蹈文化大革命悲劇的覆轍；如果祇反左不反右，特別是如果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就有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危險性。實踐證明了小平同志這一思想的正確性和重要性。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同那些拋棄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改革有本質的區別。前者是真正的改革，後者是虛偽的而且不能叫改革。因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復辟和平演變了。

三、我擁護四中全會提出的四件大事。必須做出成效來，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中央堅持抓黨治腐敗，以振奮民心，是很對的。為什麼出現腐敗，屢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呢？歸根到底，還是共產黨的組織渙散，黨風不正。因此我祇着重提一條不成熟的建議，就是應仿照延安整風，進行一次全黨整風，進行一次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否則，一切正確路綫、政策和任務，都不能貫徹執行。

(一) 整風要從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開始，并由它領導全黨進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強有力的領袖集體，是在延安整風中打下基礎的。我希望經過新的整風，樹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高層集體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權威。這是關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

(二) 整風首先要在中央和省、市這兩級中進行。我黨的七屆中央委員和八屆的中央委員，都是經過延安整風培育的，形成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創業時期的骨幹力量。我們的新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事業，同樣必須有這樣的經過整風培養的一大批骨幹力量。只要黨是團結一致的，再大的困難都能克服。

(三) 整風是以自我批評為主。王明曾經向斯大林告狀，說毛澤東在延安強迫百分之九十幾的領導幹部檢討。毛主席說，他說少了，不是百分之九十幾，而是百分之百。整風的中心是反對各種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歪風，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作風；反對各種宗派主義和自由主義，堅持黨的統一和紀律以及傳統的正派的黨風。認真學習文件（制定幹部必讀文件），總結經驗（四十年，特別是十年和當前事件），以自我批評為主並開展相互批評。延安整風中大家都寫了思想總結，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解決了自覺地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問題，堅定地走中國自己的正確的道路。人的面貌一新，黨的面貌一新，組織整頓也就順理成章了，當時十大任務都迎刃而解了。同樣的，今天各級領導骨幹，如果有人自己對四項基本原則，對改革開放，對鄧小平的繼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對鄧小

平同志爲代表的正確路線，並不懂，或不甚懂，或祇會背誦和照搬，那麼，正確路線的政策和任務都難以實現。所以，我以爲整風比整黨更易爲全黨所接受，而且可以不限於黨內并在全體幹部中進行。

四、切不可忘記農村。中國的建設和改革，目的都是解決變自然經濟爲社會化經濟，變手工勞動爲機械化生產的問題，以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文化的需要。重視發展基礎工業，也是爲了這個目標。堅持以農業爲基礎，切實去解決農村問題，我們才能不出亂子，才能順利發展。

毛澤東七十二歲生日的談話和我的看法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看到了不少國內的和國際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澤東

七十三歲生日的一次重要談話。這樣，對於「一月風暴」及其以後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景，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毛澤東，就難以做出科學的評價。所以我先把它客觀地加以介紹，然後再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飯。沒有林彪、總理、陶鑄、康生、李富春。我們到時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裏很熱。吃飯是按他的慣例，他招待外國人也是這樣，四菜一湯。今天每人加一小碗面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飯前毛主席說了很多話。他從來不過生日，這次過個生日。這實際上是個重要的會。

這次毛主席的講話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毛主席說：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連，大串連使全國革命連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

他們為什麼能蒙蔽群衆？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爲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麼，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倡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地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衆，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祇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衆也懂得，爲群衆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說，最近時期出現新的局面，廣大工農兵起來了，衝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起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幹部起來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幹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毛主席講話總的概念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吃飯時毛主席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話在吃飯前也說過。除上述的話外，他吃飯前還說了很多話。這些話在後來的文章中找得到。雖然沒用黑體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話是準確地概括他對當前形勢和今後作法的想法。有人說毛主席說「要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這次我沒記得聽他說過。他說的「全國全面」，是指的工礦企業和農村。他說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

「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口號，毛主席說是抓革命才能促進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制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說，有人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衆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他們過去靠舊框框吃飯，離開舊的一套就不會走路，就不會說話。挑動群衆停止生產，挑動群衆鬥群衆，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爲走資派。任何阻擋這場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衝掉。毛主席說，他同陶鑄分歧的實質就是這個。

那時相當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對此都不理解。原來說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後來工

礦企業和農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這兩個指示都是根據毛主席指示起草的，可是我這起草人之一，開始也沒有認識到毛主席為什麼要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毛主席過生日的談話後我才知道。

毛主席還說：鬥、批、改，改什麼？光在文化部門、機關學校改，改些什麼？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麼？作爲社會經濟基礎的工礦農村還是老一套，那還改什麼呢？那就沒有目標了。至今人們大概也還不知道這個問題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個悲劇，毛主席沒有達到他原來設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爲毛主席就是爲了天下大亂，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爲什麼要叫它亂？這次毛主席過生日才說得比較透徹。

毛主席認爲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制度（不是說社會主義制度，是說舊的規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舊紀律（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要搞掉。毛主席關於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這樣來的。他認爲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爲大民主好，便於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主席還講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要保障群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連的正常進行，專政機關不能幹涉甚至壓制，不能亂抓人。祇能對確有證

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說怪話反對領導，而是真正去放毒藥。）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制裁。革命群衆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保障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毛主席反復講，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祇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辯論。他說，專政限於很小範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好，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部，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人不殺。這一條，文化大革命中我聽毛主席講過多次。這一點他是堅持的。但他沒有堅持大部不抓。過去說大部不抓，是指確有證據的間諜特務都大部不抓。可是後來擴大到對打倒了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沒有堅持過去提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說，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他說，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這一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鬥爭還是在鬥。各級、各個領域都存在這問題。他們在黨內佔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響。清除這些影響，使各方面、各領域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還要作深入細致的工作，還要有很長時間的鬥爭。

毛主席說，一定要有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束縛群衆的

框框，到群衆中去，同工人農民學生在一起，參加鬥批改，實現機關革命化。要堅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領導幹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團結大多數，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來，越來越多的領導人會站到革命群衆方面來，支持他發動的群衆的革命運動。他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衆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話）。

毛主席在吃飯前說了上面一些話。這是他提出的「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基本內容，也是他一月份號召全面奪權的根據。這也是他反復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根據。這一番話，也比較完整地表述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飯桌上沒有說什麼話，祇是祝酒說了一句。吃完飯閑談幾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過生日的這次談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比較重要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以後，我有一些想法，認為自己的思想落後于毛主席，落後于運動。覺得毛主席總是站在前邊，我們總是趕不上。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總結，使我們比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東西。當時我是擁護毛主席的路線的，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別人的回憶錄說的，自己當時就對毛主席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事後聖人，反正當時我沒見過一個堅決鬥爭的。那時自己是否沒有疑問？也不是。這樣的搞法，到底怎麼樣？我有點擔心。當時聽了毛主席講話後一兩天，我對給我開車的中聯部司機王貴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半

年，還要大搞，看起來所有的幹部都要被打倒。後來一九八二年我從秦城出來後，王貴對我說：你看得真準，後來果然是所有領導幹部都打倒了。但是，我當時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我直到被關到秦城，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帶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農民（小生產者）運動，因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倒退性。我認為，文化大革命這一場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主要不是由於某個人的不良動機造成的一，而是有它的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這一點我過去是沒有認識清楚的。我們所犯的理論上的錯誤和行動上的錯誤，都是從這裏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特別是土地改革以後，我們就誤認爲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其實，我們並沒有把自然經濟改變爲社會化經濟，並沒有把農民等小生產者變成爲同現代生產相聯繫的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並沒有把大量的手工生產改變爲現代化生產。也就是說，封建主義的墻腳根並沒有鏟除。中國人民還是苦於封建主義，即苦於資本主義的不足，而並不是苦於對國民經濟有利的而不是對國民經濟有害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存在和發展（這本來是毛澤東自己說的話）。我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的二重性，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化和社會化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在有的問題上我們用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武器，時常祇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實質是帶着封建色彩的小生產者的觀點。我國沒有經過商品經濟這一個大課堂，人們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觀點，就難以爲現代社會的文明的、科學的、民主的觀點所代替，更談不到科學社會

主義的觀點。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性質的錯誤還可以另外的形式重現。

解放以後，特別是一九五七年以後，毛主席常常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以後，並不檢查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這樣，臆造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以至無處不是敵人了，敵人不但跑到黨內來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領導核心中來了。于是，就要「天天講」階級鬥爭，就要「不斷革命」，並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了。這個深刻的、痛苦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

我同毛主席接觸將近十年，我認為毛主席的最大弱點是沒有系統地讀《資本論》。毛主席臨終時床頭還放着《資本論》第一卷，說明他自己覺得還是要補這一課。毛主席說他自己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沒有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不是謙虛之詞。政治經濟學他認真學了，他認真學了蘇聯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一句一句地批了，但是他沒有把《資本論》的基本原理應用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去。當然，社會化生產他也不是沒有考慮，不象有的理論家，在三中全會前批判劉少奇和陳伯達時說，他們「居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要搞托拉斯」。這位理論家難道連《國家與革命》也沒有讀過嗎？列寧說托拉斯是高度社會化的生產組織，它更接近社會主義，所有制容易解決，社會化不容易解決。這一點毛主席不是這樣。他認為社會主義要搞聯合企業，實際上就是要搞托拉斯。他在武鋼、大慶都提出要搞聯合企

業・聯合企業、集團公司，就是托拉斯，這是翻譯的問題。這點上毛主席並不保守。

關於商品問題，張春橋的文章發表了毛主席的語錄，說我們還有資產階級法權，還有商品、貨幣、八級工資制，等等，那時毛主席已經老了，這段話思想很混亂。據我所知，毛主席對商品問題也有發展。斯大林說生活資料是商品，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毛主席說，生產資料也是商品。這就進了一步。不能說毛主席是保守的。直到現在，人們也沒有把商品問題講清楚。我總覺得，因為有些人沒有讀《資本論》，對商品的概念不清楚，吃了大虧。現在有的理論家，認為承認勞動力是商品就是資本主義。那麼，為什麼說按勞取酬是資產階級法權？為什麼說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什麼叫工資？如果工資不是勞動力的價格表現，那就沒有工資的科學概念。我願意給多少就是多少，我願意定多少級就是多少級，不尊重工資的科學規律。如果工資不能保障勞動力在一定經濟、文化、社會條件下滿足他的需要，滿足他生育和教育子女的需要，工資就沒有科學的定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表現，這是簡單勞動的價格，熟練勞動、高級勞動是它的倍數。認為社會主義就可以不考慮這些，只有資本主義的工資才符合馬克思的規律，這不是笑話嗎？這問題毛主席沒有解決，現在也還有待于解決。不解決工人的根本需要，他必然用種種不正當的方法去滿足他的需要。這規律誰也不能抗拒。我們的工資制度不建立在勞動力價格的基礎上，離開這個東西，計劃就是空的，可變資本、不變資本，都沒有基本的計算單位了。所有財富，不是活勞動就是死

勞動·不變資本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新增加的價值是扣除必要部分（工資）之後的那一部分·計劃離開價值法則，怎麼行呢？離開勞動的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體現的實質是什麼呢？離開《資本論》，能有科學的社會主義嗎？說計劃調節市場，市場是客觀的，計劃是主觀的，調節是主觀的。客觀規律是什麼？毛主席臨終前床頭放着《資本論》第一卷，說明他想解決這問題。毛主席說他沒有發展政治經濟學，是中肯的，是沒有發展。可是在商品問題上他也有突破。現在把毛主席完全否定是不對的。

關於科學技術方面，毛主席是沒有看到、沒有總結新的技術革命引起的新的產業革命。但是他密切注意世界上任何新的科學技術的進展。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抓電子科學的發展進程，他用辯證法來講電子問題，他說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至今電子科學家還佩服他。他跟日本科學家的談話至今還是光輝的。他是真的抓。激光，中國抓得不晚，六十年代就抓。當時在世界上是領先的。原子彈、氫彈、空間科學、火箭，凡是世界上先進的東西他都抓。就是核電站沒有抓。生物工程他也抓得早。人工合成胰島素在世界上領先。不能說毛主席反科學。把毛主席說得一無是處是不對的，不公道。當然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在這方面可以有更飛躍的發展。

說毛主席不開放，閉關自守，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毛主席不閉關自守。在這方面毛主席是開明的。一有可能他就要拉關係，毛主席死後，現在搞開放，把毛主席作為閉關自守的

代表。這是不對的。毛主席相當開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制定，是毛澤東的功績。周總理是執行者。總理自己說過，外交工作授權有限。一切原則問題必須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作決定。毛主席既定的方針、政策、原則，在這範圍內，外交工作要發揮自己的作用。絕不能越權。周總理是偉大的外交家，制定外交政策他也參與的。但政策的決定同制定主要是毛主席。

一切可以爭取的國際關係、國際援助，毛主席都用心地去爭取。同美國搞關係，抗日戰爭時期就有。抗戰時期就有美國人在延安。解放以後毛主席沒有忽略同美國建立關係。美國人開始時也沒有要同新中國搞翻。解放軍渡江後美國第七艦隊撤退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還留在南京，蘇聯大使倒跟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廣州去了。美國的作法本來是明智的，但是愚蠢的政客們一定要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什麼「民主個人主義者」身上，那當然行不通，弄翻了。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邊倒」是美國的蠢才們逼的。

毛主席非常重視發展同外國的關係。一九五四年日内瓦會議周總理對杜勒斯的態度，是根據毛主席的思想。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我參加藝術團到南美，主要任務是到美國，美國邀請了我們。可見我們沒有放鬆每一個機會同美國接觸。後來因為匈牙利事件，西方掀起反蘇反共高潮，美國愚蠢的政客們，不懂得把中國同蘇聯區別開來，又對我國關了門，美國去不成了。尼克松訪華，建立中美關係，是毛主席定的，不能說毛主席保守。對蘇

聯也是如此，一有機會毛主席就要恢復同蘇聯的關係。赫魯曉夫一下臺，馬上就派周總理去，結果又吵了架，回來了。同蘇聯的緊張關係，不是我們的責任。毛主席不反對開放，他總是爭取一切機會建立關係。在蘇美敵對我們的時候，毛主席把其他可能爭取的國家都爭取了，特別是法國的戴高樂。對日本的關係，官方不行，就從民間突破，這方針也是毛主席定的。不能說毛主席反對開放，閉關自守。另一方面，毛主席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任何時候都不放棄。任何时候、任何招牌下的國家，中國都不能成爲他們的附庸，不能依賴。同蘇聯的爭論，現在有人認爲都是我們不對，我認爲不是我們不對。我們同蘇聯的爭論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我們不聽指揮棒，我們國家民族要獨立，不能容許侵占我們的領土和主權。這類問題一萬年也是我們對。可是另一方面對於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麼搞，我們也不清楚，一定要罵人家不對，這是有不當之處。肯定一切也是不對的，不能說九評都對。特別牽涉到經濟政策問題，錯誤話說得也不少。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失敗的試驗，毛主席演了一場悲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對的，永遠不能這麼搞，但因此就徹底否定這一時期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一切，也是不合適的。

我當時是真心擁護毛主席，不能說是違心的。我也說了不少錯話，不能說這些話都是違心的。毛主席說打倒誰，我都擁護。毛主席說保護誰，我也都擁護。當時我是真心誠意的，不能說是違心的。毛澤東思想被扭曲了，當然首先是毛主席的責任；但是不能說錯誤都是毛

——鄧小平在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關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和部署上的發言

主席一個人的責任。我自己也有一份嚴重的責任，要終生引以爲鑒。

十一屆三中全會不是宣告毛澤東思想的終結，而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外國歷史學家說，這標志着鄧主義的開端，毛主義的終結，這是不對的。鄧小平的思想，鄧小平總結的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正是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并且爲沿着正確軌道應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開闢了道路。

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

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是英明的，得到了偉大的成功。但是不少問題單從報刊和檔案上是看不到的。有些事毛主席不輕易同別人講。我有幸聽到主席親口講的許多重大問題，有的還是單獨同我說的。還有的問題，是直接對主席負責的王稼祥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親口同我單獨談

的。有的事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了，不應該讓它同我一起帶入火葬場。我認為不知道這些重大事件的真實歷史，對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可能祇了解一個表面，甚至不了解。這樣，對於社會上和世界上對毛澤東的誤解、歪曲和貶低，也就難以進行有力的批駁了。有些重大問題，過去是絕密的，現在差不多都通過各種途徑公開發表了。這些發表出去的東西，有些是不確切的，甚至有些被歪曲了，所以我有責任來加以說明。

一、毛澤東—斯大林會談問題

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以後，毛澤東訪蘇。他說：我是一肚子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也都是一肚子氣。不但是斯大林不去接送，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那個友好同盟條約，還包含不平等的內容。毛主席說，斯大林不但繼續把外蒙古占為蘇聯的殖民地，而且堅持按雅爾塔會議上一個斯大林、一個羅斯福、一個邱吉爾三家瓜分中國的協議，不肯放棄蘇聯侵占中國的那部分利益。在東北，要占領中東路和旅順口，在新疆，也要保留政治經濟的特權。陳嘉庚痛哭失聲，是好樣的。蔣介石反對，也是有道理的，他利用這個來反共反蘇，我們不能不反擊。蔣介石和斯大林訂的那個友好同盟條約（一九四五年），還不是一個樣。我毛澤東是照顧大局，爲了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不能不簽字，但是心中有數。中國決不當衛星國，但是還沒有成爲完全獨立解放的國家，我們還沒有把蘇聯的局部的殖民統治取消。到抗美援朝以後才部分地解決了。直到赫魯曉夫上臺以後，他們因爲

政治上需要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我們又花一大筆錢，才把旅順口贖買回來。這才算是基本上解決了我國成爲完全獨立國家的問題。當然，外蒙古的問題就不算了。

蒙古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曾經在中國歷史上占據將近一百年的統治地位。外蒙古的獨立是在舊中國反動統治下發生的。新中國建立以後，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就不復存在了。蘇聯把外蒙古當做自己的殖民地，是資格最老的衛星國。外蒙古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蘇聯對衛星國、附屬國或殖民地統治的野蠻性和反動性。那裏人口少、地域廣、資源富，幾十年了，搞得那樣貧困落後，山窮水盡，并且取消了蒙文，以俄語代蒙語。

毛澤東一提出外蒙古問題，就捅了馬蜂窩，斯大林就變了臉，認定毛澤東是「民族共產主義者」，是「鐵托」，甚至是「美國特務」了。實際上中斷了會談。他們把毛澤東晾在克裏姆林宮，沒有人理會。當時的駐蘇大使是王稼祥，他在毛澤東和斯大林的鬥爭中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毛主席說，這是稼祥同志繼遵義會議之後，在歷史上第二次立下了大功。他熟悉斯大林那一套，爲毛澤東當參謀，怎樣對付斯大林。他告訴主席，你住的房子裏有竊聽器。他拿自己因耳聾用的助聽器給主席聽，聽到不斷有不正常的聲音。主席說，正好，我就通過這個告訴他們。於是就大聲地大罵了一通，說我明天就回北京！住在這裏幹什麼？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拉屎！果然見效，當晚就通知明天要繼續會談了。從此大家也就不談

外蒙古問題了。

二、朝鮮問題。

毛主席說：一個斯大林，一個當事人，一個毛澤東，三家子商議。斯大林原來不敢碰雅爾塔協議，他們把中國分給了美國，所以不許中國革命，後來又不許中國過江。我們過了江，美國司徒雷登大使還留在南京，蘇聯羅森大使倒跑到廣州那個「國民政府」去了。中國勝利了，斯大林又衝昏了頭腦。原來以三八綫爲界，南朝鮮歸美國，北朝鮮歸蘇聯。現在手癢了，要武力占領南朝鮮了。三家子，祇有我毛澤東一家子反對。我說，不行。這同中國革命戰爭統一全中國的性質不一樣。就是占領了南朝鮮，美國一定會出兵，一定會在仁川登陸，北朝鮮打不贏。斯大林說，美國出兵，不怕。那就中國出陸軍，蘇聯出空軍。一個斯大林，是太上皇，一個是當事人，他們兩家子都主張打，我這一家子的反對意見，他們又不聽。那祇好按他們的辦。果然不出所料，美國人仁川登陸，北朝鮮頂不住。中國出兵不出兵呢？開頭我主張不出兵，派周恩來去同斯大林他們談。後來形勢變了，美國成爲侵略者了。他的目標已經不是有限的了，不但要侵占北朝鮮，而且要侵占中國的東北了。我就不能等他們打到鴨綠江邊了。那樣，仗就不好打了。我決定出兵，叫周恩來告訴斯大林。我們出了陸軍，叫志願軍。我絕不是聽從斯大林。我們真的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如果真有侵略者的話，絕不是中國，絕不是毛澤東，而是別的國家，別的人。可斯大林賴賬了，他不出空軍。

了，要幫助訓練我們的空軍，還要我們出高價買他的飛機。好吧，那就打吧。可是正打到轉折關頭，他們又要停了。又是三家子商議，一個斯大林，一個當事人，都要停。我毛澤東說，再打它一年，美國就頂不住了，朝鮮倒是可以統一了。他們又不聽。一個太上皇，一個當事人，都要停，那又祇好按他們的辦，那就停吧。按照斯大林的邏輯，北朝鮮就應當歸中國了。我同他不一樣。北朝鮮是朝鮮人民的。我們幫助了他們，他們也幫助了我們。我們決不留一兵一卒。這樣，北朝鮮不但趕走了美國，也擺脫了蘇聯，這才真正獨立解放了。三八綫問題，當然也就不是短時期能解決的問題了。這一點，赫魯曉夫回憶錄上，洪學智的回憶文章上，還有許多出版物上都公布了。但是，因為他們都沒有直接聽到過毛澤東的話，說的都不確切，而且最重要的情況，他們都不知道。可能世界上也沒有幾個人知道了。既然已經不是秘密了，我就用毛澤東的話把它說清楚。

三、越南問題。

斯大林先是反對胡志明搞武裝鬥爭的，按照雅爾塔協議，印度支那要恢復法國的殖民統治。中國解放後，胡志明得到中國的支持，建立了軍隊和根據地。斯大林不反對了，批評胡志明不進行土地革命。態度是粗暴的。胡志明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見，進行土地改革，發動農民，在這方面也學習中國經驗。在整個抗法戰爭時期，蘇聯沒有給越南援助，直到日內瓦談判達成協議，以十七度綫為界，南方歸法國，北方歸胡志明。這是力量對比決定的，也是爲

了防止美國代替法國。按照斯大林—赫魯曉夫的邏輯，越南北方又應該是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了。毛澤東說，我不是斯大林，我們不能要殖民地、附屬國、衛星國。越南是獨立的，我們絕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堅決撤回了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祇派遣經濟專家去援助越南恢復和发展經濟。我們的政治軍事顧問撤回了，赫魯曉夫却乘虛而入，陸續派遣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控制越南的意識形態領域和軍隊，而經濟援助方面却少得可憐。

在我擔任胡志明和長征的意識形態顧問組組長時期（從一九五三年底赴越，到一九五五年十月撤回），越南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是中國經驗同越南實際相結合的胡志明的獨特模式。現在越南的總書記杜梅，我同他直接交往過。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我是中國黨幫助越南黨接管河內——鴻基——海防的顧問組的總負責人。那時杜梅是海防市委書記。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是在實際工作中提拔起來的幹部。他是務實的，又肯動腦筋思考問題。當時對待中國經驗很虛心，對中國同志有感情。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國的顧問祇能介紹中國經驗，不能強加於人，一切決定都由越南人自己做，海防市的接管工作是很成功的。我同他多次交談過，也多次留下友好的合影。當然，這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的事情了。因為他即將訪華，特把我對他的印象概括地提出。

四、美國問題。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戰略家，對美國，對蘇聯，都是放到最重要的

地位來思考的。毛主席不止一次說，中國要真正的獨立，第一就要同美國鬥，第二就要同蘇聯鬥。中國要和平和發展，第一要同蘇聯搞好關係，第二要同美國搞好關係。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有美國軍事觀察組在延安，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是我國的盟國，也是我黨的盟友。羅斯福的智囊中，就有美共和我黨的政治家。羅斯福也是有戰略眼光的人，他知道戰後中共的力量必然上升，美國同中共的合作對於美國的利益和維護世界和平很重要。毛澤東也是重視美國的力量、長處和別國不可代替的作用的。但是毛澤東絕不容忍中國被瓜分，被奴役。

羅斯福以後，美國短視的政治家，看不到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採取了以中共為敵，支持國民黨內戰的反動政策，從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主要對象。美帝國主義成為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中國本來並不是「一邊倒」，斯大林原來還懷疑毛澤東是美國特務哩。門被美國人關上了，中國人祇能一邊倒。可是，我們一邊倒，并不是投靠蘇聯，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衛星國，而是獨立自主的。我們不能容忍任何人對我們的侵犯和傷害，即使是斯大林也不行。如前邊所說，毛澤東本來是不贊成在朝鮮同美國打仗的，派志願軍也并不是為了執行斯大林的旨意，而是為了保衛我國的安全，「保家衛國」的口號是真實的。

同美國打，又同美國談。板門店的談判，大事都是毛主席掌握和決定的，表現了毛澤東的藝術。日內瓦談判的決策，也是毛澤東定的。實際上是以美國為主要對象的。長期當蘇聯外交部長的莫洛托夫，顯得那麼笨拙；而毛澤東的外交部長周恩來就顯得那麼生動活潑。五

項原則的決策，萬隆會議方針的決策，也都是毛澤東定的。我們廣交了朋友，也包括實現突破同美國的僵局這一目標。

一有機會，毛澤東就要同美國拉關係。毛澤東決不是閉關鎖國的人。人家一定封鎖我們，我們也不怕。美國的那些愚蠢的政客，祇從公開文章和盜竊的內部文件上看，祇知道毛澤東罵美國，不知道背後的文章。祇知道毛澤東誇蘇聯，也不知道背後的文章。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國派了以楚圖南為團長的龐大的藝術代表團訪問南美，臨時決定我擔任副團長兼秘書長。我當時是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這個指委會是王稼祥直接對毛澤東負責的。為什麼要我去呢？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接到美國的邀請，要在訪問南美之後訪問美國。毛主席和周總理派我的任務，就是要同美國拉關係。不料在阿根廷訪問演出時發生了匈牙利事變，出現了世界規模的反蘇反共高潮。美國人取消了邀請。美國的政客們不知道把中國同蘇聯區別開來。他們又一次關上同中國交往的大門。

杜勒斯上臺後，從實行「戰爭邊緣」的熱戰時期，轉變為以「和平轉變」或「和平演變」為主的冷戰時期。軟硬兼施，赫魯曉夫主義就是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這一政策需要的產物。在一個時期內，出現美蘇既勾結又爭奪分割世界的局面。美蘇都在冷戰旗幟下，擴充軍備，用核保護傘或核訛詐，來加強對歐洲的分割和控制，同時却向全世界擴張。五十年代末，中國正式脫離了蘇聯的軍事、政治、經濟體系，而同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獨立國家

結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世界上主要是美國、蘇聯和中國「三國演義」了。法國戴高樂擺脫美國而獨立行事，毛澤東很重視，并立即把美國控制下的西歐日本這些發達國家和蘇聯統治下的東歐都看作是間接的同盟軍，可以同這些國家結成第二條統一戰線。這是很有遠見的。

毛主席說，我們主要是同美國鬥，其次是同蘇聯鬥。以我爲主，利用矛盾，依據形勢，決定主要的鬥爭對象，有鬥有拉，鬥中有拉，拉中有鬥。即使は美國，在一定時候，在一定問題上，也是可以間接爲我所用的。但不存在同美國建立戰略同盟關係的問題。我們要用心地學習蘇聯，也要用心地學習美國。怎樣對待美國，涉及毛澤東的全部國際戰略問題，今天仍然需要加以研究，以求繼承和發展。

五、對外工作，大權獨攬。

毛主席在國內工作上，是祇抓中心環節，抓大事，一個一個抓，一抓到底。其他都放手讓別人分工去做。而一個國防，一個外事，他就大權獨攬了。部隊每個師和其幹部的歷史他都了解，任何人無權不經請示調動一個營離開原來的防區，一切重大的外事工作（外交祇是一個重要部分），都是毛主席決策，決不分權給任何人。

周恩來在向陳毅交待外交部長工作時對他單獨說過，也對劉曉單獨說過，也對我單獨說過：「做外交工作，做外事工作，時刻要記住四個字，叫『授權有限』。重大問題必須主席

決策。我最清楚哪些事必須主席做決定，哪些事是我職權範圍以內的事情。不然，就會犯大錯誤。一毛澤東是偉大的掌舵人，周恩來是偉大的輔弼者。周總理絕不會同意把他自己同毛澤東并列，更不用說超越在毛主席之上了。

大權獨攬，并不是不聽取意見。毛主席經常請最高領導層，還要吸收幾個人，在他那裏議論天下大事。主席喜歡聽取不同的意見。他歡喜「和（和聲）而不同」，不歡喜「同（單調）而不和」。他不歡喜講套話的人，說這種人從來不交心。他喜歡向他交心的人，也就是善於獨立思考又敢於講真話的人。那種祇按照提綱照念的人，下次就不聽他的匯報了。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因為與本文無關，就不說了。

毛主席很重視「文革」前的釣魚臺秀才班子。他把它當做智囊團，或者叫思想庫。人不要多，不過是六、七個重要的理論家，加上幾個助手。這個班子，實際上是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的。那裏對重要的天下大事，天天都劇烈爭論，甚至吵得面紅耳赤。但是，小平同志、少奇同志、主席一拍板，這一爭論就結束了。然後開始新的問題的爭論。周總理很贊賞，說這叫「釣魚臺作風」，也利用這個思想庫為他服務。毛主席不靠那些研究室、研究所之類的大機構，這些機構祇負責向釣魚臺提供資料和參考意見。毛主席主要是靠生動活潑的釣魚臺這個思想庫。

沒有特別的需要，毛主席不親自接見外賓。除了總理和負責外事的領導同志之外，其他

領導同志都不輕易接見外賓。毛主席說，司局長甚至處長，就是重要官員了，更不用說副部長、部長、副總理一級的人了。他們代表黨和國家講話，作用是一樣的，而且可能講得更好些，回旋餘地也更大些。黨的領袖層要接見外賓，那就總是有一段話或者幾句話是很有分量的，要使全世界特別注意聽的。領導人不要被接待單位用所謂「規格」來牽着鼻子走。毛主席的信條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處理國際問題的精力主要放在思考和決策上。不是必要的應酬，絕不出場。口要緊，開口是銀，閉口是金，硬是不講，守口如瓶，才是金，更值錢。但是，必須見的人，不管什麼「規格」，一定要見。必須講的話，不管什麼「氣候」，一定要講。毛主席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現在時代不同了，國際交往比過去頻繁多了，但這個精神仍然值得繼承。

六、其他問題。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同蘇共領導的鬥爭，「九評赫魯曉夫，十下莫斯科」，都是毛主席直接領導的。現在參加全過程、一次也不缺的，祇有我一個人還活着了。這個問題帶有專題性。從越北解放到統一全越南的曲折過程，也有專題性。還有其他一些專題，這些也是反映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重要內容，如有必要，以後再寫。這裏暫且不說了。

毛澤東談整風審幹和遵義會議

——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幹問題的說明談起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二日)

王若望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二日給我寫了一封信，并寄來了《王若望自傳》中涉及我的部分的復印件。因為這些問題不僅涉及王力，也涉及抗日戰爭期間的整風審幹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這使我想起毛澤東同我談到過的延安整風和遵義會議問題，以及山東黨這一段的歷史問題。我必須就這些問題做一些說明。

王力沒有這樣說

《王若望自傳》的第二卷第五章第四節「山東王實味之由來」，這一章節裏提到王力。他對王力的態度是友好的，但是他在這一章節裏引用王力的話時，採取了大量的王力第一人稱

的打引號的引文。這樣我就不得不說明一下：這些引文差不多全部都不是我的原話。全部都是王若望自己根據他的記憶或感覺所創作出來的。但因為打了引號，說這些話是王力說的，我就不得不說明：我沒有這樣說。至少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的話我沒有這樣說。是王若望自己編的。這大段的引文雖然不是王力說的，內容還是大體符合當時情況的。但是也有一些具體事情說的不對。比如他說王力起草了關於王若望的電報，起草電報時手還發抖，這就完全是虛構的。王力沒有起草這個電報，更談不到在起草電報時手發抖。電報是有，但不是王力起草的。至於電報的內容，王若望不清楚，我也不完全清楚。王若望回憶中還有一些我認為不合乎事實的地方，我也要加以說明。

幾點事實的錯誤

首先就是王若望的自傳當中有些事實上的錯誤。有以下幾點：

一、他說舒同當時是山東分局宣傳部長。這不對。舒同那時不是宣傳部長，他比宣傳部長的職務要高，是山東分局的常委兼秘書長。當時山東分局祇有四名常委，就是羅榮桓、黎玉、蕭華、舒同。這就是當時山東的主要領導核心。這些情況王若望不太清楚。

二、舒同不是整風領導小組的組長。當時也沒有一個整風領導小組，而是和延安一樣，叫總學委。延安總學委的主任是毛澤東，副主任是康生。山東總學委的主任是羅榮桓，副主任是舒同。具體工作是舒同作的。

三、當時的山東分局宣傳部，是同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合而爲一的。是在一一五師宣傳部那裏辦公的。一一五師宣傳部原來有個部長，是賴可可，山東分局宣傳部的主要領導人是陳沂，兼大衆日報社社長。羅榮桓非常重視宣傳工作，名義上是政治部主任蕭華分工領導，實際上是羅榮桓直接抓宣傳工作。陳沂的名義是宣傳部副部長，羅榮桓很重視陳沂，依靠陳沂來辦很多事情。

四、王力當時已經不在大衆日報任職。王若望的自傳中這一點也說得不對。他不知道我早已調到山東分局宣傳部，也合并到一一五師宣傳部去了，還是在陳沂領導下工作，有很多事情是在羅榮桓直接領導下工作。我當時主要的工作是編黨刊《鬥爭生活》。在此之前，我在大衆日報當過記者、編輯、編輯主任、編委、特派員。整風當中，我擔任總學委秘書。因此我經常不在山東分局機關。我不歸舒同管。舒同要起草電報，是不會找我的。整風審幹開始以後，我是山東分局機關領導整風的支部的副書記，跟王若望是一個支部，但是我經常不在分局機關。

整風審幹的主要分歧

王若望不知道當時山東整風在領導機關、領導同志內部，主要的分歧是什麼。他一直以黎玉爲攻擊目標，其實不對。當時在整風問題上，羅榮桓同黎玉沒有根本性的分歧。主要分歧是羅榮桓不同意延安的意見和作法。舒同是中央派到山東來搞整風審幹的，他是帶着延安

經驗來的，他是奉命要推廣延安中央黨校的經驗，要在山東來搞延安的從整風審幹開始到搶救運動那一套的。而且主要是要搞搶救運動的。

羅榮桓堅決反對和抵制延安帶來的一整套的方針和作法，但開始時他不好說話，他還得看一看，因為這是從中央那裏來的。占王若望回憶中很大篇幅的民主檢查，就是所謂延安來的經驗。民主檢查這個作法，在當時敵後的前線，適用不適用呢？能不能採取呢？羅榮桓首先是看一看，觀察一下，然後就表示反對。當時民主檢查以兩個單位為重點，一個是戰工會（相當省政府），一個是大眾日報。因為我在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宣傳部工作，在陳沂領導下工作，所以就跟陳沂一起到大眾日報去了。總學委也還有事情，所以山東分局機關的運動，我沒有多少時間參加。王若望回憶的民主檢查的動員報告，大體上是合乎事實的。當時還有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有話就說，有屁就放。」

戰工會是重點，黎玉是戰工會主席（相當於省政府主席），於是就首當其衝。山東分局機關的有關戰工會的大字報，就貼到戰工會去了。這一點王若望的回憶是事實。大字報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把戰工會的火煽起來了。

按照羅榮桓的看法，民主檢查不應該完全否定。他說民主檢查有好處，放一把火，把領導同志燒一燒，有好處。但羅榮桓不贊成錯誤的審幹方針，就是：民主檢查的目的，不是批評領導、改進領導，而是暴露特務，也就是「釣魚」，看誰上鉤，暴露出誰是敵人。羅榮桓

肯定：這種作法在敵後方不適用。打仗嘛！敵人在面前嘛！民主檢查這一套辦法在延安適用不適用，羅榮桓不發表意見，但它不适合山東，不适合敵後的情況，不适合天天要跟敵人打仗的情況。

在民主檢查中，王若望是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這個作用也有好的一面，對領導同志過去認為神聖不可侵犯，老虎屁股摸不得，誰也不能提意見。而王若望敢于提意見。他是起了一個推動作用。但因為當時的民主檢查這一套辦法在敵後根本不能用，所以王若望的作用也就很有限，而且不適宜。如果把這一套搞到司令部、政治部，那就糟糕了。羅榮桓把司令部、政治部穩住，其他單位搞一搞看，後來看到不行，斷定不能這樣搞。

搶救運動不對

搶救運動對不對？把延安搶救運動的作法搬到山東，對不對？這一點羅榮桓早就明確，用不着怎麼觀察，就認為不對。所以羅榮桓反對把發揚民主、檢查領導的目的說成是爲了暴露特務、抓特務、抓敵人。這一點一開始羅榮桓就不同意，但因為這經驗是延安來的，羅榮桓不能在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之前就反對。當時中央向全國都派出負責幹部，全國都要通過民主檢查暴露特務。但羅榮桓比別人更早地就抵制了這種作法。他不能說延安不對，但首先明確說在敵後方不適合。他說我們這裏有日本人，大敵當前，還有二敵人，國民黨頑固派。部隊每天打仗，在這種形勢下，不能把領導機關搞亂。羅榮桓老早就說，敵後方同延安

不一樣，我們的幹部，敵人早就給我們審查好了。四面八方都是敵人，他要是敵人的話，他老早就跑了，用不着我們從發揚民主、檢查領導當中去暴露特務。不過民主檢查既然已經進行了，羅榮桓就提出，要明確發揚民主、檢查領導的目的，是為了改進領導，而不是暴露特務、暴露敵人。

王若望還不知道，當時所謂暴露敵人的面是相當寬的。最嚴重的不是王若望，也不祇一個人。按照延安的經驗，要抓大的特務。而且發揚民主、檢查領導、暴露敵人還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要暴露提意見的人，就是所謂放毒的人，要審查他；不僅如此，還要查那些被檢查的人、被提意見的人，看他是不是敵人。凡是坐過牢、辦過出獄手續的人，都在審查之列。下面同志提意見的時候，也要讓他們揭露領導人是不是叛徒、特務。這樣羅榮桓才發了脾氣，說這樣不行，這要把根據地搞垮了，湖西肅托的一套又來了，比肅托的規模還大，那不行。這段歷史值得回顧。經驗教訓是很大的。可是後來還在不斷重複。

羅榮桓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向毛澤東提了意見，說不能這樣搞。敵後不能這樣搞，全國這樣搞他也不贊成。正是因為羅榮桓和別的領導人提了意見，毛澤東才制定了九條方針，規定不許這樣不許那樣，在這當中羅榮桓起了重要作用。主要是根據羅榮桓的意見。這是毛澤東親自對我說的。當時說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說即便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特務，也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一般幹部就更不用說了。這一點羅榮桓的功績是很大的。

整風主要就是反對斯大林的指揮棒

整風主要解決什麼問題，王若望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弄清楚。那次整風主要解決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問題。反對教條主義的同時也要反對經驗主義。二者都是主觀主義的不同形式。書上是這麼說的，毛澤東的書上也是這麼說的。他祇能這樣說。我今天拆穿來說，就好懂了：一九四二年開始的延安整風，主要解決反對斯大林的指揮棒。反對教條主義，就是反對斯大林的指揮棒。毛澤東說，我們不提斯大林，不提蘇共，祇提反對我們自己的錯誤路綫。斯大林不對，誰叫你接受的呢？拆穿來說，反對教條主義，就是我們中國黨要獨立自主地根據中國實際，來決定中國革命的道路、方針、政策，而不是聽莫斯科的指揮棒，不是聽斯大林的指揮棒，不是聽莫斯科的那一套，不是當兒皇帝。這就叫整風。王若望至今并不懂。我們不能提斯大林不對，祇能提王明路綫不對。王明是教條主義。什麼叫教條主義？就是祇聽斯大林的。一個王明、半個博古，還有其他人隨聲附和，把中國革命幾乎搞垮了。教條主義一切聽蘇聯的，在內戰時期主要表現是極左，把整個革命根據地葬送了，祇剩下陝北一小塊，其他都喪失了。白區也幾乎百分之百喪失了。在抗日戰爭初期，教條主義者又光聽斯大林的，不聽毛澤東的，這時教條主義又表現為右傾，祇知道服從蘇聯的外交政策，對國民黨實行投降主義，不是獨立自主，而是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綫、一切服從統一戰綫，那就是一切服從蔣介石，梳妝打扮起來送到蔣介石那裏去。他們要把黨中央搬到武漢。當時他們聲

勢很大。毛澤東說：一個王明、半個博古，還拉上經驗主義者一起發表文章。整風文件上說經驗主義作了教條主義的俘虜，主要就是指這個。

毛澤東談遵義會議

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六月中旬在武漢的那次談話，一連三個下午，談了三次，都談的同一內容，主要談的是遵義會議問題。上邊說的延安整風，也是聯系到遵義會議講的。當時在座的除了我，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和姚溱。毛澤東說：「在長征路上，暴露出他們那一套不行了。這一套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每次政治局開會，我祇有一票。後來我病了，王稼祥負傷了，我們兩個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許多意見。通過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張聞天）的工作。洛甫也轉過來了。可是以後再作別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不動了。他們死抱着斯大林的聖旨。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我這一邊，我一個，稼祥一個，洛甫一個。他們那一邊，博古一個，李德（斯大林那邊來的軍事顧問）一個，××一個，×××一個。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問題。後來軍事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們不要老是開這樣的會了，不行了。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這裏邊有贊成我的意見的人，也有贊成你們意見的人，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作決定吧！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會同意。

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我們在第三國際會成爲不合法的了。還是要由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實踐證明，這樣作是對的。實際上並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這樣中國革命就開始走自己的路，不聽斯大林的那一套了。一

中國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或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是領導核心，但遵義會議沒有也不能檢討整個的政治路綫。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不去清算政治路綫，是因爲條件還不成熟，所以祇解決了軍事路綫問題。實際上軍事路綫是爲政治路綫所決定。政治路綫在領導核心中徹底弄清楚，毛澤東真正成爲名符其實的領導核心，是延安整風才解決的。延安整風才真正確立了主要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路綫的領導地位。正確路綫以毛澤東爲代表，其次是劉少奇。他是白區正確路綫的代表。白區比起蘇區是第二位的，所以劉少奇在黨內也是第二位的。有些人是在延安整風以後才真正擁護毛澤東路綫的。擁護毛澤東，後來看起來很容易，當時是不容易的。它意味着不聽斯大林的。作爲一個老黨員，作爲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不聽斯大林的，聽毛澤東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不能怪這些同志。中國有這樣的傳統。整風期間編了個《六大以來》的文件，在山東叫作《黨的路綫問題文件選編》，把六大以來以及抗戰時期有關兩條路綫的文件選出來，讓大家學習。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家不聽斯大林的，在中國不要王明來領導，中國人要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這問題中國解決得最早，解決得最好，這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進一步

說，才有了今天鄧小平實事求是地提出根據中國特點實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還是整風時期解決了的根本問題，就是不要聽蘇聯的，不要聽外國的，要根據中國的實際來決定中國走自己的路，中國的命運由中國人民來決定。這一點是毛澤東的功勞。鄧小平的思想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整風在山東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麼，整風在山東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在羅榮桓看來，在山東也應該主要解決路線問題。就是說除了學習全黨的文件以外，還要學習山東的四年工作總結、五年工作總結，還有實際上起着六年工作總結作用的羅榮桓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這也就是說，要聽毛澤東路線的話，不要聽王明路線的話。

四年工作總結是在劉少奇直接幫助下作出來的。當時山東分局的書記朱瑞，他是很有才華的一位同志，在山東作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對山東黨、山東人民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有局限性，他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是長期在蘇聯形成的，好誇誇其談，動不動就「從國際到山東」。山東究竟解決什麼問題呢？在劉少奇去山東以前，山東沒有用主要力量來解決農民減租減息、削弱封建勢力的要求，給貧下中農以實際利益。解放後（一九六一年初）劉少奇在湖南同我談過，他說山東四年工作總結主要是批評朱瑞。劉少奇當時就說過：如果再不改，要送一塊匾，上面寫上四個字：「機會主義」。他還說：「當時我問了一句，四年工作

總結，報告由誰作？我的意思很明顯，是朱瑞不要作了。我的意思是羅榮桓作。我不好明說，朱瑞如果自覺的話，應該說這個報告我不好作。可是他不自覺，他一口接過來說，「我作」。我也祇好讓他作了。一這個報告雖然是朱瑞作的，精神是劉少奇的精神。實際上是要王明路線、要毛澤東路線這個性質的問題。要放手發動群衆、減租減息、獨立自主。從朱瑞開始，都卷起褲腿、戴上草笠，到農村去了。有人說劉少奇象趕鴨子一樣，把大批幹部趕到群衆中去了，要他們接近群衆、發動群衆去了。這一來山東根據地的面貌就大變了。

黎玉不是跟王明路線走的人

黎玉不是教條主義者，不是跟王明路線走的人，也不是那麼主觀主義。他是作實際工作的。在四年工作總結以後，黎玉作了大量的工作，是擁護毛澤東路線的。他在白區工作，也是作得好的，發動了徂徠山起義，把山東零散了的黨恢復起來，發展黨員，白手起家，建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有很大貢獻。他跟羅榮桓合作得很好，作為羅榮桓的助手，他把政府的、地方黨的一套工作承擔起來。他的能力比朱瑞差，說話不吸引人，不會誇誇其談。但黎玉也是知識分子，曾經是北平法政大學的支部書記。黎玉有他的長處，有他的短處。王若望直到今天並不知道，山東整風主要解決不要王明路線、不要聽斯大林的，要聽毛澤東的；這一點上，大的方面，黎玉是好的。特別在四年工作總結以後，黎玉是好的，是站在對的方面的。這大的方面王若望沒有看到，祇看到黎玉的缺點。

這裏還有一個全局的問題。中央發覺了山東的問題，把朱瑞調走了，羅榮桓代替了朱瑞。毛澤東說，一個地區，一個獨立的戰略區，祇要換一個人就行了，把朱瑞換成羅榮桓，山東的局面就改變了，山東成為執行十大政策的模範了。這時山東分局是以羅榮桓為首，黎玉是主要的協助者。羅榮桓批評王若望，說你把矛頭針對着山東分局領導，你就攻擊了山東分局，否定了山東的全局。而這時山東的全局是欣欣向榮的，是向上的。把黎玉的缺點、毛病無限上綱，不但傷害了黎玉，而且傷害了山東黨的全局。這點上王若望跟饒漱石異曲同工。饒漱石乘羅榮桓去了東北，陳毅在前線打仗，他就來整黎玉。他跟王若望有共同之處，把山東黨說成一團漆黑，這不符合實際。

羅榮桓對王若望的看法是全面的

至於山東分局有些部長的毛病，主要是作風問題，官僚主義、不民主等等。當然這也不是小問題。戰爭時期中國黨是農民小生產者占主要成分、又被小生產者包圍的黨，有的領導人身上確有封建的、不民主的、官僚軍閥的惡習。有些高級幹部，高高在上，不民主，官腔官調，不接觸群衆，脫離群衆。現在大喝一聲：「你有病，你毛病不輕！」這有用。羅榮桓並沒有否定王若望的全部發言。

那些部長以上幹部，是不是有進一步的問題呢？有。他們也沒有解決路線問題，也沒有解決世界觀問題，他們也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帶着很多的毛病，靈魂深處也不一定都那麼幹

淨。真正解決從思想上入黨的問題，也不容易。很多人也是經過整風以後才解決了的。有的人至今沒有解決。所以對於民主檢查，羅榮桓並沒有否定一切。羅榮桓是實事求是的。王若望認為羅榮桓批評他，是為了安撫一下那些部長們，不是的。羅榮桓是要這些部長們聽取包括王若望的意見在內的正確意見。羅榮桓的思想中是充滿辯證法的。他不是那麼片面，也不是在黨內還講什麼策略。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說話簡單明了，對人對事都不要什手腕。整風、民主檢查所揭露的官僚主義、不民主、封建性、脫離群衆，這些意見他都是很重視的。發揚民主、檢查領導的目的，就是為了改進領導，解決他們工作上、思想上、作風上的問題。

另一方面，從民主檢查中確實暴露了包括王若望在內的、或者說以王若望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無政府主義。這是羅榮桓批評他、他自己也承認的。我國歷次運動都曾暴露這兩方面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還是這兩條。這實際上是個人主義的，有的是極端個人主義，唯我獨尊，別人都不行，祇有他自己一個人行，這是小生產者的意識形態的反映。專門看別人的毛病，看不出自己也有毛病。王若望自己說，他自己確實有這些毛病，說羅榮桓批評他是對的。可惜王若望沒有能够解決這些問題。

這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毛病，無政府思潮的毛病，極端民主化的毛病，也不要緊，也不是王若望專有的，也是不足為奇的。羅榮桓認為，發現了這個問題，認識了這個問題，有好

處，對黨內整風有好處，對參加整風的個人也有好處。黨從古田會議決議以來，就抓住這個問題，這次整風也抓住這個問題，每個革命者都要不斷改造自己，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有的人在革命隊伍裏時間很長了，但是就不肯觸動自己靈魂深處的這個小資產階級王國。如果你不觸動，甚至永遠不觸動，鐵板一塊，帶到棺材裏去，別人也沒有辦法，因為思想不能強制。但是這不好，自己要吃虧，甚至會害了自己，走上危險的道路。而如果改造了世界觀，并不妨礙自己看問題的敏銳性，并不妨礙自己勇於發表意見的精神，不妨礙自己堅持真理，和對錯誤的批評。相反的，這些優點還可以更好地發揮。

以王若望爲代表的這種思想，以及他在民主檢查中的表現，羅榮桓同他的談話中批評了他。一方面以同志態度批評了他，這是愛護他；另一方面，羅榮桓否定了另一極端的意見，即王若望是敵人、是王寶味、有特務嫌疑等等。在羅榮桓談話之前已經定了性，即：王若望是思想作風問題，是經過整風改造思想、提高水平的問題，而不是敵人。羅榮桓認爲當時在運動中被懷疑是敵人、是特務的人，一個也不是。這是羅榮桓的偉大之處。

「國有疑難可問誰？」

毛澤東在羅榮桓逝世的當天夜裏，作了一首詩，題目是「吊羅榮桓同志」。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是「國有疑難可問誰？」這是非常重要的。後來有人說這首詩不是毛澤東寫的，說筆迹不對。連羅榮桓夫人林月琴都被這種所謂專家的意見弄得迷惘了。她問了我，我給她去了一

封信，我斷定這首詩的筆迹確實是毛澤東寫的，而且是臨睡前已服了安眠藥以後寫的，所以手有點發抖。懷疑者提出懷疑的這句詩，恰恰是很關鍵的。羅榮桓好提不同意見，而毛澤東喜歡聽羅榮桓的不同意見。羅榮桓的不同意見常常是正確的。解放後羅榮桓因病長期不能工作，又過早去世，毛澤東有失落感。羅榮桓去世那天毛澤東的詩說「國有疑難可問誰？」就是這種失落感的表現。懷疑者又說：就沒有別人可以問了嗎？他們列舉了一串名單，特別提出：難道連周恩來也不可以問嗎？他們不知道黨的領導核心內部的情況。周恩來很偉大，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長處，是古今中外無雙的輔弼之才。在這個問題上，周總理同我推心置腹地談過心，他說：「我這個人在路綫問題上常常是遲鈍的，但是我在兩個問題上是毫不含糊的：第一是在敵我問題上，第二是在組織紀律問題上。我對待敵人從來不手軟。同樣的不管是誰違背組織紀律，我都要批評和處理。」我說：「總理也不是對路綫問題上都遲鈍，祇是歷史形成的，自己總是第二提琴手，總是尊重和配合第一提琴手。就象恩格斯常說的，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自己總是第二提琴手。總理不但對主席是這樣，就是對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也是這樣。我們黨，我們國家，必需有主席，也必需有總理。」總理很欣賞我的說法。總理同我單獨講的這些話，在範圍很大的會上，也多次講過。歷史是必需尊重的。毛澤東也絕不會認為羅榮桓的歷史地位高於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祇是其他人都沒有象羅榮桓那樣，同毛澤東從秋收起義起就共患難、同呼吸。毛澤東的詩是有針對性的，有所指的。他那時已經

認識到自己在解放後犯了不少大錯誤，特別是象「大躍進」那樣的大錯誤。可惜羅榮桓早已不能參加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了。如果還有他，就可能避免或減輕錯誤。而現在他又過早去世了，所以毛澤東才有那樣的感慨。羅榮桓過早地喪失了工作能力和過早去世，是毛澤東的不幸，也是中國人民的不幸。而那時羅榮桓主持山東工作，則是山東人民的大幸，山東幹部的大幸，也是王若望的大幸。

當羅榮桓確定王若望是朋友而不是敵人，並且要親自同他談話的時候，我很高興，的確是我告訴了王若望。我是當作好消息告訴了他，叫他放心。我也的確勸他要抱虛心態度，對自己要嚴，要採取整風檢查的態度，這樣更好一些。這時候王若望問題的性質已經定了，但我不能把一些內部情況告訴他，不能說延安來了電報，原來把他定為特務，領導人之間是怎樣討論的，這些我不能說，因為那就是違背紀律了，也沒有好處。我祇能說叫他放心。王若望說後來證明我當時的預測是正確的，其實已經不是預測，而是已定的結果。羅榮桓正式定了以後，我才告訴王若望。至於王若望後來的發展，王若望的今天，王若望的未來，因為我同王若望分開已經很長時間，他怎樣發展，我就不清楚了。

關於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王若望自傳》對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說法，我認為不對。他說：「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着重闡明的論點就是報喜不報憂，祇許說好，不可暴露革命隊伍裏的

「黑暗」，這歪曲了原意。毛澤東並不排斥對黑暗面的揭露，也並不排斥用魯迅的雜文來戰鬥。至於要分清是延安還是西安，要歌頌光明、揭露黑暗，任何時候，任何朝代，任何統治階級都是如此。更重要的，這并不是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要內容。這篇講話也決不是單純的文藝問題。全世界有頭腦的人都公認，這是一篇重要的哲學著作，是用唯物辯證法改造世界觀的銳利武器。一切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乃至一切有出息的為人民服務的人，如果不改造舊社會的習氣，高高在上、脫離群衆，甚至站在群衆頭上，就必定一事無成。在對待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問題上，我同王若望有原則分歧。我自己就極大得利益於這篇講話。我以為正是反復學習和實踐這個講話，我才真正解決了思想上入黨的問題。組織上可以開除我，思想上却永遠開除不了我。其實，王若望本人也是在這篇講話的影響下，吮吸了山東群衆的奶汁，才成為一個著名的作家的。當然這類問題，各人可以有各人自己的看法。反對馬克思主義並不犯法，事實上每日每時都有相當多的人在那裏反對和批評馬克思主義，這不可怕。真馬克思主義不怕批評，相反地祇會在批評和反批評中日益發展和壯大。王若望在這次寄自傳給我時也還在表明，他不改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但願他能真正懂得並且堅持貨真價實的馬克思主義，在偽劣商品充斥中國市場和世界市場的時候，我願意同一切宣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共勉，把識別真假放在第一位。

毛澤東對臺灣問題的看法給我的啟示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日)

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出現了改革開放的新浪潮，到處出現奮發圖強的新局面，并且得到了全世界極大的歡迎和贊揚。同時在對外戰線上也取得了豐碩果實。我為自己能僥倖活下來看到這樣喜人的形勢而感到歡欣鼓舞。我對於不斷豐富和發展着的黨的基本路線以及對內對外的政策路線都是很擁護的。我這個垂危的重病號，現在最關注的問題，就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問題。我熱望在這個問題上也能有重大突破，也能出現新局面。現在我將毛主席對我談過的關於臺灣問題的一些話給我的啓示，作為我個人的意見提供出來。

第一，要承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事實。毛主席對我說過，在大陸，我們贏了，蔣

介石輸了。但是，在過江以後，我們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就是我們沒有集中二野和三野的兵力解放臺灣。那時蔣介石立足未穩；美國也不要臺灣了，第七艦隊也撤走了。可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分兵了。二野轉戰西南了。那時我們祇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擁有重兵。其實西南是一步死棋，是下不活的。三野又要守備江南的大中城市，還要肅清散兵游勇。再加上輕敵，所以我們在金門沒有打好。這不能怪前綫的指揮員。是我們的戰略決策錯了。而蔣介石在臺灣的棋却下活了。這是我們在七大以後犯的第一個歷史性錯誤。什麼叫歷史性錯誤？就是無法更改的錯誤。

第二，毛主席說，我毛澤東同蔣介石，有兩個共同點。一個是中國要統一，一個是中國要獨立。我們從不放棄用武力統一臺灣，蔣介石也想用武力反攻大陸。我們喊「一邊倒」，誇蘇聯，可是決不聽他的指揮棒。蔣介石靠美國反共，誇美國，可是他也決不放棄獨立國的地位。從朝鮮戰爭開始，到一九五七年，美國逐步加強對臺灣和臺灣海峽、澎湖、金馬的軍事控制。一方面阻止我們用武力解放臺灣，另一方面想吃掉臺灣。美國對大陸的政策也從武裝侵略為主改變為以和平演變為主了。蘇聯的赫魯曉夫也向我們伸手了。當時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反對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的侵略。臺灣面臨的主要威脅是美國；大陸面臨的主要威脅是蘇聯。蔣介石事實上已放棄用武力反攻大陸，我們事實上也不采用武力解放臺灣。毛主席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作出了和平統一中國的戰略決策，提出了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主

張，毛主席同我談過，那時打炮也好，停止炮擊也好，主要的都是爲了支持蔣介石對抗美國的侵略和并吞。我以爲知道這個歷史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小平同志提出了以一國兩制來實現和平統一的總方針，這就發展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要落實，要變爲行動，變爲現實，也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一些因循的思想必須有大的突破。既然是兩制，就要承認兩種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我們實行四項基本原則，他們實行與四項原則不同的原則。在國內，也是實行不同制度的和平共處。

第四，我們堅持祇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承認它是在臺灣行使權力的政治實體。我以爲這並不喪失原則。

第五，我們一直堅持，絕不能宣布放棄使用武力解放臺灣。這是很對的。爲什麼呢？因爲最早提出要我們宣布放棄使用武力的不是別人，是美國的杜勒斯。所以我們絕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因爲那時提出和平統一的基礎，主要是反對美帝採取直接占領或托管形式并吞臺灣。我們不鬆口，恰恰是對蔣介石抗拒美國的一種支持。今天的形勢不同了。今天和平統一的基礎主要是共同發展經濟，建立大中華經濟統一體，而這正是美國的和其他外國的敵對勢力所最不願意看到的。而這一條比任何外交上的勝利意義都更加重大。因此，我們在事實上早已宣布採取和平統一的方針。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被迫使用武力，已經是不言而明的了。

第六，實現統一的形式應有更大的靈活性。馬克思和毛澤東，素來不重視國家的形式，

而重視其實質。君主制并不一定比共和制差。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并不都比打資本主義旗號的先進。既然是兩制，就不能強求在短期內都統一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動蕩局勢還在繼續，很多「自古以來」就如何如何的老皇歷，令人難以置信地改變了，世界地圖不斷在重新繪制。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們的思維，我們的政策，必須要有大膽的突破，才能找到為雙方都能接受的統一的形式。

第七，兩岸互有短長，統一起來，在二十一世紀必將無敵於天下。應當承認，臺灣在許多方面超過了大陸。我們經歷了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左」傾，特別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彎路，而臺灣却抓緊解決農村和教育這兩大基本問題，又抓住了發達國家實現產業轉移的機遇，它成為四小龍之首，騰飛了。我們提出了學習新加坡的口號，也可以考慮提出兩岸互相學習的口號。報刊上的習慣性的、帶着偏見的陳腐宣傳應該改變，不應以揭露黑暗面為主，而應以實事求是的宣傳、介紹經驗為主。我們氣魄要很大，才有統一的氣概和氣勢。

第八，我們如果因循固守過去的一套提法和作法，勢必推遲兩黨會談的時間，甚至會錯過當前的好好的機遇。這樣，客觀上有利于外國敵對勢力對中國統一的阻撓，有利于臺獨分子鬧獨立，不利于臺灣的主張中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人士。我認為對臺的新思路和新策略具有重大意義。

我祇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我的看法和想法祇是表達一個中國人的願望。在統一祖國

這個關係全國以至全世界大局的問題上，如果能有新突破，那麼，我這個垂危病號，就死也瞑目了。

從文革痛苦教訓中看社會主義的法的精神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九日）

宣告十年浩劫結束的那天，我已被關了九年又兩個月。不打倒江青，我必定要關一輩子，才好滅口。粉碎「四人幫」，我同黨和人民一起歡呼。三中全會的路線，我由衷地擁護。即使不從理論觀點上和痛苦的歷史中理解，單從我十多年破碎的家庭來看，三中全會以後，每一個家屬都解放了，都得到了政治的和物質的利益。

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同一切事物的界限是可以變動的一樣，罪與非罪的界限，特別是反革命與革命的界限，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變動的。在執行中更有一很大的

彈性」，是以對統治階級的利益爲轉移，而「不拘泥於法律條文」（引號中是恩格斯語）在政治形勢發生根本變化，代表領導階級的執政黨的政策發生根本變化時，尤其是如此。

我國的《刑法》，可以幾十年成百年不修改。但每個歷史時期，要由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令條例來調節。現在還在處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及有牽連者的問題。已經公布，它們是兩個集團，不是一個集團。這是一個明確的規定。我建議黨中央還要做一些進一步的規定。首先，要有一個時間界限。一九七零年廬山事件後，林彪反革命集團才形成。林彪覆滅後，才逐步形成江青反革命集團，一九七四年在政治局內部形成「四人幫」。要把在毛主席領導下犯錯誤的人同參與反革命集團的人區別開來。在參與反革命集團的人當中，還要把沒有參與林彪的武裝政變和叛逃，或者將有沒有參與毛主席去世前後的顛覆活動和武裝暴動區別開來。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要從寬。因爲相對地說，林彪反革命集團已成爲歷史，現在的危害性較輕，其中不少人爲黨出生入死過。我以爲多開脫一些人，不拒絕任何一個願意而且可以爲黨和國家效力的人，對黨對人民有利。

反右派擴大化是錯了，但是有一條就是「一個不抓」，給以工作或勞動的機會，還可以摘帽子，這不失爲無產階級專政中可以汲取的經驗。這樣，如馮雪峰同志就可以爲黨爲人民注釋了魯迅全集。當然，我並不主張今天照搬，但可借鑒。一切可以不關的以不關爲有利，先要關後來可以不關的以放爲有利。黨和人民從釋放戰犯中得到了顯著的利益。我以爲即使

對已經判刑的十名主犯，除「四人幫」四人外，對其餘六人，在其有悔改表現並願在新路线下為黨為人民效力的條件下，也還可以利用。如陳伯達，可以讓他研究古代哲學史（雖然他過去有些論點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欣賞關鋒的論點）；黃永勝參加過秋收起義和許多重要戰役，可以讓他寫回憶錄（對納粹的一些戰犯，也還讓他們寫回憶錄）；其他等等。按照我國《刑法》，判處有期徒刑的，執行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如果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就可以假釋了。這六人按服刑期都够了，祇是看其是否符合上述條件。顯然，對這些人要假釋，祇有黨中央才能決定。

按恩格斯晚年對原始社會和國家起源的深刻研究，法律和法官，在原始社會就有了，不是隨階級社會和國家權力而產生的。伴隨社會劃分為階級，構成國家權力的，有監獄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因此，祇能說有文字的法律是階級社會才有的。而階級消滅之後，法律還要有。我以為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國家權力消亡了，法律和法官，也並不隨之消亡。隨之消亡的祇是特殊的武裝隊伍，也不是人民自動的武裝。至少在初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則必須有健全的法律。法律與道德規範相互滲透，相輔相成。法的精神應逐步深入到人民的意識中而成爲習慣。列寧在設想（僅是設想）人們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裏將自覺遵守道德規範時，還是說我們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絲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搗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搗亂的必要性。法的精神將隨着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而發

展變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兩次肯定蘭蓋說的「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權」，並說僅就這一點就推翻了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好得很。這是我國實行偉大變革健康發展并通向光明未來的可靠保證。我覺得有一點似應做些解釋：前三項是政治性質的，除疏導外，要受法律的強制。第四項（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除政治性質外，還有世界觀問題，不能受法律的強制。唯心主義世界觀，是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但唯心主義者，例如宗教徒，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唯心主義同唯物主義的鬥爭到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結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允許批評，也不怕批評。這正需要我們加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責任和藝術。當然要承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我國的指導思想，這寫入了憲法，是屬於政治性質的問題。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沒有把馬列主義列入，正是基於上述的考慮。現在情況不同，有一股全盤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歪風，所以必須提。但這一項的要求，對黨員特別是對各級領導同一般群衆應有所不同。

如果給我為黨效勞的機會，我請求在政法戰線上作一名新兵。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江青和康生抓到我頭上以後，我才痛感法治的重要，當夜就立下這個志願。一九七三年元旦（我已被非法囚禁五年多）第一次同我談話，宣布毛主席關於「秦城監獄用的是法西斯方法」的批示時，我就向當時的黨中央表達過這個願望。當然，那次不是審查我本人的問題，因為毛

主席下命令給專案組，不許他們提審王力。一直不告知王力本人，為什麼把王力關進監獄？一直不知家屬，王力其人是死是活，現在何方？王力也不知家屬死活或如何離散？我當時還請轉報毛主席和黨中央：不僅是秦城對王力五年不放風，五年不給書報看，五年不給看病却強迫吃一種破壞神經系統的藥，五年不給吃飽飯、喝足水等等做法是法西斯，而且更重要的是整個專案組的作法，是踐踏了一切人間法律，毛主席也應該過問一下：「這種作法，又是從哪裏學來的？」我不相信我的話能報告到毛主席那裏，祇知道除放風、給書報看、吃飽飯和喝足水之外，對王力的摧殘加劇了。直到三中全會以後才允許家屬探視。因為我深受無法無天之害，能活下來祇是揀了一條命，所以我希望以餘生從事政法工作。但不是要求分配做立法和執法工作，而祇是研究法學史、比較法學和法哲學，并把重點放在研究社會主義的法的精神上。

我這個人也屬於小平同志曾對我講某某同志時所說的「不可重用」的一類，言過其實，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關了十四年，通讀了馬恩列斯全集，但沒有應用，積習恐怕還是難改。毛主席說我「沒有當過家，不知柴米貴」。我祇能在正確路线下做一點文字技術工作，不能做負責工作。個人摔跤子事小，禍國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見，但對我的話切不可全聽。毛主席信用我時說是「頂多聽三分」。超過三分，我就會連累他也犯錯誤了。我深知黨不要我，照樣鵬程萬里；我離開黨，寸步難行。在新時期，別人從零開始，

我是從負開始。時刻準備着，在任何一個爲人民服務的崗位上，結束自己的生命。

對外路線也要清除極左影響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三十二年來，我黨的對外路線是正確的，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也不能說沒有受「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我直接接觸到的有以下一些問題：

(一) 對蘇修的批判和鬥爭，是必要的，有正確的一面。批判中的問題是，沒有對蘇聯的經濟基礎作過研究，就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不加分析地對着幹。這樣，也助長了我國的「左」傾錯誤。

(二) 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對南斯拉夫的批判，是錯了。

(三) 一九六二年，在點名批判赫魯曉夫以前，先點名批判多列士和陶里亞蒂，是不對

的，當然，這與他們首先指名反華有關。可是，我們這樣做，一來是涉及別黨的內部事務，二來正合蘇共領導的下懷。

(四) 以格瓦拉爲首的古巴黨代表團訪華，調解中蘇爭端。常委和書記處在會談中的態度是比較適當的。最後，毛主席接見時，對着古巴的幾乎是全體政治局委員的面，指名罵卡斯特羅，顯然是不對的。而且罵得不占理。因爲單憑卡斯特羅和赫魯曉夫聯合公報上有「雙方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這種外交辭令，是不能作爲批判的根據的。我們是欠了這一筆帳。

(五)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宮本訪華，在準備發表的中日兩黨聯合公報中，日共有困難，祇願籠統提反修，不願指名蘇共，常委和書記處都同意了。這本來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毛主席一貫態度。不料，最後毛主席却表示，「他們都同意，我不同意」，從而斷然取消了。當然不能說日共變化就是因爲這個。但是，我們也是欠了一筆帳。令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次盛怒下發動的。

(六) 在「文革」初期，祇捧一個阿爾巴尼亞，連朝鮮都得罪了。被承認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沒有了。

(七)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同意提「打倒奈溫」的口號。我國對東南亞各國的關係都搞得很緊張。祇有一個柬埔寨還對我良好。「文革」狂潮連鎖反應到香港，又鼓吹什麼紅燈照，從反帝倒退到排洋，釀成火燒英代辦處。四面出擊，孤立了自己。

(八) 隨着批判蘇共，同各國共產黨差不多都斷絕了關係，在不少國家祇同若幹小宗派組織建立黨的關係。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特別是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都反對這種對待工人黨或工人組織的態度。第三國際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建立，後來又有宗派主義，圈子小。我們在一「文革」前和初期，圈子更小了。我們又長期不同民族獨立國家的執政黨發生黨的關係。三中全會以後，在這方面有了重大轉變，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針政策。

(九) 在「文革」前特別是初期，斷絕了同一切國際群衆組織的關係，不參加任何群衆國際活動，甚至不參加任何國際體育比賽。直到一九七一年，我黨我國的對外關係，才逐步恢復，并有所發展。打倒了「四人幫」，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我黨我國的國際戰略，以及正確的對外路線政策，才回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并有重要的新突破。

一切現代國家，大都是由政黨（或集團）領導的。執政的或在野的工人黨已遍布全球。各國又都有各種有群衆和有影響的團體。在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時，除了國家關係和經濟文化關係以外，有目的有步驟地同各種不同性質的政黨，建立和发展多層次（即：有的完全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有的部分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有的在反帝、反殖或反霸的基礎上，有的甚至僅僅是爲了它還有群衆）的普遍的關係。敵友我都可以建立黨與黨之間的關係。同時，既廣泛而又有重點地參加各種國際群衆活動，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在繼續前進時，回顧一些過去的歷史教訓，也許是有益的。

關於陳伯達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歷史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是科學態度，是英明的。

陳伯達長期有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左傾錯誤思想起助長作用。「文革」頭一年，我和他朝夕相處，才知道他品質不好，極端個人主義，看風使舵，左右逢源，投機取巧。我當面和在會上都這樣批評過他。「文革」頭一年陳伯達幹的壞事，我早已向黨中央作了揭露。對陳伯達判刑問題，我沒有發言權，因為（審判前後）那四個月不給我報紙看，至今不知道怎麼判的，而且把我關起來以後，他又幹了三年的「文革」，壞事不會少。這方面我就不說了，祇提供他有關「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況，供中央參考：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曉前，陳伯達找我，說毛主席剛才口授要起草一個文件

(即後來的二十三條)；還說：「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純的馬列主義者呀！」他同我商量怎麼辦？商定由他約請彭真、陶鑄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勸少奇同志趕快向毛主席當面檢討。這樣，我國人民的這場大災難推遲了。

二、《歷史決議》中列舉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極端的錯誤觀點，在陳伯達負責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沒有。而且，說《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也是後來康生要加上的，那時彭真同志正在釣魚臺八樓。

三、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林彪講話後，毛主席要陳伯達講話。那次講話，陳伯達就說他不過是劉盆子（注：是前漢亡後，一個放羊的，因為是宗室，被抬出來當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說他不過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組是江青當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講話，突然打倒了陶鑄同志，應負有嚴重罪責。但是，那次會議確實是江青組織的，即開會前陳還不知道。毛主席批評他以後，他先後同關鋒、康生、總理談話，講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殺。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殺，并已查過列寧的文章，以拉法格為例，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張春橋在上海提出的奪權口號傳到北京，陳伯達在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講話，提出上海的奪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自下而上，祇應監督，不應奪權。（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陳伯達就提出奪權，那還是根據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

清中自上而下的奪權鬥爭的指示，實際上祇是改組。」當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奪權的口號和做法，陳伯達才改變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間，毛主席召集政治局會議。散會時，要所有到會的人都立即去出席軍委擴大會議，並且人人要講話。陳伯達說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對着陳伯達和大家說：「不願意幹的人，給我統統滾！」這是我所經歷的毛主席說的一句最無原則性的話，令人痛心。這次會議，現在黨的領導人劍英、先念同志在場。

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衛」，是針對陳伯達的。因為陳伯達前一天提出，要收繳各個群衆組織的武器。

八、十大政治報告提到：陳伯達原來起草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主張今後以生產為中心。（林彪不會參加起草的具體工作。）毛主席反對以後，才重新起草了後來的政治報告。盡管陳伯達絕不會像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鮮明，但是，如果經過查對確實是那樣的話，那麼，在這個問題上，陳伯達還有可取之處。

以上這些，我過去雖陸續向領導反映過幾點，但未系統講，更沒有寫過。如調查證實，我建議黨中央考慮這些因素。陳伯達的壽命不會太長了。如他不堅持錯誤，還是以給他贖罪的機會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麼刑？祇知他沒有被判處死刑，又已經關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釋的條件了。一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

濫刑。一、這個千古名言，不幸，毛澤東同志的晚年沒有做到。今後，仍然值得警戒。

不可沿用文革的辦法處理

文革中犯錯誤的人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一、感謝黨中央的關懷。

二、問候我熟悉的領導、同志和朋友。

三、七月十五日開始，結束了十三年半單獨監禁，編成五人集體小組。我對馬克思爲什麼那麼強烈地反對單獨監禁，有深切的體會。

四、經過兩天的集體生活，就可以判斷：

(一)、五個人都是從十四、五、六歲參加革命的，有的身經大小戰爭和戰鬥八百次，

有的經歷有名的大小戰爭和戰鬥八十七次。

(二)、都熱愛黨，都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

(三)、除了我這個無用的人之外，都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

(四)、犯錯誤的動機，都是自以爲擁護黨中央、擁護毛主席而顛倒了敵我的。

五、反派性，爲什麼反了十四年還反不掉呢？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就要我在報刊上提出了。過去反不掉是因爲（一）路線不對，（二）黨內就分派。現在路線對了，還要在黨內反對宗派主義。應象愛國不分先後一樣，路線覺悟也不分先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不排除任何一個願意爲新路線服務的人。對犯錯誤的人，應采用整風的方針，團結的方針。對反革命集團切不可擴大化。專案組的辦法要真的永遠廢除。

六、祇要不是證據確鑿敵人派遣的特務，就要用整風的方法來處理，在正確路線下，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以自我批評爲主來檢查錯誤。要不要紀律處分？也應在相互批評中，由包括犯錯誤的人在內的組織中集體討論，按黨章程序決定和處理。切不可沿用文革的錯誤辦法來處理在文革中犯錯誤的黨員、幹部和群衆。查檔案的辦法并不可靠，外調的辦法更不可靠。紀委的權威要提高，但機構不宜大。

七、專業機關要與群衆相結合。政法部門的獨立性是歷史的和相對的，特別是公安部門，應象解放軍一樣，保證黨的絕對領導。

八、在林、江、康專案組時期，不但有摧殘人肉體的辦法，而且有摧殘人的大腦的辦法。這是已經過去了的事，不用提了。所有那些對我執行這一套的人，根據我的判斷，沒有一個是壞人，他們都是作爲黨的路線、政策、方法來執行的，因此不應當追究他們的個人責任。

九、五·一六問題。我是作爲五·一六頭子被打倒的。但是，第一我基本上不知道有五·一六；第二專案組審查了十二年多，沒有查出我同五·一六有任何關係；第三，中紀委告訴我全國整了一千萬五·一六分子。這是個大問題，不在全國宣布平反，就不能消除派性，團結全體人民。

十、關到秦城，一直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叫王、關、戚的詞。王力祇知王力一個人，關、戚是怎麼一回事，根本不知道。現在社會上很流行，請中央正式廢除這個不科學的說法。

注：這是我在秦城從單獨監禁改爲五人集體生活後給黨中央寄的一封信。原稿是用鉛筆寫在一張人民日報的邊上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來之不易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上午，讀了三遍《鄧小平同志談毛澤東思想》，並集體討論，對自己教育很大，知道了《歷史決議》確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準確完整地闡明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是來之不易的，是經歷了小平同志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向兩種錯誤傾向，進行了長期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才取得的。這個鬥爭，可以說，從粉碎「四人幫」不久就開始的。

一、華國鋒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就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同年二月七日在兩報一刊的社論中正式發表了這個觀點。同時他還堅持繼續「批鄧」的錯誤運動。小平同志在沒有恢復工作的情況下，四月給中央的信中就從原則上提出反對的意見了。五月的談話

中，就針鋒相對地批評兩個「凡是」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二、我一直擁護三中全會的路綫。但是過去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黨內鬥爭的產物。現在知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小平同志等就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鬥爭。十一大閉幕詞雖短，但已提出了正確的思想路綫。六月二日，部隊政治工作會議，小平同志的講話，抓住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同時明確提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問題。實際上是破除假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他尖銳地提出：那會把我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很明顯，那祇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祇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講得多麼好啊！七月、八月，在沈陽、長春的講話，更鮮明地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看來，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已經宣布兩個「凡是」的破產。三中全會正是正確路綫克服錯誤路綫的結果。

三、看來，小平同志在三中全會以前，主要是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區別真假毛澤東思想。從三中全會開始，就及時地防止產生另一方面的傾向。現在知道，三中全會公報中關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差不多是小平同志的原話。這對於學習三中全會路綫很有幫助。

四、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一九七九年三月，小平同志就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同時，就開始連續地向起草《歷史決議》的同志講了十多次話，核心是確定毛主席的歷史地位。

和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問題。看來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他講話的重點又針對這一方面，而以一九八零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提得最尖銳。當然他始終是批評兩種錯誤傾向。

五、耀邦同志說，黨的領導核心的集體中，老同志起主要作用。很明顯，小平同志對《歷史決議》的起草，就是起到這種主導作用。《歷史決議》中從頭到尾都貫串着對毛主席的歷史地位的評價，和準確、完整地闡明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小平同志作了重要的貢獻。《決議》是統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思想的指南。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過去、現在、將來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把毛主席神化不對，會禍國殃民；把毛主席醜化更不對，同樣會禍國殃民。是一切正直的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思想和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對毛澤東思想持教條主義態度不對，這是黨和人民的一大敵，是必須反對的；丟掉毛澤東思想旗幟尤其不對，也是黨和人民的「大敵」，也必須反對。公布小平同志的講話，將有利於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于《決議》。有了好《決議》，在貫徹執行中，還要繼續進行這兩條戰線的鬥爭。我們將無往而不勝。

六、我向黨的領導建議，祇要不是搞個人崇拜，不是唯心史觀，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地、適當地宣傳幾位黨的領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有利的，是必要的。

注：這是王力在秦城監獄開始過集體囚禁生活時寫的一篇短文。那時還沒有發給紙筆，原稿是用鉛筆寫在一張《人民日報》的邊上的。這張報紙現在才找到。當時我要求公安部長趙蒼壁讓我謄清後轉呈黨中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向我傳達鄧小平稱贊王力作品的評語時說，小平同志特別提到這一篇文章「寫得很好」。

出獄前的兩封信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

王力按：這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我還在秦城時致鄧小平同志個人的兩封信。小平同志批示「耀邦同志望望」，并要鄧力群同志同我談一次話。告我「什麼話都可以講」。這個批示的復印件給我看了。十二月二十六日，鄧力群受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委托，同我談話歷七

個半小時，在這次談話中，他傳達并要我記下鄧小平以下的原話：「王力在三中全會以後寫的東西（注：十多件）我全都看了。我認為：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這段話，我曾幾次在致鄧小平和鄧力群的信中引用過，他們都沒有提出過我的紀錄在文字上有不準確之處。這次談話結束時，王光美來造訪鄧力群，她同王力熱烈握手並說：「你是替罪羊，也是受害者。」

第一封

小平同志：

祇有在難以置信的歷史情況下才能發生以下的真事，這對於你可能還是新聞：

一、在打倒彭、羅、陸、楊後，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毛主席說：「王力是彭真的
人。」

二、在打倒劉、鄧、陶以後：

(一)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在關押王力、關鋒時，江青和康生宣布：王力是鄧小
平、彭真的人，關鋒是鄧力群的人，都是黑線上的。

(二) 我的愛人被關在中聯部，人們對她說，王力是劉、鄧安在中央文革的釘子。全國

的大字報都這樣說。

(三)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打倒陶鑄。一月八日，毛主席把中央宣傳部改為中央宣傳組，要我當組長。所以，打倒王力時，王力被稱為「陶二世」。

三、(我已被關了十年)在一九七七年的揭、批、查運動中，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做「王、關、戚」的名詞。

(一)在打倒王力、關鋒時，戚本禹還是受到江青誇獎的「正確路線的代表」。直到五個月後，把我送進監獄禁止看一切書報的前夕，戚本禹的名字不但見報，而且突然排在政治局委員的前面。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有個「王、關、戚」。

(二)林彪、江青等在所謂「王、關、戚」組織領導的「五·一六」的冤案中，在全國整了三百萬人。(注：後來中紀委有的同志說，整了一千萬人。)而我這個罪魁禍首，根本不知道這個「五·一六」是什麼。

四、一九六八年二三月，打倒什麼楊、余、傅，又說王力的後臺是楊、余、傅，要我愛人交待。

五、一九七零年打倒陳伯達，我估計王力一定成了陳伯達的人。後來報上證實了。這時又要我愛人交待。因為她不知道陳已打倒，還按過去交待的王力如何反陳伯達去講。祇好告訴她，這次是要講王力如何勾結陳伯達。

六、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我到一九七三年才知道。我估計王力一定又成了林彪的人。果然，江青直到垮臺前夕，還是把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列入一伙。當時，又要我愛人交待，她又交待錯了，列舉王力從一九六一年起就反對「林副統帥」的立竿見影的提法等等。還要她交待王力如何「裏通外國」。她不知道是要她供出王力裏通蘇聯的安德羅波夫，給林彪牽線。她百思不得要領，說王力當過胡志明的顧問，是不是王力裏通了越南？專案人員祇好明告她，林彪已叛逃，要你交待的是王力裏通蘇聯。

七、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我同黨和人民一起歡呼，盡管毛主席提「四人幫」這個概念時，我早已被關了八年，粹碎「四人幫」時我已被關了九年多了，我仍然斷定，王力一定又成了「四人幫」的人了。果然如此。

這樣，我就成了五朝（不算楊、余、傅和陳伯達）元老。我熟知「文革」中「專案組」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忠誠的，祇是因為世界上的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而我從一九六零年起就為中央的核心領導服務，先從一個概念出發，總可以在「調查研究」的名義下找到「證據」的。所以，都可以被認為是合理的。

以上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說過。我以為辦事機關會把這些最基本的事實報告中央的。現在才得知，你和有的中央同志還不知道王力被關進監獄。其實我早已打破了關饒漱石和潘漢年的紀錄，開始過第十五個年頭的囚禁生活了。我祇好向你單獨寫信，請求你直接過問一

下，給予我繼續為黨為人民獻身的機會。

敬禮！

此致

王力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封

小平同志：

看到閱兵的電視，你很健康，這對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的事業很重要。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武漢一次會後，我單獨同主席提出對打倒劉、鄧並列的疑問，他對你作了極高的評價，在這裏不說了（二）。我祇把他對你的弱點的說法告訴你：「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我至今還相信這個說法，以為是中肯的。後來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主席說的那些氣話，我一直不相信那是認真的。我

堅決擁護三中全會路線，堅決擁護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我對黨中央有的問題的提法還有些疑問，我想有機會單獨向你提出。我對你和現在中央的領導核心很信賴，祇是有一個也許是多餘的耽心，就是怕你耳邊聽不到不同的意見。當然，我現在成了桃花源中人了。出獄後首要的是學習中央政策文件和對農村工廠作調查研究。我最近才聽說你的家庭成員在一「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心裏很難過。向卓琳同志和你們全家問好。我最熟悉的是鄧林。

此致

敬禮

王力

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

注：（二）毛澤東講的話，詳見本書《我對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看法和建議》。

『二和一少』、『三降一滅』的由來

(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文摘報》第三版刊載了一條《所謂『三降一滅』的由來》。因某些事實中央領導同志可能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所以我這個當事人有責任報告一下：

一、一九六一年春，我參加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的工作，稼祥同志正在廣州養病，多次找我向他講當時農村的實地情況。他的心情很沉痛，就提出要集中克服國內困難，國際鬥爭不要綑得太緊的主張。

二、一九六一年底，我國代表團參加斯德哥爾摩會議，稼祥同志認為，鬥得過火了，有些話說得不恰當。他就找我，由他口授，由我整理，起草一個統一對外宣傳口徑文件的草

稿

三、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裏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他系統地提出了對國內國際問題的主張。

四、我建議稼祥同志先向少奇同志深談一次，然後再作道理。稼祥同志同少奇同志長談後，才找我和李啓新同志起草一封給總理、小平同志和陳毅同志的信。稼祥同志定稿後，經過中聯部部務會議（不是黨委會議）討論後發出。這個背景，我始終沒有向任何人或專案組「揭露」過。

五、一九六二年三——六月，稼祥同志主持起草了一系列文件，都經過書記處討論通過後發出。那次書記處會議，我記得除彭真、喬木同志未出席外，其他同志都參加的。康生不是書記處成員，那次會議他也參加了，雖然他事後諸葛亮，說一看那些文件就大吃一驚，好象是出了大事件，可是他當時並未提過一句不同意見。

六、一九六二年七月莫斯科裁軍會議的方針和文件，都是書記處決定和通過的。我去參加，也是書記處臨時決定的。因為一九六零年少奇同志曾同赫魯曉夫達成一個協議，國際群衆組織會議，先由中蘇兩黨協商一致，再由兄弟黨協商一致，然後才正式開會。這次是第一次實行。我回國後一下飛機，小平、彭真、稼祥三同志立即叫我和閻明復同志去懷仁堂匯報，給予充分肯定。這些情況，我在「文革」中也從來沒有「揭露」過。

七、裁軍會議後，有的同志向毛主席告了稼祥同志。主席在游泳池見了這位同志。這位同志向主席匯報了他們對稼祥同志的意見，并說有些文件上他們簽的字是強迫簽字。當時毛主席掰着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這樣，在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在批評陳雲同志和田家英同志的「三自一包」的同時，批評了王稼祥同志和王力的「三和一少」。

八、本來主席已經了結此事。後來有人又用外事小組的名義，在外辦連開幾天背靠背的批評稼祥同志的會。（會議簡報祇印發七份）之後，稼祥同志不能工作了。中央決定康生參加書記處，主管中聯部工作。王力因為主要工作不在中聯部，而在釣魚臺寫作班子，為常委和書記處服務，所以未被撤消職務。

以上是「三和一少」的由來。

「文革」一開始，我寫了一張反對稼祥同志「三和一少」的大字報。我已多次作了沉痛的檢討，並將終生檢討，到處檢討。詳細經過和動機，這裏不必談了。

九、「文革」初期，主席突然決定，要所有在華的兄弟黨和外國人都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不用說，這個決定是很錯誤的，是違背兄弟黨關係的起碼準則的。我長期都順着主席的話去講，已經成爲一種習慣，唯獨這一次公開唱了反調，我講要內外有別。

十、康生發展了毛主席的錯誤，把某些外國同志的偏激意見概括爲「三降一滅」，這個口號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得到主席和常委擴大會議的批准。同時，還決定把中聯部外交部的有關文件，凡是牽涉到劉、鄧、王（稼祥）的，都要編成灰皮書，發到全黨，作爲大批判的材料。當時，決定要我主辦。同時還組織寫了一篇批判劉、鄧、王「三降一滅」的文章。當時我是順着講了，執行了。這方面過去我都祇是寫材料責備自己，現在我還應受到責備。但是：第一，灰皮書是我壓住了，沒有象國內部分那樣印發全黨。第二，批判文章是我壓住了，沒有發。第三，在我主管宣傳工作期間，「三降一滅」的口號，沒有見過報。而這個錯誤口號，竟然被寫進九大的政治報告，那時我已被關起來兩年了。

十一、我認爲，一九六二年少奇、小平、稼祥等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那時候一系列國際問題的文件是對的。我黨中央關於出席裁軍會議的方針和作法也是對的。當時我黨我國的利益，是集中克服三年困難，對當時的美國要採取革命的兩手政策，要緩和，沒有錯。對當時的蘇聯，要鬥得有利有節，要緩和，也沒有錯。對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也要緩和，不要那麼緊，更沒有錯。對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獨立國家發展經濟，我們要履行國際義務去援助他們。但是還是實行平等互利的原則，不能包辦，要量力而行，這也是對的。如果這叫做「三和一少」的話，那麼，今天在我國仍然要採取類似的方針。

整黨應接受文革教訓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七日)

我擁護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和《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它是我黨歷史上歷次整風和整黨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的高度概括，從而做出了一系列正確的規定。

我希望這次整黨能够是延安整風開創的中國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整頓黨的組織的傳統的恢復、繼續和發展。這首先是一次新的偉大的啓蒙運動，使全黨從或「左」或右的蒙昧主義中覺醒，統一於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發展着的毛澤東思想，統一於黨中央堅持開創着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統一於黨中央結合中國實踐發展着的四項基本原則。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基礎上解決其他問題，并把這個精神貫穿在整黨的全過程之中。我黨執政後的歷次整風和整黨，都沒有解決把實事求是這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應用到掌握中

國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性的問題上，而「文化大革命」更是同我黨整風整黨的精神背道而馳。我自己就在這個問題上犯過嚴重的錯誤。我認為整黨應接受文革的教訓。

毛澤東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也是很想把我們黨整好的。他之所以陷入迷誤，一個重要原因，是把國內黨內的政治形勢估計錯了。對敵情的估計逐步升級。直到把我關起來兩個月前，他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對我還祇是講，修正主義復辟在我國祇是部分的暫時的可能出現或者已經出現，因此，「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錯誤的、反動的，祇能「部分改善」。并叫我寫了文章。但是，毛主席那個要「演習」一次，要讓所有的人都「表演」一下，也就是說，對所有的人都不放心，再加上「剝錫」政策，勢必把黨的領導骨幹幾乎「剝」光了。這是一個慘痛教訓。這次《決定》對黨的主流的估計以及肯定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成就，對思想不純組織不純問題，既充分估計其嚴重性，又估計其不占主導地位和可以克服。

毛主席從錯誤的階級估量出發，就采用所謂自下而上地直接依靠革命群衆來揭露黨的陰暗面的做法。造成「文化大革命」搞到哪裏，哪裏的黨組織就不要了。先是學校不要黨組織。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有人提議恢復，毛主席還是說不要忙。又說，不要省委不要緊，還有地委以下的。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又自己違背十六條，要搞到工礦企業和農村基層，還說基層「文化大革命」要黨組織領導的觀點是錯誤的，并且根據這個思想，黨中

央在十二月份分別發出了兩個指示。這樣，就全部不要黨組織的領導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主席看到了這樣不行，說總還是要一個黨呀。事情已經搞到那一步，祇好另搞一套，先在省革委會中建立黨的核心小組，還要求黨員個人發揮作用。祇有我們這樣偉大的黨，才經得起這樣折騰，但是，這對於黨組織的損害太大了，至今後遺症還很嚴重。這次《決定》堅持自上而下，堅持通過各級黨委，必要時由上級黨委改組下級黨委，仍由下級黨委領導。（抗日戰爭時期的整風，有的祇調換一位主要負責人，如山東，改由羅榮桓任分局書記，局面就改觀了。）同時《決定》也接受了派工作組的反面經驗，作出了一般不派祇在必須時派而又不包辦代替的規定。

整風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延安時期上升為理論的。在整風中開展自我批評和批評，解決黨內矛盾，對於每個黨員來說，是無例外的。王明誣蔑延安強迫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檢討，主席說不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進行自我批評和批評。這個公式，在社會主義時期發展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方法。「文化大革命」拋棄了這個公式。在黨內采用並發展了四種極其錯誤的做法：一是湖南農民運動中對待土豪劣紳的「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祇腳」的那套，（其實當時就不合適，後來我黨領導的自覺的農民運動，即使對待土豪劣紳也不採取那種做法了）；二是王明路線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那一套；三是延安的那個所謂「搶救運動」前期的那套，（在山東、延安的辦法當時就被羅榮

桓反對掉了（並給毛主席發了電報，得到了批准）；四是比聯共的契卡更壞的「專案組」，超越於黨章和憲法之上，超越於黨組織和政法機關之上，冤獄遍於天下。本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對確有證據的特務（後來證明絕大多數都並不確）來說的，把這個原則應用於「犯錯誤」的幹部和黨員本來就不對，何況又是僅執行一半，祇堅持一個不殺，不是大部分不抓，而是大抓特抓。這更是極其錯誤的。我們歷史上既有堅持正面經驗的大甜頭，又吃過反面經驗的大苦頭。這次整黨我們需要堅持真理，糾正錯誤，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問題。當然，我們還要經過整黨實踐的檢驗來補充和完善。同時，還要充分估計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的歷史條件和十年內亂的沉疴，在相當一部分幹部中存在習慣性的「左」右搖擺，好走極端，以及迎合性和盲目性，特別在對待幹部問題上，我黨一貫是極左。因而要使這次《決定》中一系列正確原則為全黨所掌握，不能不做艱苦細致的工作。

清黨或重新登記黨員，我黨歷史上基本上沒有做過。「文革」中來了個「整黨建黨」「吐故納新」，我早已被關，不知道，祇看到效果很壞。我黨掌握政權後，從未進行過黨員重新登記，黨組織過度龐大並且不純，加上十年動亂的特殊歷史條件，多次突擊發展黨員，雖然在三中全會以後，實際上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造黨組織成份的有效措施，但是，在整風基礎上純潔黨的組織，當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十分謹慎從事。

黨員登記應是整風和整黨後期的順理成章的結果。即：一、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全黨

所掌握，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都不合法了。二、以四項基本原則和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各種來源的或「左」或右的言行都不合法了。三、加強了黨性和組織紀律性，各種表現形式的派性和自由主義都不合法了。四、這樣，錯誤言行和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界限就分清楚了，黨內犯錯誤者同敵對分子兩面派的界限也比較分清楚了。五、對每一個被處分或清除的對象，都按照黨章規定的原則和程序辦事，允許本人申辯和向上級直至中央申訴。在這點上，這次《決定》的精神是反對歷次政治運動都搞的而在文革中盛行的「專案組」及其遺風的，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六、不株連。七、給出路。八、嚴懲挾嫌報復行爲。九、不分配指標，不確定比例。十、《決定》對重點的確定，區別的界限，當然還有待於進一步具體化。應指出，不允許任何地方或部門有「土政策」，必須權宜制定的也要經過中央批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認真總結「文革」的教訓，自覺清除人們身上的殘存的「文革」遺風。

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的設置和確定的原則，顯然是接受那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教訓。本來，「中央文革」也并不是後來那樣的。不知道別人，祇知道我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都是說文革小組是中央常委的秘書和參謀機構，祇能反映情況，自己不能作任何決定，不能發任何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上海「造反團體」一發的賀電，政治局會議通過後，毛主席來到會場，要加上一個中央文革。我心裏不以為

然，但未提反對意見，後患無窮，至今感到內疚。二月初，毛主席就提出「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後來實際上超越於政治局，這個教訓很慘痛。有鑑於此，可否確定：第一，整黨工作委員會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委領導之下，日常工作是在書記處領導之下的參謀機構。第二，整指委不代替中央有關職能部門（主要是中紀委、中組部、中宣部、政法委等）的工作，充分發揮這些部門在整黨中各自應起的作用，并從而得到加強和改善。第三，政策性及其他重要文件由中央發布；日常性的通告，凡屬對下級黨委批示性的，經過中央批准後發布。第四，主席幾次批評文革小組本身沒有民主集中制。整指委本身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是必要的。任何成員不得發表違背中央《決定》和其他正式文件的言論或擅自決定和處理問題。第五，歷次黨內處理黨員幹部問題，祇由一個單位負責，容易產生見和片面性，似可考慮採取：整指委、中紀委、中組部互相配合而又互相監督的原則。

「十六條」中，「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及其解釋有片面性，認為祇要抓了革命，促使人們的思想革命化，生產就可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發展。至今還不能低估一些老「運動員」的能量。因此，似有必要不厭其煩地強調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決不允許改變。整黨是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證，又是為他們服務的。在整黨的全過程中都要密切地聯系改進生產和工作，并落到生產和工作上。

我以《決定》為主，結合學習了我黨和聯共掌權後的有關文件，除了上邊說了的以外，

覺得還有以下的原則值得參考：第一，「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第二，「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當然，這是指在黨章所允許的範圍之內。第三，如果公然的或兩面派性質地反對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綫，反對十二大決議，反對整黨決定，并堅持不改，屢戒不改，才可以根據黨章的原則和程序開除黨籍。這一點必須十分慎重，切不可從個人恩怨出發，感情用事，武斷處理。第四，參照二十三條，整黨的工作人員，「不一定十分『幹淨』。犯過錯誤的，也可以參加，一方面便於教育改造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有些人可能熟悉內情，對工作有用處。」第五，右派可以摘帽子。聯共被開除出黨的反對派，在他們公開聲明放棄錯誤綱領並擁護中央以後，可以恢復黨員權利，不要再搞那種「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錯誤做法。

《決定》中幾次談到反派性問題。「派性」這個詞，首先是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向主席提出的。主席把一篇文章批給我，叫我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并加一個按語，講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在政治傾向上，往往表現出左右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的弱點。他們熱衷於『極左』的詞句和口號，在思想和行動上表現出極端狂熱性和自發的盲目性。」等等。我提議加一段，在組織表現上，以小資產階級派性代替無產階級黨性的

的問題。毛主席叫我另寫一篇文章。後因去西南和武漢以及養傷沒有寫，向一個寫文章班子的負責人講了，八月下旬，陸續在報刊上出現反對派性的提法，以後一直為黨中央所採用。

我長期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派性」反了十多年，還成為妨礙黨的團結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毒瘤呢？第一，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政治路綫長時期全局上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不可能在組織上團結一致。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沒有統一的黨組織了，黨員分別參加了一派群衆組織，或為一派所支持或打倒。這種怪現象是我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第三，一些被突擊入黨和突擊提幹的人，祇知有派，不知有黨。第四，走馬燈式輪番地一派上臺，就整另一派。一切問題，常常是以派劃線，任人唯親。第五，各派中都難免有個別壞人，但被派性掩蓋着保護着。派性不消除，整黨的目的就可能達不到。

自從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和組織措施，使這種派性不在全黨占統治地位，但殘餘還存在，有的地方和部門還嚴重的存在。所以中央《決定》提出：「決不允許乘整黨之機煽起派性，決不允許利用派性整人」。這是十分要緊的。派性是違背三中全會思想政治路綫的組織表現。反對派性的任務比延安整風時期反對宗派主義要艱巨得多。還是要用各自着重進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消除派性，增強黨性，以達到全黨團結的目的。

建議在中央黨校開辦一個整黨班，其中也調集少數有各種性質問題的幹部，脫離工作崗位，專門進行整黨。在中央直接領導下，解剖麻雀，掌握政策，取得經驗，指導全黨。歷史經驗證明，泛泛的一般號召，一哄而起，是容易出亂子的，或者必然祇能走過場。

清除精神污染要有政策界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清除精神污染，必須要有政策界限：

一、在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同實現總路線關係問題上，必須明確：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決不能改變或有任何動搖。

二、整黨不單是「組織路線」上的迫切任務，也關係到促進和發展經濟。

三、搞十六條時，毛主席還是要搞一點條條、框框的，問題是主要內容錯了，後來又衝

破了。說什麼讓群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運動中間增加才幹，辨别是非，分清敵我。這怎麼能行呢？那結果，我們大家都是清楚的。

四、對敵對分子以及其他資產階級政客所講的人道主義同一些正直的資產階級學者以及社會活動家所講的人道主義必須加以區別。

五、在保衛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反對種族歧視等問題上，正直的資產階級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所講的人道主義是進步的，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可以建立這樣那樣的同盟關係。

六、鑑於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的深刻教訓，必須把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關係講清楚，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發展的必然結果。祇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現代自然科學經歷着急劇的變革，不批判因此而產生的種種哲學流派，并注意解決種種新問題，戰鬥的唯物主義就根本沒有戰鬥性，也不是唯物主義。

七、我意可明確地說：在農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號。

八、關於發展商品生產商品交換，貨幣、工資，合理獎金，正當利潤，正當利息，經濟杠杆，價值規律的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性及其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性，語氣上可改得更堅決一些，這同「一切向錢看」根本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屬於精神污染的範圍。這個

問題，同上述第六點，如果弄不好，影響最大。

九、我認為，這次清除精神污染，以祇限於黨內的思想戰綫為好。理由是：第一，掌握思想戰綫各方面領導地位的是黨員。如果黨員負責幹部不吹捧黨外的污染者，不給他陣地，他就無法傳播。第二，黨內清除了精神污染，不少人會跟着改正。有少數人思想已經定型化，有的腐朽思想可能會一直帶到棺材去，即使我們建設得再好，他也會對黨對社會主義不信任。這無關大局。第三，以憲法作為標準，那是政治法律的標準，是必須強制服從的。這同我黨清除精神污染，不是同一性質的問題。第四，至於學術上文藝上正確的討論和批評，那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也是屬於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

十、宗教問題不屬於清除精神污染的範圍，不能混淆一起去處理。這個問題，中央的政策是很明確的。必須講清楚，以安定宗教界。

十一、清除精神污染，是迫切的，又是長期的。這次的目的要集中。戰綫不要拉得太長，要收縮。這是我的總的意見。

過猶不及，一分為二，

全面看人，糾正極左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有幾條建議供參考：

第一，我以為《毛澤東書信選集》中最有理論價值的是，一九三九年二月《致陳伯達》和《致張聞天》這兩封信。特別是提出：「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綫的鬥爭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綫鬥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一定的質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說「一定的質被包含於一定的量之中」），是對的，但重要的是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並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於其它異質，作

兩條戰線鬥爭的目的在此。」

「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子）說的「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

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正確路線的發展過程也正是這樣的唯物辯證論的應用和發展過程。我提議領導同志有空時翻一翻這兩封信。

第二，「必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確的，我以為這就已經說清楚了。似不必再加一句「文化大革命絕不能一分為二。」因為「一分為二」是一個哲學概念。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任何事物，任何過程，都是矛盾。過去有人說，「毛澤東思想不能一分為二。」我當時是公開不同意的。理由是，不能一分為二，就是玄學，就不能發展和變化了。總理表示同意我的意見。今天我的建議請領導同志參考。

第三，魏徵的《遺表》值得參考：「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二，可以興矣。」這也是毛主席晚年最大的教訓之一。

第四，在招待所兩年多，接觸不少老前輩，他們在講黨史時有這樣概念，即我黨歷史上

犯「左」傾的錯誤多，難糾正。即使在犯右傾錯誤時（陳獨秀時期）或正確時（如毛主席晚年以前的時期），對黨內同志的鬥爭和處理，也往往是殘酷無情的，是極左的。把黨內的「敵」情估計過高，打擊面過寬過重，是一貫的。今天也是如此，要改正，必須花很大力氣。

以上僅供參考。屠格涅夫說：「沒有一種不幸可與失去時間相比的了。」我失去的時間太多了，總想拚命補上。

牢記歷史教訓，戰略轉移不可動搖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

我對當前國內國際問題的若干提法有如下意見：

（一）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以及一系列重要政策是正確的。有些問題

的提法及其解釋還需要不斷完善。

(二) 改革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不改革難以繼續前進，但似不必提「壓倒一切」。因為我黨歷史上歷次提「壓倒一切」都容易有副作用。三中全會的最大的歷史功績是實現了戰略轉移。四化建設是我們的中心。改革終究是屬於革命（即解放生產力）的範疇，雖然采取的方法是自我調節自我完善，即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改革是實現四化建設這個總任務總路綫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

(三)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這個口號，一切社會的和自然的發展歷史，都證明它是錯誤的。即使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以前，這也是不對的，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說現在的口號是「立字當頭，破在其中」了，這也不確切，雖然害處不大。馬克思贊成「規定即否定」這一哲學概念。我以為，作為政治口號，在今天「立字當頭」無疑是對的，但很難說「破」就能夠自然地「在其中」。總還是要「有立有破」。這不但是符合辯證法，而且也符合四化建設和改革的正確關係。

(四) 三中全會以來最大的成就是農村的變化和發展。我國現代化的中心問題，就是把自然經濟和手工生產改變為社會化的現代化的企業。把落後的農業分化成為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商業和服務業、現代科研事業等等，從而使田間作業祇是全部生產過程中的一個車間。這樣，也就把農民變成職工和技術人員。籠統地說美國祇有二百萬人從事農業，就解

決本國兩億多人，還要解決世界上多少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是不對的。實際上美國是全國規模的社會化大農業，從重工業、動力及運輸業一直到對外貿易，都有為農業服務的部分，田間作業之前和之後，都變成了工商業。馬克思曾把英國同俄國做過類似的對比，他指出，英國比俄國從事農業的人數並不比表面看的那麼少，而僅是直接從事田間作業的人數少。但是，這種差別是十分重要的。這個轉變過程，在資本主義世界是歷經幾百年火和劍的剝奪小生產者的痛苦過程。我國這五年來變革的規模、速度和效果，都是奇迹。但是這僅是一個良好開端。成績寧可估計低些，不可估計過高。特別是不能把這一中心忘掉或放鬆。在馬克思看來，不解決這個問題，現代化的生產和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的。

(五)有些並非惡意的人們，認為我國現在是在搞資本主義。我們的宣傳工作的軟弱狀況需要改變。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講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兩重性，它們的根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占有制的資本主義剝削的矛盾。社會化的程度越高越好，越要學習。這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礎。我們千萬不能學的是資本主義的腐朽的剝削制度。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管理，也有這兩重性，我們要學的是科學方法，不能學剝削及其邪門歪道。至於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生產力，沒有階級性，無疑是要學習的。與此同時，必須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允許任何人給以絲毫的損害。

(六) 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很重要。在我們社會裏，共產主義已經不僅是理想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已經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已經有不少屬於共產主義性質和萌芽的東西。首先是社會主義公有財產和事業，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這一條，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侵犯公有財產不當一回事。用相聲演員的誇張說法：「地球那邊有個加拿大，地球這邊有個大家拿」。在意識形態上，主要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向錢看」。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還是有導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當然是行不通的。提倡共產主義精神的新事，抵制資本主義腐蝕，正是共產主義教育的生動內容。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不可講成是祇有光明沒有黑暗並且沒有任何矛盾的烏托邦。

(七) 馬克思多次強調：「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權。」他說：僅僅這一句話，就勝過了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一本書。資本主義的法的精神就是資本主義私有權。全部資本主義的法律史，就是保護、日益完善並粉飾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那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法的精神當然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我國經濟基礎的主體是兩種公有制。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包括外國資本主義經濟都是在兩種公有制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領導、聯合或合作之下的經濟，因而在性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同類的經濟成分。我們也必須依靠法律來保護並促進社會主義制度的健全和發展。列寧同意社會主義法治包括叛處死刑在內都是為了教育人和改造人，但法律畢竟是強制的。

(八) 整頓黨風是很得人心的大事。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形式主義、自由主義等等，這是從中央到基層的每一個人都要整頓的思想作風問題。歷史經驗教訓證明，祇有把整風的主要目的放在改進各級領導的思想作風上，其他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這關係黨的正確路線能否執行，關係革命事業的成敗。這是一個層次。其次，是違反黨紀政紀問題，這祇是對極少數人的問題，它超出了思想作風問題的範圍，因而要給予組織紀律的處分。這又是一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犯法。這既不屬於思想作風問題，也不屬於紀律問題，而是法律問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誰犯法，都要法辦。因而，我以為，這三者要加以區別；而不要籠統地都歸入反對黨的不正之風的範圍。雖然有個別黨員犯法，但不屬於整風性質。這樣那樣的違法亂紀行為，今後還會不斷出現，如果每一次都作為我黨又發生了新的不正之風來提出，對黨的影響不好。群衆已經說：「怎麼越整黨，越發生不正之風呢？」而且，這樣黨政法不分，還可能削弱法律和國家政法機關的權威。

(九) 兩條戰綫的鬥爭似不能丟。兩條戰綫鬥爭的本意，不過是說，既不要「左」，又不要右。「過猶不及」都不好。這是一個數量和質量關係的概念。過急了，保守了，都要及時糾正，才能保證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而不致由於「左」或右的量的偏差的發展而變成異質。「左」的錯誤由量的發展而發生質變，變成異質，就是那個「文化大革命」。我們吃過苦頭了。那時「左」得不能再「左」了，還是一股勁的反右。辯證法被拋棄了。反之，右

的錯誤由量的發展而發生質變，變成異質，就是社會主義變爲資本主義。我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還沒有發生這種異質，但不能說不存在這種危險性。一旦發生上述兩種中任何一種異質的變化，那就不屬於路線問題和兩條戰線鬥爭問題了。一定的質包含於一定的量之中。重要的問題在於找出一定的質的量的規定性。一九四七年土改，在找到富裕中農的剝削收入部分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量的規定性之後，保護中農的政策，才得到正確體現。現在我們提出的或將要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都需要找到這種量的規定性。這需要全黨認真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找不出量的規定性，就沒有界限，就會發生偏差。毛主席一九三九年說，這是一切哲學，一切日常生活，（無疑包括黨的工作在內）的一個基本問題。這是遵義會議以後經驗教訓的總結。

(十) 現在的國際問題就是東西、南北問題。這個提法，既生動又概括。但是，我以為，把領導同志任何一段話，一字不改的到處照搬，這個風氣并不好。因爲那是針對具體對象具體問題說的，并不是全面分析國際問題。關於戰後國際問題，我記得小平同志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作過科學研究。那時提出的世界的幾個基本矛盾雖有新的發展和形態變化，但一個也沒有解決和消失。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東西方矛盾（那時叫兩大陣營矛盾），而是帝國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同民族解放運動或民族獨立國家之間的矛盾。今天帝國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的這種經濟侵略和掠奪是加劇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更加複雜和激烈了。它

們之間的直接的利害關係，超過東西方之間的矛盾。這一點，斯大林臨死前才認識到，因而在這之前，他作出了一系列錯誤的決策。過去沒有充分暴露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會發展成爲類似帝國主義或附屬國同民族獨立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發生經濟的、政治的以至軍事的侵略。同時，民族獨立國家在不斷分化中發生的相互之間的矛盾也在發展。這一系列老的和新的矛盾的發展並激化爲對抗性，正是戰後從未間斷的局部戰爭的根源。帶侵略性的局部戰爭之所以被制止或將被制止，正是新的世界大戰可以避免並使國際局勢向緩和方向發展的重要因素。核威脅過去是今後仍然主要是訛詐工具。新獨立國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發展問題，但不是外因爲主，而是內因爲主。南北問題是爭取的條件，不是歸結於它。要克服發展障礙，大多數國家面臨的不是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或改造的問題，而是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的民族民主革命或變革的問題。不能設想不解決農民問題甚至還是奴隸制問題，就能解決發展問題。這是各自的內政。我黨堅持的國與國之間、黨與黨之間的基本準則，是完全正確的。

(十二) 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世界市場被分割完畢并重新分割，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重要特徵。世界市場從來是統一的又是分割的。斯大林提出的兩個平行的相互對立的世界市場的理論，缺少了還有相互依存和統一的一面。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從來是相互爲用的。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一個或幾個國家，一個或

幾個集團，在世界市場中占主導地位，但從來沒有被一國獨占過。殖民制度並不總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大英帝國全盛時期有的統治者就認為「殖民地是吊在我們頸上的石磨」。在戰後殖民地附屬國變成獨立國的歷史證明，壟斷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在戰後，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相互成為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也發展了。在不斷協調的同時，爭奪市場的矛盾也日益劇烈。「資本是天生的國際派」。哪里有利潤，特別是有超額利潤，它就會無孔不入。為了爭奪利潤，它六親不認，不擇手段。這裏沒有任何溫情主義。歷史上老大國家的資本和新技術流入新興國家，不是因為好心腸，而是一條客觀規律。我黨在充分認識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這種本性，并利用其相互矛盾的基礎上，把這一規律應用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實行大膽的對外開放政策。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在現時代的新發展。這是列寧和毛澤東曾經希望實行而又沒有條件實行的大事。這一點，從理論上去論證似嫌不足。

(十二) 孔夫子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他之前就有政治、哲學家提出了這個論點。不管學問家們作各種詮釋，我用現代語言作這樣的解說：「真正擁護領導，擁護正確路綫，就要像歌曲的和聲一樣，而不是單調地同聲重複，更不能象背誦經文和『語錄』一樣。如果祇會鸚鵡學舌，那不是真擁護領導，真擁護正確路綱，實際上祇不過是擁護他個人的私利。一領導同志不是神，而是人，每天都在說話，講幾句錯話本來是正常的。問題在於不應把每一句話都當成指示，更不應匆促地發表和宣傳。我們過去吃過大虧。」

這種阿諛附和的劣根性還難以根絕。我們的領袖，要喜歡「和而不同」，不要喜歡「同而不和」。不要「一言堂」，要「群言堂」。但是，「群言堂」絕不是沒有核心，絕不是多元化的一「言堂」，絕不是「群龍無首」。祇有隨時隨地堅持民主集中制，黨和國家才有凝聚力，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才有可靠的保證。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反對自由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我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致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曾提到，「我們的宣傳工作的軟弱狀態必須改變」，「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還是有導致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兩條戰線的鬥爭似不能丟」。現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正在深入，我對若干理論性問題的提法上有幾點意見，供思考問題的參考：

一、黨中央已經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規定了特定的含義。這個鬥爭和清除精神污染，性質是基本相同的。但側重點稍有不同。這次突出表現在政治方向問題上，即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這種性質的鬥爭是長期的。但是，我以為在以後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這種性質的鬥爭，不一定也不大可能都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因此，可以說得活一點，例如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性質的鬥爭，要搞幾十年，以至更長。」

二、黨中央關於政策界限已經作了多項明確規定，都很好。實踐過程中還會繼續作出一些新規定。我以為，在理論上還必須跟上。當前主要是講清楚：

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自由。相反，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宣布了：我們共產黨人所追求的目標：「將是這樣的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同時，共產黨人把自由看作是一個歷史範疇的問題。

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歷史上和當代的資產階級從封建奴役下、神權奴役下和民族奴役下爭得的自由，是進步的，共產黨人是積極支持的。

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是籠統的反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自由。共產黨人不隱蔽自己對之所持的批判觀點。馬克思從經濟基礎上，論證了資產階級自由的本質是：一方面要有自由支配和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工人，另一方面這些工人又要自由得一無所有（生產資料）。歸根到底，就是資產階級的剝削自由。但是，第一，我們尊重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

會制度；第二，我們對西方自由並不是否定一切。我們對於經過人民鬥爭得到的自由，是肯定的，而且從中汲取有益的東西。當然，決不能照搬。

諸如此類的根本問題講清楚，就可以省去不斷要在政策問題上申明不變了。

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性質的鬥爭，是黨內鬥爭的一個重要内容。但並不是唯一的重 要內容。黨內鬥爭還有另外一種性質的內容。這就是，新和舊、革新和守舊、新生事物和腐朽事物的鬥爭。這種鬥爭，在三中全會實現戰略轉移之後，在新的技術革命和體制改革中，是很突出的。這種鬥爭一般不帶階級性，不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歷史。在新的自由王國到達之後，前面還會有新的更大的必然王國（馬克思語）。共產黨人更應當自覺地站在爭取自由王國的前列，並善於區分哪些是階級鬥爭，哪些不是階級鬥爭，又要善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同時善於把自由與必然，自由與遵紀、自由與守法統一起來。還要把有破有立的關係處理好，那種認為「破」中就自然地有「立」，或者認為「立」中就自然地有「破」的觀點，都不對。

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高度概括。這是繼一九五七年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以及兩次莫斯科共產黨會議上由我黨提出並寫進兩次《宣言》中關於社會主義共同規律的發展。我認為，結合中國的和世界的新的實際，對之在理論上進一步闡述，

還很有必要。

①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一九五七年沒有列入六條政治標準。一方面指出它在我國已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的事實；另一方面指出它是允許批評和不怕批評的，而事實上唯心主義者或各種抱着資產階級思想、封建思想或其他舊思想又不願意改的人們，每天都在用各種形式批評它。這並不犯法，在某些方面還要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信仰宗教，屬於思想性質問題，對之祇能採取教育的方法，而不能採取強制的方法。今天主要的問題不在這裏，而是由於世界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發展，在西方動搖了一切傳統觀念，「馬克思主義」也時髦起來了，但被抽去了精髓，中心是宣揚新技術的發展消除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對立，消除了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區別。這種思想也流傳到了我國，並成為這幾年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立論的根據之一。我們要接受這個挑戰，在新的鬥爭中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②我國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制度。這三條都不允許改變和破壞。否則，也談不到一國兩制。我國政治體制之所以必須改革，主要是解決那些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妨礙經濟體制改革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義的組織機構和規章制度，充分發揚民主，多方加強監督，適當分權自治，全面健全法制。一般說來，政治體制的自我完善和改進，也不可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混爲一

談

③堅持社會主義，這是社會制度問題，絕不允許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逾越論」是錯誤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我們也不是籠統的「逾越論」。我們已經並將繼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快更好地較無痛苦地完成資本主義那一段歷史任務。黨中央確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它的主要特點是：八億農民問題還未根本解決，在農村還大量存在手工勞動和自然經濟。全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化程度也不高。我國還存在着以兩個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成分。在經濟領域，一方面中央過度的行政集權，另一方面地方的和行業的行政壁壘，妨礙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代表最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企業和企業集團，還不能自己掌握生產和流通的統一的循環過程，從而難以成為不斷更新和發展自己的社會化組織。銀行在上述方面的促進作用，以及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鬥爭中的作用，還未發揮。因此，我們堅持的社會主義正是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方針的社會主義。離開社會主義，改革就沒有方向，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就沒有生命。

④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我國歷史形成的，也是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保證。任何其它階級、階層、政黨，都不可能分享這種領導權。我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也決不可能改變成爲全民黨。但是，要實現黨的領導，在今天還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領導被領導者（同盟者）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并且取得勝利，同時善於吸取失敗的教訓，轉

敗爲勝；第二，對被領導者給與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最大限度地吸收被領導者參政，同時對被領導者進行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這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黨的領導。因此，整風和繼承黨的優良傳統，是黨的生命，是實現黨的領導的保證。

小平同志指出在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兩條，是很對的。

五、四項基本原則是相互聯繫的，又是各有特定內容和不同要求的，如果不分場合，不分對象，都作爲一個籠統的口號來重複，就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反過來說，對於錯誤的東西，它違反了哪一項原則，就是違反了哪一項原則，也不可以籠統的不加分析的說它是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這樣才有說服力。四項基本原則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關係，也不要籠統的而要逐項的加以分析和解釋。四項基本原則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關係，也不要籠統的而要逐項的加以分析和解釋。這樣，政治思想理論戰線上的任務，就是很費力氣和很繁重的了。

不必用「政治紀律」的提法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我認為，黨的領導同志在接見外國和海外人士時，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第一，中央領導核心正在醞釀過程中的機密，不應向外泄露。第二，涉及黨的領導人和組織人事問題，不應答復記者。第三，對外界把黨中央領導人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類的說法，不加鮮明駁斥，會被認為是默認。第四，應掌握國內外有別，黨內外有別，核心領導與其他層次及公眾在職責上有別的原則。即使將來我國在文化條件（廣義的）具備時，實行政治公開化，也不可以沒有界限，無話不談。第五，求同而不持異，容易傷害原則性。處於黨的領導同志地位，過度的恭謙會被認為是自卑，有損於黨的形象。第六，對於別人捧場的話，不必認真對待，更不可沾沾自喜，被人家套出話來。

最近，報刊上出現「黨的政治紀律」的提法，我以為值得重新考慮。民主集中制的組織紀律，是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外，政府組織、軍事組織、外事組織、勞動組織等等，也都有各自的組織紀律。似不必另提「黨的政治紀律」這個概念。因為政治的範疇很廣泛。僅就黨來說，不僅包括黨的綱領、包括黨的總路線、總方針、總政策，也包括各項具體路線、具體方針、具體政策，大量問題都在不斷發展之中，對這些問題的探索、討論、爭論、批評以至鬥爭，將隨着黨的存在而存在。黨不但允許而且提倡通過各種正當途徑提出或保留不同的意見。作為戰鬥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用鐵的紀律約束黨員的是組織問題，以保證行動一致，步調一致。根據我的理解，最近發表的小平同志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代表大會上講的民主集中制問題，正是這個精神。

我認為，今天在全黨，首先是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人，還是大有加強組織紀律的必要。毛主席在「文革」初期，在八屆十一全會上批發的一個文件的批注中，把黨的紀律規定為：祇執行中央的「正確指示」，而對於中央的「錯誤指示」則必須堅決抵制。這個原則不對。這樣一來，各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祇執行自以為「正確」而抵制自以為「錯誤」的指示，那麼，黨組織就散掉了，事實上也取消了黨的領導。這種錯誤觀點的宣傳，也有我一份責任。這是一個慘痛教訓。至今並未認真總結。如果在組織紀律之外，又提出一個「政治紀律」，而「政治紀律」的標準是很難掌握的。這也是我為什麼提請考慮不用這個提法的理由。

黨的組織工作和紀檢工作必須改革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

我的老戰友和親屬把我去年留下的遺囑和遺言印出了幾本，現在一本還沒有發，先送小平同志和紫陽同志過目。我留下的遺言，不僅是爲我個人辯護，即駁斥江青們制造的對王力的誹謗和誣陷，而且也爲了澄清關於「文革」和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混亂說法。我是「文革」前和「文革」頭一年橫跨兩個時期都列席政治局常委會的唯一活着的人了。這一段歷史雖然離現在並不久遠，但親身經歷領導核心如何決策的人也不多了，而且有些事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了。

我以爲，「王力問題」本來並不復雜，但拖了二十一年之久，在離開秦城，小平同志又有明確指示以後，也有六年了。「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我以爲，從這一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取決於黨本身改革的成功與否。

第一，我們的黨不是密謀組織，不是宗派小團體，不是會道門，而是公開的，群衆性的，民主的，現代最進步的共產黨。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是以人民為主體，一切領導機構和領導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同樣的，黨的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應是以黨員為主體，一切領導機構和領導人都是黨員及其代表選舉產生的，因而應對黨員負責。

第三，為人民服務，就要把保護人民的合法權利放在第一位，而懲辦個別犯法者，其目的也是為了保護人民。對黨員負責，就要把保護黨員的合法權利放在第一位，而處分個別違紀黨員，也是為了保護黨的肌體。侵犯人民的合法權利，本身就是嚴重的犯法。侵犯黨員的權利，本身就是嚴重違紀。

第四，民主與法制，民主與紀律，都是不可分割的。要保護人民的合法權利，公開辯護制度是必要的。在我們國家裏，如果黨內沒有辯護制度，以保護黨員的合法權利，那麼人民的辯護制度就將是無力的，甚至是虛假的。因此，我建議：

- ①建立黨員的公開辯護制度，以避免任何個人或執紀機關濫用職權，在第二位。
- ②組織部門和紀檢部門應把保護黨員權利放在第一位，而把處分個別違紀黨員的職能放在第二位。當然後者是必不可少的，是很重要的。
- ③建立類似律師職能的黨內辯護員制度，并培訓這方面的幹部。

(4) 應類似法院、檢察、公安、司法部門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約一樣，黨的組織和紀檢等部門需要重新考慮各自的職能，做到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約。

(5) 除涉及至今還有損於黨和國家利益的問題之外，一切牽涉黨員個人的政治的和組織的問題，黨員有權公開進行答辯和討論。所有黨員的檔案都要同本人見面，不允許在檔案袋裏隨便裝材料。

關於對原四野和其他老幹部從寬

處理問題致鄧小平的一封信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日)

小平同志：

這是一封個人之間的通信。您已經退休了，本來不應該再打擾您，但是因為我所說的這

個問題是第二代領導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時期是以您爲核心的，現在也祇有請您講幾句話，才容易解決。

最近我得知，原四野（亦即原一一五師和一方面軍）的周赤萍同志接到中央軍委紀委的一封信，說正在對他的錯案進行檢查和糾正，但還需要他耐心等待一個時期才能徹底解決，要他不要着急，可以先恢復組織生活，參加這次黨員的重新登記。（王力注：當時奔走相告，廣爲流傳，後來看到周赤萍夫人的信，才知道是誤傳。她說，周赤萍問題至死也未解決。但是，我的這封信仍有參考作用。）我以爲這不失爲一個明智的重要的政策，并建議在全軍乃至全黨推廣。

我黨歷史上，毛澤東對於王明路線和張國燾路線的處理經驗，仍然值得借鑒。雖然這兩條錯誤路線造成對黨、對軍隊、對政府（根據地）的嚴重破壞，殘害了不少好幹部，但是對王明路線祇追究一個王明和半個博古的責任，對張國燾路線祇追究一個張國燾和半個陳昌浩的責任，并且都是作爲黨內性質的矛盾來處理的。張國燾叛逃去當國民黨特務了，他同黨的矛盾轉化爲敵我矛盾了，但並不因此就把過去和他在一起的人或執行過他的指示的人當成反革命。相反，毛主席對於過去執行錯誤路線的同志採取了團結的方針。

從清算張國燾開始，一直到「文革」初期，毛主席總是反復強調，要注意團結和使用原四方面軍的幹部，同時反復提醒，今後犯大錯誤的，一定是原一方面軍的幹部了。自從您成

爲黨的領袖和部隊統帥以來，我就想向您提出建議，請您也向全黨全軍講這樣兩句話：第一，要注意團結原四野（亦即原一二五師和一方面軍）的幹部。第二，要提醒原二野（亦即原一二九師和四方面軍）的幹部要謙虛謹慎，防止犯錯誤。把四個野戰軍和五湖四海的幹部擺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老幹部，使他們各得其所，這是全黨全軍和全社會保持穩定的最重要的保證。

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再次向您建議，對於林彪一案有牽連的幹部的處理還要更加從寬，因爲他們中間很多人是爲黨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長期浴血奮戰過，而且至死也不改變信念的人。「文革」在他們一生的革命生涯中祇是短暫的一段，對這一段如果還有爭議，最好是不必詳究了，也可以像對周赤萍那樣挂起來，先讓他們恢復組織生活，讓他們繼續革命，而不要永遠把他們排斥在黨組織之外。

這一原則，我想同樣適合對於王力和其他經歷過長期革命戰爭的幹部。在一「文革」前，我曾在您的直接領導下做了近十年的文字工作，您對我的品格以及我的長處和毛病是了解的。對於我的問題的處理，您曾經親自過問過，可惜沒有能够在您退休之前得到解決。在您退休之後，我仍然盼望您能够向新的領導核心講幾句話，讓我回到黨的組織中來。

我於兩年前患了賁門癌，作了手術，後來說是擴散了，經過化療後，初步得到了控制。我還能够爲黨做點工作。我迫切希望在我生命結束之前能看到問題的解決，能作爲一個老黨

員來退休，並繼續為黨貢獻自己最後的一點微薄力量。

向卓琳同志和你們全家問好。

敬祝

春節安康！

王力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日

同現代企業相聯系的家庭工人問題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

報載，甘肅省把一些經營差的飲食服務行業包給職工個人經營，仍認定它為全民所有制性質，從業人員仍作爲工人看待。這一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值得認真研

究

當資本已占支配地位時，馬克思說：「這種所謂現代家庭工業，與那種獨立的城市手工業、獨立的農民經濟，除了名稱，毫無共同之處。現在它已經變成工廠、手工工場或商店的分支機構。資本除了把工廠工人、手工工場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大規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揮他們外，它還通過許多無形的線調動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農村的工人大軍。(二)」馬克思還舉一個愛爾蘭的襯衫工廠為例，它雇用着一千個工人和九千個散居在農村的家庭工人。

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得到這樣的啓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早已占支配地位，那些由國營公司、工廠、商店、供銷社或社隊企業組織產銷，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并上交產品，或收購產品，或上交利潤，或以稅收代利潤的家庭工商業，都應視為國營企業或集體企業的分支機構，生產者應定為生產工人，經營者也應定為職工。甘肅省祇訂一年合同，太短了，但不要緊，期滿後還可以繼續訂下去，祇要不要一看贏利又匆促收回就行了。

馬克思在描述當時使用縫紉機的生產領域的生產各部門時說：「在英國，現在盛行的實際上是這樣一種制度：資本家在自己廠房裏集中大量的機器，然後把機器產品分給家庭工人大軍去進一步加工。(二)」這種制度值得我國參考，在微電子工業興起的時代更有參考價值。許多行業可以組織大量的家庭工人，少花錢甚至不花錢，解決就業和擴大生產的問題。

馬克思還說：「如果一臺單獨的工作機代替了協作或工場手工業，那麼，工作機本身又可以成爲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也就是說，又在新條件下出現以戶爲生產單位。那時在美國，手工業生產方式在機器基礎上的這種再現，是常見的事。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向工廠的必然過渡中，同歐洲甚至同英國比較起來，那裏的積聚一日千里地飛躍發展。（三）」我國在發展中，特別是在發展小城鎮和社隊企業時，似可有意識地利用馬克思總結的美國的這個歷史經驗，有計劃地組織家庭工人，逐步向工廠化過渡。

可見，在一定條件下，在社會化經濟組織有形或無形指揮和控制產銷的情況下，以戶或以人爲生產單位，不僅對於手工勞動，而且對於某些機器生產，都有歷史的必要，并且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它屬於資本主義所有制；在社會主義社會，它屬於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至於作爲責任制的包產到戶到人，在理論上的合理性，那就不待言了。

注：（一）見《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三卷五零六頁。

（二）上書五一九頁。

（三）參見上書五零四頁正文和注（二四七）。

政治經濟學不能分割為資本主義

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我黨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黨中央現在在經濟工作上所採取的方針、政策和決策，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的，也是三十多年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科學總結的產物。

耀邦同志指出，我們的經濟工作發生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不懂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原理。他并號召學習《資本論》第二卷。

為了把耀邦同志的意見落實，我提議在全黨加強政治經濟學基礎知識的普及教育。我有兩點建議：

第一，不懂價值法則，不懂體現在商品二重性中的勞動二重性（這是馬克思發現的，并作為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不懂馬克思發現的剩餘價值（剩餘勞動、剩餘產品）的原理，就不會懂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原理。馬克思對假社會主義者以及糊塗的社會主義者的批判，常常針對這個問題。陳伯達吃虧也在這裏，「文革」中我才知道，他未讀也不讀《資本論》，《資本論》第一卷是基礎，有獨立的科學價值。第二卷如果離開第三卷，恩格斯說，不能有獨立的科學價值。

第二，我不贊成把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分割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而主張編成一個整體，以中國的社會主義為主要對象，邏輯地而又歷史地論述各個基本原理。毛主席說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要看上冊，不要看下冊（當然，下冊他讀得很認真。）這是因為許多基本原理都放在資本主義部分講了，而在社會主義部分中却不講了，大量的論述成為政策匯編。

今天黨中央已經把這些基本原理同社會主義建設結合起來了，更沒有必要分割為兩部分了。

自由王國與必然王國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現在有一個提法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個科學昌明、人們開始真正認識自己、必然王國日益縮小的時代。」我以為這種提法需要斟酌。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論述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時說：「象野蠻人爲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爲了維護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着人的發展而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祇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爲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

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祇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着重點是我加的——王力）（引自《馬恩全集》二十五卷九二六頁——九二七頁）

恩格斯也說過：「自由是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人對一定問題的判斷愈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着重點是原有的。）

恩格斯那時說：「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麼可笑，這一點從下述的簡單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麼一段時間的歷史。」

盡管蒸汽機當時確實是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恩格斯仍然認為：「毫無疑問，就世界性解放作用而言，磨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類同動物界分開。」

（以上均引自《反杜林論》）

同樣的道理，雖然現時代科學的飛躍發展造成的大生產力，遠遠超過蒸汽機，但是，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來說，也不能說超過蒸汽機，因為蒸汽機標志着現代科學、現代生產、

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的出現，也標志着工人階級的出現，并從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

在現時代，人類正處于新的技術革命的時代，正處于新的產業結構變革的時代，現代社會正由工業社會發展成爲智能工業社會，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對社會的認識，對自己的認識，其廣度和深度都是過去的歷史所無法比擬的。當然對人類的歷史不能再做恩格斯那樣的概括了。我們不能拘泥於馬克思的個別的或過時的原理。馬克思主義不發展，它就沒有生命了。但是：

第一，似不能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人類開始真正認識自己」的時代。

第二，自由王國和必然王國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隨着科學昌明，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不是日益縮小，而是日益擴大。未被認識的，即新開闢的研究領域，這個必然王國，也不是日益縮小，也是日益擴大。到了將來人類進入今日難以想象的科學昌明的共產主義時代，自由王國也必將建立在更無比地不斷地擴大的必然王國的基礎之上。

科技絕不能一邊倒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最近看了核科學應用展覽會，受到一些啓示：

一、我國核技術應用同先進國家相比雖還有很大差距，但領域已很廣泛，成果已很豐碩。我問了一下，從軍用轉而結合民用，大多是從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開始的，時間不過短短八年。軍用推動了民用，民用廣泛開展以後，又反過來促進和提高了軍用。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二、核電站我們搞晚了。我們現在採取自力更生和積極引進相結合的方針。有自己的獨立設計，才能培養人才，消化外來技術。有積極引進，才能少走彎路。這樣的正確方針也適用於其他領域。

三、我們也要搞熱核發電，即除研究利用裂變能以外，還要研究利用聚變能。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搞出來，但西方發達國家都在研究，蘇聯也在研究。盡管我國能源主要靠其他途徑解決，但這項綜合性的尖端科學，代表一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我們也不能放鬆。

四、我以為所有代表新技術革命標志的項目，如微電子、光纖維材料、熱核發電、機器人、遺傳工程等，我國都要積極搞。我國專家的水平不低，在許多領域的研究成果也不低。祇是我們的試驗設備差，成果應用和推廣能力差，整個社會的經濟文化科學水平低。但是，我們國家大，有集中力量和合理分工的優越性。因此，我們有條件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分別爭取在某一部局上和某一領域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從而在總體上在所有重要領域中都有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項目。

五、科學技術上絕不能一邊倒。解放初，我國在政治上一邊倒。那時，天津市委提出科技一邊倒的口號，受到了中央的批評。現在我國在政治上不存在一邊倒的問題，在科技上更不能一邊倒。可是，不論在展覽會上，還是在社會上，實際上都是一邊倒。展覽會上一句話也不介紹蘇聯和東歐。《人民日報》甚至《參考消息》都絕口不報導蘇聯的科學技術發展情況。美國、日本和西歐的好東西，我們是要學的。但是，切不可忽視學習蘇聯。世界上高級水平的科學家，蘇聯占四分之一；世界上的尖端發明，蘇聯占三分之一。美國科學家已開始認識到，蘇聯的工程技術書籍的水平比美國高得多，美國人吃虧在於自以為是，不學俄文和

日文。我國中年知識分子懂俄文的很多，這是一個好條件。但老年和青年知識分子不懂和不學俄文，這不利於我國的「四化」。為此，我建議採取適當的政策措施，以解決這一問題。

從山東農業發展中看到的問題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中組部招待所和我同住一個樓的劉貫一同志去山東考察了十四個地市，五十個縣，歷時五個月，他同我概括地談了一下農村情況，真是十分令人鼓舞。

山東農村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形勢是好的。一九五八年以後二十多年來長期徘徊，甚至倒退。三中全會以後，短短四、五年時間，就發生了巨變。

山東最貧困的地方，是西三區，即聊城、德州、惠民地區，這幾年的變化最驚人。聊城地區的人均收入，在一九八二年躍居全省第一。德州第二。煙臺地區從第一降為第四。今年

的第一將是德州。為什麼大翻身呢？群衆說：一靠政策，二靠棉花，三靠黃河水。

黃河在山東已經變害河爲利河。過去人們曾經擔心，實行雙包責任制會不會影響農田水利建設？聊城、德州、惠民、荷澤四個地區普遍做了回答：不但不會，而且起了促進作用。幹渠、支渠、毛渠交織成網了；土地平整如棋了；淤地後肥力提高了。

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政策路線爲群衆所掌握，就成爲改造世界的武器。依靠這個武器，第一解決了溫飽問題；第二解決致富問題；第三要進一步解決翻兩番問題。

各地重點戶、專業戶和聯合體已占到總農戶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這是生產關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偉大變革。

向大農業的投資不斷增加，開闢了擴大再生產的新局面。農民根據經驗計算，投資種糧食的收益大體爲一比三點五；投資經濟作物的收益大體爲一比三點七。一般說，不種植經濟作物，難以解決致富問題。種植什麼，又必須因地制宜。

要解決翻兩番，就要解決農、工（副）、商的分立和綜合問題。即田間作物生產的產前和產後，都要分化成爲獨立的工業或商業部門而又聯合起來。

煙臺地區新的領導班子，提出了要使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來自多種經營；要使百分之七十的勞動力用於多種經營。再加上一個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精力來抓多種經營。這三個百分之七十要達到既促使農產品大增產，又促使直接從事田間作業的勞力人數日益縮減，從而田間作

業本身也向專業化發展。這是一切變革農業的國家的共同途徑。我國將避免走資本主義國家的畸形膨脹大城市的老路，而走大力發展農工商綜合體、發展小城鎮的道路。

農民普遍迫切地要求學科學。科學工作人員奇缺。國家解決農業科技人員必須抓緊，但畢竟很有限。因此，各縣都迫不及待，以自行解決為主。在這方面，五蓮縣成績最突出。他們自己每年為各公社培訓一千名農技人員。中央提出的選拔明白人的口號，他們具體化了。什麼叫明白人？就是明白政策又明白科學的人。他們還出了《明白紙》，每期一頁，介紹科學種田，農民都爭相傳看。這是中國農村生產力偉大解放的推動力，真正頂得上開辦幾千所專科學校。

現有的農業科學技術因地制宜推廣問題，如雜交良種化、機械化、化學化問題，潛力還很大。但是，對於尖端科學，特別是遺傳工程問題，我們也要抓緊研究和應用。有的項目，我們可以在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基礎上達到先進水平。蘇聯一九六六年召開的二十三大，科學院長提出把微生物工程總局，改為遺傳工程部，不知結果如何，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當前山東農村最感缺乏的三樣東西：一是電，二是油，三是化肥（特別是磷肥）。我國農村用電，全靠電網輸送，難以滿足。必須開闢其他就地解決能源的途徑，如生物能、太陽能、水力、風力等等。沼氣是我國首先定型的，但現在的推廣工作不如印度。美國要在二十世紀末解決農村不靠大電網，而自行解決能源的課題，我們可以避免他們過去走的彎路。我

們在繼續發展化肥農業的同時，也要避免走他們造成污染破壞土質的彎路，抓緊研究利用微生物和遺傳工程改變植物根系和種屬特性的方法去解決。

除了生產領域的問題以外，流通領域趕不上。賣不掉，買不到。缺少倉庫，特別是冷藏。缺少農產品加工和包裝。缺少運輸力量。有些產品，如水果，要爛掉百分之二十以上。我們要全黨全國真正把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美國的大農業是包括從重工業到外貿在內的最大的產業部門。農業是影響全局也需全局來解決的最大問題。

農村的大好形勢，突出地反映了上層建築中兩大問題：第一，黨組織的現狀不能適應，因而必須整黨。是不是貫徹執行三中全會以來的黨的發展農業的政策路線，應作為整黨的一個重要內容。第二，意識形態領域趕不上。農業的變革，雖已初步得到理論的說明，但太薄弱了。理論家們對這樣大的問題有興趣的人太少了。在文藝上的反映更顯得不足。我們的文藝家們對此有興趣的人也太少了。其他思想戰線的各種專家們也大都如此。我們要像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整風一樣，作為解決世界觀的大問題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祇是根據非親身調查的間接材料，夾雜一些自己的議論，提出供參考。我希望早日得到能够親身進行調查研究的機會。

政策與科學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

抓科學技術是整個歷史發展鏈條中的中心環節。實現翻兩番的目標，必須從現在起，緊緊抓住這個環節，這是對的。

現在有這樣的提法：「農業的發展，靠政策調動積極性很重要，但有個限度，到一定時期，也就飽和了。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我感到這在文字整理上有缺陷，可能引起誤解，而且我已經聽到有人把這段話簡單化為「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科學技術的作用是無限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然和社會都當作歷史發展過程，自然史和人類史「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掌握

了中國社會主義的規律性，政策的威力顯示出來了，群衆中蘊藏着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象噴泉一樣的涌現出來了。相對的說，科學技術的威力還發揮的不够，潛力很大，必須加以強調，這是完全正確的。祇是在文字表達上，似需斟酌。

第一，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即使在農業方面，也還祇是開闢了道路。表現在政策上，一方面要求穩定性，另一方面，政策方面發展的餘地也是很大的，并將是不斷的。

第二，科學技術的發展前途是無窮無盡的，但是，它也是同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因此，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它的發展，特別是它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而不是無限的。

每年都應有一個農村問題的

一號文件和一號電影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昨天看了電影《咱們的牛百歲》，很高興。每年中央都有一個一號文件，今年春節我們有了一个一號電影了。

在描寫農村的電影中，它比起《喜盈門》來，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進了一步。

這是喜劇，但是是建築在大量悲劇的基礎之上的。因此，人們在大笑中引起深思、引起流泪。這反映着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的社會，正是一個繼大量的時代的悲劇之後的時代的喜劇。從而具有重大的典型意義。它描寫一個新事物（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誕生。它是在接受

一系列舊事物的挑戰，並且在戰勝這些舊事物的鬥爭中發生和發展的。最頑固的堡壘是舊的習慣勢力，要攻破它，除了採取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別的方法都是無濟於事的。這些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死板的，又無濟於事的。

傻子原來最聰明，破鞋原來很清白，愛動拳頭的小伙子原來是正直的，可以引導的。二流子是可以改造的。這些人，「誰的脖子上沒有灰」，但這正是活生生的新式農民，他們創造著歷史，同時在偉大的變革中不斷改變著自己的面貌。

表現手法是新鮮的又是中國氣派的。外國的和古代的表現手法是注意吸收的，但具有民族特點和創造性。不但表現了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在表現戀愛和吃醋時也是中國農村式的。作者、導演和演員們是有生活體驗的。語言是形象的，生動活潑的。典型人物的刻畫是有生命力的。

我在情不自禁的表示祝賀之後，也還認為這僅是一個好的開端。這類電影太少了。即使這個好電影，離開反映農村的偉大變革的要求還很遠，甚至還是比較膚淺的。要有更多更好的《咱們的牛百歲》出現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地上和銀幕上，這是我的願望。

我建議我們每年除了發一個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之外，在春節都放映一部新的反映農村偉大變革的一號電影。

白雲觀怎麼辦？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白雲觀對外開放了，我看了一下，真的是「層樓復觀此誰構，祇疑天巧非人工。」「西山亦喜得佳客，巍峨相向如爭功。」白雲觀的盛衰史，從一個角落反映了一千多年來中國的治亂史。那個唐代的石雕老子像可以作證，每當亂世，包括十多年「文革」時期，都被有心人埋入地下了。三中全會後才重見天日，又是「九枝燈裏開真景，三素雲中賀太平」了。

我想到需要更加重視這個白雲觀，有幾方面的意義：

第一，從歷史上來看，唐、宋姑且不說，白雲觀是宋金末元初一位杰出道士邱長春的道院和墳地。邱長春是道教北宗的始祖。他屢次拒絕金和南宋的詔命，而當成吉思汗一統前，却接受詔書，跋涉沙漠和雪峰度過陰山，提出停止侵略戰爭和安民休養的建議。成吉思汗接

受了他的意見，并要他掌握全國道教。元、明、清三代統一中國後都重視白雲觀。今天，它對於我們多民族的統一的新中國，仍不失為一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史證。

第二，從古籍來看，白雲觀所藏道藏經版本和數量都很可觀。中國古籍書目，當然以四庫全書為第一，大藏（佛學）為第二，道藏為第三。道藏不可忽視。它是從易經開始，繼以老莊，包括除儒家以外的墨家、名家、雜家、法家、兵家等等，特別還包括醫學和武術。其中有精華可以汲取，糟粕要剔除的也很多。因此，也應列入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部分。

第三，作為宗教，道教雖不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但因它發源於中國，所以在我國可與三大宗教相并。長期以來，不但在民間傳說和小說（如《西游記》、《封神榜》）中，而且在一些宗教經典中，早已形成道、佛、儒的溶合。宗教的消亡將晚於國家的消亡，這種逐漸消亡的過程，除了隨着自然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以外，還要有一個對宗教本身進行科學研究而掌握其規律性的過程。至於有關道教的神話故事，例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王母、麻姑、八仙等等，則是具有「永久的魅力」。座落在首都的白雲觀，正是歷代（元以後）道教的中心。

第四，有關道教的以及白雲觀歷代流傳下來的文物，雖經歷動亂，現存的還很珍貴，但尚未引起重視，有待於在專家協助下，進一步鑒別、整理和陳列。

第五，從旅遊的角度來看，現在還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效益。白雲觀可以辦成北京的、中國的、乃至世界的重要的旅遊點。把它辦成包括全國道觀，如終南山、武當山、青城

山、茅山、嶺山等在內的旅游中心，從而組織一個專業的旅游公司，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

白雲觀還有些重要部分沒有修葺，據說是因為缺乏財力、人力和物力。我以為，國家過去撥過不少錢，已經整修得有相當基礎了。黨和政府祇要採取適當的方針政策，任用得力的創業幹部，加上有聲望的老同志支持，以及電視和報刊的倡導，白雲觀不需要捧着金飯碗再伸手向國家要錢。它可以面向社會，向全中國人，華人，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信道的和不信道的都在內，依據傳統號召施捨。同時，還可以在開放和改革政策的指導下，采用社會主義性質的托拉斯的方法，集資開辦一項獨特的旅遊業。它可能成為贏利的企業。

黎玉應徹底平反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致黨中央領導同志的一封信

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陳雲同志：

送上我爲山東寫的一份關於黎玉同志的材料。一九四七年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給副書記黎玉戴的「富農路線」、「反黨的本質」、「類似鐵托的錯誤」之類的十幾頂帽子，居然至今還未平反。因爲這不僅是黎玉同志個人問題，而且涉及對山東黨以至全黨這一段重要歷史時期的估價問題，涉及到對羅榮桓同志領導時期山東分局工作的估價問題，涉及到陳毅同志領導的華東局初期工作的估價問題，所以請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從這一問題中有以下啓發：

一、在人民革命戰爭中，作軍事工作的功臣不能忘記，作地方工作的功臣同樣也不能忘記。象黎玉這樣一位有卓越貢獻的同志，山東以至全國人民是不應忘記他的。

二、從戰爭時期和地下黨時期沿襲下來的幹部檔案制度，似應考慮進行全面改革。過去本人至死不知檔案袋裏給自己裝了些什麼。我以爲，除涉及特殊機密尚在審查中的特嫌之類的問題外，應全部可以同本人見面。凡本人不同意者，應分別情況予以撤銷或附上自己意見。任何別人的檢舉材料，都不應裝入，而祇裝經過核實的材料。

三、如同政法機關的任務是有保衛人民權利又有懲辦犯罪分子的二重性一樣，黨的組織和紀律部門也有保護黨員權利和處分違紀分子的二重性。包青天也有既保護秦香蓮又鋤陳士美的二重性，因而千古傳頌。黨內也應考慮建立類似辯護律師的職能和制度。這樣可以減少

發生類似黎玉同志的三十八年的冤案而遲遲不能平反，也可減少新的冤假錯案。以上供參考。
敬禮！此致

王 力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注：此件及附件已經胡耀邦同志批印。胡耀邦同志并批示爲黎玉同志徹底平反。

附：致山東省紀委和中紀委的信

山東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并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關於從一九四七年五月開始的由華東局饒漱石書記發動的對黎玉副書記的批判的問題，現根據山東省紀委來人提出的要求，將我所知道的情況以及我的看法報告如下：

一、當時對黎玉同志的批判，牽涉到對抗戰時期山東黨的估計問題。對山東分局持否定一切的態度是不對的。我當時向陳毅同志和羅榮桓同志先後匯報過這個問題，他們都表示同意這樣的看法：山東分局一九四二年在劉少奇同志幫助下所做的四年總結是正確的。一九四三年朱瑞同志所做五年總結，有繼續四年總結的正確的一面，但有片面性。此後，羅榮桓同

志主持分局工作時期，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山東是執行十大政策的模範。一九四四年羅榮桓同志所做的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實際上是六年工作總結，是正確的。（手稿原由我保存，解放後送還羅政委，軍事博物館建成後曾將此手稿公開展覽。）黎玉同志是這一時期分局的主要成員之一，主管地方工作，他發表的《目前究竟應該作什麼？》我認為也是重要的歷史文件，是對的。陳毅同志到臨沂後，分別徵求山東幹部意見，我向他匯報了上述情況，他要我為他找出這些文件，閱讀後他表示了同意上述看法。羅榮桓同志也持同樣看法。關於上述內容，我曾向羅政委寫過一封信。

二、當時對黎玉同志的批判，實際上牽涉到陳毅同志。一九四五年底，組織華東局的領導和工作班子。一九四六年一月，陳毅軍長來臨沂。當時華東局書記饒漱石還在北平、沈陽、延安做停戰調處工作，華東局副書記是陳毅和黎玉。當時主持工作的是陳毅同志而不是黎玉同志。陳、黎的關係是協調的。陳強調尊重山東幹部，黎強調尊重華東幹部，下邊幹部一般都很和諧。我認為山東分局向華東局交接時期的工作有條不紊，這是很不容易的。在這個時期中山東的工作是符合中央路線的。山東的「九·一」指示也是對的，是符合當時中央的方針的。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臨沂解放以後，山東分局就組織兩個較強的工作組，一個以減租減息發動群眾為主，一個以摧毀偽政權為主。以臨沂三裏莊為典型推動全盤，把反奸與減租

配合進行。當時分局就提出在和平民主新階段時期，也要大膽放手發動群眾。

(二)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陳毅同志主持的華東局決定，由黎玉同志在萬人大會上號召：①加強國防（即備戰）；②努力生產；③徹底減息。這時，山東自一九四五年冬已經相當普遍地開展了反奸訴苦運動，成績在全國也是突出的地區之一。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用山東省政府名義發布指示，全省中心工作是放手發動群眾，貫徹減租減息，并再次提出：「以爲和平民主時期來到不需要再發動群眾的錯誤思想，必須徹底糾正。」這時省直及各區黨委都派出大批幹部下鄉。

(三) 一九四六年三月總結臨沂縣經驗，向全省推廣。把反奸訴苦同減租結合進行，實際上已經部分地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土地問題。中央的「五·四指示」，正是各解放區包括山東的這些經驗總結。「五·四指示」發布後，山東全省在五月底就普遍地開展了群眾運動。

(四) 一九四六年七月已開始全面內戰的形勢，中央指示爲着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依靠雇農、貧農、團結中農；另方面應將一切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對待富農和中小地主要放寬些。當時陳毅同志爲首的華東局堅決執行中央指示，一面在臨沂王家封河試點，一面由陳毅同志在臨沂城召開開明士紳座談會。

(五) 一九四六年華東局「九·一一指示」，正是在上述情況和背景下起草的。這個文件

主要是陳軍長而不是黎主席主持制定的。執筆人是當時的秘書長魏文伯和教育科長王力。華東繼續抓王家對河的典型，在九月下旬試點成功，向全面推廣。王家對河解決土地問題的經驗，是黨中央向全國推廣的第一個典型，連續在延安解放日報刊載。山東大眾日報上發表的《王家對河經驗告訴我們什麼》的社論，就是根據陳毅、黎玉同志的意見由我起草的。

三、宣傳一下山東省政府主席黎玉，是中央確定的同國民黨政治鬥爭的方針。因為：

(一) 一九四五年重慶雙十協定時，我黨代表力爭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四省主席由中共方面擔任。其中特別是山東。

(二)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早在一九四三年逃往重慶的國民黨的山東省主席何思源，突然在重慶招待中外記者。黨中央針鋒相對，由當時在延安的山東人民代表李澄之和姚爾覺，分別發表談話，列舉何思源罪行，要求將其撤職交付人民公審。延安解放日報也發表評論。

(三) 何思源於十一月回濟南。山東選舉黎玉為省主席，為全國各省最早的一個。為着針鋒相對，華東局決定，凡是挂何思源像的地方，就挂黎玉的像。第一并未在全省普遍挂；第二并不是黎玉同志自己的決定。在報紙上從未登過挂黎玉像的報道，而祇有挂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像的報道。農民分得土地，祇有感謝共產黨、毛主席的口號，而沒有感謝黎主席的口號。

四、饒漱石書記回山東不久，就發動批判黎玉副書記。最後給黎玉戴的那些帽子，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就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就都講了。

首先，說黎玉是「富農路線」，上述事實證明，這樣說法不對。中央在一九四七年二月開始提出「五·四指示」不徹底，不動富農多餘土地，不能滿足貧農土地要求問題，但同時也還是要適當照顧富農和中小地主。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發布土地法大綱，才提出平分土地，因而不能要求華東局一九四六年的「九·一」指示就那麼提法。饒漱石在會上還批判黎玉寫的《怎樣做群眾工作》的小冊子。那是羅榮桓政委領導山東分局時期出版的書，在山東幹部中有很大影響，效果也很好。饒的批判是不對的。饒漱石還從這本小冊子聯系批判彭真同志寫的關於冀察晉邊區群眾工作的一本小冊子。彭真同志當時是政治局委員，饒在下面批評他在東北的問題，并把冀察晉也罵了。我認為這是無原則的。

五、「宣傳個人」問題，前面的事實已經說清楚了。「近似鐵托的錯誤」，那更是毫無根據。

六、「抵制華東局領導」，不能成立。陳毅同志主持工作時期，陳、黎合作得很好，已如上述。饒漱石書記下車伊始，就整黎玉了。二人沒有共過幾件事，不產生抵制不抵制的問題。何況饒漱石不等於華東局。饒漱石先叫黎玉不要把機要電臺交給他，後來又拿這點來整黎玉，說黎玉不肯交權。

七、至於「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主義」等等，那不屬於政治性、組織性的問題，而是屬於一般的思想作風問題。

八、陳毅軍長，羅榮桓政委，蕭華主任都對我表示，不同意饒漱石書記批判黎玉副書記的作法。

(一) 一九四七年五月，劉格平同志和我奉命到孟良崮前線去向陳毅軍長匯報在渤海區視察的情況。我們順便報告了華東局會議的情況。陳軍長不同意對黎玉批判的內容和作法。他說：「黎玉是老實人，不是那樣人。現在敵情很緊，怎麼能這樣搞法？」他還說：「我這個人，有話就當面說完，沒有背後文章。當面不說背後又搞一套，最傷腦筋。我上的當太多了。」我知道，陳老總是把饒漱石整黎玉同過去在黃花塘整陳毅的手法相類比了。

(二)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解放不久，我奉羅榮桓政委之命，到北京飯店向他談山東情況。他很關心批判黎玉的問題。他聚精會神地聽了以後說：「黎玉做過不少好事，是個正派人，實在人。他的毛病，是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問題。整黎玉是不對的。對山東黨過去的評價更不對。」

(三) 批判黎玉時把山東黨說得漆黑一團，對此，留在山東的將領不敢公開罵，但從山東去東北的將領很多人罵娘。解放後我同蕭華主任談起這件事。蕭華大罵饒漱石混蛋。說：「他是借着整黎玉，給山東黨抹黑。山東工作那麼糟，能出這麼多兵嗎？」以上這些話，都是在高銳事件以前講的。

九、綜上所述，我以為對黎玉同志的批判是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取消那時戴在他頭

上的一切帽子。不但應肯定黎玉同志抗戰初期在山東發動起義的功績，而且應該肯定他以後在山東分局時期和華東局初期工作的卓越成績。這不僅是黎玉同志個人問題，也是山東最重要的一個時期的黨的歷史不被歪曲的問題。

此致

敬禮！

王 力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

從廊坊市看發展鄉鎮企業的道路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

經耀邦同志批準，我看了廊坊、香河、霸縣（包括勝芳）和固安：

廊坊地區農村改革從一九八三年才邁開大步。僅僅三年時間，面貌就大變了。各種新鮮事物，連做夢都想不到。

第一，廊坊地區，特別是霸縣和香河，利用鄰近京津的優勢，掌握發展小城鎮企業為樞紐，一方面充當大城市和外貿的大企業或聯合企業的配角；一方面為農業的供、產、銷提供服務，從而把農村的自然經濟逐步轉化為專業化、社會化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第二，小城鎮企業能在競爭中發展，靠的是現存的地皮，廉價的開支，轉產的及時，周轉的迅速，價格的便宜，還要加上優質和信譽。它同一九五八年的盲目大辦有性質的不同。迅速從這一工業部門轉入另一工業部門，是建立在最新科學技術基礎上的現代工業的本性決定的。在這方面，小城鎮企業具有機動靈活的特點。

第三，縣、鎮、鄉、街、村企業發展了，支援並改造農業，避免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就有保證。以霸縣為例，超百萬的街、村，去年已有十六個，今年可達四十四個；五十萬以上百萬以下的街、村，去年已有三十六個，今年可達五十六個；收入不足十萬的後進街、村，不到二十個，今年可以消滅。個別的村、街，已全部成為不離鄉的職工，農業成為園藝化的副業。有一千畝地祇要三個勞動力管，產前、產中、產後，都有專業的社會化服務。包括老弱病殘者都各得其所。糧食按計劃增產。

第四，廊坊地區已經是農村同城市相結合的改革。看來中小城鎮是農村改革和大城市改

革的中間環節。經濟聯合既有橫向，也有縱向。有些有自主權的企業，既面向全國和世界，又通過對本地的城、鎮、街、鄉、村企業的聯合來改造和開發農村，從而更有利於發展自己。聯合是社會主義企業資金的積聚，而積聚是加速的積累。

第五，普遍存在的突出困難有二：一是能源趕不上；二是文化素質趕不上。當然這些單靠國家是不夠的。群衆自己已在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新生的企業家們懂得引進和愛惜人才，也捨得花錢培養技術人員。看來在這些地方開辦各類專業的或業餘的中等技術學樣或培訓班，是形勢的迫切需要。

不必提中國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

最近報刊上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方針之間的關係的論述，日益完善了。

第一，把二者不是分割而是統一起來了。

第二，明確指出四項基本原則是我黨一貫堅持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是它的繼續和發展。

第三，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的方針，是三中全會及其以後提出並實行的，這也正是四項基本原則新發展的主要內容。

連續的大量的關於改革的論述很鼓舞人心。我以為有一個論點，在文字表達上容易引起誤解，還值得斟酌。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够格即不成熟的社會主義。「不够格」和「不成熟」不是等同的概念。「不够格」容易被誤解為我國還不够資格叫社會主義國家。初級階段、較高階段、高級階段的區別，也不宜用「成熟」「不成熟」作為標準。因為即使到達高級階段，也很難說就成熟了。

籠統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也容易被誤解為：因為我國現在還貧窮，所以就不是社會主義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證明是什麼社會制度。任何新的生產關係都是最初碰到各自現成的生產力水平，并且以此為出發點來發展生產力的（馬克思語）。

歷史條件造成了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初級階段，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有初級階段的優越性，所以我國人民才選擇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工作的失誤和社會的弊端，延緩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民擺脫貧窮的時間，但這些不是社會主義固有

的，相反的，正是從「左」右兩方面偏離社會主義。我們可以說，失誤和弊端不是社會主義，而不能籠統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事實上，同解放前比，同三中全會以前比，絕大多數人總是富裕一些了。實行改革開放方針，已經還將繼續在初級階段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進一步得到發揮。

我國人口這麼多，人均土地這麼少，底子這麼薄，不平衡性這麼大，不宜過份強調以生活水平作為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標準。即使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實現翻兩番時，發達國家或某些具有特殊自然條件的國家的生活水平也還要提高，與他們相比也還有差距。現在全世界人均國民收入最高的是阿聯酋和文萊，並不能證明他們的社會制度有優越性。

我一直認為，任何領導人都會有一時找不到準確語言來表達自己思想的情況，主要是在公開發表時應由負責宣傳工作的人加以斟酌修改，并請示領導人最後定稿。我從一九五七年參加修改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起，到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這十年中參加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核心起草文件的工作班子。這一段正是極左錯誤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我痛切地體驗到宣傳工作特別是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的嚴重責任。我多次建議，領導人威信越高，每句話的份量就越重，影響就越大，公布前就越需要經過理論工作者協助推敲。

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不科學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建議，在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不要把三個世界的劃分，作為我黨對國際問題的基本分析和制定國際戰略的依據。

一、我被關在秦城時，一九七四年二月，看到毛主席語錄：「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我原以為不過是說說而已，這也不失為一種說法。後來，華國鋒同志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說，「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指明了當前國際鬥爭的大方向，明確了誰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誰是可能爭取、聯合的中間力量，這就使國際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中，能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

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反對主要的敵人。」在一個長時期內，說成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我一直不同意提到這樣的高度。

我以為，這個劃分是不科學的。一不是經濟標準；二不是政治標準；三不是社會制度標準；四不是地理標準；也不是綜合的標準。

二、劃分三個世界，早在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統計學家索維就使用過了。他說的是第一世界是「自由世界」，第二世界是「共產主義世界」，其餘的是「第三世界」。類似這種說法，一直沿用着：第一世界是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集團，第二世界是蘇聯及東方國家集團，剩下來的就是第三世界。這樣，第三世界並沒有特定的含義，等於什麼也沒有說。

三、毛主席把蘇聯同美國并列為「第一世界」，是建立在蘇聯已經變成社會帝國主義的論斷的基礎之上的。現在既然承認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了，那麼，立論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蘇聯如公開復辟資本主義，勢必成為美國附庸，而降為次等國家，那也不存在同美國并列為第一世界的問題。

四、當時把被認為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國、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列入「第三世界」，而把當時被認為是「假社會主義國家」，「修正主義」的東歐國家（除羅馬尼亞），同除美國以外的帝國主義國家一起列入「第二世界」。現在，東歐國家被認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了，那麼，他們又屬於哪一個世界了呢？這些國家站那一條戰線上，是可以

變動的，如果發生了變動，那麼他們屬於哪一個世界，是不是也隨之變動呢？

五、最復雜的莫過於究竟什麼是「第三世界」了。如果是依經濟發展程度來劃分，那麼，經過四十年的分化，各國之間的差异已很大了。例如，南朝鮮、新加坡、中南美的某些國家，其發展程度已超過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如就人均國民收入而論，阿聯酋和文萊國已超過美國。

如果依政治態度來劃分，以色列、南非等等，又怎麼屬於「第三世界」呢？

如果依社會制度來劃分，所謂「第三世界」也存在着不同社會制度，相互之間經濟、政治以至軍事衝突是不斷的。如果依地理來劃分，說是「南部」以同「北部」相對應，也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

因為「第三世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共同體。各國之間共同點祇是：大多是新獨立國家，還要消除殖民主義的殘餘，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以經濟爲主的新形式的侵略。（至於保衛世界和平和發展經濟，則不僅是這些國家的而且是全世界的共同任務。）同時，由於這些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種歷史因素，他們相互之間的矛盾是很復雜的，有的並且激化爲對抗性，所以，不能把它當成一個統一體來作爲依靠力量。

因此，與其說「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不如說，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同民族獨立國家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矛盾，民族獨立

國家和民族解放運動在反帝、反殖、反霸的鬥爭中是主力。反之，這些國家也存在着聯帝、聯霸的勢力，那些就不但不是主力，而且是相反方面的力量了。

六、美國在西方集團的霸主地位已經動搖。它在經濟上特別在對外貿易和金融上已經較日本為疲弱。它已從最大的債權國變為債務國。帝國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格外突出，他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和爭鬥是很尖銳的。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都不是老大的占霸主地位的帝國主義發動的，而是後起的爭霸主地位的帝國主義發動的。因此，美國並不一定比日本更危險。

七、世界上存在着兩個超級大國。這主要是指美蘇兩個擁有龐大核武庫的超級軍事大國。兩國還在爭奪優勢。這種競爭除了尖端科學技術的競爭之外，在美國及其盟國主要還是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的一種畸形的表現形態，美蘇炫耀核武器都還有特定的對內對外轉移視線的目的。戈爾巴喬夫能不能實現根本改變，主要還要看他的國內政策。對外政策永遠是對內政策的繼續。不管如何，兩個核軍事超級大國的存在，并不能成為美蘇共同組成「第一世界」的論據。

八、我是肯定毛主席在制定我黨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方面的偉大貢獻的；正是他首先違反斯大林的錯誤意志，提出美蘇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美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現實的可能性，戰後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之間的矛

盾。因此，才有中國革命的勝利。殖民體系的徹底瓦解，更證明這一論斷的正確性。我黨同蘇共領導在歷史上論爭的實質不是別的，主要是：我國不能容忍任何附庸的地位，理當成爲真正完全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突破對美、對日、對聯合國關係的僵局。對外關係五項基本原則的制定和堅持。毛主席這些正確方面，在三中全會以後都得到了繼續和發展。特別是在適應我國的改革開放的總方針而展開的全方位的對外活動方面，有了重大的發展。

九、當然，「第三世界」已經成爲口頭語，不妨同「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欠發展國家」、「南部國家」、「不結盟國家」諸如此類的口頭語一樣，在一定的場合，同一定的對象，說一說。但是，總起來說，我以爲，三個世界的劃分，是不科學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不能作爲我黨制定國際戰略的依據。

市場是發展商品經濟的

前提和表現形式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暫時逃出了鬼門關，立即學習十三大文件。初讀以後，有以下意見：

一、十三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說明，是很重要的，是全黨全國人民今後的行動指南，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評價。

二、這個理論的闡明還僅是開始，還有待於充實、完善和發展。如果把這個理論說成已經很完美，不需要討論、修改和補充了，祇需要照本宣科逐字背誦，一切實際問題都隨之解

決了，而且今後就可以既防「左」又防右，而不要再花費力氣就保證永遠正確了，那就不合適了。我們的宣傳切不可誇大。

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主要特點是什麼？這個階段主要是解決什麼問題？也就是說，初級階段與高級階段或較高級階段的界限是什麼？區別在哪裏？這個問題需要有科學的鮮明的答案。否則，初級階段本身的概念就不能說已經是很確切的了。

四、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一樣是客觀存在的，違背它就要受懲罰。生產力是決定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因素，這一點，十三大實現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我國之所以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但是，籠統地說是不够的。因為高低是相對而言的。馬克思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全世界的鋼產量加起來也趕不上我國今天的產量，那時還沒有電燈電話，更不用說當代的科學技術了。因此，我們要具體地說明我國生產力究竟低在哪裏？

五、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到達到小康程度以後，就開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了。

什麼叫小康？很難說明白。在我國古籍上，小康是對大同而言的，大同是指以堯舜為代表的原始公社時期，小康是指以夏、商、周為代表的奴隸社會。在舊社會，作為口頭語，小康之家一般是指小地主和富裕中農的生活水平。這些都不是確切的概念。

以人均國民收入多少美元來計算也很困難，一是各國的計算水平不同而不可比，二是美元是不斷浮動因而無法預計若干年後的實際價值。籠統地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容易找到一個確定的衡量標準。小康這個詞可以用，但要有科學界定。

一切發展和進步，最終都表現在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這是很對的。但是，預先以生活水平作為區分社會發展階段的標準，却是難以說得清楚的。

六、我以為，我國之所以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是八億農民間題尚未根本解決。在土地問題解決以後，廣大農村還基本上是手工生產和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可以逾越，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任務，主要是把農民改造成各行各業工人的歷史任務。絕不可逾越。也就是說，我們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裏，把大量的手工生產改變為現代化生產，把大量的自然經濟改變為社會化經濟，把陳舊的不合理的經營改變為科學的經營。

我們說我國生產力落後，主要也指的這一方面。這一歷史任務，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經歷幾百年的剝奪小生產的痛苦過程完成的。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痛苦可以少些，時間可以短些，祇要不再走彎路，這不是很渺茫的。

七、同自然經濟相對立，是社會化經濟。商品經濟是社會化經濟的一種形式，但不是社會化經濟的全部形式。

我國商品經濟發展不足，因而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無疑是正確的和必需的。

但是，商品經濟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形態，因而沒有一個獨立的商品經濟階段。

我國在原始社會末期，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都有相當程度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不管人們承認不承認，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依然表現為商品形式。問題在於人們以偏見代替事實，視而不見，不去分析商品這種依然是社會財富的元素形式。

我們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但是，似乎不必提「商品化」，因為「商品化」，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不是一個好字眼。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並不是一切都商品化。在每個社會化大生產的工廠內部，都有系統的分工（例如紡織廠的清花、粗紡、精紡、織布、印染等等），但是這種分工不是普通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品來實現，而祇有小商品生產者的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完全的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當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了高度的發展，更不是一切都取商品交換的形式。

由競爭到壟斷，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我國是國家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必要仿照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盲目競爭，而應更多地批判吸取當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驗。馬克思晚年已經看出不能再說資本主義是沒有計劃的了。我國是國家社會主義壟斷和競爭體制的結合，因而發展的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八、商品經濟要發展，前提是市場，表現形式也是市場。市場有二，一是國內市場，二

是世界市場。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於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掃除了封建的和行會的堡壘，建立起統一的國內市場。國內市場不是開放不開放的問題，而是打破條塊分割，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問題，使商品以自己等價交換的本性在全國暢通無阻。資本主義是在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或者改變其屬性使之成為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分支機構以後，才建立起穩固的國內市場。我國要建立穩固的國內市場並日益發展和擴大，同樣必須緊密結合對農村自然經濟改造進程。

對外開放，就是利用世界市場的問題。一個是進入，一個是開放，目的都是為了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不開闢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就不能發生和發展。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同樣不能離開世界市場。我國日益擴大的國內市場，是世界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將隨着我國全面改革的成功而日益增強。一個國家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但是並不能脫離世界市場。在世界市場中，不論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還是相同社會制度國家，通行的祇能是平等互利的原則，祇能是商品流通的等價交換的原則。在這個領域裏，什麼「永恆友誼」，什麼「無私援助」，都沒有也不該有地位。我們的歷史教訓已經够多的了。在世界市場中，各國之間既是互相競爭、互相鬥爭的，又是互相補充、互相合作的。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離開國際分工與合作，更是不合時宜的。

九、基本路線是正確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戰略轉移的概括和記載。說它正確，是

同九大、十大、十一大通過的錯誤的基本路線相比較而言的。那個基本路線，是由我整理和概括的毛主席的幾次講話。當然，奉為基本路線時，我已被關起來近兩年了。我深切地認識到為什麼新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但是，三中全會實行的戰略轉移，意義還要更加遠大。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不僅是初級階段的中心任務，也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包括高級階段在內的中心任務。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全過程。堅持改革開放，當然也不僅限於初級階段。也正因為如此，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任務特殊路線呢？我以為還需要進一步具體化，才有更加確定的奮鬥目標。

實行改革開放的文物政策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

我提議，為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和總政策，有必要重新考慮研究和制定我國的文物

(包括當代藝術品)的政策。

一、文物和藝術品是民族的，同時又是世界的。有價值的文物和藝術品，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是沒有國界的。中國的藝術品在倫敦、紐約、列寧格勒、巴黎、羅馬、東京等大博物館陳列，不但不會損害而且會更加激發我們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精神。

二、文物和藝術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和其它商品一樣，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體。它的欣賞價值和研究價值就是使用價值。它的交換價值的體現和實現有其特殊的規律。有的藝術品還是比黃金更可靠的貨幣貯存對象。它的交換價值祇有在世界市場的流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現。

三、在文物和藝術上的閉關自守政策，祇同古代的從皇帝到地主的「秘藏」和「子孫永寶」相適應，而對於國際文化交流、弘揚中國文化以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則是背道而馳的。這種政策造成的惡果是：

第一，使中國藝術在世界上很陌生，因而不能占有應占的重要地位。

第二，以年限為界不許出口，使大量珍寶成爲糞土，不見天日，或聽任自然界和人為的破壞。

第三，名家的藝術品不許出口，使低劣的貨色被誤認為是中國藝術的代表。

第四，真迹不許出口，使偽造的贗品，被誤認是中國藝術的代表。

第五，在世界市場上，外國近古的一幅名畫，已有賣價高達七千萬美元的，而中國古代大畫家，在世界上連名字也鮮為人知。中國現代大畫家作品的售價，不但比西方畫家是望塵莫及，比起日本畫家也差得遠。這種不合理現象，主要也是我們自己的自我封鎖造成的原因。

第六，這種政策，并不能阻擋，相反地勢必加劇文物和藝術品的黑市交易和走私現象。這種違法現象，也妨礙中國文物和藝術品在世界市場上充分展現其價值。

四、因此，我建議：

第一，徹底開放我國的文物和藝術品市場。

第二，組建以世界市場為目標的國內外市場兼顧的強有力的中國文物總公司。

第三，允許臺灣、香港、新加坡和海外華人以及外國文物總公司，在服從我國法律的條件下，在我國境內投資挖掘和經營文物。需知未經開發的文物，同自然界的泥土一樣，沒有任何價值。

第四，把不許出口的文物限制到最低限度，即真正是獨一無二的東西。其它都一律允許出口。

第五，珍貴的文物和藝術品在世界市場拍賣中充分展現其價值後，國內博物館或收藏家在一定限期内有優先購買的權利。否則，讓它公開流到國外去，這并不可怕。

第六，現在故宮博物院和其它博物館收藏的並非國寶的文物和藝術品，與其任其霉變、蟲蛀和壓箱底，不如有計劃地投入世界市場去拍賣，但切不可一哄而賣。

第七，祇有開闢公開合法的出路，才能使嚴禁黑市和走私的法令收效，而使文物市場搞活。既達到保護文物，又達到為國家創匯和增加利稅的目的。

五，以上是我十年來對這個問題考察和思考的概括表述。過去我沒有提出，主要是擔心實行起來容易出大偏差，我這個提議者還可能會被罵為賣國賊。今天我仍然認為，如果我的建議被採納的話，首先必須要挑選很強的幹部來主持這一工作。其條件是：第一，懂馬克思主義（我認為，祇有真正懂得改革的人，才談得上真正懂馬克思主義）。第二，懂文物和藝術品。第三，懂現代經營管理。以這一幹部為首，成立一個領導小組，在黨中央或國務院的領導核心直接領導下，來組建這一工作。

贊裘沙的《魯迅世界》畫展

(一九九一年十月四日)

魯迅世界是最難用繪畫形式來表現的，而你們却奇妙地表現了。你們用繪畫形象貼切地表現出了魯迅的思想體系。

你們的作品不是插圖，而是魯迅世界的再創作。你們把魯迅精神同新中國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了。你們的作品有強烈的時代感，有現實的社會意義。它已成為魯迅精神的一種表現形式和一個組成部分，因而發放光彩。

魯迅思想是我們的民族魂，是我們的革命魂，是我們的改革魂，是我們的建設魂。魯迅思想同毛澤東思想是相通的。過去、今天和將來，都是中國人民的戰鬥的銳利武器。有黑暗，就有光明。有光明，就有黑暗。完全的光明，同完全的黑暗一樣，那就什麼也

看不見了。揭露黑暗中謳歌光明，謳歌光明中揭露黑暗。有勇士，就有奴才；有孺子牛，就有哈叭狗；有園丁，就有民賊；有先驅者，就有反動派；有烈士，就有叛徒。或者用匕首，用投槍，用炮火；或者用號角，用戰鼓，用贊歌；或者用透視，用良藥，用手術刀；愛憎分明。這是魯迅世界表現出來的完整的、全面的魯迅精神。

魯迅世界把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地結合起來。

魯迅世界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我深深地為魯迅世界所感動了。我受到了一次魯迅思想的再教育。這是我看到過的最好的最有價值的一次畫展。我對你們十九年嘔心瀝血的勞動表示敬佩。我祝賀你們的畫展的成功，并希望它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次手術前的一個建議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死神又在向我敲門了。我在賁門手術切除將近五年之後，現在幽門口又新發現癌細胞，即將接受全胃切除的大手術。我仍然對一切採取革命樂觀主義。但是，病魔是無情的，不少大夫認為我活下來的可能性不大。

在我的案頭，堆積如山的關於《探索改革新思路——以股份制、信用制和銀行制為樞紐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書籍和材料，現在祇好告別了。但願我能再一次戰勝頑症，繼續研究這一課題。

現在改革開放的形勢很好，勢如破竹，我十分高興，渴望建立下來投入這次新浪潮。但是，也許閻王不允許了。所以我想在沒有喪失思維能力之前，向黨中央進一言。

馬克思一生遵守下列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我相信中國改革家的領導核心，也是遵守這一格言的，對於所謂「輿論」的偏見，從來不也永遠不讓步。這是基本的態度。

同時，我認為戊戌變法失敗後，嚴復在點評《王荊公詩》中，總結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教訓，似也值得我們注意。他說：「荊公之大蔽有二：一不知政之宜於一郡一州者，不必宜於天下。」——不知人之攻我而互異者，不必皆奸人；而其助我而和同者，——又未必非奸人。——嚴復認為「是其（王安石）哲學遙處。」我黨的領導核心都精通唯物辯證法，熟練掌握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因而必定會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因地制宜，警惕因為加快步伐而一哄而起的現象。同時也必定會歡喜「和而不同」的善於思索和探索的人，而不歡喜「同一而不和」的隨聲附和盲目起哄的人。小平同志是這方面的模範，相信後繼者定會加以繼承和發展。

醫院改革之路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

五月二十二日，一位大夫拉着我的手說：「你又從死神手裏回來了。」我感謝神醫，感謝黨和人民，又給了我一次新生命。我又可以為自己的理想繼續進行思維活動了。

這一個月，我學習的課堂，就是醫院的病房。這裏是社會的縮影。從中我學到了許多新鮮的事物。

把我看到的、聽到的、學到的、想到的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我國的醫療制度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

我住的醫院是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腫瘤科，也是北京腫瘤研究所，也是籌建中的北京腫瘤醫院。在這裏，一個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九十年代世界第一流的專家和技術，同五

十年代陳舊的設備和老一套的管理體制的矛盾，高水平的醫護人員同令人難以想象的低報酬的矛盾。

建設一個北京腫瘤醫院，是中央和北京市從一九七八年就決定了的，每年都說沒有錢，每次緊縮基建項目時都被砍掉了。圖紙有了，地皮有了，建材備了，時間過去了十五年，還是說沒有錢，蓋不起來。為什麼北京能蓋那麼多大飯店，就蓋了一個腫瘤醫院呢？主要是因為，飯店是賺錢的，醫院是賠錢的，飯店實行的是改革開放政策，醫院實行的是老政策。

如果不改變政策，不進行徹底改革開放，再過十五年，大概還是蓋不成。這裏，首先必須從觀念上明確幾點：

第一，醫院和飯店一樣，同屬於第三產業，都應採取產業的制度，亦即實行贏利的原則。第二，醫院不是福利機關，不是慈善機構。把醫療作為社會福利，是政府的職能，是社會的職責，是企業收入中的合理扣除，是發展中的個人參與的社會保險事業所應分擔的，不能把這種負擔轉嫁給醫療衛生部門，更不能轉嫁給醫院。

第三，醫院應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改變由政府獨家壟斷一切的舊體制，應該大膽試行各種新體制。可以吸收外國投資，允許外資合營以至獨營，引進外國先進的成套設備和科學的經營管理方法。當然吸引外資必須以贏利為前提。國內可以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各種所有制的醫院。

第四，政府同醫院的關係，應該同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一樣，實行政企分開。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是很重要的，但機構要小，以服務為主。

我以為這幾點是符合基本路線精神的，也符合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多次關於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講話精神的。

我向腫瘤研究所所長、國際知名的腫瘤醫學專家、亦即籌建中的北京腫瘤醫院院長徐光煒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按照上述精神，黨中央和國務院不是以給錢為主，而是以給政策為主，能不能較快地在北京建設起一個世界一流水平的醫院來？我建議：

第一，可以采用「北京腫瘤醫療制藥股份有限公司集團」的名義和體制。

第二，國家新投資僅需一億元，加快建成醫院，國家新投資和原有設備等作為基本股，盡快贏利，通過各種渠道引進外資和利用國內的資金，戰勝腫瘤對世界和對海外華人都是有吸引力的熱門。

第三，因為該院現有的腫瘤科學研究和制藥等方面，包括手術、化療、放療、激光、生物學工程等等，已有了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好幾項是「七五」攻關項目，有的產品已經成為商品，因此，完全有條件發展成為許多專業的企業，由小到大，滿足國內市場需要，并開發世界市場，在建設過程中，就可以逐步增加贏利。

第四，醫院作為產業的實體，要有獨立的經營權。工資制度改革刻不容緩，現在外科大

夫的工資是「開顱的不如剃頭的，開胸的不如搓背的，院長不如院門口烤白薯的」，這種情況是違背馬克思的價值法則和工資法則的，也是違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作一次胃手術，不管是普通大夫、還是大專家，都祇收費一百元，這更是違背一切常識的。就像是齊白石一幅值十萬元的畫蝦，同一個普通畫家祇值二百元的畫蝦，都一律標價一百元一樣。何況這一百元又不是給個人的，個人作一次手術，祇得到七角錢誤餐費。這不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表現，而是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不文明的表現。這是人才外流問題的重要原因。

第五，建議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先試辦北京腫瘤醫院這一個股份制的、實行徹底改革開放政策的醫院。在這裏試辦沒有任何危險性。因為這個醫院現在還祇是一張白紙，好畫最美的圖畫。它又沒有舊包袱，不產生安置多餘人員之類的問題。它可以為醫療制度的徹底改革創造經驗。但其它醫院現在都不要忙于作這樣的試驗，而是根據不同情況實行各種不同的改革方案。

第六，如果黨中央、國務院批准這一構想，建議由國務院直接領導，民政部、衛生部和北京市也都可以在這裏作為把醫院改變為第三產業的試點單位，并研究把醫療作為社會福利的職能由政府的民政部門統一掌管。

我向徐光煒教授提出以上的設想之後，他經過五天的思索和探討，在我出院前對我說：「我們認為你的建議是可行的。」我很高興。

對十四大的一點看法和建議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九日)

今年十一月，我因作了胃癌第二次手術，又經過四個療程的化療，經醫生建議，并得到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的批准，我去南京休養和探親。現在我的身體已經得到了可喜的康復。十二月初，我已回到北京。

在南京的一個月，我雖然未作任何專門的調查研究，但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從自己親友和鄰居的接觸中，還是深深地感到每一個角落裏，都沐浴着十四大的東風。

我將對十四大的文件作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特別是結合自己的調查研究來作理論的探討。我盼望趁現在自己體力較穩定時能夠為黨作點工作。

我學習十四大文件後初步形成了以下概念：

第一，正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當於遵义會議一樣，黨的十四大相當於黨的歷史上的七大。鄧小平的思想，鄧小平同志從實踐中總結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方針和基本政策，以政治報告和黨章的形式，在全黨取得合法的統治地位，并成爲黨的憲章。這必將爲中國人民所接受，從而在中國迸發出無窮無盡的物質力量。

第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理論，就是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獨特理論。它是中國四十多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正反經驗的科學總結。它也是七十五年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它又是對當代發展程度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化方面新成就的批判的總結和應用。我們建立這一理論的方法，正是馬克思建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方法，也正是毛澤東建立中國式革命理論體系的方法。當然，我們建立這一理論僅僅是開端，切不可把我們已達到的水平估計過高，我們還要作許多艱苦的工作，使之更完善、更有說服力。

第三，開了一個很好的會，通過了一個很好的文件，現在中心問題便是如何正確地貫徹執行了。這裏問題還是很大的。因爲這是一場大革命，實際上關係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換腦筋，即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我們不能低估四十多年的習慣勢力，以及中國長期因缺少商品經濟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的濃厚的封建保守思想的影響。所以要正確貫徹執行十四大決議，必須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首位。我建議除了現在黨中央已布置的教育內容以外，請考慮增加：一，用語錄形式，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有關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

觀點，包括馬克思關於股份制、信用制和銀行制的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高度社會化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平改變」為社會主義的論述，列寧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沒有任何中間階梯的論述等等，廣為發行。二，列寧曾主張，在蘇聯應出版一批資本主義啓蒙作家的原著，這件事後來斯大林沒有認真辦。我以為，我們應當認真辦。選擇的書，不要太多，并且要新寫序言，由中央有關部門並組織專門班子直接掌握。這件事與整理出版中國古籍具有同等的甚至更緊迫的意義。

第四，在十四大前夕，我曾就和平統一臺灣問題提過建議。十四大不是專門解決臺灣問題的會，不可能在大會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把臺灣和港、澳等量齊觀，因為港、澳是到時間就要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而臺灣則不是這樣的問題。我仍然認為，我們在國際國內的路線政策方面都已經打開了新思路，現在還迫切需要在臺灣問題上打開新思路，實行新策略，以求能得到新突破。

中國的改革與世界新的

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開始根據中國的實踐，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撥轉了航行的船舵，轉入了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也就是說以滿足人民群衆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為中心，實行了改革開放的總政策總方針。

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既不是因為走投無路，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時代的要求，歷史的必然，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選擇。這不僅是中國，也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全世界面臨的新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新的世界性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

我們的世界正處於新的技術革命的時代。這個新的技術革命，引起了新的產業革命的到來。前一次技術革命，主要解決的是人的肢體的延長問題，即手臂的延長、視覺的延長、聽覺的延長、嗅覺的延長、觸覺的延長，而這次新的技術革命，主要進一步解決人的大腦的延長的問題。前一次是以機器來代替人體，或代替體力勞動；而這一次，是進一步地以機器來代替人腦，或代替腦力勞動。這樣一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過去所不可設想的日新月異。使得過去人類要思維幾年、幾十年、幾百年的問題，可以在幾分鐘之內、甚至在幾秒鐘之內就解決了。這樣就使得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支配，對社會的認識和支配，對自己的認識和改造，都產生了新的飛躍。在微觀上，人類深刻地認識了物質的結構，並且能够創造新的物質財富。人類也更深入地認識細胞的內部結構，特別是發現了基因，并且能够創造出新的物種。在宏觀上，人類不但更深刻地認識太空，而且可以遨游太空，利用太空為人類服務。人類從微觀的裂變和聚變，還從太空取得直接的能源。新的科學分枝又多又快地發展和變化，是我們和全人類今天共同面臨的新的技術革命的時代。

新的技術革命，必然地引起了產業結構、世界經濟的變化，也就是世界的產業結構都要發生兩種變化：一方面是智能的商品、大腦的產品、知識的產品，也就是腦力勞動的產品，也產業化了，也成為社會化的生產，并且成為直接的生產力，本身成為商品，本身成為進出

口貿易的對象了。所謂新的產業部門的建立，就是說的這部分，這種人類大腦延長而產生的智力產業、知識產業、或者說是科學技術的產業，這部分以嶄新的面貌，占據重要的地位。這是一個方面的變化。

另一個方面的變化，就是由於大腦延長而產生的智能化的革命，它必然同過去的產業即體力延長而產生的機器產品相結合，這樣就促成了舊的產業結構發生革命性的變革。

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舊的產業革命時期的機器本身必然也要改造。原材料改造了，動力改造了，傳導系統改造了，通訊改造了，交通運輸改造了，機器本身與智能產品相結合，從而產生了自動化、機器人化。這樣一個新的產業革命，使一些產業部門必須迅速地由這一部門轉入另一新的產業部門。

新的產業革命的特點及其歷史任務

現在，新的產業革命要解決的問題，是工人內部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的所謂藍領工人，本身成為過渡性階級，向知識工人過渡。知識工人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知識分子。工人的工作，很多要知識分子直接來從事了。另一方面是工人的知識化。新的產業革命引起了工人本身的這麼大的變化，那麼工人階級解放的科學——馬克思主義當然也要隨之發展和變化。

這樣，就要着重研究，體力勞動工人將要為腦力勞動工人、或者以腦力勞動為主、結合體力勞動的工人所代替的這樣一種歷史趨勢。同時直接引起了另一種變化，就是過去的企

業，主要是體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現在也要轉向智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比如拿生產半導體的微型集成電路的工廠來說，在整個生產成本中，智力勞動的成本占百分之七十，體力勞動的成本祇占百分之十二。現在新型的藥物生產的工廠，智力勞動的成本一般占百分之五十，體力勞動的成本祇占百分之十五。這個趨勢也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還有一些傳統工業不能達到這個比例，例如鋼鐵工業、汽車工業等。汽車工業即使實現自動化，體力勞動仍然要占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二十五。所以，有些國家的未來經濟學家和其他人們有這樣一個設想：把一些傳統的工廠，體力勞動仍要占相當比例的工廠，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外國去。

由於這樣的變革，技術革命，產業結構的革命，工廠制度的轉化，使得規模經濟學發生了逆轉。過去的經濟學家，包括馬克思在內，共同的看法都是：經營的規模、工廠的規模、公司的規模、企業的規模，越大越經濟。把不同部門集中在一個工廠，一個大的公司，一個大的企業，是經濟的。而現在不完全是這樣，現在已經顯示出，許多部門不是越大越經濟，越大越有益。因為現在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不斷地建立新的科學部門的分支，需要不斷地把新的科學技術能力轉化為產業。這樣，大規模的工廠調動不靈，迅速把這一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改成另外一個科學部門的生產，還是小船調頭快。因為中小型企業便於應用日新月異的科技產品，接受新的信息，開闢新的市場，他們適應變化的能力就更大，所以更加機動，更適合於現在的形勢。因此，過去那種規模經濟學的概念，在新的技術革命、新的產業革命

的面前就不完全適用了。因此，中小型企業適合於新的科學技術、新的產業的調整。這不是我們一個國家的問題，這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過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日本，都熱衷於大型、超大型的企業，以為規模越大，成本越低，分工越科學，可以用較小的勞動獲得最大的利潤，最大的生產成果。現在不完全是這樣了，現在許多國家都證明了，許多大的公司都不是盈利最大的公司。在汽車工業中，盈利最大的却是西德的一家中型制造廠，叫貝爾發動機公司。現在很多大企業也都加強他們下面的中小型單位的獨立經營權。

由於這種變化，就導致過去在規模經濟基礎上的一套管理科學和管理機構，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現代工廠管理機構基本上應用了現代軍隊和現代國家的機構，有層層的領導，形成官僚性的管理機構。因此，過去的這種規模經濟學基礎上產生的管理科學，以及一套的規章制度，同官僚性組織和制度不可分離。現在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說明規模經濟學必須改變或部分地改變。現在必須實行根本的或者部分的改變或變革。這種軍隊組織式的、國家組織式的機構，要讓位於產業組織，讓位於分門別類的專門家的領導。那些祇有官僚性才能的人，要讓位於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擔任領導工作。這種情況也不光是中國發生，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全世界都在發生這樣一種性質的變革。

我國的改革當然也必須以此作為指導思想。但是因為我國的發展程度不高，還需要采用兼并的形式加快積累。所以我在規模經濟的發展問題上將是雙向的，就是說，我們也還要

利用規模經濟學的原則來發展大工廠、大企業、以至企業集團。

再一個明顯的變化是，現在新的世界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把全世界的經濟更加緊密地相連。孤立主義和閉關自守是不行的。

新的時期——智能工業社會

有人把上述情況說成是，發達國家已經到了「非工業社會」。這種說法不對。又有人說是「後工業社會」，這也不確切。有人說是「信息社會」，也不對。信息不能說成爲社會。信息就是 information，翻譯成「信息」、「新聞」、「情報」都可以，「信息社會」的說法不對。中國的社會科學家提出，新的社會的特點應該叫「智能社會」，這也不完全。有人認爲較確切的說法應該叫「智能工業社會」，即既有腦力的延長，也有體力的延長相結合的這樣一個產業的社會。這問題必須以現在的最發達的國家作爲典型來研究。過去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是英國，現在，當然應該以美國爲研究對象。美國不是什麼「非工業化」社會。美國的製造業生產的絕對量一直在上升。三十年來，一直穩定在百分之二十三——百分之二十四左右。美國經濟不是「非工業化」。現在美國的經濟學家也提出這個問題。美國不是「非工業化」，而是勞動力的變化。一九七三——一九八五年美國的製造業生產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但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減少了五百萬。而就業人數增長的速度，在這十五年中是空前的快。就業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

在三十年代，每三個勞動力，有一個製造業的藍領工人，五十年代，四個人中有一個，現在降為六個人中有一個。還有繼續下降的趨勢。不管製造業生產如何增長，藍領工人都是呈下降的趨勢。這一點日本更加明顯。再過一些年，美國、日本，還有別的國家，直接從事製造業體力勞動的工人，可能象現在的農業人口一樣，不超過百分之十。

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國家，在今後的二十五年中，如果不適當地增加製造業，并大大削減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就沒有希望成為發達國家，或者保持在發達國家的行列。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重視不够。而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前一個時期英國工業一直比較衰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它維護藍領工人就業，所以它比起其他發達國家來，不但生產落後，而且失業率也最高。撒切爾夫人執政十年的主要政績，也是在這個問題上作了改變。所以他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一個行業或公司，如果把維護製造業藍領工人的就業機會擺到產業革命的前頭，它很快就會喪失國際競爭力。既不能提高生產，也不能保證就業。也就是說，維護這種就業，實際上祇能造成失業。產業工人以白領工人占主要地位，富餘人員必須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從而大大擴大了就業面。所以新的產業革命要解決的是工人內部的問題，把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人的問題。舊的產業革命解決了改造農民或其他小生產者使之成為工人、而且使一切過渡性階級都成為工人的問題，這個任務，我們中國還沒有完成。正由於我國發展的不平衡性，所以我國面臨着兩重的歷史任務。

關於工業轉移問題

現在美國人已重新認識工業轉移這個問題了。這種轉移十五年前發生，今天發生，今後還會發生。就是把勞動力密集型的工業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國家，一般說是發展中國家。但是，他們現在已開始重新認識這個問題。第一，這種轉移，把勞動力密集型的工廠，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外國去，并不是提高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量的可靠的辦法。美國人的半導體工業，原來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西非，但是他們仍然競爭不過實現了自動化、機器人化的日本。在日本的競爭面前他敵不過。因此，他們不再轉移，而是要把自己的工業，從勞動力密集的工廠，轉化為技術同智力勞動密集的工廠，用自動化的、機器人化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一點，美國人從自己的實踐中得到了成功。第二，他們也重新認識了這個問題：如果把傳統的鋼鐵工業、汽車工業都轉移到外國去，美國就要失去工業大國的地位，就要喪失工業社會的基礎。因此，他們得出結論，重要的不是轉移的問題，有些部門也不能轉移，而是實行政改、實行變革的問題。最近幾年，他們這些基礎強的工業，已經恢復了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這種工廠由勞動力密集向智力勞動密集轉移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美國也不是全部不轉移了，它的民用航空、航天部門，還在實行這種轉移。其他發達國家，和次等的發達國家和地區，也在實行這種轉移。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大轉移，造就了亞洲的四小龍，我們則喪失了機遇。現在，我們已經注意抓住新的機遇了。

中國改革的方向及歷史使命

所以，我們現在講全世界的產業結構變化，變化在哪裏呢？就變化在這兩個方面。我們必須趕上這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看不到這種變化，不但不能發展，而且不能生存。

在新的技術革命面前，在新的產業革命面前，在世界性的產業結構的調整面前，任何一個國家，祇有自己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學都是不够的。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以至一個企業集團，一個工廠，面向世界的工廠，都必須除了研究自己本國的宏觀經濟學，還必須研究世界範圍的宏觀經濟學，必須把自己本國的經濟放在世界性的產業革命這樣一個總的趨勢、總的進程中來研究，把自己的生產和流通，納入世界市場的大生產和大流通中去。這場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必然引起國際關係、世界格局、人際關係、包括工人階級內部和外部關係，發生革命性的大變革。

我祇簡單地列舉這幾點來說明。現在，我們中國所進行的改革，從時代的意義上來講，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不是中國一國，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特殊性的問題。我們中國的改革也是全世界性的技術革命，全世界性的產業革命的一部分。

因此，我的結論是：

第一，改革是時代的潮流、世界的潮流。我們處於新的世界性產業結構大變革的時代。我國

如果不改革，就不但不能發展，而且不能生存。我們的改革，有着深刻的歷史和時代的背景。

第二，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潮流。這些世界的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暴露了社會主義國家在體制上的共同問題。主要是長期以來不承認價值法則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的經濟法則，不同的社會形態祇是剩餘價值（剩餘勞動、剩餘產品）的占有和分配的形式不同。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仍然是商品形式，看不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存在，把計劃和市場對立起來，祇承認離開計劃的市場是盲目的市場，不承認離開市場的計劃是主觀的計劃，并且把主觀的計劃當作客觀規律，因而時常發生比例失調、經濟困難或經濟危機。出現困難時又往往誇大「階級鬥爭」和「反復辟」，而忽略建立穩定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面臨的改革，正是把社會主義理論中還帶着的某些空想成分改變成爲科學。這也不是中國一國的問題，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任務。

第三，改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還沒有完成把農村的自然經濟改變成爲社會化經濟。還沒有完成把農民和小生產者改變成爲同現代化生產相聯繫的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還沒有把大量的手工生產改變爲機器生產。也就是說，舊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這種不平衡性，更增加了我國改革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

第四，我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和中國發生的巨變，是舉世矚目的，我們的困難，要充分估計，絕不能隱諱。但是，要實事求是，不可以誇大。因爲舊事物的缺陷人們往往

熟視無睹，而新事物的缺陷人們則往往容易看到和加以抨擊。今天已經制定了克服困難的辦法，最要緊的是同心同德去克服困難，保護新事物，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政策，繼續穩步前進。

探索改革新思路

——以股份制、信用制、和銀行制為樞紐

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二日)

(二) 據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上海《解放日報》社《報刊文摘》刊載的一篇短文說

：「鄧小平同志最近指出，改革要探索新思路」。就是說，一要有不同於前十年的新辦法、新措施。」「關鍵在於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就以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言，有些同志總是習慣于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這種看法，經過這些年的實踐，已證明不符合實際情況了。計劃和市場祇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能作為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滯，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等同起來。」這一論斷，具有現實的理論和實踐的意義。這是生動活潑地運用了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長期以來，我對中國改革的研究，認為最好以股份制、信用制、銀行制為樞紐，來加速而又穩步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發展社會化的生產和流通。在這方面，我們自己的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還很少。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可以為我所用的却很多。在這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作過科學分析。可惜，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長期被埋沒。所以，本文盡可能採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話，以啓迪我們的思考。

二

(二) 馬克思晚年就明確地指出，再也不能說資本主義是沒有計劃的了，在馬克思寫《資

本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還都認為自由競爭是一種「自然規律」。而那時馬克思就對資本主義作了理論上和歷史上的分析，證明自由競爭引起了生產的集中，而生產的集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引起壟斷。壟斷早已經成為事實。卡特爾、托拉斯、辛迪加早已不是暫時的現象，早已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一種基礎。社會經濟生活重大方面通常早已不受自由競爭的支配。競爭變為壟斷。結果，生產社會化有了巨大的進展。特別是技術發明和改良的過程，也社會化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使生產走到全面的社會化，它不顧資本家的願望與意識，可以說把他們拖進一種從完全自由競爭過渡到完全社會化的新的社會制度。競爭以新的形式出現。壟斷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和新成就。

(三) 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社會化的程度也日益提高。既然大企業變得十分龐大，并且根據對大量材料的精確估計，有計劃地取得億萬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甚至全部；既然運送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地點（彼此相距千萬里）是有步驟地進行；既然從原料的依次加工到制成許多種成品的各個工序是由一個中心指揮的；既然這些產品分配給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是按照一個計劃進行的；那麼很明顯，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生產的社會化。很明顯，私有經濟關係和私有制關係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

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前舊的國民經濟體系不同，它的各部門形成了一種密切的聯系和相

互依賴的關係。要是沒有這一點，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都是不能實現的。這正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也正是建立在這個科學的基礎之上的。在一定的意義上講，我們的計劃，在某些方面，并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嚴密。例如美國的農業，已經是全國規模的社會化大農業，全部耕地哪一塊允許耕種，種植什麼，都有嚴格的計劃，而在我國則是不可能的。同樣的道理，在社會主義國家，祇要還存在商品和貨幣，經濟運行就必然通過市場。計劃和市場絕不是不相容的。那種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在理論上是無知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三

(四)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新思路不能從天下掉下來。它祇能是從我們自己的實踐中來，同時還必須研究和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發展起來的高度社會化的經驗。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股份制做過高度評價。在馬克思看來，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

(五) 由於股份公司的成立，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

了。同時，這種以前由政府經營的企業，成為公司的企業。社會主義國家有條件更好地利用股份制來擴大生產。在我國，消費者手中的銀行存款和現金有一萬三千億元之多，推行股份制可以使相當部分的消費資金轉化為生產資金。我國更有條件不僅向本企業，而且向全社會發行小額的股票，以利於集中巨額資金。廣大的持股者不帶剝削性，相反的，必然會由於更加關心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增強主人翁的責任感。股份制並不改變所有制。我國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必將更加明顯地表現出各自的特性。公有制的企業也將在股份市場上檢驗自己的效益，發展的快慢和大小，虧損的快慢和大小，直到破產後的關、停、并、轉，都不是行政命令職能的運轉。這樣，政企分開才不是一句空話。這樣，由政府部門改變企業或企業集團才不是換湯不換藥，而名符其實地享有經營權，有利於在國際國內市場的海洋中自主地游泳。

(六)馬克思研究的是資本主義，認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那麼，在社會主義社會，它的優點就更易發揮，擔心和害怕是多餘的。

(七)在資本主義社會尚且如此，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後者所得的股

息包括利息和企業的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潤，經理的薪金祇是或者應該祇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一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在股份公司內經營的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須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八)自從馬克思寫了上面這些話以來，大家知道，股份制企業的形式高度發展起來了。這些形式代表著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以至無數次方。總之，歷來受人稱贊的自由競爭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耻破產。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作好了準備。

四

(九)股份制離開不了信用制。馬克思認為，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

私人產業——撇開不說，信用爲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支配別人的勞動的權利。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一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衆認爲他擁有的資本本身，祇是成爲信用這個上層建築的基礎。在這裏，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進行投機的批發商人是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冒險的。在資本主義生產不很發達的階段還有某種意義的各種觀念，在這裏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了。在這裏，成功和失敗同時導致資本的集中，從而導致最大規模的剝奪。在這裏，剝奪已經從直接生產擴展到中小資本家自身。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發點，實行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後要剝奪一切個人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隨着社會生產的發展，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資料和私人生產的產品，它們祇有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還能是生產資料，因而還能是他們的社會財產，正如它們是他們的社會產品一樣。但是，這種剝奪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內，以對立的形態表現出來，即社會財產爲少數人所占有，而信用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爲財產在這裏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爲鯊魚所吞掉，羊爲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內，已經存在着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爲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

化並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祇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基本上不存在這種對立。所以，實行社會主義的股份制和信用制，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

(十) 馬克思沒有看到社會主義的企業。但是，他對資本主義的合作工廠作了高度的評價。他認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成為多餘的了，就像資本家本人發展到最高階段，認為大地主是多餘的一樣。

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時，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

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祇不過在前者那裏，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裏，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十一)以上，主要是和產業資本相聯系來看待信用制度以及這一制度中包含的資本所有權的潛在的揚棄。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基礎到了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的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信用制度，發揚其積極的一面，限制和防止消極的一面，具有重大的意義。

五

(十二)經營權同所有權分離而獨立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同資本相分離，就

是一般的勞動過程。因此，同資本所有者相區別的產業資本家，就不是表現爲執行職能的資本，而是表現爲甚至與資本無關的管理人員，表現爲一般勞動過程的簡單的承擔者，表現爲勞動者，而且是雇佣勞動者。資本家作爲資本家所要完成的，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區別、相對立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爲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餘價值，不是因爲他作爲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爲除了他作爲資本家的性質以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餘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餘價值，而是一種和剩餘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爲資本同勞動的對立，轉移到現實剥削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剥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爲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勞動，二者作爲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像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利息成了資本的社會形式，企業主的收入成了資本的經濟職能，不過這個職能的一定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被拋掉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開來。社會主義企業家是同工人一樣的勞動者，根本不存在剝削勞動的性質了。

(十三)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爲孤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過程的聯系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

志上，就象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一方面，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擔任了。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所有者。

(十四) 祇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着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祇要這種勞動不祇限於剝削別人勞動的這種職能，從而，祇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象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主義完全無關一樣。我們社會主義的企業就是這樣。我們除了要總結我們自己的一切行之有效的經驗之外，還要學習資本主義經營管理一切最新的科學經驗，為我所用。對於任何外來經驗，都不能照抄照搬。

(十五) 與信用事業一起發展的股份企業，一般地說也有一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這完全像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隨着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一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都是土地

所有者的屬性。

但是一方面，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着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一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一方面，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用借貸也不能用別的方式占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管一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祇有管理人員，資本家當然就作爲多餘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

(十六)不用諱言，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批駁混淆剝削收入和勞動收入的論調。但必須明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對於剩餘價值和剩餘產品歸誰占有和歸誰支配的問題，而不在於股份制和非股份制，不在於信用制和非信用制。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之一，就是剩餘價值規律。價值規律並不是馬克思發現的，而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發現的。馬克思的新發現是剩餘價值規律。這也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

六

(十七)股份制和信用制的樞紐是在中央銀行，把社會經濟調節得有利於全社會，把生產資料交給適當的人運用，設法使生產和消費經常處於協調的狀態。這種機構就是銀行。現

代銀行是社會化的集中表現。銀行由誰掌握，決定股份和信用制的性質和方向。

銀行造成了社會範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銀行收集了一切貨幣收入。「生產資料的公共分配」，從形式上看來，也是由現代銀行中生長出來的。有組織的工業國，表現在大銀行對交易所的統治。這樣就縮小了自動起作用的經濟規律的範圍，而大大擴大了通過銀行進行有意識的調節。

舊的資本主義，即絕對需要交易所作為自己的調節者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早已成為過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資本主義，這種新的資本主義帶有某種過渡的現象的鮮明特徵，某種自由競爭和壟斷的混合物的特徵。銀行業發展的最新成就還是壟斷。舊資本主義早已過時了。新資本主義是向某方面去的過渡。二十世紀是一般資本統治進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折點。

隨着銀行業的發展及其集中于少數幾個機構，銀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變成萬能的壟斷者，他們支配着所有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幾乎全部的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許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

現實的貨幣總是世界市場貨幣，并且信用貨幣總是建立在世界市場貨幣的基礎上。隨着信用制度的發展，像倫敦、紐約、東京那樣大的、集中的貨幣市場就興起了。這個貨幣市場，同時還是這種證券交易的中心。解放以後，我們拋棄了上海這個遠東的以至世界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一個失策。但是，歷史的這種發展，是多種因素造成的。

(十八) 銀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組織和集中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精巧和最發達的產物。因此，^和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這樣的機構，對商業和工業擁有極大的權力。銀行制度成了社會範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祇是形式而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不僅是形式而已了。

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揚棄資本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了資本本身的揚棄。銀行制度從私人資本家和高利貸者手中剝奪了資本分配這樣一種特殊營業，這樣一種社會職能。但是，由於這一點，銀行和信用同時又成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超出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杆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其它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系的一個要素。與此相反，關於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種種幻想所以會被賦予社會主義的意義，是由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沒有認識。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央銀行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我們應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銀行的作用。我們有大量的政府的行政的職能應當轉化為社會的、經濟的職能，而使銀行成為協調社會化生產和流通的「最精巧和最發達的一機構。我們的銀行本身也必須通過改革，使之進一步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不是用行政機構，而是用社會機構，控制和調節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成分，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是

我們改革繼續深化和前進的中心環節。

七

(十九) 生產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長起來的壟斷，銀行和工業的溶合或混合生長，——這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所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都有了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少數積累了大量資本的最富的國家已經處於壟斷地位。在先進的國家裏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

自由競爭占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新資本主義的特徵是資本輸出。

金融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則到處實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系」來訂立有利的契約，以代替開放的市場上的競爭。最普通的現象，就是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作為貸款的條件。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

全部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老大的國家向新興的國家轉移資金和新技術，是一個客觀規律。這對於新興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化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正是建立在認識和掌握這一規律的基礎之上的。十年中，我們獲得了偉大的成功。那種對於

引進外資、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的經驗持懷疑態度，裹足不前，是缺乏遠見的，是不對的。

(二十) 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首先分割和霸占國內市場。國內市場必然是同國外市場相聯系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場。隨着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系和殖民地聯系以及「勢力範圍」的極力擴張，「自然」就使得這些壟斷同盟之間達成全世界的協定，形成國際卡特爾和托拉斯。資本輸出，更加使食利者階層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給那種靠剝削海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為生的國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在發達國家，食利者的收入早就比對外貿易的收入高出多少倍。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也同壟斷資產階級分享：一、剝削全世界；二、在世界市場上占有壟斷地位；三、擁有對勢力範圍的壟斷權。其後果是：一、一部分工人階級已經資產階級化了；二、甘願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這個歷史從馬克思時代就開始了，現在還在發展着。

(二十一) 國際卡特爾的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都是以新的獨特的形式表現出來。實際上並不是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鬥爭，而是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的鬥爭，是一個壟斷組織同另一個壟斷組織的鬥爭，一個金融資本同另一個金融資本的鬥爭，一個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同另一個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在鬥爭中，更新的、更強大、更有組織、更高明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要顯得「優越」。但這並不說明自由貿易的「優越」。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總是互相為用的。現在美國正在步歷史上英國的後塵，從輝煌走向暗淡了。而德國和日本却又像

當初美國那樣地崛起了。

八

(二十二)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積極意義。列寧甚至認為，(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下面的壟斷資本主義，必然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或一些步驟。

因為社會主義無非是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向前邁進的第一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

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就不能從壟斷組織向前進。歷史的發展異常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從而人類異常迅速地接近了社會主義。——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就上升到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其實，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雛形早已在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窗口中出現，在這個最新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每前進一步的重大措施中，社會主義都直接而實際的顯現出來了。

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就有人認為郵政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範例。這是非常正確的。那時郵政就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形式組成的一種經濟。現代發達國家把所有托拉斯都變為這種類型的組織。這個機構完全可以由聯合起來的工人來親自掌握，使用、雇用一些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在列寧看來，當時高度社會化的德國，比起被小生產自發勢力包圍的俄國來，倒是離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更接近。

(二十三)但是，混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或者認為可以互相溶合，那是馬克思時代、列寧時代、毛澤東時代，以至現在都存在的、甚至是風行一時的錯誤論調。有人斷言，壟斷資本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等等。這完全不對。盡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計劃性，盡管資本主義大王們預先考慮到了在一國範圍內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盡管他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但是現在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是在它的新階段，雖然社會化的程度高度發展，而為社會主義準備了物質條件，但無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這一點在這裏用不着多說。

九

(二十四)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向壟斷的發展過程時，還必須研究競爭的新的

表現形式。同時還要進一步研究壟斷與競爭的相互關係及其歷史發展。以美國為典型，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經歷了一個托拉斯大發展的時期。壟斷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這時，在美國就提出了：如果想繼續維持有效的競爭制度，必須制定反托拉斯的法律。

美國在很長歷史時期中，執行反托拉斯法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法律學上面，而不是放在經濟現實。制裁的對象一直是壟斷的行爲，而不是已經存在的壟斷。不良的和不合理的市場結構本身，往往沒有同不良的和不合理的市場行爲區別開來。因此，壟斷不但保持而且發展。不管怎樣說，美國是首先既有這方面的法律，又有這方面的實踐的資本主義國家。

美國是反托拉斯的立法和實踐的先驅者。在許多年中，英國、日本、德國以及其他歐洲發達國家，都對壟斷弊端的合法性質採取寬容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占領日本和德國的軍事當局在這兩個國家引入了反托拉斯法，以便拆散他們原有的聯合企業。在短時期中，似乎取得了成功。以後，當這些國家取得自立以後，又出現了向相反方向發展的情況。在歐洲共同市場國家都加強了反托拉斯法，但各國有各國的解釋和做法。後來英國也開始實行反托拉斯法，雖然有點晚。在這個問題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新材料。

(二十五) 衆所周知，世界上并不存在着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當代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亞當·斯密說的，「由市場自由放任的作用導致滿足需要的看不見的手」的原

理早已不復存在。

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薩繆爾森認為，美國實行的是壟斷和競爭的混合制度。他論證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完全競爭的制度。他說，「完全競爭」可能正如蕭伯納對於基督教所說的一樣：「它唯一的毛病是它從沒有實施過。」自由放任這一極端和集權主義另一極端，使經濟學的原理戲劇化了。

那些充當蘇聯和東歐狗頭軍師的蹩腳的經濟學家，用什麼所謂休克療法，要從過去的集權主義的所謂計劃經濟，一下子跳到完全自由放任的所謂市場經濟，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理所當然地演出了鬧劇和悲劇。

美國嚴肅的經濟學家都懂得，他們說完全自由放任的競爭，經濟後果可能比完全壟斷的還要糟：不僅價格太高，而且寶貴的資源也被浪費掉，因為每個廠商都擁有多餘的閑置的設備和人力。這種情況的壞處有三：一是生產者蒙受虧損，二是資源被浪費，三是向消費者索取的價格太高。而且，生產者會蒙受長期的虧損。

另一方面，完全壟斷也是不行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認識了這一點，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其實資本主義國家早已有了經驗教訓。例如：戰後的西德，造成經濟崩潰的原因就是價格機構陷入癱瘓。由法令規定價格。但是在那種價格下，簡直買不到什麼東西。存在着黑市，以物物交換和價格高得出奇為特徵。在一九四八年發生了「奇迹」。一次徹底的貨幣改

革使價格機構面向市場，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都為價格和市場所決定，於是生產和消費立即高漲了。

(二十六) 在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中，競爭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并不是一個混亂和無政府的制度，而是一個精巧的機構，通過一系列的價格和市場的作用發生協調的作用。另一方面，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排除政府在調節價格和市場方面的重要作用。

美國的經濟學家說：「每人都覺察到政府在控制經濟活動方面做了多少事情——關稅法規、食物標準法、公用事業和鐵路的條例、最低工資的規定、雇用勞工的法律、社會保險、最高和最低價格的限度、公共工程、國防、國稅和地方稅、警務和司法機關的保護、區域的劃分、用水和煤氣工程等等。而沒有覺察到的是，有多少經濟活動在繼續進行，不受政府的幹預。千百萬人生產着千百萬種商品，大致都是由他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而沒有統一的領導和計劃。」計劃和市場是相輔相成的。前者是政府職能，後者則是不應由政府直接幹預的。

美國的經濟學家們認為，現代人看來，已經不再相信：「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政府在現代混合經濟中具有日益擴大的作用。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反映出來：一是政府支出數量增長，二是國家對收入的再分配，三是直接調節經濟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整個國民收入的十二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不得不消耗已經大大增加了的國民總產量的一半。在本世紀中，美國各級政府的每年費用，從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七十年代的四千億美元以上。

混合經濟制度的國家，如瑞典、法國和（據說是但並不是自由放任的）西德，政府支出相對來說是最高的，而這些恰恰是近數十年來成長和進步最快的國家。

我們說資本主義必然要走向社會主義，并不是今天或最近的將來就會很快實現。我們過去把資本主義社會自我調節的生命力總是估計太低，而過高地估計它的垂死性。事實不是如此。用一位美國的經濟學家的話來說，沒有彈性的鐵會突然斷裂，有伸縮性的鋼却可以彎曲。歷史告訴我們，脆而沒有伸縮性的經濟制度不能逐漸演變來使自己適應與日俱增的緊張狀態和社會變動。因為科學與技術經常改變經濟生活的自然發展途徑。如果一個制度要繼續存在，它的社會體制和思想體制必須根據這種改變而加以調整。在新的技術革命和新的產業革命來臨後，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地進行調整，實際上也是一種改革，因而取得了發展。但是，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不可調和的矛盾，並不能改變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規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進行的種種調整或改革，不是離開科學的社會主義更加遙遠，而是更加接近了。

十

(二十七) 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趨向是不可抗拒的。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法國大革命推動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許多封建諸侯王國的王冠紛紛落地了，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取消了宗教裁判所。但是，當拿破侖第一戰敗以後，出現了一個黑暗的時期，這些共和國幾乎一個也不存在了，封建諸侯王國都復辟了。但是，馬克思斷言，這些埋葬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人，必然成為共和國的遺囑執行人，必然要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歷史的實踐證明了馬克思的論斷。今天的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新紀元開始七十四年之後，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宣告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但是社會向前發展的規律同樣是不以任何個人以至任何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今日歡呼社會主義滅亡的人們，又將充當社會主義國家的遺囑執行人，而為社會主義新發展開闢道路。這是因為：

第一，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并不是產生於工人的頭腦之中，而是實際地不依賴人們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着。現代社會主義理論是這種實際衝突在人類思想上的反映。隨着實踐的發展，改掉不合理

的成分，發展合理的成分。這種理論更加具有科學性與生命力。

第二，由於新的技術革命和新的產業革命，加速了也加深了社會化的新發展。社會化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化的了。它絕不會永遠服從於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的占有形式。

第三，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矛盾不會消失，而在新條件下發展着。帝國主義的各種基本矛盾，一個也不會消失，同樣地以新的形式發展着，而且必然要激化。

第四，工廠內部的生產社會化組織早已發展到同存在於自己之旁、凌駕於自己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早已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愈來愈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把大量生產資料推向高度的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部門早就排斥任何其它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向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投降。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容忍由一小撮專靠剪息票的人，對社會實行露骨的剝削。

第五，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承擔起生產的領導。但是國有化必須是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才意味着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着在由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方面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否則，就不是進步，甚至是反動，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個原則，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同樣適

用。

(二十八)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不排除在高度社會化發展的國家中，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即所有制和政權性質的「和平改變」，或者也可以說是「和平演變」。這種「和平改變」，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設想過會在英國發生，列寧曾經設想過會在德國發生，在今天倒是西方的發達國家都存在着發生的條件，特別是美國更具備發生的條件。它社會化程度最高，而又最腐朽。他們說我們會「和平演變」，我們說倒是他們會「和平演變」。我們的關鍵是把自己的事辦好，而他們却不是這樣性質的問題，他們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當然，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絕不會也絕不允許用武力把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任何國家的。祇要世界上還存在着不同的社會制度，我們就堅持和平共處的基本政策。但是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說到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平改變」的時候，都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們並不指望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這後一句話，是馬克思主義者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分歧。也是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同拋棄四項基本原則的人的一個重大的原則分歧。

歷史捉弄人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今年七十歲了，應該對我這七十年的經歷作一個回顧。可是要回顧我的一生，就必須回顧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我是一九二一年生的人，也就是說，是十月革命以後四年生的人。我從少年時代就相信，十月革命是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新時代。我看到了這個新的世界的发展。我也親眼看到新的世界、新的社會遭到的挫折和打擊，和它內部所發生的各種變化。我沒有想到，我自己居然能活到七十歲，更沒有想到，在我七十周歲的這一年，發生了蘇聯的解體。在十月革命的故鄉，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公開拋棄社會主義、實行

資本主義的巨大變動。這樣一個巨大的變化，當然要引起人們的思考，也引起我自己的思考。我必須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我這一輩子選擇的路，是完全錯了嗎？

我經過反復的思索，我不認為我這一生是走錯了路。我走的路是對的。我以為我所選擇的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些破了產的是假的，或者是摻了假的。我不會改變自己的信念。但是我不能像有的糊塗蟲那樣，祇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招牌，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過去是盲目的，今天還是盲目的。他相信馬列主義，跟相信會道門差不多。在今天，因為中國還沒有發生蘇聯東歐那樣的變化，因此他們還沒有切身的感覺，還是繼續糊裏糊塗過日子，繼續當他的官，利用共產黨的招牌，為自己謀私利。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我從來是經過思考來決定自己行動的人。因此，我不能象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堆裏，好象世界上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我不能採取這種態度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因此，回顧我七十年來所走的道路的時候，我必須思索、必須檢討，我必須破除迷信，我必須回答時代以及我自己所提出的問題。

我是一九二一年生的人，同中國共產黨是同一年誕生的。也就是說，在五四運動以後出生的。一出生，中國就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這個革命是中國無產階級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這一生，除去在家裏生活的短暫時間以外，從十四歲開始，就是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之中。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生活的、工作的、戰鬥的。

文的、武的、地下的、地上的工作都作過。從最低層的普通戰士，到寶塔的尖端，最高的領導層，都經歷過。我是被捧上了天，又被摔到了十八層地獄。從中央領導人，一下子被送到秦城監獄去當囚犯。在最高領導層的崗位上，我還是我，并不因為我在這個崗位上，就比過去高明了。不是，並不高明。地位並不能增加自己多少才智。在每一級的領導崗位上，包括在最高領導層的崗位上，那些同我共事的人，他們各有自己的長處，各有自己的短處。我也是如此。有些人被神化了。但是，我有幸直接接觸這些人，包括最高領導層的崗位上的同志們，他們並不是神，他們都是普通的人，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愛好、自己的好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弱點。他們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固然很值得我們尊重，但不應被神化。他們也不應該被醜化。任意地神化一個人，美化一個人，或者任意地醜化一個人，鬼化一個人，都是不對的。一下子把我摔到十八層地獄，送到秦城去當囚犯，我也並不因此就比過去卑劣了。也並不因此就比過去高尚了。我還是我。

我必須思索、必須檢討，必須反思，必須破除迷信，必須客觀地回答歷史提出的這個重大問題。有人建議我寫回憶錄，但是我已無力寫一個完整的回憶錄。

要正確對待歷史

寫回憶錄我過去不那麼贊成。毛澤東在世時，他一直不贊成寫回憶錄。當時中央領導同志主張寫的，祇有一個人，就是朱德。朱老總。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二年非常有興趣，

要寫回憶錄。朱德找了康生，要康生從釣魚臺秀才班子中找一個人，幫他寫回憶錄。康生問了毛主席，毛主席不贊成，康生就婉言拒絕了朱老總的要求。

回憶錄也就是一種歷史著作。中共黨史，在毛澤東活着的時候沒有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本簡單的提綱式的書，毛澤東對我說過，他並不那麼喜歡這本書。毛澤東稱贊《聯共黨史》，曾在整風時對它作過積極的評價，他也從這本書裏學到一些斯大林的不好的東西，但他也不完全同意這本書。他不贊成在他世時就寫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他主張讓後人去寫。他也不贊成在他世時寫毛澤東傳。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通史也好，重大事件的歷史也好，以及黨的領袖人物包括他自己的歷史也好，他都不主張寫。對別人，就是朱老總要寫，他也是不贊成的。毛澤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不相信正在發展變化中的、還正處在歷史發展中的人物，自己就能把自己的歷史寫好，就能在歷史上站得住腳。他不認為這樣。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二中全會上，他就決定，不準以人名作為地名。如果按照蘇聯的作法，中國就會到處出現毛澤東城、劉少奇城、周恩來城、朱德城、林彪城、陳雲城、鄧小平城、任弼時城、劉伯承城等等。

毛澤東的想法也有合理的地方，他認為正在創造歷史的人，自己是難以寫好這段歷史的。他不贊成寫，也就沒有什麼人來寫，沒有組織個班子來寫中共黨史。毛澤東去世後，反其道而行之，現在的歷史多得很，這些通史、斷代史、重大事件的歷史，以個人回憶錄形式出現

的歷史很多，當然有積極作用，不少是很有價值的，但太泛濫了就不好了。

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歷史，從法國大革命算起，到十月革命，有一百多年。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們，把資產階級革命後的一百年的歷史，寫得使後人迷惑不解。到了列寧生活着的時代的前後，一些思想家、文學家，都感到資產階級革命後一百年的歷史，是不可理解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作為歷史科學，沒有說清楚。其他，包括通史、斷代史、重大事件的歷史、人物傳記、大量的回憶錄，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的歷史，又怎麼樣呢？我認為並不比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那一百多年的歷史強多少。我們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我們對歷史時期、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表達，包括各種歷史著作，回憶錄，不能認為都是科學的。不能回答歷史提出的問題，也就不能回答現實的問題。

俄國的托爾斯泰就感覺到對資產階級大革命後的一百年迷惑不解，他這一輩子想回答：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或作用是什麼？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來探討從拿破崙到亞歷山大一世這些在歷史上起重大作用的人物，他試圖探討，想得出科學的結論，用文藝的形式來表現歷史。托爾斯泰的態度是可嘉的，但後人評價他，叫勞而無功。托爾斯泰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可惜我們中國現在有些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態度，連托爾斯泰也不如。托爾斯泰認為，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著作，包括回憶錄，他們最後都歸結到，歷史是個

別人決定的，這個別人又是他的意志決定的，他的意志對了，歷史就前進，意志錯了，歷史就倒退。歷史科學不應該是這樣。它還是要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中，真正回答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行為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現在寫的歷史也還就是個別人物意志的歷史。毛澤東的意志對了，中國革命就前進了；毛澤東的意志錯了，中國歷史就受挫折。毛澤東或別的人物的意志錯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就錯了。這些歷史學家，千方百計要在個別人的意志上去尋找歷史發展的原因。那麼，毛澤東的意志錯了，為什麼中國歷史還能前進呢？他們說就是因為還有別的一些人的意志是對的，所以歷史才沒有完全倒退。而這些人的意志又往往是虛構的。當毛澤東被神化了的時候，毛澤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就推動歷史前進。後來說毛澤東不對了，又是別人，甚至是完全虛構的人物，他的意志，又推動了歷史的發展。這樣的通史，那是非常簡單的。

過去毛澤東時代雖然沒有寫通史，但就有這種說法：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兩條路綫鬥爭的歷史。對嗎？那就是意志的歷史。一個黨的歷史，而且是同中國革命密不可分的一個偉大的政黨的歷史，就是兩種不同意見鬥爭的歷史，就是兩種意志鬥爭的歷史。這能叫歷史嗎？不能叫歷史。這種可憐的歷史，是祇能靠想象同虛構來描寫的歷史。

現在有點像托爾斯泰所感慨的那樣：有的回憶錄，有的歷史書，像發的票子一樣，是真正代表金、代表有價值的物？不一定。當你讀了這些東西的時候，就像平常看到票子在

流通的時候，你也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它不但無害，而且有點益處，總是讓人知道點事情吧！但是當這些通貨膨脹了，就不行了。我們現在也有點通貨膨脹，你不仔細追究，總覺得它還不錯。我們的通史、斷代史、重大事件的歷史，也是這樣。

回憶錄我看的不多，有的也祇看了個別章節，或翻了一下，有的是寫得很好，但是也有的給我的印象是吹噓。先要把一個人物神化，這一個人物一生下來就是對的，就了不起，這一個人物的意志，就決定中國的歷史。先把這一個人物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吹噓一遍，互相抄襲一通，然後就吹噓自己。這個人物在歷史事件中究竟怎麼樣，他并不了解，他就硬把自己同這個人物的正確意志拉在一起，然後他自己也就正確、偉大了。

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對，那就一定要有那麼些意志正確的人，這些人了不起，老早就知道毛澤東不對。毛澤東的意志雖然錯誤，老早就有那麼一大批意志正確的人，同毛澤東的錯誤意志鬥爭。——可是要說同毛澤東鬥爭，又覺得不那麼合適，於是就祇說同幾個壞人作鬥爭。於是，善同惡就鬥，善行同罪惡就鬥，好心同壞心就鬥，於是就構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也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按照這些人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應該是不會發生了。那麼多好人、正確的人在毛澤東周圍，他們比毛澤東更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什麼不能阻擋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意志？他們不是沒有發言權的。後來的那些壞人，那些被詛咒的人物，品質惡劣的人物，犯罪的人物，反革命分子，最初並不當權。這些人當中，有的我直接接觸過，他

們確實不好，我不喜歡他們，但是他們能創造歷史嗎？他們能包圍毛澤東嗎？他們能決定毛澤東的思想行爲嗎？這樣的歷史是太簡單化了。另外，這些人的歷史也是一種人物傳記，也是一種歷史著作。現在這種歷史著作也在市場泛濫，也是通貨膨脹，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消極的東西、一切惡果，都說成是這幾個大壞蛋的意志決定的，他們能決定中國的歷史，決定毛澤東，而那麼多正確的人，不能決定毛澤東。這些人的傳記，因為他們沒有資格自己寫，祇有別人給他們寫，寫的人可以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隨意性更大，比寫正面人物的傳記更輕率。因為反面人物沒有發言權，不能為自己辯護，可以任意地往他們身上潑污水。有人認為，對這些人更不需要科學態度。科學不適用於對待歷史上被認為壞的人。這些人從娘肚子裏就壞，就沒作過一件好事。有些確實是這些人作的好事、說的好話，怎麼辦呢？那也不屬於他了，要屬於別人，要說成是另外一個「好人」說的和作的。而「好人」有時也說錯話、作錯事，那怎麼辦呢？那就把它安在「壞人」的身上。這些寫的人不知道，寫被認為是反面人物的人，這也叫寫歷史，也要回答歷史提出來的問題：歷史事件為什麼會發生？人民為什麼會接受這樣那樣的指示和命令（中國叫作最高指示）？這究竟為什麼？

因為抱着這樣的寫作態度，於是就出現這樣的怪現象：這個人沒有被打倒之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旦被打倒，就成了國民黨特務了。國民黨特務也可以隨便說嗎？這不叫國民黨笑話嗎？共產黨的領導人，原來是國民黨特務？這樣粗暴地對待歷史，是愚弄人民，嘲笑

歷史。這樣的東西，讓它通貨膨脹，誰吃虧？共產黨吃虧、人民吃虧、國家吃虧。當然，個別的歷史學家，是借這個來求得名利雙收的，他不必對歷史負責，不必對人民負責。而且這些東西還可以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添枝加葉，嘩衆取寵，傳得越來越不像話，說得離奇古怪，這樣才有銷售市場。這些反面人物的傳記，比現在出版的回憶錄、正面人物的傳記，影響更大，銷路更廣，對共產黨的醜化，越來越離奇。他們可以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讓他們的思想長上翅膀，在天空中自由飛翔，不受任何事實和邏輯的約束。我們大家知道，如果一句話我傳你、你傳他，當面傳十個人，就會走樣。現在不當面了，又有人故意編造，那就更加走樣了。這樣的東西，不應當成為共產黨的歷史。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包括通史、斷代史、重大事件的歷史，正面人物的傳記，反面人物的傳記，還有漫畫、相聲，有的比托爾斯泰所碰到的那種迷惑人的歷史科學，更加不科學。有的根本就不需要科學。

托爾斯泰、馬克思對拿破崙的研究給我們的啓示

托爾斯泰着重研究拿破崙。現在我國有好多人在研究毛澤東。我思考歷史問題當然要涉及毛澤東，涉及對他的一些看法和評價。托爾斯泰說，從法國大革命開始，舊的、被認為不够偉大的組織崩潰了，舊的習慣、舊的傳統消滅了，新的組織、新的習慣和新的傳統一步一步地形成了。在這些舊的崩潰和新的形成的過程中，有這樣一個人，他要立於未來運動的領導地位，並且對於行將發生的歷史事件負有全部的責任。他周圍的同僚無知無識，他的反對者

軟弱和無足輕重，他本人大膽和自信，歷史上無數的機遇伴隨着他。他自己有光榮和偉大的理想，他不但不認為自己作的任何事情是錯的，而且他能證明他所要作的一切都是對的，正當的。祇有他一個人思考。他在無數的機遇中得到了、或者客觀時勢給予了他權力，所有的人們，他周圍的人們，都承認他的權力。他經常有理。因為他站在權力的頂端，而他周圍的人們，廣大的群衆，都認為他說的和作的都是合理的東西，而且都是最好的東西。沒有人比他說的和作的那麼好的。所以也可以說，與其說拿破侖是他自己準備去執行他的歷史任務，毋寧說是他周圍的人們使他準備去擔負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責任。因為他所作的行為，沒有一件不立刻在他周圍的人們中、至少在口頭上當作是偉大的事業。

毛澤東何嘗不是如此！毛澤東自己也理解這一點。他說過：「我就那麼對？也不一定。我就那麼偉大？也沒有。是人家那麼說。你別看他嘴上那麼說，實際上也不是。」不過，毛澤東周圍的人們確實就是說他對、他正確、他了不起，每一件事情都了不起。列寧也何嘗不是如此！

在這樣一個歷史情況之下，周圍的人們的這種態度被認為是好的、正當的、是善的。誰誇拿破侖是好的、對的、偉大的，他就是好人、對的、善的；而反對拿破侖的，雖然反對派並沒有什麼力量，也沒有什麼結果，但祇要你反對他，就是不對的、錯的，就是罪惡，在中國還可以加上反革命的帽子。因此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他固然要對歷史負全部的責任，最主

要的責任，但不能說他周圍的人們都沒有責任。這不是個人責任問題，而是那樣一個客觀環境決定的，是托爾斯泰所說的三條，即空間、時間、條件的相互聯系決定的。

在這重大事件中（拿破崙的重大事件就是打仗），拿軍事組織來說明，（軍事組織同國家組織以及其他組織是一樣的。）這個軍事組織可以正確地用圓錐體（中國叫寶塔）來說明。它最大的底層是兵，它的上面是從小到大的斷層，就是軍隊中較高的軍階，一直到圓錐體的頂點。這個頂點就是統帥。人數最多的是兵，是這圓錐體的最底層，是最下層的基礎。人數最多，他的行動最直接，打仗是他們打，砍、殺、刺都是他們，而且他們總是奉較高級的命令行事。比他們數量少的軍曹，（我國就是上士、中士、下士。）他們的直接行動比兵少，但他們已經是下命令了。再往上是軍官，他的直接行動更少，他們的命令更多。到了將軍，祇是命令軍隊行動，指示目標，他自己幾乎不使用武器，不去殺人、拼刺刀。最高的統帥決不參與行動本身，而祇發出關於大軍運動的一般的命令。他祇下命令，而且祇下大命令。軍事組織是如此，其他的組織也是如此。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也是如此。從這裏邊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規律：人們爲了共同行動，總是要結合成這樣那樣的關係，他們越是否直接參與行動，他們的命令就越多，他們的人數就越少。這樣直到最上層的一個人，他最不直接參與事件，而使他自己的活動全部用在發布命令上。

我引用托爾斯泰這樣一大段的話，我認爲對我們很有用處。我們的歷史學家也好，政治

家、法律家也好，要懂得這個道理。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就不知道、或故意歪曲歷史的真相。因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是共同行動的結果。是許多人、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是上億的人，共同行動的結果。在這裏是有發布命令的人，他的責任大。雖然他的行動最少，但責任最大。他要負全部責任。而直接參加行動的群衆，他們雖然行動多，好多事情是他們作的，但他們是奉命行事的。下命令的人也不是個人意志決定的，是客觀條件決定的。在他的命令之下行動的人，說了錯話、作了錯事，作了很不對的事，但是這些人是奉命行事的，不應當追究不應由他承擔的責任。

托爾斯泰還說，一個運動，似乎表現在許多人的意見和希望當中，但是最後表現在一個人、歷史上有一定作用的人、起決定作用的人的意見當中，集中到這一個人的意見、意志、命令當中。也不是這一個人的所有意志、命令都能實現，都能造成千百萬人的共同行動。他有好多想法、命令行不通。（中國也是如此。）如果不加分析的話，就常常造成錯覺：這樣一個大的行動、大的運動和事件，僅僅是在這一個事件之前的一個人的命令造成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運動之前就有一個人，站在權力的頂峰，他可以命令這個事件出現。托爾斯泰認為不是。這是一種錯覺，這是不科學的。他說，例如一隻航行的船，無論它向哪一個方向行駛，在它前面總是可以看見被它分開的波紋，在船上的人看來，這些波紋的運動是唯一可以看見的運動。祇有時時地、密切地注視這個波紋的運動，并且比較船的運動和波紋

的運動，我們才能相信，波紋的每一瞬間的運動，是船的運動所引起的，無論船向哪個方向行駛，波紋既不領導也不加速船的運動。自然界的現象是如此，這是它的規律。同樣的現象也表現在歷史現象上。也就是說，歷史現象也有它自己的法則。人們的自由意志，不得不服從這個法則——歷史的法則。

沒有偶然性就沒有歷史，但是歷史的必然性是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的。不應該把歷史看作是個人意志的表現。對客觀法則理解得越深刻，就會發現個人意志和行動的限制性，也可以說個人的自由意志是很有限的。因此，不應該把歷史上錯的、壞的、甚至是罪惡的個人意志，過分地歸罪於個人。也就不應當把那些對的、好的、善良的個人意志，過分地歸功於個人。我要本着這個精神來思考問題。對前者不必那麼深惡痛絕，對後者也不必那麼頂禮膜拜。還有一種人在歷史中又不對又不錯，又不善又不惡，其實他們祇是跟着說、跟着作，獨立好像倒是獨立，是觀潮派，甚至潮也不觀，隨波逐流，并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們的自由意志就表現在他什麼話也不講。對這種人，他們在歷史上并不起什麼作用。對這種人，如果我們了解了必然和偶然的關係，那麼對人物評價的時候，就不必隨着風向，把他們時而說得那麼好，那麼偉大；風向一來，又把他們說得那樣壞。

馬克思對那些隨意編寫歷史的人，有這樣諷刺的話：「紙張永遠是容忍你在它上面亂寫的。」他還說，正如醫學上的妙手回春的神醫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對自然規律的無知作

爲自己的基礎一樣，社會領域中的神醫和萬應靈丹，也是以對社會規律的無知作爲自己的基礎的。他還說，歷史唯心主義的達賴喇嘛和真正的達賴喇嘛有共同的地方，即他們甘願使自己相信，似乎他們賴以獲得食物的世界，這個世界離開他們的神聖的糞便，就不能夠存在了。

馬克思認爲對資產階級革命家，對這些偉大人物作評價時，不要一講到法國大革命，一講到拿破侖，就誇大這些偶然性歷史人物的個人作用。爲什麼把這些人說得那麼偉大呢？早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那一年），就有人說（巴黎革命周報上的警句）：「偉大們所以看起來偉大，祇是因爲我們自己在跪着，站起來吧！」歷史活動是群衆的事業。要想站起來，僅僅在思想上站起來，而現實的、感性的、用任何觀念都不能擺脫的那種枷鎖仍然套在現實的、感性的頭上，那是不行的。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別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們的歷史編纂學家却還沒有達到這一平凡的認識。不論每一個時代關於他們說了些什麼，想了些什麼，他們都一概相信。（因爲他們是從檔案上看到的嘛！或者是根據書上講的。）馬克思認爲這種研究歷史的方法，以及它們爲什麼占統治地位的原因，是同一切思想家、政治家的主觀主義的幻想聯繫着的。他們從自己的獨斷的主觀偏見出發，從他們獨斷的玄想和曲解出發，他可以不受事實和邏輯的約束，他可以放心地解開纏繩，讓自己思辯之馬自由奔馳。

馬克思對歷史學家的說法，同托爾斯泰的說法差不多。馬克思說，對於這個非凡人物（指拿破侖）的評價，那就是他統治得越久，他就越應該遭到他最終的命運，就是打敗仗、當俘虜、流放，被囚在一個小島上。在他當皇帝這樣一件事情上，我並不準備責備他，因為這是歷史決定的。在資產階級已經在法國確定了統治，而人民又漠不關心的情況下，不可能有別的出路。但是拿破侖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為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迹，反而極力和它妥協，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拜倒在正統主義的原則之前。他同這些皇帝結成同盟，因此很自然，真正是正統的帝王們，便要把篡奪者踢出自己的圈子。所以馬克思說他統治得越久，越是注定要被拋棄，因為他倒退，是違背歷史發展的。

後來的歷史學家把反拿破侖的戰爭說成是多麼偉大，把俄國的沙皇、德國的皇帝說得那麼偉大，把英國也說得那麼偉大，這也不對。馬克思說，要是反對拿破侖的戰爭確實是爭取自由、反對篡政的戰爭，那麼在拿破侖垮臺之後，所有被拿破侖徵服了的國家，都應該宣布實行資產階級的原則，也就是平等的原則，應該享受平等原則帶來的幸福，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這就證明他們的原則不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爭取自由。所有一切戰勝國都把拿破侖的垮臺看成是法國的覆滅，和正統主義原則的勝利，封建王朝的勝利，結果他們當然都在自己的國家裏恢復了這種原則。

拿破侖是法國農民的綱領，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綱領，但不能把毛澤東等同於拿破侖

歷史上法國大革命以後、特別是拿破侖以後的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歐洲的歷史，同我們今天十月革命以後的歷史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同中國革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所以我把這一段歷史，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來分析。馬克思距離拿破侖的時代還是很近的，他當時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有好多對中國革命至今還值得思考。

法國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馬克思認為，拿破侖是充分表現了一七八九年新形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的人物。在農民眼中，拿破侖不簡單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拿中國共產黨來說，我們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在農民的心目中毛澤東也是綱領。但拿破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而毛澤東在農民的心目中，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中國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利益的代表。我們進行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可是解決農民問題這一任務本身又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并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一點確實象拿破侖。馬克思說，法國農民把革命得到的利益，全都歸功於拿破侖。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造成了一種迷信：有一個人，叫拿破侖，他使農民得到了利益，還可以把農民失去的利益還給他們。這個科學分析，我認為是很重要的。我自己過去對這一點還弄不清楚。農民，主要是小農，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權力，能從上面賜給他們水和陽光。這也就是我們說的

紅太陽。在這些農民的落後、迷信的思想中，行政權力、黨和政府的權力，要表現為一個人或幾個人、主要集中到一個人的權力，來支配社會。不是社會決定個人，決定權力；而是個人權力來支配社會。這正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的一種落後的意識形態。這種迷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極端。在批判個人迷信時，我深感過去沒有用馬克思的觀點來批判。所以後來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身也分析為不能算是真正無產階級性質的運動，而是大量的農民觀點、小生產者觀點泛濫的運動。人們在清算、批判這個運動時，往往沒有去接觸到它的階級根源。這種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個人的恩賜，看成是上面的恩賜，這是不開化的觀點。這種迷信不是科學，不是理智，而是偏見，而是愚昧。這並不代表農民的未來，而是代表農民的過去。我以為必須充分地了解、研究、認識這一點。

這同我自己的一生也有關係。我從不了解農民到比較了解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一個學生到一個革命工作者，最重要的轉折點就是我到了農村，接觸了農民，參加了農民運動，逐步地了解了農民。但是，我在清算我自己的人生時，還不能說我自己以及我們的黨已經真正地完全地科學地解決了對待農民的問題，更不能說已經解決了農民問題。我們在土改中確實保證農民得到了土地。拿破侖在他那個時代，也確實鞏固和調整了一些條件，保證農民得到土地，保證農民無阻礙地利用他們分到的土地，滿足了農民強烈的私有的欲望。在分配土地這一點上，我們比拿破侖作得更徹底。但是我們在有些地方還不如拿破侖：我們在分

配土地以後，很快地就在所謂蘇聯經驗的框框下，又使得農民不能無阻礙地使用自己的土地。合作化是對的，但步子邁得太快，實際上使農民又喪失了對土地的無阻礙的使用權。「六十條」和聯產承包責任制糾正了這一點，但土地仍然是分散的，小塊的。拿破侖以及他的後繼者不曉得，小塊土地正是在繼續發展過程中使農民陷入貧困的原因。地產的分散，也就是拿破侖在法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所有制的形式，在十九世紀初期原來是保證法國農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而後來，這種所有制的形式，就成為農民受奴役和貧困化的原因了。

拿破侖關於農民的一切觀點，包括當兵，同我們也差不多。他的軍隊是農民的武裝。毛澤東也說過，我們的軍隊是武裝起來的農民。軍隊成為農民的光榮。這一點也沒有錯。因為我們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才有了有戰鬥力的軍隊。因為我們有了武裝了的農民，得到了利益的農民，我們才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取得了勝利。但是毛澤東不是拿破侖，毛澤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建設和改造農民軍隊的，而拿破侖是把他的觀點停留在小農的觀點上，他的愛國主義是以農民的感情、以農民的思想來表現出來的。而我們的愛國主義不限於這一點。可惜我們對這一問題也沒有科學的分析，包括我自己在內，過去也沒有深刻的研
究。愛國主義不能僅僅是農民的觀點，不能是籠統的排外的觀點，不能以愛國主義反映農民的意識形態同本質。因此如何把愛國主義從民主革命時期、從反帝反封建時期的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祖國結合起來，提高一步，而不要重複過去的陳詞濫調，特別是在現在這一新

的時代，就更有必要。

不能把毛澤東的思想同拿破倫的觀點等同，或降低到拿破倫的觀點，把一切都停留在不發達的、以小塊土地為基礎的、小生產者所抱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馬克思時代已衰老了，變成荒謬的了，已經變成幽靈的魂魄了。我們直到今天還必須把徹底解決農民問題、正確解決農民問題，提高到戰略地位，當成我們的首要任務。但是這絕不能意味着我們要鞏固農民的小塊土地，那就是把自己降低到拿破倫的水平。另一點拿破倫把外國軍隊趕出法國的國境，趕得越來越遠，有這兩條，農民就欣喜若狂了，就一口一個拿破倫萬歲了。這一點，我們也切不可停留在拿破倫的水平上，切切不可以爲，經過土改和戰爭，有這麼多人擁護我們，就放心了。不行。

法國歷史上，波旁王朝一八一五年就復辟了，拿破倫就失敗了，貴族又要求得到他們在革命中失去的領地。農民看到這個是對他們革命全部成果的威脅，因此法國農民對波旁王朝刻骨仇恨。在我們中國，還沒有發生過這種復辟。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復辟是不斷發生的，但是很快法國又發生革命，叫七月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又一次保護農民占有自己的土地。但在這以後，農民就不再關心國家的一般利益了。他們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他們的土地不再受到威脅了，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父親保存了二十五年之久的三色旗，又交還給他們，他們又舉起這個旗幟，這個旗幟又在他們村子的屋頂上迎風飄揚了。這時候農民再也不關心一

般的國家利益了，因為這祇是爲資產階級革命開闢道路。新的壓迫是在現代化的、合乎時代的精神下進行了。農民是看不到新的階級關係的，農民不可能要求消滅這種新的關係，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他們還是祇知道拿破侖法典，祇知道自己的小塊土地。法典被農民認爲是現代的聖經，可是對他們來說，已經變成了鞭子。

要看到拿破侖法典和農民的小塊土地的二重性。既要尊重農民對土地的利益和感情，又要使農民不束縛在小塊土地上。所以我們過去一直是主張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合作化道路。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以及現在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並沒有從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經驗中科學地分析這個二重性。我曾經作過調查，農民最滿意的時候是初級社，就是土地不歸公，那個時候農民積極性最高，農民也最高興。但是我們走得太快了，而且把主張慢一點的人說成是小腳女人，這就越來越不尊重農民對已分得的土地的利益和感情。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最大功績，首先也表現在解決這一問題上。但又不能停留在這一點。將來還要實現社會化的大農業。這個經驗直到今天並沒有很好地全面地總結。

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但不能避免資本主義革命要解決的歷史任務

法國大革命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其次就是資產階級問題。法國大革命是反封建的，徹底反封建的，它爲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解決了農民問題，解決了把外國侵略者趕出法國的問題，這實質上也是農民問題。如果法國大革命沒有這個基礎，就不可

能取得任何成功。而這個成果，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必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資產階級啓蒙的思想家，他們為法國大革命作了思想準備。他們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設想成、也說成是多麼美好的社會，而且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社會。這個社會是實現了，但是這個社會的現實，即法國大革命實現的資產階級社會，決不是啓蒙思想家們想象的、所說的那種絕對合乎理性的社會，絕對合乎理性的國家。這種資本主義啓蒙學家所說的理性國家，可以說在法國大革命以後是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實現了，但它是在恐怖時代實現的。在法國大革命初期的恐怖時代實現的。丹東在恐怖時代被送上了斷頭臺，但他還是昂起了頭。在被斬首時他還說：「畢竟人權宣言是我寫的。」他寫了人權宣言，但他上了斷頭臺。在法國大革命中，在城市起作用的市民等級，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信心，為了擺脫恐怖，起初是求救於督政府，最後是依靠拿破崙的專制統治。在這個所謂理性社會裏，在這個資產階級社會裏，犯罪一天比一天增加，舊的、過去明目張膽的封建罪惡，暫時收斂了，但是，以前暗中偷着幹的資產階級罪惡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是一「博愛」，而在競爭的詭計中，你死我活，互相嫉妒，互相制服對方，壓倒對方，巧取豪奪，這種「博愛」在這個當中實現了。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為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杆。淫亂增加到前所未聞的程度。這種新社會的出現，這種資產階級社會的發生和發展，同啓蒙思想家的華美的言論比較起來，這種理性的勝利，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制度和

政治制度，竟然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以法國大革命爲代表而出現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情景。馬克思說：法國的資產階級高聲嚷道，現在祇有盜賊才能拯救財產，祇有違背誓言才能拯救宗教，祇有私生子還能拯救家庭，祇有混亂還能拯救秩序。以奠定這種秩序爲名而造成真正的無政府狀態，這樣就使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失去了靈光，成爲贅瘤，成爲可笑的、可厭惡的東西了。這是一種什麼情景呢？馬克思還把它描寫爲：無論什麼地方，到處是一樣，貪圖不靠生產而靠騙他人財產來發財致富，不健康的、腐朽的欲望泛濫橫流。投機取巧得來的財富很容易，自然是要尋求開心的用場。於是享受變成了享樂，變成大吃大喝和淫蕩。金錢是同污垢和鮮血同歸一流。祇要錢不要臉了。不爲榮譽花一文錢，因爲榮譽不能帶來任何利潤。社會上不少的人，上層社會的人同下層市民想的都是錢，於是乎笨拙的狡滑，奸詐的天真，矯揉造作的高尚，自欺欺人的迷信，令人傷心的滑稽戲，荒誕絕倫的顛倒時代的現象都出現了。這是世界歷史的笑話。

這就是馬克思的描述。這個描述在某些方面，是不是也像我們現在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上發生的情形呢？這一點我們要對照一下。我們要復習這一段歷史。這并不是偶然的。這是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掃除了封建束縛以後，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以後，必然出現的現象。必然出現這樣一個社會。而這一個社會在誕生到世界上來以後，就是這樣一個景象。這叫作歷史的玩笑。馬克思說：歷史就是這樣捉弄人的。這種歷史的玩笑，在典型的資本主

義社會——法國，它經歷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它出現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也出現過恐怖時代，出現過皇帝復辟，然後又出現過共和國，又出現了復辟，又出現了共和國，出現了這樣多次的反復。在這樣一個資產階級社會誕生以後，在資本主義初期出現的這樣一些情景，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我們同法國不一樣，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掃除了封建制度的，在新的歷史時代當中，我們根據中國的特點，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我們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掃除了封建制度，也必然要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我們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是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它必然有舊社會留下來的痕迹，可能還不祇是痕迹，還有種種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并不因為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它就沒有了。我們中國的歷史，同任何其他國家的歷史一樣，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在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以後，還是被小農經濟、被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包圍着。它一方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一方面是保留封建制度殘餘的土壤。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我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但是客觀的社會發展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掃除了封建制度以後，社會必然出現的一些好的東西、以及壞的東西，都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任何個人沒有辦法來阻止。它也不以我們中國的大人物或者

說主要領導層的意志為轉移。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層，也沒有辦法完全避免在中國出現象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初期甚至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出現的那些東西。這些東西有些已經在中國出現。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也還是可以重演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的那些醜劇。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在一九五七年打鑼敲鼓慶祝北京市一天之內進入社會主義，「消滅」了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把「人民公社化」和公共飯堂，當做一次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試驗。這個試驗失敗了。不是推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對生產力的破壞，後者甚至導致了普遍貧困化乃至餓死人。毛澤東親自領導和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條」，我是參加起草的。農民最高興的就是解散食堂和允許自留地。毛澤東想要純粹的社會主義，甚至想要共產主義的天堂，想要割去資本主義尾巴，已經在實踐中證明不是科學的，也是行不通的。

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正是法國大革命以後不到一百年，有幾十年吧，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幾十年。我活了七十歲，我也經歷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到現在為止，我比馬克思活的年紀還大，我沒有碰到馬克思的時代，我也不會看到馬克思那個時代裏他所看到的那些問題。但是馬克思所總結的、他那個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後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它雖然是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有積極的方面，但它不可避免的會有種種醜惡現象、消極的東西。同樣的事情我是看不到，但我從馬克思的書上看到了，再來考察我所碰到的、社會主義社會所碰到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所碰到的現象，

雖然不是完全一樣，但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這些東西絕不是用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的。不能因為我個人不高興，它就不出現了。也不因為有任何大人物不高興，它就不出現了。也不是用簡單的方法就能解決的。「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我是非常重視列寧的這句話的，據我所知，毛澤東也很重視這句話。其他主要領導人也很重視這句話。但蘇聯革命七十年了，這問題解決了沒有？沒有。我們講這句話，也講了幾十年了，是不是解決了呢？也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就能解決的問題，是要幾個世代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思想的、文化的各個領域不斷地解決問題的一個積累的過程，才能使我們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地完善和發展，才能在發展積極面的同時，把消極面消除。這是從馬克思對他一生所碰到的問題——資本主義革命同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問題——的總結當中所感到的，值得引起自己思考的問題。

新中國也還有徹底鏟除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

馬克思還分析了，一七八九年以後，法國的貴族階級怎麼樣呢？封建殘餘怎麼樣呢？法國是反復出現復辟的。馬克思分析過奧爾良黨，說它是反革命勢力最適合的盲目的工具。對這些人，也不可以低估。他們被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剝奪了財產，後來一部分所謂正統派，當上了拿破崙的奴僕，為拿破崙服務，他們又恢復了原有的產業。大部分的正統派，這些被剝奪的封建貴族，他們不是投靠拿破崙，而是在復辟時期得到了大量的賠償金，十億法郎，又

私下得到了封贈，所以又重新置了產業。他們退出了積極的政治活動，但他們還是有地位的，有的還提高了地位，回到故鄉去了。馬克思說，這些人的特點，是對於過去什麼也不忘記，什麼也不學會。難道這不值得我們深思嗎？法國人以為所有的封建貴族已經被埋葬了，後來看到他們又重新出現了，在法國人民看來，感到驚訝和耻辱。

這一點，我們和法國不一樣。我們的舊社會的代表人物跑到臺灣去了。他們並沒有完全被埋葬。他們的主要人物在臺灣，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資產階級化了。並不是什麼也不學會。他們有的人學會了資產階級的一套。我們不感到驚訝，也不感覺到耻辱。我們還歡迎他們回來看看。我們要實行一國兩制。我們這邊是社會主義制，他們那邊是資本主義制。都不是封建制。但是馬克思總結的歷史經驗，對我們還是有用處的，不管在大陸，也不管在臺灣，都有封建殘餘。在大陸的封建殘餘，這些人作用不大了，更重要的是在我們自己身上，有些人還是被舊的封建幽靈纏繞着。在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組織上、思想文化上都有這表現。有些人把「塊塊」當作自己的領地，把「條條」看作封建行會，置民主與法制于度外，妨礙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也是封建殘餘意識的表現。

馬克思有一個重要結論，這是在馬克思的時代，先進的法國人面臨的問題，就是法國不僅需要進行十九世紀的革命，（也就是新的革命、新時期的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要把封建制度的殘餘、封建餘孽、封建思想，

象牲畜一樣趕到屠宰場去，把這些舊的、資本主義前的這些舊的東西，讓他們走到自己的歸宿地——也就是屠宰場去。

我們同法國是不一樣的。我們已經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可是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并不等於社會上一切東西都自然而然就是社會主義的了。不是祇要挂上社會主義的招牌，就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了。不是的。我們還要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這要貫穿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這個鬥爭又是很複雜的。因為我們掃除封建制度後，根據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我們必須允許（不允許也不行）資本主義有一個正當的發展，而同時又要同我們不允許的資本主義的醜惡現象以及一切醜惡的東西作鬥爭。話好說，界限難定。我們要在這個鬥爭中總結歷史教訓。要有一個度，要有一個量同質的規定。沒有量的規定性，就沒有質的規定性。我們常常在這方面犯錯誤，到現在也難以避免，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作科學研究，制定正確的政策和法律。就是說，我們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當中，要不斷地使社會主義制度繼續完善和發展，這種完善和發展叫什麼呢？叫革命也好，叫改革也好，就是要繼續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革命。對我們來說，這種改革是同資本主義道路相對立的，這是主要的。但是不能忘記，還有另外的任務，這可以說是次要的，但是它是重要的，有時也會成為主要的，這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法國一樣，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還要看到資本主義革命的任務並沒有徹底完成。一七八九年性質的革命、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任務也還需要徹底完

成。對於這一點，我個人認識很差，也很晚。我過去總是過高地估計了民主革命的徹底性，過高地估計了它的不徹底性。在中國，這個革命任務還不小。在許多方面，甚至還浸透在社會生活當中，浸透在政治生活當中。這一點，據我自己看來，除了我本人之外，別人也如此。甚至有些重要領導人也如此。甚至還有人把封建主義的東西，當作反對資本主義的武器。他們不是用社會主義的武器來反對資本主義，而是搬出封建主義的貨色作為武器，去反對資本主義。這不是前進的東西，也可以說是後退的、倒退的東西。我親身經歷的種種情況都證明了，除資本主義的污垢之外，還有大量的封建主義的污垢要清除。民主革命的任務，要徹底完成，在我們中國也還是十分繁重的任務。

不讓資本主義洪流泛濫，只能疏導而不可硬堵

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這方面，我們在實踐上遠遠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寧的眼界了。但是馬克思指出的清除封建制度後不可避免地出現資本主義社會，關於這方面的分析，至今還是光輝的。資本主義的積極面和消極面，都是值得我們作科學研究的。不研究就要吃大虧。用一個人的手，或更多人的手，是擋不住真正的洪水的奔流的，是抵不住這個客觀社會發展的必然法則的。不能阻擋歷史洪流發展的。怎樣正確地疏導這個洪流，按照它自己奔流的規律性加以引導，而不是祇堵住它，不讓它泛濫。在這問題上處理不好，就要吃大虧，就要被洪水所吞沒。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最

大的教訓就在此。而蘇聯的教訓，我們也沒有認真地加以總結。

列寧的《兩個策略》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他把資產階級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相區別而又相聯系。列寧死於新經濟政策時期，他已經知道在建立社會主義以後，在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以後，資本主義完全不發展、不許發展，是不行的。資本主義應該有它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發展，這個客觀規律，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不可避免。俄國是落後的，俄國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農民解決土地問題以後，不能主觀地阻擋資本主義的必然的發展。但是列寧不可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這問題。後來蘇聯一直沒有解決這問題，結果是走向了反面。現在面臨的問題，它被資本主義吞沒了。並不是西方的和平演變把它吞沒了，而是因為它主觀地阻擋對蘇聯發展生產力有利、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那個資本主義潮流。資本主義必須、也不能不為自己求發展，這是客觀規律。我們不走這條路可以，但是一定不讓它發展，那不行。並不是西方把蘇聯和平演變了去的，而是它自己社會裏的資本主義勢力結合着封建殘餘勢力把它吞沒了。這是七十四年的歷史了，不是一天。當然不是說蘇聯的七十四年都不對，不是說這七十四年他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都不對，都不好。我以為他們的領導人至今也還不懂科學社會主義，不知道應該引導什麼，應該把主流引導到什麼方向，應該堵什麼東西。他們把主流當成不好的東西，但從特定的意義上來講，確實是祇知道堵資本主義，是不行的。象俄國、中國這樣的國家，封建的東西比法國更嚴重，

祇反資本主義、不反封建主義，也是不行的。從社會主義建立之時起，或者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或勝利之日起，就需要在社會領域內、在經濟領域內、在政治領域內、在思想領域內、在文化領域內，立新除舊，把社會主義建設好。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終結，而是另一種新形式下的開端。這個開端，今天叫改革，這個詞是很好的，但這個詞要有科學的含義。

馬克思所總結的、實際上也是他一生所碰到的以法國為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所產生的問題。馬克思並未見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巴黎公社祇存在了七十二天。但是馬克思總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對我們今天是很有用處的。

封建制度掃除後，必然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我們不能讓資本主義泛濫，是對的。

資本主義有積極的方面，優於封建主義；也有消極方面，有種種醜惡的現象。我們定了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列寧也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斯大林也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掃除封建制度以後，必須允許資本主義有適當的正當發展，既然允許它發展，而又要純粹的、好的資本主義，那是空想。空想的社會主義不行，沒有；空想的資本主義也不行，也沒有。又要允許資本主義有適當的發展，又不讓它泛濫，這就要研究全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沒有這個調查研究，沒有相應的理論、方針、政策，就一切都是空話。因此我們不能閉眼不見這個資本主義、新資產階級的存在、發生和發展，但必須要有領導、要有限

制。

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試圖用種種辦法，發動種種運動來阻擋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果都失敗了。決心越大，失敗越大。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災難。結果不但是資本主義擋不住，相反的在大革命的口號下出現大倒退，在大民主的口號下出現大專斷，在自己解放自己的口號下出現大迷信，自己奴役自己，出現無政府主義。這些都是以小生產者爲基礎的，還存在封建殘餘的社會表現。這是最慘重的歷史教訓，也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而合乎歷史規律地改弦更張，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的功績。

給俄國社會主義唱挽歌的人，必將成爲俄國社會主義遺囑的執行人

現在世界地圖的重畫，引起了很多人的驚奇和迷惘。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奇怪。歷史上經過了多次世界地圖的重畫，歷史仍然按照它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我生下來到這個世界上碰到的第一次世界地圖的重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是同蘇聯的誕生、十月革命的勝利同時發生的。這賦予它新的意義。現在的這一次大的重畫，是由於蘇聯的解體。沒有經過戰爭形式，但這一次重畫也使全世界發生巨變。馬克思說，世界不是一直不變的，它不斷出現新的問題、新的利益、新的關係，不可能停止，就像不可能把一匹馬的尸體的腐敗過程停止在一定階段，防止它完全腐爛一樣。舊的東西的滅亡，新的東西的發生和發展，都是不可避

免的。

在法國大革命即一七八九年以後，世界地圖經歷了幾次重畫。法國的勝利重畫了世界地圖。一七九二年初，歐洲的封建專制的國家結成反法同盟，來幹涉法國的革命。這種幹涉來自普魯士、奧地利、沙皇俄國，他們結成同盟。英國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它也參加了這個同盟。這種武裝幹涉的戰爭一直延續到拿破崙的失敗，即一八一五年滑鐵盧戰役法國失敗為止，結果是恢復了法國的帝制。反對共和國的歐洲國家同盟取得了勝利，這又發生了世界地圖的重畫。所有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無一不復辟帝制。但是歷史的發展却還是沿着資本主義道路前進着。

馬克思說，那些給一八四八年革命唱挽歌的人，必然成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遺囑執行人。這是一個有名的預言。

資本主義大革命以後的歐洲，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誰也擋不住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另一方面，又是不斷的、而且普遍地復辟。普遍地不要共和國，普遍地宣布恢復宗教勢力，普遍地宣布要舊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歷史，到現在僅僅才七十四年，東歐就更短。現在又發生一個普遍的現象，像過去要恢復帝制、恢復封建制、恢復國王、恢復貴族地主一樣，今天從蘇聯到東歐，都宣布要恢復資本主義。歷史何其相似！我們復習資本主義的這一段歷史，難道就沒有教益嗎？把這一段歷史研究清楚，才能對我們現在生活的這一段歷史有個更

透徹的了解。沒有歷史就沒有理論，沒有理論就沒有方向，沒有指南，就會瞎動。我們應當研究這一段歷史，為什麼着重研究它？因為這一段歷史是經過馬克思總結的。以後的歷史，就沒有馬克思去總結了。列寧的總結有人還不大相信，斯大林的總結有人更不信。毛澤東又很少總結世界的歷史。所以我着重學習、探討，結合着自己的經歷來研究馬克思所闡述的這一段歷史。這一段歷史同我們很相像。經過這樣的研究，對於資產階級革命同無產階級革命以後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我們就不必那麼迷惘了。

要相信歷史發展的規律。一些不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東西，它就站不住。不管你打着什麼旗號，要看你的真貨色。你的貨色是符合社會發展的，誰也擋不住。你的招牌雖好，貨色是假的，不符合歷史發展，它就站不住，就要被淘汰。這不值得惋惜，不值得悲嘆。打着資產階級革命旗號的拿破崙，他所作的不好的事情，不對的事情，非正義的事情，就站不住。他作的符合歷史規律的事情，就站得住。盡管把它的招牌換了，內容換不了，實質變不了。荷蘭是被法國占領的國家，當時叫巴達維亞共和國，是法國的傀儡。荷蘭原來是比英國早一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在海外占領許多殖民地。荷蘭的資金同技術，造就了英國。英國代替了荷蘭的地位。荷蘭衰落了，成了被法國占領的國家，成了傀儡、附庸。但它的名義叫共和國。歷史上有多少這樣的例子，它可以用共和國的旗號，實際上是附屬國、衛星國、附庸國。拿破崙失敗以後，荷蘭恢復了帝制，取消了共和國。直到今天，荷蘭還有女王。但荷

蘭是不是恢復了封建制度了呢？不是。並沒有阻止荷蘭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潮流。荷蘭的資本主義一直在發展。歷史的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樣來看待歷史，我們的眼界就更亮堂一點。不能祇看招牌，叫社會主義共和國，就一定進步嗎？現在他說我不要社會主義招牌了，我就叫共和國了，或者叫資本主義共和國了，真的這樣嗎？歷史的發展，人民的選擇，是不可抗拒的。

馬克思曾多次分析，恩格斯也繼續作了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海外市場的爭奪、占領，也就是殖民主義的強盛和衰落，是此起彼伏的。首先強盛的是意大利、威尼斯，然後它衰落了，它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到荷蘭，荷蘭成為最大的殖民主義國家。荷蘭也象意大利那樣，為英國的強大奠定了基礎。好多荷蘭發明的東西在荷蘭不能用，在英國才能用。一個是資本，一個是技術。當時馬克思在他的時代就預見到，英國必然而且已經開始一步一步用它的資金、技術造成美國的強盛。美國沒有舊的包袱，沒有舊的殘餘制度的束縛。美國的革命是徹底的，美國解決土地問題是最徹底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雖然它當時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看到了，美國一定會代替英國的地位。歷史難道不是證明了這一點嗎？

那麼，現在的世界能夠永遠成為美國的一統天下嗎？絕不會。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除蘇聯同蘇聯的勢力範圍以外，它的勢力逐步地延伸到全世界。在蘇聯解體後，它又成

爲唯一的超級大國。本來是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現在蘇聯已經土崩瓦解了，一去不復返了。但切切不可被現象所迷惑。實際上美國老早走下坡路了。它已經造就了日本、西德（現在是統一的德國）。絕不能永遠維持美國的統治。它到處伸手、到處占領、到處幹涉，其結果是自己陷入困難的境地。有的情況是吞下了炸彈。實際上他現在已經無力來作世界警察，軍事上有強大的力量，經濟上沒有錢。如果從表面上看，社會主義在大多數國家是失敗了，倒退了，改朝換代了，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佔了優勢。但是社會的發展決不能永遠這樣，資本主義決不能永遠一統天下。

美國的社會制度自己就不變了嗎？不會的。馬克思時代，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在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研究對象，當然主要是美國。美國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國家，美國離完全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比我們的路程要近。這是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他們都說解決社會化的問題要比解決所有制問題和政權問題困難得多，花的時間要長得多，也要複雜得多。所以那些叫嚷社會主義已經唱了挽歌的人，宣傳社會主義已經滅亡的人，他們也必然違背自己的意志，成爲那些已經死亡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遺囑執行人。這些歡呼者，這些送葬者，他們會成爲、也必然成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遺囑執行人。

社會主義的思想，并不是馬克思發明的，更不是列寧發明的，更不是毛澤東發明的。社

會主義這個思想，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當中產生的，特別是現代工人階級一產生，就暴露了、也使人們看到了資本主義除了它的積極的、革命的、前進的因素之外，還有黑暗的、骯髒的、消極的東西。因此，資本主義產生以後，就有社會主義思想萌芽的產生，就有建立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加合理的制度的思想。那時候並沒有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的時代，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產生於任何一個人、那怕是天才的頭腦中的，而是實際地不依賴人的意志和行動而客觀存在着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的衝突在人類思想上的反映。也就是說，社會化的生產，已經使得全部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而且日益不適用了。生產資料和社會生產，實際上已經革命化了。因為它已經變成社會化的生產了。這種革命化的、社會化的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它絕不會永遠服從資本主義的占有和所有權的形式。在馬克思的晚年，他就說現在再也不能說資本主義是無計劃的了，它已經不全部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狀態了。生產的社會化的發展，已經迫使資本家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了。他已經把大量的生產資料推向股份公司那樣的社會化的形式。計劃和市場，壟斷和競爭，并不是互不相容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就明確地指出，股份公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否定。因為它使資本成為社會化的資本，而且把資本的所有權同企業的經營權分開了，掌握資本所有

權的人，他們變成了剪股息的人，變成了露骨地對社會實行剝削的人，因為它並不從事經營管理，而經營管理的廠長經理，也變成社會的職員，變成社會化生產的雇佣勞動者了。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永久容忍有一小撮人專門靠剪股息來進行投機。

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把整個社會生產的管理職能擔當起來，已經不是資本家個人的、分散的、無政府狀態的經營管理了，而是社會化的生產管理了。這個生產勞動越加社會化，離科學的社會主義就越近。列寧有句名言：德國的卡特爾是高度社會化的組織，它同社會主義之間沒有任何中間階梯了。相反的，俄國雖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生產社會化的管理程度很落後，它離科學社會主義反而更加遙遠。因為社會化這個過程更長、更復雜。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化的程度更是無比的高了，生產方面，流通方面，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高度發展的社會化。作爲一個科學社會主義者，不重視、不研究、不學習這些國家的高度社會化的組織和經驗，不從這裏頭去吸取養分，不承認這個現狀，不懂得這個東西，是不行的。當然說這個東西就是社會主義，那是絕對的。但是這都是社會化，是對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的一種否定。拿馬克思的話來說，是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的投降。爲什麼我們不講這些道理，還是像小孩一樣，像蘇聯的教條主義那樣講？在斯大林以後，也還是那麼僵化，那麼不接受新事物、不學習新事物、不分析新事物，一定把世界上的東西說成：我這叫社會主義，我就好，他那裏叫資本主義，他就

壞，這是兒童的遊戲、吵架，不是科學，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那時並沒有現在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化生產，可是馬克思已經看到，已經作了科學分析。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呢？為什麼那麼悲哀呢？為什麼對世界發展前途覺得那麼茫然無措呢？

但是馬克思很清楚，股份公司也好，托拉斯也好，國有化也好，這不能叫社會主義。是在保存資本主義的原則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否定，但還不能叫社會主義。列寧說沒有中間階梯，但還有一步之差。這一步之差是本質的差別。因此，說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一個樣了，這種論調也是錯誤的。不是的。它的性質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馬克思時代就已經不得不承擔對社會生產的領導，但是它的性質，還是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正式代表，今天也是如此。馬克思也並不認為，國有化就一定好，就一定是進步的。祇有在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才意味着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着在由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方面向前進了一步，達到一個新的準備階段。但是相反的，如果不是在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情況下，而是人為的國有化，把不應該國有化的也國有化，這就不意味着社會的進步，不意味着向科學社會主義前進。相反，甚至妨礙社會生產的發展。在馬克思時代，就有這種不合乎經濟規律的國有化，那就是在馬克思時代的俾斯麥實行的一些國有化。馬克思認為它沒有進步意義，對它進行了嘲笑。它也沒有推動社會主義生產發展。這一點難道不值得我們作為科學來研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確實有許多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的東

西。我曾經專門研究過美國的農業，我當時寫的材料說：美國的農業是國家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和流通。我當時就說，美國的農業，比蘇聯那個打着社會主義招牌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距離科學的社會主義更近，而不是更遠。我們為什麼祇重視招牌，不重視內容呢？我們為什麼就認為人民公社就是好？事實證明並不好。蘇聯的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就是好嗎？歷史實踐證明，也並不好。凡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的，它就不但不能推動生產發展，而且會障礙生產向前發展，它就不是向科學社會主義前進，而是倒退。這一方面，我們反過來看，也是值得我們總結的教訓。這就是說，這樣的自以為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有的並不地道，帶有空想的成分，并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在馬克思以後，在列寧以後，在斯大林時代，碰到了一九二九年的大危機。這一個大危機是馬克思、恩格斯想象不到的那麼大的危機。列寧雖然說過總危機到來，但他也沒有見到。一九二九年的危機是對資本主義消極面的充分暴露。這是偶然的呢？不是。怎麼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呢？這一點，列寧、特別是斯大林，把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資本主義的生命力，資本主義無力來調節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一點，看得高了。這是馬克思主義者通常的容易犯的毛病。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我不能離開這個時代，不能離開當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其他領導人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我總是把他們估計得太壞。我對《資本論》是讀過好多遍，但是很多地方沒有讀懂，特別是《資本論》第三卷，對資本主義

的社會化生產，以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自我否定，這方面的認識和研究是非常不够的。

長期以來，有的所謂社會主義的衛道士，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都看成是魔鬼，有的所謂自由世界的衛道士，又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看成魔鬼。這都是不對的，這是歷史的特別是冷戰的產物。不能祇看招牌，要看貨色。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形成一種基本矛盾，它有相互對立的一面，但并不一定發展到對抗。同時也有同一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互相轉化。蘇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化，斯大林時代就埋下了禍根，赫魯曉夫時代就開始了這個過程。一九八九年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也正是對斯大林極左路線的懲罰。向全世界宣告，被斯大林扭曲了的社會主義，并不完全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破產是必然的。

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點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探索和堅持要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是對的，是真的。社會主義國家真正實行正確而有成效的改革的，祇有我們中國。我們是以四化建設亦即發展生產力（並改善人民生活）為中心，堅持密切結合中國實踐的、生動活潑的、不斷發展着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實行有方向的、有目標的、有軌道的既大膽而又慎重的改革開放。我國的改革開放的成果，主要表現有四條：

第一條是農村的變革。這是基礎。我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而且是以在農村實現現代化、產業化和社會化為戰略目標。

第二條是發展社隊企業，發展中小城鎮，它們一方面為農村和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提供社會化服務，另一方面接受大城市和外貿的輻射擴散，成為連接城鄉的樞紐，并把城鄉連接為統一的國內市場，加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改善城鄉人民生活的步伐。

第三條是建立和發展特區，并帶動大片的開放區。這就使我國的國內市場同世界市場相連接。我們利用和把握世界歷史上老大的發達國家必然要向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和技術的規律性。「資本是天生的國際派」（馬克思語）。它不管社會制度的異同。特區還為內地的改革提供科學經驗。同時還為將來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創造了條件。我們在這一方面得到了舉世公認的偉大的成功。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在十年的時間裏，已變成為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僅次於上海的現代化大城市了。真是比魔術還奇異。

第四條，有了前三條成就，就推動了我國大企業的改革和全面的改革。大企業是我國實現四化的骨幹力量和領導力量，實際上已經開始從行政化向社會化轉變，開始實現從流通到生產到流通的獨立的循環過程，以擴大再生產。商品經濟是不可超越的。我國已經開始實現並不斷完善着建立在價值法則基礎上的、市場和計劃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我國已經實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我國正在建立和發展沿海和內地統一的國內市場。我國

也開始學會用金融作為幹預市場和調整計劃的經濟手段。我國已成為新的技術革命和新的產業革命時期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場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組成部分。這樣我國才有吃、有穿、有用、有外匯、有外國投資的環境。以此為基礎，各種改革都在前進。我們豐富的實踐經驗，需要上升為理論。

當然，我們不能過高地估計成就，我們面前存在的問題還很多，也很嚴重。但以上四條成果是主要的方面。這才保證了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生活向上，團結對敵（自然界的和社會的、國內外的敵人）。我國不同於蘇聯，中國革命是獨立進行的，是中國式的革命，而且是在反對蘇、美、英雅爾塔會議瓜分中國的協議中取得最後勝利的。中國建設也是獨立進行的，我們一直反對蘇聯的指揮棒和任何形式、任何方面的控制。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叫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才是真正的、生動的、不斷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我們要走的道路還很長，還會有曲折，但是總的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經過反復研究以後，我更加堅信，我這一生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我是死而無悔的。而且我還預言，今天那些搞和平演變的大人物們，吹鼓手們，他們給社會主義的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唱挽歌的時候，他們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主義的遭囑執行人，他們也終將走向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相反。現在不是社會主義滅亡了，而是離開我們所向往的目

標更近了。我們不要把現在的天下看得那麼迷惑不解，那麼復雜，那麼混亂，那麼不得了。不是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作為科學研究，沒有什麼可怕之處，不必那麼膽戰心驚，一天到晚怕別人來和平演變我們。我看他們也要演變，他們的演變才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演變也好，改變也好，過渡也好，總是要用革命的方法，總是一場革命，這是不可避免的。

(中冊)

第三部

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草稿)

我從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關起來了。工作了一年零兩個月，被關了十三年半。這兩個數字，就足夠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獄中備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殘酷折磨，九死一生，這段曲折坎坷的經歷，更令人觸目驚心。由於我個人的命運和黨的命運、個人的錯誤和黨的錯誤密切地糾纏在一起，更增加了人們對我的問題的關注。朋友們都希望我寫一個回憶錄。

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該怎麼認識？該怎麼辦才是正確的？我是應該進行反省和探討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

我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闡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兩次講話中的詞句編輯起來加以系統化，成為一段有名的「語錄」，這段語錄後來被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實踐已經證明這是錯誤的。

我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階段和第三個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為標志」這一錯誤觀點的主要提出者之一。這也是錯誤的。

理論上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黨內和人民群衆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亂，其危害性是難以估量的。

由於理論上的錯誤，導致黨在一系列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敵我界限。在我參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時間裏，黨中央指導運動的重要的指示、決定、通知、社論和文章，我都參加了起草工作。（那個專門整老幹部的「專案組」辦的事情除外，因為「文革小組」成員祇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專案組」之外。）我參加起草的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則，今天看來大都是錯誤的，正確的很少。即使有的在當時起了某些積

極作用，但是，因為是在戰略錯誤的前提下寫成的，因而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雖然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為具體執筆者也有嚴重的責任。我不應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主席。

我一被關進秦城，就開始了反省。我認為，「文化大革命」這一場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主要不是由於某個人的不良動機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這一點我過去是沒有認識清楚的。上面所說的我所犯的理論上的錯誤和行動上的錯誤，都是從這裏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特別是土地改革以後，我就誤認爲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了。其實，我們並沒有把自然經濟改變爲社會化經濟，並沒有把農民等小生產者改變成爲同現代生產相聯繫的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並沒有把大量的手工生產改變成爲機器生產。也就是說，封建主義的墻腳根並沒有鏟除。中國人民還是苦于封建主義，即苦于資本主義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對國民經濟有利的而不是對國民經濟有害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毛澤東語）。我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的二重性，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化和社會化正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們用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武器，時常祇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實質是帶着封建色彩的小生產者的觀點。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性質的錯誤還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後，特別是一九五七年以後，我們的領導人常常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

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以後，並不檢查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這樣，臆造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以至無處不是敵人了，敵人不但跑到黨內來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領導核心中來了。于是，就要「天天講階級鬥爭」，就要「不斷革命」，並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了。這個深刻的、痛苦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

我國沒有經過商品經濟這樣一個大課堂，人們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觀點，就難以爲完全現代社會的文明的、科學的、民主的觀點所代替，更談不到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從深刻的社會的、經濟的、思想的根源來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帶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農民（小生產者）運動，因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倒退性。這個歷史是絕不能也絕不應重演了。

我回顧過去的目的，是爲了現在和未來。我的回憶錄裏要涉及不少人。對所有的人，我從不計較個人恩怨，祇是如實地反映他們在特定歷史情況下的真實的言行，以便探討真實的經驗教訓，爲後人作爲可靠的借鑒。

下面，我就按照時間的順序，回顧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程。

第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發動

一、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

(一) 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文化大革命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對此有幾種說法，有的說從學術批判就算開始了，有的說學術批判祇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從一九六六年三月開始談的。其實可以從一

九六五年開始。現在我就從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會議談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羅馬尼亞開黨代會，勃列日涅夫率蘇代表團去羅，中國是鄧小平率代表團去的。我們的既定方針是在那會上繼續同蘇方接觸，改善同蘇關係。代表團出發前，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集會，參加者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權、王力。會上毛主席大講黨史（我有記錄，整理出來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丟了），毛主席反復講不要怕龐然大物。他說陳獨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經是龐然大物，都不行，都沒有什麼了不起。還說不要怕大風大浪，大風大浪了一定要頂住。這個會本來是討論同蘇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復講上述問題。具體問題講了兩點：第一，罵楊尚昆，說楊尚昆為什麼還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楊尚昆離開北京，說楊尚昆搞竊聽，還說反右派時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這就是所謂八司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辦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書的愛人等八人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後來英文秘書告了狀，毛主席給他們翻了案。他們不知道是毛主席給他們翻的，具體是田家英辦的，他們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會上還罵了鄧力群，說鄧力群當時看了大字報，對打右派的事一句話不講，隨聲附和，這樣的人怎麼能行？那時鄧力群是劉少奇的秘書，所以毛主席這話也是對劉少奇的。第二是談彭德懷，毛主席說，我看要給彭德懷分配工作。毛主席說彭德懷這人是不會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幹實事。毛主席提議叫彭德懷到三線當副總指揮（彭德懷是三軍團的，楊尚昆也是，劉少奇也

是。」小報傳說毛主席請彭德懷吃飯，我沒參加。請吃飯那件事在後，決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這次會上決定的。毛主席還罵楊尚昆從來不檢討，他打右派打錯了，翻過來了，他也不檢討。會上大家說馬上叫楊尚昆走。會開完後，楊尚昆打電話給吳冷西，問會上談了些什麼問題？吳說「我沒參加會，你問王力。」楊尚昆就問我，我不好說毛主席罵他，祇說毛主席在會上大講黨史，講龐然大物。從這次會以及後來的發展看起來，龐然大物是指劉少奇。（這次會上還要給彭德懷分配工作，可見這次會不是繼續整彭德懷。）

一九六五年去羅馬尼亞前的政治局擴大會上，已經提到要批判《海瑞罷官》。這次會康生沒參加，陳伯達參加了，他聽了後沒有什麼反應，彭真也沒有向我們講，我們都不知道。毛主席說要批《海瑞罷官》，常委、書記處同志也不知道。祇有姚溱比較敏感，他說張春橋為什麼經常往來于上海、北京之間？張春橋一定有事。現在看來，彭真對批《海瑞罷官》是不那麼積極，可是也應看到吳晗寫這劇本，是因為胡喬木傳達了毛主席講的「我們要提倡海瑞精神」，他才寫的，可以說是奉命文學。

（二）學術批判和五人小組

下面談五人小組。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組，是為了領導學術批判。那時毛主席對思想文化戰線的情況不滿意，毛主席召集了幾個人談學術批判，他提議搞個小組，要陸定一當組長。那時江青同中宣部的衝突已很尖銳，說中宣部是閻王殿。一九六四年我們去杭州談

外賓事，也談過學術批判，毛主席也對中宣部不滿，可是這時毛主席還要陸定一當組長。陸定一堅決不幹，他說「我幹不了，我見事遲，不能當組長。」陸定一提議彭真當組長，毛主席同意了。小組成員究竟幾個人，也沒有定。毛主席當時祇提了陸定一、周揚，陸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個人。陸定一說要加幾個人，毛主席說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還有康生、吳冷西，這樣就成了五個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個人，叫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不是文化革命小組。當時沒有文化革命小組這個詞。陸定一提議彭真當組長，彭真沒有推辭。這時江青同中宣部的衝突已很尖銳，同彭真的衝突還不尖銳。彭真當組長後，還真的抓，開了些座談會，成立了學術批判辦公室，列了個很大的名單，包括胡繩、許立群、吳冷西、姚溱、王力、範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繩當辦公室主任。當時我推辭，因為同蘇修打交道任務很重，寫《九評》我是專職，中聯部副部長我是挂名。康生也說，王力不參加學術批判辦公室吧！但彭真說不行，非要王力參加。這個五人小組送常委和主席的匯報提綱（即後來的二月提綱）稿子上並沒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姚溱後來加上的。那時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釣魚臺，外號叫「樓長」。姚溱加了個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綱批轉全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字也傳開了。姚溱很得意。二月提綱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劉少奇不在國內。毛主席看了沒反對，壓下了，連個圈都沒劃。後來周總理總結出個經驗：凡是毛主席祇劃圈的，還不

要急着去辦。因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話，他會鮮明地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樣才可以積極執行。如果祇劃圈，那還不行，何況這個文件主席連圈也沒劃。

赫魯曉夫下臺是一九六四年十月以前。周總理率代表團去蘇聯是十一月五日到十三日。赫魯曉夫下臺後我們發表一篇文章：《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這篇文章是我寫的，那時寫國際文章主要是我。秀才班子已沒有了。

(三) 四清問題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發表《二十三條》。毛主席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園經驗，先是王光美作報告，然後劉少奇作報告。在北京懷仁堂講的。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可是劉少奇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裏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劉少奇報告中是說過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這個報告我沒聽。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報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們也在。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江青告狀，祇是覺得報告有些話說得過了，如不蹲點不能當中央委員等等，我們把它勾掉了。後來突然少奇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桃園報告不發了。（這是說的王光美的報告，劉少奇報告沒有送毛主席。）當時在座的有

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發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黨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代表是李雪峰。過去都說白區工作正確代表是劉少奇、彭真，這次說是李雪峰。桃園經驗不發我同意，我當時認為它很左，撇開原來幹部，扎根串連，實際上是搬石頭。那時還抄家，查幹部的筆記本，說裏面有些東西比《金瓶梅》還厲害。噴氣式也是桃園發明的。李雪峰反對是對的。毛主席對桃園經驗也認為劉少奇的一套過左。江青告狀我當時不知道，文革時才知道。文革時江青說文化大革命是她拚着離婚發動的，就是指這件事。毛主席不滿意四清由劉少奇領導，說了些不大好聽的話，如「什麼都叫劉少奇幹就得了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條，是針對劉少奇在四清中的過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陳伯達，陳伯達服了安眠藥沒醒，盡力地記下了十三條。他從來不詳細記。記下一點，趕緊打電話找我，把記下的先理一下，看怎麼理解毛主席的話。他說我寫，寫了十三條，說要搞個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發的。陳伯達對我說，主席要整少奇，怎麼辦？他說少奇同志是很純的共產主義者，現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對黨對國家不利。我說：「主席還是信任彭真、陶鑄的，我建議你去找他們兩人，你們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認個錯，就好了。」這是因為在二十三條之前毛主席和劉少奇有爭論，政治局擴大會上，劉少奇說當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說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的說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會上有爭論。劉少奇堅持四清四不清的矛

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說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矛盾。那個會我沒有參加，康生也沒有參加，陳伯達參加的。我認為毛主席的說法是對的。這時我建議陳伯達等三個人去告訴劉少奇，請他趕緊向毛主席認個錯，毛主席消消氣，就行了。他們三個人找了劉少奇，劉少奇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向毛主席表示檢討，說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說的兩條道路矛盾是對的。劉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因為劉少奇表示了檢討，就沒有整劉少奇，光搞了個二十三條。這樣一來，整劉少奇推遲了一年多。在這點上陳伯達是有功的。關於這事我在秦城寫過材料，說陳伯達有功。那時陳伯達已打倒了，我還是這樣提。我寫的這個材料彭真也看過。現在陳伯達、陶鑄不在了，彭真還在，這件事他大概還記得。

搞二十三條，我從頭到尾參加。主要是我寫，後來又吸收幾個人，有許立群、鄧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劉少奇本來依靠王光美指揮全國四清，二十三條以後劉少奇不指揮了，毛主席指揮。書記處是彭真管四清，抓通縣為重點，二十三條印成大布告到處張貼，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後寫成二十三條。這個文件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這樣提。這裏所說的走資派表面是指農村幹部，實際上是指劉少奇。毛主席認為黨脫離群衆，搞不好黨要變質，政權要變質。官僚機構，舊的機器，如不解決，黨要被打倒。這問題蘇聯解決不了，中國采用了很多辦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學術批判不行，四清這樣比較激烈的辦法也不行，最後才找到文化大革命這種方

式。一九六五年劉少奇還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揮四清了。《歷史問題決議》說在四清問題上劉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當時劉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他對這方面講得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劉少奇在懷仁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強調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還拿出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上面談了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問題。劉少奇要各地加以貫徹。余秋里、谷牧在工業方面加以貫徹。劉少奇強調一看書，二要調查研究。他在會上還誇了王力，說王力是這方面的模範，又研究理論，又搞調查研究。

那時鄧小平抓三綫，劉少奇準備出國，書記處、常委祇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實際上是副總書記。彭真抓兩條，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組。

會開完後，我跟鄧小平去三綫，同去的還有谷牧、呂正操、余秋里。我對這一年多北京情況不太清楚，北京的事我沒有管。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海瑞罷官》，我手裏沒有文匯報，沒有看，姚漆夜裏打電話來，說有重要文章，要馬上看。我請中聯部馬冠華同志給我找了文匯報，連夜送來。當時覺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沒考慮會引起什麼後果。我跟鄧小平上三綫，把文匯報帶着，向別的部長們推薦。我跟鄧小平去了西安、寶雞、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綫建設，也了解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情況。現在看來，毛主席抓階級鬥爭為綱，而劉少奇、鄧小平，想把重點放到建設上。社會主義建

設怎麼符合中國特點？鄧小平考慮要發展小城鎮，解決城鄉矛盾、工農矛盾，兩種勞動制度也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我也在研究這個問題。我把鄧小平同志在三線的歷次講話、插話作了系統整理，成為給鄧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國道路解決城鄉關係問題，不能過度發展大城市，而要發展中小城市。三線的大工廠必須有小工廠為它服務。部隊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處，也很有成績，又省錢，工程又搞得好。對這問題，劉和鄧沒有交換意見。劉從理論上提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鄧小平看三線，從實踐中解決這問題，解決兩種制度問題、城鄉關係問題、工農關係問題。我覺得兩方面要結合。我整理了馬克思列寧對這問題的觀點，也整理了鄧小平在三線的講話。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統的會上印發了。紅旗雜志給鉛印了。鄧小平的談話同後來提的發展鄉鎮企業的方針有關系。前幾年我到廊坊參觀，回來後寫了個報告，也提到這問題。

鄧小平在三線沒搞完就停了。十二月中央打電話要鄧小平立即赴上海，因為發生了羅瑞卿事件。當時誣蔑羅瑞卿篡軍反黨，把他調離，楊成武擔任代理總長。鄧小平走後我們留在昆明，閻紅彥招待我們。他們發現了盧漢埋藏多年的白蘭地，用這個招待我們。鄧小平走後，羅瑞卿來了。他自我感覺很緊張，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打聽怎麼回事？為什麼開會不通知他？我們也不知道。後來又來電報要羅立即赴上海。後來知道已經採取了措施，防止羅逃跑。文革時批判李井泉，說羅瑞卿到成都，李井泉還送給他兩筐桔子。其實當時方針是

先穩住羅，羅到上海後就沒有自由了。

(四) 《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個人，說要出版五本馬列原著，有《共產黨宣言》、《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要他們五個人每人寫一篇序言。毛主席對他們談了很多話，講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德懷也是海瑞，等等。他們五個人商量的，由關鋒、艾思奇作記錄並整理，主要是關鋒。記錄整理後給胡繩、田家英看，當時他們都沒有說什麼。後來田家英說，關於彭德懷這一段和主題無關，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認為這是重大原則問題，我們有責任全部整理出來，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繩說就不要吧，關鋒沒有表態，最後是刪掉了。後來五六通知起草小組把這事提出來，關鋒說了說當時情況，說到田家英當時要刪去這一段，這成了田家英的大問題。現在有些文章寫的不符合情況，說關鋒一定要保留這一段，其實也不是這樣。這話沒說完就回北京了。

毛主席說，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抓住要害，但是沒點名，戚本禹的文章點了名，但是沒抓住要害。

起草二月提綱以前，彭真在人大會堂開會，研究學術批判情況及存在的問題。除五人小組成員外，還吸收一些理論工作者，有王力、胡繩、姚濤、許立群、範若愚、鄧拓，對學術

批判提些意見。會上沒有什麼爭論，比較一邊倒。那時二月提綱還沒出來，會上發言說的也就是二月提綱上的那些話，都說學術批判不要輕易提高到政治。

這裏插一段：評海瑞罷官文章一發表，陸定一就有意見。（不是在這個會上講的。）他說姚文元的文章寫得不錯，海瑞罷官可以批評，但姚的文章最後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說要害是罷官，并且和廬山會議相聯系。這是陸定一的意見。

當時會上並不是針對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籠統地說整個學術批判不要輕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當學閥，不要武斷和以勢壓人，要允許改正錯誤，與人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準革命等等。二月提綱不過是把會上的意見綜合了。有些觀點一九六四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時我就向毛主席提過。這次會上「有破有立」的觀點是我提的，我說現在說怎麼做不對說得多，究竟怎麼才對呢？還要下點工夫。包括九評，都是光說人家不對，究竟怎樣搞社會主義，我們自己研究也不够。這一點大家同意，寫到提綱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組織隊伍，通過學術批判，組織馬列主義學術批判的隊伍。會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學術批判辦公室。過去也提過，這次是要見諸文字，向毛主席匯報。後來嚴家其的書說康生力排衆議，要把海瑞罷官同廬山問題相聯系，這不對。當時大家意見一致，沒有爭論。康生當時心思也不在這裏，他要管國際問題，同蘇修鬥爭，還要編毛選五卷。當時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對北京那麼不滿。如果會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彭真也不

會那麼匯報了。

二月四日，姚溱、許立群在釣魚臺整理匯報提綱，這就是所謂二月提綱。整理時康生、吳冷西是沒有參加。二月五日開常委會討論提綱，參加的常委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還有彭真、康生、吳冷西、王力、姚溱。康生參加了，也沒提出不同意見，大家都說提綱可以。所以不能說二月提綱是背着康生、吳冷西的。上面說過，事先討論這問題的時候他們參加了，事後討論提綱的常委會他們也參加了，祇是起草的那一天沒有參加起草。常委會上決定誰到武漢去向毛主席匯報，五人小組五個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辦公室負責人胡繩、許立群，主要起草人姚溱。我沒有去。康生提出加一個田家英。康生說他要談五卷毛選，田家英是康生編五卷毛選的助手，毛主席的資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從來沒有說過康生的壞話，這時毛主席對田家英已經不怎麼好了，康生還是要田家英去。）

到武漢匯報我沒有去，所以我祇有第二手材料。康生、吳冷西、姚溱回來說，毛主席對提綱沒有什麼意見。康生、吳冷西、姚溱回來了，陸定一、周揚、胡繩、許立群也回來了，彭真和康生到上海，把匯報提綱給江青、張春橋、陳丕顯、曹荻秋看，說毛主席沒有意見，問他們有什麼意見，他們也沒說有什麼意見。毛主席又要彭真、康生到蘇州看望林彪，轉達毛主席的幾句話：毛主席不同意「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的提法，不同意「馬克思主義頂

峰」的提法，叫林彪不要這樣提。他們回北京說，毛主席對提綱沒有意見。（毛主席沒說不同意，也沒說很好，發吧，而是放起來了。）于是就批發全黨。是彭真批的。毛主席也同意編五卷毛選，在中辦西樓搞了個房子。

這時在北京發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主席。是姚溱、許立群幫他辦的，沒有找我。吳冷西也知道這件事。我聽吳冷西說了後，很緊張，馬上給彭真打電話，我說你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鋒、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文件已經送走了。這果然闖了大禍，後果很嚴重。這成爲毛主席對彭真不滿爆發的重要原因。本來二月提綱毛主席雖然沒明確同意，但還沒有下決心整彭真，這件事在兩可的時候加了個砝碼。什麼事都有個偶然性。彭真至今還記得這事，說王力是很慎重的。當時我建議彭真跟關鋒、戚本禹緩和關係，他也接受了，請他兩人吃了一頓飯。後來戚本禹給彭真寫信，說過去對彭真了解不够，這次接觸後改變了印象。他還誇彭真有偉大的政治家的胸懷，等等。後來從彭真家裏查出這信，江青對戚本禹大爲不滿，這又成爲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五）毛主席批評《二月提綱》和彭真

三月份，常委會開會，討論是否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事先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

要在京常委討論，討論結果告訴他。常委會是劉少奇同志召開的，參加的有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康生、吳冷西、姚溱、王力，加了劉寧一。會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計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團參加的。人家邀請，不好拒絕不去。去了以後，我們可以堅持我們的意見。最初劉寧一主張不去，大家說，人家邀請都不去，在全世界面前顯得不好。我們可以用他們的講壇講我們的話。我們不直接罵人，但可以表明我們的看法。劉寧一也就同意了。一致同意派代表團，並給毛主席發了電報。但毛主席回話說不能參加蘇共二十三大，說要寫個公開信答復勃列日涅夫，說明為什麼不參加。這封信是我起草的，經過毛主席定稿的，正式發表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報上登了。不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這是個重大政治決定，要向全世界講清楚我們為什麼不去，責任應由蘇共來負。公開信列舉蘇共不斷在黨內黨外發表很多反華文件，安德羅波夫還發表了反華文章。公開信還說，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們都去了，但二十大你們反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反共浪潮。二十二大你們公開攻擊阿爾巴尼亞。赫魯曉夫倒臺後，我們建議各國共產黨開個會，希望你們改變赫魯曉夫的作法，你們又不改，你們堅持赫魯曉夫的一套，而且越走越遠。一九六五年三月，你們不聽我們勸告，堅持召開分裂性的兄弟黨會議，我們要求你們公開承認錯誤，承認非法，你們也沒有作。分裂的責任是你們的。現在我們不能參加你們的二十三大，這個責任在你們。我們還是相信蘇聯大多數人民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如果帝國主義發動

侵略，我們還是要同蘇聯人民站在一起。這封信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寫的。

蘇共二十三大後，日共代表團和越南代表團來我國。日共是以宮本爲首，吳冷西接待；越南是黎笋爲首，我負責接待。黎笋沒什麼問題，雙方同意不發表公報。宮本要發公報，而雙方意見不一致。中方主張在公報中點蘇共修正主義的名，宮本不同意，祇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點蘇共的名。中央又開常委會討論，這次會我參加了。會上一致同意要照顧日共的困難。這也是毛主席一貫的觀點，要照顧兄弟黨的困難。會上都同意照顧日共的困難，公報上不提蘇修，祇一般提反修。會上決定派康生和趙毅敏去上海向主席匯報。這時劉少奇要出國，鄧小平要去西北三線，彭真主持中央工作。

康生、趙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匯報，魏文伯參加，江青在座。這次毛主席講了一大篇，發了脾氣，說你們（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報問題，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兩個決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後就大罵二月提綱、罵彭真、罵北京市委、罵吳晗、罵中宣部，罵他們整左派材料。這對康生來說也是很突然的。據我分析，如果没有因爲二月提綱等問題對在京常委的不滿，毛主席對中日聯合聲明和蘇共二十三大問題本來都可以同意的。

在這裏插一段：毛主席發脾氣以前，陳伯達已經知道一點風聲。因爲他在杭州、在武漢見過毛主席。那時北京空氣已經很緊張，彭真也知道點風聲，知道毛主席不滿意，但不知道那麼嚴重。陳伯達回來後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談《紅旗》的一篇文章。紅旗雜志主持

日常編輯工作的杜進跟我去的。陳伯達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對學術批判和二月提綱的不滿。那時候許立群也很緊張，我去天津時，許立群說，現在看起來形勢很緊張，有什麼動態你趕快告訴我。

康生從杭州回來後，先在釣魚臺傳達毛主席的意見，還準備在政治局傳達。我說這不好，這麼大的問題，又是針對彭真的，現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麼好去傳達？我建議他請小平同志回來主持。康生同意，當着我們的面就拿起紅色磁石機給小平同志打電話。剛說了幾句，小平同志就說立即回來，因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會議是鄧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傳達。會議決定馬上向全黨發個通知，撤銷二月提綱。會上要我起草，我說這個不宜多說，說不清楚。所以我祇起草了一句話：以前中央某月某日發的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現在予以撤銷。大家同意，報毛主席。毛主席說，這不行，沒說實質性問題。毛主席實際是對常委不滿。毛主席要陳伯達起草，陳伯達還是找了我，起草了個稿子。這時陳伯達在十四樓，又開了一個會，參加人有康生、吳冷西、姚溱。這時不叫起草小組。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後來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後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幾次，搞了好幾個稿子，還是在八號樓開會修改，彭真也參加。康生在會上說「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彭真說：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溱很緊張，因為二月提綱是他主要起草的。陳伯達同我起草的稿子還是祇批了二月提綱本身的問題，按照毛主席對二月提綱不滿的那些話來批，沒有離開學術批

判及二月提綱本身。『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是討論時康生要加的。

這裏還插一段：一九六六年紅旗第三期（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登的尹達的文章《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份寫的。首先在內部刊物發表。一九六五年評海瑞罷官前後，毛主席在尹達的文章上批了，要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是批翦伯贊的。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曾說四個人不準批，其中包括翦伯贊。可是一九六五年他又要發表批翦伯贊的這篇文章。當然這篇文章沒有點翦伯贊的名。尹達的文章是關鋒、戚本禹修改的。他們在修改時認為應該點翦伯贊的名。他們問我，我說毛主席批這文章時沒有說要點翦伯贊的名，現在還是不點名的好。可是下一期紅旗雜志（三月二十四日出版）刊登的戚本禹、閻長貴、林杰三個人寫的文章，題為《翦伯贊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還是點了翦伯贊的名。

（六）《五·一六通知》的起草過程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時還不叫五·一六通知）祇有幾個人，不叫起草小組。四月份在北京完稿後送到杭州毛主席那裏。這時毛主席決定開兩個會：一個是常委擴大會，在杭州開，參加者有常委、康生、陳伯達，各大區的書記。常委擴大會的任務是批評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組，在上海，名義上是給常委擴大會準備文件。名單是江青定的，組長陳伯達，成員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陳亞丁、關鋒、戚本禹、穆欣。（葉永烈的書上少了陳亞丁、吳冷西、尹達、穆欣。）因為康生、陳伯達在杭州開會，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組

實際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就是北京日報發表北京市委批判鄧拓的兩個版的那天。毛主席指示要讓我們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我們在上海非常舒服，我、吳冷西、陳亞丁、尹達是住的錦江飯店後樓的套間，其餘人住的是錦江飯店前面的客房。吃得好，每天看電影，是江青組織的，看那些她認為有問題要批判的電影。有時在小禮堂，有時在後樓的會議室。毛主席叫我和吳冷西寫些陸定一的材料，我們寫不出多少。因為吳冷西的人民日報不歸陸定一領導，我更不歸陸定一領導，平常來來往往見了面開個玩笑，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嚴慰冰的事我們不清楚。陸定一說話不慎重，說過些不好的話，叫我們淒淒，也沒有湊出多少。我們沒別的事，就逛大街，逛淮海路。這時康生、陳伯達在杭州開會，上海起草小組是江青主持，她不住錦江飯店，她有別墅。柯慶施給毛主席搞了個單獨的、適合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時也給江青搞了個相當于毛主席標準的別墅。她住在那裏，我沒有去過，都是她到錦江飯店來。來了就到客廳見見談談，看看電影。張春橋是起草小組的，他好象是秘書長，招待我們三頓飯吃得好，時常來看我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江青來了就講她那一套，罵彭真，罵中宣部閻王殿，罵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講她自己如何受打擊，沒人理，說閻王殿的閻王我一個一個殿都去拜望，一個個副部長我都登門拜訪，可是沒有人理我，在北京沒有一個人支持我，我祇好依靠上海。那時她還沒有罵常委和書記處，祇罵彭真和中宣部。她還給我們看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的紀要（那時還沒有公開發

表）。說她要請尊神，靠部隊，靠林總。我們在上海的任務是什麼？主要就是原來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即後來的五一六通知）送主席後，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張春橋，再交我們討論，文字上理一理，順一順，有什麼意見給毛主席回話。毛主席每天都新的思想，新的觀點，後來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體字，都是毛主席親筆加的。有些雖然是黑體字，但問題提得很尖銳的，也是他加的。

杭州常委擴大會和上海起草小組會同時舉行。在毛主席看來，起草小組改稿子比常委會重要。常委會並沒有討論和通過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對五一六通知的修改，並不給常委會看。常委會的任務就是批彭真，彭真作檢討，揭開彭真的蓋子。實質性的問題都在上海。有人說常委會通過了五一六通知，交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沒有那回事。常委會開會期間，毛主席每天送修改稿來，開了幾天會就修改了幾次。杭州的會開完了，起草小組的會還沒有完。杭州會開完後，康生、陳伯達到上海，參加起草小組的會。康生簡單說了說杭州會議的情況，沒詳細說，因為沒有什麼精彩的發言。康生說到會的每個人都發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對彭真的問題認識不够，沒那麼高。都批評了彭真，說彭真檢討不好，過不了關，說彭真作法惡劣，沒有經過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鄧拓的兩個版，以為把鄧拓拋出來就沒事了。毛主席說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彭真和劉仁沒有檢討，沒有考慮整個市委是否改組。總之是不能容忍彭真。彭真回北京是單獨回去的，回去時馬上就有了一「警衛」了，是

公安部九局的，汪東興是局長。這個局是專門保衛中央的。五一的活動彭真沒有參加，從此就不出面了。康生還說到，劉少奇出國回來，到了杭州，劉少奇對國內情況，對彭真的問題大吃一驚。康生傳達時江青插話，對陳伯達說：你這個伯達，主席講《論共產黨員修養》是唯心主義的，你還給他修改整理，重新發表在紅旗上，你怎麼搞的？你也真够糊塗的。當衆批評劉少奇，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大吃一驚。康生也很緊張，因為他正在編劉選。（其實延安整風文件中就有《論共產黨員修養》）。

下面談談毛主席對《五·一六通知》初稿修改的地方。

第一，通知開頭第二段：「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實際上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徵求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爲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忙忙發到全黨。」這一段雖然不是毛主席的親筆，但是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給康生開脫，由彭真一人負責。這叫剥笋政策，這一次祇剝到彭真。這一段是上海寫的，大概是張春橋寫的。

第二，下面一段，即通知的（二）中的一段，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提綱的作者們竟然

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多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多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這一段強調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

第三、通知（四）段開頭不是黑體字的地方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這些提法本來還可以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的，可是後面又加了一段黑體字，問題的性質就變了。黑體字說到「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就很明確了。問題性質發展到這程度了。這是毛主席的親筆。

第四、通知（七）段談到學閥、黨閥，這也是毛主席的提法，起草文件以前他就說過。這些非黑體字不過是用文字表達毛主席的思想，得到他的認可的。後半段黑體字更明確地說：「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衆，什麼學問也沒有，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這就更明確了。

第五，杭州會議結束後，康生、陳伯達回到上海參加起草小組會議，會議還是江青主持的，作最後一次定稿。我們正在讀稿子時，徐業夫又打電話來找王力，又加了幾句，就是通

知（一）段內括弧裏的話：「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把這段加上，這才算是最後定稿了。

會開到下旬，我們要回去過五一節。我兼着中聯部副部長，五一節要接待外賓。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尹達也要回去。江青留下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穆欣、陳亞丁。留下這幾個人，大概是布置寫文章。這一段我不太清楚，反正他們留下後就出了何明、高炬兩篇文章，何明就是關鋒的筆名。奇怪的是沒有留吳冷西，也沒有布置人民日報寫揭露北京的文章，江青後來說，她有四個基地，就是紅旗雜志，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和上海市委，其中不包括人民日報。

（七）政治局擴大會通過《五·一六》通知

康生帶着定稿回北京，要開政治局擴大會，要將這文件印發。當時不相信中辦印刷廠，怕他們同彭真、楊尚昆關係密切，怕他們泄露給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謝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廠印刷，要絕密。但他們印得不好，不好看，還有錯字。文件定稿時還是有「彭真同志」，第二年公開發表時把「同志」去掉，祇剩「彭真」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三個版批判鄧拓、廖沫沙、吳晗等三人，《前線》加了編者按，這是北京市委搞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華社當天廣播了。可是當天新華社就奉命通知撤銷北京的按語，因為毛主席、江青不同意北京的按語。上海開會回來後，五一六通知發表前，

五月四日解放軍報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文，提出這不是學術問題，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五月八日發表高炬文章，題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文章，題為《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何明就是關鋒，高炬是解放軍報的，解放軍報那時正副總編是唐平鑄、胡痴，是劉志堅領導的。何明、高炬的文章直接批評北京市委。五一六通知發表前，組織了一系列文章，一面中央開會，一面在社會上揭露。五月十一日發表戚本禹文章《評前綫、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章說：姚文元文章提出吳晗問題以後，你們改變態度沒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時間裏，你們對姚文元文章不作介紹，反而質問上海同志，有什麼背景，為什麼不事先打招呼，你們的黨性到那裏去了？這段話是彭真打電話給曹荻秋時說的。戚本禹把它拿到社會上去了。

政治局開會的情況，王年一的書說的差不多。主要是康生傳達。上午下午八個小時。他連毛主席說的「我就是要搞剥削政策」也說了，說一層一層地剥，這次是彭羅陸楊。我們都很驚訝，這個怎麼能傳達？康生傳達着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為蘇共二十三大和日共公報問題大發脾氣時講的一些話，還有杭州會議期間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過程中毛主席對陳伯達、康生講的一些話，康生都有筆記，他寫得很工整。這次經過整理，把它連起來，成為有邏輯的、系統的東西。好象是經過我整理的。康生傳達後政治局會上進行了討論，對文件沒有提出什麼修改意見，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過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會議的主要任務就完

了。張春橋、陳伯達也介紹了情況，張春橋限于文化戰線的情況，陳伯達講的不多，他講彭真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歷史上一貫錯誤，思想作風不好。常委都講了話，都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認識不够，還都說自己受了剝削階級影響。少奇同志首先講的，他說過去填表時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農，後來到花明樓看看，應該是地主。總理也說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響，對階級鬥爭認識不够，對北京的問題事先沒有覺察。鄧小平同志也作了檢查，說書記處發生這麼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彭羅陸楊都是書記處書記。）最神氣的是林彪，他不檢討。不過最後也講了幾句，說常委同志都檢討了，我沒有準備，我的家庭也是地主，問題也看得不那麼清楚。這是十七號下午的事。十八日林彪講話，講政變經，這已經有全文，就不多說了。我們事先知道葉群到科學院等單位搜集中國歷史上關於政變的資料。林彪為什麼講這個呢？是因為毛主席多次講要防止在我國發生反革命政變。但毛主席不贊成林彪這個報告。大概因為林彪講得太玄乎了。毛主席從一九六二年就講有反革命復辟的可能性，并且採取了措施，要害部門都調來一些軍隊幹部。當時林彪經常生病不在北京，是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從軍隊挑的優秀的、可靠的幹部到要害部門。一九六五年調丁榮夫到廣播電臺當政委，交代他的任務就是防止政變者占領電臺。他原來是一個軍的政委。林彪的政變經別人都說很好，劉少奇、鄧小平、周總理都說要印發。林彪要陳伯達、劉志堅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講話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長時間，討論修改過幾次，直到十一中全會後九月二十二日才印發。

毛主席也同意了，劃了圈，但毛主席背後說他不那麼贊成。是跟江青說的。

十九日批評彭真、陸定一，彭還是說自己認識不够，至于搞政變、裏通外國等等，他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同陸定一沒有聯繫，請中央審查。彭真發言五分鐘，大家批評他說不深刻，沒抓住要害，還是對抗的態度。陸定一早就受審查了，就是因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信上說葉群在延安時跟陸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陸定一生的。林彪到哪裏信就到哪裏。這就涉及公安問題，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的行踪的人寫的，林彪到哪裏她都知道。經過偵破知道是嚴慰冰寫的。告訴陸定一，陸大吃一驚，說他不知道，說嚴慰冰有精神病，找醫生證明。一九六五年中央決定要彭真審查陸定一，看是嚴慰冰單幹，還是有個夫妻店。要陸定一離開北京。陸定一到外地後，給嚴慰冰打電話都有人竊聽，陸電話裏說給嚴買了個半鋼的表，這句話被說成是暗語，因為無錫話「半鋼」和「半講」同音，說這是暗示嚴慰冰祇能講一半，不能全講。這是葉群在大會上講的。彭真審查陸定一的結果，說陸確實不知道嚴寫匿名信，林彪很惱火。政治局會上林彪寫了一個條子，證明他和葉群結婚時葉群是處女。這個條子印出來發給到會人。陸定一發言沒有說幾句，林彪就質問：你為什麼害我？我這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什麼幹這麼壞的事，用意何在？陸定一說我確實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說了臟話，說你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嗎？批判變成了鬧劇。有人說林彪在會上說「我恨不得槍斃了你」，這話是沒有。還有人

說，陸定一說丈夫不知老婆的事的不是很多嗎？這好象是頂嘴了，這話也沒有。別人批評陸定一，也說不出什麼，祇是說文人無行、縱容老婆胡鬧等等，另外就是批評陸定一反毛澤東思想，祇反教條主義，思想戰綫的事都由他負責，中宣部一塌糊塗，成了閻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塗，學術批判他反對上綱，這是給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總之都是籠統的，具體的沒什麼東西。陸定一不承認有反黨集團，不承認搞復辟。嚴慰冰問題他辯解的多。會上人人都得發言，不祇是康生、陳伯達說。我們這些秀才可以不發言，吳冷西也沒有發言。（吳冷西開會前不久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

（八）田家英之死

檢查以後，會上討論對四個人的處理。羅瑞卿不在這個會上處理，由軍委處理。會前已經通過對羅瑞卿的處理決定。大約是二十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組（那時不叫專案組）處理彭、陸、楊、田（家英）的問題，總的組長是周恩來，下分四個分組，彭、陸、楊、田各一個分組。彭組由周恩來自己負責，陸組陳伯達負責，楊組康生負責，田組安子文負責。周恩來統一布置，召開會議，布置對四個人談話，收文件。這個會我參加了。我們這個分組沒開會。周恩來還有什麼具體布置我不知道。安子文分組的組員是我和戚本禹。二十一日或是二十二日，安子文突然打電話通知我到他家裏去，坐他的車到田家英家裏。怎麼談事先沒商量，是安子文一個人談的，我認為談的還是相當緩和的，不是那麼

氣勢洶洶。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了錯誤，要檢討，暫時不工作，即中辦副主任，處理來信來訪的工作暫時不作。田家英手邊有許多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要他交給戚本禹。這件事的時間，陸定一檢討完後，二十日當天中午就開了常委擴大會，我記得是二十一日到田家的。董邊說是二十二日，這不重要。安子文沒有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據我所知，是汪東興統一布置叫一批人搬出中南海，包括陸定一、楊尚昆、田家英、王稼祥、胡喬木、張際春、張子意、李卓然。我那時心思不在這上頭，這事不是我主管。我當時聽說中辦的一些人說了些難聽的話，不象安子文說的那麼緩和，甚至說採取了相當粗暴的批鬥式的態度。不祇是汪東興一個人，還有些相當粗暴的人。當時是有相當的壓力。因為江青到毛主席那裏，把田家英的問題說成敵我矛盾。田家英的一個哥哥在香港。

二十三日人大會堂繼續開會，討論通過政治局擴大會作出的組織處理決定：彭真、陸定一撤消工作，調陶鑄為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任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就在這個會上，汪東興接了個電話後很緊張地跑到主席臺上跟總理說了幾句，說田家英自殺了。總理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趕到田家，這時田家英已經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臺酒然後上吊。事先把公務員打發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務，如燙衣服、取衣服、買這樣、買那樣，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他自己倒鎖了門自殺。等公務員回來敲不開門，最後報告中辦把門撬開，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去時已死了很

久。安子文光嘆氣，說家英怎麼這樣，有話可以向組織上說嘛！這時安子文也是自身難保，六神無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覺得他死得很可惜，審查以後可以繼續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東西他最合適。戚本禹也嚇呆了。戚本禹對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調到要害部門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搞三自一包時戚本禹也在田家英領導下搞試點。這時候陳伯達、江青也在拉戚本禹，但還是剛開始，戚本禹對田家英的舊情還是有的。總之當時對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沒有人說「自殺是自絕于黨」之類的話。

一九六一年我同田家英一起搞六十條，以後也常常在一起搞文件。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會上批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陳雲，附帶批田家英；批三和一少，主要是批王稼祥，附帶批王力。都當成右傾典型。事後我和田家英不約而同去找康生，請他緩和一下。我們說現在各方面都很困難，不要對陳雲、王稼祥搞那麼緊張。康生拒絕，也就算了。田家英死後我們到他家，看到家裏很亂，有些燒東西的灰。康生給我寫的一個畫上的題跋，田家英那裏還有照的一張相。田家英到死以前沒罵過康生，他祇罵陳伯達和江青。我對田家英是很欣賞的，私交很好。當時對他的壓力當然是不小的，可是頂一頂也就過去了，何必自殺？在田家英自殺前姚溱也自殺了。他以前和國民黨鬥爭時，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包圍，企圖秘密逮捕他，姚跳了樓，那是爲了公開國民黨秘密逮捕的事，讓組織知道，是爲了保全組織而犧牲自己。那次

跳下來沒有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服了大量安眠藥然後上了吊。田家英死後火化了，在八寶山，中辦有幾個友好還去送葬，陳秉忱號啕大哭。陳作過灘縣專員，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田死後當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邊，到中央組織部，談談田家英死的經過。董邊說頭天夜裏田家英說了一句話，說「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董邊說她當時沒有注意這句話，沒有向組織匯報。七月份江青回北京前，我們就聽到傳達了江青的話，說陳伯達、康生（實際上是說周恩來）為什麼不採取措施，讓田家英自殺了？（意思是應該先加以隔離。）江青回來後又罵了好幾次，說對田家英處理不果斷，早就該隔離。她是把田家英當成敵我矛盾了。田家英之死的經過就是這樣。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刊載胡喬木的文章，說「王關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田家英遷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這些誣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這種說法完全違背事實。

對彭真、羅瑞卿的問題中央已經有了文件，對陸定一、楊尚昆也有一個說明他們錯誤的文件，是後來二十四日通過的。楊尚昆搞「竊聽」，毛主席不知道，但這也不是楊尚昆能够決定的。有人說這完全是無中生有，這也未免太武斷。搞錄音是有的，但我判斷楊也不是壞意，因為在毛主席那裏開會不準記錄（政治局、書記處正式會議有記錄），祇有個人可以記。毛主席有些話很精彩，錄下來多好。但安錄音機絕不是辦公廳主任能夠決定的。後來楊

尚昆也沒有承擔這個責任，沒有檢討。他沒有說是誰決定的，祇把具體辦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還有直接安錄音機的幾個人撤了。後來楊尚昆平反時說這不叫竊聽器，叫錄音器。我認為錄音不經過毛主席也是不對的，但確實不是為了監視毛主席。

（九）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組名單是劉、鄧爲首的常委、書記處提名的，五月二十八日發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認爲中央文革小組是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實際上那天並沒有成立。因爲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爲組員，所以沒正式定下來，到六月份才定下來的。原起草小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吳冷西沒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陳亞丁換成謝鎧忠（總政文化部正部長），加了姚文元。這還有個過程，張春橋極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審查一下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張春橋說沒有問題，於是就定了姚文元爲中央文革成員。名單送主席後，主席不同意王力，說王力是彭真的人。

爲什麼毛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實還是江青搞的鬼。因爲一九六四年九月，彭真、喬冠華和我到杭州毛主席處，談國慶十五周年邀請外賓事。說完這件事後，彭真提了個頭，我接着講了一通對學術批判和京劇改革的意見。我說一是不要動不動提高到政治；二是不要擴大化，要有個界限。京劇改革不要一律排斥傳統戲，鬼戲也不必一律禁演。毛主席很不高興，變了臉，說你這個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嗎？（那時已經罵中宣部是「閻王殿」了。）但他還不

是完全不接受。最後他講：第一，江青是有點「左」；第二，是要有個界限。他說對郭沫若、茅盾、範文瀾不準批。我們告辭時，主席說再加一個翦伯贊。

因為我批評了京劇改革，觸怒了江青。另外，一九六四年中央要我列席常委會，是彭真找毛主席談的，彭真說王力是優秀幹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在釣魚臺，常委要我作點秘書工作。彭真講的王力的好話，江青在文革中作為攻擊王力的把柄。因為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說王力的壞話，毛主席才形成「王力是彭真的人」這個印象。毛主席不同意王力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可是當時康生、陳伯達覺得過去的秀才班子一個不留，不好辦事，從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個過程，新來的人都不熟悉，所以要留一個王力。他們請江青向毛主席談，說「要留一個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張、姚、關、戚都是響當當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為有這樣一個周折，而且各大區參加中央文革的人也還沒定，所以文革小組成立會是在六月二十日前幾天才在上海開的，當時沒有通知王力出席。他們從上海回來後才告訴我新的文革小組中有我。

文革小組雖然成立了，但沒有開會，也沒有機構，反映情況靠光明日報的內部簡報。陳伯達調尹達、關鋒、穆欣到釣魚臺十四樓，我還在八樓。吳冷西回了人民日報，姚溱自殺了，範若愚回了黨校。有人說謝錚忠、劉志堅進中央文革是葉劍英提的，這不符合事實。劉志堅是林彪的主要秀才，當然是林彪提的。打倒劉志堅，林彪是不同意的。不能因為現在劉

志堅是好人，就不說他是林彪提的，而說是葉劍英提的。

(十) 關於《大事記》的一些情況

大事記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專門搞大事記的人。他把毛主席歷次談階級鬥爭的話都排起來，這次又排了個大事記。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劉鄧同意。我是參加整理，還有李鑫、賈一學。現在中紀委把這說成是我的罪狀，說我在大事記中給康生開脫。其實大事記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說得緩和。正件說彭真背着康生、吳冷西炮製了二月提綱。我整理大事記時覺得不好說整個二月提綱是背着康生，就祇說起草的那一天是姚溱、許立群關起門來起草，這比正件輕得多。寫大事記時康生提出要給王力開脫，有些事是王力反對過的，其實主要是爲他自己開脫。他要給我開脫，我不贊成。因爲文件太長了，不能再加了。後來康生在中聯部講話時說，沒提王力是個疏忽，王力是正確的。中紀委把這作爲王力的罪狀，說王力在大事記中栽贓誣陷彭真，給康生開脫。其實大事記比正件輕得多。爲什麼正件無罪，附件《大事記》倒有罪呢？這些我在「申訴書」中已寫明了。

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發動

(一) 毛主席為什麼重視聶元梓的大字報

那時文革小組沒有制度，沒有機構，康生也並沒有重視他這個顧問的職務。他是中央理論小組組長，還要管國際問題。理論小組派了幾個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熱鬧了。何明、高炬文章發表後，各學校震動很大，大字報小字報都出來了。康生派一個組到北大，組長是曹軼歐，她是理論小組辦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調研的。她本來就常去北大。她這個組沒有多少權，也没有多少事，聶元梓大字報出現後，曹軼歐是很重視，因為五一六通知剛發下去，就出現這張大字報，是一個重要動態。曹軼歐向康生作了匯報，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陳伯達也通過光明日報向毛主席反映了。六月一日毛主席在上海，給康生、陳伯達都來了指示（不知是經過什麼人傳來的）。毛主席叫在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而且還講了很多話，主要是同康生講的多。毛主席說聶元

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陳伯達那時是人民日報工作組組長，是五月三十一日進駐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決定的。他還兼顧新華社。康生找了王力、關鋒、曹軼歐，讓我們寫一篇評論員文章。

毛主席為什麼重視這張大字報？因為他想用大字報直接號召，自下而上的發動群衆。毛主席一貫的總的思想是，解放後十七年搞的一套機構不行。他認為這一套機構、制度脫離群衆，如果發展下去，會成為人民的敵人。必須把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麼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風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種辦法都試了，都不行。這次要用新的辦法，自下而上發動群衆運動，揭露黨的陰暗面。要實行這種作法，依靠原來的組織、制度、紀律就不行了。他認為祇用原來機構，自上而下傳達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報也不行。江青向來認為人民日報不在她手裏。陳伯達的工作組是劉鄧派的，而廣播這張大字報是毛主席布置的，評論員文章是康生傳達毛主席指示後，根據毛主席指示寫的。六月一日傳達，當晚寫好，六月二日見報。對毛主席的思想，當時評論員文章還沒有從理論上說得很明白，後來才說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縛群衆手腳的舊的機構、舊的紀律、舊的秩序打亂、摧毀，解放群衆的手腳，讓群衆直接揭露當權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評論員文章當時寫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會印發時，在括弧內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話，原稿上還有「毛注」字樣。紅旗公開發表時就正式加了一段。這一段是：「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毛主席

爲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一、這是毛主席加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修改。

對於聶元梓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爲什麼那麼重視這張大字報，歷史學家等估計不够。其實毛主席是借題發揮，把陸平作爲舊組織的代表。問題也不在江青和聶元梓有什麼私交。當時陳伯達對這點就遲鈍。評論員文章寫好後，康生要我和關鋒送給陳伯達，陳伯達沒有把聶元梓的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放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論。我們說主席指示應該放在上面，他說社論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論是不行的。

後來大字報的作用大了。聶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來了，曹軼歐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參與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報也有關係，他把大字報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傳達的，他就把功勞歸于自己。康生同外國人談話時也居功。實際上他們三個人人都沒有份。後來曹軼歐和聶元梓的矛盾爆發了。曹軼歐不同意把聶元梓捧那麼高。康生對聶元梓一貫印象惡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視聶元梓，曹軼歐覺得過分，就揭她的底，說大字報她一個字也沒有寫，主要是楊克明寫的。楊寫了後，叫哲學系的人簽字，聶元梓是哲學系總支書，叫她簽她還不簽，說服了好幾次才簽的。因爲她是總支書，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說曹軼歐和聶元梓是老鄉，大字報是曹軼歐組織的，這一點影子都沒有。曹軼歐強調楊克明，十一中全會吸收北大的人參加時，江青提聶元梓，康生提楊克明。曹軼歐和聶元梓勢不兩立，聶元梓靠攏江

青，江青支持聶元梓反曹軼歐。曹軼歐也列席了十一中全會，參加文革小組，當辦公室副主任，後來被撤消。

以上所談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是毛主席為什麼重視聶元梓的大字報。毛主席認為歷次運動都沒有解決脫離群衆、官僚主義、變修的問題，這次運用大字報，採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發動群衆，不靠原來的組織，原來的紀律，原來的方法。第二是澄清關於大字報的一些胡說編造，沒有那麼複雜，有的人沒有那麼多功勞。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講話的精神，還有毛主席歷次講話加以綜合。它的發明權不屬於陳伯達。如果說陳伯達有發明權，那祇是在社論中第一次提出「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光這篇社論也沒有用，如果没有第一張大字報，還是按過去搞法，舊的機器、舊的組織紀律還束縛着，還是不行的。毛主席利用聶元梓大字報、評論員文章來解決這問題，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毀舊機器、舊組織、舊紀律、舊方法，同過去的運動都不同。人民日報工作組，組長是陳伯達。因為當時說人民日報不站在左派一邊，不代表毛澤東思想，不是可靠陣地，所以要派陳伯達去奪取陣地，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派他去還是劉鄧統一派的，不過他比別的工作組早一點。工作組是陳伯達自己組織的班子，在政治局書記處的會上說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軍政治部、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紅旗雜志，還有上海的一個人。這幾個單位都是江青的陣

地。具體的人有穆欣（光明日報總編輯）、錢抵千（總政宣傳部副部長）、唐平鑄（解放軍報社長）、尚力科（解放軍報編委）、紅旗編輯楊某某、解放日報魯瑛（當時未到，後來到了）。

陳伯達在人民日報開會，說要清除鄧拓的陰魂（資產階級辦報方針），清除吳冷西的陽魂。宣布要一天寫一篇社論。這些社論都是他自己主持寫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時請我去過。

（二）文革小組成立初期和工作組問題

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開會，沒有通知我。我打電話問陳伯達，問我要不要去，陳說不要去，也沒有說什麼原因。開會回來後告訴我說文革小組有我。這時陳伯達還在人民日報，康生還是不管文革，曹軼歐正式參與文革，各機關大字報很熱鬧，很震動。在我觀念上，文革小組不過是常委的參謀秘書性機構，由少奇、小平同志領導。這時文革小組沒有機構，沒有制度，沒有刊物，還是由當時的黨中央領導運動。懷仁堂每天都有會，各部門各個口在會上匯報，按原來的組織系統搞。各單位自己有簡報。就是說，原來的機構還在正常運轉。如團中央，後來有人說是王力去撤了胡耀邦的職，其實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組到團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職，宣布的人是過去就管青年團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員分管青年團的，是按正常系統搞的。清華的工作組長葉林，是經委副主任，日常

工作是薄一波管。北大工作組長張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這些地方很熱鬧。最初文革小組沒有什麼措施，後來上海來電話，江青傳達毛主席的意見，說文革小組要積極活動，要直接去看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不要讓原有機構控制運動。六月下旬，文革小組雖然還是沒有制度、沒有機構，但執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馬浩浩蕩蕩集體去看大字報。蒯大富這時還沒有被隔離，薄一波和蒯大富辯論，薄一波說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要富，還要大富，還要快大富！這樣的話簡報上就有。毛主席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學生，登過人民畫報的。這時各單位很熱鬧，積極執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幫、牛鬼蛇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沒有把矛頭對準走資派。陳老總在外事口匯報，說外事口有三個大牛鬼蛇神；一個是李昌，是對外文委主任，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他母親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惡霸，李昌一直養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長助理宦鄉，說他裏通外國，家裏有美金，抄家抄出來了。第三是浦壽昌，是總理的外事秘書，後來放到外辦當工作人員，是美國博士。這三個人後來證明都是優秀幹部。外辦工作組組長張彥主持搞李昌。

六月下旬，上海來電話給陳伯達，不贊成由原來舊的工作機構派工作組。陳伯達根據上海意見，在懷仁堂會議上遞了個條子，說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衆自己解放自己。條子遞給鄧小平，鄧小平批評陳伯達：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套了嗎？會形成自發、自流、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

黨中央的方針貫徹。陳伯達說不出道理，回到釣魚臺十四樓就坐在地毯上哭，說上海不要工作組，這裏又批評得這麼凶！他報告了上海，江青傳過話來很厲害，說你們文革小組要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衆反對工作組。

這時確有群衆反對工作組，如對外文委，工作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還有些小的。工作組同造反群衆對立，群衆要揭發領導，受到工作組打擊。文革小組集體到對外文委找人談話，群衆對工作組有很多意見，貼了不少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如張彥當工作組，整了李昌，但張彥的夫人楊純是對外文委副主任，就沒有事。所以有人說張彥去對外文委是保楊純，不準給楊純貼大字報，不準查對外文委的「黑綫」。康生、陳伯達都去看大字報，支持反工作組的人，反對張彥。陳老總非常惱火，他召集群衆大會，說張彥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幹部，這是領導的看法，你們群衆說他這樣那樣毛病，是群衆的看法，這不對，要以領導的看法為準，不能轟走張彥，張彥是我派的。當時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簡報是劉少奇批的，康生、陳伯達都劃了圈。簡報說對「反革命事件」要鎮壓，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國彷彿。那時上海電話還沒來，康生、陳伯達也在簡報上劃了圈。六一八事件經過，大體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北大工作組正在開會，群衆離開工作組，揪鬥了四十多名校領導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動。工作組制止了他們，指出避開工作組亂鬥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經被壞人利用。工作組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見北大文革簡

報第九號。少奇同志批了：現將九號簡報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工作組處理亂鬥的作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辦法處理。據說當時有侮辱婦女的行為。我們沒聽說。有的書沒有說簡報認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祇說毛主席認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這是春秋筆法。這一段經過是在上海來電話以前。事件發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電話是六月下旬。毛主席祇知道北大工作組把群衆說成反革命不對，毛主席認為是革命事件，為什麼群衆離開工作組就是反革命？他當時還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語。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會開會以前，康生發現全國都發生工作組與群衆的衝突，他認為來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語。可是他查了檔案，看到簡報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畫了圈。他在文革小組裏說：一到處發生這個問題，和中央批語有關。我把批件揣在口袋裏，幾次想告訴毛主席，到現在沒有拿出來。一張春橋一聽，馬上把文件要過來。他馬上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衆，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毛主席當時不但罵劉少奇，還罵了康生。因為張春橋告了康生的狀，說康生把簡報揣在懷裏很久沒有拿出來。毛主席說，要康生這種人有什麼用處？我想，康生不拿出來，一方面有個人顧慮，因為自己也劃了圈；另方面據我觀察，他也顧慮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狀的問題。他當時對劉鄧還是尊¹的。他常講，他自己在白區執行的是王明的左傾路線。少奇同志是正確的。總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這裏，毛主席的大字報和換接班人的決心來源于此。其

他學校發生的類似事件並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從上海回來，江青是先兩天回來的。她回來後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和制度，籌辦刊物——「快報」。專門開了一個樓——十六樓，作為文革小組的辦公樓，建立文革小組辦公室，說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當辦公室主任。為什麼要我當辦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一九六零年列席書記處會議，一九六四年列席常委會議，在黨內人熟好辦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辦。別人在黨內沒有這個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辦事就不方便。我推辭不幹，江青說不行，非要我從八號樓搬到十六樓。八號樓還保留我的房間。陳伯達住十四樓，江青自己住十一樓，毛主席要來開會就住十二樓。王力為辦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軼歐、穆欣為副主任。要我和肖華、劉志堅商量，調一百個團以上政工幹部辦「快報」，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動態。快報暫時放到解放軍報印刷。這一百人等於是文革小組的聯絡員、巡視員，到各地、各部門了解情況，公開名義是用紅旗、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記者的名義，不用文革小組聯絡員的名義。其實人家也都知道是文革小組派的。這一百人是劉志堅、肖華從全國部隊挑的，主要是從濟南部隊和沈陽部隊挑的。這一套作法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通過江青說的，說辦公室不要大，聯絡人員要多。辦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祇有三五個助手，他們祇作些技術性工作，主要的事情應該我們主任副主任自己辦。毛主席就沒有政治秘書，祇有個收發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作

他的秘書，都是兼職的。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把舊的機構、舊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組人少辦的事不少。不準配專車，需要人臨時調。後來電話太多，搞了個接電話的組，三個人，是部隊的。曹軼歐要搞個調查組，調了幾個人，不住在中央文革，還是依靠北大。從文革的機構來看，毛主席的思想是對的，大批人到第一線反映第一手情況，坐辦公室的人要少。簡報一事一報，要快，不要積成一大疊才印。「快報」祇發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員。很多快報上有毛主席的批語。檔案館可能還存着。一百個記者得力的不多。後來又從人民日報、新華社調來一些人。江青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頭會，每天下午三點碰頭，小組全體成員參加，另外需要誰就通知誰，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總理和陶鑄。後來幾乎每次都通知他們二位。周總理說，凡是中央文革通知開會，他從來沒有不到過。最早的時候，中央文革每天開過碰頭會以後，全體人馬到一個單位去開群衆大會，如各個大學（有的大學去了不祇一次）。大會上都是把文革小組成員向大家介紹，每個人講講話。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書記、候補中委）、劉志堅、張春橋、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紹江青，說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中央沒有這麼通知）。有人介紹我時，說我是黨的理論家，九評的作者（九評有七評半是我主稿的）。關鋒、戚本禹不用介紹，因為他們寫的文章很多，人們都知道他。這時期，重點逐漸轉移，劉少奇那裏黯然失色，懷仁堂祇討論一般性問題，實質性問題都在釣魚臺。釣魚臺直接支持群衆，矛頭對着工作組。

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關鋒到清華去見蒯大富。這時蒯大富被隔離在宿舍。我們聽取了他的申述，對他說，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會恢復自由，有什麼話可以對我們講。他對工作組葉林、薄一波有意見。我們根據毛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動。我們沒說要釋放他，可是我們一走，他就恢復自由了。蒯大富在學校是孤立的。開大會辯論時，蒯處于被告、辯解的地位。這次辯論會我去了，總理也去了。蒯大富這人不怎麼行，他的發言不是進攻的，都是被動辯解、批的人理直氣壯，他都嚇蒙了。

再一件事就是七月下旬，我們正在師範大學開會，突然有人遞了個條子，說團校在展覽館禮堂組織大會，同彭小蒙辯論。根據毛主席指示，派我和吳德去支持彭小蒙。（這次會上有周總理。不知是誰來個條子給江青，據說說的是二月兵變，我沒聽到）。我和吳德到展覽館，青年團說彭小蒙那個組織是反動組織，要在大會上辯論。彭小蒙比蒯大富厲害，口才很好，講話邏輯性強，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十一中全會把她的發言印發了。當時最重要的是支持不支持紅衛兵或類似組織，對此首先鮮明表態的是我和吳德。當然是根據中央指示這樣講的。我們代表中央，表示他們的組織不是反動組織或反革命組織，是革命群衆組織。對他們的革命行動應該支持，不應該阻撓。會上還有個問題，團校是不是要象其他學校一樣搞文革？校方意見是不搞，我同吳德商量後表態說要搞，一般性學習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應放在首要地位。這樣就把團校衝垮了。這時團校校長是周杰。這時來不及請示，我和吳德就

表了態。

因為文革小組天天到一個單位支持群衆反工作組，這時劉少奇那裏的指揮就不那麼靈了，毛主席直接領導文革小組，取而代之。工作組不行了，到處轟工作組，有的被趕走了，中央不得不發出撤工作組的決定，不撤也被趕走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開了大專院校積極分子大會。大會上，劉、鄧講話都是帶檢討的。鄧的檢討是自己寫的，請我去修改過。他又打電話請康生、陳伯達來看了，沒有意見，他才講的。這次大會我沒去。劉、鄧都是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沒有後來提得那麼高，沒有提到毛主席不要舊機器、舊組織、舊紀律、舊方法的思想，沒提到那個高度。毛主席認爲舊的一套不行，要自下而上揭露脫離群衆的陰暗面。少奇同志說文化大革命怎麼搞，問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組的人也並不清楚。劉、鄧不是發牢騷，確實是手足無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這句話來源于劉少奇，在這個會以前劉少奇就說過。毛主席認爲再不解決官僚主義、脫離群衆的問題，黨就要成爲人民的敵人。群衆對黨是有不滿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幹部特權，群衆都有意見。當然也不能認爲群衆意見都是對的。

(三) 八屆十一中全會

十一中全會以前，中央常委會是劉少奇同志主持。總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同志參加。毛主席那裏開會都是他自己定名單。陳雲同志說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不是常委

了。毛主席、少奇同志開會時都不通知他。一九六四年以前就沒有他。

毛主席從外地回來後，原來還是少奇同志主持常委會。後來張春橋告了狀，說少奇同志對北大六一八簡報有批語，毛主席大怒。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夕，毛主席下決心換接班人。那時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總理主持。從這個時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總理批了，沒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換下來，是全會前夕就定了的，選舉祇是個形式。全會公報是早就寫好的。公報初稿是總理批的。總理主持日常工作時，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匯報，不經過總理。如陶鑄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也可以。總理參加文革小組的會，但文革小組向毛主席匯報的署名是陳伯達、康生、江青。總理要報告，就單獨報告。

毛主席本來已退居二線，這時又回到第一線。毛主席主持常委會。毛主席不在時，林彪主持常委會。政治局的會他不參加，就派葉群參加。文革小組的會也是派葉群參加。

七月一日，總理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回來。我建議康生趕緊向總理匯報，國內情況很嚴重，不是一般的運動，劉、鄧都陷進去了，陳老總也陷進去了，總理千萬不要再陷進去。我當時在陳伯達那裏起草十六條，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機場歡迎總理時，同總理坐一個車回來，一路上向總理匯報了。康生說，一是總理不要陷進去，二是中央文革現在與過去大不一樣，總理要參加，要過問。劉、鄧可能站不住了，陳毅在張彥問題上也陷進去了，總理不要再陷進去。總理第一不要參與工作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陳伯達管不

了。（康生那時對江青很有意見，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歷史上不那麼幹淨。）總理也知道這件事的重要，回來後差不多天天接觸文革小組的事，首先抓清華。當時總理祇要不陷入工作組問題，毛主席就會同意由總理主持工作。

八屆十一中全會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開的。會議的主要內容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和中央的人事變動。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也是在這個會上發出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是在這個會上發出的。會議經過，在有些書中已經敘述過了。我在這裏祇談談十六條的起草過程和中央人事變動的一些情況。

（四）起草「十六條」的過程

五一六通知一發下去，外面大字報就開始貼了。這時毛主席就提出，光有五一六通知還不行，因為通知講的都是政治思想性的問題，至于怎麼搞運動，還得有個條條框框。毛主席說，得有個界限，哪些許可，哪些不許可，主要搞什麼，要達到什麼，要注意什麼，要講清楚。毛主席要陳伯達在北京搞個文件。這個文件絕不是在大會上臨時搞的。在江青回來之前，六月份，陳伯達就開始搞了。陳伯達找了王力、關鋒、尹達、穆欣，在十四樓搞。搞得很慢，有時一天連一條也搞不出來。大家常說出去看一看吧，就坐陳伯達的車到各大學去看。毛主席催初稿，我們寫不出來，因為究竟怎麼樣，寫的人也不清楚。五一六通知起始是從學術批判開始的，毛主席加了黑體字，性質變了，成了一個大的運動，究竟怎麼搞，誰也

不清楚。毛主席在上海經常對北京提些不同意見，我們從中知道一些，這才寫成一個東西。這裏面有這麼一個思想，即要有巴黎公社的精神。這是問題的核心。十六條第九條說：這些組織不是臨時的而是常設的，適合廠礦農村。文化革命委員會代表大會要象巴黎公社一樣實行選舉制。這是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十六條中這一條說得還不太明白，其實很重要。毛主席要用巴黎公社形式代替舊的國家機器，幹部要選舉，隨時可以撤換，不是任命制。毛主席還說過他自己的工資不應高于中等技術工人。這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十六條第四條說，群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不要怕出亂子。他認為這個亂是亂了舊機器，舊秩序，他認為舊機器反正已經快腐爛了，就該讓它亂，亂了才能有新的。十六條第三點，重要的是更明白地把革命對象定為黨內走資派。四清是指局部的，農村的，這是指全局的。集中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毛主席的思想，認為這種人就在黨內，要揭露、清算他們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十六條主要是講這一面。然後又講另一面，即要有界限，擁護社會主義的人，雖然說了些錯話，辦了些錯事，寫了些錯文章，也不能叫做走資派。毛主席後來又發展了，即使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祇要不是拒絕改正的，屢教不改的，也不能作為敵人。這是重要的界限。另外要把幹部分為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錯誤但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第四類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是前三類，第四類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打擊面要縮得很小。還有，不準隨便把人打成反革命。特別要保護群衆的革命行動，一般群衆行動也要保護。不能輕易把革命群衆、也不能把一般群衆打成反革命。這是毛主席總結歷來的經驗得出來的。以前常把對領導提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先叫人大鳴大放，然後就把人打成反革命。另外，指出除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的反革命分子要依法懲處外，群衆中的問題，特別是學生，一律不許整。毛主席還反復說明所謂放毒是真去放毒藥，不是說他講話裏有毒素就叫放毒。

對報紙上點名，毛主席還是加以控制。毛主席說報紙點名要經過同級黨委批，重要的人物要經過中央批。當時確定地委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中抓革命促生產是毛主席最後加的。毛主席不怕把舊秩序弄壞，但還是怕把新秩序弄壞。

毛主席回來後，看到十六條初稿，說大體可以，但太長，要換換手，修改一下。他要陶鑄、王任重、張春橋、王力修改。又開了一個樓，十五樓。這不是對陳伯達不信任，祇是換手。因為自己寫的東西總是捨不得刪，換換手可以刪一點。最後也沒有作多少修改，毛主席也就同意了。他自己再改一改，就提到會上了。一般人祇重視五一六通知，不重視十六條，是不對的。十六條提出巴黎公社原則，這是很重要的。有人把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當成兩個不同性質不同內容的東西，認為五一六通知講得很凶，沒有政策界限，十六條有政策界限。他們不了解，兩個文件是一回事，都是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確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

想、理論、政治路線，十六條是五一六通知一發表毛主席就提出要搞的文件，同樣代表毛主席的思想，同樣是綱領性的。它所解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組織、路線、方法、政策界限問題，這兩個文件是毛主席同時考慮的。更不能認為通知是毛主席搞的，十六條是以劉少奇爲首的黨中央搞的。十六條也是相當厲害的，提出了巴黎公社原則，考慮用什麼新機器代替舊機器，這是多麼大的問題！

（五）十一中全會的人事變動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接班人從劉少奇換成林彪，但還是要把劉少奇放在常委會。常委名單是毛主席親自提的，經過林彪、周恩來、江青同意。這次大會實際組織者是周恩來，名義上是陶鑄。周恩來把名單拿來徵求林彪、江青的意見。毛主席原來安排的次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江青說，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還升了？原來是第七位，現在升到第四位，這怎麼行？要把陳伯達排在鄧小平前面。江青又說，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來。這樣就成了陶鑄第四，陳伯達第五，鄧小平第六。毛主席同意了。這說明毛主席還是要用鄧小平，剝筍政策還沒有剝到鄧小平。不過這麼大的事不該江青參與。江青那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第一綫的問題，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從外地回到北京後就是第一綫了。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說了毛主席回到第一綫。毛主席回來後，在一次小會上陶鑄說主席最大

的失誤就是劃分一線二線，因為毛主席退居二線，中央才出了這麼大的問題。十一中全會的簡報是陶鑄掌握。謝富治在小組發言批評到鄧，說進城後老部下找鄧他都不見。如取消鐵道兵，這是多麼大的問題，陳再道找鄧，鄧都不見，祇是丁關根、呂正操幾個人在橋牌桌子上就定了。這些話陶鑄沒有編到簡報裏，祇編到特刊上，給少數幾個人看。這一點江青非常不滿，說陶鑄為什麼保護鄧小平？她罵陶鑄簡報編得不好。中央委員選舉常委時，江青還對康生、陳伯達、陶鑄說，你們是有投票權的，你們為什麼投鄧小平的票，讓鄧得了全票？

大會上關鋒給江青遞了個條子，說這是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出現了逆流，等等，江青把條子轉給毛主席，在全會上印發了。林彪看了這個條子後立即要葉群去找關鋒，說林總很重視你的條子，林總要找你，你把你的地址電話告訴我。林彪用關鋒，就是因為這個條子。後來林彪一直用關鋒，但關鋒不敢背着江青給林彪辦事，每次去林彪那裏都要拉着我和戚本禹。後來打倒王力、關鋒時，江青說，你關鋒不要以為寫了個條子就有了政治資本，那條子是我叫你寫的，內容是我的不是你的。

十一中全會後，文革小組建立制度，從各處調人，要我兼辦公室主任，沒幹幾個月，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就不要我當了，改由解放軍報的宋瓊當主任。後來不到兩個月，宋瓊又被江青打成「胡痴小集團」，也就不要辦公室了，叫辦事組。沒有頭，就要王廣宇負責事務。他是馬列研究院的一般幹部。

十一中全會後，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當時有兩套班子：總理一套，文革小組一套。總理、陶鑄也參加文革小組的會，凡是通知他們的會他們都來參加。但文革小組的會不是每次都通知的。會幾乎天天開。地方的事，文革小組不能定，它的職權是負責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但不能下指示。文革小組向各地派記者，出《快報》，反映情況，還到各機關、學校了解情況，北京哪裏出事到哪裏去。還有就是接待群衆來訪。陳伯達、江青直接對主席負責。陳伯達這時管的《紅旗》紙對主席負責，從不請示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

十一中全會後陶鑄是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也不說鄧小平是總書記了。十一中全會後書記處實際上便沒有了。雖然還有一批書記處書記，但沒開過一次書記處會議。陶鑄曾提出過要健全書記處，要建立制度，要有個班子，準備些材料，被江青在人大會堂的政治局會議上反對掉了。她說：你還搞這個幹什麼？陶鑄以後再沒有提。劉寧一祇是在接待外賓時有書記處書記的頭銜。陶鑄實際上祇管了宣傳部。

（六）「生活會」批評劉少奇

十一中全會後開了政治局擴大會（中央文革成員參加），也叫「生活會」，批評劉少奇。新常委都到了，陳雲沒到。文革小組成員中部隊的幾個人沒參加，包括劉志堅、謝鎧忠、加了肖華、楊成武、葉群。這個會本來沒有說批鄧。可是江青發起，林彪響應，說主要危險不是劉，劉已被毛主席一張大字報打倒了，現在主要危險是鄧。因此這個會變成劉鄧並

列，據我了解，這同毛主席原來的設想不一樣。會上對劉少奇進行了批評，劉少奇作了檢討。林彪對劉少奇的批評也並不那麼尖銳，除一般的話外，祇是說歷史上在蘇區你眼裏根本就沒有我們這些人。（那時劉在蘇區具體工作崗位不高，是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林是一軍團司令員。但劉當時就是中央政治局成員，林還是年輕幹部。）林彪對劉少奇批評不怎麼尖銳，但對鄧就講得很重，特別是把鄧同吳晗、彭真、北京市委聯繫起來，說你一天到晚同吳晗打撲克，打的是政治撲克。吳晗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你的問題性質是很嚴重的，是政治性的。意思就是敵我矛盾。總之說得很凶。而且林彪公然提到野戰軍問題，說你吹噓你的二野，你搞四卷毛選的注釋時沒有把各個野戰軍擺平，突出你的二野。其實許多人包括康生在我們看來，鄧小平還是比較公正的，對二野也比較克制，并不是象林彪所說的。這次會毛主席內都知道，搞毛選時各個野戰軍將領都爭功，而鄧小平是總書記，他又不在部隊，當時在我們看來，鄧小平還是比較公正的，對二野也比較克制，并不是象林彪所說的。這次會毛主席要批劉少奇，江青要把劉鄧并列，以鄧為重點。在江青看來，鄧是掌握軍隊的，是她掌權的障礙。這點江青同林彪一致。林彪並不怎麼怕劉少奇，林彪認為能同他爭權的不是劉而是鄧。鄧是淮海戰役前委總書記，是指揮兩個野戰軍的。毛主席派抗美援朝的指揮員時，第一是考慮林彪，林彪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去，第二考慮鄧小平，但鄧小平國內工作離不開，第三才考慮彭德懷。指揮大規模作戰，指揮百萬大軍的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在毛主席看來，這兩個人政治上也都很強。我覺得在毛主席心目中，一直是劉鄧要分開。毛主席不

祇一次反復地講資反路線由劉少奇負責。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常委排序時把劉往下壓了，而鄧是往上提的。後來雖然江青提意見把鄧壓下去，但是也還不低。劉早就不好分配工作了，祇是國家主席的職務沒有撤。鄧在常委還是有分工的，他管中聯部、中調部，還有一個重要的分工是彭羅陸楊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可是這個會上林彪把鄧罵成那樣，鄧沒法工作了。鄧當場對康生說，我現在沒法工作了，因為把我提成敵我矛盾，我沒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這個會前，葉群跟肖華、楊成武談話，江青、張春橋跟王任重、王力談話，動員批鄧。江青說劉少奇沒什麼，一篇大字報就打倒了，最危險的是鄧。他在十一中全會上得了全票，在黨內還很有影響。這次會要批鄧。可是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對鄧都不熟悉。江青說，王任重、王力是黨的優秀幹部，在這問題上你們要發言。張春橋還對我說，主席起初不同意你為文革小組組員，說你是彭真的人。他說這個話是為了壓我批鄧。但會上我還是沒有發言。為此江青一直恨我。王任重發了言，我認為他是很勉強的，是應付之辭，不痛不癢。他發言時滿頭大汗，說明他不是出自內心的。肖華、楊成武按照林彪的指示，講鄧講得多。從鄧講到李井泉，講到西南局，講到賀龍，這樣毛主席就把這個會停了。

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第一個浪潮

(二)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所有常委都要上天安門同群衆見面。爲這件事，周總理煞費苦心。劉少奇已經靠邊站，但並沒有公開批判。「十一」是國慶，國家主席不能不要。總理再三躊躇怎麼辦，位置怎麼站，擬定方案後報毛主席。方案是：毛主席站中間，左邊是林彪，右邊是劉少奇。當時既要象個國家的樣子，便不能按常委的次序排列，但又要能在中央文革通得過。總理考慮得非常周到，把少奇同志安排在主席身邊，又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少奇同志這一邊，這樣一來，文革小組也沒什麼話可說了。總理定了名單後，先在文革小組談，通過了。然後馬上報毛主席、林彪。毛主席同意了。

這天接見紅衛兵，名義上是十一名常委都出席了。但到晚上，毛主席就改變了常委一致出席的安排，組織了一個以他爲首的車隊，從群衆中穿過，是坐的敞蓬吉普車，參加的不是

十名常委，祇有毛主席、林彪、總理、陶鑄、陳伯達、康生和李富春。劉、鄧、朱（德）、陳（雲）四人沒有了。另外參加的還有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穆欣、葉群。沒有通知王任重、劉志堅。群衆爭着和毛主席握手，那天晚上擠死好多人。傅崇碧擠斷了肋骨。後來上了天安門。上天安門後，在座的有總理和文革小組的幾個人。我在場。林彪、陳伯達、康生、陶鑄、李富春都不在座，因為他們看完焰火後早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和我們談了一些話。他對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談完話後，在天安門城樓上照了相。總理對江青說，「我們經常見主席，我們站邊上，讓年輕的站在主席身邊」。結果是主席站當中，姚文元、戚本禹站在主席左右兩邊，其他人兩邊排下來，總理和江青站在兩頭。這張照片現在還可以找到。

國慶節林彪講話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紅旗雜志十三期社論（十月三日見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兩個口號其實是一回事，下面我要加以說明。

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況。據我了解，反映情況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鑄的女兒，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還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幹子女，她到林彪家裏反映軍事院校鎮壓群衆。因此林彪決定要發一個緊急指示，說軍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這個文件是林彪聽取了情況反映後口授的。文件概括了幾個問題：第一，把學校裏的舊的東西，條條框框，繼續束縛群衆運動的條條框框通通取消，同地方一樣按十六條辦理。第二，給被打成

反革命的學生一律平反，整他們的材料一律無效，交給本人或當衆銷毀。第三，確實有一小撮壞家伙，要揪出來批鬥。第四，明確宣布取消院校黨委對運動的領導，軍事院校不許串連的規定予以取消。這個指示不僅適合軍事院校，而且把地方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規定了怎麼做，簡單明了徹底。中央完全同意，毛主席批了很好，很重要，地方也適用，要貫徹執行。祇有一條是毛主席本來就不同意的，就是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說，其實早就介入了。軍委緊急指示也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文件，也是在全國範圍內點火的。當時認為這個文件很好，葉劍英在廣場在全軍大會上宣讀，張春橋在體育場宣讀。有人說這個文件不是軍委起草的，是中央文革什麼人起草的，這不對。這個文件葉群把責任推給劉志堅，有人說劉志堅當時不同意。有人說劉志堅要堅持黨的領導，陳伯達、康生、江青要取消黨的領導，我不知道有這個爭論。這個文件符合毛主席的思想。

(二)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中央工作會議

過去研究文革史的人，都把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成孤立的一件事，說因為社論一出來，就掀起一個高潮，矛頭針對了老幹部，而把中央工作會議看成了另外一件事。實際上批資反路線同工作會議是一回事，工作會議就是為了貫徹批判資反路線。還有人說，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已經靠邊站，工作組也撤了，為什麼還要徹底批判資反路線？這是因為，以前批判資反路線，主要是批十一中全會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劉

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發生的問題，這問題在十一中全會已經算是解決了。而這次批資反路線，實際上已經不是解決劉少奇的問題，而主要是解決八九兩個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主要是總理、陶鑄）以及各省市委領導人的問題。毛主席認為他們在這兩個月中對路線鬥爭是不明確的，不堅定的，不徹底的。毛主席從九月份就形成這一概念。現在歷史學家把有造反派頭頭（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等）參加的大專院校座談會也當成是偶然的，某個人組織的，這也不是。這個會也是根據毛主席的思想來開的。會議本來是王任重主持的，王任重沒興趣，改由張春橋主持。會上學生發言說造反派還在受壓，說周總理和稀泥、折衷主義。也批評了陶鑄。張春橋沒怎麼表態，祇是說我們回去如實向中央匯報。江青聽了張春橋的匯報，她說總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義。會議記錄當時整理出來了，有全文，江青說記錄要送一份給總理，但她說不給陶鑄。記錄主要送給毛主席，這加深了毛主席自己對形勢的判斷。當時毛主席的概念，認為這兩個月群衆是發動起來了，成績也很大，但領導是不力的，沒有明確地對主要的對象進行批判，目標分散，不明確，不集中，沒有對準錯誤路線，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主要對象，沒有觸動毛主席認為的舊的機器、舊的組織、舊的機構、舊的紀律，采用的是舊的方法。沒有給過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沒有處理當時所謂的黑材料，退給本人。沒有支持被認為是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人，沒有建立新的機器、新的組織、新的紀律，沒有採取新的方

法，還是老的一套。各省市也是如此。毛主席的一套主張，包括五一六通知，十六條，「我」的一張大字報，並沒有在全黨貫徹執行。也就是說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執行很不得力。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主席這一思想要在國慶節林彪講話和紅旗社論中表現出來。有人說十月一日林彪講話中「反對革命路線」的提法還沒有形成概念，而紅旗十三期社論無限上綱，才形成新概念，這不對。他不知道這是一回事，是同時布置的，寫的人也差不多。林彪的講稿是陳伯達、張春橋起草的，紅旗社論是陳伯達、關鋒、王力起草的。林彪講稿上本來提的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快要講的時候，陶鑄、王任重、王力對毛主席說，「反革命路線」提法太重了，中國人最怕「反革命」三字。毛主席說，那就加個「對」字，成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這樣就輕一點了。林彪就這樣講了。當天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張春橋又說：「反對革命路線」概念不清，容易誤解，文字不通，表達不清楚。毛主席說，那就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旗雜志社論原來用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但毛主席決定了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以後，紅旗雜志當然也得照此改。爲此拖了一天，十月二日才廣播，三日才見報。紅旗社論上改的這幾個字是王力寫的，但發明權不屬於王力。江青還要在社論中寫上「和稀泥」、「折衷主義」，文革小組討論時改得緩和一些了，不那麼露骨了。

紅旗雜志出來後周總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說他要去問毛主席。事後他告訴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總理知道這是毛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總理以後就照着毛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

國慶節後，十月四日，毛主席提出要把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主要領導人找來開個會，這就是中央工作會議。通過這個會把毛主席的精神貫徹下去，在中央內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中央工作會議是毛主席十月四日提出，九日至二十八日開的。這個會就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會，跟紅旗社論是一回事，不是兩回事。

有人說，紅旗十三期社論後才掀起了揪鬥老幹部的風潮，這不對。光是一篇社論起不了那麼大的作用。還有人因為紅旗社論底稿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幾個字是王力的筆迹，因此就把它定為王力的罪狀。這更是不能成立的，這提法的來歷上面已經說明了，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在秦城時公安部門的同志就說：「我就不相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是王力提出的，而中央十大常委都響應王力的號召。我要查檔案。」他查了檔案後，就不把

這作爲王力的罪狀了。可是中紀委和兩案辦公室至今還把這作爲王力的罪狀。我的申訴書對此已經作了說明，現在再把當時的背景講清楚。

（三）毛主席的思想和陳伯達的講話

毛主席一開始就叫大家談工作會議怎麼開，談了以後叫陳伯達和文革小組搞個報告，把兩個月的運動總結一下，把路綫鬥爭的繼續作爲會議的主題。九號開會，會前會後毛主席都講了他的思想，陳伯達執筆寫成他的報告。所以工作會議上最重要的不是林彪的講話，而是陳伯達的講話。陳伯達的講話不能說是他個人的。陳伯達起草報告的過程中找了我。是陳伯達爲主、我爲副起草的。報告對文化大革命估價非常高，認爲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國歷次革命和群衆運動都更深刻，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運動。這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毛主席認爲這個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沒有這次深刻、高級。另外毛主席着重講兩條路綫鬥爭，這個兩條路綫鬥爭已經不是指五十天的鬥爭，而是指十一中全會後的兩個月。毛主席認爲兩條路綫鬥爭十一中全會後還在繼續。工作組的問題解決了，撤走了，但工作組的影響並未解決。毛主席認爲各地採取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新形式。工作組走了以後，如果還是舊的組織原封不動，還是舊的機器、舊的紀律、舊的方法，祇是換一種形式，還是不行。工作組走了以後，成立了文革委員會、文革小組等等組織，有的領導人自己組織了紅衛兵，在自己直接領導和支配下組織了紅衛兵或其他組織。他們也搞串連。原來毛

主席認為是造反的組織，變成官辦的組織，實際還是老組織、老辦法。毛主席認為有的地方組織工人農民反對學生，保他自己那個黨委，而不是發動群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認為這一段沒有支持那些毛主席認為是堅決擁護革命路線的、過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是毛主席認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們繼續受壓制，而原來黨組織領導操縱下的組織，還是成為所謂的多數。所謂革命左派還是受壓制、受打擊。這是毛主席的看法，在陳伯達的報告中得到反映。另外報告提出了一些問題，也是照毛主席的思想說的，比如說對路線錯誤問題要分開來看，一種是提出錯誤路線的人，一種是執行的人，二者要分開，這是毛主席的思想。誰是提出資反路線的人？根據我的接觸，毛主席一直認為是劉少奇，他沒有把劉鄧并列。而陳伯達報告說資反路線是劉鄧提出的，這一點在起草過程中我同陳伯達不一致。我說，毛主席一直說劉鄧要區別。毛主席的大字報主要說劉少奇。現在把劉鄧并列，提「劉鄧路線」，合適嗎？陳伯達說，反正還要送毛主席，如果不合適毛主席會改的。後來送上去毛主席也沒有改，就這樣定了。林彪報告也是提的劉鄧路線。

社論說資反路線有提出的，有執行的，這是為了爭取各地方、各部門，說你們不過是執行中的錯誤。毛主席本來認為很簡單，一說通了，改了就行了，就站到毛主席一邊了。毛主席看來改很容易，但要有三個標志：第一，是不是向群衆公開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第二，是不是給那些被工作組或什麼人打成反革命的群衆認真平反，把所謂黑材料抽出來，當衆燒

毀或退給本人；第三，是不是支持革命行動，也就是支持所謂造反派，屁股要坐過來。特別是第一條，公開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那就要徹底批判錯誤路線，不徹底批判錯誤路線，就不能執行正確路線。而徹底批判錯誤路線，本來是批五十天，現在要批的不是工作組，不僅是五十天，而是批那些采用新形式抵制群衆運動，控制群衆，不許群衆造反的人，概括地說就是挑動群衆鬥群衆，組織部分群衆來保衛自己的人。盡管不是用工作組，而是用文革小組的形式也不行。是不是有決心自下而上揭露工作中的陰暗面，不在乎有没有工作組。工作組也可以執行正確路線。有的人把自己封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祇要群衆批到自己頭上，就叫做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不允許，那是不行的。這次批資反路線，五十天要檢查，兩個月也要檢查，才能把舊的一套改變。毛主席還說，要講團結，錯誤路線的執行者，不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思想的右派分子。他們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祇要改了，本來是二類三類的，很多人還能成為一類。但如果堅持不改，矛盾就要起變化，就會由人民內部矛盾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方面，變成敵我矛盾。所謂被錯誤路線欺騙蒙蔽的群衆，要開脫，不要叫他們負任何責任，對他們不要歧視，不要扣帽子，要團結，這也是毛主席講的。毛主席以為憑他的威信和在黨內的影響，祇要講清楚，大部分人會跟着他，按他的一套搞。

毛主席還着重講不要怕亂，這問題他過去就講過，這次又反復強調。第一不要怕群衆亂來，第二不要怕把舊的機器、舊的組織、舊的紀律、舊的秩序打亂，第三不要怕妨害生產。

毛主席認為革命不會妨害生產，還會促進生產。毛主席一直講要促進生產，既然要搞這麼大的運動，就不要以「妨害生產」為借口而不搞革命。再一點，不要怕反革命鑽空子，不要怕所謂右派翻天。軍隊在我們手裏，右派翻不了天。總起來說，不要怕群衆、怕革命。這次革命到自己頭上，不要怕。這才能解決十七年來脫離群衆的問題。

毛主席特別講到階級路線問題。主要以對待這次大革命的政治態度作為區別左中右的標準，要貫徹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運動中發展壯大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也就是真正的左派隊伍。他認為左派隊伍還不够强大，還在繼續受壓抑。毛主席說左派不是極左，要爭取中間的、動搖不定的、可左可右、可前可後、可進可退的人。有了堅定的無產階級核心，團結中間狀態的人，徹底孤立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認為這種人很少），把他們孤立起來，就可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反革命分子象東歐一樣篡奪了黨、軍隊和政權。他這一套道理，陳伯達和我並沒有完全表達出來，祇能說大體上表達了。有人說陳伯達報告是一個嚴重錯誤的報告。當然不可能是正確的。

毛主席還針對當時出現的問題，着重講了兩點：一是不能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要重視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毛主席說工黨的成員都是工人，蘇聯的領導人家庭出身都是工人，不能因為工人家庭出身就一定是無產階級立場。馬克思主義不是在工人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毛主席特別反對自來紅，反對分紅幾類、黑幾類。當時一些造反派就是因

爲不是紅五類而不够資格參加紅衛兵。毛主席反對所謂「龍生龍鳳生鳳，父是英雄兒好漢」的提法。第二點，毛主席說要正確對待少數、多數的問題。不能因爲暫時是多數就一定對。雖然是少數，但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綫，就是對的。布爾什維克長期是少數，祇有一次是多數。孟什維克長期是多數。毛主席在遵義會議前長期是少數。這些說法是針對有的造反派還沒有平反，還在受壓，各級領導自己組織了一些工農和學生保衛自己而說的。

陳伯達報告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爲什麼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陳伯達對此作了闡明。另外很明白，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已經不是指十一中全會前的五十天，而是指會後的兩個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主要是針對當時繼續居于領導地位的一些同志。在中央主要是周總理、陶鑄。（陳伯達報告也并不是每個地方都用「資反路綫」這個詞，有時是用的「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綫」。）

（四）林彪的講話

林彪講話是十月二十五日，即在陳伯達講話後十天，會議快結束時講的。他的講話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問題，主要是從理論上闡明一些問題。他對形勢作了一些分析，說兩頭勁很大，中間不足，甚至頂牛。所謂兩頭，一頭是毛主席和堅決跟毛主席站在一起的人，一頭是發動起來了的群衆。所謂中間，是中央各部和各省市各級領導，他們勁不大，還有頂牛的現象。因此毛主席才建議開會的。林彪講話中影響比較大的，很多人現在還記住的，比如「革

命的群衆運動是天然合理的」，這說法不那麼科學。還有「提倡一個公字，狠鬥一個私字」，「大立一個公字，大破一個私字」，「共產主義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公產主義」，這說法也不科學。這幾句話在文革中流傳很廣，有很大的影響。這些說法都不完全科學。林彪講話不是會議的綱。

會上所有常委（不記得有沒有陳雲）都講了話，都有批評自我批評，不是檢討自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就是對資反路線進行批評。各省市委負責人講話也是如此。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常委講話中最重要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檢討。

（五）劉少奇的檢討

毛主席早就要劉少奇做檢討。十一中全會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就準備要劉少奇在一定範圍內作檢討。全會後常委會的「生活會」也是要劉少奇作檢討。還沒有來得及檢討，「生活會」就停掉了。劉少奇九月十四日就寫出檢討，這是工作會議前很久了。當時劉少奇還有書面表示，他給毛主席寫信，說「以我為錯誤典型，把我拿出來批評，對黨對人民有利，對推動文化大革命有利，我願意這樣做。」劉少奇的檢討送毛主席後，毛主席當天就批了，認為寫得很好，是很嚴肅的、很誠懇的。毛主席認為劉少奇不但檢討了五十天，還根據毛主席的大字報檢討了一九六二年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毛主席對此很滿意，認為這一部分更好。劉少奇還提到他絕不作兩面派。據我和毛主席、劉少奇同志長期

接觸中了解，劉少奇對毛主席所堅持的意見，他一直是擁護的。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劉少奇祇要知道毛主席不同意他的意見，他總是考慮改正自己的意見。他并不是把自己同毛主席并列。這一次毛主席提出這麼厲害的意見，對他是很大的震動，但他還是從自己方面找原因。事情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一九六二年的問題，以及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問題，現在有些歷史學家說少奇同志當時所支持的意見是對的。一九六二年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還有支持陳雲在財經方面的意見，對這些劉少奇都作為問題檢討，認為是很大錯誤。現在歷史學家已經作出了另外的結論，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已重新作了結論，我們不去管他了。一九六四年四清中的形左實右，桃園經驗，以及他自己的講話，說調查會的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作中央委員等等，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沒有說這是對的。一九八一年我和鄧力群談話時，他也說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文字上雖然沒有明說，但有這個意思，即劉少奇在四清中比毛主席還左。現在劉少奇把歷史上的問題也講了，毛主席是滿意的。因為這樣證明毛主席的大字報是正確的，證明劃分了一綫二綫以後，一綫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特別是在兩次路綫問題上犯了錯誤，而這兩次錯誤都是毛主席親自糾正的。劉少奇的檢討證明了毛主席大字報的正確性。這問題由劉少奇來說比毛主席來說更好。在毛主席看來，應該使全黨認識五十天的錯誤，認識一綫主要負責人的錯誤，而這兩次帶路綫性的錯誤都是毛主席糾正的。這一次錯誤又是前兩次錯誤的繼續發展。

毛主席對劉少奇的檢討，開頭是滿意的，要發給一些人，補充修改後在一定場合講一講就行了。毛主席九月份就這樣表態了，可是江青首先不同意，認為劉少奇檢討不深刻，不同意讓劉少奇過關。江青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毛主席原來還沒有想到召開工作會議，他原來設想在北京市委這個範圍，再把工作組的負責人找來，讓劉少奇說一說，發到全黨就行了。可是後來又發展了。到九月份，認為下面頂牛很嚴重，劉少奇的錯誤影響很大，繼續頂住，資反路線以新形式出現。毛主席原來設想文革搞三個月，他的一套就能搞下去了，整個黨的面貌就改變了。新的組織、新的紀律、新的秩序就可以建立起來了。後來三個月不行了。到工作會議前夕，毛主席又認為文革要搞半年，就是已經搞了兩個月，再搞四個月，搞到一九六七年初。這樣，對劉少奇檢討的估計，讓劉少奇過關的設想，沒有得到實現。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作檢討時，稿子基本還是九月十四日的稿子，作了些修改補充。劉少奇的檢討發給全黨。

(六) 鄧小平的檢討

據我了解，毛主席對鄧小平是不把他與劉少奇平列的。把劉鄧平列的，首先是十月十六日陳伯達的總結報告，說提出資反路線的人是劉鄧，并用了「劉鄧路線」的詞，還說資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劉鄧司令部。毛主席寫大字報時沒有這意思。陳伯達報告送毛主席以前，我向陳伯達提了意見，我說毛主席認為劉鄧要區分，毛主席的大字報沒有說劉鄧，毛主席要劉少

奇在一定範圍內檢討，沒說鄧小平，沒有要他們並列檢討。陳伯達說，反正要毛主席定稿。後來稿送去後，毛主席批了很好，祇說要加上抓革命促生產。陳伯達這一報，毛主席這一批，林彪又大講劉鄧路線，正式提出了劉鄧路線這個詞，就把劉鄧平列起來了。

鄧小平的檢討是臨時作的，不是從九月份起就作的。鄧小平的檢討送毛主席是十月二十一日，是急就章。鄧的檢討着重講五十天，沒有多講歷史問題，祇承認一九六二年錯誤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錯誤他沒有份，而且當時他就有不同意見。鄧說這次錯誤是他同劉少奇的錯誤。劉少奇的檢討說由他一個人負責，鄧說他和劉兩人負責，別人都不負主要責任，特別是工作組不能負責任。毛主席認為，別的一些人也認為，鄧的檢討很誠懇，本來不能由他負責，他還說他負責。鄧的檢討講到，他這樣高的領導幹部，長期獨當一面的同志，學習很差，沒有跟好毛主席，嚴重脫離群衆，脫離實際，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得少，同群衆接觸少，同幹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之間也接觸少，對工作不够勤謹，沒有認真向群衆作調查研究工作，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祇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他說，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主席思想的軌道，必然發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觸，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并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認真，向同志向群衆請教很少，特別是向毛主席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

不允許的。一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個獨立王國，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原諒自己，并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是鄧的檢討。當時毛主席及其他同志認為鄧小平的毛病也不過這些。作為一個負責同志，能這樣檢討也就不錯了。對他有意見的也無非說有的同志找他他不見，沒有象林彪那樣把他罵得一塌糊塗。至于說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這是言不由衷。後面還談到不寒而慄，要補過，要保持晚節。

檢討本來到此為止，毛主席看了後，希望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如說「我要有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相信在相當時間內錯誤會得到改正，請給我時間，自己努力站起來。幹了半輩子，跌了跤，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鄧小平照毛主席的話說了。毛主席還把「初步檢討」的「初步」二字也勾了。毛主席的意思是不要以消沉的話來結束，要以積極的話來結束。鄧的檢討，在當時條件下不能說是被迫的。但是對林彪的亂罵鄧是不會同意的。對陳伯達，鄧一直有意見。他的檢討中對林彪、對陳伯達的部分，不會是由衷的。

仔細分析，鄧小平以及劉少奇並不是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明明白白地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般還是說錯誤路線，或者用毛主席的提法，說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提出的路線」。鄧有時也用「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

(七) 中央工作會議以後

工作會議把劉、鄧的檢討，陳伯達、林彪的講話，作為正式文件發到縣團級，實際上全黨都知道了。會議把問題直接捅到群衆中去，造成十一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受到很大衝擊，很難按過去的形式、方法領導下去。會後叫各省負責人、第一書記回去作檢討，檢討自己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是祇要作了檢討，給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表態支持造反派，就可以過關。可是作到這一條不容易。中央開會的消息傳出去，各省的會就開不成了。各省第一書記在劉鄧領導時期執行了資反路線，十一中全會後這兩個月，各省執行的又不是那麼合乎毛主席路線和基本思想的黨中央的作法，這不叫路線，叫不得力的、不徹底的，總之執行的也不大對。這樣，各省以及中央各部在會後就很難按照原來情況繼續進行工作了。有的省領導人一下火車就被包圍，會也開不成了。真正在全國、全黨範圍內揪鬥領導幹部，是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特別是會後開始的。這種形勢，當時在毛主席看來好得很，過去沒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開始動起來了。

毛主席是不是要把各省市、中央各部負責人都打倒？據我所知不是的。不單是周總理、陶鑄要保一些人，要「救火」，當時毛主席給中央文革的主要任務也是「救火」。該保護的幹部要保護。現在有些人說保護幹部的功勞都屬於周總理，這不符合事實。毛主席的思想，一方面要讓群衆充分揭露，要讓幹部到群衆中去，一方面還要保證他們的人身不受侵犯。這

就叫「救火」。當時部隊也動起來了，也要「救火」。毛主席給周總理、陶鑄和給中央文革的指示是一致的，都是一方面要群衆起來揭露陰暗面，要讓領導人到群衆中去，一方面要保證他們安全，保證他們過關。有的地方亂來的，要親自去解決。毛主席要我和謝富治到化工部，保護高揚。要支持群衆揭露，但不許亂來。當時化工部有些外地來的人搞得很亂，對化工部的機密資料採取了破壞性的行動。我和謝富治立即去化工部，當場抓了兩個人，把破壞分子抓了，保護了檔案。總之，到處都在「救火」。

工作會議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實際上是因為毛主席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同志周總理、陶鑄同志兩種想法不一致、有矛盾。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和主要矛盾問題、紅衛兵問題、中央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問題。下面再具體說一下。

(八) 主要矛盾和主要對象問題上的分歧

毛主席認為八九月間中央同志領導不力，沒有抓住主要矛盾，主要對象。有人說為什麼亂打亂鬥禁而不止，是因為毛主席要天下大亂，是因為毛主席肯定了北大亂打亂鬥是革命事件，所以才發生這些事。我認為這是不了解當時毛主席的基本態度。毛主席說的天下大亂不是這種亂法。破四舊毛主席不贊成。北大問題是不是革命事件，不在于亂打亂鬥，而在于毛主席認為這不是反革命。北大簡報是說了「反革命」，是當反革命處理的。而毛主席認為不應該把響應毛主席號召的人打成反革命。有人說造成亂的形勢是因為到處引用了毛主席在湖

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一段話而造成的。這一段話還寫進了十六條。有人認為因此才造成了亂的局面。這問題我問過毛主席。我說：現在文化大革命中能適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提法嗎？毛主席明確地說不適合。但他在會上還是承認「我闖了禍」，「我也有份」，「把我的話到處用」。我當時就認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那幾句話，是針對當時情況說的，是在當時黨內鬥爭的情況下說的，有些過激的作法，如戴高帽子、游街、槍斃，打倒在地再踏上一紙腳等等，在湖南當時也是不對的。（這點我沒有對毛主席說。）中心問題是文化大革命對象是誰，目標是什麼，這次革命主要解決什麼問題。在毛主席看來，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這次不是解決民主革命的問題，主要對象不是舊的地主惡霸、特務、反革命間諜等等，當然這些也在清查之列，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是防止蘇聯式的復辟，防止改變顏色。紅衛兵封了民主黨派，可是在毛主席看來，主要問題不是民主黨派的問題，主要是我們自己黨內、政府內、軍隊內、以及群衆組織、文化組織的領導，當權的，要搞資本主義的，要和平演變的，才是主要對象。關於反動學術權威，在他看來也主要是黨內的，如吳晗。毛主席認為這些才是主要對象。而我們一搞就是搞那些民主革命的對象，如劉少奇同志主持工作時，在懷仁堂匯報，都是查這些問題，而沒有把目標放在黨內走資派，防止演變，防止復辟。陳老總代表外事口匯報，說外事口查了三個主要對象，一個是李昌，他母親是四川最大

的地主惡霸，李昌跟她的關係還很密切。第二個是宦鄉，家裏抄出美金，意思說可能是裏通外國、間諜之類。第三個是浦壽昌，曾經是總理的外事秘書，美國博士。這三個人現在看來都是整錯了。這種作法沒有同毛主席合拍。周總理做檢查時說自己對民主革命時期的敵我矛盾他是敏銳的，而對黨內路線鬥爭他是遲鈍的。特別是這次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是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執政十七年以後，形成了官僚主義的舊機器，要自下而上的揭露陰暗面，以自己為革命對象。毛主席認為，這次革命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共產黨自己為革命對象的。他設想革命對象是極少數，但確有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赫魯曉夫，這些才是主要對象。毛主席認為，八九兩月雖然搞得轟轟烈烈，群衆積極性要保護，但是沒有抓住主要點，批判錯誤路線，沒有把主要矛頭對準走資派，批判得不够，沒有給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毛主席認為這些人是革命的，是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自下而上揭露陰暗面的，沒有給他們堅決徹底平反、摘帽子，沒有支持這些人。紅衛兵起初也是被認為非法的，後來在毛主席支持下才合法了，還有些人沒有得到支持。紅衛兵在八九兩月大方向是對的，響應「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但這兩個月的實際行動，並沒有指向黨內走資派。

(九) 紅衛兵問題上的分歧

八九兩個月，中國發生了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這幾個月所進行的幾件事情，毛主席並不覺得那麼合乎他的意思，合乎他的路線。如最重大的一個問

題是紅衛兵問題。

紅衛兵最初并不是在大學發生。首先叫紅衛兵的是清華附中。還有其他一些類似的組織，也是在中學首先成立。中學的問題，也列入批劉的內容，劉少奇的資反路線，也包括把紅衛兵打成非法組織，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彭小蒙）。紅衛兵問題為什麼發生在中學？因為劉少奇直接聯系北大一附中，另外當時黨中央要團中央負責中學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也是在劉少奇直接領導下的，團中央確定了一個方針，搞了一個文件，劉少奇批了。團中央的意見是中學要停課，教師集訓，學生到農村去鍛練。這個文件沒有實行，遭到擁護毛主席的學生的反對，他們成立種種戰鬥小組，反對團中央不讓中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反對讓學生下農村。彭小蒙的講演也是反對這個。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支持彭小蒙，支持他們抵制團中央集訓教師和叫學生下農村的作法。毛主席指示叫我和支持吳德去支持彭小蒙。這一支持就把團中央衝垮了。團中央歷來是緊跟黨中央的，這次首先受到衝擊。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正式用書面表示了三個熱烈支持。一個是熱烈支持紅衛兵。紅衛兵被認為不合法，而毛主席表示熱烈支持。二是對彭小蒙和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支持。三是對全國類似的組織表示熱烈支持。毛主席認為紅衛兵及類似組織是群衆運動中自下而上創造出來的一種形式，不同于過去的舊機器、舊組織、舊紀律框框的一種形式。這封信在全國傳播，加上他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時穿上了軍裝，影響就更大。

了。穿軍裝事先沒有準備，臨時去會場之前決定要穿軍裝，所以第一次穿的軍裝不合身，是警衛員的軍裝臨時脫下來的，毛主席穿起來有點瘦。穿軍裝，表示他搞文化大革命要用解放軍的組織形式。一方面要依賴解放軍，一方面要用他從蘇區創建的人民解放軍這種形式，在這種形式的基礎上加以改進，作為新的國家機器的組織形式。另外在天安門城樓上獻給他紅衛兵袖章，他戴上了，這也不是事先計劃的。他戴了紅衛兵袖章，這說明紅衛兵也是當時他所設想的新形式。他認為舊的形式不行，通過黨和政府一層層傳達不行（軍隊可以，他的意志可以直接暢通）。他認為群衆團體也不行，十七年以來群衆團體沒有獨立的性格，不能代表群衆，官僚化了，而紅衛兵是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當時不祇是給毛主席一個人戴袖章，在主席臺上的常委、中央文革成員都戴了。會上馬上決定，常委、文革小組成員都量身子做軍裝。當時部隊正在做第一批滌卡軍裝，元帥們也都作了軍裝。此後領導人接見群衆或其他重要場合都穿軍裝。這說明了毛主席的思想。這一提倡，全國範圍不光是中學大學，都成立了各種紅衛兵組織。

紅衛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舊的運動。有些歷史學家不知道毛主席對破四舊的作法實際態度是什麼。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的了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我也不贊成。我跟陳伯達提過，我說四舊這提法不科學，根據毛主席思想，不應這樣提。這口號很籠統，沒有個界限。林彪的報告也提了四舊，但他也沒有叫人們對四舊這樣搞法。我認為思想文化不

能以新舊來區分，舊的思想文化當中有好的還是要繼承。風俗更不能不要。有害于革命的舊的習慣勢力保守勢力要反對，群衆的習慣怎麼能改呢？林彪講話有這提法，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社論中也這樣提了。林彪接見紅衛兵的講話號召破四舊，這講話稿毛主席也看過，當時也不知道會產生這樣大的後果。毛主席對當時的中央領導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祇搞破四舊這些東西，毛主席對此並沒有欣賞。林彪、陳伯達也沒有號召這樣去搞。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具體工作的同志對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華社提倡這樣搞。紅衛兵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報說好得很，新華社作了詳細的歌頌性的報道。在這一點上，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不滿意。但群衆行動也不好去制止。也沒有想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一出現打人，毛主席就說不行，要文鬥不要武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就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說武鬥祇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砸的問題，中央工作會議的時候就發生了。毛主席組織大家都去參觀八一學校，那裏砸的一塌糊塗，砸的都是公物。這樣的破壞行動同毛主席的初衷完全相反。關於砸文物，毛主席一開始就不贊成。文革小組什麼人提倡砸文物，我不知道。江青、陳伯達、康生都沒有提倡砸文物。康生、陳伯達對文物都是有知識的，不會瞎來。我當時祇聽到譚厚蘭到曲阜去砸孔廟，是戚本禹組織的，我對關鋒說，這是瞎搞。關鋒告訴了戚本禹，後來戚本禹也說不能搞。有人說後來到煉銅廠搶救了多少噸文物，這是

毛主席的思想，戚本禹執行的。他到煉銅的廠去搶救文物，不準他們化掉。他還帶了四個樣品回來，有一個鎏金小銅佛，放在他自己屋子裏。搶救舊書，不準毀壞舊書，也是根據毛主席指示，戚本禹作了一個講話，日本共同社還廣播了。文革小組沒有一個人提倡和歌頌破壞文物的行為。抄家問題，一發生毛主席就反對。不光不讓抄民主人士的家，對一般人也不贊成抄家。私設公堂，毛主席不贊成，毛主席指示文革小組到北京各地去查，關的人要放出來，不準虐待。

徹底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以後，紅衛兵內部發生了分化。原來的老紅衛兵，多是革幹子女。批判資反路綫後，他們的家庭受到衝擊，他們的思想也就發生了變化。老紅衛兵和後來稱為造反派的紅衛兵形成了對立。還出現了「老子英雄兒好漢」，「龍生龍、鳳生鳳」的血統論。而有些造反的紅衛兵為什麼得不到平反，不給他們退材料，不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就是因為這些人的家庭是「黑五類」，成分不好，或者他們本身就被認為是反革命。這個思想跟毛主席的思想對不上號。毛主席認為是搞錯了。毛主席反對血統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幹部子弟問題，他說幹部子弟不是不能領導，但紅衛兵最好不要由高幹子弟掌握。這問題中央沒有正式作決定，也不好正式作決定，祇好由陳伯達個人出面，說高幹子弟不要領導紅衛兵，但沒有引起別人注意。在紅衛兵問題上的分歧，第一是紅衛兵主要搞什麼，毛主席不贊成搞破四舊那些事。第二是紅衛兵內被打成反革命的，響應毛主席號召的，要革命的

人，要得到支持，要平反，要退材料，包括蒯大富、譚厚蘭、王大寶等等參加大專院校座談會的那些人，他們在九月下旬還沒有得到支持，還處于少數，處于受壓的地位。也的確有些地方領導同志轉不過彎來。我們黨的傳統什麼都由黨來領導，而毛主席認為要支持下面起來的組織。有的領導同志轉不過彎來，都要自己直接去領導紅衛兵，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要在各級黨團領導下來進行，而毛主席認為這是官辦的紅衛兵，認為他們自封為無產階級司令部，跟工作組一樣，誰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革命，現在是誰反對我這個黨委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在自己掌握下，不是把矛頭對着毛主席認為的黨內走資派，讓群衆揭露我們自己。這一點大家都不習慣，誰也不敢放手搞。所以這幾個月普遍產生了毛主席認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產生了「保守派」、「保皇派」。

周總理和陶鑄同志力圖把紅衛兵運動納入黨的領導的軌道，各省市也都這樣作，這同毛主席有分歧，毛主席認為不能這樣搞。真正理解毛主席思想的人不知有沒有，我們當時也不怎麼理解，後來琢磨出一點。王任重也力圖把紅衛兵納入黨的領導的軌道，他在釣魚臺開了一個樓，聯系指導紅衛兵。王任重同江青的矛盾也包括了上述的問題。

聯動本來是老紅衛兵，破四舊時他們很積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他們發生了變化，和後來被稱為造反派的紅衛兵形成對立。聯動罵戚本禹不過是個十七級幹部，他算老幾？罵關鋒算老幾？說要開汽車把關鋒撞死。他們對王力還比較客氣。後來中央文革經過毛

主席同意，把聯動宣布為反動組織。有些人還抓起來了。江青在一次大會上說「周榮鑫是聯動的後臺」，一句話就把周榮鑫打倒了。她的矛頭是針對周總理的。周榮鑫是周總理聯系紅衛兵的助手，給聯動一些物質支援，給汽車、軍毯、軍大衣、軍裝。周榮鑫被打倒後，周總理陷入極大的被動。周總理說怎麼辦？沒有周榮鑫，我怎麼和紅衛兵聯系？江青說可以叫張春橋來當國務院秘書長。周總理當時就加以拒絕，說我可用不起張春橋。後來聶總提了意見，別人也提了意見，毛主席接受了，決定釋放被抓的聯動的孩子們。江青搶先去放，還把她的書發給每人一本，孩子們熱淚盈眶，感謝江青阿姨。江青很會收買人心。

大串連，同破四舊不同，破四舊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違背，不一致，不合拍，大串連則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紅衛兵運動之前他就有這思想。在紅衛兵運動之前，聶元梓大字報之後，六月份的時候，外地學生要到北京，毛主席就有這思想，說各地學生到北京要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他才高興。有人說毛主席的目的就是天下大亂，所以要大串連，不是這樣。他一直有這思想，就是同蘇聯有關系的，他說蘇聯出修正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中國要防修，就要讓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見到我。毛主席這話說了多次。現在看來，直接見過毛主席的人不一定就不修。毛主席這想法後果相當嚴重，給全國鐵路交通、全國正常秩序造成很大的影響。這一點他要負責。周總理、陶鑄同志對此提過意見，特別是周總理感到很困難，但毛主席堅決要做的事，周總理總是服從的。具

體工作都落到了周總理的身上。周總理每天都要到鐵道部，看鐵路調度情況，紅衛兵坐車、吃飯、住宿不要錢，這樣影響交通運輸，影響經濟，影響國計民生，勢必搞不下去，後來就提倡徒步串連，提倡長征，直到最後停止串連以後，毛主席還是要盡可能多的年輕人到北京來，北京學生到外地去。他要求設立兵站，最後沒有搞成功。大串連是毛主席的想法，不光是周總理、陶鑄同志，其他人也不太理解，跟着說就是了。困難很大，效果是不是一定很好？都表示懷疑，可是毛主席一直是津津有味。

串連還有政治上的問題。黨團領導不要了（劉少奇的罪狀之一就是過早恢復黨團組織），離開本地，在全國範圍串連，首先是學生，勢必影響工農，這點毛主席要負責。把大串連作為新的形式，來達到他的（目標對着走資派的）互相交流、互相支持，造成聲勢。最初還有界限，不要影響工礦企業農村，後來這界限也沒有了。

（十）組織形式、工作方法上的分歧

毛主席對八九月改組後的黨中央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不滿意。毛主席在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我過去搞一綫二綫，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十一中全會對一綫二綫作了改變，他自己到第一綫。是不是他自己到第一綫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呢？不是。他認為獨立王國北京有兩個，一個是劉少奇主持的常委會，一個是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毛主席說：「我也有責任，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以前沒有書記處），一綫二綫也是我提議的。我過于信任別人

(指劉少奇)。『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不贊成搞書記處，不贊成過去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方法，他要適應于他在一線的工作方法。他還說過，「搞大區，也是他們搞的」。就是說，是常委和書記處搞的。大區本來已經取消了，後來又搞起來。調陶鑄來中央，是打倒彭真以後，鄧小平提議調陶鑄來中央當常務書記。陶鑄不知道，毛主席根本不贊成再搞書記處。陶鑄還真要把書記處搞起來，在人大會堂開過幾次書記處的會，要分工，要書記處建立制度，跟過去一樣，後來也沒有搞起來。十一中全會決定陶鑄當中央文革的顧問，後來說中央文革代替了書記處。實際上毛主席不要書記處，他所要的祇是常委的、實際上是他自己的秘書參謀機構，而不是要一個權力機構，陶鑄不知道這點。毛主席不要過去的形式。陶鑄還要依靠大區，他到中央後要王任重當大區書記，這也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不想要大區，他要直接搞省。這是毛主席對組織形式的想法，陶鑄不知道，不清楚，所以搞不下去。其實毛主席在工作會議上已經講明白了，不過大家沒有注意。毛主席對周總理意見不大，周總理不主持常委會（林彪也不主持），周總理主持政治局擴大會，日常工作重大問題都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在組織形式這點上對周總理意見不大，對陶鑄的意見大。我們知道這點，也沒當作什麼大問題。（那時中央文革並沒有那麼大的職權，祇是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充當常委，特別是毛主席的參謀和秘書，不能管文革以外的事。）中央各部有事還是找政治局和書記處。政治局沒問題，周總理主持日常工作，凡事都請示毛主席。書記處找陶鑄，他要行

使書記處的職權，毛主席不那麼高興。陶鑄管中央辦公廳、中宣部、中組部，把王任重和張平化調來。八九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映了毛主席不要舊的組織形式、舊的工作方法，但陶鑄還是要舊的（我們也習慣舊的），毛主席不滿意。

中央工作會議以後，工人農民的問題突出了起來。本來工人中就有人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業餘搞。這時工人問題突出了，毛主席把相當大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人農民問題上。毛主席的想法同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又不那麼一致。主要領導人一是周總理，一是陶鑄。周總理在這問題上不太尖銳，陶鑄比較抓得緊。當時包括我們這些人在內，都認為目前基層還是不搞文化大革命較好。這也是毛主席自己的主張，他也一直講工廠農村不同于學生，學生可以停課，工人生產不能停。工廠最早規定不搞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規定地委以下不搞，農村繼續搞四清，正面教育。工廠也沒全面搞。另外規定工人農民不要串連，工人不搞跨行業組織，祇在企業內部搞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如果真正堅持這一點，後果不會那麼大。可是後來毛主席在這問題上思想發展了，別人都沒趕上。後來他主張首先工人要搞，農村也要搞。他認為，如果不搞的話，繼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會利用工人農民，利用原來的組織形式和系統來反對學生的造反組織。有的地方的確也是這樣做的，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反對學生的造反組織。這個問題突出了，這是工作會議後出現的尖銳問題。

四、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工廠農村

(一) 安亭事件

工作會議後，突出的問題是安亭事件。毛主席本來一直依靠上海市委，江青說她主要依靠四個點，第一個是上海市委，第二個是紅旗雜志，第三個是解放軍報，第四個是光明日報。實際上是毛主席要依靠上海、依靠解放軍。十月工作會議期間，江青還在大會堂請陳丕顯吃飯，是否要整上海市委？最早毛主席、江青都沒有這種意思。安亭事件前，張春橋也沒有說上海市委不好。平時張春橋不回上海，帶着姚文元在北京住着。張春橋是文革副組長，本來不一定住在北京，但他怕回上海麻煩，他覺得自己在第一綫不合適。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上海的工人比別的地方的工人起來造反要早，也比較多，但安亭事件前，上海市委的日子還比較好過，沒有到搞不下去的程度。

安亭事件前，林彪十一月三日接見紅衛兵的講話說，要把兩條路線做鮮明對比，說它們

水火不相容，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才能正確、完全、徹底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林彪講話不是個人名義，是代表毛主席的。他說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黨要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衆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來批判和監督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這號召非常鮮明，但許多歷史學家都沒有注意。他同時又提出要搞巴黎公社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并說，沒有這樣的大民主，不可能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黨和國家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他說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廣大人民群衆結合的新形式，不這樣做黨就要變質，就要復辟，讓剝削階級騎在人民頭上。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要用新的形式，新的組織，新的紀律，舊的都要搞掉。這是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意見，由林彪講的。這一號召的後果是相當大的。

十一月六日，上海籌備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有潘國平、王洪文、陳阿大等人。九日開成立大會，發表工總司宣言，說我們要奪權。上海市委根據中央過去一貫的精神，也根據十六條，根據當時中央提出的工人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組織的精神，請示了黨中央、中央文革。當時他們定了「三不」方針，即不承認、不支持、不參加工總司。工總司大會要曹荻秋參加，曹沒有去。工總司到市委大樓造反，市委要上海總工會主席張祺去傳達市委的方針，勸他們不要搞跨行業組織。他們認為這是壓制造反，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工人

的迫害。十日凌晨，上海造反組織的工人上火車到北京告狀，火車不肯運他們，火車停在安亭，他們就下來卧軌，導致停車三十個小時。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火車剛中斷，市委報中央時，中央就開會，主席、林彪未參加，總理主持，李富春、陶鑄、康生、陳伯達、文革小組的人參加了。中央要李富春提出意見，因為他是常委，主管經濟、工交、鐵路。這個會是中央常委擴大會，不是文革小組會，不是文革小組處理這問題。會議上定了一要打電報給華東局，二是給上海造反派發電報。從電報可以看出，當時大家都沒有支持中斷交通。這兩個電報都是陳伯達起草的，不是他個人意見。當時意見是一致的。張春橋也沒有不同意見。電報不承認跨行業組織，不認為臥軌攔車、中斷交通是對的。對工人的電報客氣一點，說他們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生產，而且影響全國交通，應該改正，立即回上海，就地解決。決定派張春橋去上海（是李富春提出的）。文革小組沒有專門開會。現在一般說是文革小組派張春橋去的，這不合事實。當時沒有不同意見，沒說工人可以成立跨行業組織，可以臥軌，停火車，沒有一個人這樣主張。江青也沒有不同意見。張春橋是帶着致上海工人的電報去的。當時，毛主席叫我兼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後來很快就撤了），我組織張春橋回上海的事，調飛機等，我和張春橋商量，要帶個助手，帶誰？張說：「我不要」，「我上海有班子」。十一日晚，張春橋去了上海。張春橋去之前還請示過什麼人我不知道。據我所知，張去後中央文革小組沒接到任何報告。陳伯達、江青都沒接到報告，張自己就處理了。

十三日晚，我正在陳伯達那裏，接到張春橋的電話，陳伯達接的，我也聽到了。電話裏聽到張春橋不是那麼得意，很狼狽的樣子。他說：「我不能不簽字，工總司五條要求我不能不簽字，也來不及請示華東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組，不然車就不能通，他們不肯回上海。我一回上海就去了安亭，有廣播車反復念中央文革的電報，請他們回去，有問題到上海談。廣播後我祇強調一條，有什麼問題回上海再談，并說，我不是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是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來處理問題的。當時我被包圍了，他們提出的五條要求我簽字了，不簽不行，不簽就不通車。」張春橋認為可以簽字。當時他是很軟的。七二零在武漢把我打得那麼厲害我也没簽字，張春橋簽了。

張春橋的電話一放下，馬上接到陳丕顯的電話，陳丕顯氣壯如牛，非常氣憤。對陳伯達提出質問：第一，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有没有權利不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華東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組織簽字，達成協議，反對華東局、上海市委？第二，張春橋眼裏還有沒有國家法律、黨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顧國家法律、不顧黨中央的政策，擅自達成違背法律、違背政策的協議？陳伯達很為難，因為張春橋已經簽了字，陳伯達知道張春橋在毛主席眼裏是很重要的人。毛主席關於劉少奇的大字報就是張春橋告的狀。（北大的簡報康生沒有報告毛主席，張春橋向毛主席告了康生，毛主席當時說：「要康生這樣的人有什麼用？」可見張春橋的地位在毛主席眼裏高過康生。）所以，這時陳伯達很為難。張春

橋電話裏還說到華東局、上海市委害怕群衆，早到群衆中去就沒有這些事了。陳丕顯在電話中當時強硬地抗議，他說也給陶鑄報告過了。陳伯達說：「我的老鄉，不要生那麼大的氣，好好商量，已經簽了字，怎麼辦理再研究。」陳伯達沒有在原則上明確表態，採取了勸解的態度。接電話後，陳伯達與我到十一號樓找到江青，如實地把電話內容告訴江青，并問她怎麼辦？要江青請示毛主席。江青態度非常鮮明，認為陳丕顯不對，怎麼這樣對待張春橋？她說：「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江青并說：「我馬上報告主席，連夜報告，不能讓陶鑄先報告。」

第二天，即十四日，毛主席到了釣魚臺十四號樓開常委擴大會，參加者有陶鑄，沒有劉、鄧、朱德、陳雲。有文革小組和部隊幾個人。毛主席一開頭就拿出憲法念了一段關於公民權利、集會結社自由的條文，這是針對陳丕顯的。還有陶鑄，陶鑄在開會前也說了類似的話，這也就是支持張春橋。毛主席接着講了認識論，說先有事實後有政策，張春橋是對的，根據事實改變了過去的政策。過去的政策脫離群衆。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貫的，他認為舊的組織都不行。我估計即使陶鑄先去報告也不行，毛主席還是認為張春橋對。會上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都是檢討，陶鑄也檢討。會後，我把會議結果電話告訴張春橋，張春橋才神氣起來。張春橋回京後說他接這個電話後馬上向華東局、上海市委說明他的簽字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支持。他說他十五日到蘇州，讓在蘇州的造反派們、工人們回上海，是約曹荻秋一起去的。他

對曹說：「你的要害是怕群衆。」安亭事件是以張春橋與王洪文達成協議、中央承認來結束的。這個影響非常大，後來工礦十條都來源于這個精神。工交座談會有爭論，實際上在安亭事件中毛主席已做了結論。

張春橋回京後很得意，他的地位更高了。上海市委成了舊市委，成了革命對象，跟北京市委一樣了。更大的影響是，全國的工人組織、工礦文化大革命、工人串連等方面都突破了原來的限制。

安亭事件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它把工礦文化大革命方面過去中央定的政策突破了。

這樣，不光影響到工礦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影響整個中國文化大革命。江青說不要讓陶鑄先去向毛主席匯報，現在想起來，就是陶鑄先去匯報，也不行。因為毛主席同陶鑄的分歧是九月就已開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同志不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是指劉鄧，而「批判不徹底」，主要是指總理同陶鑄。在毛主席看來總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

這裏再說一下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中簽字的五條。起初，張春橋也不是那麼鮮明地支持工人，毛主席也不那麼明確。這五條內容是：（一）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這就是說原來是非法的，中央對工總司本來是採取「不承認，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這三個「不」是上海市委提的，中央批的。）（二）承認一一九大會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動。（這

就是說臥軌也是革命行動。）（三）這次行動造成的後果（停火車當然後果不好）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四）曹荻秋必須向群衆做公開檢查。（這就是說，曹荻秋要代表上海市委檢查上海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為那時陳丕顯患鼻咽癌，曹主持上海工作。同時這次安亭事件曹也要做檢查。）（五）對工總司今後工作要提供各方面的方便。這就是「五條」的內容。

張春橋開始不是那麼理直氣壯的，他是被迫簽字的。不簽字工人還要鬧，他就簽了。在常委擴大會上毛主席拿出憲法，說張春橋是對的，說先有事實後有政策。毛主席這一支持，我們覺得思想跟不上。原來主席也不是這樣態度，後來他的思想發展了。他說先有事實後有政策，這五條成了政策了。

（二）工交座談會和工礦十條

安亭事件之前，工作會議後不久，毛主席就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大革命，光是學生不行。毛主席認為中國革命最早都是從學生開始，學生起來後，還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來還是不行。他說文化大革命工人最早也是曾經起來的，可是領導沒有很好引導。那時他就要陳伯達起草一個工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陳伯達和我一起搞了十二條。安亭事件後，這十二條落後于毛主席的精神了。安亭事件以後我們的稿子拿出去了。毛主席要公開徵求工人意見，徵求各方面的意見。我們召開了工人代表座談會，就在北京開的。十二條沒牽涉到安亭事件，

提出的建立工人組織和串連等問題，祇談工廠要搞文革，工人起來好。十二條本身還是強調要各級黨委和工礦領導來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抓革命促生產。安亭事件後，這提法變成右的了。

十二條交給了余秋里、谷牧，他們那時正召開工交座談會，參加者有：中央主要工業部門，全國幾個工業主要城市的代表，各中央局管工業的負責人。我們要他們一周內拿出修改意見。他們十一月十六日開始，圍繞着十二條座談，談了二十天。這時，形成對十二條的兩面夾擊：安亭事件後說十二條右了，谷牧他們說十二條「左」了。他們說十二條總的精神不對，第一沒肯定工交戰線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他們認為估價錯了，他們說他們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第二他們說十二條沒有提分期分批（這點是對的，應該分期分批）。第三他們說應該堅持在工礦企業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工廠中不能建立群衆組織。參加會的有上海工業書記馬天水，他是反對張春橋簽字的，他們不知道毛主席已開過會，同意張春橋簽字。谷牧也不知道。他們要取締上海全市性工人組織，反對串連，禁止學生到工廠串連。他們說工廠的運動不能同學生相結合，工廠應集中力量搞好生產。這些意見他們都有簡報。可以想見，這些簡報毛主席看了作何感想？直到現在，谷牧的回憶錄中還不知道毛主席的態度，好象毛主席還支持他們似的。他們到現在還認為陶鑄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這樣說。

有的書中說有三次抗爭，第一次是劉鄧發了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這是劉鄧想限制工礦文化大革命範圍的第一次抗爭。確有這個文件，可是這個文件引起了毛主席不滿意。毛主席認為工廠文化大革命運動三起三落，就是說毛主席發出號召後，本來有工人起來，讓這個文件一限制，就壓下去了。這個文件基本精神也要搞文革，但要大抓生產，說工廠有工廠特點，各地黨委要領導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運動，同時要注意工礦企業和基建單位的特點，他們要保證完成國家任務。這些單位的文革要同四清運動結合，按二十三條規定，按原來部署，分期分批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納入四清軌道。這個文件毛主席也劃了圈。但總理說過，主席批文件不要看他劃圈了就認為他沒意見了。主席如果說很好，照辦，那才算數，或者說很不好，不行，壓下。如果祇劃圈，不要認為就沒意見，別的常委都同意了，最後才送給他，他祇能劃個圈。這一文件同毛主席的想法根本不一樣。毛主席那時也不在北京，他正在外地醞釀對劉少奇的意見。毛主席認為劉少奇搞白色恐怖，這一文件也是一條，它把工廠文化大革命壓下去了。第二次工人又起來，又讓他們（名義上有總理，主要是陶鑄）壓下去了。這是指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陶鑄搞了個人民日報社論《論抓革命促生產》。這個社論看起來沒什麼，但同毛主席的精神不那麼符合。社論引的是毛主席在延安對「生產和整風兩個環節同時抓」的論述，側重工廠要搞生產。這個社論主席也劃了圈，但心裏根本不高興。文化大革命怎麼能跟整風相比呢？第三次是九月十四日，陶鑄又抓了兩個指示：一個是中央

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按毛主席的看法，工人剛起來又來了這個！」）這個指示規定，要把人民日報社論普遍張貼，要組織全體職工認真學習社論，要立即加強組織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研設計等等照常進行，保證革命生產雙勝利（實際上祇保證了生產。按毛主席的看法：革命哪裏去了？），要堅守崗位，串連的要回來，學生不準到工廠，已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組織兩個班子（毛主席不反對兩個班子，他反對「黨委統一領導下」。毛主席的看法，要群衆自己選出來的班子統一抓革命和生產。毛主席總認為搞了十七年的現在這個機構不行，要改一改，衝一衝。）生產任務重沒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可以推遲，即暫時不搞，進行正面教育。除派工作組不適用外，仍按七月二日通知（即劉少奇發的通知）進行安排。（這一點我們當時也沒注意，如果注意到，可以提醒一下。在毛主席看來，陶鑄還是執行的過去的一套。）對幹部不採取群衆直接罷官的辦法，而是由黨委統一調整。另外陶鑄還搞了個縣以下（即農村）文革的辦法，現在暫且不談。谷牧等也是根據毛主席劃過圈的文件來批評十二條。毛主席已經改變了，他們不知道。

工交座談會簡報，毛主席相當不高興。這是陶鑄主持的。他組織余秋里、谷牧搞了十五條。不是總理主持，也不是李富春主持的，是陶鑄主持的。谷牧回憶錄中說好象就是他自己搞了十五條，其實根本不是。如果祇是他搞了十五條，根本沒有事，毛主席不怪他，陶鑄搞才有事。因為毛主席談安亭事件的會谷牧沒有參加，而陶鑄是參加了的。總理絕不主持也不

會搞十五條，也不會批評十二條。他知道十二條在毛主席看來還不够呢！可是陶鑄搞了十五條。十五條到底有多少毛病，我看也沒有，但是陶鑄既然參加了毛主席談安亭事件的會，十五條中還談工礦文革仍按四清布置，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連，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其實毛主席也說堅持八小時工作制），黨委統一領導，不搞群衆組織等等，那就不符合毛主席的精神。

谷牧回憶錄中說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總理、陶鑄、李富春聽了谷牧匯報，然後，總理、李富春向毛主席匯報。下午，李富春打電話給谷牧，說毛主席同意他們的意見，工礦企業文革要分期分批，八小時不能侵犯，祇能業餘鬧革命。說要谷牧到各地聽取意見，爭取十二月發出十五條。這不對。總理、李富春向毛主席匯報，這個會我參加了。毛主席不同意十五條，而且不高興，特別對陶鑄不滿意。並不是對谷牧、余秋里不滿意，他們不知道毛主席的態度，可以諒解的。而陶鑄知道毛主席對安亭事件的態度以後還這樣說，這不是頂着幹了嗎？毛主席不高興，毛主席叫他們重寫，討論討論，給大家看看。毛主席是說可以分期分批，也說了八小時不能侵犯，爭論點不在這裏。但毛主席沒說他們的文件改改就發下去了。毛主席對陶鑄說：「總要支持工人建立聯合組織，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嗎？」

散會後毛主席把陳伯達和我留下，說：「你們重搞。」我們按毛主席新的思想搞，把過去的十二條改成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也接受十五條中的一些好的意見。十條開頭就說，按照憲法規

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原來十二條中的「各級黨委、工礦領導統一領導」沒有了，變成「群衆選出能代表自己的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和代表會議，讓群衆在文革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領導生產的班子改成「由工人認真討論健全或改選領導生產的班子。」各單位工人群衆之間、工人組織之間，可在業餘時間在本市進行革命串連，學生可有計劃地到工礦，在工人業餘時間進行革命串連，工人也可派代表到本市各學校進行革命串連，學生可以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勞動學習。這稿子毛主席已經定了，到了十二月四日，毛主席委托林彪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這個文件。毛主席說還要充分聽取工交座談會的意見。

這裏插一點：谷牧說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下午，陳伯達打電話叫余秋里、谷牧到他那裏去（我想陳伯達也是爲着工交座談會搞了十五條，把原來的十二條完全否定，另起爐灶，他覺得這樣不好，才找他們的。）陳伯達拿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對谷牧大發牢騷，說「我們是小小老百姓，你們瞧不起，你們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有本事你們自己寫。」這其實是一回事，這時毛主席已經否定了十五條，要陳伯達和我重寫了。（我記得「體無完膚」這句話是總理講的，總理在毛主席那裏開會時講，「工交座談會把十二條全盤否定，批得體無完膚，這說明下面抵觸情緒很大，這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社會上，黨內大量的人思想不通。」）陳伯達找余秋里、谷牧不是爲了發牢騷，因爲陳伯達有了尚方寶劍，

知道毛主席的意思了，找他們談，還是給他們（谷牧等）通通氣的意思。

總之，毛主席開會，否定十五條，陳伯達找谷牧，李富春打電話，都是一回事。總理在毛主席那裏發言，說他們把十二條批得體無完膚。總理還是維護毛主席的。毛主席留下陳伯達和我另搞文件，沒留下總理。會後，兩方面同時搞，谷牧搞他的匯報提綱，陳伯達和我另寫一個稿。我們寫的稿毛主席已經定稿，交林彪在會上通過，毛主席並沒有打算還要谷牧的提綱。十二月四日開會前我告訴總理，毛主席已經直接抓了另一個稿子。我給總理通了風。如果更早通風，也許就沒有谷牧的匯報提綱了。匯報提綱總理看到了，沒有制止他們。毛主席在四日前也看到匯報提綱了，他不高興。不是對谷牧，不是對總理，而是對陶鑄不滿。谷牧被「圍攻」三天，實際是對陶鑄。毛主席否定十五條的會，陶鑄也參加了，他有點拗，已經知道了主席的態度，對匯報提綱還沒有加以制止。匯報提綱主席也看到了，很不高興。谷牧回憶說陳伯達發脾氣，說你們搞突然襲擊。本來也沒有事，他們匯報時帶點檢討也就完了，或者說時間倉促趕不上，或者說下面不通，也就行了。毛主席不怪總理、李富春、谷牧，他怪陶鑄。他認為陶鑄在劉鄧時期就是這種觀點，這次從十二條到十五條陶鑄又是這種觀點。毛主席的觀點他知道，可是他又弄個匯報提綱。（搞提綱不是陶鑄搞的，是谷牧搞的，谷牧把下面的意見綜合了。）

我比較清楚地知道，毛主席的矛頭是對準陶鑄的。谷牧出來匯報，引出林彪主持的四日、

五日、六日三個下午的會，在這之前我同總理打了招呼，說主席已經定了稿，不要多說了。文字修改可以，大的原則方面不好再提意見。會上谷牧匯報以後，工交方面的人還發了言，特別是馬天水，在所有問題上堅持他們的意見，堅持過去中央通知的意見，而且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不滿意，反對成立全市性組織。馬天水講一句，張春橋頂一句，他說馬天水糊塗，說馬天水的意見不代表上海。馬天水還是講完了他的意見。四號那天除地方、各部有人發言維護匯報提綱外，中央的人發言一邊倒，否定匯報提綱。有的緩和一點，有的激烈一點。陶鑄最早幾天沒發言。

十二月四日、五日、六日這三天的會，六日的會最重要。我的印象這個會不是圍攻谷牧，是對工交座談會、十五條、匯報提綱的觀點進行批評。十條已經有了，他們也沒說不同意，但是還是提出些相反的意見。地方上來的人有人發言擁護匯報提綱，中央的人發言是一邊倒，批評匯報提綱。有的講得比較厲害，這可以參考王年一的書。他說江青大罵，說是反革命，這點我印象不深。康生發言我有印象。康生說工交戰綫問題不比學校少，經濟領域問題不比思想領域少。這也就是從理論上說明毛主席為什麼要在工廠搞文革。我記得較清楚的是康生說谷牧象柯西金，搞點實事還行，不注重理論思想問題。這會議沒有正式記錄，王年一不知根據什麼人的記錄寫的。王年一也承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發言也批評了提綱，但沒有說是誰。政治局委員發言都是表態性的。他們大體上知道了毛主席對安亭事件的態度，所

以他們大體上是擁護毛主席，批評和否定匯報提綱，歸罪于谷牧。康生說的最厲害，其他人不是對谷牧，是對提綱的錯誤觀點提些意見。其實谷牧他們的觀點不能算錯，毛主席最早也有這些觀點。但安亭事件後毛主席的思想變了，對他們的觀點就不能容忍。中央的人都擁護毛主席的觀點。這也不能說是違心的，總是要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跟陶鑄的思想，跟谷牧匯報的下面人的思想。六日的發言就不一樣了。這一天要正式通過十條。這天發言不是對谷牧，是對陶鑄。

(三) 江青和陶鑄的衝突

安亭事件前後，陶鑄同江青發生衝突，十一中全會前後連續發生幾件大的衝突。前面幾件事不知是否有毛主席的意見，後來毛主席正式表示了和陶鑄不同的意見。江青和陶鑄的衝突前面已說過一些，現在再系統地說一說。

第一，十一中全會後陶鑄當了常委，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十一中全會的會務工作就是由陶鑄主持的。毛主席後來（打倒陶鑄以後）說陶鑄是鄧小平推薦的，說陶鑄不老實，說陶鑄還是搞過去的一套。但十一中全會常委名單中有陶鑄，這名單最早是毛主席提的。決定名單的是總理、林彪、江青。毛主席祇徵求這三個人的意見。徵求意見是總理辦的。毛主席本來把陶鑄排在後頭。江青說，鄧小平犯了大錯誤，怎麼還升了？過去他是第七位，現成了第四位，江青說不行，要把陳伯達調到鄧小平前面。江青又說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陶

鑄厲害，把陶鑄提到陳伯達前面，這樣陶鑄就成了第四位。他們三人商定後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名單是毛主席勾過來的，把陶鑄勾到前面。（毛主席在用林彪的同時就給江青寫信，說林彪的壞話。毛主席用人就是這樣。起初不同意我為文革小組成員，說我是彭真的，人，後來又很信任我。最後打倒我也是毛主席同意的。）會一開完，江青就罵陶鑄，是為了陶鑄辦的會議簡報的事。在會上謝富治批評鄧小平，其實問題也不大，話也不那麼尖銳，祇是說解放後見不到鄧小平，去找他他也不見。這意見至今還是對的。現在陳再道也說見不到鄧小平。鐵道兵取消，陳再道不贊成，他找鄧，鄧不見他。據說鄧在橋牌桌上同丁關根、呂正操就定了。謝富治的意見也不過是這些。陶鑄沒把謝富治的意見登在簡報上，祇登在發給常委的很小範圍的簡報上，江青就非常不滿，她說：對鄧小平的批評，陶鑄為什麼不登簡報？為什麼保護鄧小平？這是一件事。另外江青當着陶鑄、康生、陳伯達說：你們是有投票權的（江青沒有投票權），為什麼投鄧小平的票，讓鄧小平得了全票？其實毛主席、林彪、總理也投了鄧小平的票。江青不敢說他們，祇說康生、陳伯達、陶鑄。她把陶鑄提上來壓鄧小平，但陶鑄不聽她的。陶鑄對鄧小平是很尊重的。據我個人觀察，總理、林彪形式上都非常尊重江青，而陶鑄是按原則辦事。（他那原則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又當別論。）按照陶鑄的脾氣，對江青已經是很容易忍了。陶鑄說，凡是中央文革通知我開會，我沒有不到的。

第二，陶鑄在中央文革的會上與江青正面衝突，是因為吳傳啓的問題。陶鑄抓社會科學

院的文化大革命，那時側重整黑幫、特務，陶鑄在文革小組會上說吳傳啓是國民黨特務。（這也不對，吳傳啓是共產黨派去參加國民黨的。）陶鑄堅持要整吳傳啓，江青馬上反對，說吳傳啓是革命左派，是從文化大革命一發動就站在毛主席一邊的。（那時報上登的一些文章署名撒仁興，就是吳傳啓、關鋒、林聿時三人。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我們是起草小組正式成員，住錦江飯店，吳傳啓同林聿時也在上海。所謂左派的班子就有吳傳啓。他雖然不是起草小組成員，但整個會議期間他們都在上海。會結束後，我同吳冷西走了，關鋒、陳亞丁、吳傳啓等還在上海。後來就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吳傳啓是否參加寫作我不知道）當時江青說吳傳啓是左派，陶鑄說吳傳啓是國民黨。江青說，你說吳傳啓是國民黨，你陶鑄也是國民黨！陶鑄發火了，說我是什麼國民黨，我是大革命時期共產黨派我去參加國民黨的。吳傳啓是真國民黨。陶鑄還大聲說，按你這樣說，毛主席也是國民黨！江青從來沒受過這樣對待，馬上就哭了。後來葉群知道了這事，告訴了林彪。林彪原來對陶鑄很好的，後來也不敢太接近陶鑄了。葉群說陶鑄怎麼能這樣對待江青，怎麼還提到毛主席？這事總理也知道了。（這時社會上有人擁護吳傳啓，有人反對吳傳啓。劉寧一問我，我說吳傳啓是左派。吳傳啓確實不是國民黨。）陶鑄為吳傳啓問題同江青爭吵，使江青不能容忍陶鑄。

第三，再一件事，就是在組織上，陶鑄還要搞書記處。他開了幾次書記處的會。他沒有理解，毛主席要他當文革小組顧問，意思就是不要象過去一樣，還叫他管宣傳口，事務多的

了。并不是要叫他去搞書記處。可陶鑄要搞書記處，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調來，把張平化調來，宣傳部組織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如果真要搞書記處，恐怕還要調人。毛主席對此是不滿的。毛主席講過，他不贊成搞書記處，認為過去搞書記處是失策，導致大權旁落。當然第一個失策是搞一綫二綫。據我所知「一分一綫二綫是失策」這話最早是陶鑄講的。這話是合毛主席的意的。可是毛主席還有一句，說搞了書記處也是失策。這句話陶鑄沒注意，他還要搞書記處。毛主席採用了中央文革小組這種形式，它祇是一個參謀秘書機構，大的問題由毛主席自己決定。可是陶鑄還是要搞書記處。毛主席說過，鄧小平是這樣，彭真是這樣，陶鑄還是這樣，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說他們這三個人性子都太急。

第四，這第四個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陶鑄搞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兩篇社論和關於工廠、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兩個通知。其實這些文件毛主席都看了，都劃了圈，實際上不滿意。一九六六年九月已經講了關於陶鑄不那麼順他的心的話。這次陶鑄又搞了個十五條。谷牧說十五條是總理主持的，不對，是陶鑄主持的。陶鑄組織谷牧、余秋里搞，谷牧、余秋里又組織別人去搞的。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是十一月九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討論的，是陶鑄主持的，不是總理主持的。

這裏插一點：谷牧是我的老上級，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文化大革命中人家說谷牧是特務、叛徒。有一次在人大會堂，我拉着康生一起去告訴谷牧，讓他主動寫清楚這一段歷史。谷牧

解放前是北平地下黨的文委書記，他介紹了個黨員，是個詩人。文革中這個人給中央寫信，說谷牧被捕叛變，還說谷牧在街上開着吉普車等等，其實那時根本沒有吉普車，谷牧也從來沒開過車。五一節前國民黨總要捕一批人，把這個人捕去了。谷牧把他保出來，他反而說谷牧是叛徒。我約着康生一起向谷牧打了招呼。

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確實是陶鑄主持的，不是總理主持的。在會上陶鑄說：「就是要把他們壓下去，寫這社論把他們壓下去」。他指的是壓潘國平、王洪文這些人。那時安亭事件剛開始，還沒有臥軌。上海市委就是給工人們念這篇社論，勸工人們不要鬧。這社論也是毛主席劃了圈的。但這社論和安亭事件相聯繫，還說要把工人們壓下去，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中央說對跨行業的工人組織不承認、不支持、不參加，但是沒說壓下去。陶鑄說要壓下去，在會上總理的態度已經轉了，陶鑄還沒有轉。

十二月六日前，十條定稿的那天毛主席談到了陶鑄。因為十一月十四日以後，毛主席收到一些告陶鑄的信。毛主席說第一個正式告陶鑄的是唐平鑄。毛主席說陶鑄指示，報上對常委要平衡，十個常委都要有，因此陶鑄同意了一「換頭術」，即把鄧小平的頭換到陳毅的身子上。毛主席說第二個告狀的是關鋒、戚本禹，他們列舉陶鑄七大罪狀，說陶鑄參與制定劉鄧路線，執行劉鄧路線。毛主席說是關鋒、戚本禹告的狀，有人說是江青指使的，具體情況我不知道。這時江青也正同我發生衝突。

(四) 政治局擴大會批評陶鑄

毛主席定了六日會上要批評陶鑄，要陶鑄檢討。要不然這個會就成了對谷牧的了，這不能反映問題的實質。谷牧說他萬萬沒想到，有的書也說突然攻擊陶鑄。我沒覺得突然，因為是毛主席定了的。這會上常委們不好出面批評陶鑄，所以在醞釀時要我們這些人發言，特別是我，因為十二條、十條都是我參與起草的。所以我發言比較多。我當時發言也不能說是違心的，因為總覺得要緊跟毛主席。我講到幾次工人起來都被壓下去了，講到人民日報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講到通知，講到紅旗雜志社論《信任群衆依靠群衆》中陶鑄堅持要加上「絕大多數共產黨員、黨組織是好的，是可以信賴的」。這說法本來也沒有什麼，可是他是在毛主席說要「依靠堅定的革命左派」的前提下這樣講的。陶鑄說共產黨員、黨組織是革命左派的核心，這同毛主席的思想不一樣。陶鑄還是堅持「在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張春橋主要圍繞安亭事件批評陶鑄、關鋒、戚本禹沒有發言。

六日的會不是批評谷牧的匯報提綱，而是把中央兩種不同意見擺出來，毛主席的意思要陶鑄表個態。陶鑄作了檢討。谷牧的回憶錄上說他自己承擔了責任，要求不要扯到陶鑄，其實陶鑄在會上承擔了責任，他不要余秋里、谷牧負責任。這是符合實際的。陶鑄承認自己堅持老框框。他說：我主持制定的工業六條、農村五條還是堅持結合四清來搞，我是怕影響生產，這是老框框。毛主席思想發展了，主張工人農民要起來，我思想沒趕上。他說他寫了兩

篇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也是堅持老框框。（陶鑄檢討時說他沒有「把革命壓下去」的意思。可是我記得他確實是說過。可能是信口說的。）他說他思想落後于實際，堅持主張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一直到最後。他一直不贊成離開工廠去串連，不贊成學生到工廠。他主持制定的文件同毛主席的思想不一樣，沒趕上毛主席思想的發展。他檢討說他對匯報提綱中的一些觀點并不是完全同意，但其中有些觀點他是贊成的。他說他的錯誤思想反映了黨內現狀，就是十一中全會後沒有解決問題，十月工作會議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各省各部抵觸情緒很大，思想不通，在許多問題上有抵觸，有懷疑。他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進行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這是陶鑄的話，其實毛主席沒有這意思。谷牧說因為王力突然批評了陶鑄，谷牧才說批評十五條可以，不要牽涉到其他問題，即不要牽涉到陶鑄，好象他為陶鑄承擔了責任，這不對。拿陶鑄作例子展開批評，是陶鑄說的，毛主席沒有這意思。當時會上沒有人說要拿到全黨去批評陶鑄。在會上是說這是內部起草文件過程中的不同意見，文件也沒發下去，不需要把討論中的分歧拿到更大範圍去。當時余秋里、谷牧都表了態，地方上來的過去堅持反對意見的人也表了態，都同意十條，說自己思想跟不上。谷牧等說了點牢騷話，說「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說相信毛主席思想正確，站得高看得遠。

最後林彪總結說，實質不是谷牧的問題，而是陶鑄的問題，是書記處負責人堅持一些錯

誤觀點，現在本人也作了檢討。他說「要座談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堅持舊的一套。林彪說，你們最後還堅持三大特點，頭兩個特點錯了，第三個還可以。頭一個特點是說工交戰線是高舉毛主席思想紅旗的，是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第二個特點說工交戰線隊伍是好的，不象文教戰線問題那麼嚴重。如果肯定這兩個特點，工交戰線就不需要進行文化大革命了。第三個特點還可以，說工業生產不能停，這沒問題。林彪說，在整個工交戰線，劉鄧的影響不但五十天的問題，而且整個十七年都影響很大。我（王力）當時就覺得林彪講話有兩點不好，直到現在也不理解。其一，「祇要革命搞好了，生產受影響也不怕」。毛主席沒有這麼說過。毛主席是說要用革命來促生產。其二，他突然大罵李井泉，這是對着鄧小平來的。他說李井泉這人最壞，誰最壞他就跟誰一起。這是對着鄧小平的。毛主席也沒這麼說過。這實際上定了對鄧小平的調子。本來八月份十一中全會開始時毛主席還把鄧小平排在第四位，讓江青給反對掉了，排到第六位，十一中全會後開常委生活會，毛主席指示要批劉，林彪、江青他們以批鄧為主，而且把鄧提到敵我矛盾，鄧小平不能工作了，把他管的工作交給康生。這個會牽連到賀龍的時候，毛主席把這個會給停掉了。這些我過去談過。到十月工作會議，毛主席批準了一「劉鄧路線」的提法。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林彪突然提到李井泉，我們覺得很難辦。我們想林彪這麼講，想必是代表中央的。過去對西南的事我們沒有鮮明表態，林彪說了以後，就定了調子，我們也得那麼講了。看起來毛主席

對鄧的看法也改變了，認為西南是頑固堡壘，是鄧小平的勢力範圍。對賀龍，毛主席也不保了。林彪還說，今後文化大革命要擴大到一切領域，誰也擋不了。不但不能擋，還要有意識地向每個領域去擴大。他還講了黨不能統一領導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對全黨的批判，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是批判我們這個執政黨的革命，所以不能由各級黨委統一領導。這確實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批判幹部的運動」不是毛主席的說法。關於執政黨的問題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認為我們是官僚主義的舊機器，自己不解決，總有一天會成為人民的敵人。

（五）「生活會」批評陶鑄

工交問題的會林彪作了總結，通過了十條，陶鑄作了檢討。這個會實際上是針對陶鑄的，歷史學家說是圍攻谷牧，不是的。這個會後陶鑄的地位變了，工作還照舊，沒有改變。這時主席定了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歷史學家不知道這個會。這個會在懷仁堂，總理主持，叫「生活會」。（打倒劉鄧叫生活會，打倒我也叫生活會，打倒胡耀邦也叫生活會。）這生活會是政治局擴大會，是十二月下旬開的，沒有記錄，所以歷史學家找不到這個材料。這個會明明白白地說批評陶鑄、叫陶鑄作檢討的會。這個會上的發言是一邊倒，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一致批評陶鑄。主要發言是陳伯達。主席定了開這個會，大家議論時要陳伯達發言。歷史學家都沒有寫這個會。曾志的回憶錄也不提這個會。她的回憶錄連上次談的工交座談會陶鑄作

檢討也沒有。好象憑空什麼人就把陶鑄打倒了。這個會上的發言沒有記錄，大體上可以參考一月十日陳伯達接見造反派的會上的講話，那個講話是有文字的，葉永烈的書上引用了。我記得生活會大體上也就是談的這些問題。一個說陶鑄在劉鄧路線推行時他就是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我記憶中還有「參與制定」字樣），中央和毛主席想挽救他，所以還是用了他。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有人揭發他（說陶鑄是執行劉鄧路線的，是搞白色恐怖的。）中央和毛主席知道陶鑄是執行劉鄧路線的，但還想讓他站過來，挽救他。可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沒有可能來，沒有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是繼續執行劉鄧路線，不但執行，而且繼續推廣劉鄧路線。陶鑄和王任重領導的中南局，出現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鎮壓群衆的事件。在武漢逮捕了相當大量的革命群衆。這是其他地區都沒有出現過的。我們想幫陶鑄，但幫助不過來。（我記得陳伯達還講了陶鑄主持搞「抓革命促生產」的文件和文章。）毛主席講在八、九、十三個月，即陶鑄主持中央工作的時期，有不少地方組織工人農民反對學生，陶鑄說要把工人農民壓下去。（陳伯達沒說壓下去，是在會上別人說的。）陳伯達說陶鑄不能接受毛澤東思想，因為他是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就不能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陳伯達說，我們中央文革批判過他，在中央全會上批評過他，但是他不接受，沒有觸及靈魂。（其實我記得當時也沒有什麼批判，祇是有些爭論。有人說陶鑄到中央全會時還不接受「資反路線」的提法，這不對。陶鑄在中央全會的發言是檢討性的。還有人說，王力說陶鑄在中央全會上還不接受

「資反路線」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我沒有這樣說。」陳伯達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我們就幫助過他，在執行劉鄧路線時也幫助過他，勸阻過他，但他還繼續鬧，我們就開始公開攤牌了。陶鑄說很好，攤牌就攤牌吧！陳伯達說陶鑄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言行不一。他口裏說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做的還是那一套。陳伯達說現在大街上出現打倒陶鑄的大字報，這怪誰呢？不怪我們，我們盡了幫助他的責任了。正如陶鑄自己講的，他是咎由自取。

葉永烈引用的這段發言，是一月十日陳伯達的發言。據我回憶，陳伯達在生活會上的主要發言也就是這些內容。在這會上大家都批評陶鑄，批評他思想方面、路線方面的問題，過去工作中的問題，更多的是講這次有關工交座談會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批評這些。總理批評陶鑄講過「懷疑一切」，是形左實右。陶鑄是講過，除毛主席、林副主席外，總理以下包括陶鑄都可以懷疑。總理早就公開批評這說法不對。這次批評的會上總理又說：懷疑可以，應該有根據。會上批評陶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執行劉鄧路線，是右的，另外也有左的，形左實右。如陶鑄在領導新華社、文教系統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科以上幹部都戴高帽子游街。「所有幹部都要放到火裏燒一燒」的提法，也有他的份。他不是主要目標打擊走資派，而是分散了對主要對象的注意力。會開了一個下午，陶鑄表態，作了檢討。他說：「我知道我這人不行，不能勝任現在的工作。我這人在黨內威信也不高，一下子把我弄到這麼高

的位置，我自己沒想到。我自己知道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時我是倒數第幾名。大家說我執行了劉鄧路線，我的確是一直尊重劉少奇、鄧小平。我的確在一九五五年說過，我甘願拜鄧小平為師。我的思想沒改造好，舊思想舊觀念很多，一腦子的舊框框。文化大革命前後形成的框框，同毛主席的思想不適合，趕不上。伯達同志跟我很熟，私交也很好，沒想到伯達同志對我有這麼系統的意見。過去說過一些，是友好的，打打招呼，我沒當一回事。我是咎由自取。中央信任我，把我放在現在這個位置，我還是堅持舊的一套。我在中央工作沒有搞好，中南又出了這麼多問題，我辜負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信任和期望。我還是到下面去工作，去參加文化大革命吧！—

這個會開完後，陶鑄的工作還沒有變動。陶鑄要求見主席，據家屬回憶是見到了主席，主席要陶鑄到下面看看，保幾個省委書記。我的回憶不是這樣。主席同我們說，陶鑄這人也真怪，他自己說不當中南局第一書記，要王任重當，現在他又找我，說他還要回去當第一書記。其實毛主席根本不贊成搞中央局和大區。我的判斷，毛主席同意陶鑄現在的工作不管了，同意他下去，但不會說叫他再去當第一書記。

這時毛主席並不贊成公開批判陶鑄。不但對陶鑄，就是對劉鄧，雖然這時劉鄧已劃到那邊去了（陶鑄還沒有劃到那邊去）。毛主席對劉鄧已下決心要整，但毛主席還是不贊成公開批判他們。毛主席認為群衆要喊打倒可以，但在報刊上或群衆大會上公開批判，毛主席都不

赞成。毛主席还是把陶铸作为十一中全会选出的常委。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还是全体常委都出席，刘邓都有，陶铸更不成问题。他们的地位变了，但公开批判他们，毛主席还是不准。上面说十二月下旬开了批评陶铸的会，但还是不准公开开大会，更不准在报上公开批判。

(六) 公开批判陶铸

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突然公开宣布陶铸的问题。陈伯达说这个会是江青组织的。那天陈伯达还没起床，他自己说吃了安眠药还没醒，就被江青叫去出席会。江青叫陈伯达把陶铸的问题公开宣布。这天接见的对象是湖北省揪王任重的代表团。陈伯达事先没有准备。江青组织的这个会，通知中央文革的人去参加，参加者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陈伯达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保刘少奇、邓小平。打倒陶铸不是突然的，而这个公开宣布是突然的。我至今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知道毛主席不同意这次宣布。陈伯达在会上说，陶铸到中央后没有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陶铸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是洗刷不掉的。后来他又变本加厉地推行刘邓路线。陶铸在北京接见过这一批人（揪王任重代表团），陶铸表示不赞成揪王任重。陈伯达说陶铸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他是文革小组顾问，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来不跟文革小组商量，独断独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陈伯达说你们

揭露陶铸，揭得很好，这也是给我们的支持。会上主要是陈伯达讲话，江青作了些插话，加强了陈伯达的讲话，向群众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就是这次。这下子满城大字报都出来了。可是一月七日总理对批陶联络站的人还宣布陶铸是中央常委，说你们开大会不恰当，常委没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

一月八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我到会了，陶铸没有到会。毛主席在会上谈了陶铸问题。毛主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我记得是很不老实，有的历史学家把很字去掉，只说不老实。曾志回忆说毛主席不会说陶铸不老实，可能是说『不老成』，可能是记错了。曾志说给毛主席写信，附去外面的传单，毛主席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划了一道杠，打了一个问号。曾志说可能是毛主席记错了。可是我记得这个会好多人都在场。我记得毛主席是说的不老实。）毛主席说，他问邓小平，陶铸这个人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毛主席说十一中全会以前陶铸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候报纸上和电视里刘邓的照片和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毛主席说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这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这天晚上毛主席开会封我作宣传组组长，代替陶铸。到二月份毛主席又是另一种说法了。这个以后再说。

我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现在回过来思考，主席对于在他领导下能作战略决策的人，他要有意见都是很尖锐的。如果不提战略性的意见，只是辅助他，不在战略上同他争论，只在战术上有点不同意见，他一般都能容忍，而且还能很好地一起工作。周总理自己也知道，他说他自己不是战略家。总理说现在战略家太多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提都是战略性问题，而不是毛主席提出战略他们来落实。林彪也是『战略家』，但他一点锋芒不露，任何会上都是毛主席到他才到，毛主席不到他不到，毛主席叫他主持会议他才主持。他总是站在毛主席后头，手里拿个语录本。他非常谨慎，而陶铸在大区当第一把手习惯了，从来是他说一句话算数，到中央后，在毛主席看来，他同总理不一样。总理常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如此，至于中央文革，陈伯达无所谓，江青打着毛主席旗号，她定了总理就办。连张春桥，总理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在八、九月刘少奇、邓小平不主持中央工作后，总理、陶铸主持工作，毛主席不满意，认为很不得力，批判不彻底，文化大革命没有搞下去，对他们两位不满。但毛主席对总理和陶铸态度不一样。毛主席对陶铸不大能够容忍，对总理还没什么，因为只要主席说一句话，总理就照办。以上我的这些看法，对理解打倒陶铸的问题可能有些帮助。

（七）中央专案组的建立

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毛主席负责。江青

宣布改组专案组时说，除王力一人外，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穆欣和谢镗忠实际上已不参加文革小组了，所以也不参加专案组。）专案组成员名单上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邓小平同志打倒以后，专案组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主席负责。』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要康生向毛主席建议和请示，要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毛主席说，不能立案，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常委，不好立案。后来康生告诉我，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附带说一下，一九六七八年八月，江青在常委会上提出要调军队负责干部和大批团以上干部，建立庞大的中央专案组机构。林彪说：从南看到北，从北看到南，从东看到西，从西看到东，军区以上的军队干部没有几个人站得住。会上决定调一些军一级的干部，叫总政马上送档案，交康生审查。我好象记得总政报送的名单中有李德生。

江青说她要抓专案组，她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专案组的所作所为是否都符合毛主席的意愿呢？不一定。据我同毛主席接触中了解，毛主席并不想打倒那么多人。他究竟针对着哪一个人，也没有。对刘少奇过不去，也没有。一九六七年七月我最后见他时，他说下次代表大

會少奇要留在中央委員會，小平至少是常委。我談到「打倒劉鄧陶」的口號時，他說：「打倒一年，頂多兩年。」他跟我說了很多鄧小平的好話，不但不打倒，他說：「林彪身體不行了，還要鄧出來。」他認為總理不能當第一把手，但不管誰掌舵，也離不開總理。總理自己也說過，他不能當第一把手。人的才能不一樣，他是輔弼的人材，古今中外都少有的人材。領導正確時他可以幫你把事情辦得很好，領導錯誤時他可以幫助你減少損失。要他改變舊的，換一套新的，這點他不如鄧。他自己說他不是戰略家。毛主席並不想打倒那麼多人。他原來設想，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各省第一書記，絕大部分都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這也是他一九六七年說的。他還說一旦國家有事，帝國主義、蘇修向我進攻，打起仗來，所有的人一律官復原職，打完了仗再說。毛主席真心要打倒的，我看一個也沒有。但是，誰不聽他的話，不執行他的路線，他就要打倒一下，說些氣話，反過來又覺得這個人不錯，又說些好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對周總理說：「趙紫陽、張平化、劉子厚、張體學……都要保。」「都給打倒了，打倒那麼多，我也不高興。」

（八）農村文化大革命

現在談農村問題。十一月，我正在幫陳伯達搞工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這時農村還是按過去規定，不搞文化大革命。江青忽然找我，說你派一兩個快報組記者，去了解一下農村情況。她沒有說了解什麼情況。

那時我管快報組。快報組有一百個記者，是從部隊調來的。我曾經作了一件好事，我要他們不帶任何框框，把所有的傳單、小報，不管哪一派出的，都要寄回來，印成快報發常委。這些快報上還有毛主席、周總理、康生、江青的批語，檔案裏可能還查得到。這是寶貴的研究資料。

江青說叫我派幾個人去了解農村情況，說了後我也没有特別注意，我就找了徐學增，讓他派幾個記者到通縣了解一下農村情況。他派了兩個人去，回來寫了個報告。我把報告交給江青。報告基本精神是說農村情況很好。今年豐收，四清按部就班進行，農村很穩定，沒提文化大革命的情況。過了幾天，我們正在吃晚飯，江青來了。她突然變了臉，罵我說：王力，你是什麼理論家，我看你是個大混蛋！我說：你怎麼罵人？你是怎麼啦？你究竟要說什麼？我在黨內不少年，沒見過你這種人！江青說，主席要搞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搞到哪裏去了？你派那麼兩個人去，他們都是老爺，不和貧下中農三同。她說：我早就派肖力去了。主席要的是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怎麼不搞？我說：你沒有告訴我，我今天第一次聽到主席要搞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跟江青吵起來了，戚本禹趕緊來調解。我說既然主席指示，我立即執行，我親自去調查。戚本禹說：我陪你，今天馬上去。我們吃完飯馬上要車到了大興縣。準備不經過縣委、公社，直接到一個大隊、一個村裏去，可是車經過縣城時，縣委不讓我們到下面去，說：你們從哪裏來的還回哪裏去！我們說是中央文革的，

也不行。正在僵持中，恰好康生的孫女下鄉在那裏，她認識我們，帶我們到一個村，這時已經半夜了，祇好睡覺了。第二天同大隊幹部、同老百姓談了談，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縣委想擋是擋不住的，群衆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情況。老百姓最反感的是縣委布置搞紅海洋，花好多錢。我們回來後起草了一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說看起來農村文化大革命要搞，縣以下不搞不行。可是怎麼搞呢？我們還是比較保守的，還是說要同四清運動相結合，分期分批，要有領導。這時戚本禹正在通縣搞四清，他也怕把四清成果搞掉了。我們提議請農口派人來一起搞這個文件。後來農口來了三個人，集體起草。起草以後我拿着這草稿，一個人到薊縣，找了橋頭大隊、公社、縣委，徵求意見。橋頭村已經自發地搞了文化大革命。縣、社、村三級都說我們起草的這稿子可以。這稿子還是說要有領導、分期分批，同四清結合，有的地方可以不搞文革，繼續搞四清。這稿子交給江青，她沒問主席，就說不行。她說要肖力參加重搞。她說肖力到農村是毛主席直接派的。于是我和戚本禹、肖力三個人搞，肖力爲主，起草了個文件。肖力文字不行，可是主席思想她了解。這個稿子突出的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名義上是以我爲主，實際上是肖力爲主搞的。這個指示同工礦十條比起來，約束範圍提得還是比較明白的。我還是堅持了一些東西，肖力也不是不講理的，她比她媽媽強。這個稿子不說把文革納入四清軌道，而是反過來說把四清納入文革軌道，在文革中解決四清和四清復查的問題。農村文革要按十六條，按四清的前十條和二十三條的原則進行。（前十條和

二十三條是毛主席主持、我參加制定的。後十條是劉少奇、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字是田家英搞的。）這就是說，在這個文件中沒有把四清丟掉。新的突出的東西是根據肖力轉達的毛主席的意見。稿子搞好後交給江青、毛主席，毛主席又讓交給陳伯達。陳伯達說不行，他又主持搞。又要我到天津武清縣轉了一下，到天津轉了一下，回北京後陳伯達主持，又搞了一個稿子。我說你不用搞了，同意肖力搞的就行了，陳伯達不聽。這時工礦十條已經有了，舊框有些已突破了，但是毛主席對農村文革的新的思想，陳伯達也沒有了解。陳伯達搞的是第三稿，也送毛主席。當天江青就說主席定了用第二稿。這稿子中說農村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這是毛主席的思想。小學文革由所在社隊文革委員會統一領導。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貧下中農文化革命委員會，由貧下中農大會選舉產生，如不稱職，可隨時加以撤換。這都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已經在稿子上批了一「請林彪同志主持會議，開會通過，現即印發」。十二月十五號開會，會上大家都同意。譚震林說這是中央文革為主起草的。他對此稿祇有一個意見，就是希望分期分批。林彪說不用討論了，主席已經批了。

工廠、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兩個指示，在毛主席看來就是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如果停留在學生和文化團體中搞，就要半途而廢。走資派的經濟基礎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復辟就解決不了。他認為兩條路線鬥爭的中心就是這個問題。

題，加上這時各省市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在他看來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是兩條路綫鬥爭在繼續。他認為錯誤路綫的代表是陶鑄，因此，他對陶鑄的問題抓得很緊，把它作為中心。

五、一九六六年的大變動

(一) 四個元帥講話

十一月十三日工人體育場幾位元帥（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講話，現在歷史學家把它作為一次兩條路綫鬥爭，正確路綫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他們四人，特別是陳毅、葉劍英。有人說當時要他們拿出來批判。但據我所知，毛主席沒有這個意思，沒有要他們拿來批判，沒有把他們看成不同路綫，看成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綫，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妨礙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沒有這樣。當時要他們講話的背景，主要是軍事院校學生到北京來（也有地方學生），衝了國防部，所以要講一講。他們開這個會毛主席是知道

的，也經過林彪同意的，主持人是肖華。會的名字叫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現在有人把元帥們的話抽出個別詞句，說成他們當時就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不符合事實。如陳毅同志講有些口號他不贊成，象「砸爛」、「火燒」等等，他不贊成。歷史學家認為他就是不贊成文化大革命，其實不是。我覺得陳毅同志講得不錯，很誠懇，對群衆是教育勸告的態度。陳毅還現身說法，說他自己歷史上犯過各種錯誤，勸大家不要犯錯誤。他說他犯過右的錯誤，折中主義的錯誤，「左」的錯誤，也正確地進行過路線鬥爭。他說四方面的經驗他都有。他說：現在全國學解放軍，解放軍本身就要講政策。要有組織紀律，成為模範，不要胡鬧。他說，他完全歡迎路線鬥爭。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陳毅同志在這次會上雖然沒講，但他在很多會上講過，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他說過：「正確地進行路線鬥爭，要學習毛主席，學習林彪，林彪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的。要顧全大局，不要圖報復，不要亂戴帽子。要實事求是，不要逐步升級，不要一味擴大，不要衝國防部。」歷史學家摘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話都是摘好的，好象正確的話都是他們講的，不好的話都是壞人講的。其實查查歷史，最早勸學生不要衝國防部的不是別人，是陳伯達。十一月八日陳伯達有文字指示，張春橋去念的。陳伯達說：「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不管你們有千條萬條道理。比起衝進神聖的國防部這件大事來，你們的多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說了兩遍）。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後還可以作毛主席的好學生。」幾位元帥的講

話也是說不要衝國防部。歷史學家說毛主席主張天下大亂，不是這種意思。毛主席是說不要舊秩序，可是要建立新秩序，不是要到處亂來。絕不是因為老師們勸學生不要衝國防部，毛主席就反對他們。葉劍英的講話更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反對的。葉勸學生說：「我對你們是支持的，但真理跨過了限度就成了謬誤。走資派過去鎮壓學生是錯誤的，現在不準人家承認錯誤也是不對的。不要不許人家革命，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有階級感情，不要被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形勢很好。你們不要到總參看大字報，部隊不要參加地方游行，砸爛解放軍報這口號不對。」葉劍英講話時出了點問題，有個李基才是獸醫大學的學生，他寫了個條子，提出質問：「這個會是否經過林副主席批準？你們的講話是否經過林副主席的批準？」葉劍英惱火了，把李基才罵了一頓，說了很重的話，採取了些措施。

十一月二十九日又開了會，陳毅、葉劍英講話。葉劍英還堅持十三日講的話，他說：「有人說我上次講的話是挑動群衆鬥群衆，必須批判，說對李基才的處理是錯誤的。你們應該接受我們的批評，一定要顧全大局。有人說毛主席祇接見學生，不接見工農兵，你們不是一般的學生。我不願你們犯錯誤。一小撮人衝進國防部，我不講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你們要不改，我就洗刷你們。衝進國防部，嚴重地講就是反革命。你們幕後是有人指使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在指揮。有的人父親是黑幫，自殺了，他來報仇。有的人母親是黑幫，他來報仇。你們跑是跑不了的，要趕快回頭，現在改還可以革命。你們回去要鬥、批、改。你們如

果像一小撮那樣，我是不允許的。李基才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究竟怎樣不知道，但他的事實俱在。一二九日他還是講得很凶，對李基才的問題突出了。而陶鑄出問題以後，葉劍英趕緊採取措施，請李基才到他家吃了頓飯，但是他沒有說自己不對，沒有賠禮道歉，祇是說李基才沒事了。歷史學家把元帥們講話當成反對毛主席搞法的有組織的重大行爲，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誰也沒有說可以衝國防部，元帥們的話對衝國防部的學生來講沒什麼特別過火，但確實被地方上一些單位利用了，印出來了。有的工廠企業雖未全印，但把尖銳的地方摘下來印了張貼。我們起草工礦十條、十二條時，陳伯達同我到第一機床廠，廠長是葉選平。陳伯達看到他們把元帥們的講話貼到牆上。陳伯達說：「你們把這些講話貼到你們廠幹什麼？」陳伯達還批評葉選平：捍衛團是捍衛你們自己，不許人家批評你們。

有的地方利用老帥講話的這事，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說過，不要利用元帥的講話阻擋工廠農村文化大革命的開展。至于要把他們的講話拿到全黨批判，是没有的。

(二) 紅衛兵的變化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另一個問題是紅衛兵的變化。據我的印象是，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前，被稱為造反派的人普遍處於少數地位。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紅衛兵就逐步有了變化，造反派逐步從少數變成多數。

據我記憶，地質學院紅衛兵是高校第一個從少數變成多數的。地質學院屬於三司，北航

屬二司，但觀點相同。有人說三司是中央文革的工具，這概念不知從哪裏來的。首先支持地質東方紅的不是中央文革，是李富春。他有五條指示：（一）可以到地質部設聯絡站，地質部應接待你們，你們可以在地質部挂牌子。（二）叫周榮鑫把工作組整理的革命師生員工幹部的材料，已銷毀的把清單交出來。鄒家尤（工作隊長）留下來進行辯論。（三）東方紅不是反革命，要平反，叫何長工向全國宣布。（四）地質部副部長卓雄可以調回來。（五）下次開鬥爭會時何長工、胥光義、趙承豐、鄭伏兆、卞園都要參加鬥爭會。還叫別的地方到地質學院學習。

第二個印象較深的是北航。他們堅持二十八天二十八夜坐在國防科委門口，要求科委趙如璋回北航檢討。羅舜初（國防科委副主任）不讓趙如璋去。這事報告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說叫趙如璋去，他還是不去。羅舜初自己到北航去了六次，坐在地下和學生座談，但就是不讓趙如璋去。後來陳伯達寫了文字的東西：「請你們住到學生中去，如果被打死，拿我陳伯達抵命。」趙還是不去。於是中央正式決定，報林彪批準，決定羅舜初、趙如璋停職反省。後來他們還是到北航去檢查了。北航這件事成了大事。總理代表中央正式宣布決定時，特別講不是罷官，祇是停職反省。他們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黨，是覺悟不高，抵制中央路線。是否罷官，將來看檢查結果決定。這樣北航造反派也成了多數，江青、陳伯達接見他們，我去西南時毛主席也叫帶北航的紅衛兵去。但是，他們人數還是不多。

蒯大富是我和關鋒奉毛主席指示去把他放了的。後來開大會辯論，蒯大富不行，完全是由被動挨打的姿態。清華大學在很長時期內蒯大富一方的人不多。八月份我講話批評蒯大富，說他過去受打擊，現在解放了，但不能團結不同意見的人。

總的趨勢是造反派從少數變成多數，從十一月、十二月就起了變化。

另外一個變化是最早造反的中學紅衛兵，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深入後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是純潔的，擁護毛主席的，但在一開始就有優越感，因為他們是紅五類中的革幹子弟（一九四五年以前參加工作的才叫革幹，解放前就當工人的才算工人，他們的子弟才叫紅五類）。他們認為他們應該領導紅衛兵，他們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這些自來紅的觀點。這種觀點的集中代表是譚力夫，譚的講話到處印了小冊子，很多省委、工廠都印了他的小冊子。十月六日，康生、楊成武、謝富治接見北航紅旗，北航紅旗寫文章批評譚力夫，康生說他們寫得好，謝富治說譚力夫講話是修正主義。楊成武說，你們（指北航）批得對，批得好。這一時期中央反復講這問題，陳伯達、江青都講過，總理也講過，都是說不要「紅五類、黑五類」的說法，說我們第一是有成分論，第二不是唯成分論，第三是重在政治表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總理說革幹子弟就是自來紅，就要在紅衛兵中當權，這是譚力夫的胡說八道。戚本禹說：「譚力夫講話是一株大毒草，譚講話的精神是反對革命學生，整群衆，把揭發黨委、給工作組提意見的人說成右派翻天。譚提出秋後算帳，是反動觀點。」

壓制群衆的人都喜歡譚的講話。問題不在譚力夫，問題是背後有一股社會思潮，批評譚力夫，這不是群衆鬥群衆，不是對譚力夫這個人。譚還是北工大籌委會主任。有人把譚力夫說得那麼好，也不對。譚力夫的基本觀點確實不對。當時我說：十六條是批判工作組的，譚力夫說工作組好，這是違背中央精神的。毛主席說過：紅五類、黑五類的說法是混淆了文化大革命的組織陣綫，不是以革命不革命來劃分，而是以家庭出身來劃分。「龍生龍，鳳生鳳」的血統論是反動的，反馬克思主義，連資本主義都不够，是封建主義的，混淆了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陣綫。制造混亂的不是譚力夫一個人，是一些省、市、中央的領導人，他們的思想就是如此，就是要把陣綫搞亂，來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阻擋革命深入開展，把水攬渾。最初破四舊、搞地、富、反、壞時，革幹子女覺悟高，容易站在前面。毛主席認為，真正革命深入了，要革自己的命，要受群衆監督，革命幹部子女有些就受家庭影響，懷疑文化大革命。他們覺得父母革命那麼多年，現在成了革命對象了，他們就起了變化。毛主席這種觀點，中央同志反復說，總理講過，我也講過。不過對學生不用「保皇派」這個詞，他們是一時跟不上，還是教育問題，不要把學生變成批判鬥爭的對象。這是毛主席的精神。各省都組織了官辦紅衛兵，祇準他們參加，不準別人參加。這種情況到運動深入時就不能維持了。

再一個問題是，紅衛兵從破四舊到鬥黑幫，後來發展到私設公堂，設拘留所，抓人打人，追財產。這些現象開始就有，後來發展嚴重了。十一月，毛主席要陳伯達約我和關鋒到

北京各地去看，哪裏私設公堂，我們當場把人放了，不許這樣搞。我們到一個中學，他們把女校長、教導主任關在地牢裏，我們把他們放了，他們不敢回家，寧願到公安局去。我們當場打電話叫北京公安局把這兩個人保護起來。我們還簽了字。我們到了幾個地方，後來起草了十一月十八日北京重要通告。內容是：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它單位，都不許私設公堂，私設拘留所，抓人打人，這是違反國家政策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國法黨紀處分。從今天起，如果再犯此種罪行，要立即處理。這個通告十二月二十日用中央名義發到各地，要各地普遍張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陳伯達、王力、關鋒、胡痴、劉建勛到商業部招待所，這個招待所住的人，也有抓人打人的，也有被抓被打的、也有上訪的。我們向招待所的群衆講，北京市公告是毛主席同意的。告訴他們，昨天陳伯達、戚本禹和我到東糾，他們私設拘留所，拷打了住在你們招待所的三位同志，昨天下午還在打，逼他們按手印。我們告訴他們，任何人沒有權利抓上訪的同志。被抓的三個人我們不了解，但抓他們的做法是非法的。現在公安局把這三個人請去了但不是逮捕他們。如果不制止這種行為，文化大革命就搞不下去。這種行為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文化大革命，給公安機關造成很大困難。你們這裏住着個張文彩，自己說是江青的秘書，根本不是。還有個李仁貴，說是林彪的秘書，林彪也聲明根本没有。我們讓他們誰帶凶器馬上交出來，如果再帶出去就犯法，把人家證件拿走的一律退還。文革開始後因向領導、向工作組提意見被打

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一律無效，恢復名譽，檔案要退還本人。過去的作法是國民黨的作法，毛主席堅決反對。工人因給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被調走被開除的，一律無效，工資照發。要回工廠去，不要跑到北京來。各地到北京來抓人的，和東糾西糾結合，不但不執行中央關於平反的指示，而且追到北京來抓人，這是不對的。（這些作法歸罪于毛主席是不公道的，毛主席說天下大亂，不是這個亂法。）陳伯達說：「你們帶來的刀子、鞭子都要留下。」一個叫于修海的用鋼絲鞭子打人。我對他說：「你如果不改你就是犯法。」當時還沒有帶槍的。毛主席把這看成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新形式。

總之，十一月、十二月紅衛兵的變化，一是造反派在學校裏逐步變成多數，占到主導地位；另外，有些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不那麼積極，方向不對。

（三）一九六六年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講話和我的一些看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飯。沒有林彪、總理、陶鑄、康生、李富春。我們到時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屋裏很熱。吃飯是按他的慣例，他招待外國人也是這樣，四菜一湯，每人一小碗面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飯前毛主席說了很多話，吃飯後又說了幾句。他從來不過生日，這次過個生日，實際上這是個比較重要的會。

我印象很深的話是，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

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毛主席說：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連，大串連使全國革命聯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文化大革命他們不是真搞，他們是兩面派，陰一套陽一套，用種種手段對抗革命路線，破壞群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最重要的手法是挑動群衆鬥群衆，組織操縱一些群衆來壓制革命，保護他們自己。挑動武鬥，企圖制造混亂。他們總是把鬥爭矛頭指向群衆，指向革命路線，也就是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用「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制造宗派，攪亂階級陣線，來對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提倡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的血統論，不平反，不銷毀材料，還要秋後算帳。

他們為什麼能蒙蔽群衆？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爲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麼，

就叫作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倡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地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衆，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祇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衆也懂得，為群衆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小撮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現在，對這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叫他懸崖勒馬，如果再搞兩面派，他們就是和走資派同流合污，或者他們就是走資派。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說，最近時期出現新的局面，廣大工農兵起來了，衝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起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毛主席說的革命學生就是當時所說的造反派），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幹部起來造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負責人的反。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幹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毛主席講話總的概念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吃飯時毛主席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話在吃飯前也說過。

除上述的話以外，他吃飯前還說了很多話。這些話在後來的文章中找得到。雖然沒有黑體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話是準確地概括他對當前形勢和今後作法的想法。有人說毛主席說「要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我從來沒聽他說過。他說的「全國全面」，是指的工礦企業和農村。他說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半途而廢。他認為如果不搞工礦農村的文化大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基礎就搞不掉，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舊東西就搞不掉。

「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口號，毛主席說，抓革命才能促進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制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說，有人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衆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他們過去靠舊框框吃飯，離開舊的一套就不會走路，就不會說話。挑動群衆停止生產，挑動群衆鬥群衆，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為走資派。任何阻擋這場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

被歷史潮流衝掉。毛主席說，我同陶鑄爭論的實質就是這個。

那時相當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對此都不理解。原來說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後來工礦企業和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兩個指示都是我起草的，可是我這起草人開始也沒有認識到。毛主席過生日的談話後我才知道這是當時毛主席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

毛主席還說：鬥、批、改，改什麼？光在文化部門、機關學校改，改些什麼？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麼？作為社會經濟基礎的工礦農村還是老一套，那還改什麼呢？那就沒有目標了。

文化大革命是個悲劇，毛主席沒有達到他的目的。歷史學家說毛主席就是爲了天下大亂，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爲什麼要叫它亂？這次毛主席過生日才說得比較透徹。我當時覺得很對。至今還覺得毛主席的願望並不壞，但是階級估量錯了，戰略錯了，方法也不對，必然失控，達不到原來設想的目標。

毛主席還說，學生一定要下廠下鄉，把學生革命運動和工人農民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合成一體，才有一個幾億人的大軍，才能解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各文化單位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和鬥批改不能孤立地搞，革命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應投入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真正明辨是非，知道爲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爲什麼要搞兩條路線鬥爭，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樣上層

建築領域內的鬥批改才有真正的實質性的內容，才能達到改，改成新的一套。祇有這樣結合起來，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生才能了解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國情，也才能聽到工農兵的聲音，才能有適合中國情況的上層建築，才能有適合中國情況的教育內容、教育制度和方法，才能使全部上層建築的機關、學校真正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脫離實際、脫離群衆、脫離中國國情、脫離根本宗旨。學生、文化機構、上層建築要同工人農民結合成一體，充分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向社會主義的敵人舉行總攻擊。

毛主席認為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制度（不是說社會主義制度，是說舊的規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舊紀律（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要搞掉。毛主席關於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這樣來的。他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于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主席說，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容易形成或已經形成少數人對群衆的壓制以至壓迫。毛主席還講了另一面，說我們的大民主必須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集中指導下的大民主，對革命群衆以及對方的不同意見，祇能擺事實講道理，不能用強制方法壓制別人。在人民內部，不能祇許自己發表意見，不許別人發表意見。那就違反了大民主。有人故意破壞無產階級大民主，制造武鬥，挑動群衆鬥群衆，壓制革命，這種破壞無產階級大

民主的作法，也就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因此我們的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不能幹涉甚至壓制民主，不能亂抓人。祇能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說怪話反對領導，而是真正去放毒藥。）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制裁。革命群衆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保障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毛主席反復講，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即使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祇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辯論。

毛主席有些思想並不都是錯的。不能說毛主席就是大獨裁者。根據他的思想搞的「公安六條」，現在有人把它罵得一塌胡塗，我以為，個別條文有問題，總的精神在當時不壞，是要保障群衆的民主，在一定條件下實行專政。歷史學家着重批評一條：「誰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其實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如此。（當然他審查時也沒有去掉這一條）後來又推廣為誰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這提法毛主席也批了，但不是他的思想。毛主席還規定文化大革命初期武鬥中殺了人的，也放到後期處理。因為當時派性嚴重，容易弄錯。當時福建有這麼一個人，他們說要槍斃，我向毛主席建議，毛主席同意後期處理。總之是要保障民主，專政限于很小範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好，頑固堅

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部，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個不殺。文化大革命中我聽主席講過多次。這一點他是堅持的。但他沒有堅持大部不抓。過去說大部不抓，是指確有證據的間諜特務都大部不抓。可是後來擴大到大部都要抓。他沒有堅持過去提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說，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他說，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文化大革命中少奇同志（他沒有提鄧小平）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祇是兩條路線鬥爭的進一步暴露。這一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鬥爭還是在鬥。各級、各個領域都存在這問題。（毛主席退居二線後）他們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響，清除這些影響，使各方面、各領域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還要作深入細致的工作，還要有很長時間的鬥爭。對這一點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緊緊抓住這一問題，是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關鍵。

歷史學家說毛主席專門反對黨中央的多數，但毛主席認為這是路線之爭、道路之爭。當然毛主席對這方面估計過分了。

毛主席說，一定要有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束縛群衆的框框，到群衆中去，同工人農民學生在一起，參加鬥批改，實現機關革命化。要堅持分清兩

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領導幹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團結大多數，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來，越來越多的人會站到革命群衆方面來，支持群衆的革命運動。

他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要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衆打倒，這種少數人是咎由自取。（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話。）

毛主席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估計過分了。對蘇聯東歐的修正主義起初看來也估計過分了一點，現在看不過分了。他們確實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當然中國和蘇歐東歐不一樣，他們有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我們是戰爭中打出來的，一直走的是中國式革命的自己的道路。

毛主席在吃飯前說了上面一些話。飯桌上沒有說什麼話，祇是祝酒說了一句，吃完飯閑談幾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過生日的這次談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比較重要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以後，我有一些想法，認為自己的思想落後于毛主席，落後于運動。覺得毛主席總是站在前邊，我們總是趕不上。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深刻，當時我是佩服毛主席，擁護毛主席的路線的。自己覺得趕不上，當時自己覺得總是要跟毛主席幹革命，防復辟，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別人的回憶錄說的，自己比毛主席還高明，當時就對毛主席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事後聖人，反正當時我沒見過一個堅決鬥爭的。那時自己是否沒有疑問？也不是。這樣的具體搞

法，到底怎麼樣？我有點擔心。當時聽了毛主席講話後一兩天，我對給我開車的中聯部司機王貴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還要大搞，看起來所有的幹部都要被打倒。後來一九八二年我從秦城出來後王貴對我說：你看得真準，後來果然是所有領導幹部都打倒了。我的確擔心，對這樣的具體作法有疑問。

過生日的會說明毛主席對我還是信任的。我這人愛提不同意見，毛主席喜歡不同意見，不喜歡隨聲附和。我同毛主席接觸將近十年，我認為毛主席的最大弱點是沒有系統地讀《資本論》。這是上層領導的通病。少奇同志沒有讀《資本論》，他還說不要讀《資本論》，讀些小冊子就行了。陳伯達也沒有讀過《資本論》，讀了第一章就讀不下去了。毛主席臨死時床頭上還放着《資本論》第一卷，說明他自己覺得還是要補這一課。毛主席說他自己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沒有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不是謙虛之詞。政治經濟學他認真學了，也不能說他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發展。他認真學了蘇聯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一句一句地批了，但是他沒有讀《資本論》。他的確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但是離開了《資本論》這基本的東西，無產階級專政講得多，考慮得多。公有制、社會化生產他不是沒有考慮。不象有的理論家，在三中全會前批判劉少奇和陳伯達，說他們「居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要搞托拉斯」。這位理論家難道連《國家與革命》也沒有讀過嗎？列寧說托拉斯是高度社會化的生產組織，它更接近社會主義，所有制容易解決，社會化不容易解決。這一點毛主席不是這樣。

他一貫認爲社會主義要搞聯合企業，實際上就是要搞托拉斯。他在武鋼、大慶都提出要搞聯合企業。聯合企業、公司，就是托拉斯，這是翻譯的問題。這點上毛主席並不保守。

關於商品問題，張春橋的文章引了毛主席的語錄，說我們還有資產階級法權，還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那時毛主席已經老了。這段話思想很混亂。據我所知，毛主席對商品問題也有發展。斯大林說生活資料是商品，生產資料不能成爲商品。毛主席說，生產資料也是商品。這就進了一步。不能說毛主席是保守的。直到現在，人們也沒有把商品問題講清楚。我總覺得，因爲有些人沒有讀《資本論》，對商品的概念不清楚，吃了大虧。現在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同志們，認爲承認勞動力是商品就是資本主義。爲什麼說按勞取酬是資產階級法權？爲什麼說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什麼叫工資？如果工資不是勞動力的價格表現，那就沒有工資的科學概念。我願意給多少就是多少，我願意定多少級就是多少級，不是從科學的概念出發。如果工資不能保障勞動力在一定經濟、文化、社會條件下滿足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滿足他生育和教育子女的需要，不從這方面考慮，就沒有科學的定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表現，這是簡單勞動的價格，熟練勞動、高級勞動是它的倍數。認爲社會主義就可以不考慮這些，我定多少就是多少，資本主義的工資才符合馬克思的規律，這不是笑話嗎？這問題毛主席沒有解決，現在也沒有解決。不解決工人的根本需要，他必然用不正當的、不科學的方法去滿足他的需要。這規律誰也不能抗拒，誰也壓不住。我們的工

資制度不建立在勞動力價格的基礎上，離開這個東西，計劃就是空的，可變資本、不變資本，都沒有基本的計算單位了。所有財富，不是活勞動就是死勞動。不變資本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新增加的價值是扣除必要部分（工資）之後的那一部分。這都用行政命令來解決，計劃離開價值法則，怎麼行呢？價值法則不是馬克思發現的，馬克思發現的是剩餘價值。離開《資本論》，能有科學的社會主義嗎？說計劃調節市場，調節是主觀的，客觀規律是什麼？主席臨死前床頭放着《資本論》第一卷，說明他想解決這問題。主席說他沒有發展政治經濟學，是中肯的，是沒有發展。可是在商品問題上他也有發展。現在把主席完全否定是不對的。

關於科學技術方面，毛主席是沒有看到、沒有總結新的技術革命引起的新的產業革命。但是毛主席是偉大的。他密切注意世界上任何新的科學技術的進展，他這點不在現在的領導人之下，而且在他們之上。他中心抓電子科學的發展進程，他用辯證法來講電子問題，他說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至今電子科學家還佩服他。他跟日本科學家的談話至今還是正確的。他是真的抓。激光，中國抓得不晚，六十年代就抓。在世界上是領先的。原子彈、氫彈、空間科學、火箭，凡是世界上先進的東西他都抓。就是核電站沒有抓。生物工程他也抓得早。人工合成胰島素在世界上領先。毛主席是偉大的。不能說毛主席反科學。好多科學成果是在十年動亂期間出現的。把毛主席說得一無是處是不對的，不公道。那時中國處于被封鎖的地位，全世界也還沒有形成概念，引起產業上的革命更沒有。當然可以設想，如果不搞文化大

革命，在這方面可以有更飛躍的發展，但那畢竟是設想，不能說毛主席不抓科學技術，不能說他抓得不早，抓得不緊。這不公道。

現在有人說毛主席抓三綫不對，這不符合實際，鄧小平也不會同意這麼說。當時是什麼時候？當時美蘇同我都是敵對的。現在可以說風涼話，可是在當時是重大的戰略決策。鄧小平對此也是積極的，而且是實幹的。我跟鄧小平去過三綫，現在說搞三綫是胡鬧，浪費錢，是毛主席的瘋狂，這不符合實際。如果當時不搞三綫，什麼都放在沿海，一旦發生戰爭就要困難得多。也不能說三綫都是虧本生意，一點收獲沒有。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甘肅的發展很大。當然現在和沿海比還是不平衡，但有了重大發展，在當時這不能說不對。現在雲南貴州出了很多尖端的東西，軍用轉民用的東西，好多是世界一流的。西昌成爲發射衛星的基地，沒有三綫基礎能行嗎？對毛主席的批評應該是公正的，不能把中國的落後都歸咎于毛主席，也不能把動亂時期毛主席抓出來的貢獻，尖端的東西，都一筆抹煞。毛主席是犯了很大的錯誤，造成很大的損失，是貽誤了時間，但是不能把他說得一塌糊塗。中國的社會基礎決定，不犯這樣錯誤也會犯那樣錯誤。不能掩蓋、也不能誇大毛主席的錯誤。

說毛主席不開放，閉關自守，這也是不對的。毛主席不閉關自守。在這方面毛主席是開明的。一有可能他就要拉關係。毛主席死後，現在搞開放，如果把毛主席作爲閉關自守的代表，這是歪曲。毛主席相當開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制定，是毛澤東的功績。周總理是執

行者。總理自己說過，他不是國際戰略的決策者。我也聽劉曉、陳老總說過。陳老總說，要他當外交部長時，他問總理，你當了多年外交部長，有什麼經驗？總理說：很簡單，你記住四個字，授權有限。外交大權是毛主席掌握的，總理或外交部長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權有限。劉曉說，他當駐蘇大使時，陳老總也對他反復交代這四個字：授權有限。周總理和陳毅也同我當面講過這四個字，就是說，一切原則問題必須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作決定。毛主席既定的方針、政策、原則，在這範圍內，外交工作要發揮自己的作用，絕不能越權。周總理是偉大的外交家，制定外交政策他也參與的，但政策的決定同制定主要是毛主席。

一切可以爭取的國際關係、國際援助，毛主席都用心地去爭取。同美國搞關係，抗日戰爭時期就有。抗戰時期就有美國人在延安。解放以後毛主席沒有忽略同美國建立關係。美國人開始時也沒有同新中國搞翻。解放軍渡江後美國第七艦隊撤退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還留在南京，蘇聯大使羅申倒跟蔣介石撤退到廣州去了。

這時是解放臺灣的最好時機。毛主席說七大以來犯的第一的大的歷史性錯誤，就是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臺灣，喪失了時機。我們解放上海後，管得很好，陳老總威信很高，但具體作法上可能有不當之處，中央決策上可能有點問題。對上海的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如果更寬一點可能更好。上海是遠東金融中心，這個地位我們自己不要了。其實外國銀行並不影響我們徹底解放。當時上海地位高于東京。香港那時還沒有地位。後來香港的發展，是

上海的轉移，最大問題是沒有集中力量解放臺灣。三野力量分散了，去打西南。其實西南胡宗南是一盤死棋，而臺灣這盤棋被蔣介石下活了。我們喪失了最大的時機，金門打了敗仗。

毛主席非常重視發展同外國的關係。一九五四年日内瓦會議周總理對杜勒斯的態度，是毛主席的思想。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我參加藝術團到南美，主要任務是到美國，美國邀請了我們。可見我們沒有放鬆一個機會同美國接觸。後來因為匈牙利事件，西方掀起反蘇反共高潮，美國去不成了。尼克松訪華，建立中美關係，是毛主席建立的，不能說毛主席保守。對蘇聯也是如此，一有機會毛主席就要恢復同蘇聯的關係。赫魯曉夫一下臺，馬上就派周總理去，結果又吵了架，回來了。同蘇聯的緊張關係，一直延續到我打倒前。但毛主席講到蘇聯時都說：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反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忘記學習蘇聯，包括他們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的經驗。是蘇聯撤退了專家，封鎖我們，不是我們的責任。毛主席不反對開放，他總是爭取一切機會建立關係。在蘇美敵對我們的時候，毛主席把其他可能爭取的國家都爭取了，特別是法國的戴高樂。對日本的關係，官方不行，就從民間突破，這方針也是毛主席定的。不能說毛主席反對開放，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毛主席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任何時候都不放棄。任何時候、任何招牌下的國家，中國都不能成爲他們的附庸，不能依賴。同蘇聯的爭論，現在有人認爲都是我們不對，我認爲不是我們不對。我們同蘇聯的爭論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我們不聽指揮棒，

我們國家民族要獨立，不能容許侵占我們的領土和主權。這類問題一萬年也是我們對。可是另一方面對於社會主義究竟怎麼搞，我們也不清楚，一定要罵人家不對，這是有不當之處。肯定一切也是不對的，不能說九評都對。特別牽涉到經濟政策問題，不能說都對，錯話說得也不少。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毛主席演了一場悲劇，但因此就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時代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一切，是不對的，我不同意。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對的。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不能一分為二，我也不同意。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為二。如果文化大革命不能一分為二，那就不能得出經驗教訓了。那就不會有以後的新發展了。

不能說毛主席閉關自守。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國與國關係、黨與黨關係的確立，是毛主席的偉大貢獻。當然同周總理分不開，但首先是毛主席的貢獻。總理如果在世，他也會說主要是毛主席的貢獻。

我當時是真心擁護毛主席，不能說是違心的。我也說了不少錯話，不能說這些話都是違心的。毛主席不說打倒誰，我不會去打倒，毛主席說打倒誰，我都擁護。當時我是真心誠意的，不能說是違心的。不能說錯誤都是毛主席一個人的責任。我的主流是擁護毛主席。雖然有些問題我有些擔心，但不能誇大這個擔心。王貴說我看得真準，其實我也不是那麼明確，沒有那麼鮮明的概念。

根據我的回憶，一九六六年毛主席說了上面一些話。這表達了毛主席當時的思想。

(四) 書記處和政治局名存實亡了

一九六六年底，黨中央領導核心是什麼情況呢？首先常委十一個人，經過這半年祇剩下六個人，就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其他幾人，有的也沒明確說他是資反路綫，但好象就不是常委了，開會也不請他，他也不到會，祇是還上天安門，報上發表時還是常委。那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朱德。十一中全會定的常委名單是十一人，表面上是十一人，實際上當時祇有七人，除上面所說六人外，還加陶鑄。後來陶鑄也沒有了，就祇有六個人了。朱德有些不重要的會他還參加，而陳雲，從一九五七年我接觸中央領導時起就沒有看見他。十月一日天安門上還是十一個人，而晚上看烟火，毛主席叫開個敞篷車到群衆中去，這車上常委就祇有七個人，即上面說的六個人加陶鑄，沒有劉、鄧、陳雲、朱德。另外加上中央文革的人，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文革小組的副組長王任重、劉志堅都沒去。軍隊是葉群去的。

毛主席要到群衆中去，總理很緊張，謝富治、傅崇碧都緊張。敞篷車從群衆中經過，群衆衝上來和毛主席握手，車根本走不動。那天踩死的將近十人，踩傷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擠斷了三根。白天林彪在天安門的講稿，定稿時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綫」，陶鑄、王任重和我對毛主席說：「反革命」一詞中國人最害怕，最好改一下。毛主席臨時匆忙加了個「對」字，成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綫」。晚上到群衆中去之前，在人民大會堂集合時，

張春橋說「反對革命路線」在中文裏的意思不清楚，不確切。毛主席思索以後說，「那就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吧！」因為修改這個詞，紅旗社論晚發了兩天。王力、關鋒起草的紅旗社論原稿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毛主席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我執筆改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這成了我的罪狀，說這口號是我提出的。（在秦城時公安部門的人當我的面說：「我得查，不可能毛主席和十個常委都響應王力的號召。」公安部門根本不贊成把王力列入兩案，據說是中紀委的人拍了桌子才列入的。公安部門查了檔案之後，否定了這是我的罪狀。可是一九八四年中紀委開除我黨籍時，又作爲我的一條罪狀。）當時，總理問過我，黨內鬥爭歷來都是左傾右傾，怎麼能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呢？我叫他問主席。後來總理跟我說，他問了主席，主席用英文講了這三個詞的區別，總理馬上講「我懂了。」一打倒陶鑄時毛主席說：「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毛主席並不認爲十一個人都是核心，所以坐敞篷車到群衆中去沒有劉、鄧、朱德、陳雲四人。晚上上天安門看煙火時，到後來太晚了，很多人都走了，陶鑄、陳伯達、康生都走了，祇剩下周恩來、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天安門上，毛主席對我們說了很多話，他說：「形勢很好，阻力很大，現在還看不清楚反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並說：「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驚的是毛主席接着說的話：「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這說明他充分估計到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相當大。另外也

看到他的決心很大，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失敗了，受到懲處的話，你們要同我一起承擔這個歷史責任。他提議要照相，他站在中間，總理說：「我們年紀大了，讓年輕人靠主席站一會。」所以姚文元、戚本禹靠近毛主席，其餘的人挨着站。周總理對江青說：「我們常和主席在一起，我們站邊上。」

這是十月份常委的狀況，到年底，陶鑄又沒有了，常委又去掉第五個，剩下就是毛主席、林彪、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

六個人當中，林彪的態度是：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他不主持。他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來講話，他自己冒出來的話也總是挂着毛主席，如，「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一開始用林彪時，就給江青寫信，對林彪有些地方不滿意。林彪雖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線。陶鑄講最大的失誤是劃分一綫二綫，毛主席明確說現在不要一綫二綫。毛主席自己是一綫，所以林彪什麼事都往後退。一九六六年年底時毛主席對林彪還是信任的，還沒有什麼大的意見，第二年二月份就很有意見了。

對周總理，毛主席不滿意，認為周總理、陶鑄主持常委日常工作期間，即八月、九月、十月三個月抓得不行，沒有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進行徹底批判。但毛主席對周總理還能合作，因為周總理向來是主席一講他就馬上擁護。總理自己講他是管策略的，搞戰術性工作的。

李富春是作具體工作的，毛主席對李富春的具體工作也不滿意，所以叫余秋里來代替。李富春是計委主任，余秋里是副主任。但毛主席組織了小計委（有余秋里、谷牧），決策性的事是小計委領導大計委。毛主席喜歡班子小，小計委直接對毛主席負責。文化大革命時期實際主管經濟工作的是余秋里、谷牧，工交座談會以後還是他們。

陳伯達是個秀才，按毛主席思想起草東西，把毛主席的提法從理論上加以解釋，毛主席一直認為他是可以的。陳伯達有時講偏了也不要緊。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是聽江青的，陳伯達是常委、文革小組組長，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會上陳伯達就講：「我不過是劉盆子。」從前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闖了禍，最後毛主席講「秀才是我們的人」，這主要是指陳伯達，不是講田家英、胡喬木。那時有人要打倒陳伯達，特別是葉飛（福建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陳伯達回福建時，對福建大躍進提了很多意見，廬山會議上葉飛不能饒過陳伯達。柯慶施講了情，才讓陳伯達過關。毛主席講「秀才是我們的」就是指這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何況他也不造反，總是順着毛主席，不過有時順錯了，把話說反了。

康生，毛主席對他私人關係很好。毛主席說康生歷史上有功勞。康生從第三國際回延安以後，康生、陳雲、王稼祥都是擁護毛主席的。王明回來後要把中央搬到武漢。第二次王明路線包括王明、博古、周恩來。周恩來向來是擁護第一把手的，王明是斯大林那裏來的，他就擁護王明。康生、陳雲、王稼祥擁護毛主席，否定了王明要把中央搬到武漢的意見。康生

一回來就提出要毛主席代替洛甫（張聞天）。因為季米特洛夫說你們回去後要擁護毛澤東。康生不斷表示擁護毛主席代替洛甫，毛主席說還不行，時機不到，還有斯大林。私人關係方面，毛岸英、毛岸青是康生布置張某從上海把他們找回來的。以後，康生到巴黎把他們哥倆安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康生一直照顧這兩個孩子。毛岸英回延安後，毛主席還叫毛岸英跟康生學點東西。解放戰爭初期，在山東渤海區，康生帶一個班子去開土地會議，就有毛岸英參加，搞調查、搞土改。毛主席和康生在詩詞、文物、書法方面有共同愛好，有交往。毛主席詩詞定稿由康生負責。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經過康生，編四卷毛選也是康生負責（一、二、三卷是陳伯達負責）。江青是康生的老部下，他是延安社會部的，她的全部材料康生都掌握。毛主席對康生個人關係很好，他們來往信件都是用毛筆字，寫得很漂亮。爲什麼不叫康生當中央文革組長？因爲江青不能容忍康生當組長。陳伯達是傀儡，康生要當組長就要真當，那將置江青于何地？康生片面性也很大，他外強中幹，外面很凶，實際怕事。到十一中全會之前，康生在毛主席眼裏的地位已低于張春橋。因爲北京大學的文革簡報（關于六一八事件的）康生找出來想送給毛主席，猶豫着沒有送。張春橋搶過來馬上送給了毛主席。張春橋告了劉少奇，然後才有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毛主席對張春橋講：「要康生這樣的人有什麼用？」後來，在二月逆流中，張春橋在毛主席眼裏地位也高于康生。張春橋向毛主席匯報時不但告了副總理和老帥，還告了周恩來、康生、陳伯達。

一九六六年底，十二月份，剩下的常委就是這種狀況。此外，劉、鄧已經不能容忍了，陶鑄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鑄和彭真一樣。

陳雲早就不能容忍了。我是一九五七年直接接觸毛主席的，後來列席書記處會議，列席常委會議，在這些場合一次也沒見過陳雲。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陳雲不發言，說是三年以後再說。國務院小禮堂陳雲發言，毛主席不高興。鄧力群把陳雲的經濟理論編了小冊子，發很小範圍，毛主席不高興，立即收回。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陳雲寫了一封信主張包產到戶，王稼祥主張三和一少。在北戴河毛主席批評四個人：陳雲加田家英、王稼祥加王力。陳雲不到會，寫了條子「為避免當場心肌梗塞，特此請假」。陳雲他自己也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

朱德和毛主席是老搭檔，又是老對頭。王明路線時他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說：「紅軍長征中處在危急的時候，每次政治局會議永遠是四票對三票。這四票一是博古，二是李德，三是朱德，四是周恩來。我這邊原來就是我一票，後來我生病，王稼祥負傷，我們兩人擔架在一起，我首先爭取了王稼祥，他也認為按博古這一套搞下去不行。又通過王稼祥爭取了洛甫，我這邊成了三票。後來我提議開擴大會，把各軍團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找來，這就是遵义會議。這才改變了局面。」毛主席說朱德每次重大路線鬥爭中不是站在對立的方面，就是不大清楚。但毛主席說：「我這一輩子一定要保兩個人，一是朱德，一是陳毅。陳毅也經常

反對我，但是從井岡山就是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政治部主任陳毅。我一定要保他們。——廬山會議，朱德又是站在彭德懷方面。

鄧小平在王明路線時是擁護毛主席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都是堅決擁護毛主席代表的路線的。書記處原來也不錯，後來鬧獨立性，毛主席不要書記處了。一九六六年底，劉鄧問題要公開化，因為在全國，在國際上影響太大，不公開不行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主席講了個剝笋政策，康生傳達的，我覺得很不好，一層一層地剝，最後剝光了，先剝彭、羅、陸、楊、後剝劉、鄧，再剝陶鑄，最後剝光了。

康生是死後才定為主犯的。陳雲和康生同年入黨，同時在上海當區委書記，同時當江蘇省委委員（江蘇省委相當于中央局）。康生是常委，當時叫趙雲，陳雲是委員。兩人差不多同時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路線時代他們倆差不多同時補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康生未在我面前說過陳雲的壞話，祇說過一句：「陳雲心計太多，平常不作事情，該說話時不說，說一句就够你受的。」後來陳雲地位比康生高，主要因為身體原因。康生在延安騎馬摔了跤，腦子受傷，精神分裂，當時還沒什麼，解放後一有病就看到四面都是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看病。後來不知為什麼，定級時康生比陳雲高一級，陳雲四級，康生三級。郭沫若說康生是當代第一書法家。康生養病時用蠅頭小楷抄西廂記，一本一本本地抄，後來病好了可以工作了。毛主席在世時康生一直沒有打倒，他是副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

主義理論家」。我覺得他不够理論家，他沒讀過《資本論》，小冊子讀得很多，寫文章專門摑字眼，自己沒有積極意見，祇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九評》如果没有鄧小平拍板，一篇文章也出不來。

這是一九六六年底最高領導核心——常委的狀態。

一九六六年底書記處是什麼狀態？陶鑄是常務書記，這是彭、羅、陸、楊撤銷後定的，五月份定的，常務書記陶鑄、書記葉劍英、十一中全會增補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毛主席根本不贊成書記處，說書記處成了獨立王國。陶鑄沒有領會毛主席並不是真想搞書記處。毛主席叫他當文革小組顧問，他還不懂，還是想搞書記處。毛主席眼裏根本沒有書記處。十月一日上天安門，根本沒找書記處的人。毛主席開會從來不找書記處的人。一九六七年二月份，毛主席說：「中央文革代替了書記處。」

政治局委員的狀況：除原來的委員外，十一中全會除康生、陳伯達外增加了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毛主席對他們很尊重，是作為元帥來尊重，不是作為政治局委員來尊重的。候補委員增加了李雪峰、謝富治。政治局開會通知他們。毛主席那裏開會，是常委擴大會，沒有政治局的人，政治局日常會議一直是總理主持的。毛主席思想上沒有把政治局作為領導機構。

(五) 文革小組的人事變動以及性質和作用的變化

文革小組從成立之日起，有些人一次也沒到會。說是每個中央局出一個人，其中楊植霖是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西北局書記，他從來沒到會。西南是宣傳部長劉文珍，也一次沒到會。東北是鄭季翹，他是吉林省委書記（以前是紅旗雜志秘書長），也沒到會。華北成員是郭影秋，他過去是南京大學校長，後來調人民大學校長、北京新市委書記。他開始時出席過文革小組會議，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新市委有問題，郭影秋不能工作了。北京的文革小組成員換成吳德。吳德到過幾次會，實際上也沒有他，不經常通知他開會，也不經常參加工作。此外文革小組第一個被打倒的是尹達，他第一個寫文章批判翦伯贊的歷史觀點，受到毛主席稱贊，要紅旗雜志發表，所以他被挑選為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成員，後來成了文革小組成員。他的名字排在前面。可是他是歷史研究所所長，群衆造反他首當其衝。戚本禹、關鋒是歷史學家，歷史所把尹達的材料送給關鋒，關、戚他們兩人請示江青後去歷史所講了一篇話，尹達就被打倒了。因為關鋒政治地位高，是大左派。詳情我至今不知道。我還是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謝鎧忠是軍隊政治部文化部長，一九六六年底還沒打倒，但文革小組會議都沒有他參加。毛主席找文革小組的人也沒找他。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上天安門還有他。那時我當宣傳組長，節日發消息按老規矩是把文革小組的人排到中央委員後頭，可是五月一日總理讓印好的人民日報停發，重排名單，把文革小組成員排到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後頭，中央委員前頭。謝鎧忠本來在我前頭，這次總理把王力、關鋒、戚本禹名字排在中央委員前

頭，謝鐘忠、穆欣排到中央委員後頭。穆欣十月一日報上還有，再往後沒有了，因為人家揭露他講江青的壞話。這是文革以前的事，他說江青精神不正常，江青不能容忍。還有，人民來信說穆欣從晉綏到晉冀魯豫時，路上被國民黨逮捕過，說他是國民黨特務、叛徒。江青叫我查穆欣的歷史，我讓矯玉山去調查，找了廖井丹，他整風時審查過穆欣。廖井丹寫了材料說，「穆欣在整風中審查過，沒有問題。」另外找了穆欣的愛人林冰，她也寫了報告，說穆欣沒問題。我就跟江青說，穆欣沒有問題。後來我才知道，江青對這點不滿意，認為我包庇壞人。光明日報揪鬥穆欣，關鋒、戚本禹到光明日報講了話，不讓揪鬥他。穆欣不工作了，我安排他還住在釣魚臺，後來讓他到人民日報作點工作。他基本上沒有參加領導核心的會。毛主席那裏開會從來不找他，文革小組的會他也不參加。在毛主席看來他從來也不是中央文革的成員。王任重、劉志堅是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本來不是副組長，後來增加的。王任重比陶鑄更早就被認為不行了。他在釣魚臺不住在文革小組那個樓，他自己單住一個樓，二號樓。他在北京這一段自己搞自己的，還找些紅衛兵住在他那裏，有清華的、北大的。文革小組的事他不沾邊。他是中南局第一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直接向他匯報，他發指示。後來武漢情況引起毛主席的不滿，但他說湖北省委就是好。湖北抓人抓得最早，鎮壓群衆比別地方還厲害。陶鑄問題首先從王任重開始。最早毛主席是信任王任重的，毛主席外出經常住湖北，毛主席那裏會見外賓等都是找王任重作陪的。那次毛主席要開

常委生活會批劉少奇，江青、林彪轉移目標批鄧爲主，江青親自動員王任重、王力批鄧，江青對王任重和我說：「你們都被毛主席、中央領導認爲是優秀幹部，你們知道內情，你們要很好批鄧。」一批鄧會上王任重發了言，我覺得他是被迫的，當時他滿頭大汗，臉色蒼白，講了些不痛不癢的話。我一句不講，江青很不滿意。王任重祇抓湖北的事，沒有把自己作爲中央文革成員。他不知道這樣搞的後果。他自己搞一套。他的女兒王小平給他聯絡。她也是紅衛兵，但她的紅衛兵不是後來造反的那一派。湖北的紅衛兵後來成了一「反動組織」。七·二零抓我時車上也有紅衛兵。王任重還組織老紅衛兵保護湖北省委。憑良心講湖北省委還是不錯的。王任重住的樓跟文革小組的樓不是一回事。我不是專案組的，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認爲王任重是特務。葉永烈書上說，有一個特務叫任重，江青他們就認爲是王任重。後來王任重關到秦城。江青說她到二樓看王任重時，王正看一個什麼文件，一見江青就把文件翻過來，往別地方一塞。康生他們本來很重視王任重。十一中全會上康生說「王任重雖然是候補中委，也可以破格成爲書記處書記。」後來很快就變了，在北大、清華問題上王任重同聶元梓、蒯大富有衝突。他用他的女兒王小平。王任重先被打倒，陶鑄後倒。

王任重同劉志堅是老關係，是冀南的，王任重是區黨委宣傳部長，劉志堅是軍區政治部主任。劉志堅的夫人是王任重介紹的，他們是老朋友。劉志堅夫婦倆也搬到二號樓。劉志堅地位高于王任重，王任重水平高于劉志堅。這個樓以王任重爲中心。劉志堅是文革小組副組

長，但沒起多大作用。劉志堅同王任重被搞到一起，是因為歷史上有兩條。我不是專案組，我不太清楚，聽說劉志堅被日本人俘虜過，營救他的人當中有王任重。王任重被懷疑為特務，劉志堅當然也受到懷疑。再一條是鄧小平說過，劉志堅不可重用，他擁護張國燾，這倒沒有什麼，但是他太過分了，在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裏他寫的那些東西，組織的漫畫，罵毛主席罵得太不象話了。劉志堅是林彪重用的，唐平鑄、胡痴都是劉志堅用的人。中央領導核心沒怎麼找劉志堅。十月一日晚上毛主席見群衆時沒有王任重，也沒有劉志堅。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劉志堅被打倒。在江青他們心目中劉志堅早就倒了，但林彪不知道，打倒劉志堅他不願意。在人大會堂宣布打倒劉志堅時，葉群給林彪打電話，說：「江青堅決打倒劉志堅是為了保老帥，保陳毅、葉劍英。他們在工人體育場講話，造反派攻他們。為了保老帥就拋出劉志堅。」電話打了半個鐘頭，林彪勉強同意。劉志堅是中央軍委文革組長，這時說都是他沒搞好。軍委文革組長換成徐向前。

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就是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常委剩下六個，其他人，實際上不參加領導核心。後來比較多的吸收葉劍英、肖華、楊成武、謝富治、葉群，後來又有汪東興。毛主席周圍經常見面、開會、來往的就是這些人。經常在毛主席那裏開會的是毛主席、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重大決策就是這個範圍，也不知叫個什麼會，有時多一個人，有時少一個人。二

月以後增加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謝富治、楊成武、葉群、汪東興、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和姚文元回北京時也參加。

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的變化：十一中全會後正式建立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毛主席叫王力兼，副主任有穆欣、曹軼歐。首先江青不要曹軼歐，直接原因是曹軼歐同聶元梓有矛盾。曹軼歐和康生不喜歡聶元梓，意見很大。認為第一張大字報不是聶元梓寫的，是楊克明寫的，曹軼歐這時正在北大，知道這事；楊克明寫好後叫聶元梓簽名，聶元梓最初拒絕不敢簽，經說服後才簽的。因為她是北大哲學系總支書記，才簽在第一名。把聶元梓抬得那麼高，曹軼歐不同意。所以後來列席十一中全會時，北大是兩個人，聶元梓和楊克明都列席。後來還是都捧聶元梓，沒有楊克明。康生也不同意把聶元梓捧得那麼高。現在有人說是康生授意曹軼歐組織聶元梓寫的大字報，這跟我了解的不一樣。曹軼歐到北大不是文革小組派的，是康生的理論小組派的。衝突的結果是江青支持聶元梓。江青跟我說不要曹軼歐當辦公室主任，要我去找講，說這是毛主席的意見，因為聶元梓同曹軼歐有矛盾，聶元梓旗子已豎起來了，同聶元梓對立的人不適合在中央文革工作。江青還讓我不不要說是毛主席說的，也不要說是江青的意見，要作爲我自己的意見去說。她並說這是毛主席的意見叫這樣說的。我祇好去跟康生說：「請你考慮，曹大姐歲數大了，身體又不好，文革小組辦公室搞些事務性的事情，曹大姐不要做這些具體工作了，她當副主任，排到我們下頭，也不好看。以後她要什麼材料我們馬上

給她，有什麼事我們不清楚去向她請教就是了。」康生馬上變了臉，說：「怎麼回事，曹軼歐不能幹了？」我說：「不必幹了吧！」康生指桑罵槐，罵穆欣忘恩負義，往高杆上爬，祇認識江青，不認識我康生了。過不幾天，他知道是毛主席、江青的意見，也就沒事了。他說曹軼歐身體不好，不幹了。以後曹軼歐一直還是活躍的。鄧穎超還是靠曹軼歐。她們是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曹軼歐對毛主席是崇拜的，在十一中全會上她發言說，不要叫毛澤東思想，要叫毛澤東主義。

中央文革的辦事機構中曹軼歐去掉了，穆欣不行了，後來我也不行了，因為在農村問題上我同江青吵了一架，後來也沒有向她賠不是。不過我還是跟肖力合作搞出了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工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我也參加了。毛主席和我接觸的時間還不那麼短，江青想整個不要我還不行。後來江青同我的矛盾尖銳化以後，整我的時候，她說：「王力眼裏沒有我江青，我不找他他從來不找我。」其實不能說我眼裏沒有她，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說她沒有一點水平，她總是跟毛主席學了些東西，不能象現在說相聲說得那樣差。當然我也不是那麼佩服她，她沒有系統地讀過馬列主義的書；文字方面，文學修養很差；古詩詞她不懂格律。她要我批鄧我沒有接受，她當然就不滿意。不過因為批鄧本來不是毛主席的旨意，所以她不能告我的狀。她給我們下指示時，我總是問：「是毛主席的指示，還是你的意見？」如果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立即執行，如果有意見我向毛主席當面提。如果是她的意見？

見，我就說主席不是怎麼怎麼說過嗎？跟你說的不一樣。我可以直接見毛主席，這點她也討厭。我當辦公室主任時，發常委的文件我都是發全體常委，包括劉、鄧。我說：「今天他們還是常委，我就發，明天不是常委了，或者毛主席說不發了，公開批判了，我就不發。」這點江青也不高興。有幾次鄧小平參加會議，主席身邊的沙發別人要坐，我就說：「這是小平同志坐的。」這是因為鄧耳朵聾，坐遠了聽不見。批鄧後，我不是用自己的話而是用主席的話提醒主席。一直到七二零以前，七月十六日主席和我單獨談話時，我還說：「主席說過多次，劉、鄧要分開，主席的大字報出了以後還講過劉、鄧要分開。主席還講過多次鄧小平的好話。現在講打倒劉、鄧、陶，我們也得那麼講，這合適嗎？」毛主席對我講了一大篇鄧小平的好話，說：「打倒一年，頂多兩年。人家要打倒嘛，就打倒一下吧！」毛主席說的人家是指江青、林彪、陳伯達。前二人是權力之爭，他們認為鄧小平比劉少奇更危險。陳伯達是出于個人恩怨。一九六六年以來，鄧小平否決了好多次陳伯達起草的稿子，對陳伯達不客氣。在工作組問題上，陳伯達寫了個條子，說：「不要搞工作組。」其實這是毛主席的意見，鄧小平不知道，就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回釣魚臺後坐在地毯上哭。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對我說：「鄧小平文可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與林彪、彭德懷相比，一個人指揮兩個野戰軍的祇有鄧小平。林彪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毛主席還想用鄧小平。這時他對林彪已有很大意見，他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林彪身體不好了再

用鄧小平。毛主席還說：「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離不開總理。總理不能當第一把手，可是誰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他。」毛主席說：「下次再開代表大會，我看鄧小平還是常委，少奇也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各省市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絕大多數應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後來，我看到九大的公報，大吃一驚，同毛主席說的完全不一樣。我對鄧的態度是一貫的。他的確有毛病，但他可以跟毛主席合作，從第二次國內戰爭起，他一直擁護毛主席。毛主席同蘇聯鬥爭緊張的時候就要找鄧小平，要同蘇聯合作就一定找周恩來。鄧小平同毛主席是能合作的。毛主席還講，「鄧的毛病是性子太急，決心下得太快，可是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我覺得毛主席對鄧的批評是中肯的。毛主席還說鄧小平懶，不調查研究、不深入群衆。歷史證明，三中全會鄧小平把局面扭轉還是對的。在毛主席的話提醒過鄧小平。後來毛主席讓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別人很詫異，我覺得可以理解。鄧沒有丟掉毛主席的旗幟。鄧沒有說自己一貫正確，他總是說所有的錯誤都有他自己一份。毛主席看人，大的地方是看得對的。對劉少奇沒有看錯。對林彪是否看錯了，讓歷史去做結論。林彪後來怎麼跑了，我不知道。

我對林彪接觸不多。毛主席選林彪做接班人開頭也不是瞎了眼。林彪不是不讀書的人，他還做卡片。他注重調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說話，說話都是有份量

的，他認為對的，還是堅持到底的。當時他的威信還是很高的，總理對林彪還是很尊重的。林彪對毛主席有戒心，毛主席對他很有意見，我也看出來了。林彪不是全心全意地做事情，祇是表面上每句話不離毛主席。他說：「喊毛主席萬壽無疆可以，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不能喊。」他起草了個通知，文革小組不同意，毛主席也說不能發，他不聽，一定要發。我對葉群說，「最高指示怎麼不執行？」她說這是林彪職權範圍內的事，不要請示主席。毛主席看人，選鄧小平沒有錯，後來批鄧不知怎麼回事，我不知道。他認為鄧小平可以繼承他的事業，這點沒看錯。鄧小平說：王力在主席面前說我的好話，我也要說王力的好話。我說鄧的好話沒有錯，爲此江青很生氣。

江青同我發生矛盾後，就不要辦公室了，成立辦事組，組長是宋瓊。宋是解放軍報編輯主任。現在宋瓊寫了很多文章，罵所謂的壞人，其實當時文革小組開會他都不能列席，他根本不了解什麼情況，中央領導核心的情況他更不了解。他作了沒幾天，又成了胡痴集團，被抓了。辦公室改成辦事組，江青直接操縱。後來她吃不消，宋瓊又被抓了，她也不抓辦事組了，辦事組有事要問，她還是讓問王力、戚本禹。關鋒不和我們住一個樓。宋瓊還是老老實實的幹部，有一定文字能力，還是正派的，不能因爲他罵我就說他怎麼壞。罵王力這是時髦，我的辦公室主任也沒說撤，但辦公室不要了，主任自然也就沒有了。因爲主席還在用我，所以我這次還沒打倒。我安度了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還被毛主席重用了，代替陶鑄

了，這是同江青的意願相違背的。

(六) 中央專案組的形式禍害無窮

中央還有一個重要的機構叫專案組。現在的歷史學家不知道，專案組同文革小組不是一回事，是兩個機構。雖然兩個機構的成員大多是一批人，但他們是兩個不同機構。負責整人的機構是專案組，不是中央文革小組。專案組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屬中央常委，也就是對毛主席直接負責。專案組機構的成立開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成立一個處理彭、陸、楊這幾個人的機構，羅瑞卿除外，他由軍委處理。另外加一個田家英。當時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據毛主席指示，由劉少奇主持，成立一個組，分別同四個人談話，處理他們的問題。這個組少奇同志決定由周總理總負責。下面分四個分組。我被分到第四分組，組長是安子文，其它三個分組我記不清楚，一個是彭真的組，由周總理親自負責，一個組是康生負責，一個組是陳伯達負責。第四組安子文是組長，成員有王力、戚本禹，在周總理統一部署下工作，跟田家英談話。那一天安子文打電話通知王力、戚本禹到他家，坐他的車，一起到中南海田家英家（辦公宿舍在一起）。安子文同田家英談，我一言未發。據我記憶，戚本禹也沒說什麼，除一些技術性的文件交待以外，沒說什麼。安子文談話是根據總理的統一部署，少奇同志的指示，少奇同志又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安子文是老組織工作者，他同幹部談話是很有經驗的。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書，他們平常也有來

往，所以談話不是氣勢洶洶、張牙舞爪。我們一去，田家英起初感到有些突然，安子文先說了些閑話，田的情緒穩定一下了，然後進入正題。安子文的態度是很和藹的，稱呼他「家英」，說：「中央對你問題的看法，覺得你在現在的崗位上工作已經不適宜了（沒有用『撤職』的說法）。因為你這崗位是很重要的。（田是秘書室主任，直接對毛主席負責，毛主席的信件都經過秘書室。）」安子文說：「中央認為你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適宜擔任現在的工作了，暫時由戚本禹負責。中央要你馬上把有關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編進毛選的原稿、印的東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來。」這當然實際是撤職，這是毛主席決定的，少奇、總理都不能決定。現在的謠言公司說，因為王力、戚本禹談話，把田家英談死了。其實連中紀委都從來沒有說田家英的死同王力有什麼關係。但是四川文摘周報摘錄的一篇文章說是王力、戚本禹談話把田家英談死了。人命關天，罪狀不小，我給文摘周報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過去人家罵我，我都没有辯解，祇給中央寫信說明情況，可是這次是登了報，牽涉到人命問題，我不能不管。我給文摘周報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說明我當時一言未發。文摘周報把我的信摘要發表了，這就觸怒了好多人，他們說王力怎麼能說話？董邊（田家英的愛人）的女兒女婿後來對我說，幾十人去找董邊，說如果按王力的說法，田家英就不是迫害致死了。董邊又寫了信給四川文摘周報，這個報給她全文刊登了，而且加了按語，題目是《王力不應回避歷史事實》。董邊的信的頭和尾都罵了王力，但當中敘述的事實也沒有說王力說過一句話。

祇是談話的日子比我早了一天，那不重要。她也說是安子文談的，但她又說安子文是好人，平反後還關心田家英和董邊，等等。這封信別人看後也說，這不是證明了王力一句話沒講嗎？還有，她說安子文叫田家英立即搬出中南海，我說不是安子文講的，搬出中南海是統一布置的，主持這事的是汪東興。這也不是汪東興個人的責任，他是辦公廳主任，九局局長，他根據中央決定，要一批人搬出中南海，有陸定一、田家英、王稼祥、胡喬木、張際春、張子意、李卓然，都搬出中南海。安子文是沒有說讓田家英搬出中南海。董邊的信發表後我又給董邊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我了解的情況董邊不一定了解。我覺得田家英這個人是不錯的，我同他私交也很好。田家英交文件時把逢先知叫來幫助清理文件。逢並沒有參加安子文同田家英全部談話。發表董邊的信時，逢先知寫了幾句話，增加董邊信的份量，因為他現在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他證明董邊信上所說的是對的，但沒有具體說當時情況。我把關於這事的全部材料寄給黨中央，同時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在這之後，董邊的女兒、女婿來看我，問我田家英的一些情況，他們一定要問是誰讓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我說不必問了。他們說是不是汪東興？我說是的，不過也不是他個人的責任。他們說汪東興是不好，四人幫倒臺後董邊要求讓一戶子女回北京，汪東興批了：「田家英的子女不能回北京。」田家英之死我很難過，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很談得來，有些觀點也一致，還有共同愛好，都愛好文物。他收集清代學者書法，是全國第一位的，我送他一個孔尚任的字帖，現在還在他家。現在人們

說我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派去的，他們忘記了。那時還沒有中央文革小組。我參加田家英這個組不是以文革小組身份，因為我是中央的秀才，中央叫我參加的。我的職務是中聯部副部長。當時我同戚本禹也不熟，祇知他是中辦秘書科的科長，知道他是「八司馬」之一，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毛主席指示田家英給他平反，在戚本禹心目中田家英是他的恩人。田家英給戚本禹恢復黨籍、恢復工作，而且調到中央辦公廳重要部門工作。另外，田家英搞三自一包的試點，戚本禹也是這個點的成員。戚本禹寫了些文章以後調到紅旗雜志作歷史組組長，升了官，相當司局級。這時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秘書室工作，也是升了官。田家英的死戚本禹並不好受。他也不是那麼無情無義，他一直認爲田家英是他的恩人。奇怪的是逢先知這本書《毛主席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正文還沒講王力的壞話，但作爲附錄的胡喬木的大文還是說戚本禹、王力談話把田家英談死了，沒提安子文。另外，這書裏的田家英小傳還是說王力、戚本禹談話後田家英自殺了。這本書影響不小，但真正動腦筋的人讀後印象不佳。

中央成立的這個找四個人談話的委員會，本來是個臨時性的組織，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政治局常委領導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下面分四個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個組，專案委員會的主任是鄧小平。康生、陳伯達都在這個組。關鋒、戚本禹一直參加這工作，江青還在外地沒有回來。直到十一中全會以後開批劉的生活會，後變成批鄧爲主，鄧小平不能工作了，後來康生管專案，江青也要抓這件事。不久，江青正式宣布說有兩件事主

席要自己抓，她說她要代表主席來抓。一是人民來信，一是專案組。她正式宣布文革小組成員除王力一人外都參加專案組。她不要我，表面上是說王力太忙所以不參加，實際上是對我不信任。文革小組參加專案組的人是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除上述以外，江青還要增加幾個人：謝富治、汪東興、楊成武、葉群。她說，康老有延安整風的經驗，要康生當組長，康生還要對江青負責。江青說戚本禹當她的秘書。戚本禹每天早晚都要到江青那裏去匯報。專案組每次會都要請總理參加，總理每次都到。專案組沒有我，揪人、整人、關人都沒有我的事，我連知道都不知道。戚本禹幹了些什麼我不清楚。我從秦城出來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來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說，判戚本禹判不下，有些事情難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懷，戚本禹說他是執行決定，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做的決定。我說，中央開會我都參加的，這個會我沒參加，大概不是中央的會，是專案組的會。他們說問過汪東興、楊成武，是不是中央決定，他們說是的。再一條是把彭德懷交給群衆批判，結果成了批鬥，把彭德懷肋骨打斷。戚本禹說這也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他執行的。他們也問了汪東興、楊成武，說確是中央開會決定的。我判斷是專案組的會。專案組的會也是總理主持的。專案組就是辦這種事的。揪人、批鬥、關人都是專案組管的。

專案組這種組織形式禍害無窮。本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專案組這種形式永遠廢止，這一點我很擁護。但是後來沒有實現，還是繼續和發展專案組的弊端。專案組有無限權力，沒

有人監督它。我向中央建議過，黨內也應該象公、檢、法一樣，應該互相約束、互相監督、互相牽制。現在沒有。專案組可任意整人，把黨內問題同關人的權力結合在一起，判多少年都是它決定，這是非常壞的一種形式。專案組應該永遠被埋葬，它後患無窮。它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個人決斷。有了它我們國家就不能成為民主法制的國家。中紀委弄得不好也就是擴大的專案組，它可以說：「你不老實，我就把你再關起來。」扣工資它也可以定。黨內最高處分是開除黨籍，要按黨章的手續程序，可是專案組不按程序就可以辦，可以要關就關，要給多少工資就給多少工資。這是那一門權力？聽說公安部門不同意把王力列入兩案，中紀委有關的人拍了桌子才列入兩案的。一九八零年七月十四日來了個正式逮捕令。按道理，這時才能停發工資，在此之前沒有宣布逮捕，叫請假檢討，工資照發，存在中聯部。一九八八年我寫信給伍修權，要求把已發的現在存在中聯部的工資補還給我。我也不是真要這錢，是想看看政策怎麼樣。伍修權批了「我管不了，請中聯部酌辦。」中聯部請示中紀委兩案辦公室，他們批了，「王力問題不屬於冤假錯案，不補發工資。」其實即使不是冤假錯案，以前領的工資也應該給，這不叫補發。他們這樣無知，無法無天，黨政不分，權力極大，他們的話就是法律。我多次申訴從來不理，連收條都不給一個。三中全會永遠廢除專案組的決定是一紙空文，不但沒有廢除，還繼續發展了專案組的弊病，祇是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我不贊成管黨的紀律和管國家法律的是一個人，這做法不好。一個人既管黨的檢查部門，又管政法部

門，管公檢法，這就成了比文革時期專案組權力更集中的人了。這樣不行。任何一個人處于這種地位都是不行的。這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教訓之一。

權力應互相牽制、互相約束、互相監督。中組部、中紀委，還有有關部門，應該互相牽制、互相監督。現在的狀況不應再繼續下去了。這歪曲黨的領導，一個人一句話就決定問題。陳雲同志我很尊重，但不能贊成他對王力的話：「告訴王力，他是戴帽子的、是寬大處理的，你要是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我就把你再關起來。」這樣的話是沒原則的，眼裏沒有黨章，沒有刑法、刑事訴訟法。他沒有研究，戴的帽子對不對？免予起訴，白關了十三年，還是寬大處理？這樣的話康生說不出來，江青可能說出來。我那時還沒開除黨籍，誰也沒有講過他個人能要抓就抓，既不按黨章又不按國法，要抓就抓，關了十三年還要再抓。他叫宋任窮找我談，宋任窮叫一個局長來的，我說：「既然你代表陳雲同志找我談，我請你轉告幾條：（一）我可以不可以找鄧小平？（二）我可以不可以找胡耀邦、鄧力群？因為鄧小平、胡耀邦委托鄧力群同我聯繫，要我研究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如何發展了馬列主義的問題。（三）請你告訴陳雲同志，對於我的免予起訴書第一條，說我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其內容是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是關於匡亞明問題的，這篇社論是工作組時期，劉鄧司令部時期的事。江蘇省委江渭清派工作組整匡亞明，毛主席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把劉鄧路線上綱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們為什麼把劉鄧路綫又升一級，變成「反革命」了呢？」

何況這社論不是我起草的，是錢抵千等人起草的。錢抵千現在（一九八一年談話時）還是解放軍報社長。當時我不管人民日報。陳伯達去上海前叫我看這篇社論，我加了幾個字，最後定稿也不是我，是陳伯達。怎麼成了王力的反革命宣傳罪了呢？」這三條至今未答復。因為我提了意見，到一九八四年開除黨籍時這條罪狀沒有了。可是別的一些在秦城已經否定了的罪狀，又羅列出來。陳雲同志這樣高的水平，這樣長的歷史，這樣高的威望，可是他對我講的話我不能認為是馬列主義的，不能認為這段話有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味道。我當然不是說陳雲同志本人，陳雲同志本人當然是有水平的馬列主義者，可是這段話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沒有，而且是違法的。違背憲法、刑事訴訟法，同時也是違背黨章的。集黨紀、法律于一身，任何人有這樣的權都要犯錯誤。我對專案組這種形式深惡痛絕。幸而我沒參加專案組，在這方面我沒有責任。三中全會決定永遠廢除專案組。

江青要康生向毛主席提議，要成立劉、鄧、陶的專案，毛主席不同意，說劉、鄧、陶還是十一中全會選的常委，專案不好立。散會後江青對康生說，不立也要立，不單獨立，把他們都放到彭案裏一塊整。實際上立了專案，一立了案就很少成爲好人。鄧小平也立了專案。王明路線時鄧小平就被打成反黨集團。這事總理知道，是中央要鄧小平從廣西回中央，可是專案組硬說他離開廣西是逃跑動搖，也立了案整他的歷史。莫文驛是鄧小平的老部下，他寫信揭露鄧，說鄧是逃跑。他們還組織張雲逸寫信，證明鄧小平逃跑。張雲逸是很老實的人，

德高望重，品質很好，可是他在那種氣氛下也寫了信。每次大的路綫鬥爭他都是跟着跑。饒漱石整陳毅，他也站在饒漱石那邊。（山東整黎玉，也是饒漱石整的；那時陳毅在孟良崮前線，我跟劉格平到渤海檢查工作回來，參加了饒漱石整黎玉的會，我就不服，我們向陳毅匯報，陳毅也不以爲然。在國民黨重點進攻的緊張情況下，還要整黎玉。）張雲逸不是很積極的，是跟着走的，可是他這封信份量大，加重了打倒鄧小平的砝碼。張雲逸死時悼詞還是鄧小平作的，說張雲逸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

中央專案組做具體工作實際辦事的有兩個人，一是謝富治，一是汪東興。到我打倒以前，康生、江青覺得專案組骨幹力量不够，要加強擴充專案組機構，調一些能實際主持工作的幹部。她向林彪提出這問題，林彪主持常委擴大會，參加者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葉群。這幾個人決定黨和國家重大問題。那時毛主席在上海。這會上江青、康生提出專案組要加強，祇有從部隊調人。林彪說：「部隊現在看起來，軍區以上司令員、政治委員，從南數到北，從東數到西，沒有一個能站得住的，要調人祇能從軍這一級調，請康老調檔，從軍政委中挑最强的來作專案組工作。」後來康生同部隊商量，初步決定調李德生，能力最强，行政九級。還有郭玉峰。這些人還沒調來，我就打倒了。

（七）各省市的變化和毛主席的部署

中央領導機構一九六六年底的情況談過了，現在談談一九六六年底全國的情況及毛主席對全國情況的看法和他的一些部署。

現在的歷史學家們說：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要以北京、上海、天津、東北為重點。這話我不記得。毛主席是把上海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海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地，他密切注視上海情況。最初他對上海比較放心。再就是北京，是首都，關係到全局，黨中央國務院都在北京，他一定要把北京問題解決好。這兩個地方是他考慮的重點，至于天津，不是重點。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天津還不是直轄市。到十月中旬工作會議才提出天津成為直轄市的問題，在此問題上起作用的是陳伯達。他對天津有特殊感情，地下黨時期他長期在天津，他出去休息或寫文章都是到天津。最早提出天津成為直轄市的是陳伯達。他還想兼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四清蹲點時他也去天津小站。說毛主席把天津作為全國的重點，不是的。天津不影響全局。有人說東北是重點，我也不知道。毛主席是掌握全局的，他經常考慮全局的問題，特別是到要開展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期間，他在思考全面的部署。他是按大區來考慮的，雖然他不贊成大區，但歷史已形成了。他還是考慮幾個大區的形勢，并不特別重視東北。

西南：十二月西南問題突出，有人不斷反映，西南是鄧小平的老地方，西南局等於鄧小平的局，他過去是西南局第一書記。十二月鄧小平實際上被打倒，西南問題就突出了，要集

中把李井泉在西南地區的頑固堡壘突破，這是毛主席的想法。西南不大容易搞得徹底，舊的機構、舊的秩序、舊的紀律還在束縛着。他們說，產業軍、最早的紅衛兵都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直接掌握的，因此，要攻西南頑固堡壘。直到我打倒以前，他還是重視要把西南問題解決。最早派我和謝富治到各地就地解決問題，首先也是派到西南，後來半路才到武漢。毛主席對整個西南局勢認為很嚴重，要突破。另外，四川李井泉、廖志高，毛主席認為他們堅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要徹底批判，搬掉這個石頭。但對他們本人，毛主席並沒有認為李井泉那麼壞，廖志高更無所謂。林彪認為李井泉很壞。在西南各省中四川是重點。

雲南，閻紅彥在毛主席看來還是不錯的。因為閻紅彥在陝北同高崗是兩個山頭，他揭露高崗的問題，毛主席認為閻紅彥還不錯。揭露李建彤那本小說，也是閻紅彥寫信給中央，說這小說是給高崗翻案。「利用小說形式反黨是一大發明」，這話是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自己講的。現在有人說是康生寫的條子，毛主席念的，這不符合事實，當時我在座。這話對不對是另一回事，但確是毛主席講的。他不是為了整高崗，也不是為了解決山頭問題。當然牽涉到山頭問題。這以後把習仲勛撤了職（國務院秘書長）下放到洛陽。毛主席主要是為整文化部。閻紅彥對康生是不錯的，一九六五年我跟鄧小平到三綫，雲南街上賣的法國陳酒，是幾百年以前的，埋藏地下幾十年，盧漢家窖藏的，挖出來了，在街上賣，閻紅彥知道了，全部收歸招待所。我離開雲南時，他托我帶兩瓶給康生。毛主席、康生沒有要整閻紅彥，認

爲還可以。另外有兩個人，一個是周興，一個是趙健民，毛主席都是欣賞的，他們都是書記處書記。

貴州，第一書記周林，毛主席也認爲不錯。人民公社辦食堂就是從他那裏開始的，直到六十條以後才解散。解散食堂是用胡喬木名字給毛主席寫的信，胡喬木是我們調查組的組長。毛主席派了三個調查組，胡喬木在湖南，田家英在浙江，陳伯達在廣東。我在胡喬木這個組，許立群、鄧力群在陳伯達那個組。田家英那個組比較小。我們這組還有于光遠、胡績偉、張超、中辦的王愈明。毛主席祇找胡喬木和我到廣東制定六十條。陳伯達那組找的是陳伯達、鄧力群、許立群，浙江組祇找田家英。六十條初稿對食堂問題稍有些鬆動。我們認爲食堂不能辦，胡喬木給毛主席的信是我寫的。發起解散食堂在韶山，從一個小組開始。文摘報說張超是全國第一個解決食堂問題的，不符合事實。他在組裏不是負責的。是胡喬木在火車上跟毛主席談的，毛主席同意的。還有的文章說食堂要解散是田家英提出的，我不知道。田家英也有此意見，但據我所知胡喬木寫的信，胡喬木和毛主席當面談的。第一個解散食堂是我和王愈明辦的。

毛主席並沒認爲周林不行，毛主席認爲周林還不錯，但貴州出了個特殊情況，省軍區政委李再含，最早系統地向中央報告貴州的文化大革命情況，他個人署名，用正式電報發給中央，報告貴州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包括：群衆運動，紅衛兵情況，揭露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

動路線的情況，省委搞不下去的情況。他經常發較長的電報，對毛主席有很大啓發，認為貴州有李再含就行了，這也是毛主席考慮部隊支左的一個現實來源。貴州省委書記中還有個人叫李立，過去是湖南省的書記。

西藏，毛主席看來沒問題，有張國華。張國華是大功臣，進軍西藏、平叛、中印邊境打仗的功臣。張國華是二野的，但他也是林彪過去的老部下。

四川，當時，整個西南的問題主要是四川的問題。比較早的時候毛主席要我多看看西南的材料。當時各個地區、省委，不是中央文革領導，各個省委還是向中央匯報，分工主管各省的還是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的幾個人，在總理領導下分工處理各省的問題。毛主席要我看西南材料，是因為在鄧小平問題上我和江青、林彪意見不一致，我沒有很早就積極響應他們揭露鄧小平，說西南是頑固堡壘。尹聚平把劉結挺、張西挺的材料交給我以後，我並沒有作爲大問題馬上報告毛主席。光是江青的話我不能相信。到十二月底，鄧小平的問題毛主席明確說了，我才把這個材料實際作爲鄧小平的問題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寫信給江青轉報中央。因爲江青說毛主席要抓鄧小平的問題。信裏提出劉結挺、張西挺問題是突破李井泉在西南的頑固堡壘的重要關鍵，其實這也不是我的話。不管劉結挺、張西挺這兩個人怎麼樣，我當時認爲、現在仍然認爲李井泉、廖志高的作法是不對的。劉結挺是地委書記，張西挺是宜賓市委書記，劉結挺、張西挺的錯誤是在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運動中搞擴大化，但反過來對他們的處

理也是不對的。李井泉把他們關起來。劉結挺、張西挺也是執行中央的指示，執行中有擴大化可以批評，不應關起來。這還牽涉到宜賓地區的宗派鬥爭。把他們開除黨籍，劉結挺、張西挺一直申訴，沒得到任何反應。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起來造反，又提出他們的問題，當時支持他們的有宜賓地委副書記兼監委書記，他認為過去對劉結挺、張西挺的處理是不對的。以前有個人叫丁一，講了彭德懷的好話，劉結挺當權時，把丁一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關起來，這是不對的，反過來把劉結挺關起來，也不對。當時的地委副書記兼監委書記認為這案應該平反。他們到中央上訪，反映李井泉和四川省的問題，省委運用專政工具來對待他們，要公安部門來捉拿他們。我給江青轉中央的信沒提我的看法，祇說明情況，提出這是李井泉問題的突破口，因為彭德懷問題是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焦點。北航紅旗的小報登了省委把劉結挺、張西挺關起來以後劉結挺寫的日記，他堅持他自己的觀點，很鮮明地反對彭德懷。他堅持不改變立場，堅持反修、防修，防止中國改變顏色。北航紅旗的小報得到毛主席的欣賞，欣賞劉結挺這個人。我十二月三十一日寫信給江青轉中央，提出劉結挺、張西挺問題作為突破西南頑固堡壘的突破口（「頑固堡壘」不是我發明的），我建議考慮重新處理，建議中央成立調查組，把情況弄清楚，然後再處理。現在說王力一手給劉結挺、張西挺翻案，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在四川做了大量的壞事，把四川搞亂了，這成了我的罪狀。我這天還寫了一封信，因為毛主席問江青，劉張問題當時是不是鄧小平他們批的？江青叫我去查，我調了檔

案，是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楊尚昆批的，我故意把李富春漏掉，我給江青復信，說是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等批的，沒提李富春，恐怕再給李富春惹麻煩。

在秦城時把我列入兩案，審批四人幫時也對我進行預審。公安部一位預審的同志公開對我說（旁邊還有別的預審的人）：「我就不相信王力能給劉結挺、張西挺一手翻案。我要查檔案。」第二天他說：「查了檔案，沒有你的事，你的信是周恩來批的『同意王力同志意見』。而且你的意見也沒有錯，不過說成立個調查組，并沒說一定要給他們翻案，這是很適當的，怎麼能說你一手給他們翻案？四川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時，劉、張上臺，你已經關起來了，怎麼去支持他們做壞事？」這樣，他就給否定了。王力打倒後兩年，劉結挺當選為中央委員，張西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後來他們被部隊的人打倒，去勞動。林彪出事後，毛主席又請劉結挺、張西挺到北京，他沒來得及穿鞋，光着腳來的。那時王力已關了，怎麼能說王力支持他們作了大量壞事？這問題已經否定了，一九八四年中紀委又把這列上了，有一點實事求是嗎？閉着眼睛就定罪，這是笑林廣記。不核對事實就開除我黨籍，中央書記處批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我寫給江青轉中央的兩封信時，劉結挺、張西挺還在北京到處流竄，怕逮捕。他們以後上臺作壞事與我無關。

中南，毛主席也很關心。除上海外，他喜歡住武漢。湖南是他的家鄉。廣州他也比較欣賞。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認為中南問題相當嚴重。因為主要是陶鑄管中南，這時陶鑄問題

在黨內核心中已經公開，群衆中還沒有宣布。從發動文化大革命開始，經過十一中全會，又經過十月工作會議這幾個大的階段，中南一直是陶鑄指揮，中南來請示也是陶鑄和王任重解決。王任重出問題比陶鑄早，王任重早就回去了，毛主席認為王任重是不行了，但對這個人毛主席心裏沒有抹掉。後來康生、江青無中生有說他是特務，就沒法了。陶鑄被說成是叛徒，也沒法了。一九六六年底陶鑄、王任重還是屬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沒說他們就是走資派或特別壞。中南是在他們指揮下搞的，因此毛主席看來中南局面相當嚴重，特別是武漢抓人太多，打反革命太多，誰保省委就是好，誰反對省委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王任重回去時沒有思想準備，認為局面可以維持，可是一回去就不行了。特別是陶鑄問題爆發，王任重就頂不住了，戴了高帽子游街，香港報上登了。我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叫我起草個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絕對禁止登報，不應該這樣作。把王任重圍鬥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對他殘酷鬥爭不對。王任重確是比較優秀，能動腦子，愛讀書，會寫文章。毛主席對人都是兩面的，不執行他的路線他不能容忍，特別是在重要崗位上不能容忍，另方面他對人還是比較寬的，我快打倒時王任重給我寫了個條子，我交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嘆口氣說：「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毛主席看來，王任重並沒有被抹掉，祇要改正錯誤站到他的路線上來還是可以用的。後來王任重關到秦城，很晚才放出來。

廣東，毛主席對趙紫陽有好感，在文化大革命前趙紫陽有實際工作實驗，又有一定理

論、概括能力，毛病不大。廣東問題出在陶鑄，陶鑄主管廣東，他執行了劉鄧路線，這樣趙紫陽就被動了。毛主席看來，趙紫陽還是能够掌握廣東局面的。到我打倒前，黃永勝管廣東，他也講趙紫陽的好話，說趙毛病不大，祇是男女關係問題。趙紫陽在四人幫垮臺前沒徹底打倒，也沒有重用，四人幫倒臺後還當第一書記。廣東工作不錯，大躍進沒死多少人，農村一直比較好，平穩。他鄰近的湖南就一塌糊塗。

湖南，毛主席認為張平化不錯。文革一開始，張平化讓陶鑄調到中央來了，管中宣部。湖南比較亂，第一書記王元春，是王任重在湖北的助手。毛主席談王元春不多，說張平化不錯，說過幾次。湖南局面亂的時候張平化自報奮勇回湖南，可是就沒有再起來。湖南搞得不好主要是王元春搞的。王元春後來把省委搬到韶山，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用農民對付造反的工人學生。省委的人都跑了，華國鋒沒有跑，群衆就結合了他。毛主席說華國鋒覺悟高，對文化大革命有認識，站到群衆方面，華國鋒說我不是認識好，我是沒跑得了。毛主席認為他老實。

湖北，王任重不兼湖北後，張體學負責。毛主席一直說張體學可以，有工作能力，有頭腦。湖南省問題嚴重，是陶鑄、王任重搞的，張體學還可以。張體學沒有倒，他作風較好，群衆關係較好。

廣西，毛主席談的少。原來的書記是陳漫遠，調到農墾部後被打倒。王震是部長，管農

口，他是造反派，反譚震林、農墾部幾個部長都打倒了。毛主席說陳漫遠不錯，陳漫遠調走後是喬曉光，毛主席沒怎麼談過他。毛主席問過我喬曉光怎麼樣？我說不錯，喬曉光給我寫過信，後來喬曉光沒站住。後來是韋國清。

河南，毛主席認為劉建勛不錯，劉建勛是陶鑄把他調到中央的。他在中央的情況同王任重、張平化不一樣，他在中央沒倒。他先是華北局書記，李雪峰不行了，劉建勛當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是北京第二書記，在毛主席心目中劉建勛比吳德強，他不怕群衆，同群衆可以談得來。舊的省委第一書記能站得住的不多。劉建勛是數一數二的。毛主席去世，否定文化大革命，他才打倒的。他給李先念寫信要了房子，臨死前要求中央給他作個結論，習仲勛代表書記處到醫院對他說，第一不作結論，第二不開追悼會，第三不發訃告，第四不舉行遺體告別。對臨死的人來了四個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劉建勛還在北京沒有回去。在河南，劉建勛不是打倒對象。後來劉建勛要求回河南，毛主席認為他能掌握河南局面。果然就掌握到底。毛主席去世後，否定文化大革命後他才被打倒的。

東北，十一中全會補選的政治局委員有宋任窮（他是東北局第一書記）。毛主席認為宋任窮可以。文化大革命開始，他支持造反派，中央局書記支持造反派的，宋任窮是一個。他去黑龍江發表講演。後來，支左以後，陳錫聯把宋任窮打下去。宋任窮日子過不去，跑到北京來。宋任窮支持一派，陳錫聯支持一派。一九六六年底還沒有支左，他還沒被打倒。

遼寧，歐陽欽一下子就站不住了。毛主席對他 also 沒有特別壞感。毛主席重視遼寧，因為遼寧是重工業基地。當時認為東北局面還是可以控制的。

吉林，書記是吳德，他調中央後，主持工作的是趙林，很早被包圍，十二月底中央還是叫他們不要揪趙林，有材料報告中央。但趙林還是站不住了。吳德到了北京主持工作，有人要把他揪回去，那辦不到。

黑龍江，情況特殊。文化大革命前夕派了潘復生去當第一書記。潘復生過去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後來分配工作，作過全國合作總社主任，又派到黑龍江當第一書記。黑龍江過去的問題與他無關，不產生清算他的問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沒沾邊，他是超脫的。毛主席看來，潘復生可以控制黑龍江的局面。最早成立新的政權組織，黑龍江與上海同時。上海叫人民公社，黑龍江也叫人民公社。現在歷史學家把這一筆抹掉了，說公社都是上海張春橋、姚文元想出來的，說毛主席嚴厲批評了張春橋、姚文元。有些話確實是毛主席說的，下面再說，這裏祇是說人民公社這個詞不是張春橋、姚文元靈機一動發明的。北京開始時毛主席也是考慮籌備成立人民公社。通知上海和黑龍江採取人民公社形式，兩個電話都是我打的。毛主席指示要用公社形式。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認為潘復生能控制局面。果然他最後也沒倒。

西北，劉瀾濤不行了，說他是叛徒。西安交大事件西北局處理不恰當，西北局混不下去

了。

陝西，文革前夕胡耀邦是西北局第二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沒待幾天就同劉瀾濤發生矛盾。胡耀邦走了三千里路，帶着青年報的負責人，寫了些文章，提了一系列政策性意見，劉瀾濤不能容忍，向中央建議把胡耀邦調走。中央同意劉瀾濤的意見，把胡耀邦調回北京，在團中央工作，文化大革命胡耀邦首先被打倒。那時工青婦都歸李富春管。宣布胡耀邦撤職是李富春宣布的。現在又有人說是王力去宣布的，這完全是謠言。陝西問題怎麼解決？毛主席寄希望于軍隊。甘肅蘭州部隊政委洗恒漢跟李再含一樣，首先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情況，最早支持文化大革命，對甘肅省委、對汪鋒不滿。洗恒漢在文革中一直是紅人，九大前就是革委會主任。蘭州部隊、西北各省都歸他管。另外，寧夏楊靜仁也站不住了。他開頭反劉鄧路綫很積極，毛主席不一定要打倒他。說楊靜仁好話的人也不多。毛主席對他不大熟，印象不深。

青海，第一書記楊植霖是中央文革成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不大行了，文革小組他也没來過。青海出了個劉賢權，是軍區司令員，一開始就支持造反派。後來，被趙永夫（副司令員）抓起來。副司令員抓了司令員。趙永夫開槍鎮壓群衆，最早匯報到林彪那裏，林彪講「打得好」。後來翻過來了，中央把趙永夫抓了，劉賢權抬起來了，成了了不起的人物，這時又說「打得好」的話是葉劍英講的。林彪打倒後，趙永夫升了官，可是一查檔案，「打得

好」是林彪說的，趙永夫又降了官，現在也不得意。劉賢權作爲省軍區司令員支持造反派是很突出的。後來被重用，成了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江青的文化組要他負責，還有吳德。

新疆，自治區書記是王恩茂。毛主席對王恩茂不錯，他也受到衝擊。中央一直打聽他，在我打倒前一直保他。毛主席沒有要打倒他。

華北，是李雪峰，是毛主席欣賞的幹部，文化大革命前，在反對桃園經驗的問題上特別欣賞他。本來王光美作了報告，劉少奇作了報告，都有書面的，我和陳伯達幫他修改的。桃園經驗是極左的。毛主席本來已經批了，用中央名義發到各地，是肯定的。可是少奇報告江青聽了，她向毛主席告了狀。本來毛主席不準江青過問政治，特別不準過問領導核心的問題。所以江青說她拼着打離婚到毛主席那裏去講，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你還沒死，現在劉少奇就作公開報告來反對你。江青說她當時大哭了一場。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她自己誇耀時說的。毛主席相信了江青的話。少奇同志報告是有缺點，有些話說得不好，比如說「對毛澤東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的方式過時了」，這不對。說要蹲點，象王光美那樣，「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這話就傷人了。少奇同志我和他相處很久，一九四二年在山東就認識，在他領導下工作很久。他有很大的長處，有很高的理論水平，有很純的黨性、原則性，對周圍幹部是寬厚的，對毛主席是尊重的，反對毛主席他沒有。他的缺點是有很大片面性，強調一個問題時不顧其他，爲了引起人們重視，把話說得很絕。總理

就說得很周到，少奇同志就常說過了杠。他說調查的目的是爲了解決問題，這並不錯。必須蹲點，就不對了，還要扎根串聯，就更不對了。這報告，陳伯達同我給他整理的。我們把我們認爲不對的地方都給他去掉了，如「調查會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等話都去掉了。可是江青聽了他的報告，江青告了狀，毛主席相信了。這是江青參與領導核心政治生活最大的一次，是開端。正是這時李雪峰找毛主席，不同意轉發桃園經驗。毛主席立即下令收回。我們整理的少奇同志報告也不送毛主席了。我們不知是江青告狀的結果。當時毛主席就誇李雪峰的意見對。起草修改二十三條，毛主席一定要李雪峰參加。毛主席還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同志。這使我大吃一驚。過去一直說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寫在歷史問題決議上的，這時忽然說是李雪峰。毛主席心目中李雪峰位置很高，補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本來就是中央書記處書記，華北局第一書記。

北京，華北局第一書記沒有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重要。代替彭真當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是李雪峰。本來中央對他寄予很大希望，但李雪峰又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十一中全會前，新市委成立以後，執行的是劉鄧的路線，所以中央工作會議前他就站不住了。會上劉少奇、鄧小平檢討，李雪峰也檢討。他不大容易過關，因爲北京衝擊新市委的力量很大。毛主席希望李雪峰過關，但就是過不了關。毛主席沒有打倒李雪峰的意思。至少在我打倒前毛主席沒這意思。北京工作臨時由吳德管。毛主席認爲吳德還可以。毛主席說：「吳德有德，吳德是

老實人。」這句話言外之意是「有德無才」。北京局面吳德掌握不了。毛主席還是保他的，毛主席認為他可以當第二把手，不能當第一把手，要另外找一個第一把手。當時有人提這個，有人提那個。有人提高級黨校的李廣文。關鋒同李廣文很熟，我同李廣文也比較熟，解放戰爭時期我當渤海區黨委宣傳部長，李廣文當區黨委副書記。區黨委相當省級，華東局直接領導。解放後他當過山東省委書記（不是第一書記），不斷受批判打擊，後來到高級黨校學習，文化大革命中他參加造反派，擁護毛主席的路線。

北京市由誰負責的問題，當時提了個名單，江青提的李廣文為首。當時江青考慮到北京市很重要，所以要戚本禹參加，人還在中央文革，但參加北京市工作。這方案在文革小組醞釀時，沒有人反對。我同李廣文同志很熟，覺得他不大容易掌握得了這局面，可是我也没反對。名單提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胸有成竹，提出由謝富治負責。因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謝富治提為候補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管政法的副總理。謝富治在毛主席、周總理心目中是很不錯的優秀幹部。他是工農幹部，是陳謝大軍的政委。謝富治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直到年底，每個關鍵問題上都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毛主席每次講謝富治的時候都加一句「謝富治是小平用的人，小平會用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謝富治不怕群衆，可以到群衆中去同群衆談話，解釋問題，該批評的也批評。毛主席心目中認為謝富治可以掌握北京。這樣北京定了謝富治為首組織領導班子。謝富治說他不行，如果一定要他幹，

一定要戚本禹參加，這樣中央文革直接有人管北京。謝富治在籌建領導班子中的表現毛主席比較欣賞，他有大將風度，不着急，很冷靜，做了很多考慮，不忙于挂牌子，搭架子。毛主席很欣賞這種做法。還有劉建勛，謝富治要求他晚一點回河南。

河北，李雪峰，毛主席沒有打倒他的意思。毛主席想等他過關以後，叫他到河北省。後來實現了。林鐵，毛主席認為不行。第二書記劉子厚把他打倒了。林鐵打倒後，河北工作是劉子厚負責。工作會議前後是劉子厚負責，毛主席心目中及講話中，認為劉子厚不錯，可以用。毛主席不是打倒一切，是一個個慎重對待。劉子厚在中央開會回去後檢討通不過，不過還能開起會來，有的地方連會也開不起來了。毛主席總覺得河北省問題劉子厚可以解決，李雪峰過關後可以到河北工作。

山西，毛主席很重視，因為山西是老根據地，八路軍總部在晉冀魯豫，中央大量幹部是晉冀魯豫的，晉冀魯豫以山西為中心。鄧小平暫時成為被打倒的對象，而山西是鄧小平的基地。十二月份薄一波已被打倒，毛主席、總理都說薄一波手伸得長，他們在山西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時已經宣布安子文是反黨分子，安子文同山西的關係很密切。山西省委書記衛恒是安子文同志培養的典型。文化大革命開始，衛恒被認為是堅決鎮壓群衆的。毛主席親自培養的一位有名的人叫解悅，是太原紡織廠工人，她寫的學哲學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欣賞，她在文革中堅決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起來造反，受到山西省委壓制、打擊，很嚴重，所以一

九六六年毛主席就認為衛恒不行。山西毛主席很重視。劉少奇當過北方局第一書記，鄧、彭、羅、楊都在過太行山，薄一波、安子文都在山西待過，所以山西被認為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很早就決定請劉格平到北京來。那時劉格平是山西的副省長。他原來在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被撤銷、貶官後，到黨校學習，後安置在山西作副省長。毛主席對劉格平印象很深，少奇同志也跟他講過劉格平的好話。劉格平是一九二二年的青年團員。劉少奇當順直省委（相當北方局）書記時，彭真當組織部長，劉格平負責津南特委。劉格平長期坐國民黨的監獄，出獄時劉格平沒有簽字，沒有發表反共啓事，他寧可坐滿刑期也沒簽字。他說，一是黨中央的指示我也不可能執行。少奇同志對他是欣賞的，毛主席也是欣賞的，少奇同志同我談過，他說解放後他找了劉格平，少奇同志說：「你不了解形勢，當時需要大批象你們這樣的人投入抗日戰線，發揮很大的作用，你不出來對黨的事業有影響，你自己也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做不了多少工作。」劉格平說：「我不是不了解形勢，我了解形勢，也相信中央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可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看了反共啓事，于心不忍，我不能在上面簽字。既然是中央指示，別人出去我並沒有反對，祇是我不能簽字。如果形勢發展很順利，我想不簽字我也會出來。我也没想到國民黨又把我交給日本人，快到抗戰勝利才坐滿刑期出來。」少奇同志認為劉格平黨性很純，解放後他重用了劉格平。開國大典時劉格平是作為少數民族代表，在開國大典上講話的。因為他在少數民族中資格最老，這麼堅

定，有高貴品質，所以讓他代表少數民族講話。（那時我在渤海區，渤海區出了兩個代表，區黨委書記張曄是全國農民代表，也在開國大典上講話。）少奇同志很尊重劉格平，定級時劉格平定為行政三級，全國很少的。那時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是烏蘭夫，劉格平是副主任。另外，他是人大常委民族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毛主席跟我講劉格平解放後主持民族工作（烏蘭夫到內蒙，劉格平主持），毛主席認為有兩件事劉格平做得對：一是新疆，王震同志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不妥當，搞得很尖銳，毛主席說他要用武裝消滅一個少數民族。毛主席認為劉格平當時反對王震的作法，劉格平是對的，王震不對。第二是處理大小涼山彝族問題，西南局李井泉也過火，也已經和將要動武，劉格平反對他們的作法，毛主席認為劉格平是對的。現在劉格平貶官到山西，毛主席說，山西就讓劉格平搞吧！把劉格平調到北京來，了解一下他的情況，過去處分他究竟是怎麼回事，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起來。他認為劉格平能掌握局面。劉格平到了北京，本來江青要自己代表毛主席找劉格平談，可是江青一直沒談，劉格平在北京飯店等了好久。後來主席要我同關鋒先去看劉格平，問問怎麼回事，要他回山西。康生是否與劉格平談了我不知道。後來說康生和劉格平談話成了劉格平的罪狀，沒說王力和劉格平談話是劉格平的罪狀。劉格平說，康生當時是常委，他代表中央跟我談話，怎麼成了我的罪狀？不過劉格平在山西很快被打倒。他在九大選成中央委員不久，部隊掌權後把他打倒，一直沒起來，這是後話。當時要劉格平回山西，是

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要了解為什麼把他打倒，劉格平說打倒過程很可笑，中組部開了個會，說他這毛病那毛病，有人提出說他出獄時不簽字是錯誤的，安子文馬上制止說，這個不提，祇說他右傾、民族主義。我們向毛主席匯報，說那次打倒不一定是劉格平不對。民族問題我們沒研究。我認為劉格平是讀馬列主義書的人，動腦筋的人，堅持意見的人。那次打倒并不是因為他工作中有什麼問題，而是有人覺得劉格平這人放到中央不合適，劉格平沒有簽字，反而有人說劉格平是叛徒。我們黨內動不動說人是叛徒，一說叛徒就否定一切，這是老毛病，不好。陳伯達廬山會議以後不但成了壞人，又成了叛徒。陳伯達也是草廩子監獄的，沒有在反共啓事上簽字，他是因為淋巴結核快死了，通過了一個同鄉（山西軍閥）關係用錢贖出來，保外就醫的。他沒簽反共啓事，履行一般手續取得釋放的。這些事本來大家都知道，可是葉永烈的書至今還說陳伯達是叛徒。少奇同志沒說劉格平不執行中央指示，他還說劉格平好，了不起。六十一人案的中央文件附件說劉格平是特務，我覺得奇怪。後來撤銷了這附件。還有康生，這人不好，整人太多，傷人太多，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壞作用，歷史會作出評價；但說康生是編了號的國民黨特務，我不同意。鄧力群代表鄧小平、胡耀邦和我談話，我說：「這個文件根據一個特務的口供就說康生是編了號的國民黨特務，這太不嚴肅。」根據我對康生歷史的了解，康生不可能是國民黨特務，我們這樣作叫國民黨笑話。在上海，周恩來、康生負責特科，他們是專門對付國民黨特務和我們的叛徒的，顧順章叛變

後，康生到處找周恩來，在一個理發館找到了，他們決定把顧順章的大小老婆、兩個孩子處死，因為中央負責人的地址顧順章都知道，稍晚一步黨中央就要被破壞，這是不得不採取的措施。黨中央機關保住了。康生向斯大林匯報這事時，斯大林說周恩來、康生是好小伙子。如果康生是特務，黨中央還能在上海存在嗎？我和鄧力群談話時，鄧力群說：「你的意見和鄧小平一致。小平同志說康生不是特務，是品質問題。」我現在插這一段是為了說明我不同意動不動說人是叛徒，是特務，說劉格平是更不對。現在人們也不說了。我們黨內對叛徒是任意性的戴帽子，誰被打倒誰就是叛徒特務。我反對在文化大革命中抓叛徒的作法。

當時山西毛主席要劉格平回去。還有一個條件，山西出了個張日清，是山西軍區第二政委，他支持造反派，受到攻擊。攻擊張日清的理由是說他違背了軍委緊急通知關於「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用這一條攻擊張日清，這也引起毛主席的重視。張日清和李再含不同，李再含祇打電報反映情況，張日清真的去支持左派，部隊已經介入了。到一月份有個支左決定，其背景之一就是張日清支持左派的事。當時山西有三個情況，第一有劉格平；第二有解悅，加上陳永貴、李順達；第三有張日清。有這三個情況，出現這樣的苗頭，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視山西。

內蒙，在毛主席看來烏蘭夫總是要保的，因為有個民族問題。烏蘭夫本人怎麼樣？能不能掌握局面？沒多考慮。毛主席說：還是烏蘭夫吧！沒想到烏蘭夫沒有起來，內蒙搞得狠

亂。毛主席談內蒙的事不多。

天津，最早還不是直轄市。萬曉唐自殺了，臨時負責的人是胡佩衡。陳伯達認為他還可以。天津問題是要派人當第一把手的問題。後來派了解學恭，是華北局書記，他一直沒倒，四人幫以後才倒的。那時還考慮他是不是屬於兩個集團，判不判刑的問題。陳伯達對天津有特殊感情，小站經驗是四清中的重要經驗。陳伯達有些東西的來源是小站。二月份所謂「反革命復辟」也是根據小站的情況。陳伯達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批了「現在自上而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後來陳伯達把「復辟」改成「逆流」。這以後再講，華北局勢一九六六年底就是如此。

（八）董元梓去上海的一段公案

華東，特別是上海，在毛主席心目中是第一位的。毛主席認為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批海瑞罷官、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組織文章、毛主席批北京大學的大字報，都在上海。火是從上海點起的。毛主席認為上海二百萬產業工人要發動起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人階級應起領導作用，上海應成為模範，成為榜樣。原來華東柯慶施是一書記、政治局委員，毛主席是很欣賞的。他跟毛主席最緊，有時過了杠。柯慶施相當長時期是在華東局工作，同毛主席關係很密切。江青搞京劇改革，沒得到北京市委、中宣部的支持，但得到柯慶施的支持。上海對江青的接待規格同毛主席一樣。柯慶施是八大二次會議

後，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空氣下，毛主席提議把他補選為政治局委員的。這件事劉少奇同志不贊成。劉對我說：「我在北方局時，柯慶施是北方局主要成員，我當時向他講，我們應該擁護毛主席為中心的領導，他堅決反對。這問題他從來也沒檢討過。」後來毛主席要柯慶施跟劉少奇談談。柯慶施找了劉少奇，說他當時不了解黨內情況，對共產國際王明、博古執行的錯誤路線認識不足，以為他們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是正統的；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情況認識不清楚，毛主席著作沒看到，當時沒有理解，錯了。他檢討很誠懇，少奇同志同意了。柯慶施進了政治局。大躍進時柯慶施相當左，特別大煉鋼鐵搞得很左，整彭德懷他也很積極，他同毛主席一起到湖南發現一個人才，就是華國鋒。華國鋒提供了彭德懷回家的情況。柯慶施向毛主席提議華國鋒為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最後一名。柯慶施在上海很有威信，一直到死。柯死後華東局書記都是各省第一書記兼的，魏文伯是秘書長，後來也是華東局書記。毛主席很欣賞他。毛主席說華東局是秘書長專政。毛主席在上海接見外賓，內部談話，都讓他參加。發動文化大革命，曹荻秋、陳丕顯指定張春橋同江青聯系。張春橋原來是候補書記，文教書記是石西民。後來石西民調中央文化部，張春橋是書記處書記，主管文教。江青的京劇改革，華東局、上海市委都支持，要什麼給什麼。起草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組也在上海。當時第一書記是陳丕顯。陳丕顯原來就是華東局第二書記。柯慶施死後沒有第一書記。開頭陳丕顯被認為很好，華東局、上海市委被認為是可以信賴的。寫海瑞罷官文章，有人說毛主席

席不知道，是江青勾結張春橋、姚文元弄的，這不符合事實。最初要寫這文章就是毛主席要寫的。毛主席在北京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各大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毛主席提出要寫文章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毛主席後來很生氣，就是因為「我說了北京沒有人寫。」怎麼能說毛主席不知道呢？北京沒有人寫，毛主席才叫上海寫。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寫的。毛主席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章寫了後北京沒有轉載，上海印成小冊子送到北京，也是毛主席的意見。北京不發行這小冊子，毛主席才發火了，對中央主持工作的領導同志也有意見了。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寫，沒有背着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張春橋是作為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代表來組織文章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這在當時說是對的。現在這文章成爲不好的了，又說上海市委本來就反對寫。毛主席的指示他們能不執行嗎？當時是執行的，還是光榮的。毛主席對上海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並沒有把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開。彭真當時主持搞二月提綱，姚文元文章發表後他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發了火，在釣魚臺八樓拿起電話質問曹荻秋：（陳丕顯病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麼大的事，爲什麼不跟我們打個招呼？他不是質問張春橋，是質問曹荻秋。張春橋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間，對中央保密，對我們釣魚臺也保密。這件事是毛主席依托上海市委搞的。張春橋不是作爲個人，是作爲華東局、上海市委的負責人來搞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也是依靠上海市委進行工作。張春橋作爲上海市委的人，爲起草小組作些技術性組織工作。

印刷、分發、組織開會等。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得到毛主席支持，這是陰差陽錯，他去時是執行中央指示，念的是陳伯達的信。後來在群衆包圍下他簽了字。他本來狼狽不堪，誰知正合毛主席的意，張春橋馬上神氣起來了，對華東局、上海市委指手劃腳。張春橋是不是要取代之，坐鎮華東、上海呢？據我了解他不想去，他願意在中央文革，因為他自己也是當權派，沒有一個當權派有好日子過，他不如在中央文革作爲他的避風港。他可以超脫，說說風涼話，作些指示。姚文元更無所謂，他在中央是領導，回上海算老幾？張春橋是不是想把上海市委都打倒？沒有，他同他們分不開。祇是安亭事件才意見不同，過去沒有什麼不同。

一些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的說法，張春橋在當時就看到後來的發展，一開始就要把上海市委搞掉，搞成象彭真那樣，這不符合歷史。張春橋自己就是上海市委成員，而且是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他願意在北京，超脫上海。他不想到上海，他怕陷在上海。安亭事件是李富春提出，常委定了，叫張春橋去，是突然的，張春橋沒有思想準備，他帶去的是黨中央、中央文革的口徑，同上海市委的口徑並沒有多大差別。陳伯達那封信，張春橋用廣播車、高音喇叭向工人廣播了，不同意工人提出的條件。去之前他並沒有同陶鑄的觀點不同，在上海，同華東局也沒有不同。後來，在群衆包圍下他頂不住了，才被迫簽了字。那知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批評了陶鑄，批評了陳丕顯。張春橋在上海並沒有站到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對立的方面。如果華東局、上海市委垮了，張春橋自己置于何地？毛主席同意他的簽字以

後，他很得意，但也並沒有馬上把上海市委、華東局打倒。他留在上海的那幾天，同上海市委、華東局也並沒有分開，還是帶着曹荻秋去見群衆，曹荻秋也服從中央決定，一起去見群衆，上海市委也照毛主席指示辦，同意群衆五條要求。曹荻秋、陳丕顯、華東局的韓哲一、魏文伯，都是這種態度。張春橋沒有完全站到王洪文一邊。我看他還是想協調、疏通上海市委和群衆的關係。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說聶元梓和張春橋早有勾結，有計劃、有組織地用聶元梓轟上海市委，一切都是預謀的、有計劃的，這不符合事實。他們沒有那麼高的預見。

聶元梓的事是我經手辦的，我比較清楚。那時我兼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十一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裏，說得到可靠情報，有人要綁架聶元梓，而且時間就在今天夜裏。她說她報告了主席，主席意思要立刻找到聶元梓，在中央文革小組把她保護起來。江青給我這個任務，我馬上請王廣宇，要他立即找到聶元梓。他說找不到，我叫他開個車到處找，一定要找到。王廣宇很晚才找到聶元梓，安排她住在快報組（花園村）。下半夜我和徐學增到花園村找到聶元梓，傳達江青意見，叫她住着休息幾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電話。她有時也出去，晚上回來住。這期間正好發生安亭事件，陶鑄受到毛主席批評。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衆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同上海連成一片。江青找我，說主席的設想，組織個班子去

上海，最早她想李訥（肖力）要去，聶元梓去，阮銘也要去，搞個比較大的班子。聶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負責籌備這個班子。李訥找過我，我介紹她見過聶元梓，陳伯達找到阮銘。這個北京和上海聯系的組織，沒牽涉到張春橋。江青說李訥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慮，因為她正在搞農村文革的指示。後來江青又轉達毛主席指示，李訥不去，阮銘也不去，班子不要那麼大。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紅衛兵組織，祇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衆組織，用北大群衆組織的名義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號，完全作爲北大聶元梓領導的群衆組織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觀察、聯絡工作，沒有說她的任務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跟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記者站照顧。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說聶元梓和張春橋在上海秘密見面，搞什麼陰謀，聶元梓在上海的行動是張春橋策劃的，他倆怎麼說，作者都聽見了。這個我不知道。我祇知道張春橋對聶元梓非常反感，張春橋打電話給我，問怎麼回事？聶元梓爲什麼打着中央文革旗號？爲什麼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講了毛主席指示的幾條，我說沒交代她有事去問張春橋，是因爲張春橋要回來了。也沒有必要，因爲她祇是代表北大群衆組織去進行串連。沒有叫她打着中央文革旗號。

至于聶元梓同上海的關係，還有這麼一件事：在這之前，聶元梓寫過一張對上海市委的大字報，主要是常溪萍的問題。常溪萍是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上海市委教育委員

會書記。四清時常溪萍調到北京大學搞四清，是北大工作組黨委副書記。聶元梓認為常溪萍在四清中包庇陸平，她要把常溪萍揪回北大鬥爭。這事發生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聶元梓把這張大字報交給張春橋，張春橋在十一屆中央全會期間把這張大字報交給曹荻秋，并寫了一個條子，條子說，常溪萍同北大的陸平分不開，北大已貼了常溪萍的大字報，江青向毛主席說過，要把常溪萍揪回北大鬥爭。張春橋對曹荻秋說，你回去跟常委同志議論一下，不然會被動。曹荻秋是猶豫的，他請示了當時的中央領導同志，是否不要把常溪萍揪回去，大字報也不一定要貼。說市委意思是不要搞，而聶元梓一直抓住不放。張春橋對這問題再三跟上海市委講，再不貼大字報會被動。後來上海市委還是貼了。歷史學家說，這樣一來常溪萍成了陸平，上海市委就成了彭真。聶元梓自稱這是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可是根本沒有叫響，在社會上沒有人這樣說。現在有人說聶元梓同張春橋秘密會見，張春橋向聶元梓交代戰略，要從常溪萍問題上炸開上海市委的缺口，要到常溪萍的老窩華東師大去放火，說聶元梓必須見王洪文，祇有依靠工總司才能在上海打勝仗，這些話是虛構的。因為當時張春橋根本不贊成聶元梓在上海的作法。張春橋給我打電話就說明這一點。聶元梓老早就要揪常溪萍。張春橋是否很贊成支持聶元梓在常溪萍問題上打開上海市委的缺口？我看當時沒有，後來怎麼樣，我不知道。因為常溪萍是張春橋的部下，張是文教書記，從常溪萍問題轟開缺口，就是從他那個系統轟開缺口，這不符合情理。張春橋在離開上海前是講了話，提到常溪萍，但

是，可以看出他是爲了劃清界綫，怕連累到他自己。他說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詳細情況我不知道，看大字報後才明白他犯了嚴重罪行。這是張春橋認爲自己被動了，不得不交代一下。有人說張春橋是導演，做了提示以後張春橋就不見了。這是因爲十一月二十四日張春橋就回北京了。張春橋回北京匯報時主要談處理安亭事件的過程，總的來說很得意，但並沒有把這同聶元梓在上海的活動聯起來，并沒有稱贊聶元梓，還是不同意聶元梓的做法。張春橋離開上海以後，十月二十五日，上海開了個大會，是上海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據說是聶元梓建議的，我不知道。大會的名稱叫「批鬥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大會」。這個會還是籠統地炮轟上海市委，還沒具體提出揪出那一個人。攻擊目標是常溪萍。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發解放日報事件，上海紅革會要把他們的紅衛戰報同當天的解放日報一起發。上海市委及主管報刊發行的部門不同意，紅革會就占領解放日報，不讓解放日報發行，工總司也衝進報社，僵持了好幾天。到十二月二日上海市委請示中央，陶鑄指示說，群衆組織的報同黨報性質不同，不能一起發，這是原則問題，上海市委要頂住。聶元梓在上海是支持進駐，說不能輕易退出。這時中央並不是接到聶元梓的報告，支持聶元梓。因爲這時正是討論工礦十條的會也開始了，鬥爭很尖銳，陶鑄要做檢討，在這樣的情況下，風向有很大變化，中央的態度是鮮明地支持工總司，所以上海市委在十二月五日就同意工總司和紅革會提出的要求。這個賬應該記在誰的頭上？不能因爲現在說聶元梓是壞人，就認爲都是聶元梓的

罪狀。歷史事實主要是中央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毛主席的想法有了新的發展。十二月初正是轉折的時候，聶元梓對工總司、紅革會的支持成為對的了。當時，也並沒有認為聶元梓去上海立了多大的功。中央文革也沒有組織她匯報，沒有人誇她做得好，祇是原則上做了肯定，但不同意她的作法。張春橋對她還是很反感。張春橋對聶上海市委態度並不那麼鮮明，不那麼願意。現在說成張春橋策劃的，要將上海市委的軍，這一着棋就把上海市委將死了，這是根據後來的歷史反過來去編寫以前的歷史。不能因為他們後來扮演了那樣的歷史角色，就說當時張春橋策劃將上海市委的軍，把上海市委將死了。另外，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把上海市委的機關造反派的行動也說成是張春橋、姚文元、聶元梓預謀策劃的，我不知道這些策劃。我祇知道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到上海去時，他並沒有想另外搞一個班子，從上海市委機關挖出一批人歸他，另搞一套。直到他回來也沒有這東西。上海市委是全國唯一的或者僅有的幾個領導班子能堅持日常工作的。毛主席原來依靠上海市委。後來毛主席支持的兩個文件都是陳丕顯簽發的，不是張春橋簽發的。這兩個文件一個是一月十四日的文件，即告上海市人民書，另一個文件是工總司和紅革會等群衆團體署名的，這兩個文件都是由陳丕顯簽發的。

那時張春橋在上海沒有自己搞班子。毛主席是否已經有了機關幹部要造反的思想？有。毛主席認為光靠學生、工人、農民不够，領導幹部要站出來，另外還要靠機關幹部有人參

加，才能批得深揭得透，鬥、批、改才能實現。可是要聶元梓到上海時，沒有要她去推動機關幹部，成立什麼造反組織。張春橋在上海時，徐景賢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幫助市委、曹荻秋、陳丕顯寫些東西，并沒有獨立的搞一套，是在市委領導下進行工作的。張春橋回到北京後，上海寫作班子有一個人出了事，這不是徐景賢那個班子，這個班子原來就是姚文元的班子，寫評海瑞罷官和一些雜文的，筆名羅思鼎。出事的這個人叫朱永嘉，被復旦大學揪去了，徐景賢直接撥電話給北京，找姚文元，姚文元問張春橋，張春橋問文革小組，議了一下，進行了幹預，復旦大學放了朱永嘉。葉永烈說，姚文元十二月十二日對徐景賢說，打倒上海市委後，寫作班子能不能成爲我們的工作班子？這事我不知道。我判斷不可能，那時中央沒叫姚文元回去，沒想到要另搞一套。上海市委還在進行工作，犯了點錯誤，檢討檢討就行了，那時誰也不會想到以張春橋、姚文元爲首建立一個新班子。自從朱永嘉事件後，張春橋、姚文元同上海有電話聯系。但葉永烈這話不可能，張春橋、姚文元回上海去成立新的機構，當時沒有這想法。市委寫作班子是造反了，發表了造反宣言，同上海市委機關《支部生活》負責人聯合起來，成立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這同北京市委機關幹部的造反行動同樣受到毛主席的重視。聶元梓十二月十六日回北京，十二月十八日上海文化廣場開會，有人說這個會提的戰略口號是聶元梓同徐景賢擬定的，這個我不知道。因爲聶元梓十六日已回北京了。這個大會比聶元梓在上海時的口徑進了一步，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

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這口號是不是聶元梓同徐景賢擬定的，我不知道，聶元梓也沒有講。

張春橋從上海回來是十一月，到十二月毛主席過生日時還沒有說叫張春橋回上海。我覺得我在這問題上有發言權。這是因為後來毛主席同張春橋打交道都經過我，別人不知道的事我知道。光看檔案和紅衛兵小報不行。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臨時決定要張春橋、姚文元回上海，當時不是去改變上海領導班子，是作為文革小組的調查員去看看，把上海情況及時地、準確地報告毛主席。為此給我和張春橋之間建立了直接電話。本來中央負責同志都是紅的磁石機，拿起來要找誰就能找到。這時毛主席要我和張春橋聯繫，張春橋有什麼事報告中央，毛主席有什麼話要傳達給張春橋，都經過我。為此在我的電話機上安一個抗幹擾的機器，我們通話時竊聽聽不到，總機也聽不到。一月初張春橋、姚文元去上海，是臨時派去做調查員。到一月中旬毛主席奪權概念形成以後，毛主席要我通知張春橋，要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權機構，要他們去亮相，作為領導班子三結合的成員。這是在毛主席那裏開會後毛主席把我留下要我打電話的，不是張春橋、姚文元自己要參加的。毛主席要成立北京公社，擬名單後通知上海，要上海也建立公社，這電話也是我打的。後來張春橋他們幹的事他們自己負責，建立公社不能由他們負責。歷史學家說張春橋預先就知道後來的事情發展，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當時華東的情況：中心是上海，華東毛主席也很重視。華東局亂了以後，華東有些省第一書記站不住了。江蘇是江渭清，毛主席沒有意思要打倒他，因為江渭清過去曾受到劉少奇批評，所以就認為江渭清還可以。江渭清最早還掌握着局面，但他也派了工作組，執行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浙江是江華，同毛主席是老關係，從井岡山就熟識。毛主席外出時常住杭州。運動開始，毛主席心目中沒有要打倒江華。但江華在文革初期對毛主席的意圖心中無數，很早就發生江華的夫人吳仲廉自殺的事。當時浙江的矛頭對着江華。福建對着葉飛。福建又出現一個情況，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支持群衆。他屬於最早的在中央發表支左指示之前就支持群衆揭露葉飛的。後來一直就是韓先楚掌權。韓先楚是四野的。江西是方志純。江西一開始就亂。方志純曾在新疆被盛世才關過。在工作會議後，特別是十一、十二月，江青等人說在新疆被盛世才關過的一批人都是叛徒（這沒有道理，這樣連毛澤民都否定了。）方志純和江西原來主要負責人都沒站得住。山東是譚啓龍。文化大革命剛起來不久，毛主席在批語中表揚的有譚啓龍、王效禹，說他們站在群衆方面，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可是很短時間後譚啓龍成立的紅衛兵分化了，譚啓龍支持保省委的一派。譚啓龍被造反派的紅衛兵帶到北京來了，我見過他。當時還是文明的，沒有武鬥。當時中央徵求譚啓龍的意見，就在北京待一個時間，還是回山東？譚啓龍表示他不怕群衆，要回山東。譚啓龍這次回去後就不行了。山東省委不能掌握局面了。省委的指示青島拒絕執行，青島直接找中央，中央支持青島。青島

首先奪權，奪權負責人王效禹又到山東省裏主持工作。這些到一月份再講。

(九) 國務院各部的狀況

當時各大區各省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央文革管，省市委的日常工作是黨中央繼續管，就是總理、陶鑄管。陶鑄不行了以後還是總理、李富春管。國務院機關還在運轉，沒有改變。陶鑄以後，還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分工負責。華東是譚震林管，中南是李先念管，西北是陳毅管，華北謝富治管，東北、西南李富春管。直到一月，各省奪權，建立新的政權機構，到中央來談，還是總理為首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談。直到二月份，即後來的所謂「二月逆流」後才改變，改為各省奪權以中央文革為主來談，也還是總理談，副總理一般不參加，個別參加。國務院各口工作還照舊。各部還是由副總理、國務院辦公會議來處理，總理為首，李富春協助。最主要的是工交口，是李富春負責，實際負責的是余秋里、谷牧。財政口是李先念，農口是譚震林。完全癱瘓的是文教口及它所屬各部，都不行了。原來還有陶鑄，陶鑄倒了後，到十二月底，文教口由中央文革管。包括中宣部、文化部、新聞單位有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還有對外宣傳。國務院外事口還是總理、陳毅管。政法口是謝富治。經委是薄一波，他很快不能工作了。還有工交政治部陶魯笳不能工作了。經委薄一波不能工作，原來他管的單位由余秋里、谷牧管。總的來說國務院運轉還沒有多大問題。薄一波之前，科學口原來由聶榮臻負責。十一中全會聶榮臻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剛提了後就說他

不能管國家科委和科學院了，沒講什麼原因。這件事寫聶榮臻傳的人不知道，歷史上應該記一筆。據我觀察，是因為在十一中全會上有兩個人發言很尖銳，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搞法，而且發言時帶着感情，特別對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問題有意見。發言者一個是聶榮臻，一個是張際春。他們兩個都是管科學的，他們發言很尖銳。八月十三日開始，科委同科學院的運動領導就是總理管了。十一月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總理特別講了科學院問題，批判對象是韓光。實際主持國防科委工作的韓光，是很不錯的。不久前還是中紀委書記。當時總理對他批評很厲害。總理認為，八月十三日總理接管科委後文化大革命進展很慢，其原因就是韓光。總理說韓光是陽奉陰違，「過去把一切責任推到聶榮臻頭上，實際上你對聶榮臻也是陽奉陰違的。我想把群衆引導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進行大鳴、大放、大辯論，辨明是非，你韓光有組織地叫你那方面的人向我示威，當着我的面就鬧事。」（當時科委有兩派，張本也是一派）。總理說，「在一個大會上你們不讓張本上臺，我事先說好，韓光、張本都不上主席臺，可是支持張本的人寫條子讓張本上臺，主持會議的沒念這條子；後來擁護韓光的人遞了條子，主持會議的人就念了。你們準備好了牌子，反對張本。」總理說：「我看得清清楚楚，這是有組織的鬧事。」（王力按：我不大相信韓光會做這種事，韓光是老實人，不會作這種事。）總理還說，「要開會，你們雙方都有發言稿送給我，裏面缺了一點，中央發了部隊的緊急指示，張春橋在十萬人大會上念了。」

我又講了話。中央有了新的精神，地方也要按部隊的指示精神辦。這樣重大的決定，你們不知道。我要你們改稿子，你們不改。韓光方面三個發言人都不改，講的話不象樣子。韓光是有組織的陽奉陰違。一總理指名批評韓光後，韓光不能工作了。科委張本是機關領導幹部中比較早的站到造反派一邊的。毛主席三結合的思想，同張本這樣的人的出現有關。說明機關領導幹部是有人站到毛主席一邊。張本成了突出的例子。

工作會議後，十一月十二日國務院各部全面緊張，部長被包圍，呂東、榮高棠被群衆扣留，沒能參加工作會議。對中央各部，毛主席怎麼設想？整個政權究竟採取什麼組織形式？毛主席這時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概念。部長們在他心中除個別不能工作外，大多數還是能够繼續工作的。可是他經常流露他不主張大的政權機構，黨的機構也不贊成大。他設想的是小政府，不要那麼多人，那麼多層次，不要部，叫組就行了。也不要那麼多部或組，很多事情由社會辦，不是政府包辦。他認為政府大、層次多、機構臃腫，一定會官僚化，容易成為人民的對立面，以至成為人民的敵人。毛主席搞小計委，調余秋里來搞，小計委領導大計委，小計委直接對常委、對毛主席負責。他對政府機構的設想是「一小」，小政府大社會。文革小組很小，但職權不小。文革小組辦事組不到十個人，快報組人多，是調查研究通報情況的性質，都分到下面去。部改成組，毛主席說過多次，第一個改的是宣傳組。陶鑄一月四日打倒，一月八日中宣部改宣傳組，叫我當組長。再一個設想就是政府和黨的官員（幹部）要根

據巴黎公社的原則，第一，群衆可以隨時撤換罷免，不是一輩子當官；第二，十二月毛主席明白地說要實行供給制，取消級別工資制。毛主席本來是一級，後來他自己把工資降到四百元，他還認為高了，不符合巴黎公社規定的領導人的工資相當中等技術工人的水平。額外的東西如特供等都要取消。文革小組取消了專車，辦事用車按制度用。毛主席這樣的思路，要搞公社的想法，是逐步形成的，具體採取什麼形式，十二月底還沒有明確。

毛主席在十二月底或更早一點就提出要在一月一日發表社論，并組織群衆代表人物寫文章。十二月組織寫文章，發表在一月一日的紅旗雜志上。國慶節就請了些工、農、兵、勞動模範上主席臺。組織寫文章時我見到一些人，他們住在新僑飯店，我同關鋒去看他們，有山西的紡織工人解悅，東北機械制造廠的工程師尉鳳英，沈陽副食店副政治指導員李素文，他們都寫了文章，主題同上海市一月四日告人民書差不多，都是抓革命促生產，兩副擔子一起挑，群衆自己挑起來。用很大篇幅講工人自己把生產管起來，不能用生產壓革命。解悅的文章揭露（有的是口頭談的）走資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怎樣迫害她，說她打着紅旗反紅旗，說：「你再這樣搞就搞得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對她進行圍攻，搞得狠凶，人身攻擊虐待很嚴重。她說她不怕，回去後還要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把革命激發出來的幹勁用到生產上去。文化大革命中她工作一直做得很好。有人認為她祇能看一千二百個紗綻，可是雖然改粗紗後困難多，她還是運用辯證法，掌握了如何克服斷頭的規律，斷頭從每

小時六十個降到三十個，她能看一千六百個紗綻。她說工人完全可以把革命和生產兩副擔子自己挑起來。毛主席絕沒有不要生產或認為生產可以降低。毛主席認為生產要搞得更好，但一定要由群衆自己來搞，不要走資派指手劃腳，借抓生產來壓革命。毛主席說，有人壓不了就破壞生產，然後再歸罪于革命。毛主席說，革命生產的領導權究竟應歸誰，工礦十條就是解決這問題。十月一日在主席臺上見過王進喜，這次寫文章沒請王進喜，聽說是有人說他的壞話。毛主席還是要保他的。直到第二年四、五月，有人把矛頭指向王進喜，毛主席還是要保。孟泰，十月一日見了他，但這次寫文章也沒有孟泰，第二年孟泰到北京上訪，要求見中央文革，我見了他。他好多話還是有道理的。孟泰是否被打倒我不知道，我對他是尊重的，他有貢獻。他在人民中有很大影響。大慶寫文章請了幾個人我不熟悉，一個叫崔忠誠，一個叫李希文，一個叫王和君。紅旗雜志刊登的第一篇文章還是大慶的，中心思想還是抓革命、促生產，講石油工人一定自己能够、而且已經把革命、生產兩個任務擔當起來。大慶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生產有了新的發展。

這些文章，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沒有什麼不對，沒有什麼過激的言論，都是講要抓好革命，也要抓好生產，階級鬥爭越尖銳，完成生產的擔子就越重，要把生產搞得更好。大慶是聯合企業，一個環節出問題會影響全局，因此，不管遇到多麼復雜的情況，都必須堅持八小時生產，堅持大慶精神，嚴、穩、準、狠，一絲不苟，保證優質增產，超額完成任務。反對

有人企圖撒手不管，他們不管我們工人自己管，一定比他們管得更好。總的精神同上海兩個文件一致。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想法，看到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群衆的想法。寫文章的還有陳永貴，山東黃縣的王永幸，紅九連黨支部等。這些文章現在看來平平常常，當時工人、農民用自己的語言來講毛主席的思想，這說明毛主席的思想還是可以被群衆接受的。

這裏插一件事：在北京舉行過一次大慶展覽，被北師大譚厚蘭造了反，這件事鬧得很大。最後十月二十九日，陳伯達、戚本禹、余秋里接見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陳伯達有事不能去，戚本禹念陳伯達的信：「同學們發現石油展覽會的布置有政治問題，是對的，我贊成你們的意見。我本來打算同余秋里同志來會見你們，因事不能來，特請余秋里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給同學們說明展覽會布置的問題。據我了解，責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部陶魯笳同志，要陶魯笳同志檢查。」這是總理參加決定的方針，保余秋里，保石油部，拋出薄一波、陶魯笳。然後余秋里在會上講：「我熱烈地擁護戚本禹同志代表陳伯達同志給我們的指示。陳伯達這封信把我們的根本問題解決了，同志們對大慶展覽的造反我完全支持。它有錯誤就要在群衆面前揭發暴露。這對我們是有教育意義的。同志們發現展覽館的布置有政治上的錯誤，這表明北師大井岡山的同志們政治上敏感、尖銳。這值得我們同志們學習。同學們在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鬥爭裏面表明，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堅定勇敢，我們應當向你們學習。我今

天上午接見了同學們，作了調查。我們佩服你們這個隊伍，很有戰鬥性，紀律性，組織性，很勇敢，政治上很敏感，敢于揭發問題，敢于與政治上的問題作鬥爭，不愧為偉大的紅衛兵戰士。同學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展覽館政治問題揭露出來了。這對石油職工特別是大慶職工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一

余秋里說：「這個展覽會我是沒有參與的。我過去是石油部長，兩年沒有參與工作了。今天上午我去看展覽，過去沒有看過。提出要在北京展覽的是工交政治部，決定的是陶魯笳同志，審查也是他們審查的。這就是薄一波、陶魯笳，還有一些副主任，材料是大慶政治部提供的。當然提供材料的也有不可回避的責任。但提出的、決定的、審查的，是工交政治部。尤其嚴重的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還展出有政治性錯誤的問題，陶魯笳同志要負主要責任。因為他參加了十一中全會。」

余秋里說：「我看了展覽會，我也認為有很多地方對大慶事迹有歪曲，不是完全反映大慶的事迹，比如說，兩種勞動制度。大慶是根據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九月到武鋼視察時的指示逐步辦成的綜合性的聯合企業。辦點機械工業，農、商、學、兵都有。也是後來的五七指示的精神，大慶是兩論和老三篇起家的。大慶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偉大綱領性問題。而展覽不合乎那時的實際情況。大慶是戰勝災荒、戰勝修正主義，千方百計找油的。我認為這個展覽不合乎大慶的實際情況。最後，我表示，同志

們到展覽館鬧革命，受了委屈，受了侮辱，遭到謾罵，被攝了影，我一定負責查，查出以後向大家道歉賠禮。你們不吃飯、不睡覺、受圍攻，有的同志脖子被掐出血，還堅持鬥爭。主要責任在陶魯笳，他不僅這件事，不僅在這件事上挑動群衆鬥群衆，鬥學生，是兩面派，他在郵電學院也搞兩面派。在地質學院策劃學生鬥學生，他是布置者和參與者。毛主席允許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但陶魯笳不是這樣。他絲毫不檢查交代。郵電學院、地質學院、鋼鐵學院、北師大，都要陶魯笳執行陳伯達指示，好好檢查。有人遞條子說二號批判薄一波，我要加陶魯笳。一余秋里表示同意同學們提出的五個要求。譚厚蘭又提出來，工人鬥學生要追究責任，賠禮道歉，要罷陶魯笳的官。戚本禹說：「對，不能掉他的官就不能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戚本禹還說批判大慶展覽時，要把展覽與大慶分開。大慶是我們工業的明珠，不許有一點灰塵，不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玷污這面紅旗。學生中的多數派和少數派要團結起來。主要是余秋里表態，余秋里這個態表得很厲害。余秋里是正直的，他當時就這麼認識。

中央定的方針是余秋里不能傷害，要保護，大慶要保護，石油部要保護，定了要怪陶魯笳。不光展覽怪陶魯笳，工交領導的幾個學院都領導得不好。他是根據薄一波的指示，薄一波也不對。這時六十一人案雖未作爲正式問題，總覺得薄一波這人不好。

毛主席組織人到北京來寫文章，并沒找王洪文這樣的人。找的人都是過去作爲旗幟樹立

起來的勞動生產很好的人。並沒有把上海安亭事件的頭子請來，一個也沒有。

一九六六年底，十二月三十日傍晚，文革小組的人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去，江青公開表態，對蒯大富十二月十五日組織的「打倒劉少奇」的游行，江青公開表示支持，說清華游行是革命行動，在群衆中（還不是登報）公開表示支持打倒劉少奇的游行，這事發生于年底。歷史學家們記載，這天，江青單獨接見劉濤，這件事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王力接見劉濤。江青那些話我沒有說，如江青說：「你爸爸、媽媽是反革命，你要跟他們劃清界線」等等，這些話我沒說。讓我同劉濤談話是毛主席的意思，叫她做些思想準備。我說：「父母的問題是父母的問題，你自己還是要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父母問題不會影響到子女。」我沒說他們是反革命，江青說了我不知道。我說：「你要站到正確立場，工作組有問題該批評揭露的還要批評揭露。」這時王光美專案組已經建立了，十二月十三日建立的。劉少奇的專案組建立很晚，在我打倒之前沒有專門的劉少奇專案組。十二月十三日成立王光美專案組時，并沒說到劉少奇怎麼樣。可是，有人說，十二月十八日蒯大富在中南海西門見了張春橋，張春橋指示蒯大富組織游行示威，打倒劉少奇，這事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不大象。如果張春橋按毛主席指示，不是自行其是的話，十二月十八日不應該去指示蒯大富搞游行。因為當時中央方針還是不把劉少奇的問題放到群衆中去解決。同時十二月十八日江青接見群衆組織，這次接見大家都知道，不是單獨接見。江青說：「劉少奇和鄧小

平是黨內問題，中央可以解決，現在搞他們不合適，不策略。他們在黨內外有影響，群衆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過去在清華、北大有人貼劉少奇的大字報，主席親自派陳伯達去制止，不要貼劉少奇的大字報。」這是十二月十八日江青的話。就在同一天，張春橋一個人去指使蒯大富組織反劉少奇的游行示威，我總覺得不象。我不能說沒有這事，但按照江青的口徑（不是她個人的口徑，是毛主席的意思），十八號還是說劉少奇的問題不要放到群衆中解決。

毛主席過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沒有說到是否把劉少奇問題公開拿到群衆中去。可是，二十七日就變了。江青在接見群衆時又說，她頭幾天說的劉少奇的大字報陳伯達去制止，那是幾個月以前的事了，現在不同了，現在你們祇要背靠背，不要死揪出來，其他怎麼做都可以。還有一，毛主席的想法也變了，大約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講了話，說「現在看起來，對劉少奇問題不能象過去那樣內外有別了，現在不公開批判不行了，要公開批判。」這是在很小範圍內講的。可是毛主席說對劉、鄧、陶都不能面對面的鬥爭，祇能背靠背，這精神是直到我打倒以前還是如此。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我最後見毛主席時毛主席講的，這有文字記錄可查。毛主席堅持不許對劉少奇，更不要說劉、鄧、陶夫婦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我很重視，把這條記錄整理出來。後來江青指使戚本禹在中南海揪鬥劉、鄧、陶夫婦，我是不贊成的。我認為違背毛主席指示。毛主席在武漢講得很清楚，他說：「如果面對

面鬥爭，勢必發生武鬥，而且不能解決問題。」後來，他們組織八三四一部隊對劉、鄧、陶進行武鬥，掐着脖子，要劉、鄧、陶承認是反革命。劉、陶死也不承認是反革命。鄧小平靈活一點，說：「你們說是反革命那就是反革命吧！」這也沒有喪失原則。對劉、鄧、陶過去毛主席定的內外有別的原則，到年底不適用了。變成可以在群衆中公開批判，祇要不面對面，其他形式都可以。毛主席這一決策我無法猜測，為什麼有此變化。我認為這樣不對，也不好。後果很嚴重。如果没有這一條，一九六七年形勢不至于亂到那個程度。既然劉少奇可以如此，那就對誰都可以如此了。那時還是說劉少奇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還沒有說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對這種人可以採取這種辦法，那全國都可這樣做了，在全國連面對面的限制都沒有了。面對面的武鬥，人身侮辱都發生了。年底發生的這一變化給我印象很深，我很不理解。

第二部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高潮

一、一月份上海奪權

一九六六年底的重大情況都談了，一九六七年一月發生的事件就不會感到偶然了。但直到一九六六年底，還沒有出現造反派和機關幹部聯合起來從下而上的奪權。一九六七年元旦紅旗社論，實際上傳達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提的口號最重要的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

爭」，並沒有提出奪權的口號。當時祇是提出各方面、各地方，特別是北京、上海要把生產的領導權由群衆自己掌握起來，由支持革命群衆的領導人，就是同造反派群衆站在一邊的領導人，同機關幹部，把革命和生產的領導權掌握起來。但當時沒有提出奪權的口號，更沒有提出奪權採取什麼樣的組織形式。主要是北京，特別是上海，在安亭事件後繼續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到過年後，一月二日，毛主席才決定派張春橋、姚文元用文革小組調查員的名義回上海。不是叫他們去代替原來的上海市委，他們祇負責向中央反映情況。

這裏我要倒過來敘述，因為我不能從上海角度講，他們哪天幹什麼，我不完全知道。有些人所說的，我不能判斷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有水份。我祇能倒過來講，從我直接接觸經歷的事來講。

我直接接觸的事情是一月八日晚上的會。原來一月四日陳伯達、江青接見揪王任重的造反組織時，講了一篇話，把陶鑄打倒了。陶鑄問題在群衆中公開宣布，公開地打倒陶鑄，發生在這一天，即一月四日。但陶鑄實際上被打倒，不是一月四日，而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開了政治局生活會，他已經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鑄是不是違背毛主席意圖呢？不違背，也是他的意見，但采用這種形式來打倒，後來知道毛主席是不贊成的。這作法不對。二月份毛主席表示了意見。一月初這時候，公開打倒陶鑄已成了既成事實，詳細情況毛主席還不太清楚。陶鑄不能工作不是一月四日開始的，早就不能工作了。所以一月八日晚毛主席召集陳伯

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代替吳冷西管人民日報）、胡痴開會，通知時把我漏了，我晚到了一會。在這個會上毛主席宣布他的決定，中央各部要改成組，首先從中宣部開始，改為宣傳組。中宣部長陶鑄已經打倒了，現在改成中央宣傳組，由王力、唐平鑄、胡痴三人組成，以王力為組長，代替陶鑄的工作。這件事我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感到很突然，而且我認為我管不了。這不是謙虛。我對毛主席講，領導意識形態、宣傳、文教這麼大的工作我不行，這個事非要一位常委來做不可。我說還是陳伯達同志負責，我當他的秘書。毛主席不高興，說：「定了」。後來才知道他對陳伯達不滿意。可是要我來當，陳伯達也不高興。後來有一個場合，陳伯達、康生和我三人跟毛主席談別的問題時，陳伯達問毛主席：「人民日報也歸王力管嗎？」因為他是人民日報工作組長。毛主席很不客氣地說：「難道這還有什麼問題嗎？」這就是說人民日報要我管。《紅旗》雜志我不管，解放軍報我不管。我怎麼能代替陶鑄？他是常委，我代替不了他。可是毛主席要我管，就管吧！

（一）毛主席支持上海市告人民書，口授人民日報按語，并决定由王力代替陶鑄

一月八日這個會主要不是解決王力代替陶鑄的問題。這個會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支持上海奪權（那天沒用奪權的提法）。毛主席講話中提到文匯報奪權，說文匯報左派奪了權，這方向是好的。文匯報一月五日刊登的一月四日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合發表的告上海市人民書，題目是《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毛主席決定這文件要在人

民日報發表，同時他要馬上起草一個人民日報編者按，代表中央的態度。毛主席說：「當天晚上王力你就要到廣播電臺去，立即廣播。」毛主席又說：「他們內部造反了，過幾天要他們寫一個綜合報道。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一場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了，同時起來掌握了權力，掌握了領導權，全國就有希望。它的影響不但會影響到整個華東，而且會影響到全國各省市。原來的領導人不同群衆站在一起的話，他們就離開，沒有他們，我就不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要馬上廣播。」以上都是毛主席說的話。會上決定三個人為宣傳組組員，王力為組長，決定胡痴代替熊復當新華社社長，康平鑄當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代替吳冷西。當場我根據毛主席的話（等於他的口授），起草了人民日報按語。這個按語不長，分兩段。第一段說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第二段說，隨着上海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局面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這個按語是我當着毛主席的面起

草的，經他看了，沒有改，說「就這樣，馬上廣播」。

老實說，我當時自己也不清楚。上海市告人民書要廣播，這個我理解，文匯報、解放日報的事，我當時並不那麼理解。報紙究竟誰來管？不能說一個報社的造反派自己領導這個報。這我不怎麼理解，也沒向毛主席提，就照他的話寫了這按語。這按語本身沒提「向上海市委奪權」，沒用奪權這個詞。但這按語影響很大。我同唐平鑄、胡痴三人立即到廣播電臺，廣播電臺的人總還認識我，但並不知道我現在管電臺。本來應該有人介紹一下，陳伯達不去介紹，我祇好自我介紹。我說，毛主席決定成立宣傳組，代替陶鑄，今後電臺歸我們管。胡痴他們二人說，「王力是宣傳組組長。」

這個按語影響不亞于聶元梓的大字報，甚至更大。叫我當宣傳組長之前，我不管宣傳工作，突然叫我管，我要負責任。過去沒好好研究上海情況，我祇是轉達張春橋的匯報和毛主席的意見。現在我就要反過來研究上海究竟怎麼回事。

一月二日決定張春橋、姚文元回上海，一月三日他們在北京做了些準備工作，找上海造反派在北京的人，例如王洪文，還有聶元梓，張春橋聽取了他們對上海情況的介紹，作了準備。給張春橋的任務很簡單，就是向中央匯報情況，沒說叫他們去掌握上海局面。他們一月四日回上海。據我記憶他們去後沒有經過我向毛主席報告。是毛主席先從文匯報上看到的告上海市人民書。沒有人說一月四日告上海市人民書和文匯報奪權是張春橋策劃的。因為他還

沒到上海。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市人民書是上海各造反派聯合發表的文件，領頭的是工總司、紅革會，還有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哈軍工駐滬聯絡站等組織。這個文件是上海市委陳丕顯簽字的。歷史學家說這文件不好，不好的地方是它根據紅旗雜志元旦社論的精神，說一九六七年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的一年，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崩潰、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年。這是總的精神。文件提到上海的兩派：工總司、赤衛隊。市委支持的是赤衛隊。據說後來張春橋一個電話把它瓦解了，這個我不太清楚。文件中抓革命、促生產的鋒芒針對着上海市委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另外，群衆組織把破壞生產的責任推到赤衛隊身上。歷史學家當然說這文件不對。但有的另外的歷史學家認為，這文件還可以，因為通篇是講抓革命、促生產，工人要在工作崗位上，工人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鋒和骨幹，而且要做抓生產的先鋒和骨幹。他們反對離開工作崗位，反對破壞生產。文件總的精神還是反復講堅決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文件還有可取之處。所以歷史學家說，文件是陳丕顯簽字的，而且說王洪文反對這文件，說他本來反對簽字，後來中央把這文件加了按語向全國廣播以後，工總司又把功勞歸于自己。

當時毛主席決定廣播這文件，後來我作了研究，認為這文件不錯。這文件符合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的精神，以工人為主，特別是上海、北京、東北、天津等產業工人占主要地位的城市，要由工人起來，自己把革命同生產的責任擔當起來，把革命生產的領導權自己掌握起

來。另外也符合毛主席這個精神，就是以造反派為核心，團結廣大的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群衆，一切可以團結的工人和其它勞動者。學生也是這樣，如對待赤衛隊隊員，不要歧視他們，要團結他們一起，以造反派為核心，把全上海工人團結起來，特別是過去參加赤衛隊的，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蒙蔽的人要站過來，團結起來，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搞好生產，不要責怪他們。這是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反復講的。另外學生同工人要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一切勞動者同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聯合起來。這是毛主席的大聯合的思想。這精神我當時認為不錯，符合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有新的發展。

人民日報按語雖然指的是這文件，它的中心點不在第一段，而在第二段，即關於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的一段。過去沒聽到毛主席有這樣的主張，可是發生了這件事，毛主席堅決支持，這確實是很大的問題。

(二) 文匯報奪權

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宣布一月四日接管文匯報，發表告讀者書，宣布決心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刀兩斷。認為文匯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獲得了新生。文件列舉舊文匯報的罪狀：一九五七年曾墮落為右派的報紙；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執行中宣部閻王殿反革命修正主義辦報路線，是為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的報紙；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折不

扣地貫徹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文件說，中央一兩個或幾個負責人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文匯報成爲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報紙。舊文匯報必須徹底革命，徹底改造。十多年来革命左派爲捍衛毛澤東思想不斷地對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進行批判鬥爭，現在文匯報的造反派决心大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反，大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一反到底，决不回頭。他們提出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最高行動指南，我們無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我們辦好新的文匯報的靈魂。我們決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作爲新文匯報的最高的戰鬥任務。這些都是對的。但是他們提出「凡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大力宣傳、大力提倡，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堅決抵制、徹底打倒」，這個怎麼判斷呢？他們說：文匯報要成爲一張革命造反的報紙，我們要全面開展階級鬥爭，向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在這場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我們堅決一邊倒，鮮明地倒到革命造反派一邊，爲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搖旗吶喊……

我當時感到文匯報的面貌一新，有了生氣。過去毛主席就不喜歡看人民日報。毛主席喜歡看紅衛兵報，不喜歡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毛主席指示我堅決執行了，但是有很大疑問：報紙究竟由誰管？誰來領導？誰來判斷什麼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什

麼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如果各地報紙都這麼做，那怎麼辦？假如整個市委權力都由革命力量掌握了那還好，可以由市委來領導報紙，現在祇是報社造反派來掌握這個報，是不是合適？當時我就有這疑問。但是它通篇沒有說打倒上海市委，沒提到上海市委，沒說同上海市委一刀兩斷。文匯報奪權的消息毛主席沒有叫登，但他的講話通篇是支持文匯報同解放日報的奪權。

（三）解放日報奪權

一月五日發生了解放日報奪權，比文匯報奪權是一個更嚴重的步驟。一月五日發表了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告讀者書，說我們接管了解放日報，宣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解放日報死亡了，革命造反的解放日報誕生了。它這宣言提到了上海市委。宣言說，解放日報原來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應該成為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貫徹執行黨的方針路線的工具，但近幾年來解放日報在市委和報社黨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操縱下，背離毛主席的教導，發表了許多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毒草，解放日報極力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成了資產階級的工具。文化大革命以來，解放日報忠實執行了市委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報紙上製造輿論，轉移鬥爭大方向，壓制紅衛兵運動和工人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擊革命左派，妄圖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最近發生了大規模的群衆鬥群衆的「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

綫又一次大暴露。舊的解放日報對黨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必須徹底批判，徹底改造。我們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有責任接管解放日報的領導權，解放日報就是要成爲革命左派的報紙，就是要成爲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專政工具，就是要成爲毛澤東思想的堅強陣地。這個陣地我們是占定了，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其它的話是一般的。

解放日報的告讀者書明確提出了奪權。毛主席在一月八日講到文匯報時也講了奪權，但在文字表達時，人民日報按語沒用奪權字樣。文匯報同解放日報這兩個告讀者書，毛主席沒有叫登人民日報。可是一月九日人民日報對告上海市人民書的按語中肯定了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生的事，作了很高評價，說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大事。毛主席那句話：「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這句話我起草時沒有用，毛主席也沒說一定要用。也沒用奪權這詞。我回去以後考慮，這事情勢必引起連鎖反應，怎麼辦？

(四) 王力在新華社的講話

陶鑄問題同上海問題是在同一次會議上定的。八日廣播，九日見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沒有問題，因爲已換了人，換了唐平鑄。廣播電臺我們三人去過了。還有新華社是重要單位，決定新華社領導人換成胡痴，沒有人去宣布。一月九日商定陳伯達、王力、胡痴去，宣布兩件事，一是說明廣播上海市告人民書的意義，一是宣布王力代替陶鑄，胡痴代替熊復。但陳伯達不去宣布，胡痴也沒去，我一個人去的。有人作爲我的罪狀，說我這次講話罵了陶鑄。

他忘記了背景。這時陶鑄已打倒，毛主席要我來代替他，在這背景下能避開陶鑄嗎？除非我也不去。可是我不去不行，我要工作，新華社工作一天也不能停。歷史學家不看時間背景，祇羅列了誰說了什麼批評陶鑄的話。這些話是毛主席的意思，誰也得照毛主席的意思講。總理也得講。誰也不能違背毛主席的意思。

我的講話說：今天報紙第一版轉載了文匯報發表的上海三十一個革命群衆團體的告上海市人民書。這件事情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這是毛主席親自決策的，這是繼聶元梓等七同志在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以後，毛主席親自決定要廣播的重要文件。它標志着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現了新的形勢，到達了新的階段，提出了新的戰鬥任務。上海是一個重要的城市，上海發生的事情，它標志着我們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要出現這樣的形勢，就是革命群衆的力量發展了壯大了，革命群衆從過去處于少數、受打擊、受圍攻的地位，到了他們要掌握上海革命的命運，掌握上海這工業城市的生產的命運，到了這樣一個時候了！（這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隨着上海革命群衆力量的發展，上海出現了那樣一個嶄新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對這一件事情，我們（也就是毛主席、黨中央）作了很高的評價，看作是一個大革命（這件事確實是比告人民書還大），看作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造反派起來了，革命的造反派自己掌握了報紙（這時我祇能籠統地說「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掌握了報紙」，不能說「報社的造反派掌握了報紙」，不能說這

個報的造反派掌握了這個報，那個報的造反派掌握了那個報，祇能籠統地說上海的造反派掌握了報紙。造反派起來了，究竟採取什麼形式？毛主席自己也還不明確。我當時沒辦法講得清楚。」我說革命造反派同革命的群衆團體聯合起來，推翻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領導，推翻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自己掌握報紙。自己把報紙變成一個同革命群衆聯合起來的報紙，辦成一個革命的報紙，這是我們的方向。（這是毛主席講的）這樣一個事情它不僅是上海的問題，它必然對整個華東，對整個中國，對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巨大的推動作用。（下面也是毛主席的概念）以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不但要擔負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還要擔負起一個革命報紙的責任，擔負起上海一個大規模工業城市的生產任務。要無產階級革命派真正把國家的命運，生產的命運，業務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樣一件事情，在今天這樣一個時候，毛主席決定廣播這樣一個文件，是有極其偉大的意義的。

下面我講到陶鑄。我說目前形勢好得很，北京形勢，特別是在最近一個時候，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揪出了陶鑄，揭露了他繼續忠實地執行了劉鄧路線，揭開了這樣一個蓋子。這個變化突出表現在中央直屬機關同宣傳文教系統的各個單位，把陶鑄的這個蓋子揭開，機關的文化大革命起來了，過去是一塊大石頭壓着（這是毛主席在年底特別強調的）。毛主席指示

我們，機關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僅僅有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沒有機關幹部起來積極投入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成的。有好多重要問題，就是要依靠機關幹部來揭露。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元旦社論，就是根據毛主席這個指示，提出了機關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毛主席十二月二十六日過生日那天特別強調講到這問題，這問題寫到元旦社論裏去了。）我們經過了對陶鑄問題的揭露，好多以前死氣沉沉的中央機關，現在變了，蓋子揭開了，鬥爭展開了。什麼陶鑄、熊復呀！同志們揭露了。陶鑄在劉、鄧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就是忠實執行劉鄧路線的，他的屁股是坐在那一邊的。（這些話當時非講不可，不然中央為什麼把他撤換？陶鑄過去領導新華社，現在為什麼陶鑄換成王力、熊復換成胡痴？中央的意思必須講，有些話是毛主席講的，特別是鄧小平的腦袋安到陳毅頭上，這同新華社有關，必須講。我講這問題不僅是為陶鑄問題，而是為了毛主席那樣的一個思想，就是機關幹部要起來。所以我提到陶鑄問題的開始和結束都提到機關幹部的問題。）在機關，徹底批判陶鑄的這一套，對於機關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現在我們看，許多機關都出現了這樣一個很好的形勢，我們覺得，機關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這樣轟轟烈烈地開展。而且根據毛主席決定，廣播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這樣一個榜樣，經過這樣批判，經過辯論，經過鬥爭，經過一個發展，我們這些機關一定能够掌握在毛主席的好學生手裏。當然我們要區別對待，但是我們要相信自己，相信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自己一定能掌

握自己的命運，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辦好，辦得比他們更好。

我講的兩個問題就是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會上講的內容。先講上海問題，後講陶鑄問題。我把毛主席在一月八日會上講的兩個問題向新華社傳達。

陶鑄問題在新華社揭露後，新華社對陶鑄意見很大，這些以後再說。主要是他把科長以上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倒，把新華社的主要領導人差不多全部打倒。到我去管新華社時，幾乎沒有負責人了，祇有新上任不久的副社長王唯真。我没法工作，新華社工作又不能停。我跟毛主席講，新華社祇剩下一個王唯真了，還要打倒，那不行，我要求毛主席講一句話，新華社具體工作由王唯真負責，要有職有權。毛主席同意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以後，我就叫王唯真管了。胡痴不上任，他怕到新華社，推脫不去。我後來才知道胡痴怕離開解放軍，因為解放軍安全一點。他怕到新華社沒好下場。他有個歷史問題，就是抗日戰爭時期河北有些地方黨組織決定黨員假自首，這老早作過結論，沒有事，但他顧慮被揪住不放，他不願去也不敢去新華社。被任命後沒幾天，他就在解放軍報被打倒了。一月十三日李訥（肖力）貼了他的大字報，一月十七日葉群用林彪名義宣布胡痴小集團假奪權，把他抓到衛戍區去了。連唐平鑄也抓去了。胡痴一天也沒有到新華社到任。胡痴、唐平鑄都願意當中央宣傳組成員，住到釣魚臺。他們住到釣魚臺後，在原單位安排了接班人，聽說接班人是不錯的。胡痴安排了新的領導班子，李訥就貼了大字報，說他是假奪權，用林彪名義起草了一封信，

執筆人是關鋒。關鋒這時已被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我問關鋒怎麼回事？他說他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含糊地用了「胡痴小集團」的提法，沒說反革命小集團或者反黨集團等等。這個信是江青一定要那麼寫的，林彪不那麼高興，但江青一定要林彪簽字。信經過毛主席看過，小集團成員就抓到衛戍區去了。被抓的一個姓楊的同志跟我說，他得穿厚一點的衣裳，帶好洗漱用具，準備長期呆着吧！宋瓊也成了小集團成員，也關到衛戍區去了。後來都放了。放得最早的是唐平鑄，因為他沒有大問題，人民日報離不了人，我和陳伯達堅決保了唐平鑄，他較早地出來了，胡痴一直沒翻過來。

總之，一月九日王力在新華社的講話是傳達一月八日毛主席開會的精神和決定。

（五）上海的緊急通告（陳丕顯簽署）和綜合報道毛主席都批了

一月九日在上海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上海造反組織又發表了一個緊急通告，署名的造反組織比過去多了，以前二十一個，現在三十二個，還是工總司為首。這個緊急通告共十條，主要內容是抓革命促生產。他們當時說上海有人在破壞生產，在搞經濟主義，有一部分人要停工停產，中斷鐵路、公路，中斷港口工作，停水停電。緊急通告提出，正當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兩條路線大決戰的時候，正當頑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時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玩弄新的陰謀，他們與社會上資本主義勢力相結合，以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挑動群衆鬥群衆，造成工廠停工，鐵路

中斷，公路阻塞，甚至挑動港務工人停止生產，影響港口工作。他們任意揮霍國家財富，隨意增加工資福利，濫發各種補助費，煽動群衆強占公房，這是上海市委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這個緊急通告提出：我們嚴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圖用破壞生產、中斷交通和增加工資福利來轉移鬥爭視線的陰謀，都是絕對不能得逞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造反派，堅決揭露這個陰謀，堅決打退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進攻。緊急通知說，為了迅速扭轉由上海市委在社會上所造成的嚴重局面，我們呼吁大家：第一條，抓革命促生產，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堅守生產崗位，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第二條，呼響全國革命造反派，說服動員在各地串連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等立即回上海，搞好本單位文化大革命。第三條，過去各單位當權派簽發的外出串連的證明，即日起一律作廢，各單位發出的大量串連費要追回。第四條，除必要的正當經費外，各單位的流動資金自即日起一律凍結，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衆組織聯合監督執行。第五條，爲了避免轉移鬥爭大方向，工資的調整和補發、福利待遇等問題，原則上放到運動後期再處理。第六條，有些當權派爲了破壞學生與工農相結合，竟給學生發放較高的勞動工資，即日起一律不準發放。第七條，不準任何人強占公房，違者由公安局查處，依法處理。第八條，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凡是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生產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第九條，上述各條希望各單位造反派組織和全市廣大革命群衆立即貫徹執行。第十條，上述各條責令市委、

公安局照此執行，凡有違背上述各條者，立即以破壞文化大革命查處。這個緊急通告由二十二個造反組織聯合署名，也是陳丕顯簽名的。

一月九日文匯報、解放日報還發表了一個綜合報道，說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了總攻擊。毛主席對這兩個文件（緊急通知和綜合報道）都批了。毛主席一月八日講話內容我有責任傳達給張春橋，這時還沒接到張春橋的報告，也許他通過別人報告了我不知道。我把一月八日毛主席講話轉達給他，毛主席說叫他們把這幾天的情況搞個綜合報道。我八號才告訴他，他們九號就發表了，是不是早就寫好了，我不知道。

（六）中央給上海的賀電

十號毛主席批示，說此兩件很好，要文革小組替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賀電是文革小組的人起草的，參加者有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痴。賀電拿到政治局討論，總理爲首，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徐向前（軍委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是顧問）江青、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謝富治、楊成武、肖華參加。（這時劉志堅已打倒，軍委文革小組已改組。）在人民大會堂總理主持討論。賀電不長，份量很重。因爲緊急通知說群衆組織責令市委怎麼怎麼樣，不是他聽市委的，而是他命令市委。他的十條內容確實也不錯，陳丕顯簽字也有道理，問題是市委反過來聽群衆指揮。中央賀電的內容說

：上海工總司、紅革會等三十二個群衆組織：你們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你們及時識破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陰謀，舉行了有力的反擊，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你們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制定了正確的政策，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的大聯合（這是第一次用大聯合的口號），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衆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革命沿着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賀電不長，可這個了不起，這是多大的問題！會場上快定稿時毛主席來了（他就住在人民大會堂），總理問他還有什麼意見，主席看了，提出這個賀電要這樣：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再加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用四個名義發出。這是過去沒有用過的，毛主席第一次采用四個署名，這個賀電一月十一日發到上海，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賀電，同時發了上

海三十二個群衆組織的緊急通知，還發表了文匯報、解放日報的綜合報道。十一日上海用號外形式印發賀電。這件事後來我問毛主席，我說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並列，合適嗎？我的概念中，文革小組是常委的參謀秘書機構，怎麼成了權力機構？我還說政治局不能同中央並列，書記處也沒有同中央並列過，文革小組怎麼能同中央並列？毛主席笑而不答，說「就是要這樣好」。我想可能非常時期要用非常的形式，也就不再提了。這個賀電比人民日報按語更不一樣。人民日報按語已經影響很大。象龔元梓大字報一樣，起了劃階段的作用。這個賀電更不一樣，四個署名，而且轉發的緊急通告表明群衆組織可以向市委發命令，這在全國範圍影響很大。

（七）上海十萬人大會奪上海市委的權

一月六日張春橋、姚文元向中央做了一個報告，他是客觀報道，說一月六日上海開了十萬人大會，從上午十時到下午三時，有機關幹部、工人、學生代表參加，中心口號是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陳丕顯、魏文伯、韓哲一、馬天水、梁國斌均到會，會後又發出通令，不承認曹荻秋為市長、市委書記，曹荻秋監督勞動。責令陳丕顯一周內交代自己的罪行。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上海市委可以說完全垮臺了。大會名字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大會發出三個通令：

第一號通令說：第一，從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衆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

主義分子曹荻秋爲上海市長、市委書記。第二，責成大會服務團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并批準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第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并責令其徹底坦白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這個會的報道和通令人民日報沒有登。毛主席也沒叫登，也沒有批準罷免曹荻秋的職務。看起來造反派祇是自己不承認，罷免還是要中央罷。

第二號通令說，陳丕顯必須在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待。（沒說陳丕顯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曹荻秋是兩個檔次。沒說監督勞動，沒說不承認陳丕顯爲市委第一書記，沒說報請中央罷免陳丕顯，沒說要在報上點名批判陳丕顯。）

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爲以陳丕顯、曹荻秋爲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後來張春橋說，一月六日的大會上海就奪了權了。姚文元起草的向中央的報告沒說得那麼明確，祇是說「上海市委可以說完全垮臺了」。後來相當晚的時候，張春橋說上海市已經奪權了。他這樣說，一方面是事實上如此，再者，張春橋怕發明權被別的省拿去。他們起初沒用奪權口號，後來山西等地奪了權，他怕發明權落到別人手裏。

賀電這一發，等于毛主席支持上海奪權，不過還沒用「奪權」這個詞。那時毛主席對奪權

採取什麼形式還沒有形成概念。上海三十二個群衆組織下命令叫上海市委怎麼怎麼樣，但權力機構是什麼，還沒有定。

一一、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毛主席這些作法，大家都認為很英明，看得深，看得遠，認為形勢很好，但是中央最高層有人對究竟怎麼回事，應該怎麼提法，是否叫「自下而上的奪上海市委的權」有疑問，有一個人沒請示毛主席，擅自在北京慶祝中央給上海賀電的大會（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十萬人參加，十三日或十四日開的。）上講了不同的提法，這個人就是陳伯達。大會有上海的人來，有王洪文。陳伯達說上海自下而上的奪權，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衆組織祇能監督，不能奪權。陳伯達的話人家不懂，我給他當翻譯。在大會上王洪文這一派的人還

作了檢討。當天下午剛散會，毛主席馬上知道了，馬上開了個會批評陳伯達，支持上海。毛主席明確地批評了陳伯達。毛主席說，上海造反組織來奪上海市委的權，怎麼能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呢？是他們（上海市委）採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衆把他們的權奪了。毛主席說，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毛主席然後講了一大篇的話，後來寫成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就是號召奪權口號的背景。這是毛主席的系統的思想。是第一篇公開號召奪權的文章。

（一）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公開號召奪權的正式文件

毛主席開會批評陳伯達，講了一大篇支持上海奪權的話。根據毛主席的話，我同關鋒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寫文章本來都是陳伯達、王力、關鋒三個人寫，或我們寫後跟他商量、修改、定稿。可這篇文章同他的提法不同，是批評他的，把他作為對立面，所以他不參加起草。而且打破慣例，過去文章送毛主席時由陳伯達送，他簽陳伯達、王力、關鋒三個名字。這次他寫的是，主席：這是王力、關鋒同志為紅旗雜志寫的一篇文章，請審閱。下面是簽名，表明他沒有參加寫。陳伯達搞了另一篇文章，題目叫《響應毛主席號召，到群衆裏面去》，這當然也很好，有些領導幹部怕到群衆中去，應該讓他們到群衆中去。但這不是運動發展中最迫切的問題，不痛不癢，過去紅旗社論也都是我們三個人寫，這個是他寫的。這兩

篇文章是一月十五日送的，主席當時退回。陳伯達寫的那篇主席畫了圈，王力、關鋒寫的那篇毛主席批了「寫得很好，照發」。這篇文章當晚廣播，震動全國。陳伯達把他那篇用紅旗社論的形式發表，把毛主席批的「寫得很好，照發」的文章用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的形式發表。但是，當時群衆、幹部，并不因為是評論員文章而看輕它，也並不因為陳伯達寫的是社論就重視它。全國重視、北京敲鑼打鼓到紅旗雜志社報喜，也是報的評論員文章。上海非常滿意，認為黨中央全面支持上海奪權，也是指評論員文章。社論無聲無息，人民日報發表時也把評論員文章放到第一版，社論放到第二版。十五日廣播，十六日見報。後來陳伯達判刑後，我還給中央寫信講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些好事，他有些意見不能說不對，舉的例子就有這一條。可是陳伯達有個毛病，他不堅持自己意見。評論員文章發表後，到處都在講奪權，他反過來講得比別人都凶。

評論員文章是第一篇正式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號召奪權的正式文件，題目叫《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作為毛主席、黨中央向全國號召奪權的文件，它肯定上海群衆組織聯合起來自下而上的奪權。文章說，把上海的經驗集中為一點，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市的政治、經濟、文教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文章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結底就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

資派手裏奪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毛主席就有這思想，不斷說要搞新的機器，新的組織形式，新的鬥爭方法，新的秩序，新的紀律。毛主席不斷有這個思想，說這個話。這些思想差不多都寫在這文章裏。祇有一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提法，這篇文章還沒講。毛主席的理論觀點很鮮明，就是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我是照毛主席的思想寫的，但我思想趕不上，覺得很難理解。自下而上的奪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革命造反派代表無產階級，而奪權實際上已經不是個別的，那麼，所有被奪權的都是被推翻的階級嗎？當然還說有無產階級當權派，可以站到群衆方面來，但從理論上怎麼解釋？另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能把資產階級消滅了？毛主席說過幾年再搞一次，很長時間才能消滅。說奪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他這些理論觀點用着重點標出來。起草人本身覺得從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來說這是新的觀點，自己趕不上。文章又提出上海奪權是文化大革命到了轉折點，開始了新階段，是在新形勢下採取的新的戰略決策，以上海奪權鬥爭為標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了新的飛躍。這麼多新字！

有人說毛主席是幻想家，是空想社會主義，說毛主席碰了釘子，走投無路了，才採取了一月奪權的決定。根據我的親身經歷不是如此。他一點沒有感到碰壁，相反地覺得形勢很好，上海是產業工人集中的城市，上海工人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是很好的形勢，有的歷史

學家分析說，十二月全國都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刮起十二月黑風，毛主席很孤立，碰了壁，走投無路，于是孤注一擲搞奪權。我認為不是的。上述觀點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毛主席一貫堅持的理論觀點，這些方針、方法，他是很堅持的。

（二）周總理立即接受毛主席關於奪權的指示

周總理也很快就接受了毛主席的觀點。一月十日接見北京造反派代表、外地群衆時，參加者有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王力、關鋒、唐平鑄。周總理領會毛主席指示最快。周總理讓我在會上念上海緊急通告，念上海的綜合報道，念一月十二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還沒發表，先徵求群衆意見）。周總理最後講話，抓住要害，說上海告人民書是毛主席最先發現的，是毛主席決定讓我們廣播的。（其實那天開會毛主席沒請周總理、康生、李富春。）周總理說，這文件的發表象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一樣，相信全國會響應，我們想在這次運動大發動之前跟同學們談談，通通氣，通過你們作工作，號召全國勞動人民起來，同你們一起，把新的發動工作搞好。周總理說，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革命行動很好。（總理也沒用「奪權」二字。）周總理說，確實現在各級領導當中堅持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繼續抵抗，用新形式進行反撲，破壞文化大革命，他們起初是抓生產壓革命，現在又在喊革命，破壞生產，實行經濟主義，實際上也就是修正主義。周總理也說新階段鬥爭進入關鍵時刻，

走向新的高潮，他們要進行新反撲，我們就要進攻，迎接新的高潮，這個高潮很廣很深，你們應該做精神準備。北京左派隊伍要整頓，聯合，討論，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聯合起來，整頓隊伍，是為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次講話，還是總理抓住要害。陳伯達講得很凶，罵陶鑄。毛主席那次講話是兩個題目，一個是陶鑄問題，另外講反對經濟主義。毛主席講的最新的東西他沒講。當然他也没說反對毛主席講話。他從來不記錄，講完了他記不住。這以後，毛主席對陳伯達很不滿意。文革小組有事時，實際上毛主席都找周總理。陳伯達說話沒有準，不着邊際。當然他說的也都對。江青講話也沒講毛主席決定發這些文件的意義。她罵陶鑄，罵呂正操，宣布打倒劉志堅，說軍委文革有問題都怪劉志堅，說劉志堅故意把矛頭引向元帥，自己躲在一邊，說元帥、副總理是好的，矛頭對着他們不對。上海奪權對全國的意義，祇有總理講，我沒有講，祇是念文件。十四日大會上，陳伯達講反了，把上海奪權說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的新形式，遭到毛主席批評。這次講的轉折點、新階段、自下而上奪權，過去我們也沒想到。

(三) 毛主席說奪黨權、政權、財權的本意和后果

毛主席的想法，是全面奪權。評論員文章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明確提出奪黨權、政權、財權，而且分別講為什麼要奪這些權。

關於黨權，十四日陳伯達講話後，毛主席說：就是要奪他們的黨權。他們欺騙、蒙蔽、

壓制幹部黨員，使黨團員成爲他們的工具。他們要保他們的烏紗帽，他們是作官當老爺。他們拿手的是用紀律壓人，他們的紀律不是無產階級的紀律，是作爲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需要的紀律。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被歪曲成爲資產階級的紀律，成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紀律，歪曲成爲對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紀律，誰不聽他們就是反黨，就是違背紀律。這個紀律成爲束縛幹部、黨員的金箍咒。毛主席說，就是不要他們那個紀律。不對的東西不能服從，要有條件地服從，不是絕對的。你不對，你路走錯了，走反了，怎麼能服從？你不聽我的就是違背紀律。每一個直接上級的話都聽了，這行嗎？毛主席也想解決這問題，到死也沒有解決，到現在也沒有解決。過去毛主席說他不承認思想上要保持一致。當然大的方面應該一致，馬列主義思想要保持一致，具體政策上一致不可能，具體問題是充滿矛盾的，充滿不同意見的，新的意見層出不窮，常常是群衆有好多新東西，我們要把它集中起來，怎麼能一定要同你的文件過去規定的一致？情況變了，新的問題冒出來了，同你不一致了，就不行了，這怎麼行？階級鬥爭中，你站到對立面，我還能聽你的？新舊鬥爭中，你站到舊的方面，我一定聽你的？你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能聽嗎？新生事物同保守事物的鬥爭永遠存在，我不聽代表新生事物的思想，總結新的經驗，一定要聽舊的嗎？階級鬥爭到一定時期就不存在了，新舊鬥爭永遠存在。

毛主席當時提出意見，沒聽到有人反對。如果有不同意見，他也不是都不聽。

奪黨權他講得很多。他說就是要奪黨權。當然不是全部奪，還有黨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奪。

毛主席說政權，掌握在走資派手裏的部分政權也要奪。因為他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專政；不是鎮壓敵人，而是鎮壓群衆；不是鎮壓反革命，而是鎮壓革命。這政權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的。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觸犯了個別人利益，革命革到他們頭上，要革命的人一定要被打成反革命，這成了規律。不是要全部打倒他，祇是他不對的地方革掉，那就不行，就是反革命，就要抓你，他們可以隨便開除、監禁、戴帽子，挑動群衆鬥群衆，用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保衛自己的烏紗帽、地位和利益。

毛主席說，財權也要奪。不是說國家財權要由群衆革命組織來管。毛主席說的奪財權，是一小撮走資派掌握的部分財權要奪，中心是反對經濟主義問題。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總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跟緊急通告差不多是同時，十二日發的，同時發表的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社論，講得比較充分。從理論上講，毛主席為什麼支持上海革命造反組織、工人、學生、紅衛兵？因為他們提的中心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毛主席把它提到理論高度。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社論講的反對經濟主義的理論，認為經濟主義是採取經濟收買手段，適合少數落後群衆的心理，腐蝕群衆的革命意志，把政治鬥爭引到經濟主義的邪路，引導人們追求個人的暫時利益，要扼殺革命，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瓦解社會主義制度。他們

現在的經濟主義，直接破壞社會生產，破壞國民經濟，破壞社會主義所有制，提倡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動的性質。這種經濟主義成爲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的工具，作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發動者，把這問題提到這樣高度，表示支持群衆奪他們的權。這時中心口號是反對經濟主義，所以奪財權實際內容是反對經濟主義。這個經濟主義是作爲政治內容來提的。總的來說經濟主義是用資本主義自發性，代替無產階級的革命自覺性，用資產階級的極端民主化，代替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用資本主義所有制，代替社會主義所有制，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向無產階級革命路綫進行大反撲的新形式。所以，這次上海奪權，它的內容是從反對經濟主義作起，而中央也抓了反對經濟主義的問題，毛主席也抓了這個問題。奪權的這篇評論員文章就講的奪財權。

（四）大民主是無產階級性的嗎？

在這篇評論員文章中對上海的經驗作了敘述同總結，認爲上海工人階級發揮了領導作用同首創精神，體現了工人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第一個經驗是祇有奪權才能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保障無產階級大民主。（毛主席的思想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位任務是保障人民權利，不是鎮壓群衆，把人民打成反革命）。第二個經驗，無產階級大民主絕不是極端民主化，絕不是小團體主義，是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實行民主集中

制，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這樣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才能建立起革命新秩序。（講大民主的同時，講反對極端民主化，實行民主集中制。毛主席用很大精神抓這個問題，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極端民主化，反對小團體主義。）上海再一個經驗是，一定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一定要反對修正主義的經驗主義，政治上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自由化。對這些東西要進行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堅持社會主義的大方向，維護社會主義的所有制，這樣才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目的很鮮明，發動廣大革命群衆打垮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發展和維持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事業。其它是一般的。主要是正式提出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

奪權本身的問題我以後再說我自己的看法。我們中國每次大的運動都說是無產階級性質的，但是中國的社會基礎是小生產者、農民，是汪洋大海，革命隊伍長期被這種勢力包圍着，自己說是無產階級性質，實際上起來後還是帶着農民運動的性質。這種農民運動性質不但距離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很遠，甚至個別地方連現代資產階級性質都不如。我不隱蔽我的觀點，毛主席可能也不高興。毛主席自己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有些提法作法他闖了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那些提法當了語錄，如打倒在地再踏上一紙腳，戴高帽子游街，污辱人格等。我認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時是同黨內、國民黨的右派辯論，矯枉必須過正，種種提法根本不適合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工人階級

性質的運動。我當面跟毛主席說過。我說我認為當時作為辯論是可以的，但那種做法不能肯定，作為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運動，那些作法不對，不但搬到文化大革命中不對，當時就不對，不能提倡，那樣搞法結果非失敗不可。停留在農民自發起義、暴動的一些作法上，不能作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運動的作法。不要任何法律同政策，污辱人格，罰跪，戴高帽子游街，動不動槍斃人（槍斃人這一點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提倡。）當時就不對，這會喪失人心。我說了毛主席也許不高興，他也没有駁斥我。我在毛主席面前說話是比較多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就說到這裏。

（五）所謂「王力煽動奪權」

中紀委加給王力的罪狀有一條，說「一九六七年上海奪權後，王力接連煽動全面奪權。」當時我是黨中央宣傳組長，毛主席號召奪權，我沒有反對，其它也沒有一個人反對，中央領導核心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反對。說我「煽動」，這個詞不對。我是中央的宣傳組長，我當然要宣傳，宣傳黨中央毛主席的思想。這就叫「煽動」嗎？

具體罪狀是什麼呢？說「十一月十九日王力在人民日報講話，說一九四九年以來有些人變成資產階級，這次要徹底打破舊的機器，在一切部門，一切領域，凡是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的權，都要統統把它奪過來。」上面這段話不是我說的，是毛主席的話，而且就是他的原話，可以查得到。我祇是傳達而已。傳達毛主席的話，就叫「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嗎？毛

主席這思想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廣播第一張大字報時就有，而且不止一次地講。毛主席在十九日之前，十四日那次，或者晚一、兩天，除上述的話以外他還講（有檔案可查）：「垮了的單位，他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專政，這些單位的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現在已經開始創造，并將繼續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的新組織形式。」這是毛主席的話。我說的那些也是毛主席的話。毛主席的話我不能不向人民日報傳達嗎？當然要傳達，新華社廣播電臺都要傳達。我負責的部門都要傳達。這是我的工作，是中央交給我的任務。這不能叫「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六）周總理傳達的毛主席這段話后果很嚴重

這個觀點周總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又發展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傳達說（當然是傳達毛主席的）：「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呢？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該奪過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以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這也有檔案可查。這話我還沒說。我還祇是說：不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的權，要把它奪過來。周總理又進了一步，說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不是頑固堅持資反路線的，不能仔細分，奪過來再說。這當然是傳達毛主席的話。這些話老實說我不傳達，我給毛主席提過意見。我說這值得考慮，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奪過來再說。毛主席有些話臨時一想就

說了，傳達下去要闖大禍！

從這兩段話來看，中紀委不知怎麼搞的，我傳達的話還是比較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部分我沒有傳達，我還提了不同意見，為什麼周總理的傳達沒有事，我傳達的倒成了罪狀？他們沒有研究整個文化大革命情況，當時他們包括陳雲同志在內，有一些事情沒有參加，有一些情況不知道，也不同本人核對。我現在還認為，我向人民日報的傳達沒有錯。

（七）「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是從哪裏來的？

中紀委的審查報告還講，一月二日王力、陳伯達共同炮制人民日報社論，鼓吹「有了權就有了一切，要內外聯合，兩面夾攻，徹底粉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秩序」。這些話也是毛主席講話的重複。當時毛主席就是這麼講的，不過中紀委斷章取義，「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句話還有前後文，講的是政權，不是個人權力。前後文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而且「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句話也不是王力的發明，是林彪的名言，不少人都轉述過。林彪也是講政權，不是講個人的權。何況這篇社論不是我寫的，我根本不重視它，歷史上這篇社論也不是個重要文件，這是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人根據陳伯達在工人座談會上的講話整理出來的。人民日報歸我管，他們送給我看了。陳伯達這時調子也變了，口氣比評論員文章還凶。（當然從歷史來講不能忘記，他最初是不

贊成的。」這篇社論王力看過，陳伯達定稿，毛主席也看過，這也成了王力的罪狀，不是笑話嗎？社論也有新的地方，把「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作為毛主席語錄發表，打了引號，這過去沒有過。這篇文章經不起推敲，比如說：「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是奪權鬥爭，」這話不明確，一開始還不是奪權鬥爭。雖然文革初期也用奪權字樣，那是舊的奪權，是黨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中自上而下派工作組，改組下級黨委領導班子，不是上海一月開始的那種性質的奪權。這個社論沒有新的東西，就是提出了「大聯合」這個詞，根據毛主席指示作了解釋：大聯合要在奪權鬥爭中形成，必須旗幟鮮明，是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而不是亂七八糟的大雜燴。一方面不要采用折衷主義、改良主義辦法實行大聯合，另外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分裂主義的東西也不行，要統統打倒。最後說「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這是陳伯達喜歡的話。這篇東西不能算是奪權的綱領性文件。

三、奪權的綱領性文件——

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

奪權鬥爭引起了一系列矛盾，出現種種問題，發生了很多事件，我暫時都不來敘述。我繼續談毛主席當時的說法。在一月底，毛主席認為光有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不够，光號召奪權還不够，還要有綱領性的東西。他提出要用紅旗雜志名義寫一篇綱領性的東西，寫一篇綱領性的關於奪權的社論。這社論也是王力、關鋒寫的。這篇社論是根據毛主席一系列指示，根據他的思想寫的，許多是他的原話，祇是文字上作些加工、變動、補充。這篇社論題目叫《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作為奪權的綱領性文件，等於是中央的指示，發表在紅旗雜志第三期，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發表的，二日就廣播了這篇文章。

陳伯達送毛主席時也是寫：這是王力、關鋒同志為紅旗雜志寫的一篇文章，請主席審閱。

毛主席又批了「寫得很好，照發」。我說咱們三人一起署名吧！他說不行，我一個字也沒寫，不好說我參加寫的。

為什麼要寫這篇社論？毛主席認為，光有紅旗雜志號召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不够，好象光有五一六通知不够，還要有個十六條。光有號召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不行，還要有系統的論述同規定。所以要寫這篇社論。這篇社論不能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發下去，因為這時各級黨委已經大部癱瘓了，祇有用紅旗社論形式，直接同各級黨委、群衆組織、全國人民見面，這篇文章很重要，不能僅僅看成一篇文章，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上一個轉折點，一個新階段，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是決定性的綱領性的文件。

(一) 肯定上海奪權，并規定奪權的性質和目標

社論第一個問題是對上海發生的自下而上的奪權作了肯定。社論說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群衆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毛主席作了肯定。社論並且判斷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卷全國。社論說，一月革命毛主席立即堅決支持，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要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號召人民解放軍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這是毛主席親自決定，得到常委擴大會的通過的。這是在上海奪權後毛主席決定發的。歷史學家說毛主席是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沒有辦法了，祇好從他自己的幻想出發支持上海奪權，這不是的。在毛主席看來，當時形勢很好，認為形勢還要

很快地發展，發展得更好。上海的兩個文件，他決定發表的「緊急通告」和「綜合報道」，正合他的「貫思想」。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貫的想法很多人不那麼清楚，我也不完全清楚，也是逐步知道的。很多話是他一貫說的。這篇社論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社論把上海奪權鬥爭的性質做了規定。這也是毛主席的話，用文字表達出來的，說：「奪權同反奪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性質是敵我矛盾，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規定了這個性質，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認清大的方向，不要走錯路，要集中目標打擊敵人。這個敵人很少很少，但能量不小。」這有兩層意思：一個意思是，如果目標錯了，就站到敵人方面去了。不能把目標針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意思還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意思是不能亂轟一氣，不能擴大打擊面。從中央來講，不能把目標對着下列的人：不但不能對着毛主席、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也不能對着幾位副總理（除薄一波、陶鑄之外），不能對着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這意思有些在負責同志講話中講了，沒寫在社論上。還不能對着謝富治，不能對着葉劍英，不能對着聶榮臻、徐向前（但賀龍除外，一月份就不保賀龍了。賀龍是否是敵人也沒有說，沒表態。）還不能對着余秋里、谷牧。他們兩位主管工交、主管經濟，不能亂轟一氣。對上海的打倒對象，中央沒有明確表態。雖然支持上海奪權，但是對他們具體要打倒的對象，中央沒有明確表態。他們不承認曹荻秋為市長、市委書記，他們要毛主席、中央批准把曹荻秋罷

官，中央並沒有開口答應，祇是原則上、籠統地說目標對準敵人，不能對着自己，絕不能亂轟一氣。造反派也好，另一派也好，不要亂轟。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發表文匯報《革命造反有理萬歲》這文章時，紅旗雜志加了按語，駁斥了各種不支持群衆造反的借口，同時在這個社論中，也看出毛主席的精神。按語說：「有些負責人，他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但資產階級世界觀沒得到改造，或者還沒有改造好。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既不學習，又不接近群衆，因此他們直到今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于是他們就跟着瞎說什麼過頭了，太亂了，說革命精神是好的，具體作法不對，等等。應該向這些同志大喝一聲，這樣下去就要從不理解走到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同志極有必要讀一讀文匯報這篇文章，對照自己的思想，換換腦筋。希望這些同志趕快猛醒。」這差不多是毛主席的原話。這時上海叫曹荻秋監督勞動，叫中央罷曹荻秋的官，叫陳丕顯交代，可是上海究竟誰是敵人？毛主席沒有講。祇原則上講要打擊敵人。中央講了一大堆標兵，說不是敵人，至于上海，毛主席沒明確講誰是敵人。社論說如果繼續對抗，矛盾會從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須嚴格區別兩類性質的矛盾，絕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毛主席對我說過不止一次，說，「各省第一書記，再開代表大會時絕大多數還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後來九大的結果同毛主席的設想大不一樣。第一個問題把奪權鬥爭的目標規定的很清楚，要很少，敵人很少，是個別的，不要弄那麼多敵人。對陶鑄沒說是敵我矛盾。薄一波不

行，其它副總理、元帥都不能轟。有人以為毛主席碰得頭破血流了，不對。他這時還是很冷靜的。另外他想得太容易了，以為各省市負責人很快會站到群衆方面來，改變國家的組織形式。他想得太容易了。

(二) 毛主席說不怕亂並不是容忍無政府主義

社論第二個問題提出大聯合的問題，也是從支持上海奪權的第一天就講，一定要實行大聯合，這個大聯合就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整頓思想、整頓隊伍，加強無產階級組織性和紀律性，在奪權鬥爭中，每個組織、每個人都要克服自己頭腦裏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各種錯誤思想，克服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非組織觀點、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這些錯誤思想和做法。因為要實現大聯合，必須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大聯合，而不是大雜燴。各種妨礙大聯合的思想和行動，都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大聯合也是階級鬥爭，大聯合包括要解決新掌權的人思想中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當時毛主席就提出，以後又反復多次講，各種群衆組織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評，要掌握無產階級自我批評這個武器，不要互相攻擊，革命隊伍造反派內部這些人，他們自己的錯誤思想和行動如果發展下去，也可能從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也可能成為人民的敵人。革命群衆組織奪回了某些權力以後，他們本身地位發生了變化，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很容易發作起

來，毛主席看到了這一點。毛主席一直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很難解決。剛大富奪權後馬上變了，秘書也有了，亂花錢。直到去年六四都有這問題，吾爾開希也是這樣。毛主席也考慮這些人掌權以後是否一定比原來的好？不一定。但他還是寄希望于新的人，也寄希望于老的人能够改。毛主席認為我們十七年以來脫離群衆，有鴻溝，弄不好就要成為人民的對立面，成為人民的敵人。他寄希望于經過這個大的革命，老的人能改好，新的人一開始就要解決思想問題，不要學老樣子。每一個人都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要觸及靈魂，要節約鬧革命，不要亂花錢。也提出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毛主席在奪權鬥爭、奪權與掌權的問題上的這些思想是不錯的。可惜文化大革命採取這樣的方法，使這些思想並沒有實現。有些掌權的人比原來的人更差。

在這裏插一個事：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就提出群衆組織的學生要受軍訓，提倡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唱這個歌。上海奪權後，毛主席決定發發表古田會議決議，即《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叫人民日報加了編者按。古田會議決議的性質就是把農民起義組織起來的隊伍，農民武裝，還有舊的軍隊參加起義帶來的軍閥作風和思想，要把它改造成無產階級的軍隊，糾正種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把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改造成無產階級隊伍。我至今還這樣看，中國百分之九十是農村。同舊的生產方式相聯系，這樣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上產生的上層建築，必然要帶着農民運動性質，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質。即使解放後，祇要不把

這個根子挖掉，使廣大的農村同現代化生產相聯系，變成社會化生產，那麼不但農村會出現這些問題，城市也和鄉村分不開，也勢必實質上變為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也就是資產階級性的，甚至帶封建性的東西，變成這樣的自發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可悲之處，毛主席的想法沒有實現，也不能得到實現，某種意義上說，自發性的程度超過了過去舊的領導狀態。舊的領導總有幾十年的歷史，解放軍也有幾十年的歷史，這些都不要，另外來一套，而且是幾億人的行動，任何高明的馬列主義者、領導人，本人馬列主義水平不管多麼高，這運動性質他必然無法控制，成為小資產階級農民的自發性的運動，誰也控制不了。有些話說歸說，都不能實行。我認為至今也沒解決這問題。現在，沒有一個人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祇是說毛主席晚年錯了，周圍有一幫壞人，幾億人就都發瘋了，這叫什麼教訓？這樣就會繼續重復過去的東西，不能從沉痛的教訓中真正得到益處。徹底否定很容易，那就不用總結了。這是血的教訓，根本沒有總結。這種自發的運動，人民公社、大躍進，能叫無產階級性的革命運動嗎？不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幾億人起來了，毛主席自己主觀願望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這些群衆組織的隊伍，改造每個人的靈魂，變成無產階級的隊伍，為什麼不能達到目的？因為中國沒有根本解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同舊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同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這樣一個生產方式和社會基礎，它沒得到根本改造，在這基礎上發動的運動規模越大，毛病就越大，付出的代價也越大。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文

化大革命以後並沒有認真總結。古田會議決議在歷史上起了作用，把工農紅軍從農民起義、農民組織的隊伍，改造為無產階級的軍隊，這點實現了。否則中國革命不能勝利。中國革命勝利證明，這決議在歷史上起了作用，達到把農民軍隊改造為無產階級軍隊的目的。但是，那時改造農民軍隊時所進行的革命戰爭、革命本身，還是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的，他的任務本身就一定有局限性。這隊伍本身不可能就是徹底的無產階級化的軍隊，還是以農民運動為基礎的革命運動。把那時所提的問題，所解決的問題放到社會主義社會，放到革命勝利以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光用舊文件解決不了新問題。反復地講也很難實現。

第二件事，也是毛主席的決定。毛主席找了我，說首都紅衛兵三司的小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打倒私字，實現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毛主席說這文章寫得很好，要我查清是誰寫的。我查了告訴了毛主席，是孟繁華。毛主席說，「我知道，我還看到小報上他署名的關於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語錄。」他說你一定把他找到，跟他談一談，把他放到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要輸送一些新鮮血液。這件事主席要我負責，我要人民日報具體辦，調二十幾個象孟繁華這樣的能夠獨立思考的人，來充實人民日報編輯部。

這裏再倒敘一下人民日報的情況。在上海文匯報事件發生後，北京的紅衛兵造反組織也包圍了人民日報，要接管人民日報。毛主席派我去，我約着關鋒去到人民日報。我們說人民

日報不能接管，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毛主席領導的，中央宣傳組直接領導的，組長是王力。不能接管人民日報，造反派要同人民日報配合。我召集他們講話，根據毛主席指示，造反組織可以派聯絡員駐人民日報，加強人民日報編輯部同革命群衆組織之間的聯繫。毛主席說，也可把紅衛兵中有寫作能力的人留幾個在編輯部，讓他們寫點東西。毛主席說紅衛兵寫的東西好看，人民日報不好看。當時留了幾個人，有北航的吳介之，那時是北航的研究生。孟繁華一去就跟吳介之合作，寫一篇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毛主席原來就講過，北京日報可以公開批判，人民日報不能公開批判。因為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報，過去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作鬥爭，所有文章都是用人民日報同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發表的。人民日報不能批，祇能換人，加人。吳冷西換成唐平鑄，着重要加新人。人民日報用換人、加人辦法來改變面貌，不能批判，不能接管。人民日報要同群衆造反組織建立直接聯繫，調孟繁華，在毛主席作為一件大事，因為孟繁華反對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極端民主化。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正在進行兩種奪權鬥爭，革命造反派不僅要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權，而且必須奪自己頭腦裏資產階級思想的權。整個精神是，如果不奪頭腦裏私字的權，不打倒頭腦裏的私字，就不能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祇有奪了我們頭腦裏資產階級思想的權，讓毛澤東思想占領陣地，才能形成浩浩蕩蕩、步調一致的堅強的革命隊伍。否則即使奪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也不能鞏固。這是紅旗雜志編者按的話，也就是毛主席的

話。精神的東西要轉變為物質的東西。腦子裏帶着私字去奪權，即使奪了，這個權也會蛻變成資產階級的政權。編者按是毛主席的思想。至今還是如此。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個人的權、錢，你說這是什麼性質的權？紅旗雜志編者按說，當前奪權鬥爭中革命造反派隊伍中暴露出來的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非組織觀念、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主觀主義，這些錯誤傾向，總的根子就是私字。打倒私字這口號提得深刻、及時、說到了問題的根本。編者按語說，要打倒私字，必須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當前要學古田會議決議，反對自由主義，加上老三篇，這就成為老五篇。學習毛主席著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應該切實學好。借口鬥爭緊張放鬆學習是完全錯誤的，要立即糾正。必須在自己靈魂深處鬧革命，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開展嚴肅的批評自我批評，實行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改造世界觀，全心全意為工農服務。在一定意義上，一定條件下，革命隊伍主觀世界的改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過去我們不整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就不會勝利。現在革命隊伍如果不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整風，不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我們也不能達到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大聯合，也不能實現奪權，或者奪了權也不能鞏固，奪了權還會變。所以現在有人把奪權鬥爭說成亂來一通，那不是的。說奪權是因為毛主席走投無路了，突然心血來潮，發神經病，不是的。他是想搞好，在大聯合的基礎上才能奪權，不是在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基礎上，不是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各種錯誤傾向的汪洋大海的基礎上能夠實現大聯合。掌握權力的人，

站在大聯合主導地位的人，首先自己要整風，要改造自己。同時，對待有不同意見的群衆和群衆組織要採取團結的方針，爭取大多數，而不能排斥大多數。這樣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敵人，也才有利于建立無產階級的新秩序。毛主席是說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但據我同毛主席接觸的時期中了解，他所謂天下大亂并不是瞎來一通，并不是所有的亂他都高興。他是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新秩序，大聯合要在無產階級思想基礎上。無產階級新秩序不是資產階級的秩序，不是對群衆實行鎮壓的秩序，束縛群衆這也不能動，那也不能動，不許人家說話，一定要聽我的，反對我就是反黨，就是違背下級服從上級。這種紀律不要，這種秩序不要。表面上鴉雀無聲，誰也不吭氣，這叫不亂？比亂一點還壞。到處聽不到不同聲音，表面上不亂，不如把這種秩序改成亂，亂它一下，以後還是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最新秩序，新的基礎上的新秩序。可惜他老人家最後沒看到這種新秩序。在大聯合和奪權中每個人都要經受新的考驗，特別是新掌權的人要警惕，不要做歷史舞臺上曇花一現的人物。毛主席關於大聯合的問題從原則上講、從理論上講并不錯，它本身是要防止政權變質，防止當時所謂復辟，防止和平演變，防止糖衣炮彈打中。任何新掌權者都有這樣的危險。不當權也要改造，當權後不改造，後果要嚴重得多，對人民群衆的危害要嚴重得多。所以不能實現大聯合，就不能奪權，亂七八糟的大雜燴一概不批准奪權，不能承認它叫奪權。這篇綱領性的文章闡述了毛主席關於大聯合的理論思想同政策性的規定以及方法。

這些公開發表而且當時按這個來實現的東西，歷史學家認為不重要，認為小報才是歷史，那不行，這才是歷史。

(三) 解放後歷次大的政治運動都是極左

社論第三個問題是要足夠重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毛主席反對打倒一切，他說要重視革命幹部，他們是黨的寶貴財富，他們可以成為奪權鬥爭中的骨幹，可以成為奪權鬥爭的領導。群衆組織的領導人可以參加領導，但光靠他們領導還是不行的。像王洪文這些人不能領導革命。領導幹部是經過長期鬥爭的，有的人已經亮了相，有的人已公開表明站到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革命領導幹部願意而且已經同革命群衆結合，共同參加文化大革命，共同戰鬥，要相信他們。一定要分清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要分清他們執行的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認為祇要是當權派就一概不相信，這是不對的。上次講過，總理傳達主席的話說一下子分不清是什麼樣的當權派，奪過來再說。老實說，我當時不贊成，我沒有這樣傳達，我向毛主席提了意見，後來他還是接受了，還是講要分清領導幹部是執行資產階級路線還是執行無產階級路線。後來我又向他建議，祇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就行了，因為這是規定的敵我矛盾。不要再提「奪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因為他是執行的問題，他一時弄不清，不能就成了敵我矛盾。毛主席實際上同意了我的意見。所以這篇社論說，不分青紅皂白反對一切，排斥一切，打倒

一切，這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觀點的。革命群衆組織要支持革命領導幹部，他們鬥爭經驗比較豐富，他們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組織能力比較強，有他們參加核心領導，對於奪權和掌權都是十分有利的，要充分重視他們的作用。

對犯錯誤的幹部要正確對待，對他們不能一概打倒。這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他的語言。社論中下邊一句話是他親自加的：「祇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這句話在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中已經有了，而且是毛主席親自加的。這句話後來在所謂二月逆流時我寫的一篇《必須正確對待幹部》的社論中也寫了，影響很大，在討論時周總理親自念的，政治局一致通過，而且非常稱贊。他們特別重視毛主席這句話，其實毛主席并不是二月才說的，而是在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裏已經寫了，當時沒有引起特別重視，到二月才引起普遍重視，以為是那時才加的。

社論接着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黨的傳統政策。這話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難。在文化大革命中並沒有怎麼實行，我認為現在也沒有實行。對犯錯誤的幹部，甚至還不是幹部的人，都是採取懲辦主義方針，這不是毛主席的路線。把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祇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是左傾機會主義時代的方針。從蘇聯學來的就是這方針。我個人認為，從黨的全部歷史看，不管黨的領導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綫時期，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綫時期，在對待幹部問題上，對待人的處理上，一貫是左傾的。全部黨的歷史，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

打擊人方面並不右，也是左。立三路線是左的，組織路線上對人的打擊也是左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左傾路線時期，對幹部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主席正確領導時，雖採取整風運動的方法，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祇有很少一段時期實行過，馬上就來一個審幹運動，搶救運動，就不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了。這個方針在抗日戰爭時期各地區執行狀況不平衡。山東羅榮桓為首的山東分局執行得比較好，實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抵制了延安搶救運動經驗，中央派欽差大臣到山東，傳達延安搶救運動經驗，受到羅榮桓抵制。象羅榮桓這樣的馬列主義者，對毛主席思想體會最深的人實行了，有的地方沒實行。羅榮桓一走，正確方針也走了。饒漱石又整人了，從黎玉整起。饒漱石下車伊始就整人。即使毛主席正確領導時期，對幹部問題上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停留在口頭上，我個人認為，解放後沒有實行。黨內第一個大的鬥爭就是反高饒反黨聯盟，我認為這兩個人有毛病，應該批評，也不應當重用。但他們沒有集團。現在歷史已證明他們沒有集團。所謂高饒集團的人都證明不是集團，大多都重用了。被認為饒漱石集團的人也沒有了。不是集團了。集團都沒有了，怎麼「聯盟」還有呢？這問題至今沒有徹底平反。第二是反胡風集團，抓了不少老共產黨員，關在秦城，如劉雪葦、彭柏山，還有潘漢年、楊帆都關了。然後反右派，有一點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嗎？黨內搞了那麼多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後在特殊條件下才徹底平反。最後一個都沒有了，祇有三個頭子，後來，這三個頭子也不是了。開國大典電影中還有他

們。打得那麼凶，時間那麼長，最後一個都沒有了，還說基本正確，祇是擴大化的問題。如果基數是九十五，擴大到一百，這叫擴大化。如果基數是零，怎麼叫擴大化呢？怎麼不承認這是極左的組織路線、幹部政策，怎麼不總結經驗教訓呢？有一個老幹部叫陳沂，是軍委總政文化部長，當過東北野戰軍前線政治部副主任，後來當過四野後勤副政委，他被打成右派。堅持要把他打成右派的是彭德懷、譚政。後來他們倆都倒了，陳沂還是不能平反。陳沂打成右派我就不同意，我一直為他奔走，找過羅榮桓同志，我說，陳沂毛病是有，毛病擺到臉上。他不是右派，打他右派的材料我全看了，我認為不能成立。說他反對合作化，其實他就是說合作化搞得太快了，這不能說完全不對。而且我懷疑錄音有修改，前後銜接不起來。即使照那錄音，也構不成反對合作化。說他不贊成彭德懷要搞蘇聯的一套制度，他的意見可能對，後來也證明他的意見對。不能構成右派。毛主席講陳沂是極左，那倒有點象。剛說極左，兩天後怎麼又成了右派？羅榮桓同志說：我同意你的意見，陳沂不是右派，不過我也没有辦法，你也向中央同志講講，我也向中央同志講講，可能解決吧！我找了康生、彭真，他們不管。陳沂的夫人馬楠找了林彪，那時林彪已經代替彭德懷。林彪說：「應該平反，已經平反。」但是沒有平反，一直到右派都平反他才平反。大家明知道不是，但是已經做過結論的，就不能改。

徵前毖後治病救人，說了這麼多年，解放後沒有實行。上面舉的例子是陳沂，這事情看

起來好象不能理解，但就是明知不對也不解決，拖到最後全國右派一風吹，他才平反。再講我所接觸的有關單位的「右派」：當時我在中聯部，直接領導對外宣傳，我所領導的單位，業務歸我領導，就是對外宣傳的方針、政策、作法，這些由中聯部負責，主要負責是王稼祥同志，直接管是我。方針是我們定的，日常工作是我領導的。這些單位行政上、黨的關係是歸中宣部管。反右派也歸中宣部管。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如新華社對外部主任王飛；廣播電臺副臺長、廣播事業局副局長、負責對外宣傳的溫濟澤（從延安創建廣播電臺就有他）；外文出版社社長兼《人民中國》總編輯吳文濤；人民畫報總編輯李千峰；中蘇友好雜志總編輯莊方，無一幸免，全部被打成右派。還有一個北京周報總編輯楊承芳，幾乎被打成右派。這說明打右派的面相當廣，中宣部搞得是相當左。馮雪峰、丁玲、陳企霞都被打成右派。歸我領導的這些單位負責人全部都被打成右派。我到處講，向中央同志講，我說這沒有道理，我所領導的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執行的是中聯部確定的方針，即對外宣傳方針不同于對國內的方針，要能為外國讀者接受，不能板起面孔講大道理，要多講一點知識性趣味性的東西，來宣傳中國，這個方針我至今認為是對的。如果因為執行這方針成為右派，那首先我應該是右派。我跟胡喬木談，那時他是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宣部副部長。他說完全同意我的意見，特別溫濟澤，他說他絕不是右派。可是一點用沒有，跟誰說也沒用，陸定一同志、周揚同志，上面有中直黨委，打右派有指標，書記處雖沒有指標，有總的精神。我很尊敬中聯部黨委書記、老

副部長李初梨，是位老同志，創造社的，他有獨立見解，不隨聲附和。魯迅是值得尊敬的，但并不是完人，不能把他神化。并不是魯迅都對，創造社都不對。李初梨是創造社的，他有他的見解。在反右派時上面要指標，他頂了，要打幾個處長以上的右派，他說中聯部就是一個沒有。

反右派開始我就寫了兩篇重要文章，成了全國學習的，一篇叫《論社會主義的內行》，批羅隆基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我至今不認為這篇文章是錯的。我說，三百六十行很多，今天中國總起來是兩大行，社會主義一行，資本主義一行。講到專業，如果讓梅蘭芳來領導京劇運動，不行。專業分得很細，任何一個人對其它專業來講都是外行。這篇文章黨中央很欣賞，青年團正式下通知叫大家學習。還有篇叫《駁黨天下》，駁儲安平的「黨天下」，主要就是說要堅持黨的領導。

後來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定為敵我矛盾，政治上歧視打擊，馬上成為另一種人，好象不是正式中國公民了。這樣意義上的右派，我認為確實一個也沒有。但是，主張按資產階級的一套搞的，主張不要共產黨的，不能說沒有，這個爭論不能說沒有。這個爭論並不奇怪，這個爭論並不都是錯的，還要繼續爭論下去。過去爭論，反右派時爭論，文化大革命不但爭論，還有超過爭論範圍的搞法，這種爭論還很長。反右派鬥爭中的所謂右派分子，可以說一個也沒有，後來都平反了。但作為思想鬥爭是長期存在的，不能說這個爭論不必要。人家不

是這個思想，硬說成這個思想，這是錯了；另外，他就有這思想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以爭論。有的人說不服他，可以讓他把他的思想帶到棺材裏去。我們共產黨的確沒有搞好，我們自己對社會主義理論知道的也不多，在實踐上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區別得很清楚的更不多，這些東西完全可以討論。資本主義的東西也不是都壞，沒有資本主義也就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好多好東西，對資本主義全盤否定，那就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我們始終沒把這問題搞清楚。

我爲他們奔走，誰都同意我的意見，但一個也沒能解決問題，非說他們就是右派。我的奔走祇解决了一個人的問題，就是山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王卓如，他在山東渤海區黨委當過書記（區黨委相當省級），我在區黨委當過宣傳部長，我們一起共過事。山東把他打成右派，我向當時中監委書記王從吾談，王從吾是王卓如的叔叔，他了解王卓如，自己不好說，我講了對王卓如的看法，王卓如平反了。那是因爲有王從吾。一般說王從吾也沒有這能力解決，不知還有什麼原因，王卓如問題解決了。反右派我們黨二十三年才解决。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一風吹了，如果沒這個條件，明知不對也不解决。陳伯村同志被打成高崗反黨集團，本來定了高崗的五虎大將，說是還不够，把他湊了個數。他是很老很負責的幹部，大革命以後不久就參加革命。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復旦大學負責，在延安時期他是中組部的幹部，跟陳雲同志一起，是陳雲直接領導下的，後來當過東北局的組織部副部長，陳雲也在東北局。後

來東北局書記是高崗，反高崗集團時打了五個人，說是還不够，把他湊上。這個人很正派，沒有開除黨籍，所謂高崗反黨集團的人都沒開除黨籍。他原來是行政六級，降了一級，控制使用，一直是水利部的副部長。這些對幹部的作法是不合適的。後來控制使用取消了。直到很晚，幾年以前，才恢復原級別，按正部長待遇，但絕不能說搞錯了，不說平反。

這種作法到今天還是如此，究竟為什麼？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作法，為什麼不否定？一些教訓為什麼不總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文化大革命中也那麼講，結果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個教訓為什麼不總結？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對這些不否定？我根據毛主席思想寫的社論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也寫了，當時並沒有系統思索這問題。但當時看到的實際情形不是如此，難以實行。當然，說比不說強，但說了用處不大，因為光是這兩句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毛主席還說得更清楚了點，便是沒有界限，沒有具體規定。我們常常是提出一個政策，但沒有把它具體化，祇有個口號，沒有具體政策。教訓在哪裏？就是我們把不同性質的問題混到一塊。

一類問題是法律問題，應該不屬於黨內具體管，誰犯法就法辦，按照法律懲辦，不管你職務多麼高，不管你出身多麼高貴，誰的兒子、孫子，不管你過去有多大的功，不管你對人民曾經有多大貢獻，你犯法就按法律懲辦。這是一種性質的問題。我們把它混起來了，現在

犯法的事也弄到黨內，也由中紀委管，那根本不對。犯法是政府部門、公安部門、檢察部門、人民法院的事，這些部門歸共產黨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方針政策的領導，但不是把每個黨員犯法的問題都先在黨內討論，並且由黨內做出判決，交政府部門執行，這不對。犯法就應偵察、起訴、審判，你也可以辯護。相反的，黨內問題為什麼變成法律問題？黨內問題不管是哪種性質的，祇要不犯法，你不能隨便抓、關、隔離、拘留。這不僅是混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問題，而且混淆了法律問題、行政紀律問題和黨的紀律問題，甚至是思想問題。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要採取不同的處理手段，即使是敵我矛盾，不一定都犯法，都要法辦。教訓就在這裏。

第二類的問題是紀律問題。黨內問題，要看是不是違背黨的紀律？違背黨紀要受到黨紀處分，如果不屬於黨紀範圍，不是黨的紀律問題，就不應歸中紀委管。黨的紀律應有具體規定，沒有紀律黨就散了。違背黨的紀律不行。

第三類問題是日常工作中的問題。工作中的錯誤，也有不同性質。有的是路線性的錯誤，祇要是做工作的人，就要不斷犯錯誤，不犯錯誤的是那些不工作的人。錯誤不管什麼性質，即便是路線性的，祇要他不違背紀律，就不應該受到紀律處分。這些界限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劃分清楚，至今並沒有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不了解情況，看起來進步不大。有時領導上的路線錯了，人家執行了，他並沒有違反紀律。毛主席作為領導核心，並不是代表他

個人，是代表黨中央，人家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錯誤路線、政策，但沒有違背紀律，不能處分他。一定要叫他一輩子不得翻身，控制使用，這一套不好。不能團結大多數。過去叫專案組，現在叫中紀委，現在中紀委要整誰可能還有專案組，我不了解。

我們黨的歷史上掌管黨員紀律處分的部門，他的職能祇有懲辦的一面，而忘記了更重要的職能，應該是保護黨員的權利。就象專政機構，它的主要職能不是抓人，是保護人民的權利。不要忘記了它的主要職能是保護絕大多數，包括全體人員，以及非人民中守法的人也要保護，這是主要的一面。我們如果有強有力的紀律檢查部門，它的首要的職能應是保護黨員權利。我們現在祇有整人的組織，沒有保護人的組織，沒有辯護制度，沒有專職的爲黨員合法權利辯護的幹部，象律師一樣。律師爲犯法者、被告者辯護，黨內沒有，不許本人申辯，更沒有專門爲黨員權利而辯護的、保護黨員權利的職能部門同人員。這弊病很大，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專案組的形式極壞，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流毒，這確實是流毒，整人是流毒。現在似乎還認爲很香，似乎還有了某些發展，把政法同紀律合而爲一，就很成問題。專案組的形式現在怎樣，我不能作出科學結論，但我親身經歷的文化大革命中專門整人的專案組，有無限權力，這種東西或類似這種東西的存在，我認爲不僅影響黨的團結，而且影響到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性質會起變化。專門整人，黨靠這個來維系自己的話，黨的性質就成立了問題，成了馬克思主義所反對的密謀組織、道會門。黨的組織不是建立在保護黨員的權利

的基礎上，不是民主集中制的黨。在這問題上我們屢次犯錯誤，屢次不改正。文化大革命的這類的教訓還是不總結。

紅旗雜志社論這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字句上看都很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很好，如果真正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明確的界限，真正辦了，才能够象下面說的，使犯錯誤的本人心悅誠服，才能使革命派得到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才能使自己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派立于不敗之地，否則是很危險的。是很危險，因為打倒的人太多，毛主席也看到了，毛主席也不高興。毛主席的悲劇也在這裏。

幹部問題，除領導幹部外還要重視一般幹部，要相信他們絕大多數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絕對不能忽視，要團結他們，使一般幹部都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要奪權不能離開他們。後來，我打倒了，看到九大文件，沒實現毛主席的設想，即絕大多數省市委負責人都留在中央委員會。絕大多數都被排斥了。毛主席在紅旗社論中的願望沒有實現。毛主席要勸他們立新功，不要躺在過去的成績上，自以爲了不起。不要輕視革命小將，輕視年輕的幹部。不要終身制，要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後浪推前浪。這些道理至今也還對。

(四) 第一次公布毛澤東關於在文革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理論

社論第四個問題，講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毛主席認爲這次奪權鬥爭，不是自上而下的撤換和改組，而是毛主席主張的自下而上的運動。毛主席感覺到每次改革改組都不行，四清那

麼大的運動也沒有解決問題，他認為祇有自下而上由群衆自己選擇、撤換、改組，這樣才能使黨和國家領導機關、企業事業單位、文化團體同學校煥然一新，才能徹底清除資產階級的東西。毛主席想動這麼大的手術，把領導機關從中央到下面重新搞，氣魄很大，可是後果相當嚴重。在紅旗社論中已提出三結合的思想，沒有這個詞，祇講臨時權力機構要由三方面組成：一是革命群衆組織負責人，一是當地駐軍的負責人，再一個是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要放手讓群衆起來，但不是祇讓他們去搞，三個方面要結合起來。革命領導幹部是主要領導核心，負主要責任，這是有繼承性的。這樣的臨時權力機構，抓革命、促生產都由他領導。同時也是專政機關。這不是幻想，是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的，建立新的、臨時權力機構作為過渡，然後再發揚群衆的智慧，創造建立更加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嶄新的政權組織形式。他的設想沒有實現，也可以說失敗了。他的理論是在這一篇文章裏公開講了，這就是：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長期盤踞的、爛掉了的一些單位，他們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專政，這些單位的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國家機器的原則。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無產階級絕不能接受資產階級的現成的國家機器，而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偉大的真理。既然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踞的一些單位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機構，我們當然不能把它現成地接收過來，不能採取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

徹底打碎。這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的理論。這個對不對呢？我當時沒有認為不對，沒有對他提出意見。可是，這同他過去對中國國家機器問題的分析不符合。他過去一直說中國不同于蘇聯，蘇聯是城市武裝起義一下子奪取了政權，不得不利用原來的國家機器，它建立新的蘇維埃政權，國家機關還得用原來那些人。中國不同，中國是長期革命戰爭打下的天下，長期就有同國民黨政權并存的對立的政權，有根據地，有解放區，原來就有新的國家機器。我們去接管政權，也留用了一些舊人員，但是以根據地的政權為主，吸收舊的留用人員，這是中國不同于蘇聯的一個重要特點。馬克思所講的國家機器是現成的、徹頭徹尾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蘇聯不能不更多地利用舊的國家機器。在這點上，我們優于蘇聯。蘇聯也不能說完全是舊的國家機器。這是毛主席過去一貫的論斷，但這次他下決心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不光從馬克思總結的經驗出發，他還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了馬克思的話還是一個偉大的真理。當時我本人從這意義上感到毛主席站得高，總結了蘇聯、東歐的經驗。他認為蘇聯、東歐是舊的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東歐一直沒有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掌握在修正主義者手裏，政權性質就會發生變化。他是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來總結的。現在看來當時把這個原則應用到中國是錯了，巴黎公社關於打碎國家機器的原則不適用於我國情況，不能採取這個原則。我們的國家機器不能說是舊的，就是部分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當時不能說它就是資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自己也再三講祇是一些單位、部分的，而實際奪權的結果不是部分的，而差不多是普遍的。實踐證明，這是錯了。也可以說把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原則當成教條，搬到中國來，後果很嚴重。他原來設想的目標是建立新的適合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家機器，不但沒有實現，後來發展的後果更加嚴重。但他的這種想法是不是都錯了呢？我覺得沒有都錯。打碎不對，改善是對的，改善就是改良，說不能採取改良主義是不對的。打碎才不對，無產階級專政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了，在這種條件下，國家機器不能打碎，不能采取暴力手段，不能採取暴力革命，應該採取改良主義。這個觀點并不是我的創造，是列寧講的。改良主義并不可怕，改良主義也是革命，是用改良主義的方法進行變革。改革這口號不錯。

社會主義制度要不斷自我完善，不斷地自我改革，自我變革，使上層建築適合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適合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但這完全責備毛主席也不公道，他本來也一直是採取改良的，後來他認為改良不行了。他說過去採取各種方法，想使黨和政府機構同群衆之間不要有一條鴻溝，不要成為人民的對立面，更不要成為人民的敵人，但什麼辦法都用過了，都不行。整風不行，一直到四清還不行，他才想到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辦法。在當時上海奪權，他認為已經開始創造、並將繼續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構新的組織形式。要尊重群衆的首创精神，大膽采用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來代替歷史上剝削階級的東西，代替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舊東西。因此，奪權絕不能僅僅是把權奪過來，而一切還按舊章程、按老規

矩辦事。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決定廣播北京大學大字報的那一天他就說，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當時他就說我們的國家機器要出現一種嶄新的組織形式，要打碎舊的東西，創造新形式，開創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新紀元。毛主席認為，中國這個新的國家機器形式的出現，將大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巴黎公社是失敗了，祇存在了七十二天，當時毛主席認為，列寧建立、創造的蘇維埃政權，到赫魯曉夫手裏已經失敗了，變了。巴黎公社被武裝鎮壓了，蘇維埃和平演變了。蘇維埃沒有被敵人所鎮壓，沒有被帝國主義包围所嚇倒，沒有被希特勒的進攻所滅亡，蘇維埃這種形式它有好的東西，值得學習和繼承，巴黎公社也有好的、值得繼承的東西。我們的國家機器也是學習的蘇維埃的經驗，沒用蘇維埃這個詞，在蘇區用了這個詞，後來沒有用，叫人民代表大會。我們根據中國特點，接受蘇維埃經驗，我們有解放區政權的底子，建立了新的國家機器，十七年了。從整體來說不能說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有人提出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批評了這種口號，他說祇能部分改善。毛主席這種思想是對的，但是，毛主席認為我們有部分的失敗，部分的權掌握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他們脫離群衆，他們和人民群衆對立，他們要搞修正主義的一套。毛主席認為這部分國家機器變了，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了。因此要部分改善。但最後結果不是部分，而是擴大化，擴大到差不多是整體。也不能說整體都打碎了，毛主席沒打碎，周總理沒打碎，國務院沒打碎，軍委沒打碎。在巴黎公社失敗、蘇維埃失敗的教訓的基本

礎上，要搞新的，創造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家機器。他這個錯不光是方法錯，理論也錯了。要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錯，但實際上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理運用到文化大革命中來，這錯了。很多嚴重後果來源于理論表達的錯誤。這點我也有責任，這方面理論表達主要是我寫的，他都很滿意，符合他的思想。理論上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理論上表達得不清楚、不對，用這理論作為運動的指導原則，它的後果是很大的。用打碎國家機器的理論來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是錯了，後果很嚴重。當時我作為他在理論上的助手，我也要負歷史上的責任。但是，說這就是我的罪狀，不對。中紀委引用我講打碎國家機器的話還沒有這個社論中毛主席講得那麼重，那麼清楚。毛主席的指導理論錯了，我只能用他的思想加以文字整理，又經過他審查、批準發表，這不能算我的罪狀，這同犯法一點關係沒有。中紀委沒有把這個社論列入我的罪狀，大概因為他們不知道，應該總結這個經驗教訓，不但要批評毛主席不對的地方，還要總結出他合理的、對的、至今值得警惕的地方。應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我認為過去的、也包括現在的領導人，祇要不是爲了私利，是爲了想把中國事情搞好，不管是錯不錯，錯到什麼程度，都不能作為個人的罪狀。

(五) 公安六條是毛主席要搞的

社論第五個問題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當時認爲，要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要搞大民主，也要無產階級專政。要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秩序，必

不可少的條件是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下面先插幾個問題：

第一是一月十三日公布的公安六條，也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這文件一月十三日正式發表，是在中央肯定上海奪權以後。但這文件的提出、起草不是在一月，而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就開始搞的。提出搞這文件是毛主席提的。現在歷史學家以為是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提的，不是。是毛主席提的，毛主席的思想是要保障革命群衆組織能够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障革命群衆不受鎮壓，保障文化大革命的進行，要搞幾條。當時有些公安部門還掌握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人手裏，他們抓人，到北京來抓人，毛主席很不高興。毛主席認為，他們还想搞白色恐怖的一套，不行。到上海奪權以後，覺得這文件必須馬上發，在發之前就由周總理、謝富治一月九日下午向在北京的公檢法的各地來的人宣讀了公安六條。謝富治念的，說還要中央最後決定。周總理說，還要經過主席批准。他相信中央會很快通過，發下去。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馬上討論，通過了。毛主席批了，一月十三日發下去了。這文件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運動。文件強調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衆的大民主。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須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採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另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是不錯的，至今還是應該兩

面，對敵人專政，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保證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還是要有秩序，不能亂來。

文件總的精神還是講兩面，一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一是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下面分幾條：

第一條，現行反革命行爲要依法懲辦。什麼叫現行反革命？這方面毛主席限制很嚴，不要擴大。要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毛主席講過幾次，放毒是指放毒藥，不是說怪話、說不好聽的話就是放毒。）搶劫、制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的機關、裏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懲辦。毛主席的想法限制很嚴。上面說的這些都是公認爲不能允許的，必須受法律制裁。但是這裏有個問題，「反革命分子」這個詞作爲法律概念不清楚。殺人、放火、放毒等都是刑事犯罪，怎麼都叫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概念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前就不清楚，因爲沒總結經驗，至今還不清楚。好好的一個人，有的還是負責幹部，明天就說是反革命分子，他犯的是哪條法律？現在法律上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這概念也不清楚。這個詞來源于文化大革命，沒有總結經驗教訓，而且列入法律。對我來說，我寫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毛主席直接領導、審查過的，因爲其中有奪權字句，就叫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這不是笑話嗎？毛主席把概念限制很嚴，但有個籠統的詞叫現行反革命分子。我頭一天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最高領導核心，第二天

就成了反革命，五一六頭子、公安六條本身是法律性的東西，上述種種行爲不允許，今後也不能允許。要依法懲辦，是對的。

第二條，現在有的歷史學家比較客觀地認爲第一條沒問題，問題出在第二條。其實第二條是被簡化了，說成是「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該逮捕法辦」。這一條討論時毛主席說，「批評我就是反革命嗎？我就不能批評嗎？」爲什麼他又同意了呢？因爲這上面還有限制詞，限制在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這樣子來攻擊誣蔑毛主席和林彪的才是反革命行爲。雖然有有限制詞，這一條確實不好。嚴重的是，毛主席批了認爲很好的、報上公開發表的上海市一月九日的緊急通知，把它更加簡單化了，成爲「凡是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生產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這個通知在前，公安六條在後，本應以後者爲準。但這個通知簡單明了，容易推廣，後患無窮。凡是反對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的就要逮捕，這個錯誤太嚴重了。這教訓至今也沒總結，還是動不動說人家是反革命，話說得不好聽就逮捕。爲什麼批評不得？毛主席自己也沒說他批評不得，批評就叫反對，就叫反革命行爲，這怎麼得了？據說全國打了一千萬「五一六」，就是因爲說人家反對周總理。其實人家並沒有反對周總理。後來發展到反對林彪、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等這些人都不行。這一條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性質、人民民主專

政性質的，用毛主席的話來說，這是法西斯。這教訓應該總結，這種提法、作法，不但違背了毛主席原來說的要保障人民的大民主，連小民主也不保障，提不得反對意見，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性質。這一點上是法西斯，是違背無產階級專政，違背人民民主專政的。這樣的教訓要總結，不然還要重犯。把保障人民民主變成鎮壓群衆、鎮壓不同意見，不許批評，誰批評就是反革命，打了一千萬「五一六」，至今不平反。一九七五年鄧小平說，最大的冤案是一「五一六」，但他的話沒有落實。後來他又被打倒了。

第三條，要保護革命群衆和革命群衆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衆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衆的都是違法行爲，一般的由黨政領導和革命群衆進行批評教育。那些打死人民群衆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這一條當時說起來沒有錯，但是有片面性，你認爲不是革命群衆組織，就不保護了嗎？就可以拘留毆打嗎？在這點上不應區別是否革命群衆組織，都應受到法律保護，都不應該去扣人打人。我們的法律常常美其名曰階級性，實際上是不公正性。革命群衆組織的人不能扣留毆打，你不承認是革命群衆組織的，難道就可以嗎？這種規定性成了片面性。中國解放後就把人分成兩種，一種好人，一種壞人，用兩種不同的法律標準對待，這實際上是封建性，而不是無產階級性。把你打入另冊，這難道是階級鬥爭嗎？難道按政治態度來劃分階級嗎？難道因爲政治思想問題就作爲不同的、對立的階級嗎？就作爲專政對象嗎？就應該在法律面前處于不平等地位嗎？這

在實際上必然成爲支持一派，打擊另一派的武器。

第四條，地富反壞右分子，還有一大串分子，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不許外出串連，不許混入革命群衆組織，不準背後操縱，更不準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懲辦。這是對的，因爲這是敵人。問題出在所謂地富反壞右本身，好多是搞錯了的，有的不是地主，不是富農。那麼多年了，還老把他當成敵人？反革命更沒有準，不是反革命你可以把他當成反革命。壞分子這個詞不那麼科學，概念不清，强奸犯就是强奸犯，搶劫犯就是搶劫犯，爲什麼籠統稱爲壞分子？右派一詞也不科學，現在一個右派也沒有，一九五七年打的右派，到文化大革命都十年了，怎麼還是右派？右派這個概念本身就不科學，不清楚。現在證明，當時那樣定性處理的右派，一個也沒有。中國人的習慣，運動來了就把認爲是敵人的人又弄出來鬥一番，這也是應該總結的經驗教訓。現在右派分子沒有了，地富也沒有了，反革命分子還有。解放後還不斷有帽子，三反分子、五反分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派、五一六、三種人……不斷的有。這些都不科學，要好好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還規定各種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也列入不許串連……等等的範圍。中國好株連家屬，這是封建性的東西。人有獨立人格，應看他本人如何，不能因爲是誰的家屬就怎麼樣。那時居然還有這個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怎麼成了個階層？人都有兩種可能，誰都可以教育好，怎麼他爸爸打倒了，他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完全荒謬。

絕倫。這些東西都經不起歷史考驗。

第五條，凡是利用大民主或其它手段散布反動言論，一般的，由革命群衆同他們進行鬥爭；嚴重的，公安部門和革命群衆相結合進行鬥爭，必要時酌情處理。動不動說人家是反動言論，這一條教訓要總結，千萬不能重複。輕的就鬥爭、重的就抓，究竟什麼叫反動言論？什麼叫反黨反社會主義？黨錯的地方可不可以反對？即使是對的地方，他反對錯了，也不能叫反動。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就不允許人說還有毛病？在發表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時，本來講話時沒有，發表時加了區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一）有利于團結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和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和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和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個團結。

這六條中最重要的是兩條，一個是社會主義道路，一個是黨的領導。提出這些標準是爲了幫助人們發展對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爲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六條政治標準可以做爲標準來衡量，反對也可以。是否不同意就叫反動言論，就要鬥爭你，嚴重的就要抓你？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沒有。特

別說明一點，商討六條標準時曾提出來，不能把馬列主義列入政治標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國家的指導思想，但是不能作為政治標準。你反對馬列主義就不允許，那不是。馬列主義有個世界觀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怕批評，歡迎批評，歡迎反對。馬克思主義是在別人批評和反對中發展的。實際上唯心主義者、非馬克思主義者，每人每天都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例如宗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可是我們保護信仰宗教，非得馬克思主義的話才準說，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話就不準說，那還有幾個人能說話？那就不用說話，也不用生活了。明顯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明顯的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好辦，但是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精神世界的問題，簡單的辦法不行，不能禁止，思想言論都不能禁止，也沒法禁止。所以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對的，必須的，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方面改革開放，中心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把中國從一個原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變成現代化的國家，這是中心，但四項基本原則每一項原則是不一樣的，不能籠統並列，不能籠統地要求每一個人。要求領導與要求群衆應該有區別。要求黨員和非黨員應該有區別。不能拿這個作為判斷你反動不反動的標準，不能輕易戴反動的帽子。這個應該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這是非常重要的教訓，不能籠統地說你是反動言論。如果他有明確的動機，用語言或行為表達出來，要推翻社會主義政權、社會主義制度，這叫反動、反革命，如果没有，他說我想社會主義社會某些地方不應該這樣搞

法，而應該是另外一種搞法，他就是反動嗎？他說資本主義還有些好的東西應該學，這叫反動嗎？如果他沒有一個動機、也沒有行動來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他說我覺得社會主義搞早了，經過一段資本主義階段更好一點，這意見我是不贊成的，但他說了，能不能叫反動言論呢？在一定的時期內，會有各種思潮泛濫，反動言論總是個別的，大多數錯的想法，不對的想法，不明確的想法，都不奇怪。有的甚至當時看來不對的思想，歷史又證明他的思想是對的。如果一律輕易地稱爲反動思想，那不好。應當很好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不要重複過去的錯誤。動不動戴反動言論的帽子，動不動抓人，這就是公安六條的教訓。

第六條，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衆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能鎮壓群衆，這是對的，但實行的結果也并不是如此。結果還是支持一派，鎮壓一派。誰掌權都祇保護支持自己的一派，鎮壓反對自己的一派。這些保證文化大革命的進行、保證奪權進行的綱領性的、專政性的文件，現在有的歷史學家光從文字表面上去分析，不了解當時背景和領導核心中的實際情況。這樣不能得出真正的歷史經驗教訓。

(六) 支左決定是毛主席指定王力起草的

公安六條發下去了，毛主席又提出，一月二十三日又發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叫「人民解放軍支左的決定」。他從奪權開始就想到必須要軍隊支持和參加。上次講，有的軍區大軍

區出現支持左派的情況，也有不支持左派的情況。這時還沒有明確提出三結合這正式的口號。但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實際上已提出三結合問題。毛主席一月二十三日在安徽省軍區的一個請示報告上批了。安徽請示是否可以派部隊警衛群衆組織批鬥第一書記李葆華的大會，毛主席在這報告上批了，是批給林彪的，說：「應該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衆。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幫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過去軍委緊急通知說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請酌。」就在這一天的下午，毛主席開了個小範圍的會，除幾位常委（包括林彪）還有部隊的葉劍英、徐向前，還有江青、我、肖華、楊成武。這個會上毛主席講部隊要支持革命左派群衆的問題。這會上他講的比給林彪的信更多一點，指出過去緊急通知的規定是不對的。大家沒發表不同意見。毛主席對我說：「你回去馬上起草一個指示，不經過任何人，直接送我，要馬上發。」我回去後馬上起草，送給毛主席，馬上就發了。一月二十三日就發了。毛主席要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四個名字。題目是《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群衆的決定》。文件的帽子說：現在奪權了，是新階段了，主要特點是革命派大聯合，向什麼什麼人奪權，是什麼性質的革命，然後講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在這場奪權鬥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一邊，堅決支持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簡稱「一支左」）。這個文件特別用文字的形式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這個概念。文件把毛主席對

安徽軍區指示的精神重說一遍，在更大範圍內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衆，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軍隊支持援助，都應該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該積極支持革命左派。下面有五條指示：

第一，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以及其它違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廢。（這是毛主席的話。緊急通知有這一條，要作廢。）

第二，要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衆的奪權鬥爭。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這一條後來發展了，不但支持，而且參加政權，成為三結合的一部分。）

第三，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這一條後果很嚴重。軍隊是個武裝集團，軍隊出來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們動武，軍隊要堅決還擊，這就弄不清究竟誰先開的槍，軍隊認為誰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群衆組織，說他們動武了，軍隊就可以開槍。）

第四，重申軍隊不得作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防空洞的指示。（以前已發過一個指示。因為地方有些材料交部隊保存，地方黨政機關不保險。所謂的走資派有的在部隊保護起來。這是對的。所有走資派差不多都兼部隊政

委，是他們原來的上級領導。不能做他們的防空洞，過去有指示，這次又重申不得作他們的防空洞。」

第五，在全軍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鬥爭的教育。這是說關於劉鄧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問題，要在全軍深入地進行教育。因爲部隊有些人搞不清楚，有些人搞不通。要教育，要弄清你究竟站在哪一邊，站到哪條路綫上，站在哪個階級一邊。

（七）支左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

我把毛主席講的主要的幾點，馬上整理出來，送毛主席，馬上就發了。這個指示中央規定要原原本本傳達到每一個解放軍戰士。這個指示，有沒有積極作用呢？有，不然就亂套了。在當時黨政機關已經癱瘓的情況之下，我們的政權還能運轉，毛主席的號令、黨中央的指示還能够執行，還能集中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支左是起了作用的。當時黨政機關癱瘓了，群衆組織是散的，這一派，那一派，即使是在左派占優勢的地方，它也是散的。毛主席自己說中國當時就象南北朝的樣子。他很喜歡看南北史，他也叫大家看，他說南北朝時亂得很，很有意思，今天這個上臺，明天那個上臺，上了臺沒幾天又下臺，有點象滿清政府剛剛推翻，國民黨還沒掌握全國政權之前的狀態，一會這個上臺，一會那個上臺，一會這個人掌握這個省，一會那個人掌握那個省。他說這個亂不怕，過去鐵板一塊不一定好，讓他亂一

陣。他說，這兩段歷史都值得一看。當然，不能永遠這樣。他說現在這個人上來表演一下，那個人上來表演一下，讓他亂一陣子。過去鐵板一塊，一輩子看不出問題。為什麼我們不怕？我們有軍隊，軍隊還得聽我們的。（聽中央、聽毛主席的，聽中央領導核心的。）他說軍隊同地方黨委不同，它是全國統一指揮的。全國範圍內要聽我軍委主席（毛主席）指揮。我不是代表個人，我是代表正確路線，代表黨中央的。我可以指揮軍隊。軍隊沒有地盤，省委他在一個地方待久了，他有地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本來也是外來的，待了十七年都是他，上下左右他說了算，他就是一個個獨立王國。軍隊沒有這個問題，他沒有地盤，要服從全國性的調動。我們的軍隊歷史又長，幾十年了，所以表面上讓他亂一陣，這個人表演一下，那個人表演一下，我們都可以觀察，都不怕。毛主席認為依靠軍隊發動文化大革命，依靠軍隊奪權，亂不怕，祇要軍隊站在毛主席一邊，聽毛主席指揮，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亂。他是說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實際上無產階級的天下並沒有亂，祇是亂了舊的、各地方的已被資產階級掌握的小天下，讓他去亂，亂了以後就不亂了。我們還有軍隊，可以穩定大的天下。這是他的一番道理。另外他認為軍隊的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這種組織形式，本身可以作為直接組成政權的一部分。新的政權組織形式可以參照軍隊的組織形式。另外人民軍隊的組織形式，在新的政權當中也要起變化。在舊的國家機器當中，人民軍隊的這種形式也能夠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舊國家機器的組織形式之下，人民軍

隊包括紅軍也好，解放軍也好，本來是人民武裝的一種形式，可是國家機器一旦被資產階級掌握了，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人民武裝也可以成爲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此，他從理論上來思考這個問題，他也敘述過這樣的理論觀點，就是：新的政權的組織形式要保證人民武裝不變質，人民解放軍不變質，保證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武裝，或者是武裝的人民。本來巴黎公社就有這個理論，列寧也設想過這樣的理論，毛主席建立人民武裝也一貫有這理論。軍隊本身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驗，保證軍隊永遠不變質。所以在五一六通知中他就親筆寫了：混入黨內、政府內、軍隊內以及什麼什麼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五一六通知開始，他就有這概念：軍隊當中也有很少一小撮，黨裏頭有，軍隊裏也有。他也認爲軍隊裏很少，另外軍隊中能起決定作用的，能使軍隊變質的，僅僅是上面，不像地方，從中央到基層都有。軍隊不是。他這思想後來不斷發展。本來認爲很少，就是軍區以上有，軍以下就沒有這個問題，沒有一小撮走資派的問題。省軍區以上有很少這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說一定要穩定軍隊。在當時情況下，是必須的，對穩定全國局面是必須的，對穩定我們的政權是必須的，在天下大亂的情況下，大的天下，掌握在共產黨手裏的天下，毛主席的指揮權得到保障，要靠軍隊，靠軍隊支左，靠軍隊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奪權鬥爭。沒有這個條件，就真的亂了套了。無產階級江山就不能保得住。所以，在當時情況下，積極作用是主要的，但是因爲整個文化大革命這樣搞法就不對，整個文

化大革命理論就不對，整個路線方針就不對，在這情況下，軍隊支左所產生的消極作用也很大，這歷史的教訓也是很嚴重的。當時不能不採取這樣的措施，這措施在當時起了作用，這一點任何時候也不能抹煞，但後患無窮。首先它違背了毛主席一貫反對的軍黨論，一貫反對的軍隊直接代替黨這樣的論點。這是重大原則問題，這樣實行的結果，勢必在各省、地方，用軍隊來代替黨，成了槍杆子指揮黨，不是黨指揮槍杆子，而是槍杆子指揮黨。其次對政權，不是政權指揮軍隊，而是軍隊指揮政權。本來政權的支柱是軍隊，軍隊是政權的工具，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軍隊應該在政權的指揮下。現在反過來了，是軍隊指揮政權，軍隊直接成為政權，雖然強調是三結合的政府，但不得不成為軍政府。黨、政、軍不分，使軍隊處于特殊地位，也就毀壞了、敗壞了軍隊。從建立中國式的無產階級軍隊開始，我們的綱領就是反對軍閥主義，反對軍隊突出于黨和蘇維埃政府之上。從古田會議開始反對的東西，現在成了合法的東西。誰處在這種地位上，誰也不以他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成為直接用武裝來代替黨、代替政權，指揮黨、指揮政權。這樣勢必走向毛主席本來主觀願望的反面。軍隊占有特殊的地位，結果從各方面敗壞了部隊，好房子歸他，好汽車歸他，好事都歸他，好的地位先給部隊。後來我打倒了，聽到這些事感到不可理解。黨中央的部可以隨便調一個人，只要是軍職幹部，不一定是正、副軍長、政委或者政治部主任，祇要是相當軍級的，都能領導黨中央的一個部。黨中央可以被軍隊接管。我很驚異。這是非常荒謬的作法。其實黨和政府

的部長，誰沒在軍隊幹過？中聯部老部長王稼祥就是紅軍時候的總政治部主任。國務院的部長絕大多數也在軍隊裏幹過。他們的水平、經驗，在軍隊裏的資歷，都不比後來的軍職幹部差。為什麼他們就不行，為什麼軍隊的幹部就行？軍隊大批人升官發財（當然發財沒現在嚴重），房子、汽車都歸他，家屬都成了北京戶口，這種事敗壞了人民解放軍的聲譽，破壞了人民解放軍的性質。這個消極影響的後果非常嚴重。軍隊處于特殊地位的這種論點同作法，這個教訓沒有總結，否定文化大革命時也沒有總結。這問題好象不敢碰，光講積極作用。

（八）毛主席提出支左，後來走向自己願望的反面，發展到要武裝左派，另建第二武裝

從實踐上來說，也違背了毛主席自己的願望，走到自己願望的反面。軍隊一旦在地方上或某個部門成爲主導地位以後，他直接用槍杆子指揮黨和政權，指揮一切，直接用槍杆子代替公、檢、法行使鎮壓敵人的職能時，往往甚至必然走到毛主席初衷的反面。軍隊的人并不比原來的第一書記好到哪裏去，并不比原來的所謂舊的黨政機構好到哪裏去。你作了支左的決定，但什麼叫左派，得由他定，誰擁護他就是革命左派，誰反對他就是反革命分子。因爲你賦予他鎮壓所謂反革命的職能。沒經過多久，毛主席就覺得部隊犯錯誤的人太多，他們也違背毛主席的意志。軍隊處在主導地位後，同樣違背毛主席的意志。什麼叫左派？什麼叫反革命分子？他們按照自己的分析、判斷，往往同毛主席認爲的左是相對立的，毛主席認爲是革命的，有的被他們認爲是反革命，毛主席認爲是保守派甚至右派的，他們認爲是左派。因

此相當普遍的，軍隊在支左以後不久，陸續地被毛主席認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又錯了，又不可靠了。（以後還要談。）

到我打倒之前（我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打倒的），八月四日，毛主席給江青寫信，江青把這封信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會上宣讀，叫大家抄下來，討論貫徹執行。在這封信中，毛主席已經形成這樣的概念：在這封信之前，林彪給毛主席一封信，說現在形勢很好，但群衆組織奪軍隊的槍，問題很嚴重，要採取措施制止。毛主席給江青的信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現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即師級）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因此當前的主要任務，第一是武裝左派的問題，決定發槍。在我打倒之前，毛主席已明確地有建立第二武裝的思想，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本來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武裝，現在好象不大够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裝，直接把所謂革命工人、革命學生武裝起來。這是更荒謬的理論。這些方面我沒有足夠材料。我總覺得這是很荒謬的，很錯誤的決策。所以對執行這個決策的人，我希望要從寬處理。因為他祇是執行的。我向中央建議過。這裏的經驗教訓要很好的總結。最大的教訓是任何時候不能槍指揮黨，槍杆子直接代替政權，槍杆子、部隊直接對被認為的反革命分子進行鎮壓，任何時候都不能這樣做。這是慘痛的流血的教訓。不接受這個教訓，後果會很嚴重。這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教訓之一。

中紀委的審查報告說我是「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發明人，這當然是亂說。首先我不知道

有一「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我那時養病，宣傳工作我不管。這口號從五一六通知就有，武漢事件以後爲了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就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是北京討論的，康生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准的，經過汪東興打電話給周總理，打電話給康生、周總理和康生傳達的，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定了調子後向宣傳部門說要用這口號。五一六通知就有這內容，是毛主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舉手通過的，這同文化大革命的總的方針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總的說錯了，這個當然也錯了，這不是主要的經驗教訓，主要教訓是支左，後來發展爲三支兩軍。支左決定是我起草的，雖然是根據毛主席意見起草的，我不能說一點不負責任。爲什麼不提意見呢？我沒有這個水平，也沒有預見到後來那些事。說是我的罪狀那不對，不過，我也要對歷史負責，絕對沒想到後果會這麼嚴重。後來發展到發槍，群衆組織造槍、修槍，成立第二武裝，是毛主席晚年最大的錯誤之一。現在沒有人知道支左指示是我起草的。因爲支左誰也不敢否定，所以也沒有作爲我的罪狀。

(九) 軍委八條命令主要是林彪根據支左決定提出和制定的

軍委八條命令是一月二十八日發表的，這是第三個關於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保衛奪權的文件。當時影響很大，它的基本精神還是毛主席關於支左精神的具體化。光有毛主席那個支左的簡單的五條不够，據我所知，主要是林彪覺得不够，認爲還應該具體一點。支左指示發了以後，林彪通過葉群來講，「不介入」不是林彪的意見，是劉志堅他們搞的。

(包括葉劍英在內)。這是葉群到文革小組來講的，想叫江青轉達給毛主席。葉群說林彪對毛主席的五條很擁護，但林彪認為還要講得更明白具體一點。我現在還不太理解，為什麼歷史學家把軍委八條說成好的，把十條說成是不好的。他們不知道背景。徐向前的回憶錄也把八條的制定歸功于他自己，好象是他發起的。我估計回憶錄不是他自己寫的，一定有個寫作班子寫的。歷史學家把八條說成那麼好，十條說成那麼壞，其實兩個文件都來源于支左決定。八條是緊接着支左決定，一個是二十三日，一個是二十八日。徐向前說二十四日他就要搞了，我不知道。我知道葉群是二十四日到文革小組講林彪的兩條意見，另外還說部隊不能亂。據我所知，八條命令是林彪口授的（後來十條也是他口授），徐向前回憶錄也說是林彪口授，徐向前在場，秘書整理，葉群參加整理，然後交軍委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肖華，經過他們。原來是七條。最後經過林彪、徐向前、葉劍英拿着文件到中央文革小組，說林彪要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七條的基本原則同五條一樣。第一條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基本精神和五條一樣，比五條在詞句上要嚴謹，加了「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另外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這在詞句上比那個嚴謹，但後來實踐證明，這一條後果很嚴重。由部隊出面，堅決採取專政措施，比那五條還更嚴重。五條說反革命組織如果

動武可以還擊，這個八條是主動採取專政措施。後來普遍對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的人採取專政措施，取締、抓人。這些嚴重後果徐向前回憶錄不回憶，歷史學家也不寫，這是嚴重問題。部隊可以宣布誰是反革命組織，可以抓，可以開槍、鎮壓。

第二條沒有什麼，規定一切人員要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生產、促工作，應該如此。

第三條，軍隊內部展開文化大革命的單位（軍以上及文化團體等）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或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罰跪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徐向前回憶錄和歷史學家強調這些「不允許」都對，這在當時沒有爭論，文革小組那些極左的人包括江青沒有一個人反對，毛主席也不允許。毛主席也明確說過：有人問：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罰跪叫不叫武鬥？毛主席明確說這就是武鬥，就不允許。我開始管宣傳工作以後，看到香港報紙上有王任重、曹荻秋戴高帽游街的照片，我拿着照片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不對，要通知所有的紅衛兵，一概不準用這些辦法，一概不準登報。因此關於八條規定的這些「不允許」是沒有爭論的，不但適用於部隊，也適用於地方。可惜不能貫徹執行。用文字形式、命令形式說「不允許」這在當時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特別是在一月奪權以後，要

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這幾個「不允許」有積極意義的。當然文字表達上有點問題，首先說不允許用對敵人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麼後面那些「不允許」就有了限制詞，對人民內部不允許，對敵人就允許嗎？你認為他是敵人，就可以允許那樣作嗎？

武鬥、文鬥是一個概念，敵我矛盾、內部矛盾要分清，又是一個概念。現在把兩個概念混起來說，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問題，把這帽子放到前面，後來才說「不允許」這樣，「不允許」那樣，那麼對待敵人就可以用這些方法嗎？應該是也不可以。它沒有講到即使對待敵人也「不允許」，這樣，就起不到禁止和「不允許」的作用。在那種亂的情況下，我說你是敵人，就可以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了。一系列「不允許」，是在這個「不允許」的前提之下，這命令也就無效了。不能起到「不允許」的作用。還是我不允許就不允許，我允許就允許。各個群衆組織，都可以認為他要打倒的對象是敵我矛盾，那就可以允許了。

第四條，對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問題，文件說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就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這也有同樣的問題。你認為他是反革命，衝擊了軍事機關就要追究，你認為他是左派，就沒有事。究竟什麼叫反革命組織，什麼叫左派？沒有標準。今後一律不許衝擊，在這點上毛主席是堅持的，不許衝擊。軍隊都衝亂了怎麼辦？

這個時期發的文件，都有這個問題。左派，無產階級革命派，沒有明確的標準，即使有標準，各人可以按自己的看法去劃分，要追究就追究。後來說大軍區普遍犯方向路線錯誤，都是在這問題上，你衝擊我，你就是反革命，就要追究。這個分別對待，很難劃個標準的情況下面的分別對待，還不如不分別對待，一律不許衝，過去衝的都不對，以後一律不許衝，這就比較容易掌握，不會發生後來那麼大的錯誤。我記不太清楚了，可能這個錯不是軍委錯的，在文革小組有爭論，最後是照文革小組的意見，首先是江青的意見定的。在文革小組討論時江青同徐向前、葉劍英有爭論。這一條，軍委原來的文件同後來修改的文件可以對照一下，不知能不能查到。

第六條，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衝擊，不準串連（這是絕對對的，沒有爭論），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這一點沒有爭論。）

第七條，軍以上機關應該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就是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利于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文化大革命。這一條文字上有點含糊，「軍以上」好象包括軍，其實不包括軍。這一點原則上也是毛主席定的。林彪堅持軍以下不搞，老帥們也堅持，這一點沒有人反對。幸虧有這一條，沒有這一條的話，我們這個部隊整個就亂了，就不成其為部隊了。實際上哪個

地方搞文化大革命，哪個地方就亂了，不能正常進行工作，那就打仗都不用打了，一旦國家有事怎麼辦？沒有這一條我們要亡國。這以上是領導機關，總還間接一些。另外還有軍委，軍委不亂。這一條對確保中國政權的鞏固，同保衛社會生產生活正常運轉，是非常重要的，否則人民民主專政、社會秩序就沒有保障。本來設想地委以下工廠企業農村都不搞，如果毛主席也堅持這一條，文化大革命的消極作用和惡果要輕得多，小得多。後來，工廠企業農村都搞了，毛主席認為不搞不行。幸而他把住了這一關，軍以下不搞，否則要亡國。

(十) 歷史學家把八條說得那麼好是不對的

這七條在文革小組通過了，討論時加了一條，就是教育幹部子女的問題。加了第八條，說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作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交給群衆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這是因為，這時幹部子女問題突出起來，北京聯動的問題爆發了，北京的聯動裏面有很多是部隊的高幹子女。所以特別加這一條。這是文革小組討論後加的。這時賀龍已經定了不保了，其他老師沒說不保，聶榮臻有些會已通知他參加，葉劍英、徐向前還在重要的掌權的崗位上。賀龍決定不保以後，叫我跟他的兒子賀鵬飛談話，因為傳說賀鵬飛要用車子撞死關鋒、戚本禹。他們的目標不是對着王力，是對着江青、陳伯達、關鋒、戚本禹。我不在專案組，整人的事我

不管。我很少出面講話，也不會講那些很凶的話。後來吳法憲的兒子、王宏坤的兒子，都是叫我談的。吳法憲對我還很感激，見了我老遠就打敬禮，說他的兒子犯了錯誤，王力同志同他談了話，還讓他參加中學紅代會的籌備組織。吳法憲那時暈頭轉向，他那單位開展文化大革命，他也首當其衝。幹部子女問題同我直接有關的，要我談話的是劉濤、賀鵬飛、吳法憲的兒子、王宏坤的兒子，都是叫我談的。要把幹部子女問題在命令中作爲一條，是在文革小組討論時加的。這一條不能說都不對，應該管教子女等等都對，犯法的應該交給公安部門，這到今天也對，但當時是不對的。它的背景就是把聯動作爲犯法分子交給公安部門處理。不能光看表面字句。表面字句，今天都對，甚至今天還特別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文字上無可非議，但不是文字問題，它的背景是聯動這樣的組織就叫反革命組織，就要交公安司法部門法辦，在當時具體情況下加這一條，特別把聯動交公安司法部門處理，是不對的。徐向前回憶錄以及歷史學家把八條說得那麼好，恐怕不合適。它是在總的不對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條件下執行毛主席支左決定，把有很嚴重後果的決定加以具體化，所以不能說那麼好。當然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作用，但是基本上沒有起多大作用，就因爲總的前提出對，加之許多概念不清楚，規定的那些「不允許」祇是對人民內部不允許，反過來說，對敵人就允許嗎？總的來說文化大革命是混淆敵我，把黨內問題當作敵人，對這樣的敵人難道就可以嗎？不能說這個文件就特別的好。我們現在常常是因爲參加起草文件或在起草文件

中起一定作用的人是好人，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如徐向前同志，他的回憶錄說是他參加或者他發起的，這文件就是好的。這不對。這離開了當時的歷史，也離開了後來的歷史發展。實際上這文件的作用，幾個「不允許」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它的作用主要在「採取專政措施」，不斷地採取措施，支持這一派，打擊另外一派，對它採取措施，然後又支持那一派，把另一派說成反革命，又採取專政措施，而且是軍隊直接採取的專政措施，後果的嚴重性和問題在這裏，不在詞句上幾個「不允許」。軍委的八條是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保護文化大革命，保護奪權鬥爭，保護所謂革命群衆組織，保護新的政權形式，把部隊變成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中直接執行專政職能的一部分。

這三個是最重要的文件，公安六條，支左決定，軍委八條，都是在紅旗社論之前發的，也就是社論中「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內容，所以我把它聯繫起來加以說明，說明它的背景、內容和後果。

(十一) 「聯動」和它的所謂后臺周榮鑫以及「聯動」的綱領

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是在紅旗三期社論中作為很重要的問題提出的。社論中宣布要把反革命組織、反革命分子、所謂牛鬼蛇神來一個掃除。說一批牛鬼蛇神跑出來，搞反革命組織，進行反革命活動，對這些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制裁。公開的提出兩個組織：一個叫中國工農紅旗軍，一個叫榮復軍（四川有榮復軍，黑龍

江奪權前部隊也鎮壓了榮復軍），還有一個叫「聯合行動委員會」，說他們名爲革命派，實則保守組織。宣布這些群衆組織是反動組織，說這些反動組織中的多數群衆是受蒙蔽的，是應該爭取教育的。對所謂一小撮頭頭，對這些反革命分子，要堅決實行專政。上面講的三個文件，特別是公安六條，說對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要採取專政措施。這個社論也公開點了幾個名作例子，要堅決實行專政。這個後果很嚴重，昨天還是革命組織，還有相當數量的群衆，今天就可以宣布爲反革命或反動組織，加以鎮壓。這種事情沒有斷過。自從這些文件的發布，這篇社論的公布，到所謂奪權，所謂成立新的國家機器（後來叫革命委員會），部隊直接參加政權，槍杆子直接成爲政權進行專政的一部分，從這時就不斷發生把一派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的問題。這裏特別講講「聯動」的問題。聯動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大約五日）正式成立的。他們是原來的老紅衛兵，其中很多是高幹子弟，他們是最早成立紅衛兵的。本來他們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夏天還是擁護的，到冬天，因爲對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進行了公開的批判鬥爭，把目標對準領導幹部，這種情況不能不影響到這些幹部的子女。他們的父母受到衝擊，在中國這個社會裏，父母受到衝擊必然影響到子女，影響到他們的優越地位。在十二月，毛主席已經有這樣的說法：這些群衆組織，這些紅衛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有的就反革命了。中央機關以及各省市黨政領導原來都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支持了紅衛兵。可是，在毛主席看來，有些紅衛兵就是堅持反動路線的人。

們對抗革命路線的工具，在十二月聯動正式成立以後，毛主席就做出上面這樣的判斷。十二月十六日，我記得是在工人體育館，在群衆大會上，江青突然點了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雍文濤的名。不知是什麼道理，我很不解。江青宣布周榮鑫、雍文濤是保守組織的後臺，意思是說他們是聯動的後臺，而且要周榮鑫、雍文濤到主席臺前面來，低頭認罪。這個作法我認為很不對，因為周榮鑫、雍文濤是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是總理委托他們代表總理接見紅衛兵，幫助紅衛兵的。他們支持了老紅衛兵，聯動成立後他們支持了聯動，給了些物質支持。江青點他們的名，這事情文革小組碰頭時沒有講，她根據什麼，不知道。我覺得非常不對。使周總理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如果說這個人是代表劉鄧的，那還情有可原，明明是國務院秘書長，是總理直接通過他們處理很多問題，不光是北京的，而且外地的紅衛兵的事務都通過周榮鑫處理。江青這種作法是非常不對的，使總理非常被動，而且變成目標對着總理了，這怎麼收場？當時我記得總理非常不高興，周榮鑫、雍文濤都不能工作了，總理沒辦法辦事了。總理把中央文革的人，還有一些人找到他那裏去，問：這是怎麼回事？怎麼辦？江青說，這兩個人就是支持保守派，總理不能用這兩個人，如果總理感到工作有困難，我可以要張春橋來當總理的助手，當國務院秘書長，來辦紅衛兵的事。總理說那我可不敢當。江青說，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總理覺得誰可以當總理的助手，處理紅衛兵問題，兼國務院秘書長，隨便挑一個都可以。總理說：「這再說吧！你事先也不打個招呼，周榮鑫、

雍文濤是否聯動的後臺，你也没弄清楚。」江青在大會上還罵了王任重是北京紅衛兵保守組織的後臺。不管從哪方面來講，江青這樣對待周榮鑫、雍文濤，間接使總理處于被動地位，這作法是非常不對的。而且莫明其妙，她是否有別的根據，我不知道。主席確有這思想：老紅衛兵起了變化，他們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群衆鬥群衆的新形式。但主席絕不會讓她去點名總理身邊的人。江青這種言論、行動當然更加激起聯動的孩子們不滿。這不滿有它對的地方，江青確實不對。這時候不光江青這篇講話，大概中央文革的人根據毛主席的觀點（就是說群衆組織有的變了，老紅衛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不不革命了，有的反革命了）在一些講話裏都這樣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聯動開第一次大會，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有北大附中的人，有石油附中的人，他們在會上宣布了一個「紅後代的宣言」，提出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言論。他們也接過這個詞，說要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爲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說江青太狂了；說要打一打關鋒、戚本禹，嚇一嚇陳伯達。這些孩子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的父母也沒真正反對文化大革命。可是，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抱着很大的優越感。形勢急轉直下的情況下，他們到各地看了，到處揪鬥革命老幹部。他們的反對意見，有一些是對的。但這些老紅衛兵過去就有優越感，現在受家庭株連，馬上地位變了，從天上掉到地下，有這

種情緒，又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當然就有了意見。本來他們的意見不能說不對，有的意見是對的，他們所反對的東西我看有不少是合理的。歷史後來也證明有些是合理的。可是，說他們覺悟就那麼高，也不是。說他們包含着合理成分的言論、行動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正確路線，就是反對中央文革某些人的錯誤路線，他們自己就那麼正確，也不能那麼說。

他們發表了一個綱領性文件，一個被毛主席很重視的通告。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發表的。這文件不能代表他們全體，是部分人的。我認為不能代表他們全體。因為聯動本身也不是嚴密組織。但是這文件毛主席重視了。他們公然用「中央黨政機關和各省市委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這個通告（當時十三級以上才算革幹）。這通告提出：（一）堅決、徹底、全面、幹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個主席（指毛主席、林彪）、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徹底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二）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產生的各種反動組織（就是造反派，特別是三司）。（三）堅決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的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曉夫分子。（四）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五）保衛黨的各級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這是他們的政治路線。

他們的組織路線是：（一）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總部、省市委幹部

子弟組成；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即地委、專區以下直到公社幹部子弟組成；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于其他家庭而政治上表現好的。他們的同盟軍包括人民解放軍的將士、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積極分子。這樣的組織路綫對不對？非常不對。這部分人（不一定是聯動全部成員）他們一開始就造反，組織紅衛兵，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們要掌握中國，代替他們的父母掌權，他們這種優越感到什麼程度？他們認為天下應該是他們的，他們是過去打天下的人民的子女，也就是八旗子弟，他們應該掌權。他們說原來的共產黨也不行了，共產黨員祇能是他們的同盟軍，你說這幼稚不幼稚？這種東西確實反動，是血統論，他們認為他們的血統優越。他不贊成老幹部被揪鬥是對的，前面說的他們的意見也有對的，可是要是他們掌了權，不知把中國搞成什麼樣子。毛主席講他們打死很多人。

他們的宣言還說，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忠于馬列主義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這就包括了大躍進、人民公社），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切行動指示。這個文件能說是好文件嗎？有的書上沒有全文引用這個文件，祇引了一句，即「忠于馬列主義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他引用這一句來證明聯動那時就看到毛主席晚年的錯誤。這歪曲到什麼程度？這整個的不能說是一個好文件，整個理論基礎是不對的，一點馬列主義也沒有。怎麼他爸爸打了天下，他就應該掌權？引那麼一句，證明

他們早就看出毛主席晚年的錯誤，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而且引的那句話本身也不對。大躍進不能肯定，人民公社也不能肯定。聯動他們掌了權以後，也是打人，殺人。現在有一些過去是聯動的人寫的文章，把聯動說得那麼好，有一篇通訊把聯動說得非常好，這也不對。聯動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應該否定聯動。破四舊也是瞎搞，沒徹底總結這些教訓。

聯動的通告還說要迎接大反攻的到來，說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不鬥爭必滅亡。說無數的革命前輩和黨員兄弟被圍攻、被拷打、被審訊、被迫害。許多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優秀戰士英勇地就義犧牲了，數以千計的黨的好兒子被監禁，被監視和失蹤，看了這些，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拿出來？說人民希望我們粉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罷工、停電、絕食、請願，向我們作出了優秀的榜樣。（聯動支持停產、停電、破壞交通，這樣的東西反映到毛主席那裏，加深了毛主席支持上海奪權的看法。）

聯動還說，我們莊嚴地向全人類和所有的敵人宣告，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流鮮血、受迫害，有何畏懼？我們是馬列主義，必然勝利。

聯動這些東西非常幼稚，不象是他們的父母指使的。它建立在反動血統論的基礎上，非常狂妄。聯動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無法無天，天下老子第一。這個文件當時不會在全國去發，他們的能量也有限，他們沒有掌握電臺等宣傳工具，祇能印一點散發張貼。這件事起了

相反作用，這些孩子把他自己置于同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相敵對的地位。這些人是高幹子弟，他們的父母當時被抓了，後來又放了，現在這些人又當權，所以歷史學家就說他們好。例如董老的兒子董良翮。另外，這些孩子還不懂事，連續衝擊公安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二十八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七日、十一日連續衝擊，不但要火燒謝富治，還喊劉少奇萬歲，打倒三司，油煎江青。說公安部執行的是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一月十日周總理接見紅衛兵時講：聯動造謠說毛主席不在北京，用這個來欺騙群衆。他們攻擊文革小組。總理說文革小組是主席的高級參謀，我們是支持擁護文革小組的，誰反對文革小組就逮捕他。這是針對聯動說的。因為聯動攻擊謝富治，江青就正式表態說：謝富治是好同志，以前我不了解，這一段工作很好。他是鄧小平的部下，第一個出來揭發鄧小平。他的缺點是弱一點、軟一點。他要抓人、鎮壓，手軟了一些。造謝富治反的是聯動，他們的頭目應當抓起來，他們基本上是西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這些人可以分化瓦解。對他們的小頭目，公開宣布要抓，總理也說要抓。因為他們的通告一發，又衝公安部，傳說他們要殺人，要專政。這些情況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講他們打死好多人。他們宣稱要用車撞死關鋒、戚本禹。一月中旬對聯動採取行動，抓了些人。一月十七日謝富治講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動，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要逮捕。北京開了一系列批判聯動的會。一月十七日工業學院附中，一月十九日石油學

院附中，二十一號各中學紅衛兵在北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的大會。公安部門到一零一中學，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二十五日到八一學校，到這些學校的所謂聯動據點，包圍、搜查、逮捕。逮捕聯動，把聯動定為反動組織，是同他們的行動分不開的，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說：這些頭頭不能讓他們自由行動，要集中起來，進行教育改造。陸定一的兒子也抓了。毛主席說過陸定一的兒子不好。那時他父母都沒有自由了，他沒人管，從原來的優越地位一下子流離失所，也不可能表現很好。那時對被打倒的子弟關心照顧不够，還淨說他不好。抓聯動當時沒有人反對。二月時有人說把這些孩子抓起來没有必要，這是聶榮臻回憶錄講的。他提出意見說孩子們要教育，不必關。有人說他這話是在懷仁堂會上講的，其實懷仁堂會議他沒有參加，不可能講，但我記得他是在另外會上講的。我向中央講過，他這意見是對的。對待聯動採取這樣鎮壓手段，我個人一直不積極擁護，總覺得聯動同其他反動組織性質不一樣，是屬於狂妄、血統論、優越感。另外是在他們的處境從天上掉到地下，在這種特殊環境下產生的一種思想，一種組織，或者原來的組織在一定條件下變了。是不是一定採取這種手段，對此我一直是不積極、懷疑的。聶榮臻提出的建議，我積極向毛主席反映過。聯動講文革小組某些人，沒提到王力。他們了解中央內部情況，多少了解王力，不象對待關鋒、戚本禹一樣。他們一開始造反就對王力比較佩服，對戚本禹瞧不起，說戚才多少級，他能有汽車嗎？他還不是坐王力的汽車嗎？這些觀點是不對的。毛主席要我同劉濤、賀鵬飛談

話，同許多人的兒子談話都是叫我去談。據謝富治講，當時公安部對聯動雖然抓了，還是採取教育方法，叫他們學習、檢討。毛主席叫他們學習，看文件，叫挑些文件給他們看。我不知道實際情況，沒去看過他們，可是我也相信。不管怎麼說，我當時沒有堅決反對，但不贊成關這些孩子。這些孩子很厲害，一般人同他說不通，他眼裏沒有幾個人。被關的有董老的兒子董良翮，我同他打過交道。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領着紅衛兵占領了共青團中央機關，中央要我去勸他們退出。當時中央機關還在正常運轉，他們佔了團中央，人家飯都沒法吃，文化大革命也沒法搞。我去同他談，怎麼講也講不通。講了一個頭午，才把他們勸離團中央。我到團中央就去了那麼一次。去年一些知識分子圍攻我時說我到團中央宣布罷胡耀邦的官，這完全是謠言，可是它登在人民日報上，你看荒唐不荒唐？真實情況是李富春去宣布的，我有什麼資格去宣布？有人說董良翮放出來後，董老說：「你是代我坐牢的。」我不相信董老會說這話。那時沒有人動董老。我接見的還有孔丹，四中的尖子，孔原的兒子。她媽媽是許明，總理的辦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自殺了。孔原那時是調查部部長，孔丹當時還是孩子，我覺得他不錯。抓住些歪道理，你要能講得過他才行。董良翮和孔丹都是尖子學校的尖子，很優秀的。我同他們談話很早，不是抓起來以後談的。

聯動抓起來後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才放。江青突然說要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這個江青，抓也是她宣布的，放也是她搶先。事先誰也不告訴，我們都不知道，總理也不知道。我

知道得稍早一點，因為她要我馬上把她署名的一個小冊子，叫「立新功」，是她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根據毛主席指示講的，講趙太後的故事。這小冊子要我準備二百份，她說放聯動時要每人發一本。江青把總理、中央文革的人請到人民大會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回事，江青對聯動的孩子們講，今天要你們回家，是主席決定的，你們表現不錯，回家繼續學習，參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隊，不要再站錯了。當場一片歡呼，孩子們熱泪盈眶，喊感謝江阿姨，毛主席萬歲。總理也講了話。江青拉攏人心，故意不告訴別人，好象放人都是她。現在歷史學家說這個會上大家都擁護周總理，罵江青，他們說的跟我見到的不一樣。我覺得江青不對，抓聯動是你，放聯動不是你。我建議過幾次，聶榮臻也講過，這都起了作用。放的時候你歸功自己。每人發一本書，有的人她還得親手發。這樣子才象江青的作法。她會演戲，她知道這些人的父母有的還沒有打倒，打倒的，毛主席也不是永遠打倒，打倒一下還要他上來。所以她才這樣做。對歷史的記載要真實，要作科學分析。

(十二) 伊林滌西的反對林彪的大字報

在聯動之前，十一月十五日，出現清華附中的伊林滌西貼大字報反對林彪。他們被抓了。當時抓他不對，但不能因為林彪後來壞了，伊林滌西就該肯定。他的基本論點是批判林彪的講話，認為林彪過份強調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性。他們說林彪強調國家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他們認為這不對，他們認為林彪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確方面，不需

要改進的方面。他們嫌林彪不够左，認為林彪沒有敏銳地感覺到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突出的問題是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他們認為黨和政府的組織形式需要極大的改變，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了，急需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歷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他們說，這些「沒有強大火力的摧毀，沒有強大炮轟的震撼，沒有高溫度的熔煉，能實現得了嗎？」他們的核心思想是批評林彪不够。這倒相當符合毛主席後來的思想，徹底打碎國家機器的不正確的思想。如果肯定伊林滌西，就應該肯定毛主席打碎國家機器的思想。你又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後來的思想，又要肯定伊林滌西，怎麼能自圓其說呢？祇能說抓他不對，因為林彪是不可以批評，大字報當時也是允許的，怎麼就抓他呢？這是不對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肯定伊林滌西的論點。他的理論是不對的。如果肯定伊林滌西觀點，就是林彪還不徹底，還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都舊了，要用強大火力來摧毀。如果肯定這觀點，亂轟一陣，就更壞了。但這不能叫反革命，這也是時代的產物。毛主席有那麼些觀點，可能他覺察到毛主席的觀點，覺察到林彪提的已經不夠了，不適合了，所以來批評林彪。如果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錯誤的理論觀點，那麼，伊林滌西的觀點不能肯定，不能因為他是反對林彪，就加以肯定。那就不總結歷史經驗了。

總而言之，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什麼叫反革命分子，什麼叫反動組織，什麼叫

反動言論，都不明確，動不動採取專政措施，甚至軍隊直接出面鎮壓群衆，這慘痛的血的教訓，應該很好總結，但沒有總結。

五個問題講完了，社論最後用毛主席的話作為結尾，是解放戰爭快勝利前的一段話：「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當時毛主席估計形勢說，現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相當于解放戰爭那個時候的形勢，要發動總攻擊，最後決戰了。軍隊向前進，是說奪權鬥爭，抓革命；生產長一寸，是說不能忘記促生產；還必須加強紀律性；這三條就保證革命無不勝。毛主席認為現在到了解放戰爭決定勝負的前夕，祇要一奪權，大家站到他這一邊，就沒有問題了。當然他的心還不踏實，還估計有兩種可能性，有失敗的可能，有勝利的可能。勝利在望了，在他看來向前進要努力，生產不能丟，最重要的要加強紀律性。

在他看來，這個決戰本來說搞三個月，後來說搞半年，後來說搞一年，半年以後他認為差不多，也許還要長一點，也許還要到一九六八年二、三月就沒問題了，但是還是要把失敗的可能性放到前頭，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時間他不斷改變，到我打倒時又說要三年了。

我們用這四句話結尾，他覺得很恰當，到了發動總攻擊的時候了，奪權鬥爭全面展開，幹部方面雖然各省核心領導絕大多數理解得還不多，但總覺得問題不大，會站到他這方面來。後來形勢發展同他原來的設想有很大差別。他不斷地說要從最壞的形勢去估計，但不斷地都把形勢估計得太好。不斷地說要看到最壞的可能，要準備失敗，要把形勢估計壞一點，

才能避免失敗，才能取得勝利，但每一次他都把形勢估計得太好，很樂觀。因此說毛主席走投無路，孤注一擲，被自己的幻想支配，不得不發動奪權，不是這樣。他還是不斷地作科學的分析估計。他認為主流的發展，是合乎實際的，合乎規律的，他認為原來革命的變成反革命，也是合乎規律的，原來作很高估計的老紅衛兵變了，最早的工人組織也變了，造反派剛上臺不久也變了，他們不行，不能當權。毛主席認為這都是合乎規律的，沒有什麼了不起。

四、毛主席進行兩條戰線的

斗争，既反右又反「左」

當時總的形勢是進攻，要爭取奪權勝利。這時期從毛主席一系列的想法、說法、作法看起來，他是在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右，又反對「左」。他歷史上領導每一次大的革命運動，都要注重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大的方向，大的鬥爭目標絕不能轉移，絕不能動

搖，不管是誰，妨礙了毛主席的革命運動大方向，他都不能容忍，他要達到的目標，誰也不能阻擋，誰也不能改變他，誰要去碰，都要碰頭。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得非常清楚。不管是誰妨礙他革命目標的實現，他絕不能妥協。誰在這個問題上動搖，也不行。模糊，也不行。他不是走投無路。他認為主流是好的，而且認為到了奪權的時候，已經看清了主流，中國人民是會而且已經擁護他這場大革命。那些模糊的、動搖的、還沒跟着他走的或者不積極的，他都認為右了。他要反對這些右的障礙。但他在堅決反對右的同時，一天也沒有忘記防左、反左。這是他的一貫思想：反右必出左，左必須防止，有左的出現必須反左，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革命才會勝利。但是防左反左他認為這是支流。當然支流也不能忽視，如果不注意支流，不注意防左反左，左也可能變成主要傾向，也可能影響、轉移大方向。

（一）炮打張春橋事件

關於毛主席的兩條戰線鬥爭，我講兩個例子：一個是反右，堅決貫徹革命目標的，就是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炮轟張春橋的事件。中央、毛主席支持上海奪權以後，上海搞得很熱鬧。在一月二十四日晚上，發生了一件被認為是很重要的事，就是群衆組織紅革會（以復旦大學紅衛兵為主的全市性紅衛兵組織），奪走了上海黨政機關的大印，市委市政府的二十三顆大印。這也是一種幼稚行為。二十五日紅革會發表了奪權通告。中央是支持上海各造反派組織，但他們還沒有建立全市性的權力機構，紅革會作為造反派中的一派，搶先奪權。他們認

爲奪了權就是掌權了。這時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他們不贊成這種作法，黨中央、毛主席也不贊成。張、姚就要徐景賢去同紅革會談判，說奪走的印要交回來，不能由你們一個組織來奪權，奪權通告在上海報上不能發表，不能各人奪各人的權。本來他們認爲很簡單，徐去一談就成功了，結果沒有成功。徐景賢被紅革會帶到復旦大學去了。張春橋打電話給上海警備區，要部隊到復旦大學紅革會的駐地，叫他們把徐景賢放回來。這時紅革會的領導對張春橋、姚文元，特別是對張春橋，已處于對立地位。因爲報上號召群衆自己解放自己，他們覺得爲什麼要聽你的？張春橋雖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但他還是上海市委的成員。既然上海市委成爲革命的對象和目標，那麼張春橋也是市委的成員之一，而且是主管文教的，文化藝術領域都是他管的，要徹底革命，揭露黑暗面，張春橋不是都有份嗎？再一個問題，那時已開始抓叛徒。張春橋在歷史上不幹淨。紅革會已提出魯迅罵的狄克就是張春橋。張春橋的老婆是叛徒。中央支持了上海的革命造反組織，他們的氣焰很高，在這種形勢下張春橋的地位就不象過去，不象在北京那樣。張春橋成了目標。原來市委的主要領導陳丕顯、曹荻秋，反而輕鬆了。曹荻秋可能說過風涼話：讓張春橋也到上海來嘗嘗滋味吧！你在北京指手劃腳容易，現在也到上海來嘗嘗滋味！當時毛主席的意思，要張春橋、姚文元去見群衆。毛主席對張、姚特別對張是很信任的。他們自己本來也認爲他們不怕群衆，可以解決問題。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七點，他們到紅革會，紅革會領導正在開會，在上海中蘇友誼大廈。張、姚被群衆

包圍了起來，一個一個問題地質問他。不但沒有解決問題，而且當面揭露張春橋過去在市委的問題，歷史上的問題。張、姚被圍攻了，從晚上七點，直到凌晨一點鐘。當時，紅革會本來想把張、姚帶到復旦大學去，後來沒有帶，還是讓他們回去了。這時，紅革會把矛頭針對着張、姚來了。而且定了一月三十日要開炮打張春橋的十萬人大會。紅革會的行為是幼稚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同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是背道而馳的。他們這種行為是不是陳丕顯、曹荻秋組織、布置的呢？我看不是。紅革會作為一個革命造反派，他們看來張春橋不在話下，陳丕顯、曹荻秋更不在話下。陳、曹是不是覺得輕鬆了呢？是輕鬆了。街上看不到陳、曹的大字報了，張春橋成了第一位了。我覺得陳丕顯、曹荻秋沒有也不會去組織這件事，紅革會也不會聽他們的。炮轟張春橋是當時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思潮的產物，但也不排除有比較有經驗的老幹部在出主意，把目標轉移。到現在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如果有的話，那是作得非常錯的。如果有這種動機，想把群衆的矛頭轉到對張春橋，那就錯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必然會走到這種動機的反面。毛主席絕對不能容忍把目標對着張春橋。因為張春橋是毛主席派去觀察推動上海文化大革命的。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作為全國革命運動的標兵、典型、先鋒的。他怎麼能容忍把目標反過來對着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呢？不管張春橋過去有什麼問題，決不能把目標轉到對着張春橋。這是件很大的事，是關係到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成敗的決定性大事。現在歷史學家把這事看成是很小的插曲，不是的，是決定文化

大革命成敗的大事，決定方向的大事，決定革命目標的大事，決定究竟是誰應該批判，是哪條路線應該被批判的大事。在毛主席看來，張春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重要代表，他怎麼能容忍張春橋成為批判對象呢？所以這事情發生了以後，毛主席親自抓這件事，不斷地要掌握上海的動態。本來毛主席要我同張春橋直接聯繫，另外他還有其他渠道。這時他坐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隨時掌握上海動態。他親自決定，採取什麼措施，發什麼樣的電報。電報調子是他定的，不能說口授，也差不多。現在有人說中央文革小組給張春橋的電報草稿是張春橋本人起草的，是張春橋偽造的，不知有什麼根據。我估計可能張春橋專案組掌握了張春橋的筆迹，可能是張春橋記下來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電報。這電報不是張春橋起草的，是北京傳去的。他們判斷說張春橋本人起草了支持張春橋的電報，這是的。毛主席二十九日那天覺都不能睡，中央文革的人也在釣魚臺等着不能散，總理也去中央文革，不斷掌握上海動態。上海方向錯了，要把它扭過來。這件事是我負責聯繫的。我清清楚楚了解，這個過程是非常緊張的。毛主席在北京廳坐鎮，不斷等匯報。給上海的電報是我起草的，但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定的調子，當面對我講的，我記下來，又經過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我把它整理成文，文革小組討論通過，江青送給毛主席，告訴主席這是王力根據主席意思起草的。毛主席說很好，有革命氣魄（不是說有造反派氣魄），還說了很多好話，毛主席很得意。這電報傳到上海，可能張春橋把它抄了一遍，上海看到了張春橋的筆

述，就斷定是張春橋起草、偽造的電報。不是的。上海這件事情，中央掌握情況主要是通過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這機構原來就有，是市委的寫作班子和機關的一些人。張春橋去後就更擴展了，他們作為上海市委在運轉着，用他們的名義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告。中央要這個聯絡站寫一個請示報告，中央的電報就作為答復他們的請示報告的。電報發給「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同志並上海市紅革會的同學們」。電報內容：

第一條，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這調子是毛主席定的，要指出紅革會中犯錯誤的是頭頭，不是群衆；頭頭也不是全體，而祇是某些負責人。沒有用「頭頭」這個不文明的詞。這裏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紅革會這樣作的結果，使毛主席下決心把陳丕顯、曹荻秋拋出來，點了他們的名。過去一直沒有點名。過去毛主席還寄希望于上海市委，特別是陳丕顯。而現在變了。如果真有某些人策劃紅革會把目標轉移，結果就適得其反。另外我們國家凡是發生問題，總要拋出一兩個人。本來可以不點陳丕顯、曹荻秋的名，這樣情況下就不行，就要點名，這一點名就很難翻身。這一鬧的結果，直接受到政治上打擊的對象成了陳丕顯、曹荻秋。

第二條，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同志（指徐景賢等）必須立即釋放，并向他們道歉。

第三條，中國人民解放軍採取保護革命群衆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紅革會說張春橋是全國第一個派軍隊鎮壓群衆的人。）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扣押了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大概叫徐海濤），是十分錯誤的，絕對不能容許的。

第四條，各群衆組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採取協商談判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應當用綁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第五條，希望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

電報署名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出的。這樣毛主席作了重大決定。
第一，把陳丕顯、曹荻秋點名拋出來。本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報告有這意見，說上海形勢不點名不行。即使沒有這種意見，毛主席也會這樣下決心。毛主席認為上海因爲有陳丕顯、曹荻秋這個蓋子蓋着，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比較高的幹部，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幾乎沒有。所以不把他們拋出來不行。第二，看來要叫張春橋、姚文元留在上海。張春橋總是市委書記，可以作爲革命領導幹部（那時還沒有三結合這詞）。這樣還能够叫上海的領導幹部一天比一天多地站到革命群衆方面來。第三，雖然上海造反派現在掌握了部分權力，但是總的權力不能靠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來掌握，也不能讓紅革會等一個一個造反派去奪權，必須建立臨時性的權力機構。我記不清是這一次或者下一次，毛主席說要用上海公社的

名義。那時北京已成立了北京公社。上海的權力機構要建立，要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上海是毛主席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陣地，這些決策都是毛主席定的。在上海這事情發生以前，有四個省市已經奪權，而且已經見報，有的已經奪權還沒有見報的，很快就要見報。其中一個是山西，一個是青島（後來發展到山東），一個是貴州，一個是黑龍江。山西有革命領導幹部劉格平、劉貫一，還有袁振（袁是原省委書記兼太原市委第一書記），還有原省委常委的幹部。另外山西有張日清，是部隊的，上次講過了。黑龍江有原來第一書記潘復生，是全國唯一的省委第一書記保留下來的。部隊有司令員汪家道。貴州以李再含為主，他是省軍區副政治委員。領導幹部有原來的省委書記李立。毛主席要上海學習山西、黑龍江的經驗，奪權要有更多的領導幹部參加。他認為上海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會參加到革命中來。他認為這代表前進的方向，運動的主流。這是一方面的問題。是反對右的問題。

（二）處理合同工、臨時工問題是毛主席糾「左」的一個典型

另外一條戰線的鬥爭是防左反左。他作為左的典型事件處理的是合同工臨時工的問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些合同工臨時工在北京成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十二月一日有三百多人占領了全國總工會禮堂，十二月四日全紅總發表宣言，說我們當前主要任務是造現行的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徹底鏟除這個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同一天全總黨組書

記馬純古向李富春同中央文革報告，請示怎麼辦？十二月六日，勞動部黨組負責人都占元同馬純古聯名提出如何解決臨時工合同工問題的請示報告。十二月八日，全總經李富春同志批准，向合同工臨時工表示，支持他們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無故解雇合同工臨時工。說合同工臨時工制度可以研究改革，改革方案報國務院後決定。十二月十八日，江青接見北京大專院校造反派代表時，發表講話說：現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劉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劉少奇搞的，我們不知道。有人說是主席要搞的，那祇能說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江青說，總工會的領導人不為工人服務，幹脆讓工人進到工會大樓去住，讓總工會的人滾出去，造他們的反。這種臨時工合同工制度，他們隨時可以解雇，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我們對壞分子還給飯吃，而合同工解雇了飯也沒得吃，是培養奴隸主義。

江青講的這道理我不贊成。當時從開始到最後我沒講話。我知道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來源。劉少奇提的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並不錯。除現在的勞動制度外，還應有另外一種勞動制度，這難道就是資本主義嗎？這樣說是不對的。工人在一個工廠裏待一輩子，這就叫社會主義嗎？訂立合同，按一定的契約辦事，這就叫資本主義嗎？這在理論上說不通。很多同志沒讀過《資本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分析了這問題，認為把一個勞動者固定在一個場所很長的時間，這是農奴制。資本主義進步之處，在于工人勞動者不願意終身被一個主人雇用，訂立終身合同，就成了奴隸制。資本主義法律的進步，比前期奴隸制進步之

處，正在于工人不能把自己的勞動力終身都出賣給一個雇主。作為法律的進步，還限制合同不能多于一年，常常是一年一訂。有的也訂幾年，但是沒有很長的。這樣可以有機動餘地，這裏不行我到那裏去。我們為什麼不能採取這辦法呢？因為我們國家有特殊情況，在解放後我們不能不把所有工人包下來，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吃。把很多人包下來，這并不是正常制度，并不是社會主義就應該這樣。一個人分配到一個廠，就得待一輩子，挪一挪窩就很麻煩，這就叫社會主義？當然也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當時在中國特殊情況下，不得不包下來，包袱背得那麼重，為什麼不能有兩種制度？採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制度，為什麼不可以？都變成固定工，包袱越來越重，也没有那麼多編制。劉少奇制定兩種勞動制度時，問我要過好多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這方面的語錄。江青等信口開河，凡劉少奇搞的都是資本主義，沒有分析。至於壓迫工人的問題，並不是祇有合同工制度才能壓迫工人，固定工制度就不能壓迫工人。固定工制度同樣可以騎在工人頭上，同樣可以採取資本家的、甚至比資本家更壞的方法來壓榨工人。合同工制度多了一條，可以解雇，也可以轉正，他可以用這兩個環節來欺壓威脅工人，你要給我好處，甚至是見不得人的事，如女工跟他睡覺，就可以轉正。這是另外性質的問題，是違法亂紀。不是合同工制度也可以發生這問題。兩種勞動制度中，不光是合同工、臨時工，還有種種形式，有亦農亦工、基建工程兵等。農民當幾年兵，搞個建築隊伍，這也適合中國情況。搞成部隊形式，花不了多少錢，還能贏利，一般的工人不能完成

的任務他能完成，復員後還可以學到些技術。第一種勞動制度也是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的，後來實在搞不起了。第二種勞動制度可以多做點事情，好多毛病并不是因為制度本身造成的，是另外性質的問題造成的。這些合同工、臨時工遭到不合理的對待，遭到迫害，並不是因為合同工制度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確實是因為造反，因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揭露工廠、企業領導上的錯誤或黑暗面，就受到迫害，被解雇、趕走。光從這角度看，他們所受到的打擊迫害，不公正對待，是屬於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報復，怕群衆提合理意見，這又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江青等把這些問題混為一談，說這都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白色恐怖。從這個角度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是聽得進去的。確有這種性質的問題。合同工、臨時工他們所處的地位，容易被打擊，被趕走、解雇。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合同工、臨時工的造反是有道理的。這種造反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陳伯達、康生還有別人正式接見全紅總的部分代表，影響很大。江青開頭就說：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據我所知，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造反而受到打擊，毛主席是支持他們的。毛主席當時也沒分析那麼清楚。江青把它混淆了。他們因造反而受到打擊，現在搞全紅總來繼續造反，提出些要求，在這問題上受到支持，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對的。但是罵這個制度，我當時就認為不對。江青說劉少奇根據他的老婆的那一套搞的，他老婆就是大資本家。合同工制度是反動的資本主義制度，然後，這些人就控訴這制

度，說他們政治上受迫害，經濟上受壓迫，受壓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代表們確實很動感情，全場都哭了。按我講，制度本身不是完全不合理，但合同工比正式工受到限制更多，受的打擊比正式工更嚴重。他們確實有個沒飯吃的問題，不象正式工怎麼打擊飯碗總丟不掉。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們把勞動部封了，陳伯達說封得好，江青也說封得好。大會上代表們哭了，江青也哭了。江青好哭，連大會堂的服務員都哭了。我們一有了權，打擊人是很厲害的，確實有很好的合同工受打擊的。康生也講了話，他沒有哭。康生是鐵石心腸，他不會哭。他說制定這合同工制度的人就是赫魯曉夫，哪裏還是什麼共產黨員？這就是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奪權中的大問題。這些部門，名義上給工人辦事，而實際上不給工人辦事的，全部要把他們解散。這種合同工制度是關係到我們國家變不變顏色的大問題，是社會主義工廠變不變成資本主義工廠的大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問題。康生也把問題弄混了，理論上我總覺得站不住，簡單化。我沒向毛主席詳細匯報，沒跟他講劉少奇把這問題作為理論問題提出來的過程。那時毛主席的確也相信這種簡單化的理論。他還想要搞供給制，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他老人家並沒有深入研究，概念也是不清楚的。

江青說（實際上不是她個人），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名義發個通知，大意是：第一，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視。第二，不得解雇，必須照發工

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來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

第三，現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條處理。在大會上她把勞動部的鄧占元、總工會的副主席王世杰叫來，叫他們站到前面來，說他們（大會代表）是毛主席的客人，你們要很好地照顧他們。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全紅總、全總勞動部負責人發表聯合通知，說：經過全國紅色勞動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發出以下緊急決定：

第一，爲了保證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雇（這比上面那個就更發展了）。第二，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雇期間的工資。

第三，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當衆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這後果很嚴重。有人認爲經濟主義就是江青搞起來的，這說法不完全對。毛主席那時說的反對經濟主義不是指這個。這個確實有經濟主義在裏頭，補發工資那麼多，有的不限于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越鬧越大，確實有經濟主義，但毛主席當時反對經濟主義，下那麼大決心反對的經濟主義，主要的不是指這個。但是江青這麼講了，口氣又是代表毛主席，總工會同勞動部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不敢不接受，就發表了這麼一個聯合的緊急通知。這就使得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作爲一個全國性的不倫不類的組織，合法化了。而且這個組織可以同全國總工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并列起來。

發通知，後果非常嚴重、非常錯誤、非常不對。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中央過去沒有鬆過口。上海成立跨行業組織都不行，這個變成全國性組織，怎麼得了？大家都到北京來成立全國性組織，代替中央了，這根本不行，後患無窮。

後來在碰頭會上，大家跟毛主席講了，有周總理，我，也有別人講的。毛主席也覺得全國性組織不行。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正式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通知，不許搞全國性組織。通知說：第一，所謂全國性組織，中央一律不予承認，所有這些組織應立即取消，其成員必須立即從北京回去，到原單位參加運動。第二，這些組織以各種名義冒領的公款一律由原單位如數追回，在通知下達前已經花掉的公款，必須開列清單，由批款單位進行審批。購置的實物，除已經消耗者外，也應追回。本通知下達後領到的款項，不準動用，如有携款逃逸者，追查法辦。這些組織中如發現反革命活動，其成員必須向公安部門揭發報告，由公安部門審查處理。

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了一個通知，是針對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說：第一，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廢。第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的決定以前，仍按原來的辦法進行。

(這時毛主席已經清醒了，毛主席已經是反左了）。第三，各企業各單位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和正式職工、工作人員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有權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是另外性質的問題，把它分開是對的，不能說他就處于不平等地位，那不對。文化大革命他有份參加，這是另外性質的問題）。第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當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應當回到原來的生產崗位，按原來的合同辦事；克扣的工資，應當補發。這樣就縮小了範圍。不能說凡是六月一日解雇的都回來。有的人他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是正常解雇，那就不屬於這個範圍了。都要回去，那得回去多少人？那就不對了，沒有界限了。真正因為提意見就說他不老實，就打成反革命，那不行。這是很少的一部分。第五，要把混入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當中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組織名義招搖撞騙者，必須堅決揭露（全紅總的頭子叫王振海，抓起來了）。另外重申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該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衆，可以參加本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衆組織。

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體現了毛主席反左糾左的完整過程。

(三) 毛主席批評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堅持奪權鬥爭，誰也不能阻礙，另方面一旦出現了左的東西，不合適的東西，他也抓得很緊，一出現苗頭就批評。

第一是批評文革小組。一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內部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是批評陳伯達，也批評江青，說中央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制，說話隨便，沒有請示報告制度，要陳伯達寫檢討。陳伯達不知道怎麼寫。他不過是個傀儡。陳伯達問我怎麼辦，我說你先寫個簡單的，表個態吧！先向毛主席承認錯誤，承認文革小組是沒有建立民主集中制，沒有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寫一兩頁就够了。陳伯達寫了一個報告，作了檢討，說文革小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建立向毛主席向常委請示報告的制度。但這以後，因為文革小組不是陳伯達作主，所以還是沒有法建立制度和向毛主席請示報告。後來還是照舊。毛主席說文革小組本身就沒有民主集中制，怎麼能起到很好的參謀作用呢？

二月緊接着上海炮打張春橋之後，毛主席的意見，上海要建立臨時權力機構，不能把群衆組織或機關幹部造反聯絡站就作為上海市的臨時權力機構。要建立權力機構，名稱叫上海公社。這不是上海同中央文革決定的，是毛主席決定的。要張春橋、姚文元參加權力機構，也都是毛主席的指示。但上海公社的成立，採用什麼形式，發表什麼宣言，這些張春橋沒有請示毛主席。也許他以為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搞的，就不用請示了。具體成立上海公社的作法，他沒有直接向毛主席請示，他請示了陳伯達。陳作為文革小組組長，沒向毛主席請示。

張春橋、陳伯達都不對，因為上海公社的成立是件大事，是毛主席直接關心的。哪天成立，怎樣成立，宣言怎麼寫，都應事先報告毛主席，經主席批准，再搞也不晚。這件事第一陳伯達要負責，第二張春橋要負責。張春橋請示陳伯達，陳同意。陳伯達沒看到上海這些文件，就同意了。上海公社成立後，這些文件用新華社報道的大會新聞稿和宣言稿的形式發出來了。這些文件在上海見報了。送到北京後，我是主管宣傳的，我把上海公社宣言和新聞請示毛主席，決定人民日報是否刊登。毛主席說人民日報不登，新華社不廣播。主席雖然叫上海籌備成立公社，但究竟什麼時候成立？怎樣成立？毛主席的想法改沒有改？他的思想過程經常反復，也許他正在考慮，上海就那麼做了。這一點毛主席沒有對張春橋不滿，而是對陳伯達不滿意，說他不請示報告。一系列事情毛主席批評陳伯達，批評文革小組，對江青也有點意見。

這件事以後，到一月下旬、二月上旬，主席對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設想形成這樣的格局：他所有批的文件，傳閱時，大體是，林彪、恩來同志和文革小組諸同志，沒把陳伯達、康生、江青單列出來。文革小組諸同志這時是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另外，張春橋、姚文元回北京時有他們倆。這樣一個格局，一直延續到我被打倒的時候。作為中央領導核心，就是這麼幾個人了。李富春也不列入。文革小組後來實際上是周恩來主持，不是陳伯達主持了。除這幾個人外，軍隊增加葉劍英，後來又增加了楊成武、葉群、謝富治、汪東興，一切重要會議都是這幾個人。這也是他進行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為了最高領

導能集中，使他的想法能貫徹執行。

(四) 在反對無政府主義中毛主席稱贊孟繁華

第二是反復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這是他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發動以來和發動以後，就有這種想法，也時時提到這問題。一月奪權後，這問題更突出，所以毛主席欣賞孟繁華的文章，要我一定找到孟繁華，就是因為孟繁華文章系統地提出了這問題，而且文章寫得很好。總理在二月一日發表孟繁華文章以後，三次接見群衆代表和國家機關群衆幹部代表，三次接見都講要學習紅衛兵三司的（孟繁華寫的）這篇文章。（當然首先是學習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就是前面講的綱領性文件。這社論，總理也參與過，知道哪些字句是毛主席親自加的。）第一次是總理接見三千人的講話，把奪權問題作了個總結性發言，他自己說不是總結，他說這些問題紅旗第三期社論已經總結了。他說紅旗社論對整個文化大革命奪權問題的論述是總結性的。總理說社論中有一個問題沒談，但人民日報發表的紅衛兵三司的文章談了，就是說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要消除私心雜念，用公權奪私權。第二次接見鐵道部分造反派的講話時，總理念了孟繁華文章中的一段話，然後說，你們聯合不起來，就玷污了有二七傳統的鐵路工人的名譽。你們沒有學習報紙，三司的文章寫得很好，不知是哪位革命小將寫的。第三次，總理在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又說，三司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值得大家好好學習。三司的文章有幾段話主席特別贊成，叫我們學習。總理說文章列舉

了當前革命造反隊伍中有些錯誤的思想表現，如極端民主化，自由化，風頭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都是妨礙無產階級大聯合的腐蝕劑。文章說這種種壞主義都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而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它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不能表現出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堅定性和團結性。它使革命隊伍離散動搖，喪失戰鬥力，不能聯合，而最終導致革命的失敗。這種種壞主義，是那種小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對於名利的無窮的貪欲生出來的，它可以最終歸結在一個私字上，這個私字就是很多同志頭腦裏那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總理念了以後說，這話說得透極了。你們不要以為你們頭腦裏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下一段更透了：我們同時進行着兩個革命：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觀世界的革命。我們同時進行着兩種奪權鬥爭：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自己頭腦裏私字的權。祇有在思想上徹底奪了私字的權，才能保證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徹底勝利。頭腦裏的奪權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必須進行這個鬥爭。這需要知識分子種種弱點，實行革命化的唯一途徑。革命工人、革命農民的大聯合，是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核心和主力。總理說，光奪人家的權，不奪自己頭腦裏的權，同樣不能取得奪權的勝利。我們常常看到別人的缺點，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對自己要刺刀見紅，這是紅衛兵

常說的對敵人的方法。這一段最深刻了，根據主席思想，并有新的提法，意思就是我們既要參加思想革命的隊伍，同時也要把我們作爲思想革命的對象，拿無產階級之矛，攻我們頭腦裏資產階級之盾。總理三次誇孟繁華的文章多麼好。

毛主席反復欣賞孟繁華的文章。我找到孟繁華以後，毛主席也還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孟繁華一到人民日報，還有原來的北航紅旗的吳介之已經在人民日報，他們根據毛主席指示，第一個任務是寫一篇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社論。毛主席知道孟繁華摘了馬恩列關於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語錄。毛主席說，無政府主義不是不要政府，祇是不要別人的政府，祇要他自己的政府。列寧說無政府主義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毛主席說，機會主義走向反面，就變成無政府主義。修正主義統治最厲害的地方沒有民主，一旦走向反面，就很容易出現無政府主義思潮。這個沒有什麼奇怪，過一陣會走上正軌的。

這是第二個反左防左的作法。

(五) 國務院鬧得很厲害，毛主席說這樣不行

第三是毛主席抓奪權的問題。到處都奪權，中央各部、各省都奪，普遍地奪。那時紅旗第三期社論還沒有出來，毛主席說這樣不行。當時國務院奪得很厲害，總理在接見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時說，工交系統二十三個部門都奪了權，紡織部內部造反派沒形成，外部要幫一下。國防口、農林口、文教口參差不齊，但也奪了。（那時這些部奪權，不是中央文革

領導的，是政治局同國務院領導的，各省市也是總理負責領導的，有的是毛主席直接部署的。（總理說，我們摸了一下，山西是自己搞起來的，（不完全是自己搞的，是毛主席直接布置的。是根據毛主席指示，山西革命領導幹部劉格平、劉貫一、袁振，軍隊的張日清，還有陳永貴、李順達、解悅等勞模，三方面的都有。）上海是最先搞起來的，但是問題沒有解決，還會有反復。貴州我們談過了，回去後還要發表第二個宣言。過去他們落後，今後也可能先進。我們正在一個一個地摸，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奪權，但不能說都是資產階級的當權派和代理人。如果各省市統統都是資產階級黑線，那麼十幾年來，毛主席的紅線又體現在哪裏呢？總理說，我們要用奪權的辦法，把幹部都考驗一下，這樣有好處。總理還說象六月一日大字報一樣，全國會起連鎖反應。上海奪權後也引起全國連鎖反應。總理最初抱着把幹部都考驗一下的態度。總理傳達過毛主席「先奪過來再說」的說法，就是普遍奪權。這樣結果不好。後來毛主席注意到這樣不行，指出對奪權要做規定，不能都奪，該不該奪，哪些部門不許奪，都要做規定，特別不能由外邊人來接管，如部隊、公安部、財政部、外交部、國家經委、計委，還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紅旗雜志、廣播電臺、解放軍報，都不能奪。

中宣部也被奪權了，外單位要接管中宣部。我同關鋒二月二日去了，制止奪權，叫外單位奪權的人回去。我講得很明白，我說中宣部是中共中央的宣傳部，是黨中央的部門。他們是搞宣傳的，這方面現在用不着你們奪權了，老早奪了，黨中央老早把權奪回來了，他們老

早就沒有宣傳權了。宣傳工作，黨中央已委托文革小組管，你們來奪什麼權？你們知不知道，這個權是不能隨便奪的。現在中宣部的幹部祇有一條任務，就是搞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你們外邊的人來搞中宣部內部的文化大革命，這樣就違反十六條，成了工作組。你們來奪這個權完全錯了。你們是不是想奪紅旗雜志的權？紅旗雜志是黨中央機關刊物，文革小組直接掌管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最重要的陣地，你們到這裏奪紅旗雜志的權是完全錯誤的。不但奪權不行，搞亂工作也不行，真正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就有責任保護、支持、挺身而出。你們的行動怎麼樣？你們怎麼相信毛主席的？你們不但不維護而且搗亂。你們為什麼要接管印刷廠、汽車班、收發室、電話總機、托兒所？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這樣做不對，你們所謂接管，在這裏抓人，這是犯法的，不許可的。你們有什麼權力掌管中宣部的印章？不是中宣部的人，統統退出去。這樣就把外來奪中宣部、紅旗雜志的權的人，叫他們走了。關鋒也講了話，陳伯達寫了條子，不許亂來，這也是毛主席指示。不分青紅皂白都奪不行。二月二日康生、王力到中聯部也講了，中聯部幾位部長劉寧一、伍修權、趙毅敏都到了。康生說，你們三位部長給我寫了一個奪權問題的報告，說形勢很好，要奪權。部長請示我，要奪自己的權，這怎麼能說得通呢？這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笑話。我在請示報告上劃了一個大問號，不答復。這像話嗎？真是荒唐。

總理在上面說過的講話中說，真正爛掉的，非奪不可的，完全接管的，像國家科委的韓

光一伙可以（現在證明韓光也不錯）。大多數領導班子中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屢教不改，當然要揭露他們。但領導班子中也有與這些人意見不同的人，他鬥爭過，這次在群衆中亮了相，站在群衆一邊，對他們要一分為二，區別對待，不要籠統地奪權。總理提出要區別對待，要罷官的人中，最壞的要抓起來的是個別的，象彭真那樣的人。（現在看來又錯了。當時專案組搞人一搞就是叛徒。我不在專案組，我不清楚，總理在專案組，他知道。）（陸定一也要捉起來。）第二種撤職留用，定期考察，帶罪立功，以觀後效。第三種停職留用，定期考察，改過自新，以觀後效。時間可以長一點。第四種監督留用，給他搞業務，監督他。第五種可以留用，可以工作，特別是業務。總之要分別處理。這是第三個問題，關於奪權的問題。

（六）周恩來批評陶鑄說的除毛澤東、林彪外都可以懷疑

第四，特別強調區別對待當權派。總理特別號召大家學習紅旗第三期社論的這一段：要區別對待領導幹部，不要不分青紅皂白。總理還批評陶鑄說的「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懷疑」。總理說，這看起來表面上是擁護毛主席，實際上是孤立毛主席。毛主席不贊成對犯錯誤的幹部一棍子打死，要分析。好人不是百分之百都好，犯錯誤的人，毛主席採取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王明、博古、瞿秋白、陳獨秀都是這樣。斯大林是一棍子打死，別的黨都向他學習，而毛主席領導地位確定後的三十多年來，不是執行斯大林的一棍子

打死。同毛主席相反的，高崗是如此，饒漱石也如此，他們認為好的，連特務都用；認為不好的，就一腳踢開。彭真也是如此，認為好的人拉過去；認為不好的人一棍子打死。張聞天在外交部也是這個政策，彭、羅、陸、楊，最突出的是羅瑞卿和陸定一，用人唯私，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有這個傾向，特別是劉。我們不要重複這個錯誤。（這些例子很多都不那麼恰當，但他強調的是不要重複這個錯誤。）不要把這個錯誤帶過來，如果把這個錯誤帶過來，對犯錯誤的人一棍子打死，這就不是緊跟毛主席了，就不是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了，這就是把翟秋白、陳獨秀、王明、博古、高崗、彭、羅、陸、楊和劉、鄧的那一套搬過來了。對待犯錯誤的領導幹部一棍子打死，完全同毛主席的方針背道而馳的。

上面這些例子不恰當，精神是對的。但大前提錯了，沒法實行。不贊成一棍子打死，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中比別的時候更嚴重，犯了錯誤就讓他一輩子不得翻身。現在也還是如此，在那樣一個前提下糾左，所舉的例子本身就不象糾左，實際上也沒糾得了。

具體的人都還是毛主席決定要保。有時要總理出面，有時要別人出面，總理出面的比較多，都打倒了，毛主席也不高興。有些人一定要保，包括幾位副總理。當時不保的祇是一個薄一波，其他都要保。元帥中祇有一個賀龍不保。這都是毛主席定的。如余秋里、谷牧、王震都要保，不斷地提，不斷地保，但是不斷地掀了去門，鬥爭方式又不對。毛主席明確提出來這些方式不對，不能採取對敵人的方法。對待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頑固堅持資反

路線的人也不能武鬥。主席不斷地說。總理在二月一日接見時也提到這些鬥爭方式不好，不對。主要是毛主席很反感，反對這些錯誤的鬥爭方式。毛主席二月一日給總理寫了一封信。毛主席的信說，恩來同志：最近以來許多革命師生和革命群衆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辦法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這裏我順便再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不要武鬥，因為武鬥只能觸及肉體，不能觸及靈魂。只有堅持文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才能達到教育人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大多數是由黨內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黨的政策，降低黨的威信。凡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理。請你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衆，毛主席的意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都不可以這樣作。毛主席對鬥爭方法的指示也是糾正左的作法。

毛主席也早就不贊成動不動開除黨籍。運動中開除黨籍，他老早就不贊成。群衆組織可以開除共產黨員黨籍，他根本不贊成。毛主席主張，還是放到後期處理。後來中央發表指示，提出除已正式逮捕法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應放到後期處理。第二，開除黨籍必須按照黨章（現在還不按黨章）由黨組織執行。群衆及其組織無權對黨員進行黨紀處分。有關黨員的檔案材料，不得燒毀。（現在還亂燒毀）。毛主席還要我們到中組部把幹部檔案封存起來，不許任何人到中組部去查領導幹部的檔案（十級以上幹部的檔案都在中組部），如確實需要

查檔案，要經過中央文革小組和黨中央批准。這也是反對無政府狀態的一個重要措施。

一些過左做法和政策要糾正，但始終沒有糾正過來，因為運動的性質、目標、對象就定得不對，雖然在具體政策上講來講去，實際上都沒有兌現。但說明毛主席在二月還是採取一系列措施來糾正過左。

(七) 防止極左派妨害團結大多數

第五強調團結大多數。這時毛主席很擔心極左派把這場大革命搞糟了。他很重視團結大多數。他決定發表一篇文章，叫「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爭取和團結大多數」，是哈爾濱師範學院革命造反派寫的。他要我告訴人民日報發表，人民日報加了按語。人民日報按語說：哈爾濱師範學院革命造反派的經驗很好，可以供各地參考。要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革命造反派不僅要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聯合起來，而且要團結廣大群衆，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要遵照毛主席教導，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以及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進行堅決鬥爭的過程中，對那些受蒙蔽的群衆，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耐心地進行教育，從而把大多數群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在別的路線下，一定要在他的路線下，受蒙蔽的人，不能怪他，他是受蒙蔽的，對他要採取教育團結的方針，把大多數團結在自己周圍。）這篇文章講，這個學校的紅色造反團開始祇有二百多人，經過最近的這個過

程，發展到二千五百人。被他們認為是保守派的八八團，由二千多人減少到一百多人。這樣就發生根本的變化，紅色造反團成了學院的唯一的權力機關，奪權時差不多絕大多數都團結過來了。文章說團結大多數是革命鬥爭的需要，不要把千千萬萬浩浩蕩蕩的大軍趕到敵人方面去。再一層意思，掌握大方向是團結大多數的關鍵，批判的過程，也就是團結教育大多數的過程。不要光說你來給我平反，要靠自己來平反。團結了大多數，自然就平反了。平反同批判、控訴結合起來，就能爭取群衆了解事實真相，讓過去叫作保守派的多數，也來參加揭露，殺回馬槍。這樣才不是孤軍奮鬥去揪住當權派不放，是擺事實講道理，把大多數人團結過來。另外要完全按黨的政策辦事，不能亂來，才是團結大多數的根本保證。對過去叫作保守派的同學，要個別談心，他們參加到革命造反隊伍來要歡迎，造反不分新老，不要因為過去是保守派就加以歧視，兩樣對待。不要強迫他們檢查，過去有人寫的材料，這是死材料，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活材料。如果有人真心實意認為過去做法是不對的，他過去寫的揭發材料就算了，不要追查，不要傷人。另外，自己開門整風，隊伍要擴大，原來老的造反派，他的地位變了，他們處于主導地位、領導地位了，就要開門整風，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開展自我批評，開觸及靈魂的會。大辯論，允許申辯，允許保留意見，允許人家不贊成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達到爭取團結大多數的目的。毛主席認為這篇文章很好，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因為總的前提不對，對領導幹部定的性不那麼準確，一些人是否就叫保守派？他們保的一

定就不對？在那樣情況下，戰略上錯了，戰術上注意團結爭取大多數也就很難。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經驗很好，但是很難，祇能表面上團結，實際上並不能達到團結，還是有內部紛爭，有小團體、小派別，很難達到團結大多數。另外主席有這樣的看法，因為出現這樣的問題：祇要是大的組織，態度比較不大鮮明，就說人家是保守派。毛主席說，排斥較大派，支持極左派的主張，是值得研究的，應該繼續作調查工作，不要急于表態，要調查清楚。他看到有些材料，破壞工廠，極左派是有嫌疑的，而較大派不是破壞工廠的。他要林彪、周恩來、文革小組注意這問題，極左派是否混入了壞人。總而言之他不贊成祇要少數所謂響當當的左派，排斥大多數。他認為這樣子革命要失敗。

（八）一系列糾「左」的措施

第六，作了一系列的整頓秩序的措施。一是外出串連的要回來，限定日期，特別是部隊的。各學校的也要限期回本單位。再就是上次講的臨時工、合同工，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不承認全國性的組織，一律不承認，應立即取消。他們的成員應當立即從北京等地回原單位參加運動，領的公款要交回，有壞人由公安部門處理。二月十七日關於臨時工合同工問題也發出指示，要整頓。前面已講過了，這裏不說了。另外，二月十九日還發一個指示，說已經到內地、邊疆即三綫的職工也跑回來，這也不行。中央下了緊急通知，這些人還要回邊疆去。三綫是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三綫搞不好毛主席就睡不着覺，現在有些人

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又從邊疆回來了，這不對，破壞了毛主席的戰略決策。三綫建設還是要的。二月十七日還發了一個通知，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的又回來了，或者串連去了，或者上訪請願去了。這些人也要回去，回到農村。過去響應毛主席號召去農村落戶，現在回來不行。要同工農相結合。這是指董加耕、侯隽那一批人。不是指後來中學生大批上山下鄉的。

（九）徐向前談軍隊的兩個司令部

第七特別強調軍隊不能搞亂，不但堅持軍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規定搞文化大革命的單位，也不能亂搞。軍委下了通知，說部隊各級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司令部、政治部、總政、總參、總後、各兵種、各大小軍區領導機關，一律不許自下而上奪權，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軍事機關。這些機關必須由黨委領導。軍隊不象地方，不應該成立各種文化革命的戰鬥組織，已經成立的要以行政單位進行改組。這些組織祇有批評、建議之權，不能代替、監督行政領導行使職權。當權派要分清楚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一律打倒是完全錯誤的。部隊也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林彪說要加強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當時軍委文革小組組長是徐向前，他在二月一日接見總後系統部分造反派時講要保邱會作。他說要分清究竟是哪個司令部的人？哪種當權派？他說：邱會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今天我還是這樣看。盡管他有錯誤缺點，作了些錯事，講了些錯話，但他不是反革命。我和軍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歷史，他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林副主席。

的，是屬於好人的。你們要認清什麼是敵人。這次兩條路線鬥爭主要鋒芒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牛鬼蛇神，搞政變集團的那伙人。我們軍隊過去以彭德懷爲首搞陰謀，以及羅瑞卿、廖漢生、梁必業等，這一類人都不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劉少奇、鄧小平代表中央講話，搞了許多壞東西。劉志堅也對中央封鎖消息，不請示匯報，搞了許多私貨。他搞獨立王國。這樣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了。徐向前說，那時，劉鄧是用中央名義，下面的人祇好執行，如果不執行，不就成了反黨了嗎？如劉志堅搞三條黑指示，下面這些人都執行了。軍隊大多數當權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並不都是資產階級陣營裏的人，他們有的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邱會作我們並沒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這樣看，今天這樣看，以後還是這樣看。邱會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軍委幾個副主席對邱會作有一致評價。過去後勤工作祇抓業務，不抓政治。我們觀察了好多年，沒想到他在生活上這些問題引起很大公憤，這些性質是嚴重的。但他並沒站在彭德懷、羅瑞卿一邊反對毛主席。北京軍區的廖漢生、楊勇這些人，我們一定要把他鬥倒、鬥臭、鬥垮。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並不都是很正確的。並不是說邱會作沒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邱會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能厲害一點，對二醫大紅縱搞了許多小動作，我就不同意。邱會作說話不老實，喜歡搞點兩面手法，這些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屬於敵我矛盾。我們都是爲革命，要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去搞劉鄧司令部的人。按兩個陣營來說，邱會作是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這個意見我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我們軍委都分析過，也不是聽了哪個匯報就改變了我們的看法。政治上的壞人我們不能保，例如廖漢生，我們就要打倒。鄭維山就要保。聽說北京軍區造反派把鄭維山關起來了，我找不到他，我很激動，一定要他們把鄭維山放出來。他們先不肯，後來談判，後來放出來了。如果這件事情我同造反派站在一起，把鄭維山打倒，那我就是同劉鄧站在一起，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了。鄭維山這個人的問題可能會比邱會作小一點。我上次就蒙在鼓裏，沒有想到邱會作問題那麼嚴重。他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生活作風問題。我聽了你們四個小時的匯報，沒有一條說明他和劉、鄧、彭、羅有串連，搞陰謀，搞政變。所以不能說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認為邱會作犯了那麼大錯誤，可以燒，但燒而不能焦，燒焦了就會犯錯誤，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你看邱會作有嚴重錯誤，但他不是劉、鄧、彭、羅反革命集團的。看十六條，看社論上，都是講一小撮嘛。你們不同意我的意見，要同我辯論，就是把我關起來，我也不能改變。劉志堅、羅瑞卿同邱會作的關係都是一般的工作關係。邱會作基本立場是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的。軍委的看法，邱會作做後勤部長，比任何一個後勤部長都好。過去後勤工作從來不抓政治，單純業務觀點，他還抓了一點政治。

徐向前也很困難，說了四個半鐘頭，群衆也不那麼買賬，還要辯論。群衆說，我們把廖漢生揪出來，門了廖漢生。徐向前說你們可以這樣認爲，我們心中有底，廖漢生並不是群衆

揪出來的。軍委根據毛主席指示，一定要分清是哪個司令部的人。軍隊不能亂。照徐向前的話被認為壞人的，看起來并不是壞人。廖漢生、楊勇並不是壞人。楊勇是三軍團的，彭德懷是三軍團的。廖漢生是廣西的，大概是參加鄧小平廣西起義的，他還不是漢族人。可見很復雜。文化大革命一起來，軍隊哪個單位搞文化大革命就要亂，這種方法確實不行。徐向前還有特殊的歷史地位，他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領導人。當時部隊中林彪的老部下很多，就是說一方面軍的幹部很多。毛主席早就說過，現在一方面軍占了重要地位，今後犯錯誤的主要是一方面軍的幹部了。文化大革命一起來，目標就對着領導幹部，他也分不清誰是無產階級當權派，誰是資產階級當權派。這個本身概念就不清楚，沒有科學的標準。他們勢必衝着主要領導來了，而主要領導大多是一方面軍的。林彪就不高興。這方面過去怪劉志堅，（劉志堅是從一方面軍調到四方面軍的。葉群講過，整劉志堅不是林彪整的。主要是江青整的）。軍委文革組長換了徐向前沒幾天，林彪、葉群又對徐向前不滿，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個方面軍整哪個方面軍？是四方面軍整我一方面軍。邱會作是一方面軍的，是林彪的老部下，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的總指揮。軍委討論時，徐向前同意也不能說是違心的，他確實認為邱會作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至于說他別的話是否都是違心？我看也不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認為有兩個司令部。是認為有些人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拿徐向前的話來說是有小撮。他就是講一小撮，把梁必業都弄到裏頭了。林彪整羅瑞卿的時候就有梁必業。梁必業也是一方面軍

的，也是林彪的老部下。徐向前說軍事機關奪權對當權派一定要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很少，祇有一小撮。

後來把「抓軍內一小撮」變成王力的罪狀。其實徐向前就講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就有「混入黨內、政府內軍隊內的一小撮」。十六條中就有，徐向前講話中就有。當時歷史條件下就那麼認識的。徐向前還是很堅持原則的，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同中央指示的。他說那時劉鄧代表中央，我如果不執行，我不就成了反黨了嗎？我覺得徐向前的話是對的，如果普遍懂得這道理也就好了。有些事是中央決定的，如果不執行中央的決定就是反黨了。對於執行不正確或錯誤路線的人，應該這樣態度。這是好的。可惜這一點到現在也沒有這樣作，沒有總結這個經驗教訓。徐向前這個講話現在看來很多地方不對，很多人不能說是壞人，但當時歷史條件下，黨中央、軍委都這樣認為。他這話就違心嗎？我認為不違心。是一定歷史條件下說的。反過來說，今天又說他當時就那麼正確，當時祇有毛主席錯了，別人都不錯，那也不對。從總理談話、徐向前談話來看，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能說違心。徐向前還是真情實感，很激動，并不是當時他心裏想的就象今天那麼正確，祇是言不由衷地談了那些話。我想不是的。

當時保護軍事機關不許亂衝擊，有些人中央要保，不光保邱會作，到處都去保。凡被認爲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受到衝擊，無一不去保，中央文革也去保，這方針是毛主席定的。

然後就發生福建前線部隊的公告。福建軍區連續于一月二十六日、一月二十九日受到衝擊，衝擊的人有地方的，也有軍隊的。一月二十八日軍委發出八條命令，可是一月三十日又發生衝擊軍事機關的事。軍委說如果邊疆衝擊，要堅決採取必要的措施。毛主席也認為福建在備戰情況下，無理衝擊軍事機關，要按反革命論處。所以，後來因為衝擊軍事機關而被打成反革命，是相當普遍的。福建問題是在軍委八條命令發布後對群衆組織衝擊軍事機關者當反革命分子處理的一個來由，誰衝軍區就說是反革命。軍事機關是不能衝。可是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秩序打亂了，衝軍事機關的事怎麼防止得了呢？衝了就打成反革命。但這也說明毛主席堅決的保證部隊穩定，誰要衝軍隊，特別是福建前線軍隊，要採取必要的專政措施。這也是對的，不然的話無產階級專政的天下就沒有了。這點是很鮮明的。

公安部門能不能衝？當時首先北京衝了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被認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公安局負責人被認為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怎麼辦？祇好對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管。公安機關是專政的重要部分，那裏如果不衝，就要軍管。

機要部門，檔案局，檔案館都不能衝。這也是政權的重要部分，關係到黨、政權的生命的問題。這次東歐的事件也可以看出，除了軍隊、內務部，就是檔案部門。他要改換你的政權，就要把你的檔案拿走。我們國家的檔案，包括各省的檔案不能隨便搞，不能把檔案機關搞亂，要確保機要文件同檔案材料的安全，加強保護，不準衝擊。如果要改換檔案部門的領

導，也必須保密員、機要員才有資格。其他單位、其他人不能幹預。核心機密的檔案不許任何人查。已經被拿走的檔案，要火速追回。破壞、盜竊檔案的要依法懲辦。毛主席把舊的秩序不要，舊的組織、制度、方法不要，但總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不要。軍事機關、公安部門、檔案部門不準亂動。如檔案機關兩派吵架不能工作了，就實行軍管。這點是很堅定的。針對這些專政機構來有意破壞的，性質就是反革命，要依法辦理。這不屬於舊秩序，新秩序也要依靠這些東西。沒有這些東西就沒有新秩序。有人說毛主席是胡來，這說法不對，他抓得很緊很緊。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和重要部門，這三個方面都抓得很緊，不允許破壞。

(十) 四清不能否定，春耕不能耽誤

再一個問題也是毛主席提出的，要保衛四清成果和號召春耕生產。不能因為搞文化大革命就把四清成果否定了。毛主席認為，四清不能解決問題，必須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起初他認為是基層祇搞四清就行了，不用搞文化大革命。後來他認為不搞不行，才普遍地搞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因為搞文化大革命，就把四清成果否定了。特別不允許在四清中受到批判處理的基層幹部借文化大革命之名翻案。不能因為劉少奇派工作組錯了，四清的工作組也都錯了。有的也不對，但不是都不對。毛主席指示對四清工作組不要糾纏，不要揪住不放，不要把工作組揪到四清的單位去批鬥。這些人應回自己原單位去參加文化大革命，已經揪走的讓他回去。對確是壞人和犯嚴重錯誤的人，把材料送到他原單位或上級領導機關。必要時，四

清單位可同他的原單位聯系，到他的原單位去參加鬥爭。春耕生產不能耽誤。毛主席接受歷次教訓，絕不能放鬆生產，每年春耕、秋收大忙都要抓緊。毛主席要用中央名義給全國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各級幹部寫一封信。這封信是二月就發出的，其實他老早就提了。下面還是要開三級幹部會議，布置春耕生產，不能誤農時。另外，要部隊發指示，要部隊全力大力支持地方，搞好春耕生產。全國的農村都要抓春耕生產，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影響春耕生產，搞得大家沒有飯吃。在這問題上不能說毛主席頭腦不清楚。

五、實行三結合，才能既不右又不『左』

(一) 不實行三結合的奪權，就不承認

上面談了七條措施，總起來就是三結合。紅旗三期社論就有這個思想，但三結合這個詞還沒有。後來毛主席很快形成概念。他認為必須實現了三結合，才既不右又不『左』。從二月初開始，他就反復講三結合。那時他已經明確提出，需要奪權的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

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

第一，三結合要依靠群衆，這是主要的，是基礎。群衆就是工農兵學商。毛主席認為我們的黨和政權是從群衆中來的。搞了十七年了，我們脫離了群衆。不然為什麼要奪權？本來剛解放時，一九四九年、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群衆歡迎我們，那時幹部吃的住的都很簡單，最早還是吃小米住帳篷。進城以後，特別是一九五二年以後，就有些變化。薪金制以後，幹部拿錢比老百姓多，特別高級幹部薪金高，生活也變化了，群衆漸漸地不那麼歡迎我們了。同群衆就有鴻溝了。所以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要把十七年來不好的東西搞掉。一定要依靠群衆，建立和創造新的東西，使鴻溝能減少以至消除。不要看不起群衆，不要不相信群衆，不要害怕群衆，特別不要看不起年輕人。革命造反派的人都很年輕，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人都可以做事情。我們自己過去不是二十多歲就能作事嗎？這都是毛主席的話，不是一次講的。他反復講這些話。

第二，要依靠軍隊。我們的軍隊不僅會打仗，而且會作群衆工作，做宣傳工作、生產工作。軍內很多幹部都是很小就參加革命，他們沒有地盤，下命令叫他走他就得走。他們動作快、組織紀律性強。

第三，要依靠幹部。幹部中絕大多數是好的。很多事情要讓幹部辦。政策要靠他們執行。很多省委書記要趕快解放出來，要他們好好檢討。有的省過去犯了錯誤，就是因為他們

害怕群衆，動員一些人保護自己，結果害了自己。但還是要依靠幹部。

毛主席認為解決既反左又反右，歸結起來在奪權鬥爭中就要用三結合的辦法解決。他明確地說，不是三結合的奪權，就不承認，不實行三結合的地方奪權，就不能叫真奪權。這話他從二月初一直反復講，而且實行。當時經毛主席批准的，他祇承認山西、青島、貴州、黑龍江的奪權。其它他當時都不承認。當然上海奪權他是承認的，但後來他考慮不能用人民公社的名稱。最早上海還沒有建立臨時權力機構，建立以後人民日報沒登。凡人民日報登的都是毛主席承認的。

(二) 王力的工作任務就是最快最準確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三結合的問題，毛主席還說了些什麼？這可以從一些傳達講話中看出來。我手邊的材料有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在新華社的講話。這講話祇有要點，但我覺得很重要。因為這些話都是毛主席當時說的。我的講話現在找到的不多，但這個講話，我回憶起來，這些話都是毛主席講的。我傳達毛主席的話是最準確的，而且是最快的。因為我管宣傳，那時我年紀比較輕，記憶力好，而且我都是作記錄的。毛主席的話我大體上都能準確地記錄下來。所以我講的話對準確地反映毛主席講話是一個可靠的佐證。我這次講話內容有：第一，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必須有個三結合的領導，即革命群衆組織的負責人、革命領導幹部、當地駐軍的負責人。這是判斷是代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奪權還是脫離群衆的奪權的標準。第二，

必須着重強調與革命幹部的結合。這是毛主席一再強調的問題。這個政策關係很多人。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作法，正好符合敵人的需要，我們不能這樣做。省市委級的奪權，不是這樣三結合的，一概不承認。第三，克服革命造反派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是當前迫在眉睫的任務。這是否能把毛主席路線堅持到底的關鍵。黨中央要求，要服從中央的領導，要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決裂。這種思潮，必須用毛澤東思想嚴肅對待，絕不能允許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也懷疑，也打倒。去年六、七月時的革命派，在奪權的時刻不一定是革命派。在自己有了榮譽、地位以後，就會忘記階級分析。要告訴這些人，自己不要到別的單位去當工作組。革命還要靠自己，要相信各地區各單位的內部群衆。

第二個材料是王力二月九日在新華社對一部分人的講話。我說，黑龍江省奪權的經驗，明天要見報，今天晚上八點三十分聯播節目時間要廣播。這是毛主席作了決定的。（我傳達的話不是我個人的，我祇是最快最準確地傳達毛主席的話。當天或當時我就要去傳達。）我說新華社要通知各報轉登，并要登在顯著位置（這都是毛主席的意見）。我說黑龍江奪權的根本經驗是三位一體的奪權，要搞好奪權，一定要搞好三結合：（一）真正代表廣大群衆的無產階級造反派；（二）黨政機關的真正的有代表性的革命幹部；（三）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駐軍負責幹部。一定要這樣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講話比兩天前的講話加了些限制詞：群衆組織是什麼樣的群衆組織，領導幹部是什麼樣的領導幹部，駐軍幹部是什麼樣的駐

軍幹部。就是說要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還不能叫三結合。

我說，山東的奪權是真奪權，情況復雜，但處理的是正確的，軍區的支持是得力的（指楊得志），對幹部的處理是過左的，建議他們改正，組成一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否則不行。貴州的十項通令，毛主席親自看過。黑龍江、貴州、山西注意了這個問題，上海、山東也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三結合是提到我們面前的第一位問題，必須貫徹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第三段，應該提到第一位（就是幹部問題）。這方面我個人要檢討，紅衛兵也要檢討，對幹部問題重視不够。寫社論時重視不够。社論上關於幹部問題的這段話是毛主席加的，改的地方比較多。毛主席反復強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我黨的傳統原則。祇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又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改過，不按毛主席的幹部政策辦事，就不能真正的奪權。那麼多的幹部都打倒，結果祇能奪到桌子、房子、大印。最近毛主席又反復強調了這一點。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會擁護毛主席這個政策的。目前妨礙我們奪權的是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潮，不分青紅皂白，反對一切，排斥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對中層幹部不加區別地一概打倒，最後就打到自己頭上了。不按階級路線分清敵友，發展下去勢必打倒自己，因為自己也是說錯話，作錯事的。社論上對一般幹部的這段話是毛主席自己加的。但要正確處理一般幹部問題，更重要的是正確對待領導幹部。領導幹部的問題解決了，一般幹部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各省

第一書記不能僅從一個省排隊，要從全國排隊。在一個省你說他最壞，在全國排不一定最壞。毛主席說那怕象辛亥革命時黎元洪那樣從床底下拖出來的人，也還是得要他，不能不要他。我們要有無產階級的胸襟、氣魄和遠見，這裏有一條，就是要站在毛主席一邊，不是無原則。不站在毛主席一邊不行。告訴老幹部要立新功，不要躺在過去的功勞上，不要看不起小將。北京爲什麼搞不攏？就是沒有解決幹部問題，三結合問題，把幹部撇在一邊不管，光是幾個革命組織跳來跳去，這怎麼能行呢？我記得這都是毛主席的話。

再一個材料，是王力二月十四日對紅旗雜志學生通訊員的講話。（我談這些講話主要是說明毛主席當時怎麼說的。我祇是個傳聲筒。）講話說，反對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觀點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集中到一點上就是無政府主義。主席今天還說，「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不解決這個問題，三結合解決不了，就不能奪權，奪了權是騙人的。有的權奪來奪去，并沒有真正的奪權，有的奪了，并不能很好的鞏固。有人說帶「長」字的都要靠邊站，有一個單位都是年輕人，一個帶「長」字的都沒有，這樣的單位不能奪權。現在流傳着一種說法，對司局長稍微靠近一點就叫保守派，不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而從他是哪一級出發，這樣搞下去，我們要失敗。所以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受挫折，就不能繼續前進。你們要接受教訓。有的同志在杭州、長沙、青島、濟南等地犯了錯誤，許多錯誤都是出

在這裏。祇要有一個領導幹部參加奪權，就說這是保守派。而不去識別這個幹部是不是站在無產階級路線這一邊，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老實說，這些同學就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站在反對革命的方面去了。他們反對奪權，說是保守派奪權，因為有領導幹部參加。我講過，不能光看招牌（這也是毛主席的話）。有的組織原來是個革命組織，我們支持過他，但是他在奪權的關鍵時刻變了。地位變了，成員擴大了，各式各樣的人都來參加，這個組織本身就有了左、中、右。所以，我們不少人以為加入左派組織的人就都是左派了，哪有那麼多的左派。看不到這個變化是不對的。有的犯錯誤的人，我們是想保的（這也是毛主席的意見），如蒯大富，我們還是想保他，但我們對他的錯誤還要批評的，在他鬧風頭主義最厲害的時候，最高峰的時候，我們就批評他，現在還是想看一看再說，但一定要批評他。對軍隊，一定要採取正確的態度。相信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軍隊。這支軍隊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領導下，是一支堅強的人民的軍隊。軍隊支持地方可能支持錯了，但是鬥爭的鋒芒千萬不能指向軍隊。軍隊中個別人是有錯誤的，但如果因為軍隊中個別人的錯誤，而把矛頭指向軍隊，我們就要犯錯誤，就要上當。沒有軍隊就沒有一切。對軍隊中個別的壞人和軍隊要分開。一定要想到有敵人，要看到敵人，警惕敵人。福建有人要把鬥爭矛頭指向軍隊的韓先楚，這個不對頭。要分析，韓先楚是最早反對省委的錯誤的人。這些暫且不說，福建是前線，臺灣在對面，為什麼會忘記敵人呢？在這個時刻，同學們頭腦發熱，亂轟一

氣，你轟我，我轟你，對上面也亂轟一氣，把陶鑄轟了之後，所有副總理都要轟，軍隊也要轟，連中央文革也要轟，但就是沒發現有敵人。究竟什麼人物在搞這個鬼？（這都是毛主席的話）內戰打得很起勁，就是看不見敵人。毛主席說，打內戰我們并不怕，打來打去有好處，暴露了敵人，教育了自己。

我們過去忙于「救火」，（哪裏轟了不該轟的人物，文革小組的人和總理就去「救火」。）毛主席批評我們說：「你們管這些幹什麼？叫他們把房子燒了，窗戶砸了，死了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氣魄可大了），這暴露了敵人，教育了自己。」毛主席中心思想是暴露敵人，是有反革命，是要有專政。（他批評救火，可是失火不去救也是問題。）

奪權的問題，報上原來有一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的提法，毛主席指示，後半句不要了，就是不要提「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祇提「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這是我建議的，毛主席決定的，第三期紅旗社論就沒說「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奪權」，祇說「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當然「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概念不清楚，「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這個概念更不清楚，不過把後面這個詞去掉了總好一點。）

在這個時期我向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天天都有傳達。可惜現在這些傳達記錄大

都找不到。我同毛主席天天見面，他天天都有指示，我都傳達得很快。文革小組有快報組，快報組歸我管，他們的任務是向毛主席和常委反映文革情況。毛主席一有指示我就馬上去傳達。不然他們怎麼反映情況？這些傳達的記錄是很寶貴的材料。專案組常常抽出一句話作為我的罪狀，他們不知道那一句話恰恰是毛主席講的。我也見到一些其他人的講話，比較起來，我講的、傳達的最準確。

（三）陳毅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並不反對文化大革命

現在再舉一個陳毅同志二月十日對西安大專院校聯合指揮部和西安地區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的講話。因為中央要他負責處理西北問題，所以他作了這個講話。他說，陝西幾個負責人都不夠格了，軍委決定派一個人去作軍區司令員或政委，你們要信任他，這是軍委派去的。讓解放軍保衛國防工廠，保護勞動人民的生命安全，支持你們，把軍區胡炳雲等幾個人調到北京，接受批判、受教育。你們造反派要把胡炳雲個人犯錯誤和偉大的解放軍分開。解放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手締造的，他們擁護黨、擁護毛主席、擁護人民。要加強部隊，要把方向搞對，要支持左派，否則就麻煩。新的軍區負責人派到西安，要正式通知你們，與你們合作。造反派成立統一組織，辨別誰是走資派，防止你也去奪權，他也去奪權，防止「保」字派打起「造反派」旗號，打亂你們的陣營。中央要我解決西安問題，我總不能公公正正，不偏不倚。總之是為了大聯合，奪權，不要在掌權之後，為自

己造成麻煩。你們造反派有兩派，鬥爭這麼長的時間，其它任何地方沒有。如果你們的問題很好地解決了，這標志着你們已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關心的。在解決造反派內部分歧上，你們給全國樹立個典型，但這不是和稀泥。你們再考慮一下。不過不要用公社這個名字。上海成立公社人民日報就未轉載，因為如果轉載了，可想全國很快就會搞起來。現在革命委員會或臨時委員會最好。革命浪潮越來越高，你們創造新形式，改變和防止你去接管、他也去接管的混亂局面。幾個主要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抓革命、促生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不是辦法。交大內部的事由他們自己去處理，革命群衆自己會解決。（這個組織不要交大，交大還頂着牛。）在革命沒有開展以前，要看誰先打開局面，點一把火，燒紅半邊天。而在奪權以後，就看誰會團結人，善于團結中間派。祇要不是頑固堅持的人，就爭取。領導核心必須是堅強的，這很重要。但領導機構可以搞政治協商，搞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三千多人，現在真正沒有問題的，你們審查一下看還有幾個？不多了。但不能說人民代表大會不好。因為它是毛主席、黨中央決定的東西，現在劉少奇還靠人民代表大會把他拿掉。（這也是毛主席的意見，還是要用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全國都成立人民公社不行。上海成立公社沒有廣播，就是爲這個。不是他不贊成公社，公社原來是他提的，後來考慮到有個外國承認的問題。）你們要解決好了與交大聯合的問題，就使自己進入一個新的水平。你們千萬不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一文，是毛主席

的偉大指示，你們兩方面都要學，可以找到基礎。造反派分化是個規律。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幾十年，在毛主席領導下也有分化。一九六六年把劉少奇、劉瀾濤等揪出來了，（他特別提到劉瀾濤，因為劉瀾濤是西北局第一書記。）把劉鄧揭露了，這就是分化，即十七年後的大分化，這一次不分化，就不能保證國家不變顏色，黨不變顏色。造反派同樣不可能不分化，也是要一分為二的。交大問題處理不妥當，你們就會犯錯誤，而且會犯大錯誤（因為交大有一萬多人）。奪權之後，要抓生產。不光是西安地區問題，陝西問題，也可以解決西北的問題。交大的問題是個很大的事情，不是個小事情。我也給交大同學講，要他們作自我批評。我很不同意李世英的觀點（劉瀾濤之後是李世英負責。現在李世英是好的，劉瀾濤也是好的。當時陳老總不同意李世英的觀點。）不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否則他們就會更團結。你們不好搞，他們到處去搞，擴大到工農幹部中去，他們會使每個生產單位都成兩派，生產咋搞？事實最有力，把革命生產搞好，就可以教育他們。如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樣下去，完全可能斷電、沒飯吃，最後還得團結。這不是降低原則。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我是你們的一個老同志，而且還是比較幼稚的老同志。我是說你們提的幾個條件要考慮交大能否接受。我們的毛主席器量多大，在遵義，毛主席上臺，就不提革命受到損失是政治路線上的錯誤，而祇講軍事上的錯誤。如果當時指出是政治上的錯誤，有些人肯定不幹，不接受，就會影響長征。十年以後到延安才指出。本來長征時革命受挫折，首先是政治路線上的

錯誤，在這些人掌權時他們挖苦毛主席，壓制毛主席，就差沒戴高帽子。以後他們失敗了，這時全軍都要求毛主席上臺，而毛主席上臺後，不提政治路線的錯誤，這並不是投降，這是有意識的讓步，是必要的。這說明毛主席氣魄多大啊！你們要仔細認真的考慮，我講的是不是有道理。我認為，絕不能讓交大離開指揮部和司令部，要把他們拉過來，因為這既然是思潮，就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還有更多的人，如果讓他在大會上認錯，他會死也不幹的。毛主席在長征時就沒讓那些機會主義者認錯，但一到延安他們就繳械了。文化大革命把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你們現在都二十多歲，因此我們國家可能保證到二十一世紀。毛主席、林副主席都很健康，可以保障世界革命的勝利，將來還要靠你們來接班。毛主席根據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上當了，把權交給赫魯曉夫。毛主席就不把權交給劉鄧，而交給你們。毛主席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奪得的權要掌好，不能採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主席解放後還和林副主席、周總理一起來團結王明，甚至和彭德懷一起工作。現在事實證明了，王、彭很壞。你們一定要主動做工作。

我引陳毅同志這講話，說明在當時奪權的關鍵時刻，也是全國很亂的時刻，陝西也很亂，不能實行三結合，大聯合不能實現。革命領導幹部談不到，部隊支左又支持錯了，負責人要調走。談話反映當時毛主席的思想，要實行三結合，不够三結合條件的省，軍隊負責人不行要調走，群衆大聯合不行也要聯合起來，說明毛主席強調三結合作為既反對右又反對左

的措施。另外我舉的陳毅同志這段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份講的。歷史學家硬說陳毅同志那時就那麼反對文化大革命，那麼反對林彪，從這個講話看起來並沒有。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作為政治局委員、有高度黨性的陳毅同志，他不會在那時候就那麼反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那麼反對林彪。這不符合實際。他還是口口聲聲講毛主席、林副主席，他的口徑跟我們一樣，比我們講的還厲害一點。他講林彪是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這就違背歷史。這說明不要簡單化，臉譜化，認為一種人是好人，天生下來就好，一種人是壞人，天生下來就壞。這說明當時不是毛主席發瘋了，再有幾個壞人，就把事情搞壞了，而有些英雄好漢、先知先覺，那時就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不該搞了。不是的。這是二月份的事，不久就是懷仁堂會議，所謂「二月逆流」，第一個批評的對象就是陳老總，而二月十日陳毅還代表中央來處理西安問題，他的講話對毛主席、對林彪、對文化大革命、對奪權、對被認為不支持左派的軍隊領導人是這樣的態度。要尊重歷史。

(四) 保護王任重，周恩來執行的是毛澤東的命令

再引一段二月十一日周總理接見西安地區革命造反派幾個單位赴京代表的講話。周總理說，王任重病得很厲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來，休養一個時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到，昨天我才給軍區下命令，限時間，今天才把人交出來。你看，連我都不相信了，這是什麼問題？無政府主義。毛主席命令我親自打電話找王任重，有人還不相信。這樣，自由主義就

泛濫到邊緣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麼回答？為什麼現在要發表古田會議決議呢？毛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寫的東西，今天一樣還很親切。四十年前，是我們那一代，四十年後，是你們這一代。現在你們重複四十多年前的錯誤，我心裏很難過。你們祇能比我們更好，如果你們比我們當初作得還差一點，那是我們犯罪。我這樣說並不是保王任重，如果傳出去又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我保王任重，我也不怕，我這裏說的是心裏話，這樣下去怎麼行？

我引總理這段話的意思是：當時毛主席對被打倒的人如王任重還是關心的，并不是永遠打倒的，打倒一下子還是要用的，祇要改了就行了（這是毛主席的話）。另外，可想當時無政府主義嚴重到什麼程度？誰的話也不聽，總理親自打電話也不行。毛主席為什麼要發表古田會議決議，為什麼把反對無政府主義提到那麼一個關鍵地位，就是因為這個。我舉這例子還想說明一個問題，現在歷史學家有點偏心，不尊重歷史，打倒人的罪狀都歸毛澤東，保人的功勞都歸周總理，這不符合事實。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不能把毛澤東與周恩來分開，一個壞人、一個好人；一個頭腦不清醒、一個頭腦清醒；一個錯誤、一個正確。如果總理在世，絕對不會贊成這樣說。這不符合歷史。明明是毛主席決定，而且是毛主席下了死命令要把王任重找到，保護起來，要周總理出面辦，怎麼一定就說所有保的人都是周總理的功勞？總理是有功勞，不能否認。但不能把一切過錯都推給毛澤東。這不符合歷史。因為毛主

席的一些想法、一些決定，確實他自己認為是從更長遠考慮，認為整一下也不要緊，燒一下也不要緊，鬧一下也不要緊，亂一下也不要緊。但是真正傷害人了，輪番鬥，鬥得人家病得很重了，毛主席還是下很大決心要保護。你可不能把他鬥死。找不到王任重，這可不行，毛澤東不能允許，是他用的幹部嘛！一時被打倒的幹部，也都是他用的幹部。要打倒就打倒一下（王任重還抓了，後來才抓的），他還是要保護。打倒那麼多，他也不高興。

總理說，西安革命造反組織力量很強大，內部問題多，西安的群衆基礎好，內部鬥爭很激烈，你們不僅政治上占優勢，人數上也占優勢，組織上也占優勢。但是現在奪權鬥爭你們落後了。有共性也有個性，各有各的特點，不過後來居上嘛！你們不要泄氣。你們同交大同志有爭論，爭來爭去，在這些小事上爭，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巴黎公社的原則要正確運用，濫用了就成了自由化了。選出幹部，要穩定一個時期，對幹部要給他一個鍛煉的機會，領導幹部要穩定一些，不能不稱心就換。你們這樣氣鼓鼓的，還能奪權嗎？你們這樣搞法必然推遲聯合，推遲奪權。現在發生分歧是客觀規律，人多了有不同意見，問題也多，現在要開門整風，準備奪權。你們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了，要努力整風，準備奪權。你們的問題靠自己解決，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奪權也要靠自己。現在你們在街上互相鬥，我是不同意的。你們一定要把自己的隊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鍛煉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動市委領導出來亮相，推動軍區左派出來支持你們；不然你們你爭我

奪，他們也不好表態。不管怎樣，三結合總要實現，也總能實現，問題全在於你們自己。軍隊是有紀律性的，軍區的問題我知道。軍區問題好改變、好辦。哈爾濱說解放軍支持保皇派，後來他們作了努力，一下子就轉過來了。解放軍是可以信賴的，毛主席是軍委主席嘛！幹部中總有好的，在於你們去發現。不管怎樣，三結合必須實現。

(五) 上面的講話說明了什麼？

上面我引用了總理的講話，這是二月十一日講的。十號毛主席已開會批評了陳伯達、江青，這就是所謂二月逆流的起源。陳總沒有參加這個會，周總理參加了。這時毛主席整個領導的側重點放在防左、糾左。十號就批評陳伯達了。毛主席一連串措施都在反左、糾左。所以陳毅同志、總理講話都有這種精神。但總的還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要大聯合，總起來要用三結合達到奪權的目標。我引用了當時的講話，在所謂二月逆流前夕總理、陳毅同志的講話，說明當時沒有象現在歷史學家所說的，總理和陳毅同志那時就反對文化大革命了，就批評毛主席了，就反對林彪了，并沒有。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反對，對奪權也沒有反對，還是認為不奪權不行，不奪權就要改變顏色了。認為劉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國家要改變顏色了。這歷史不能根據後來人的想象去判斷。另外，毛主席是說一些人打倒就讓他打倒一下，但是據我所知要保人都是毛主席決定，周總理出面或別人出面執行。現在歷史學家認為，打倒人責任都是毛澤東，保人的都是周恩來，這不對。這個例

子說得很清楚，周總理自己講，是毛主席下命令要他找到王任重，讓王任重到北京來治病，病好了再批判。這祇是一個例子。據我所知，不祇一個例子，不過這個例子有文字可查。這時毛主席正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思潮，總理、陳老總講話的口氣同毛主席是一致的。毛主席在所謂二月逆流以前一系列措施是側重防左反左，不能容許妨礙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來阻礙並使文化大革命失敗。這一段時期的講話，我手邊材料不多，據我手邊材料看起來，我講的、傳達的差不多是毛主席的原話。因為我天天見到毛主席，天天要向下面傳達，告訴人民日報怎麼宣傳，快報組怎麼反映情況，所以我講的、傳達的差不多是毛主席的原話。陳老總講的一般是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他沒有參加、沒有直接聽，他是間接的，但總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講的語言在當時是科學的，差不多是毛主席的原話。正式會議總理是參加的，他有事請示毛主席，聽到毛主席的答復，但有些具體指示他沒有接觸，每天怎麼宣傳他沒有接觸，他有些話也不完全準確。他們都不作記錄。現在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毛主席發瘋了，加上幾個壞人就把事情弄壞了，全國都跟着發瘋了，這不是歷史。現在突然出現一些英雄豪傑，先知先覺，他們早就知道文化大革命不對，早就對毛主席提批評，當時就反對林彪，這不符合事實。

毛主席提倡三結合，既反右又反左，側重反左，不結合不能奪權，奪了也不承認，不是真奪權。但是他老人家這個決策，這個戰略思想能不能實現？不能實現。因為同他總的戰略

決策、總的想法、作法、總的分析不符合。這個作為戰術是辯證的，既反右又反左，而他對總的形勢的分析，對總的黨內情況的分析，沒有變。他一貫堅持他的看法，總的作法也不改變，這樣就沒達到目的。三結合，三方面都不行。聯合，聯合不起來，分成兩派。支左一般都是各人支持各人的，你支持一派，我支持一派。因為沒有領導幹部出面就不承認這個三結合，不承認這個奪權，所以就形成搶領導，這一派擁護這個領導，那一派擁護那個領導，反過來說，這個領導支持這一派，那個領導支持那一派。三結合的結果，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沒有實現，也不能實現。本來是三相信，三依靠，最後他自己也都不那麼相信。今天這個可以依靠，明天那個可以依靠，變成抽象的概念，具體究竟哪個可以相信，可以依靠？沒有。因為他總的階級形勢的分析不對，不符合實際。所以，他預想通過三結合又反右又反左，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實現。

接下去，就出現所謂「二月逆流」了，毛主席又把側重點放到反右上面去了。就象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一樣，從反「左」開始，一下子變成反右了。「左」得不能再「左」了，還要反右，這是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特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特點，這就注定了毛澤東晚年事與願違的失敗和悲劇。

(本文系根據談話錄音整理的草稿)

第三部分

文革第一年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九日)

王力說明：這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同志向我提問，由我談的一些情況的記錄。我共談了三十個小時。這份記錄因為不是錄音，又不是專門記錄人員記錄整理的，所以很簡略。

我的校對限于：一、改一些記錯了的；二、增補一些遺漏的和其他必須增補的事實；三、刪節重複的。使別人能看懂而不致在文字上引起誤會。但未做進一步加工。我對提供的事實負責。有些判斷，是訪問者要求我講的。我所做的判斷不一定對，僅供關心中國文革的

人作參考。

訪問者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編寫《周恩來傳》。有若干問題單從檔案上看有周恩來簽名，他們就問我，哪些問題是不應由周負責的。這篇記錄主要是從這個角度反映文革中問題的，因而並不全面。

這個材料，十年前祇送鄧小平等領導人和中央的幾個研究室。後來有幾位文革史研究工作者也得到了這個材料。我一直沒有公開發表。現在因爲這個材料已經在海内外被公開利用，有的注明出處加了引號；有的則整章整段抄襲，成了他自己的作品；有的還添加虛構和想象，真假混雜，所以本人必須正式公布這個材料，以正視聽。這篇文章還不是正式的王力文革回憶錄。

「文化大革命」我祇參加一年多一點，不知道全過程，祇能够提供那時中央處理一些重要事情和起草一些文件的內情和背景。

「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一九六六年三月，康生、趙毅敏去外地向主席匯報。不是談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談的中日聯合聲明問題。江青在座，魏文伯也在座。主席談了日本問題、蘇共二十三大問題。他不同意在京常委的決定。

這兩次常委會我都參加了。一次是討論是否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總理、鄧小平、彭真、康生、劉寧一、吳冷西和我。開始主席未確定他參加不參加，而是要大家討論，看常委有何意見。討論時除劉寧一起初認為不能參加外，其他人一致認為要參加，後來劉寧一也收回自己的意見。開完會，鄧小平去西北三綫，彭真主持書記處，發電報給主席，說這是常委一致意見。結果闖了禍。彭真起草電報找的是吳冷西和我。當時劉少奇準備出國，要彭真發這電報，說常委一致同意。還有一次是討論中日聯合聲明問題。宮本祇能同意寫上批判現代修正主義，不同意點蘇共領導的名。常委考慮到我們是執政黨，要照

顧他們的困難，一致同意發這個聯合聲明。這本來也是主席一貫的觀點。兩次常委會都是在北京開的，由劉少奇主持。康生兩次都未反對。

會後由康生、趙毅敏到外地向主席匯報。主席發了脾氣，說「他們（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主席可以有不同意見。而且對主席的意見大家都是尊重的。中日、中蘇這兩件事成爲「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一個因素。

下面主席就大罵彭真提出的二月提綱，批評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實際上是對着常委、書記處。康生又告了一狀，說彭真打電話給曹荻秋，責問上海發表評海瑞罷官文章，爲什麼不跟我們打一個招呼。主席更加生氣。

「文化大革命」要發動，是從這一次開始的。主席以不滿意這兩件事作爲引子，重點是批評五人小組、二月提綱。對二月提綱，本來主席並沒有反對，他說他「沒有什麼意見」。這文件擋在他那裏。實際是不大滿意，以後再說。彭真簽發了這個文件，主席不高興。後來彭真向主席送了有關鄧拓、關鋒、戚本禹的文件和小冊子，主席就更加生氣了。這次就對着康生大講了一通對二月提綱的不滿，提出要撤消。大罵「閻王殿」。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

康生回來後，首先在釣魚臺起草九評文件的那個班子裏進行傳達，參加的有吳冷西、姚溱、王力。傳達後康生要我給他整理主席講話記錄，說馬上要開政治局會議傳達。當時我不贊成，我說這是針對彭真的，鄧小平不在，劉少奇出國，由你主持傳達不合適。康生當我的面拿起電話找鄧小平。鄧小平聽了後，立即坐飛機從陝西回來。政治局會議是由鄧小平主持的，康生傳達，決定起草一個撤消二月提綱的文件。要我起草。我就起草了一句話：「中央以前的幾月幾日轉發的這個提綱現予撤消。」祇一句話，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都同意了。送主席，主席不高興，說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實質性問題。要陳伯達負責重新起草。最初沒有起草小組。陳伯達找了我，由他主持，我協助，搞了《五·一六通知》初稿。在北京鄧小平、彭真、總理都提過修改意見。在釣魚臺開的修改會議，彭真還去參加。這是四月初。當時除了指出二月提綱在理論上不妥外，沒有後來「黑體字」上的那些內容。康生

要加上「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彭真在座。彭真說：「那好吧，說就說吧！」

文件初稿送主席後，主席要搞個文件起草小組名單，并準備在上海召開會議。主席提陳伯達為組長，成員名單有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吳冷西、王力、陳亞丁。那時初稿有了，框架子也有了，缺的是主席一次又一次加上的那些重要的內容。這些內容一加，文件的性質也就變了。另外，如果没有因「文化大革命」問題而爆發對常委的不滿，主席對那兩個東西（指中日聯合聲明和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本來都可以同意的。

主席提議文件起草小組成員到上海開會，與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時舉行。政治局會議在杭州舉行，大區書記都去了。時間是在四月十六日，正好是北京日報登批評鄧拓那一個版面的時候。我們在上海開會原來說的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名義上是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因為陳、康又在杭州開會，所以是江青實際主持，張春橋是「秘書長」。地點在錦江飯店後面那個樓。江青要教育大家，每晚要看她認為要批評的影片。小組最主要的任務，是主席對文件草稿每增改一次，就議一次，有什麼意見，給主席回話。最後一次文件起草小組會，陳、康到會了。這以前他們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主席每次都把文件直接送上海張春橋收，轉交江青主持討論。我們也提了一些小意見，如關鋒對「不破不立」等提出個別文字修改意見。最後一次會開到半截，主席讓徐業夫打電話，又加了一大段。主席讓我接電

話，我聽不懂，後來又叫吳冷西接的。我們沒意見，又送主席，他說這就定了，作為起草小組定了，提交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這個文件沒有提交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

吳冷西、康生和我，會一結束就離開上海了。其他人留下了。何明在《光明日報》、高炬在《解放軍報》發表的文章很快就出來了。五一節規模較大。彭真回來就有「警衛」了。五一節活動彭真沒參加，從此就不出面了。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接着，五月五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還是劉少奇主持，鄧小平宣布開會。我列席了，起草小組的人都列席了。五·一六通知草稿的印刷工作，陳伯達搞不來，康生組織的。搞得很神秘，直到開會前才到公安部謝富治那兒去印，爲的是怕中辦印刷廠泄露給彭真或什麼人。印得質量很差，有錯字。

這次會議分兩段：第一階段是從開會到通過五·一六通知，以後是第二段。第一段的會

議彭真、陸定一都參加了。陸定一發言，林彪拍着桌子罵。這個會議的特點，一是實際上林彪主持；二是康生在會上報告起草通知的經過，常委都作檢討，林彪不檢討，甚至每個人都講到社會歷史根源，唯獨他不講。他的發言成爲會議的基調。康生在報告中，把主席講的「剝笋政策」也傳達了。第二段處理彭、羅、陸、楊問題，會後又作出了一個決定。當時大家沒有覺得主席不對，總覺得自己趕不上。

這一段，總理雖然參加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執行對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田家英四個小組的部署（對他們還是同志式的對待），但是總理基本上沒有管。當時這還沒有成爲「壓倒一切」的問題。總理主管國務院和外交工作。林彪那時常委開會他不參加，他說是有病。「文化大革命」前，他不參加黨和國家的活動。我從一九六四年列席劉少奇主持的常委會那時起，從沒有他。這成了他的資本，一貫正確，沒他的事。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起主導作用的是林彪，會後他又不管事。因沒宣布他接替，他又不管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會後中央下發了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文件。當時我不知道。我是到六月二十日才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時，他們才告我其中內幕。因為江青動員我和王任重在會上批評鄧小平。主席原來的意圖是批評劉·林彪和江青却要批鄧。江青要張春橋告我說：主席不同意你為文革小組成員，說你是彭真的人。陳伯達、康生請江青講了話，說不留一個王力，就清一色了，才留了你。我知道這個人底，自己是一個「留用人員」。可是我並未接受任務，批鄧時我一言未發。中央文革成立，是在上海開的會，沒有通知我參加。時間大約是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陳伯達、康生、關鋒、戚本禹、尹達、謝鎧忠、劉志堅等都去了。尹達的名字本來排在組員的最前面，很快就被打倒了。文革小組主要成員有陳伯達、康生、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張春橋是江青提議當副組長的。名單是常委決定由陳伯達提名，經過批准後由常委報主席的。在五

月下旬，擬定文革小組成員名單中，原來沒有姚文元。張春橋提議加一個姚文元。陳伯達問了江青。江青說，要查一查姚文元同姚蓬子的關係。張春橋當天就回答，上海查過了，姚文元同姚蓬子沒有政治上關係，界限劃得很清楚。報告了江青，江青問了主席，同意加姚文元。常委決定的這個名單，我原來以為主席沒有批，後來知道起初祇是不同意我一個人。為什麼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實還是江青搗的鬼。

一九六四年九月，彭真、喬冠華和我到杭州主席處，談建國十五周年邀請外賓事。說完這件事之後，彭真提了個頭，我接着講了一通對學術批判和京劇改革的意見，一是不要動不動提到政治，一是不要擴大化，要有界限。京劇改革不要一律排斥傳統戲，鬼戲也不必一律禁演。主席很不高興，變了臉，說你這個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嗎？（那時已經罵中宣部是「閻王殿」了）但他不是完全不接受。最後他講：第一、江青是有點「左」，第二、是要有個界限。主席說對郭沫若、茅盾、範文瀾不準批。告辭時，主席說再加一個翦伯贊。可是後來又是主席自己批示，尹達那篇批判翦伯贊的文章，要登《紅旗》。原來是內部文章。那時是範若愚主持《紅旗》。陳伯達已經把鄧力群排擠了。稿子修改過程中，有人要點翦伯贊的名字。當時我也是《紅旗》副總編，我說不能點名，因為主席批的簡報上沒有點翦伯贊的名字。

要我列席常委會是彭真找到毛主席，說王力是優秀幹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在釣魚臺，常委要我作點秘書工作。彭真講王力的好話，江青背得出來，在「文革」

中作爲攻擊我的把柄。這兩次，江青把我當成她的對頭之一，盡說壞話，主席才形成我「是彭真的人」這個印象。

起草小組的成員後來大多保留在「文革小組」，變化的是：陳亞丁換成謝鎧忠、吳冷西不要了，又加了地方的幾個：王任重（中南）、鄭季翹（東北）、郭影秋（華北、後改吳德）、楊植霖（西北）、劉文珍（西南），成立會時他們中有些人也去了。

文革小組成立後沒有辦公機構，也沒有人特別重視這東西。六月二十日他們從上海回來正式通知我是文革小組組員。當時文革小組既無機構，也無制度。向中央反映情況，陳伯達靠穆欣，穆欣靠光明日報的內部刊物。當時辦公地點在釣魚臺十四樓，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個地方。穆欣當辦公室主任，收發文件的機要秘書一人。文革小組的制度化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後，那時主席、江青都回來了，這一套都是江青搞起來的。陳伯達那時也有個辦公室，在釣魚臺十四號樓。後來他把尹達、關鋒也搞到十四號樓。

那時，陳伯達差不多一天寫一篇社論，他的根據一是五·一六通知，一是林彪的政變經。這時我正在釣魚臺，不和陳伯達在一個樓，而是和康生、吳冷西在八號樓，這是從六十年代初同莫斯科打交道時就住的樓。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後

六七月間，中央領導運動的是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在懷仁堂，參加的有二三十人。從六月下旬開始，毛主席就對運動的領導、特別是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有意見。到了六月下旬，就很有意見了。總理在這一段是超脫的。

當時主席在外地，向主席匯報情況，一是由劉鄧主持的中央匯報，一是陳伯達的那個班子匯報。江青也在外地，她自己說有四個據點：上海、《紅旗》、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通過這四條渠道掌握運動，代表主席發指示。她與主席不在一起，但與主席有聯繫。

那時文革小組捏不攏，捏攏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江青一回來，就天天碰頭，并在釣魚臺又開了兩個樓：她自己在十一樓，碰頭是在十六樓。（後來成為文革小組會議室和辦公室）。時間大約是在七月中的樣子。陶鑄也作為小組的顧問。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剛剛被選為常委，就吃不開了，原因在於江青嫌他在會上表現不好，不批鄧，批鄧的，祇有謝富治

一個人。對謝的發言，陶鑄沒讓發簡報，祇搞了個特刊，發小範圍。江青很不高興。陶鑄來中央是鄧小平提名的。一打倒彭、陸，鄧小平立即提議要陶鑄來京當常務書記、宣傳部長。在選舉常委時，鄧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來將鄧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常委名單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為什麼還升了，過去第七位，現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排在陳伯達後面。她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陶鑄厲害，調上去。本來陶鑄的名次排在第十一位，就調到了第四位。江青企圖拉陶鑄反鄧，很快就大失所望。江青還責問陶鑄、陳伯達、康生：你們有投票權的，為什麼讓鄧得了全票？你們幹什麼的？

十一中全會後，文革小組建立制度，從各處調人。要我兼辦公室主任。沒幹幾個月，到六六年十一月就不要我當了，改由解放軍報的宋瓊當主任。後來不到兩個月，宋瓊又被江青打成「胡痴小集團」，也就不要辦公室了，叫辦事組。沒有頭，就要王光宇負責事務。他是馬列研究院的一般幹部，有了機構，文革小組主要管文革運動方面的事。

十一中全會後，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當時有兩套班子：總理一套，文革小組一套。總理、陶鑄對文革小組的會凡是通知的都參加。但文革小組不是每次會都通知的。會幾乎天天開。地方的事，文革小組不管。它的職權是負責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但不能下指示。文革小組并向各地派記者。（都是從軍隊調來的團以上的幹部，大約一百人。）出

《快報》反映情況，還到機關、學校了解情況。北京哪裏出事，到哪裏去，還有就是接待群衆來訪。江青直接對主席負責。陳伯達管的《紅旗》紙對主席負責，是從不請示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的。

陶鑄是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十一中全會後他曾正式提出健全書記處，但沒有成功。實際紙主管了宣傳部。陶鑄的意見被江青在人大會堂的政治局會議上反對掉了。那時江青一回來，什麼會議都有她。十一中全會後書記處實際便沒有了，也沒說鄧小平是總書記了。

十一中全會之後，主席決定召開常委擴大會，批劉少奇，參加人員是常委加文革小組成員。會議是林彪主持的。林彪與江青完全一致，說劉不是主要危險，主要危險是鄧。劉已打倒，鄧最危險。因此在這個會議上，他們沒按主席批示，而是組織人批鄧，輕描淡寫地批劉，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從鄧聯系到李井泉、賀龍。主席知道後，說不搞了，停掉了。林彪將鄧的問題說成是敵我問題，鄧被迫交代工作，把分管的專案委員會、中聯部、中調部等交給康生。鄧小平當時對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

十一中全會後雖然還有一批書記，但沒開過一次書記處會議。前面說過陶鑄曾提出過要建立制度，要有個班子，準備些材料，被江青罵掉了：你還搞這個幹什麼？陶以後再也沒提。劉寧一紙是在接待外賓時有書記處書記的頭銜。

林彪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也不參加政治局會議，居政治局之上，總理主持，不言自

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由主席主持，主席叫林彪主持，他才主持。主席不叫他主持，他決不主持。凡是主席開的常委擴大會，林彪必到。

十一中全會後實際上是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沒選出新的常委前已是這個局面。主席從外地一回來，下決心撤換劉少奇，日常工作就是由總理主持。在這以前，中央常委會是少奇主持，總理、朱德、小平、彭真等同志參加。主席召開會議都是自己定名單。陳雲自己也不知什麼時候就實際上不是常委了。主席、劉少奇主持時都不通知他，六四以前就沒有他。主席說他好話時，也沒有通知陳雲參加常委會。

主席回來後，原來還是劉少奇主持。後來張春橋告狀，說少奇對六·二零北大簡報有批語。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夕，主席下決心換接班人，林彪還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是由總理主持。從這個時候起，文件就是總理批了，沒有劉少奇了。把劉少奇換下來，是全會前夕定的。選舉祇是個形式。全會公報是早就寫的，搞好的公報初稿是總理批的，我當時印象很深，很詫異：第一為何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第二主席後邊即是林彪；第三初稿上寫上了劉少奇的一段話，給勾了。六月二十幾日首都召開支持越南的大會時，劉少奇還發表講話，公報上引用了，但這次給勾掉了。實際上這時是總理主持日常工作。

十一中全會以前是劉少奇主持，總理管政府、外交、軍委是主席、林彪管，賀總主持日常工作，有事先報告林彪再報告主席，有時也提到書記處與常委討論。羅瑞卿當時也是書記

處書記，一些問題他也提到書記處討論，然後再報林彪、主席。

主席本來已退居二線，這時又到第一線。主席主持常委會。主席不在時，林彪主持常委會。政治局會他不參加，就派個葉群參加。文革小組也是葉群參加，主席那裏開會，通知林彪、葉群。小範圍的會，葉群不參加。

七月一日，總理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回來。我向康生建議，趕緊向總理匯報，國內情況很嚴重，不是一般的運動，劉、鄧都陷進去了，陳總也陷進去了，總理千萬不要再陷進去。我當時在陳伯達那裏起草十六條，是跑步去的。康生是人大副委員長，歡迎總理時，同總理坐一個車回來，一路上向總理匯報了。康生說一是不要陷進去，一是中央文革與過去不大一樣，總理要參加，要過問。劉、鄧可能站不住了，陳毅在張彥問題上也陷進去了。康生向總理說了，第一不要參加工作組，第二要管文化革命，陳伯達管不了。康生那時對江青很有意見，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歷史上不那麼幹淨。總理也知道這件事的重要，回來後差不多天天接觸文革小組的事，首先抓清華。當時總理祇要不陷入工作組問題，主席就會同意由總理主持工作。

主席對劉少奇的意見，六二年就有，是對他在七千人大會和以後的所謂右傾有意見。六四年四清時，江青告狀，到主席那裏大哭一場，說斯大林死了以後，赫魯曉夫才做秘密報告反對他。現在你（指主席）還沒有死，人家已經做公開報告反對你了，說不蹲點不能作中央

委員，調查研究的方法過時了。後來江青說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離婚發動的，就是指這件事。本來在六四年十二月開始起草二十三條時，主席就準備整劉少奇了。陳伯達同我知道後，我建議陳伯達約彭真、陶鑄一起去告知劉少奇，請劉少奇趕緊向主席作檢討，這才推遲了。六六年在上海起草小組開會時，江青就罵了劉少奇，說劉的《修養》是唯心主義的，并對陳伯達說：你怎麼還給他修改？這時「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已是在指劉少奇了。對江青說出這一段罵劉的話，我們聽後大吃一驚，康生聽後也很緊張，因為那篇文章是康生給發表的。陳伯達沒說話。

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打倒劉的意思，原來祇是換換位子。六七年七月十六日，主席在武漢時單獨同我談：開九大，劉少奇還要當中央委員，就是還要象王明那樣。這同後來的作法完全不一樣。對鄧小平，主席表示：鄧至少還是政治局常委。當時主席對鄧的評價非常高。我說：你多次說過對劉、鄧要區別，可我們現在的口號叫「打倒劉、鄧、陶」。主席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小平，文可以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林彪如果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那時我知道主席當時對林彪意見很大，很懷念和器重小平同志。主席至少講過十次「劉、鄧要區別」。那天還這樣說：「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這裏說的「人家」，一指林彪，二指江青，三指陳伯達。鄧小平是林彪、江青掌權的最大障礙，最大危險。陳伯達是因為個人恩怨。從六十年代初同蘇共鬥爭

起，鄧一直批評他。陳起草文件，鄧通不過，陳一直懷恨在心。在劉少奇主持、鄧小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上，在工作組問題上，陳伯達又寫了一「不要搞工作組」的條子，被鄧批評了一頓，陳回到釣魚臺坐在地毯上哭了一場。這個條子的內容，是從江青那裏來的指示。陳伯達本身也領導着一個最重要的工作組。

在對待鄧的問題上，主席那時還是清醒的，看得還是準的。在這次談話中，主席還說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劉少奇、林彪或者他人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總理」。這次談話是一次會後主席把我單獨留下來談的。主席對鄧小平的估價一貫是很高的。這次他又重提五七年在莫斯科對赫魯曉夫說過的話：「你別看他（指鄧）個子小，把蘇斯洛夫那麼大個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小平指揮兩個野戰軍，還沒有另外一個人指揮過兩個野戰軍。主席還說過，開九大時，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人，大區和各省市第一書記，絕大多數都要選在中央委員會裏面。彭真被誣陷為叛徒後，主席還說過：「至少要保留黨籍，分配工作。」毛主席還講過這樣的話：一旦發生戰爭，所有被打倒的幹部，一律官復原職，或者是要調一個地方任原職。

在我被打倒前同主席的接觸中，經常聽到主席講的兩句話：一是「不一定」，一是「還要看」。這還是講辯證法的。因而也做出過一些在當時條件下好的決定。但因為在戰略上錯了，戰術上講辯證法是不能改變全局的。他太相信他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也一定要人家相信這個。

十一中全會後，主席主持常委會，直接領導「文革」運動。主席五三年就提二綫問題，五九年正式退居二綫。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回北京後，又直接主持常委會，沒叫林彪主持，也沒叫總理主持。總理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主席主持的會議，最初時常委幾乎都到，祇是陳雲沒到。從五九年到六六年，是劉少奇主持常委會，凡重大問題也都要向主席報告。主席想要召集開會，就叫人到武漢、杭州、上海去開。例如，國際共運的二十五條，是主席在武漢召集討論的，在杭州起草的。那次沒找總理，找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姚濤和我。王任重也參加了。

總理主持日常工作時，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匯報，不經過總理，如陶鑄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也可以。總理參加文革小組的會，但向主席匯報時的署名是陳伯達、康生、江青，總理不簽字。總理要報告，就單獨報告。

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江青已經開始要整總理。突出的例子是文革小組在紅旗雜志召開大專院校紅衛兵座談會，參加的有蒯大富、譚厚蘭、王大寶等七八個人。座談會由張春橋主持。王任重、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參加。會上先是學生發言，說當前中心問題是劉、鄧的影響還很大，除罵了劉、鄧外，矛頭對着總理，說總理「和稀泥」、「折衷主義」等。同時，也批評到陶鑄。學生發言後，張春橋表示回去報告。江青聽了張春橋的匯報，肯定了張的匯報，說：「總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義」。這次匯報是文革小組的會，沒請總理參加。會上決定一面把記錄送主席，一面寫一篇《紅旗》的國慶社論。這期《紅旗》社論是王力、關鋒執筆，文革小組（總理未參加）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都參加了審定和討論。陳伯達定稿。這就是那篇《紅旗》十三期社論。第一次稿子沒有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文革小組討論，把江青原來一定要寫上的罵「和稀

泥」、「折衷主義」的那幾句話，改得緩和一些了，不那麼露骨了。但是，後來改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提法。

這個提法的背景是什麼呢？主席天天看紅衛兵報，江青又不斷送材料給他，他就形成了一個概念：「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是從八月八日到九月，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綫的嚴肅的堅定性和徹底性。」主席的這個概念要在國慶節的林彪講話和《紅旗》社論中表達出來。林彪講話主要起草人是陳伯達和張春橋，他們用了批判「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綫」的提法，主席原已同意定稿。後來陶鑄提出「反革命」太重，由陶鑄、王任重、王力三人一起向主席建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綫」，主席同意了。天安門上也講了。講過以後，晚上在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看烟火時，張春橋向主席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綫」在語法上不通，還要改回來。主席說：「不要改回來了，以後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紅旗》社論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語錄」一本，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作為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提出的「語錄」，是有根據的。毛主席定這個口徑時，總理不在他身邊，不知道。

對於這篇社論，總理是明確地表示過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提法，他對我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綫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和「反動路綫」這個提法。我要去問毛主席。」他找了主席，事後又對我說：「我

去問過了主席，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綫），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綫），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綫）好。我才知道這是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總理還對我說，他又「請教」了關鋒，關鋒同他主要講了，毛主席的精神大概是：民主革命時期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於路綫的提法應當不同。總理以後就照着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總理把主席的主張駁掉是不可能的。十月中旬工作會議上，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講了資反路綫的問題，劉、鄧還被迫檢討。在所謂「二月逆流」會上，總理的不滿意，不祇是因為《紅旗》十三期社論沒有給他看，而且他也不同意這種提法。

在江青的挑撥下，主席對中央在八九月份的工作不滿意。而這段中央日常工作是總理主持的。江青這一整，總理的處境顯著困難，與中央文革的關係也就有了變化。

這時總理繼續主持日常工作，大政方針由政治局討論，報告主席決定。國務院的問題他交給李富春解決，大的問題親自主持解決。但祇限于政府工作。十月以後，文革小組還祇解決「文革」中發生的問題，還沒有涉及全黨全國的問題。那時主席批東西一般是：林彪、恩來、陶鑄及文革小組諸同志。這次實際上整了總理以後，更多的事情要文革小組來做了。但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也管文化大革命，陶鑄、李富春也管。

十月一日，所有常委要上天安門同群衆見面。爲這件事，總理煞費苦心。「十一」是國慶，國家主席沒說不要，總理再三躊躇怎麼辦，位置怎麼站，擬定方案後報毛主席。方案是：主席站中間，左邊是林彪，右邊是劉少奇。當時既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便不能按黨中央常委的次序排列，又要能得到江青的同意。總理考慮得非常周到，把劉少奇安排在主席身邊，又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劉少奇這一邊。這樣一來，江青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了。總理定了名單後，先在文革小組談，通過了，然後馬上報主席、林彪。主席同意了。

中央工作會議後，江青在體育館一句話就把王任重、周榮鑫打倒了。周榮鑫是協助總理處理紅衛兵問題的主要助手。突然被打倒，目的是整總理。江青說周榮鑫「看樣子就不是好人」，是「聯動」的後臺，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對於這件事，總理最惱火。周榮鑫被打倒後，有領導有組織的紅衛兵工作立即發生變化。總理後來跟我說：「這件事最使我陷入被動。事先不跟我打個招呼，就把周榮鑫打倒了，叫我靠誰來抓紅衛兵的工作呢？」江青向總理提出，叫張春橋來當國務院秘書長。總理婉言拒絕，張春橋也不願意幹。

紅衛兵串聯問題上，江青是反對總理的。她不滿意總理主張的要有組織的串聯，紅衛兵要好好地領導。聯動雖然也有錯，一般是幹部子弟，被打成反革命，本來就主要是江青和陳伯達搞的。聶總等提了意見，主席同意了。主席要放聯動，江青搶先去放，落了個好人，把她的書每人送一本，被釋放的孩子們還喊：謝謝江阿姨。

大串聯的根子在接見紅衛兵。八一八大接見，主席提出：要幾千萬人直接同他見面。要一次一次接見下去。為什麼主席非要這麼搞呢？他講，要接受蘇聯的教訓。在蘇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後來把列寧主義丢了，與這個也有點關係。當時最嚴重的是把鐵路搞亂了。總理最反對把鐵路搞亂，一再講不能這樣搞。否則整個大動脈要中斷，要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人民的生活。主席說：「這有什麼關係？不要緊，都要讓來，管飯，亂就亂一陣。」這樣一來，可把總理累壞了。他日夜操勞，親自調度火車，調度糧食，必須保證，而且真正的保證了紅衛兵的食宿。

毛主席最初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後來完全不一樣。最早說搞三個月，後來說半年，然後又是一年，在我被打倒前，他說三年。十一中全會接見紅衛兵時，他說：無非搞三個月就完了。十月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就不象過去設想的那樣。十月一日接見紅衛兵，名義上是十一名常委都見報了。但到十一晚上，主席就推翻了常委一致出席的安排，組織了一個以他為首的車隊，從群衆中穿過。是坐的敞篷吉普車，參加的不是十一名常委，祇有主席、林彪、總理、陶鑄、陳伯達、康生和李富春。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四人沒有了。另外參加的還有葉劍英、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穆欣、葉群。但沒有通知王任重、劉志堅。（他們都是文革小組副組長）。在北京大學問題上，王任重與江青有分歧。不通知劉志堅，可能與軍隊有的老帥和蕭華、楊成武也沒有通知出席有關。謝

富治要同傅崇碧去維持秩序沒有參加。那天晚上擠死好多人。傅崇碧擠斷了肋骨。

這天晚上，主席對「文化大革命」形勢的估計，說的就很沒有譜了。當時在座的有總理加文革小組的幾個人，我在場。林彪、陳伯達、康生不在座。因為他們早回去了。那天主席已經表明是要硬搞下去，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看來主席是越碰釘子越要搞下去。談完話後，在天安門城樓上照了相。總理和江青說，我們經常見主席，站邊上，年輕的站在主席身邊。結果是主席站當中，姚文元、戚本禹站在主席左右兩邊，其他人兩邊排下來。總理和江青站在兩頭。（這張照片可以找到）。隨後的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檢討，主席又覺得很好，也想了結了。首先是江青反對，說哪裏很好？很不好。並說：「徵求了林總的意見，他也反對。」主席不但保鄧小平過關，還在批語中給他出主意，要他把草稿的最後部分改得積極一點。可是江青和林彪還是反對鄧小平。這樣就又了結不了。主席也收不住場了。那時黨的核心領導中，確已帶着宮廷氣味了。我記得在中央工作會議時期，甘肅的胡繼宗（原湖南省委常務書記）也看出這一點，他當我的面勸陶鑄要小心，說現在是「伴君如伴虎」呀！不久前，（一九八三年八月）過去給我開過車的中聯部司機王貴對我說：「你看得真準。你對我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半年，還要再搞。看來所有的人都要被打倒。」這是悲劇。主席走向自己願望的反面，而且越走越遠。

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和批判陶鑄

在十月工作會議時，還祇是在學校不要黨組織了。會上有人提出要恢復，主席說不要忙，還說省委這一級組織可以暫時不要，這不要緊，因為還有地委以下的黨組織。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搞到哪裏，那裏的黨組織就不要了。本來，工礦企業和農村這些基層組織，按照十六條一般是不搞的，祇在大中城市黨政機關、文化教育口搞，一般地委也不搞，祇是本身屬於大中城市的才搞。工礦和農業一般還是「四清」。軍隊肯定不搞。這是主席定的。十六條最初是陳伯達與我起草的，後來主席要換手，由陶鑄、王任重、張春橋和我加工。最後主席修改幾次，有些重要思想是根據他的意見加的。抓革命、促生產也是他提的。至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發展，主席自己也說沒想到。他說，這三件事是他搞的，一是廣播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二是紅衛兵，三是大串聯。本來十六條之前已有了大字報，紅衛兵，之後又出了個大串聯。他說「誰知道經過我這一搞，就搞得各級黨委不亦樂乎，嗚呼哀哉！」主席說他

自己「闖了禍」，實際上他覺得並不壞，是很得意的。十一中全會後，他戴了紅衛兵的袖箍，在這之前他曾給彭小蒙寫過一封信，支持紅衛兵，全國都動起來了。大串聯先是北京到外地，然後是外地到北京，「經風雨，見世面」。十一月陳伯達總結了串聯，提倡搞長征宣傳隊。到十二月工礦農村問題就突出了，按照主席的說法，八、九、十三個月，產生了工人農民反對紅衛兵的情況。工人農民贊成紅衛兵的是少數，多數是不贊成，而且有些地方出現要依靠工人農民來對付造反的學生這樣一個局面。

十月工作會議把這提到議事日程上，提出學生要與工人農民運動相結合，打通思想，希望大家都這樣搞。陳伯達的總結中提出結合的問題。當時主席的思想是：第一要有領導，第二要分期分批。主席是在講話的前一天聽匯報時說的。總理也是強調這個的。二十四、五日的工作會議特別肯定了要分期分批，生產不能搞亂。主席對陳伯達的總結講話批示：很好，還要加上「抓革命、促生產」一句。十六條上抓革命、促生產的表達方式是主席提的，認為抓了革命，促使人們思想革命化，生產就會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發展。總理管具體工作就很為難。但是，總理還是講革命和生產都要抓，兩付擔子一起挑。總理也始終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會造成錯覺？那年豐收，莊稼長得很好，農業豐收大局已定。工廠沒搞「文革」前，形勢也很好。實際上這主要是前幾年調整的結果。主席以為是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的結果。主席判斷失誤。他從六二年就判斷失誤，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當時他聽了許世友反

映農村形勢好轉，他就得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結論。

六六年，在沒搞到工礦農村時，先是大串聯把鐵路亂了。鐵路一亂，首先是煤運不出來了，沒有煤炭，有的工廠就不冒煙了。總理每天管鐵路調度，也每天抓煤炭。中央工作由總理主持。當時還堅持兩條：一是不能停產鬧革命，工礦農村不許大串聯，二是工廠不搞跨行業的組織。這是總理在陶鑄、李富春等同志協助下抓的，主席批准的。把這兩條搞亂，才有後來的結果。

轉折點是十一月的安亭事件，把這兩條衝破了。最初主席沒管，張春橋是李富春代表常委派他去上海的。任務是恢復通車，鐵路不能中斷。張春橋去了是通車了。王洪文鬧的事，停車的時間不長。張春橋對鬧事的工人說：我不是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而是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要求同你們回到上海談判。去上海後一談，張春橋簽字承認了幾條：一是承認離廠赴京是革命行動。這豈不是就衝破了中央的決定，從十六條到十月工作會議的指示？他無權承認。承認了就是鼓勵工人可以不生產，愛到哪裏就到哪裏去。二是承認工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這也就承認了跨行業的組織。這本來是中央最反對的。工總司還有很多苛刻的要求，最核心的是這兩條。張春橋簽了字，把中央的規定衝垮了。當時有些工人在蘇州的鐵路上，等簽了字才走。張春橋沒與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也沒有請示北京，就擅自答應了。陳丕顯堅決反對，先打電話給陶鑄，陶鑄的態度很明確，不行，要堅持中央原來的政

策，張春橋的這兩條不合適，要採取補救措施。然後陳丕顯打電話給陳伯達，這時我正同陳伯達在一起。我聽到陳丕顯態度鮮明地進行責問。陳伯達的態度是勸陳丕顯，說我的老鄉，不要那麼發脾氣，冷靜一點，這問題很大，不要匆匆忙忙地表態，字已簽了，中央再研究。陳伯達知道張春橋的份量，張春橋也馬上給陳伯達打了電話，意思是這字不簽不行，鐵路不能通車，而且越鬧越大，不能同工人對立，不能壓制革命。陳伯達帶着我找江青，如此這般地對江青講了。江青說她要立即見主席，「要搶在陶鑄前面，不能等到明天。」

第二天下午三點左右，主席在釣魚臺十二樓召開常委擴大會，參加的有常委、部分文革小組成員，但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沒參加。文革小組參加的有江青、王力。在主席那裏開會，小範圍的會一般祇有江青和我，大一點有關鋒、戚本禹。穆欣早就連文革小組會議也不讓參加了，因為有人揭發穆欣在「文革」以前說過江青有精神病，江青就說他是叛徒，讓王力派人調查。我調查結果說不是叛徒，江青不滿意我這也是原因之一。在這個會上，主席主要講上海問題，講話很短，他拿出憲法，念其中的「結社自由」一段，針對陶鑄和陳丕顯說：「工人有沒有結社自由？憲法你們看不看？」並說：「上海問題，張春橋是對的。先有事實，後有政策。」原來在電話中，陳丕顯在這個問題上講得很厲害，說：「你們的一個文革小組副組長，究竟有沒有權利，背着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與群衆組織簽訂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決定？第二，究竟還要不要國家法律？」主席用憲法來回答陳丕顯，還講

了政策從哪裏來的，講了理論和實際的關係，又用哲學來回答。張春橋在去之前，不認識王洪文。李富春交代任務後，他找了江青。我當時兼辦公室主任，我要給他派人協助，他堅決不要，說「我有人」。這件事，總理沒出面，在這種情況下，誰還能說話？但原來的正確原則主要是總理定的，因為是陶鑄出面支持陳丕顯的，所以陶鑄也成爲批評的對象。

安亭事件後，主席要陳伯達起草關於工礦進行文革的文件。陳伯達找了我。主席一面找陳伯達布置，一面也在會上說了要搞個文件。本來總理、陶鑄已找人搞對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這個文件由陶鑄、李富春主持，總理不參加具體起草工作。把各大區、重要的工礦企業負責人都找來了。其實主席早已要陳伯達起草，陳伯達找我，按主席的思想寫。主席的意見除了上述的以外，就是批評陶鑄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主席說：「認爲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要基層黨組織領導，要依靠老工人，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再就是林彪也抓。（以前我不記得林彪抓過具體工作）他要關鋒給他整理各地的大字報、傳單、請願書等，收集有關工廠「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關鋒沒有給他搞出來，他又找別人搞。平日，林彪不抓實際工作，有時發表一通不着邊際、政治性的講話。這件事他却直接抓。

這一來，陳伯達和我在北京作了調研，文件改了好幾次，送給主席、林彪、沒送總理。就在同時，谷牧具體主持起草的文件也起草好了。林彪拿着這份材料，主持會議，大講了一通，對谷牧指着鼻子罵。陳伯達、張春橋罵得輕一點，張春橋還罵了馬天水，那時馬天水站

在陳丕顯一邊，當然，這件事是主席向總理交代的，是總理向下布置的。但會上沒有批評總理。因為我老早報告總理，主席自己要另搞，請總理不要再插手了。當時在會上罵谷牧時，批評到陶鑄「要把革命壓下去」的話。因為陶鑄曾在總理主持的會上講過：「（王洪文等）這樣搞法，就是要把他壓下去。」陶鑄被打倒，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他不贊成停產鬧革命和成立跨行業的組織，又主張基層黨組織的領導，還要把王洪文們的氣焰壓下去。他的脾氣很倔。這話被抓住了，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壓」怎麼得了？

打倒陶鑄的內情，還是江青對陶鑄的不滿。第一，江青要他壓鄧，他沒壓。第二，江青在文革小組與陶鑄吵了一架，陶鑄拍了桌子。陶當時管宣傳部，江青說（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的吳傳啓是革命左派，陶鑄說吳傳啓是國民黨（當然也不對）。要整。江青說：你說他是國民黨，你也是國民黨。陶鑄拍了桌子，說：他參加的是什麼國民黨，我參加的是什麼國民黨？照你這樣說，主席也是國民黨了！江青從來沒有受過這樣對待。當即大哭了一場。當時總理也在座，勸了一下。總理非常注意陶鑄的這個問題。我早已告知總理，主席不同意陶鑄的許多觀點。在這件事之前，原來林彪對陶鑄比較欣賞，這以後，林彪不敢接近陶鑄了。這次的事是關鋒告訴了葉群，葉群馬上告訴林彪。葉群說這件事太大了，這個陶鑄，他怎麼能說到毛主席！

林彪開了好幾天會，會上林彪講話中心意見是工礦要搞文化大革命，影響一點生產也不

怕，下降就下降。革命要抓好，不然，生產的成果給誰？（這種話主席沒講過。）康生說谷牧象柯西金。總理一言未發。林彪講話雖沒罵陶鑄，祇罵了谷牧，但他把這事當作大問題，當作兩條路線的繼續，資反路線的繼續，把陶鑄列入犯錯誤的一邊。林彪罵李井泉罵得很厲害，當着西南局幹部的面，說：「李井泉這個人最壞，什麼人壞，他就跟什麼人在一起。」本來這與這個會完全無關。這是林彪時刻不忘反鄧的表現。這件事就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

會一結束，就宣布中央已有了稿子，要總理主持通過。主席派人告訴林彪，說稿子已有了，還需經過中央通過的形式。于是中央就發了工礦十條。

這個文件一發，主席要總理主持在懷仁堂開陶鑄的批評會。這個會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文革小組全體參加，加葉劍英等幾個政治局委員，以及蕭華、楊成武。這個會議主席要林彪主持，林彪說有病不主持，推給總理主持。會上也沒有批評多少。陳伯達講得很多。陶鑄很傷心，說我們一直相處很好，私交也很好，今天才知道你對我有這麼多意見。陶鑄作了檢討。會議開了兩天，大家都發了言。戚本禹的班子整理陶鑄材料，說陶鑄要把革命「壓下去」、保皇、形左實右、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等等。那時江青一直抓住兩條不放，一是群衆來信，一是專案，這都是整人的。江青說，這兩件事她要直接對主席負責，她要戚本禹在這兩件事上當她的秘書。

中央專案組

專案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對常委、實際上是對毛主席負責。江青宣布專案組時說：「除王力一人外，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參加專案組。（穆欣和謝鎧忠已經實際上不參加文革小組了。）專案組成員名單上還加上謝富治、汪東興、葉群、楊成武、鄧小平打倒以後，專案組是康生抓的。中間空了一段，是汪東興實際抓。江青說：『康老有延安整風的經驗，他當組長。專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當我的秘書。具體工作由謝富治、汪東興負責。』江青多次強調：『專案組我要抓，我直接對主席負責。』」

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議請示建立劉案、鄧案、陶案。這是江青的主意，康生提的。主席說，不能立案，都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後，康生告訴我，說江青在專案小組中說：『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裏頭一起整。』這是六七年一月四日陶鑄被打倒以後的事了。

農村「文化大革命」

十一月二十幾日，江青派聶元梓到上海，要肖力與聶元梓一起去。本來準備了一個很大的名單，十多個人，還有阮銘。後來江青說：「關於肖力去不去的問題，我要請示主席。」以後江青要我轉告聶元梓，肖力不去了，主席要人少一些，阮銘也不去，祇帶北大的人。肖力那時正在中央文革，歸戚本禹直接管，正在解決候補黨員轉正問題。別處都停止了黨的組織的活動，祇有這裏可以解決。

過了幾天，江青要我派幾個記者到農村去看看。當時文革小組設有記者站，全是部隊幹部。江青向總政劉志堅調的一百個有點文化的團以上幹部，名義上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的記者，實際上是為文革小組辦的《快報》寫報告，每天向中央常委反映情況。全國重要地方都派出。我就告知記者站負責人徐學增，請他派了兩個記者到農村。其中一個到通縣。我根據記者的反映，向江青說農村形勢很好，生產和生活很好，在農村搞「四

清」就可以了，不要搞「文化大革命」。當時她並沒有說什麼。一天吃飯時，江青突然進來，大罵我一通，說：「你是什麼理論家，我看是個大混蛋！」我說：「你怎麼開口罵人？」她說：「主席叫你寫的在農村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哪裏去了？你派的都是官老爺，不與貧下中農三同。肖力反映的情況跟你們不一樣。」我說：「你不講理！你並沒有告訴我要搞什麼文件。」我同她爭吵起來了，戚本禹趕緊把我拉開，說：「我陪你，馬上到農村去。」江青本來就不滿意我當辦公室主任，這次事後，江青就把我的辦公室主任撤了。原來農村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主席的意見。這次是主席催了要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在這之前肖力知道，我不知道。戚本禹陪我到農村去，當時也沒帶介紹信，到大興縣談了談。看到學生串聯的結果，的確也影響到農村。有些人要搞文化大革命。于是就着手搞文件，主席要我主持，戚本禹、肖力參加。我很尊重肖力的意見，搞了第一個草稿。我又到薊縣與縣委、公社先商量，然後又到橋頭大隊。村裏確實有一部分人要搞文化大革命。我回來又提了一點補充修改意見，並提出：「我沒有把握，請伯達主持。」陳伯達看了文件，領我又到武清縣看了一下，四個人又從頭到尾另搞一個文件。

當時肖力是有長處的。江青講他們家中分左中右，左是肖力，中是毛遠新，右是李敏。肖力沒有主席女兒的架子，生活很樸素，吃大伙房，不吃水果，不要家裏一個錢，凡事都有她的見解。但也有片面性，個性太強，什麼人都看不起，眼界高。江青的意見，別人不敢反

對，她敢反對。

兩個稿子都是送江青轉主席的。江青說主席認為陳伯達搞的不行，現在用的是第一個稿子。這樣一來，就是農村也要普遍搞文化大革命了。帶來最大的問題是，把農村地委以下直到生產隊的黨的組織全部弄垮了。我到薊縣時，縣委、公社黨委還在管事，這個文件一下去，要成立貧下中農文革委員會，要自下而上，自己起來鬧革命，不要黨委和支部，自己解放自己。農村也亂鬥一氣了，這個影響就大了。幸虧當時還有個好的地方，一到農忙季節，中央就要下指示，叫大家不誤農時。主席、總理都注意到這個問題，一直抓得很緊，所以老百姓才有飯吃。

全國全面階級斗争與奪權

工廠、農村大搞，後加上機關幹部要造反，這就是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含義。這樣惡果很大。學生容易收，這三個方面都搞起來，兩派鬥爭沒完沒了，直到現在創傷還不易癒合。

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集中反映了主席那一段的思想。可以看出「奪權」思想在主席思想中開始形成。光是學校沒有什麼大關係，涉及到整個地委以下的農村基層，黨組織統統癱瘓，這問題就大了。

這有個重要背景。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過生日。本來是歷來不請客的，這次請了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沒有林彪和總理，也沒有康生。

主席對康生不滿意，是因為北大六·一八簡報的問題。本來是康生調來檔案，查出北大有一個簡報，把六·一八事件當成反革命事件來處理。劉少奇在簡報上寫了批示，要各地彷彿。康生本來要就這問題告劉少奇的狀，但一看上面有自己的大名，又不敢告了。在文革小組會上（總理在場），康生說了這事，說有這麼個材料，揣在自己懷裏，幾次要報告主席都沒有報告。張春橋一聽，說給我看看，就馬上把材料送給主席，他告了劉少奇的狀，也告了康生，說康生把這份材料揣在懷裏好久也沒敢拿出來送主席。主席說：「要這種人有什麼用？」這句話，是張春橋親自對我說的。時間是在七月下旬十一中全會前夕。主席當時正在找「白色恐怖」的來源，這下拿到了把柄。張春橋臭表功，一個人一個人的吹風，不告訴康生。江青除了誇張春橋，還說主席最欣賞的是姚文元。

過生日這天，主席的話很多。最重要的都在六七年《紅旗》元旦社論上。主席站起來祝酒：「為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幹杯」。

在這次過生日的會上，主席叫張春橋、姚文元回上海，要立即去，要他們掌握上海的局面。他們原來用電話同上海經常保持聯絡，這時又作些準備，耽誤了幾天。後來主席又個別找張春橋、姚文元談了話。江青本來對陳丕顯很好，在十月工作會議期間，單獨請陳丕顯吃飯，以為陳會為她效勞。她以為整個上海是她的陣地。後來出了安亭事件，陳丕顯和張春橋發生直接衝突，江青就來一個大轉彎，立即支持張春橋，反對陳丕顯。接着，江青又直接布置聶元梓去上海造市委的反，支持王洪文一派，打倒市委。聶元梓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張春橋很不滿意。江青是講過叫聶元梓用群衆組織名義，不要用中央文革名義。但聶元梓還是打了中央文革的旗號。十二月聶元梓從上海回來報告說，上海市委已垮臺，曹荻秋已被打倒，陳丕顯半打倒。

一月八日晚上，主席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還有唐平鑄、胡痴，沒有總理、康生。會開了半截，打電話通知我去。因為一月四日陶鑄被打倒了，主席在這個會上說所有的部要改成組，現在要成立中央宣傳組，由三人組成：王力、唐平鑄、胡痴，王力擔任組長。（主席可能是臨時考慮要我來當比較合適。要不然不會在會議開了一半的時候才叫我去。）我一去，主席就提出要我當組長，弄得我莫明其妙。我說，我不行，我祇能作陳伯達的秘書。主席不高興，不回答，繼續向我布置工作。（我不知道那時主席對陳伯達已經相當不滿意）。主席布置的第一項任務是：你們三人立即去廣播電臺廣播文

匯報刊登的上海三十多個群衆團體反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主席口授了按語，說這個通告不僅對華東，而且對全國有重要意義。并要我馬上給張春橋打電話。我們立即辦了，記下按語，整理了一下，主席看了，算是定稿了，立即廣播上海的通告和這個人民日報編輯部按語，第二天見報。這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總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葉群也沒有通知。當時還任命胡痴當新華社社長，要陳伯達、王力去宣布。這麼重要的會議，也沒有告訴總理一下。會議前一段說些什麼，我也不知道。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說法是主席在六七年二月提出的，主席認為修不修要看是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二月中旬，主席要我寫文章，并規定了文章的題目：《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對李井泉，主席從八月份保起，到十一月就不保了，保李井泉是爲了保賀龍。那時，主席真心要打倒的，我看一個人也沒有。但是，誰不聽他的話，不執行他的路線，就要打倒一下，說些氣話，反過來又覺得這個人不錯，說些好話。七月十八日主席對總理說：「趙紫陽、張平化、劉子厚、張體學……要保。」「都給打倒了，打倒那麼多，我也不高興。」

六七年五月一日，總理收回當天的人民日報要重印，一定要把出席五一慶祝會的文革小組成員名字排到中央委員前面。當時總理主持政治局，處境很困難。王力提出，我自己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應排在中央委員後面。總理很費苦心，怕江青看到後作文章怎麼

辦。總理說我是主持政治局的，這樣做不行。當時江青的位置已放在政治局、書記處前面了。文革小組和江青的地位大變，是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以後開始的。

主席在批發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時，就說這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十六條有這思想，但沒寫要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舊的國家機器。當時覺得不大好這麼說，祇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要「接管」政府機構的思想，毛主席老早是有。他不祇一次說過「過去革命是軍隊解放的，機關這一套機構我們祇派少數人去的，大部分是留用人員和新招的人員。這樣的機構不是工人、農民鬧起來奪取的機構，這樣的機構容易保留封建主義，容易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這種意思，主席講過不祇一次。特別是工農起來後，他常講這個。主席說這是爲了防修反修。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是先有根據地，然後才有一全國政權，這是比蘇聯好的地方。但也有不比蘇聯好的地方。主席引的語錄都不適當：什麼「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爲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蘇維埃機關職員也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等等。主席這一思想，六三年就有，并見諸于國際共運二十五條的文字。這個文件的初稿，主要是陳伯達和我在杭州，在主席直接領導下起草的。九評，康生祇起組織作用，執筆人主要是我和吳冷西，鄧小平拍板，初步定稿。鄧小平要康生署名，送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主席最後定稿。九評中也有上述三條引文，可以查到。所以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思想，接管的思想，早就有了。

一月九日，上海奪權見報，中央並發了賀信。賀信的問題更大。最初發的是主席口授的人民日報編者按：人家都來問：按語代表不代表中央？因此主席要總理主持討論中央賀信問題。賀信原來是一月八日晚決定的，那次總理沒在場。這次是在總理主持下，通過了中央對奪權問題（未用「奪權」這個詞）的正式賀電。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的。賀電通過後，主席到會，說署名要加中央文革。總理主持討論時，署名按慣例是三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現在成了四個了。這封賀信是陳伯達、唐平鑄、胡痴起草的。署名變成四個，後患無窮。中央領導下的一個機構（中央文革）可以同中央并列。過去書記處也沒有過。我當時覺得不合適，但沒有提。如果提的話，主席也不大可能接受。從此，中央文革可以向各級黨委下指示了。

當時主席盡管有接管的思想，但沒有用「自下而上奪權」的口號。黨中央雖然早就用過「奪權」口號，但不能祇看字面。那是在文革之前，在「四清」運動中，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發過《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文革」一開始，陳伯達在人民日報就用了兩次「奪權」字樣，但這與後來的「奪權」祇有字面上的相同，意義完全不同。以前說的「奪權」，都是由上而下派工作組去改組下級黨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自下而上奪權」口號，是上海張春橋傳來的。傳到北京是一月十幾日。工人體育場開十萬人大會，陳伯達講話，一是誇上海，一是說自下而上「奪權」的口號

不對。祇能監督，不能奪權。還說「上海奪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會一開完，主席就知道了，馬上召開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批評陳伯達。主席講了一大篇道理，主要内容都在《紅旗》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一文中。主席說，上海奪權的口號是對的。講了一大篇道理，基本內容寫進了我和關鋒執筆的那篇評論員文章。廣播以後，影響太大，實際上是新的五·一六通知，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這是要害性的大問題。其他問題都是枝節性的。文章提出黨權、政權、財權都要奪。這在當時是起主導作用的。文章寫好後，送給陳伯達。陳伯達受到批評。從此祇能照毛主席的話去說。他以客觀態度送給主席審閱，說王力、關鋒兩同志為《紅旗》寫了這篇文章，請主席審閱。主席批：寫得很好，照發。當天就廣播了。支持上海，號召全國奪黨權、政權、財權。主席在常委會上又講要接管政府機構。連公安部門也要接管。新幹部接老幹部。當時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奪一小撮走資派以及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這篇文章也沒有給林彪、總理、康生看，祇是主席決定的。後果不堪設想。

記得當時總理提出對當權派、領導幹部要分析，具體分成了五類：第一種是黑幫；第二種是走資派；第三種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四種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第五種是犯個別性一般性錯誤的。而第五種是絕大多數。總理的這番話是一月二十幾日的常委擴大會上講的。主席同意總理意見，還提出不能祇用一種辦法來對待幹部，提出五種辦法：一種是

全部改組，象上海張春橋、姚文元那裏；二是監督留用的；第三種是停職留用的；第四種是撤職留用；第五種是撤職查辦。而第五種要極少。總理說：「我是支持左派奪權的，但奪權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嘛！各部的奪權不要造成青黃不接，工作不能停頓。第五種撤職查辦的要極少。即使是撤職查辦的，也要讓他們工作，不要祇讓睡覺，掃大街。這樣左派隊伍才能擴大，工作才能搞得好。這并不妨礙他們抓大事，抓革命。」主席同意。後來也執行了一些。

以後，也是在一月份，主席又在另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講：不要分了。當時報紙上這樣提的：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與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權。主席說不能仔細分，把權奪過來再說。到運動後期再去分。主席這段話沒有見諸文字，見諸文字的，祇有總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傳達了。這以後就不分了，對幹部的幾種處理辦法也不分了。祇剩下不讓掃大街了。幹部留在工作崗位上的更少了。這樣，又把本來的區分變成更加不區分了。

以後主席又提出一個問題，是跟我說的：不要再在報紙上提「奪堅持資反路線的人的權」了，祇提奪走資派的權。這說明他想範圍還是小一點。主席一會這麼指示，一會那麼指示。

主席也有一些當時看來是好的作法。例如支左，在當時就是好的。當時不支左，不得

了。支左也是主席在常委會上說的，要我馬上起草，不要經過任何人。送他批後直接發。還有他提出不準戴高帽子、剃頭、游街。在軍委八條以前他就這樣提了。主席明確說：「這是屬於武鬥範圍」。總理反映過，我也反映過香港報紙登了王任重、曹荻秋戴高帽子的照片。主席叫我代中央寫一個通知，叫各地的小報都不許登戴高帽子的照片。但是這些指示的效果很小。

《紅旗》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是主席奪權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是根據主席歷次在常委會上談的和個別談的話整理的。主席要陳伯達、關鋒和我起草這個文件。陳伯達沒參加寫，是我和關鋒寫的。主席批：寫得很好，照發。文件講了五個問題，最嚴重的是要打破國家機器，要用新形式代替舊形式。這才正式表述了他從廣播第一張大字報起就有的思想。文件反映了這個理論變成實踐、實踐又提到理論的過程。北京公社宣言，文件中也講了。而且主席要江青提北京公社的名單。「公社」不是上海發明的，首先是北京發明的。是北京陳伯達打電話給上海，通報北京準備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慮成立公社。陳伯達打電話時，我在旁邊。成立北京公社，名單中提了些什麼人，是江青與關鋒商量的，總理不在場。他們提出由黨校李廣文負責，文革成員戚本禹參加領導班子，奪北京新市委的權。主席不同意李廣文，說要謝富治負責。主席還要我打電話給上海，說上海領導班子要張春橋、姚文元參加，這是常委的決定，主席的意見。主席沒有叫我讓上海成立公社。

奪權後，主席也沒有料到會那麼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從一月奪權開始後不久，主席不斷說另一方面的問題，一般不多講奪權、打倒的這一面，而是強調另外一面：不準武鬥，而且說得很嚴重，說打人的要法辦，對幹部怎麼能和對地主一樣，他們都是革命有功的。以奪權為轉折點，主席一直在強調「各省第一書記不能都打倒，最好能站出來。」主席誇劉建助，對潘復生更重視。在奪權後，主席同我說，「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各省的第一書記，大區的第一書記，除掉個別的之外，還是要選到中央委員會的。」主席以為幹部站出來很容易，不過是亮個相嘛，貼張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不就行了嗎？他不知道這是不行的。

主席在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後，反過來又講反對無政府主義。有的地方提出要「改變無產階級專政」，他說這是反動的。六月又批判「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他說祇能是部分改善，不是徹底改善的問題。他反復講大聯合的問題，幹部問題，一定要有領導幹部作為新的領導機構的成員，并且是骨幹。部隊要參加。主席說，紅衛兵，工農分子，他們在革委會中數量可以多一些，但要革命領導幹部起決定作用。主席認為張春橋就是革命領導幹部。並說山西好，革命領導幹部在革委會中占百分之三十，說上海還不如山西。主席總是這樣，把問題講到頂點，就不斷地講另一方面的問題。

主席認為最初奪權的幾個省還可以，就是上海、黑龍江、山東、貴州、山西。但他也看

出了問題，省級的領導機構光是自下而上地自發地建立，是不行的。所以他決定以後各省市
奪權一定要到中央來談，才算數。因為上海一登報，各地都搞了，主席說這不算數，一定要
到中央來談。主席要總理主持，因為政權「要經國務院批准」。這是主席在一月底二月初的
常委會上講的。總理負總責，各副總理都分工管各地的問題，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
林、謝富治都參加了。文革小組不一定參加，總理覺得需要才通知參加，國務院各部的問題
都由國務院辦公會議來處理。

所謂『二月逆流』

一、火是毛主席自己點起來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大約是三、四日的樣子，主席在一個很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議上說：
「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這個會在座的現在活着的可能祇有葉劍英、我、還有江
青、陳伯達。主席原來已有這個意思。中央給上海一月奪權的賀電的署名，是主席加上了

「中央文革」。這次主席講「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是肯定了既成事實。然後他批評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制，一直到現在還沒建立起制度。這話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說不只是文革小組內部沒有民主集中制，而且對主席也不報告。

這次主席是原則上的批評，說文革小組沒有正式會議作出過決定，各人說各人的，康生說一套，陳伯達說一套，江青說一套，對上也沒有報告。後來陳伯達就寫了一個文革小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報告。

接着，二月十日，主席又召開了一個常委擴大會議，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會議。範圍同上次差不多，參加的有常委——主席、林彪、總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此外還有葉劍英、江青、我。會上，主席發火了，罵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指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這是最重要的幾句。然後罵江青：「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裏祇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祇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這是因主席原來沒看到陳伯達一月四日接見中宣部揪王任重代表團的講話記錄，看到以後，非常不滿。一月份，陶鑄剛被打倒時，主席也說了陶鑄很多壞話，打倒陶鑄他是贊成的，但不贊成陳伯達和江青那麼樣打倒。

然後，主席罵林彪。別人沒覺得，我注意到主席是面對着林彪講的：「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陳伯達慌了，當天要檢討。我對陳伯達說：「今天主席批評你『專門投機』，份量是很重的。主席又批評現在的領導還同過去一樣，很明顯那是對林彪的。你可不要再在主席、林彪之間進行投機了。」當時關鋒在座，陳伯達走開後，關鋒對我說：「王力，你今天的話說多了，他要把這些話告訴林彪，你是要掉腦袋的！」我說「不會，頂多關起來」。

主席在常委會上最後說，文革小組要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他要我立即打電話叫張春橋和姚文元回北京，我照辦了。主席還講：陳伯達、江青的問題，祇準在這個地方說，在文革小組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談。說是不準講，當然辦不到。葉劍英就同老帥們講了。李富春就同副總理們講了。這樣就點起火來了。主席在這個會上還決定，以後主席主持的常委會範圍要擴大，主席提名增加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謝富治、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回北京也參加。還增加葉群、楊成武。蕭華不斷被打倒，祇是有時參加。汪東興開始沒有，後來也常參加。這些會都不通知陳雲、朱德、聶榮臻等。

二、文革小組批評會和陳伯達要自殺

十二日，張春橋、姚文元到京。張春橋說主席早上給機場打了三次電話，催問張、姚來了沒有，這是吹牛。事情是主席要我辦的。徐業夫打電話問我張春橋來了沒有。是我到機場

接的，直接接到中南海游泳池。張春橋說主席在門口接，沒這回事。主席坐在屋裏，穿着他那睡衣。那次主席談話的第一個主題是講成立上海公社的問題。主席沒有批評張春橋。他說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滿意的，并說原來我們考慮成立北京公社，但後來想這個問題牽涉面太大，涉及到整個國家體制問題，修改憲法問題，特別涉及到外國承認的問題。主席說上海公社還是改過來。張春橋回來後對我說：我們正式成立公社時，打電話來請示主席就好了。這回主席沒怪張春橋，問了幾次：改過來，有困難沒有？張春橋說：沒有困難，回去就可以改。主席問跟群衆怎麼交代？張春橋說祇要說主席的指示就行。主席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這也是重大的決策，改為革命委員會。這時主席還沒最後定，也說了，是不是可以考慮還叫市人民政府、市人民委員會？三個內容都一樣。

主席這次談話的第二個主題是要黨，不能不要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時，主席曾說學校黨組織不要忙於恢復。這時整個黨組織都癱瘓了，他說不能不要黨，當然已經晚了。主席從社會民主黨、國民黨一直講到一貫道，說就是一貫道也都要有黨嘛！我們共產黨不能不要黨。結論是搞個核心小組。後來就是這樣作的。

第三個主題，是主席同我講，王力同志，你要寫篇文章，題目是《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其餘談的都是一些枝節問題。要上海學習山西，多吸收領導幹部。主席附帶問我：你跟

他們講了沒講找他們來幹什麼？（指批評陳伯達、江青）我說講了一些，等主席見了以後，再詳細講。這次講話談了兩個多小時。

十四日下午，開會批評陳伯達。在這之前，陳伯達很緊張，想自殺。他先是單獨對我說的。我說你怎麼要自殺呢？主席批評你是好事，他說過，我批評一個人，就是說這個人還有可能希望，沒希望的人就不批評了。陳伯達說，我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的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他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勸他不要自殺，要請求總理幫助。陳伯達說他再找總理、康生、關鋒三個人談談。我說，你這樣的心情，檢討寫不下來，不如給主席先挂個號，寫幾句，備個案。他說幾句也沒法寫，要我替他寫，他抄。陳伯達說：打倒陶鑄會上發言的事，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說，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陳伯達又說：我服了安眠藥沒醒，亂講一通。我說，這不對，你講得很有條理。他說，我自己沒有法了，不講不行了。我說：你要向總理談清楚。陳伯達打電話，要到總理那裏去談，總理說我馬上就到你那裏去。總理同他談話後，他才不自殺了。這是十四日文革小組開會前談的。陳伯達也同康生和關鋒分別談了。開會前，我和關鋒去請康生到會，康生拍着桌子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當時我沒說話，認為他們要吵就吵吧！關鋒勸告說：康老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發脾氣，要忍住，這樣你到會上罵江青同志，怎麼得了？康生才憋住氣了。

十四日下午這個會，是在釣魚臺十六樓召開的，從三時開到七時。江青不到會，說病了。會上光批評陳伯達一個人，一句沒批評江青。這次是文革小組內部開會，也沒有請總理。到會的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會開得馬馬虎虎的，因為康生、關鋒和我都知道陳伯達被逼得要自殺了，誰還去批評？這是第一次，說以後還要再開。在會上張春橋、姚文元為江青開脫，說主席二月十日講的話，是說陳伯達問題的性質同江青的性質不一樣，陳伯達是路線問題，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風上的問題。後來有人把陳伯達要自殺的事告訴江青了，江青指着陳伯達的鼻子罵：「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怪事多呢！文革小組不是鐵板一塊。

三、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事件

然後就是十六日下午，總理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碰頭會，通知是談經濟問題。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葉劍英、謝富治參加。文革小組成員有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參加。國務院有余秋里參加。報刊上謠傳的出席名單中，有聶榮臻、谷牧、關鋒、戚本禹四人，其實這四人並沒有參加。所謂在坐位上是什麼「兩軍對壘」等等，也是虛構的。張春橋、姚文元本該回上海了，因經濟工作同上海關係很大，臨時要參加的。江青是不去，關鋒、戚本禹是沒有通知。會上的情況，大體上都知道了，我不詳細說了。這個會一直到散會，也沒有正式開會。總理沒有宣布開會，祇宣布

散會。

會前，李富春將主席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情況，向國務院副總理講了。大家都議論紛紛。這些人都到會了。還有譚震林寫了兩封信分別給林彪、陳伯達，對文革小組的人不滿，在給陳伯達的信中說你的助手（指江青）不令人滿意。他知道陳伯達不主事，所以把矛頭對着江青。給林彪的信說江青是「中國當代之武則天。」

會上，最初譚震林對張春橋、姚文元不滿，從上海揪鬥陳丕顯的問題說起，然後一人一句，越說越熱烈。我認為當時最重的話是陳毅說的，矛頭對着林彪，也批評到主席。陳毅說：「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以後又怎麼樣？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現在又怎麼樣了？」意思是說現在又搞出一個林彪當接班人，又會怎麼樣？總理在當時的情況下處理得很好，他祇能這樣做。李先念在會上批評《紅旗》十三期社論（注：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根據毛主席指示，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一篇。）說：「這篇社論以後，幹部都被打倒了。」總理對康生講：十三期紅旗社論，這麼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送給我們看看。（紅旗社論發表以後敲鑼打鼓，也是從這一期開始的。）總理實際上是批評陳伯達、康生、江青。康生說：「我不知道啊，我沒有看。」總理又問陳伯達，陳伯達也說：「我也没有看。」康生、陳伯達都睁着眼說謊。他們都看了，標題就是陳伯達改的。

譚震林的目標是對着江青的。他以為林彪能幫助解決問題。陳毅對林彪不抱幻想。但總

理對陳毅講話中個別走火的地方插了話，是正確的，必要的。總理處理得是得體的，他祇說延安整風要肯定。當譚震林退出會場時，總理拍了桌子：「回來！」總理後來自己也講，對待這樣組織原則問題，我是不能讓步的。這是黨的政治局會議嘛！總理後來說：「我這個人，對待黨內路線問題，我是不那麼尖銳的，但是對一個敵我問題，一個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問題，我這個人是從不含糊的。」這番話，是總理在懷仁堂政治局生活會議最後總結時講的。

當時徐向前也拍了桌子：「還要不要解放軍？」葉劍英在這個會上沒那麼激烈。葉劍英發脾氣是在搞軍委八條命令時，他知道江青不同意時，在文革小組的會上拍了桌子。葉劍英在這次懷仁堂會議前對陳伯達說：「我們不讀書、不看報、理論水平低，向你請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搞上海公社呢？」會上祇有謝富治不斷說：譚老板，這樣不對，這樣不好，等等。我同意會上老同志的觀點。我在會前根據主席在奪權後一段講話的精神和總理的意見寫了《必須正確對待幹部》的社論。主席在紅旗雜志奪權社論中就加上了一「祇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又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幹部就都要團結這一段話。特別強調這一點。

四、張春橋和江青利用這件事無限上綱，向毛主席告狀

會議開到七點，總理說：「現在時間到了，以後再說吧！」就宣布散會。總理沒當回

事。剛一散會，姚文元就對我說：「王力，你要站穩立場，這是一場大的鬥爭」。張春橋約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間說：「今天這個問題很大，要將情況對一對。」我也贊成對情況，我說不能歪曲事實。我記下了要點。造謠是沒有，當時認為不對的話，都對上了，包括總理、康生、陳伯達的。接着張春橋去報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張春橋向江青一條一條講，江青暴跳如雷，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在路線鬥爭中動搖。」（李富春同志在會上一言未發，所以沒有提到。）江青說要立即報告主席，「你們三個都要去。」說主席這次是叫王力通知張春橋、姚文元來的，現在他們要回上海了，還是要三個人向主席交代。江青馬上打了電話。江青這人的特點是，到主席那裏開會時她躲在一邊，一句話不說，一出門，她就對一切都發號施令。

晚十時左右，我們到了主席那裏。主席先問張春橋什麼時候走？張說十八日走，問還有什麼指示，主席說沒有了，都談過了。簡單說了幾句。張春橋說：今天發生一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着把剛才對的情況（沒有造謠，也沒有江青的評論）向主席匯報了一遍。我一言不發，祇是聽着。我注意到匯報前面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裏，板起面孔，從此以後再也沒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如張春橋說總理對紅旗十三期社論沒送他看有意見時，主

席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常委審查！」匯報的時間不長。主席已經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有發大脾氣。他針對這種形勢，最後說：「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幹部，第四生產要搞好，要抓鐵路和煤炭。」張春橋告了總理一狀，說：「主席還記得嗎？我們送過一個東西給主席的，我們不贊成把所有幹部放到火裏燒的，那就是在譚震林這些人都參加的會上搞的，是他們要把幹部都打倒的。」原來這個文件，是文革開始時搞的，主張司局長以上幹部都要燒。這是李富春主持的、陶鑄抓的、副總理和各口負責人都參加的會議的紀要。總理閱後送中央文革，總理在上面批了：「我看這個文件很好，請文革小組同志閱後送主席。」關鋒在文件上批：「我看這個文件不好。」當時他在文革小組值班。我是不贊成對幹部都火燒的。因為提出對幹部都要火燒以後，連二七機車廠裏的班組長都燒了。於是，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王力五個人聯名對文件提了幾點意見，主要是不同意把所有幹部都要放到火裏燒。我知道這不怪總理、李富春和陶鑄，因為在這以前，毛主席提過要讓所有幹部都在運動中表演一下。當時這個由五人署名的文件，連原件一起送江青，江青送主席，主席看了後退文革小組。主席對陳伯達和王力說，這個文件壓下不發了。但沒有文字指示。當時毛主席要陳伯達把五個人的意見告訴總理，要王力告訴余秋里和谷牧。這次毛主席沒有提這件事，是張春橋舊事重提。主席正在火頭上，叫張春橋馬上再把這個文件送來。我爲了緩和空氣，也向主席提出：前幾天我和關鋒根據主席意見寫

了一篇《正確對待幹部》的社論，不知主席看過沒有？主席說，你也把這篇東西立即直接送來，不要經過陳伯達。我看主席的氣也消了，就提出：以後《紅旗》的重要社論，還是送總理和政治局有關同志審閱一下，祇有好處，沒有壞處。這次大約談了兩個小時。以後主席給「王力、關鋒二同志」寫了一封信，說這篇社論要經政治局討論，并要總理主持。毛主席還是接受了我的建議。這篇社論在當時是好的，把毛主席歷來講的這方面的正確意見集中起來了。這些觀點，總理也是反復強調的。總理看了社論很高興，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是他親自讀的。陳老總在會上特別走過來拉着我的手說，寫得好極了，照這樣辦，大家就沒有意見了。

五、急轉直下，風雲突變，由反「左」變成了反右

十六日以後，發生了新的情況，估計是譚震林給林彪的那封信的問題爆發了。林彪本來沒有馬上把這封信轉給主席。張春橋十八日早上走後，江青要我去向林彪匯報懷仁堂會議情況和主席的指示。本來十六日晚上，主席就關照我，要把這個情況和他說的「四個抓」報告林彪和周恩來。那知江青要張春橋多留一天，去同總理談，就不要我去講了。我就祇有報告林彪的任務了。報告林彪，江青又要同我一起去，她自己先到林彪家，叫我在京西賓館等着，然後又接我和她同車去到林彪那裏。見了林彪，江青和葉群在座，叫我匯報，葉群記錄。林彪祇是聽，沒講多少話，一句話是罵徐向前，說「他不能代表解放軍」，還說

了一句：「陳伯達不過是一個書生」。匯報完了，江青叫葉群派車把我送走了，她一個人留下來了。

大約是十八日深夜，主席召集會議，在會上發了大脾氣。那天我沒有參加會議，後來聽康生講，那天參加會議的有總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除了康生以外，沒有文革小組的任何人。康生在會上作了詳細筆記。毛主席在會上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張國森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一塊來吧！」總理勸主席不要這樣生氣，他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得好。緩和了一下空氣，主席的氣也就消下去了。當時決定召開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的生活會，對他們進行批評。陳毅的工作由總理親自做，親自談話。李先念和謝富治去做譚震林的工作，葉劍英、李先念和謝富治做徐向前的工作。還要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會議一直開到拂曉才散會。

康生嚇壞了，回來後跟我們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從此康生在江青面前俯首貼耳。康生要馬上傳達，但江青正在睡覺，不敢叫醒她，自己也不敢睡覺，坐等，說什麼時候江青起來，什麼時候向她報告。這是過去沒有過的。康生

對江青原來是直呼其名：江青。江青也最怕他，她知道康生在延安中央社會部時知道她的底細。康生這次一反常態，是因為康生被主席講的話嚇破了膽。康生找到陳伯達、王力、關鋒，說：好了，這回解決問題了。陳伯達不用檢討了，不反「左」而反右了。他解放了，當然高興了。記得江青當時還說：站在正確路線這一邊的祇有謝富治一人。當時主席也很欣賞謝富治。主席總是一有機會就說小平同志的好話，這次又說：「謝富治是小平用的人，小平同志還是會用人啊！」主席讓陳、譚、徐三人請假檢討。批了一陣以後，又派江青代表他去看陳老總。

六、所謂「懷仁堂事件」的直接后果

這個事件以後，江青就以文革小組名義公開向總理奪權。一次是江青在文革小組會上公然對總理說：「主席已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象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總理祇好說：我以後祇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這是二月「懷仁堂事件」以後不久的事。這話江青說過兩次。不久，張春橋又回北京，是開軍委擴大會，江青、張春橋又把這問題提出，嫌總理做得還不够，逼總理交權。逼得總理祇好說：「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張春橋反而倒打一耙說：「總理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對張春橋說：「你們應該檢查一下為什麼總理說出這樣的話來。」再一次，江青公開說：「地方成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總理不要管了。到北京來匯報，總理太忙，不要組織了，由文革小組組織。」從

此，就由文革小組組織了。除謝富治外，其他副總理都不要了。對總理，當然還是通知的。總理每會必到，并且主持會議。

七、「反革命復辟逆流」問題

這時主席批了陳伯達送的小站的材料，說：「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復辟的現象。」主席說的是「現象」，而「逆流」是陳伯達發展的。主席叫我把主席的批示傳達到當時正在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江青和張春橋要把懷仁堂會議的材料發到軍委擴大會議，主席不同意，說文件牽涉到總理，不能發。江青叫我和她一起去參加擴大會議的一個小組會，她說主席的意思是文件不發，但是要你在會上講一講。

「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提法，主席也同意過，不過時間很短。四月初，他提出：「究竟有沒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有些人說有，他也還認為有。又考察了十多天，到了四月中旬，他又在常委擴大會提出：「究竟有沒有反革命復辟逆流？」我的領會，他的意思是沒有，至少是懷疑。但被張春橋打斷了，張說：「當然有。」主席就沒說下去。會後，陳伯達說要寫篇紅旗社論《堅決打退反革命復辟逆流》。過去每次社論，都是我和關鋒起草，他看了送主席。這次他自己主持了。我是從頭到尾反對。我說我的理解是主席不贊成這個提法了。他說他的理解主席是贊成的，送到主席那裏，主席空前第一次將這篇社論壓住不發了。陳伯達因為主席是批了他送的小站材料，所以非要搞這篇文章不可。我把寫這篇社論的

過程報告了主席。主席說：「這樣定，以後社論不能由陳伯達簽發，要由總理主持的文革小組會議通過批準，才能發。總理能定的，就不要送我。總理不能定的，再送我。」以後也沒執行，祇是一兩次如此。後來爲了紀念五一六通知發表一周年而寫的《偉大的歷史文件》，主席又不經過總理，要直接送給他了。

從四月下旬開始，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又可以參加常委擴大會議了。五一節上天安門，不存在陳、譚、徐三人的問題，因爲他們都已經能够參加常委擴大會議了。總理又提議朱老總、陳雲同志要上天安門，主席說當然要上。總理接着又請示說：「劉、鄧、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說：「就不上了。」後來江青在文革小組會上責問說：「總理，你怎麼還要讓劉、鄧、陶上天安門？」當時這成了一個大問題。在會上總理遭到圍攻，我逐字逐句地講明總理和主席當時的原話，總理就對着江青說：「你看，我沒有什麼錯誤吧？」三、四月份江青奪權的主要目標是總理。當時江青同林彪的矛盾不大，林彪是接班人，江青也不大可能奪「副統帥」的權。要奪就是奪總理的權。江青兩次提出要擴大文革小組成員，理由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她提議增加四個人：謝富治、楊成武、葉群、汪東興。主席第一次說：成員不要擴大，祇叫列席成員。政治上一切同正式成員一樣。過些日子，江青又提一次，說當成員好。主席仍說：列席成員。時間是在三月十八日以後。

八、懷仁堂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的批評會

從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十八日這期間，在懷仁堂開批評三位的會，一有空就開會。主席叫總理主持，參加的範圍是政治局委員、文革小組成員，加蕭華、葉群、余秋里、谷牧、汪東興等。會議叫「政治局生活會」，批評陳、譚、徐三位，主席定的讓他們「請假檢討」。會上還發了那個「所有幹部都要燒一下」的文件，主席把反對者的署名改為「文革小組六同志」。張春橋把這個文件的事弄到總理頭上，不光是對着陳毅和譚震林。他在會上說：「打倒幹部，不就是你們搞的嗎？」祇是不好明指總理罷了。總理自己心中當然有數，因他批過「很好」。總理很緊張。這個文件沒有發，被主席壓了。但是這個文件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都傳達了。總理後來作了檢討。前面說過，主席當時把那個文件壓下來和提的意見，要陳伯達報告總理，要我通知余秋里和谷牧（因為牽涉工礦幹部）。我是執行了。在釣魚臺十六樓跟余秋里談了。谷牧出差，未找到。直到這次懷仁堂會議總理檢討時，總理會後對着陳伯達和江青說：「這個問題你們為什麼不早向我打個招呼？」這時我才知道陳伯達沒有執行主席的指示，沒有報告總理。

這個會批評了三位，最後逼得總理作檢討。主要檢討自己在路線問題上不敏銳、遲鈍。江青攻他「動搖」，他祇說在路線鬥爭中遲鈍。總理在會上說：「第一、在敵我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從來是明確的，是堅持原則的；第二、在組織紀律問題上，我從來也是堅持原則的，總是要遵守紀律。」對懷仁堂會議文件，總理承擔責任，為被批評的同志開

脫，同時也說明，對有的同志因為一時衝動而脫離軌道的言行，他是沒有也不能支持。

因為有些人新參加會，總理先要我介紹懷仁堂會議的情況，讓我整理一個記錄，發大會每人一份。我整理了一份，涉及總理、康生的都沒寫。這個記錄已經不同于張春橋向主席報告時的那一份「對」出來的情況。我在後面還是加上張春橋和姚文元二人的名字，因為事端是他們挑起的。這個記錄，由我整理後交總理，總理改了。康生也改了。總理還要我在會上先念了一遍，核對一下，是不是有出入？當時祇有陳老總提出有兩句話他沒說，就是關於赫魯曉夫的那個問題，明顯地批評到了主席。總理說，不要改了。因為陳老總確實是說了。核對以後，才正式印發。會上每人都說一通，批評他們三位，有的同志是不能不表態。王力祇是念了并核對那份記錄，沒有另外發言。中間又傳達了主席的幾句話。攻得最厲害的是康生和謝富治。唯有李富春同志不是批評他們三位，而且自己承擔責任。本來沒有他的事，被批的人也沒賴在他身上。可是李富春說這件事應該怪他，說他自己是總理指定國務院副總理小組的組長，主席批陳伯達、江青的指示是他向副總理轉達的，許多議論都是在他家裏說的。康生借此說李富春是「俱樂部主任」，攻他。這個會議榮臻也未參加。

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後，總理沒向主席報告，因為他沒當個事。陳老總在會上對他們迫害老幹部的作法非常不滿，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如果光是這些，主席也不會發那麼大的脾氣。張春橋先挑動起來，到江青處就成了路線鬥爭，到主席處，最初主席並無

所謂，匯報到陳老總講延安整風時，主席才生了氣，覺得話說重了。變化是發生在二月十八日晚上，林彪和江青商量以後又向主席講了些什麼，才引起主席暴跳如雷。這點我不清楚。

會議過程中，向主席匯報的是汪東興。沒有出簡報，主席也沒有講話。主席二月二十八日對小站材料的批語，這次會議上也沒有傳達。

中央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

一九六七年三月間，中央召開了部隊軍以上幹部會議。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江青提議要把懷仁堂會議的文件發下去。提了幾次，主席就是不發。最後主席亮了底了，說「因為牽涉到總理」，所以不發。

三月十八日以後，就到處反擊「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帶槍的劉鄧路線」也來了，這是林彪在三月份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大會發言時講的，是針對趙永夫問題講的，第一次大會發言就有。大會總結時，他要關鋒給他起草，關鋒找了我和戚本禹。

林彪原來要關鋒當總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陳伯達說紅旗雜志離不開。主席批了：「要解放軍，不要紅旗。」但要徵求其他人意見。當時，祇有我提出不同意見。我說關鋒不適宜擔任這個工作。解放軍這麼多人，還找不出一個主任？這會傷部隊同志的心。再說蕭華並沒有打倒，可以保。雖然關鋒另有長處。主席同意我的意見。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又講了「帶槍的劉鄧路綫」的提法。在開這次會的問題上，江青整了總理。當時局勢很亂，沒有軍隊什麼也不能維持。總理講軍隊不僅要處理軍隊自己的問題，還要把地方的擔子擔起來，把工業農業擔起來，擔子很重。總理提議召開一次軍以上幹部會議，討論軍管問題。江青攻總理，說為什麼不先在文革小組討論？我說，總理是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文革小組會議上提出議定的。江青又說：調一個營都要主席批准，開軍以上幹部會議，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報告主席？總理是報告了林彪的，林彪批准以後就召開的。為什麼主席不知道？責任當然在林彪。總理只好向主席作了檢討，但也把經過的情況說了一下。總理當時說：不解決這問題不得了。生產沒人搞，飯沒得吃了，什麼事情都辦不成了。主席也表示應當召開這個會議，沒有責備總理。

趙永夫事件問題。趙永夫開槍，是報告了林彪的。林彪回答說：「打得好！」可是到這時，林彪又說這是葉劍英講的。這次事件總共死傷一百多人，其中死了大約二十多個。這在當時當然是個重大事件。本來，在會議上開始是要推廣這個典型經驗。散會時，又成了反革

命逆流的典型，把趙永夫等人抓起來了。

所謂「對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的革命大批判」

四月一日，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總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祇有江青知道。主席改了三遍。戚本禹傳達主席命令，立即廣播。這一來劉少奇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五·一六通知上有「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但沒有明點。一九六四年江青向主席告狀時就這樣說過。這次為什麼有這樣的變化，我不清楚。文章也點了鄧，說是「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這是多麼大的問題，把原來所謂「反動路線」的人都變成「走資派」了。（本來是要嚴格區分的，總理區分為五種人，而且前兩種人極少。）那時又說是主席的「戰略部署」。發表大字報、紅衛兵、大串連、全面階級鬥爭、奪權等，都叫「戰略部

署」。實際上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碰一步，碰一步就把「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更嚴重，就又升級。這次把劉、鄧、陶劃到敵人方面去了。對依靠部隊支左，又覺得不大靈了。

到了四月下旬，主席把「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提法否定了，認為不存在。除劉、鄧、陶是最大的走資派外，其他人都可以上天安門。陳毅、譚震林、徐向前都沒事了。四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就讓他們三人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了。

在這之前，當政治局生活會還在開的時候，江青根據主席「四個抓」的指示，奪了幾個權。她在文革小組會議上說要戚本禹抓煤炭和鐵路。總理不管戚本禹抓不抓，他一直在抓的。同時，江青又叫我抓外交部，理由是陳老總請假檢討。我說不行，我頂多照顧一下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外交部是總理管的。我說要請示主席。因為主席「四個抓」並沒有說要抓外交，祇講要抓煤炭和鐵路。江青讓陳伯達向主席講，陳伯達猶豫了幾次沒講。到陳伯達下決心要講的時候，已是四月二十六日，陳老總已參加常委擴大會了，而江青又逼着他非講不可。到快散會的時候，陳伯達才含含糊糊地說：「主席，要王力研究研究國際問題」。主席說：「這有什麼問題？」總理知道這個底，從此就將外交部的所有文件都加發康生、王力一份。可是我從未插手外交部的任何事情。戚本禹還真抓了，他從空軍調幾員大將，派去管鐵路，然後又叫他管煤炭。總理反對，在文革小組會上說：部隊的同志不能管煤炭，煤炭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張春橋聽了馬上說：「他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支左支得好，為什麼

就不能搞煤炭？一後來不知是不是這個人管煤炭了。

四月，主席提出：要開展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的大批判。公開提出罵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前一天，原來主席要我寫的一篇紅旗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是配合紅旗編輯部調查員的調查報告的。本來是內部材料，這時主席給王力、關鋒寫一封信，要公開發表。並且親筆加了一個『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標題。我原來寫的評論沒有涉及《修養》，主席看清樣時叫加一段。『修養是唯心主義』那一段，這是主席的語錄。主席當場口授，我記下來整理打印好再給主席看了，主席說馬上發。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開罵劉少奇。但那一天他並沒有給少奇同志戴上一頂『最大的走資派』的帽子，那一天的文章還是把走資派和犯路線錯誤的人區分開來的。為什麼第二天戚本禹的文章就變了呢？我也不知道底細。『越養越修』是主席的話。他早就罵《修養》了。江青說主席過去沒看過，其實主席在延安整風時不但看過，而且也是他把《修養》定為整風文件。

四月六日的「十條」和重新 公布《五·一六通知》

還有一個嚴重事件——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的「十條」，完全是林彪自己寫的，是他口授，秘書記的。起草後送給關鋒，要他斟酌一下文字。關鋒找了我和戚本禹，林彪的秘書在外面等着。關鋒作了一點文字上的修改，內容原封未動。我祇提出前面要加上肯定解放軍支左的成績。林彪送主席，主席也批了：「很好，照發」，同「八條」一樣。發表以後沒幾天，鬧得一塌糊塗，到處衝擊軍區。當時又傳達「帶槍的劉鄧路線」，加上「十條」，弄得局勢更加混亂。主席覺得嚴重，不行了，沒幾天就提出「要擁軍愛民」。主席說八條叫擁軍，十條叫愛民。八條與十條要結合，八條不是不要了。這兩個文件都是主席批的。他叫江青在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上講擁軍愛民間題，講了以後，好了一點，但還是不

行。主席當時講：「八條以後部隊神氣得不得了，十條以後群衆組織又神氣得不得了，現在都要。」其實還是收不住。

下面一個重大事件是重新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中間穿插了一個伍豪事件的問題。對於關鋒、戚本禹找周少華談話這件事，我不知道。總理後來專門在文革小組會上說了一下。對這件事康生積極為總理證明，在總理講完後，康生說這件事是敵人搞的，發生以後是由他處理的。總理查報紙，康生說伍豪委托律師的啓事也要查。總理專門抽出時間，親筆寫了個東西（大事記），先給林彪、文革小組閱。主席批「閱存」的話，我沒看到。

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不是事先決定的。如果有計劃的發表，至少在一週前就要做準備。五月十六日晚，主席靈機一動，打電話給我和陳伯達，要馬上發表。而且自己知道晚了，說：「社論是來不及了，可以晚一天發表」。這時康生緊張了，因為他是五人小組成員。主席要發表《五·一六通知》，同時還要發表二月提綱，作為附件發表。康生對江青說：附件發表合適嗎？江青同意不發附件，說：「涉及這麼多人。」（其中也有王力。）江青給主席打了電話，建議不發附件，因為牽涉的人太多了。主席同意了。這事沒開文革小組會。總理不知道，常委會也沒談。主席交辦的事，直接對主席負責，林彪也不知道。主席是不是另外通知林彪和總理，那我就不知道了。

主席當時認為要集中開展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大批判。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多少質量

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還是集中批劉，鄧沒有什麼好批的。陶鑄有些書，要組織批判。那時我的理解，主席決不是對着總理的，江青是否要借此整總理，就不知道了。寫社論是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連夜趕的，題目是《偉大的歷史文件》。其中的錯誤觀點主要是我提的：三個階段，一個里程碑。雖然字不是我寫的。這些論點全部被主席接受了。文字又經過他本人修改了，并且把關於斯大林的那段大改了一遍。那時我就是那麼認識的。主席叫我研究「文革」是如何發展馬列的，可是主席的很多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書上都沒有，當時我就說，這是新的發展，新的里程碑。關於斯大林那段幾乎是主席寫的。這個禍闖得在當時好象不大，但壞作用是深遠的。毛主席的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一直影響到十一大，以至更遠。這篇社論中有的內容，是主席加的，如：「這次文化大革命祇是第一次，以後必然要進行多次。」這對現實影響很大，使人猜測好象這次文化大革命已經完了，還必然要進行多次，而且有人以為就要開始新的發動了。

主席是否想整總理，那時看不出來。但他早在杭州會議上就提出「層層剝笋」政策，這是康生傳達的。一層一層地剥，「文革」就是這樣剝的，差不多都剝光了。

後來主席覺得不對，決定要六月初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保總理。主席的批語江青沒有給我們看，她祇說主席交辦的。江青要謝富治主持外事口加北京群衆組織的大會，我們都不知道是保總理的會。江青一手包辦。謝富治宣布開會，也沒講開的是什麼會。第一個講話的是

江青，她根本沒講一句保總理的話。江青在講話中不着邊際地講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勢，還是要針對劉、鄧，沒講保總理，沒講總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她說了一通就走了。接着是陳伯達講話，更不知講些什麼，也許陳伯達也不知道主席的意圖。謝富治就宣布散會。但群衆不散，鼓掌高喊：要戚本禹講話。我看戚本禹也不知道主席的意圖。謝富治最近一段話：肯動腦筋的人才有希望。然後又鼓掌讓關鋒講。關鋒也沒有講什麼。然後又叫我講。那天康生沒到會，說是有外事活動。他可能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不敢不去。康生聽說開群衆大會，讓我有機會講一講「三降一減」，批劉少奇。康生很得意。發明「三降一減」，是他從泰國、馬來亞、緬甸、印尼等常駐中國的兄弟黨中，收集了個別的偏激意見概括起來的。康生把劉少奇主持工作時我黨中央有關兄弟黨的絕密文件拿出給他們看，發動他們給中共中央提意見。這些文件本來是絕不應給任何其他黨看的。在五月下旬，在主席召開的常委會上匯報，他提出：叫「三和一少」不够了，應叫「三降一減」。康生的提法得到了主席的同意。這個提法在我被打倒兩年之後，還正式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可見把這條罪狀歸于王力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是主席和常委的指示。當時康生叫我講，我就照講了。當然，我沒有說總理和陳老總是「三降一減」。主席過去講的「三和一少」，現在康生經過毛主席把它升格為「三降一減」，就是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我在這問題上，不但不同意康生，而且對主席也提過意見。我不贊成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

視同仁」。我主張「內外有別」。我說：要兄弟黨參加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其他黨來解決我們黨的問題，也不好用這個大革命來解決其他黨的問題。這不合乎兄弟黨的關係準則。主席未置可否，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我不管宣傳工作（因為要我去西南）以前，一直沒在報紙上宣傳這個「三降一減」口號。這個大會，總理沒到會，他在人民大會堂另外的地方拉了一條綫聽，他很不滿意。這個會好象葉群知道一點底，她在講話中講了一句「總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別人都不着邊際。

當時流傳很廣的是楊成武說林彪說過的「對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句話的來源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不殺蔣介石，大家思想不通，楊成武找到林彪，林彪說：「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個針對具體歷史情況的說法，後來流傳成為普遍口號，就錯了。

六六通令是主席要搞的，從奪權以後他不斷反對武鬥，反對打砸搶，他說：「不管什麼情況，打人要受刑事處分。」那時出現了私設公堂，主席是反對的，要文革小組到各地去看，凡有這種地方，一律解散，一律把人放了。如果主席一直貫徹他的這個思想，文化大革命不會鬧這麼大的禍。後來他自己又從另外方面想了。主席這時希望從理論上政治上多搞些大批判，他認為現在的鬥爭方式太低級了，如「砸爛狗頭」，他說什麼狗頭？是人頭嘛！還有什麼油炸、火燒，他認為這些都沒有用，要從政治上理論上把他批倒。

後來所謂黨的『基本路線』是怎樣來的

那時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爲了紀念《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發表十周年而寫的《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理論武器》，這篇社論系統地整理了主席的思想。錯誤論點主要是我整理的。是我一個人起草的。主席二月中就交代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理，要把它歸納歸納，看有些什麼理論根據。我寫後陳伯達等一字未改。理論上的加工主要是我，把主席從一九六二年以來的錯誤思想集中起來了。我還把主席在兩次會上講的話系統化，以後被稱之爲「黨的基本路線」。其中都是主席的原話，東一句，西一句，集中起來，我一字未改，祇是一處，把他講的「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倒過來，改成長「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再就是把零散的思想集中起來，邏輯化，系統化。在這個問題上，我負有嚴重的責任。但這段話最能代表他的思想。如果没有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事實和毛主席的那些零散的話，也編輯不出來這樣完整的一段語錄。當時我寫的這篇文章有兩

重性。前面這部分是錯誤的，後面一部分反映主席經常講的另一方面的觀點，也集中起來成爲六條標準。每條的鋒芒都是針對當時運動中極左的東西，這部分可能有好的作用。本來這兩部分的份量是一樣的，可是寫好後在總理主持的文革小組會上討論時，後面這部分通不過。當時名義上是總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但江青在一旁，不合她的意，馬上就跳。討論時，戚本禹首先反對後半段，說：「這文章究竟是反右還是反左？」江青也反對反「左」。關鋒是紅旗雜志的常務副總編（陳伯達是總編，我是第一副總編）說：「那就勾掉吧！」江青定了這段不能要。陳伯達表示沒意見。本來他是誇「很好，我寫不出來」，現在也同意刪了。所以社論現在祇有一面，關於另一面，祇保留了主席提出的批判「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錯誤口號那一段，還保留了「六條標準」的引文。這樣一來，不僅不能表現當前主要是反「左」，而且那六條標準也都可以作反右解釋。這樣就通過了。總理說：「那就這樣發了吧！」這篇社論未送主席。這樣，後來成爲「黨的基本路線」這一段，當時並沒經過主席，當然他後來是看了。這得怪我，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十月的中央全會我都參加了，這次我還調來了檔案，把主席兩次會上的講話編成那麼一段。這後來成爲三次黨代表大會（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基本路線，一直到破除兩個「凡是」。主席的思想是那麼一步一步發展的。總理祇是打電話問了「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那段話是主席在哪裏講的？我說是在《九評》上主席自己加的。我應承擔的政治的責任，是把主席的指導思

想理出一個頭緒來了。可是，我這個「功臣」在兩個月以後就被關起來了。

一九六七年五一節前後的領導機關情況

這時政治局的會已經沒有了，祇剩下主席召開的常委擴大會。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是一直參加的，還有謝富治、楊成武。四月二十六日以後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也恢復參加了。朱德、陳雲一直沒有。七月，主席不在家，林彪主持常委會。他不參加文革小組會，「七·二零」事件前後，林彪在京主持常委會，連李富春也不通知。老帥一個也不通知，參加的人員同文革碰頭會一樣。

總理主持文革碰頭會，除了規定的議程外，就是大家哇喇哇喇一通，既無議程，又無結論。總理祇是他有什麼事到這裏通過一下，另外這裏有什麼事情要他去辦他去辦而已。

主席提議的地方到中央匯報三結合問題，總理每會必到。各省的各派群衆組織代表有時把人大會堂東、西大廳坐滿了。總理聽取他們一個一個的發言，然後陳伯達、康生、江青要

講話，最後還是總理講，當時副總理除謝富治外都不參加了。主席反復講，什麼事要問總理。總理當時很勞苦，接見一個接一個，還有對這個省那個省的指示，特別多。江青常常打着主席的旗號，事情很難辦。沒有總理善于講策略，事情會更糟。所有的指示都要經過總理、林彪、主席。

記得主席當時曾說過：「衝中南海也不要緊。」他老人家靈機一動就講了，這個問題可不得了。那就無處不可衝了。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有關衝中南海和國防部的那段話，是主席親筆加上的。他原來是當笑話講的：「衝中南海有什麼關係，人家不過想來看一看。祇有你能保衛主席，人家就不能嗎？」五一節上午，主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了幾個人：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張、姚被主席派到濟南去了）。坐敞篷汽車見群衆，因為事先沒有布置，人太擠，汽車開進中山公園就被包圍，無法繼續前進，就回來了。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參加，以上面這些人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時一面叫一些同志上天安門，一面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這個。

五月一日，主席特別讓曾志（陶鑄夫人）上天安門。人快散時，他提出要見曾志。曾志是井岡山的老同志。這時她已提早回去了，沒有見着。

武漢七·二零事件前後

六月下旬，主席要我和謝富治到雲南、四川、貴州去。他認為光到北京來談不行，要就地解決問題，從昆明開始。主席特別提出要謝富治負責。因為他在那裏當過第一書記。部隊是他指揮過的，是老關係。主席去武漢并不是真的爲了游泳，也是要就地解決問題，大聯合，三結合，革委會，想創造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主席當時認爲群衆發動階段已經過去了，發動得差不多了。主席講：「文化大革命」一年發動，一年勝利，一年掃尾。選擇雲南，是因爲雲南的問題出現在軍隊，部隊是謝富治的老部下。大軍區政委李成芳和省軍區政委張力雄各支一派，張把李的檔案公布了；參加過薄一波的決死隊，在蔣介石那裏受過訓練……李成芳把張力雄等五個軍區負責人關起來了。兩派鬧得一塌糊塗。主席叫我們做兩派團結的促進工作。讓李成芳把抓起來的省軍區五個主要領導人都放了，也不準省軍區散發整李成芳的材料。我提議李的歷史問題可以找薄一波問一下，究竟是不是叛徒？薄一波寫了材

料，說是整風中已弄清楚，沒有問題。主席布置時，沒請總理，也沒有找林彪。謝富治和我要去雲南，總理知道，是在一次看戲時碰面說的。主席布置工作時要我們馬上走。主席叫我把工作交給關鋒，從此我就不管宣傳了。我作了些準備，看些材料。臨走前，那時天已經很晚了，我要謝富治同我一起去報告和請示總理。到總理那裏，他正同張本談話，還有很多人等着要見。總理先見了我們，作了些指示。我們是六月二十幾日動身的。第一站是昆明，然後是成都、貴陽。謝富治提議增加余立金，主席又提出增加李再含。共四人。

下面談談七·二零事件問題。七月十三日晚，總理打電話給謝富治，要他到武漢接受緊急任務。謝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帶去的紅衛兵一起去，總理同意了。我因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務沒有完成，想不去，打一個電話問關鋒，詢問為什麼改變計劃？是什麼緊急任務？能不能不去？關鋒說：任務在電話裏不能講，你去就是了。十四日中午我們到武漢，李作鵬用吉普車去機場接的。當時總理已在我們之前趕到武漢了。隨後，總理在東湖賓館找謝富治、王力、李作鵬、余立金開會，傳達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會議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漢，大家勸他不要來，他偏要來。名義上說還要游泳，實際上是想親自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總理說他在會上提出謝富治（兼任公安部長）要來武漢，任務是保衛毛主席。主席同意，還說，武漢的部隊是謝富治指揮過的部隊。總理說：「主席的記憶力真好。我還記不清部隊的歷史，要秘書一查，果然過去主要都是謝富治指揮的部下。」總理去武漢是為了保衛毛主席。

席，他忠心耿耿。那時如果主席真出了問題，可是不得了的。總理連夜打電話，并先趕到武漢布置，把賓館的人都換了。原來賓館工作人員主要是百萬雄師的，現在換成另一派。同時不是讓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負責主席安全，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我認為這樣的作法很不妥當，但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針。我過去沒有研究過武漢問題，這次總理交給我的任務也是保衛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決武漢問題。主席當天晚上到達武漢。當天謝富治闖了禍，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報，我們從重慶來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沒有武漢軍區的人作向導，更沒有劉豐。因為劉豐是總理指定的保衛毛主席的主要負責人，陪總理去接主席了）。結果我們被人發現了。本來我們沒有任何任務解決任何問題。當我們被發現後，滿街敲鑼打鼓放鞭炮，兩派貼了標語歡迎我們。我們馬上報告總理，問怎麼辦？總理說，這也有好處，群衆正在懷疑為什麼東湖賓館的電燈亮了？這樣正好說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漢，要就地解決問題，以便掩護主席。這是被迫造成的，總理臨機處理了這個問題。這個決定由總理正式通知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總理不讓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車站上去接主席，而是自己親自去接。十四日晚，陪主席一起來武漢的有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

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謝富治、王力匯報西南情況，沒叫總理。是謝富治主要匯報的，我插了幾句。主席也插了一些話，說張國華很好啊，能到基層去，大聯合就是要從基層搞起。等匯報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總理也在武漢，便叫總理、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汪

東興也來一起聽。然後主席表示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總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請示：總理不能走，中央討論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我們都不知道，幫助主席處理武漢問題沒有把握。主席先問總理的意見，總理同意留下，主席說好。主席提出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我請求總理親自解決大軍區問題，方針解決了，我們除了保衛工作以外，協助主席做點具體工作。主席和總理都同意了。

總理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聽取匯報，參加的不到三十人。從十五日一直開到十八日。總理的總結不是個人的，而是傳達中央的方針，以及根據在武漢了解的情況，提出了具體的指示。他的總結提綱是用毛筆手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

總理和主席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我都有原始記錄，中紀委要我贍清過。他們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總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講：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衆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中央的方針是說得明明白白。主席講話向來如此，把話講到頂點，又反過來講另一面。所以主席就講得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方針，主席一條也沒有改變。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總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陳再道、鐘漢華開會時講的。總理聽完後才回去。臨行前總理又強

調布置讓武漢空軍絕對負責主席的安全。本來武漢空軍司令員是傅傳作，因為有人說他「是賀龍的人」，過不了關，總理才決定由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前負責的。謠傳說葉群打電話給劉豐，讓他一有事就請示王力，這不可能。那時，我不認識劉豐，林彪和葉群也不認識他。我是在送總理走的機場上才知道有個劉豐。那個是七月十八日開到晚上九點半，總理吃過飯後才乘飛機返回北京的。

主席事先講了這樣的話：開會時要將陳再道、鐘漢華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條方針他決不改口：他始終沒有講百萬雄師是革命群衆組織。主席說：「祇要兩派都是革命群衆組織」就如何如何，但他並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衆組織。主席強調百萬雄師有群衆，沒有一百萬，至少有十萬，說要着重做百萬雄師的工作。並且要謝富治、王力作三鋼、三新和鋼工總的工作，要他們擁護軍區，擁護陳司令員。

十八日夜（或十九日凌晨）送走總理後，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劉豐、肖前到水院（鋼工總的總部）。我反對過，謝富治一定要去。說：新華工去過了，百萬雄師總部也去過了，就是這一派沒去，應該去。到了水院，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劉豐、肖前都講了話，每人不超過二三十句話。沒超過中央確定的方針。我還根據中央指示，要求他們擁護軍區，擁護陳司令員。

十九日下午三時到晚上，在軍區小禮堂召開軍區黨委擴大會，師以上幹部參加。謝富治

傳達總理講話精神。我講理論問題，從「文革」發展的歷史說起，說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會後回到東湖賓館，我沒睡，軍區起草的要公開發表的聲明要我和謝富治修改。軍區作了檢討。我看了後說：「錯誤沒有那麼重，」我把它修改得輕了。叫醒謝富治看了以後退給了軍區。軍區負責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說：「改輕了，軍區很滿意。」

接着就是「七·二零」事件了。二十日凌晨，他們就來了。把我從東湖賓館揪到軍區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隊的，也有群衆，主要是穿海軍制服的。把我揪到卡車上，車上的人都戴着百萬雄師的袖箍，說是要到一個地方去辯論。我直接的感覺是車上的人，特別是主要負責人都是講理的。我跟他們講一些道理，他們都還聽，并沒有像後來流傳的那樣嚴重。他們還給我戴上百萬雄師的袖箍。到了軍區，每人都戴着柳條帽子，拿着長矛，坐得整整齊齊，讓我從人行道中穿過。我穿過人群通道時，群衆很文明。等進了樓到了一個房子裏以後，突然涌進了一些人，不知是什麼人。他們的負責人也控制不住，動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鋼筆也搶了，打得一塌糊塗。這件事，軍區沒責任，他們是保護我的。要沒有軍區警衛營，我很可能被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個人要向我開槍，警衛營長用自己的胸膛擋住了槍口。陳再道、鐘漢華同志對中央定的方針是擁護的，主席要他們檢討，他們也沒有任何抗拒。謝富治想進大院來，說：「我是謝富治。」讓人罵回去：「你是謝富治，進來就把你宰了。」他不敢進，又回去了。後來主席給陳再道、鐘漢華下了死命令，要把王力接出來。陳再道也住

在東湖賓館，被個別人誤認是王力，把他的頭也打破了，因此不能去。鐘漢華奉命去了，他很老實，在講臺上向群衆磕了頭，哀求說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讓他回去。陳再道、鐘漢華二同志是堅決執行毛主席命令的。當時百萬雄師負責人對我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我簽字，承認他們是革命群衆組織。我說，我沒有權簽這個字。中央要召集各派群衆組織開會，聽取大家意見。日程已經排好了，首先聽百萬雄師的意見。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衆組織，由中央決定。他們又說，是不是定了他們是反動組織？我說，我反對說百萬雄師是反動組織，我認為至少是群衆組織，而且是一個很大的群衆組織。

後來軍區孔慶德副司令員執行主席批示，利用吃飯的機會，把我弄到二十九師。我在二十九師後來被人發現，又轉移到西山。事件發生後，總理趕回武漢。總理最大的功勞是保護了主席。當時主席的住所附近已有擁擠的人群。決定揪王力，是百萬雄師負責人在我在水院講話以前就決定了。主席後來頭腦冷靜時，推翻了他自己原來的那些氣話，作出了新的分析，是對的：「不是什麼『兵諫』，不是什麼『謀害主席』，不是什麼『反革命事變』，不是什麼住到『賊窩』裏去了等等」，而是：「不過是要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雖然當時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須保衛的。主席當時確有危險。這個危險決不是來自陳再道、鐘漢華或軍區其他領導同志，也決不是來自百萬雄師的廣大群衆及其負責人，而是因為兩派中都難免摻雜有個別的壞人。這一次主席

打破不坐飛機的慣例，坐飛機到了上海。總理親自布置主席由賓館的後門轉移到機場，改乘軍隊的小汽車，用武漢軍區空軍的車號，大卡車在前面開路。主席對被迫離開武漢很惱火。這是他老人家成爲黨的領袖以後從來未發生過的事情。

當時總理爲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廢寢忘食，費了很大的事，每個環節都作了周密的布置。直到見了我的面，和我擁抱，同我貼面，流了眼泪。他幾天沒刮胡子，長得老長。總理先把謝富治、王力送上飛機先飛，然後自己留下來再作一點工作，自己的專機後飛。到北京後，讓我們的飛機在天上繞圈，他先趕到機場再來迎接我們。

對於在機場的迎接和百萬人大會，我當時是反對的。我提出，我不明白爲什麼這樣搞？機場迎接，過去祇有反修鬥爭時才這麼搞過。也沒有這樣的規模。我更不贊成開百萬人大會。反對的結果，祇反掉一條：原定由謝富治、王力乘敞蓬車繞場一圈，後來不搞了。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當時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說：這樣作法，不是爲了你（指王力），而是爲了主席。這樣說，我當然不好反對了。對七·二零事件的處理辦法是文革小組討論的。要害是提出「黨內軍內一小撮」的問題。叫喚得最凶的是康生。再一個要害是上天安門的名單不要葉劍英和徐向前，祇要聶榮臻。我看這都是林彪的意見，名單也是在文革小組討論的。并決定不點陳再道、王任重的名，而提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同時要點「百萬雄師一小撮壞頭頭」。

文章是回到北京以後作的。從武漢變成全國性的。全國都要開大會、游行。這樣就把矛頭指向了軍隊。這些決定都經過了林彪。他批：「我經再三考慮，我也參加大會。」當時他是副統帥。康生向主席請示報告後，傳達了主席的指示：第一，同意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二，「一百萬雄師一小撮壞頭頭」前面要加幾個字，成爲「一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三，同意出席大會的名單（即不要葉劍英、徐向前）另外再加上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李作鵬。後來發表時沒有加余立金，因爲余立金是被歡迎的成員。

社論報導從這時就開始提「黨內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以後在京西賓館門陳再道、鐘漢華、林彪要總理主持這個會。會上葉群最凶，還有吳法憲、黃永勝、王宏坤。最初沒有叫陳再道等彎腰，後來叫彎腰。會上的口號是葉群組織的。是吳法憲等喊的。我寫了條子給總理，說黨中央開會，這樣彎腰合適不合適？總理遞給江青，江青說就是要叫他們彎腰。她把條子撕了，還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總理當時講得比較緩和，是講道理的。參加會的人一般都要表態，講幾句。葉帥、徐帥，也坐在主席臺，都沒有發言。陳總和譚震林，也被通知出席會，沒有上主席臺，二位也都没有講話。我是主要當事人之一，因負傷坐着輪椅在主席臺邊上，我自始至終一言未發。江青指名叫我發言，我也

沒有發，在會上謝富治講得最凶。他動不動就說人家不會打仗，在懷仁堂說徐帥不會打仗，這次又說陳再道不會打仗。這樣一搞的結果，把矛盾對準了全國的軍隊。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主席給江青的一封信是錯誤的。其中有兩個最大錯誤：一是武裝左派，好像部隊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裝。沒有這封信就沒有後來發槍給群衆的事。二是群衆專政。這兩條後患無窮。這兩條都是這封信提出的。再加上過去搞的設立專案組是第三個大錯誤，比蘇聯的契卡還厲害。武裝左派的問題，主席在七月十八日晚上在武漢對總理、王力、謝富治、包括陳再道、鐘漢華在內的談話中就說：「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這話總理和我都没往下傳達。江青的「文攻武衛」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講的，和毛主席的講話沒有直接關係。實際上起很壞作用的是那個「文攻武衛」。但是，也不能否認主席早在她講話的三天前就講了武裝群衆的問題。主席還誇獎鋼工總在水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自己要親自去看一看。更嚴重的是，主席八月四日的信對形勢的估計完全錯了。他認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又說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群衆專政，說「北京過去大體上就是這樣做的。」這樣把「六·六」通告等都推翻了。成了要群衆來搞公檢法，私設公堂成了群衆專政。這與他在武漢的遭遇有關，他生氣了。這樣做後患無窮。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信頭的稱呼是「江青」，署名是「潤之」。開頭就說：

「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閱。」這封信後來中紀委查到了，在一張紙上正反面都寫的。當時叫我們都抄下來，貫徹執行。陳伯達沒抄，還叫我補抄一份。信中還提到奪槍問題。（即群衆奪解放軍的槍）主席信上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奪槍還不嚴重？！毛主席這句話是針對林彪說的，因為林彪剛給他寫了信，說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奪槍問題，並且起草了一個制止奪槍的指示。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的開頭說，他同意林彪的看法，當前的形勢很好。但是對於林彪提的實質性的問題，如奪槍問題，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這個指示後果太嚴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規模的武鬥。但是，發生大規模武鬥的時候，我早已被關起來了。不能作為我的罪狀。我兩年前向中央領導寫過信，建議對當時由部隊發槍造成大規模武鬥的，除別有用心的以外，不能按《刑法》追究執行者的責任，因為有「最高指示」。

八月四日後，由於廣東奪槍問題嚴重，林彪又主張起草了一個嚴禁奪槍的通告，由總理批給大家傳閱，要發。我提醒總理要考慮毛主席信上的意見。我怕主席說不嚴重，總理又當作嚴重，就不一致了。我建議既然廣東問題嚴重，還是先叫廣東試驗一下。總理表示贊成我的建議。當時勞改犯也奪槍了，總理徵求我的意見，我建議對勞改犯奪槍，警衛部隊可以開槍。總理在群衆大會上講了，並且說這是王力同志的意見，他本人也同意這個意見。

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漢講話時，汪東興接到電話，說北京面對面地鬥爭了劉少奇。主席講他不贊成，說這樣勢必造成武鬥，還是背靠背好。講完後，主席讓汪東興告訴北京。那時

林彪在北京主持工作，陳伯達、康生、江青他們都在，主要是江青要這樣幹，戚本禹祇是執行者。我回北京後就整理了主席講話記錄給林彪和文革小組成員等傳閱。現在這個我當時整理傳閱的正式記錄沒找到，祇有上面說的那份主席講話時我所作的原始記錄，即後來中紀委讓我謄清的那份。

那時我腿打斷了，文革小組召開的會我大多數是不參加的。大約是八月五日左右，我參加了一次會，見到了揪鬥劉、鄧、陶夫婦的簡報和照片，令人不能容忍。讓人跪下，揪頭髮、按腦袋，曾志、卓琳、王光美也如此，特別是對劉、陶更厲害。果不出主席所料，要面對面鬥，讓八三四一部隊的人來鬥，勢必造成武鬥，又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在文革小組會上說主席不贊成這樣搞，又把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漢講的這一段話整理出來，交給戚本禹轉江青了。江青很不高興。關鋒說，過去知道主席不贊成面對面鬥爭，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回知道了。至于「揪劉火綫」我不知道是怎麼搞起來的。因為那時我正在西南和武漢，不在北京。

這時，林彪看北京搞得很亂，他就走了，坐着火車「轉圈」去了。

八月十二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這一問題，雖然不應由我負責，但我覺得自己沒有反對，也執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評，表示也有我一份錯誤。（今天也不能說我就沒有錯誤了。）但是，江青、康生、陳伯達把責任全推到我的身上

上來了，實在可笑。最令人感動的是，這件事明明與總理沒有什麼關係，總理反而承擔了責任，說這是我們中央同意的。

當時起很大作用的還有紅旗雜志八·一社論，是林杰起草，關鋒審改的。陳伯達看到後鼓掌叫好，說「好極了」。這時，陳伯達正在我的房間裏，稿子念了一遍。我提出要防止連鎖反應，要肯定軍隊支左成績，說軍隊一些好話。主席說過，解放軍沒有地盤，不是爲了自己。當時還是加了幾句。這篇稿件，未送總理和康生，就發了。通篇調子很高，對於衝擊軍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王力的所謂『八七講話』

八七講話，傷害了陳老總，是不對，我承認。但是，第一，我並沒有發表一個講話，祇是在了解外交部一個群衆組織的情況時作了些插話。原來祇是因爲外交部的一個群衆組織不同意戚本禹和關鋒的講話，給中央文革寫信，說關、戚講話同總理有分歧。因而中央文革需

要了解一下這個組織的情況，就叫姚登山等來匯報一下。當時我的腿打傷了不能動，文革小組的人那天晚上都去出席文藝晚會去了，祇有我一個人還在釣魚臺十六樓。就叫我去聽聽匯報，了解情況。第二，我和外交部各派都沒有聯繫，這次匯報來什麼人都是戚本禹定的。怎麼表態也是江青他們定的。見面後最初我講了武漢的事和主席在武漢的指示。然後，問一問來信的是什麼群衆組織，來的是一封什麼信，問一問外交部的情況，主要是姚登山他們講，我插了一些話。他們整理成一篇講話，沒有他們的話，祇有我的話。我歷來不怕錄音，就怕這樣整理。這個記錄印發成傳單。總理看到以後就叫秘書錢嘉東打電話給文革辦公室的張根成，叫他「問問王力同志，是不是見了姚登山，是不是講了這些話？」我要他們報告總理：是見了姚登山，他們講情況當中，我作了些插話，但有些重要的話他們沒整理上去。例如，我說：「任何群衆組織，祇要反總理，就要堅決同他劃清界限。」總理聽了匯報又看到我寫給姚登山等的一封短信之後，說：「那我就放心了。」當時他們講話時，我的插話，錯話不少。但這些錯話的發明權不是我的，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話。同時，我並不是對他們的意見都支持。例如，他們說：外交部這麼多部長，沒有一個辦事的，祇會畫圈。我馬上頂了他們，說：「我不了解別人，但我至少了解一個喬冠華，他是親自動手的。」還有我講了主席說的外交部群衆組織「攀險峰」是好的。等等。這些都沒有整理上去。

後來為什麼整我，并不是為了這個。江青要整我，那是早定了的。八月七日講話怎麼

講，也是他們定的。在「八七講話」中我奉命要講，戚本禹說的「群衆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就讓他們喊，沒有什麼了不起」這話是對的。因為這本是毛主席七月一日講的原話，不難理解，我當然不能不講：「群衆說打倒劉、鄧、陳，完全可以嘛！」其實我當時根本不贊成「打倒劉、鄧、陶」的口號，并且向主席正式提出過意見。主席說：「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陳總與我很好，在保陳總問題上我同總理沒有分歧。我的意思，是可以叫陳總到群衆中去。如果我的腿不受傷，我一定自己去陪陳總。我祇是在群衆喊口號的問題上同總理有不同意見。我也是剛剛聽到主席的指示，他說：「現在在我們國家裏，群衆今天提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沒有什麼了不起。」毛主席舉例子說群衆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倒陳毅的口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毛主席這個指示，居然沒有向總理傳達，如果傳達了的話，總理也就不會採取這個態度了。而且主席的指示的精神，也不過是加一點壓力，喊喊口號反正是打不倒的。毛主席還說，群衆喊打倒奈溫的口號（那時緬甸打死我們一個專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個口號還居然登上了人民日報。打倒奈溫的口號，我不贊成。還應說明：姚登山、王宗琪他們是跟我這樣講的：「我們喊打倒陳毅，不是真心要打倒，祇是給他一點壓力。什麼時候主席、黨中央要保陳毅，我們立即擁護。」我說：「我這就放心了。你們要趕快報告總理，讓總理放心。」這些話記錄中都沒有整理進去。他們說要給陳總加一點壓力，背景是這樣：陳總作了檢討以後，毛主席批了「很好」，本來已經結了，陳總心直

口快，又在機場上對着各派群衆組織的人說：「我是假檢討，是江青逼我檢討的。」這當然是毛主席絕不能容忍的，事情又鬧僵了。至于李富春在大會上講：「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堅決打倒他。」我以為作為常委這樣講就不妥當了。

批評陳總時不讓陳總上主席臺我不同意，我認為叫陳總在臺下擺一張桌子挨批判，這個形式不好。為什麼不讓陳總坐在主席臺上呢？這一點，我認為我的意見是對的。

後來打倒我時，姚文元在會上說：祇能打倒劉、鄧、陶，不能打倒劉、鄧、陳。其實他們才真正要打倒劉、鄧、陶，也是真想打倒陳總，并且還是針對總理的。而我對所有這些人一概沒有真要打倒的意思。

江青派姚文元回上海，就在我房間裏談的。（因她正去看我的病，姚文元來找她。）江青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匯報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你（指姚文元）要回上海摸摸主席的底。」這樣的布置是很不正常的。我一直不贊成江青他們對待總理的態度，而在一系列問題上支持總理的。江青要搞掉王力，也包含着在領導層內部徹底孤立總理的意圖。

江青打倒王力和總理當時的態度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釘，留用我，祇是怕人們講「清一色」。沒有早除掉我，祇是怕人們說「文革不穩定」，還說是要「顧全大局」。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諱的話陷害我，說：「武漢七·二零事件以後，王力以為天下不是毛澤東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談被我親耳聽到，我的輪椅在十六樓門後，他們兩個近視眼沒有看到。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在整我的會上，總理一句也未批評我，祇是有兩次發言，一次是楊成武發言說逼總參向香港派一個營兵力這件事，要王力負責。總理說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吳法憲說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王力搞的。總理說：四十八小時最後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總理自己承擔了責任。而且，即使沒有這個通牒，因為香港問題激化了，也可能在別的事情上爆發出來。

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後，主席着急了。還有一個什麼「五·一六反革命組織」的問題，主

席把兩個問題聯系起來了。當時總理忙得焦頭爛額，身體狀況很危險，心臟病也犯了。江青他們才逼着總理把那個未經我本人核閱的八·七講話又一次送給主席，要拋出王力當替罪羊。本來毛主席早已看到了這個所謂「八七講話」的傳單，這裏邊許多話就是他自己的原話的重複，而且八月十七日他在同外賓的談話中，又講了這個精神，主張群衆可以喊打倒陳毅的口號，給他加一點壓力，然後保陳毅，也還要靠群衆、靠紅衛兵「對他進行教育」。這在中央檔案館和中聯部當時的絕密文件中都可以查到。所以他們逼總理送了那個「八七講話」，主席原來祇不過是一笑而已。兩天後爲什麼又變了呢？如前所說，是因爲江青告了惡狀，主席才說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江青說「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個壞人。」康生連夜查了檔案，說王力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還查了家庭關係、社會關係，說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窩黑貨」。其實我的岳父王翔千是山東黨最早發起人之一，我老伴的大姐（王辯）也是二零年的馬克思小組成員，二三年的青年團員，二四年的共產黨員，與小平同志在莫斯科是同班同組的同學。康生現在說王翔千和王辯也是叛徒。江青和康生一路走一路談，坐在桌子上又談，都被我聽見了。江青看到我後，問我一句：你什麼時候參加革命？我回答說三五年入團，三九入党。江青聽後大聲說：「不跟你說了！」便走了。正因爲有這個過程，所以毛主席猶豫了兩天以後，才下決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于是，八月三十日下午就在釣魚臺開所謂生活會批鬥我。外面許多謠傳，都是江青們散布的。

關鋒不是因為這些事，而是另一派群衆組織在鋼鐵學院「五一」總部抄出一個反動傳單，完全是國民黨的口氣，這個傳單就放在桌子上，讓人抄。傳單的背面有關鋒夫人周瑛的名字和家裏的電話號碼。其實，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就會判斷這完全是誣陷。這個過程，我完全清楚，因為在中央領導人傳閱文件時這個文件還是傳給我看過的。打倒他主要是因為借助了這個背景。

江青在鬥爭我的會上講：「你這個王力，我不找你，你從不找我。」又說：「你還是找過我一次，是在我生病的時候看過我。謝謝。」這是諷刺的話。她又說：「不管什麼人，祇要犯了我的疑，就叫他不得了。」還說王力是鄧小平的人，黑綫上的人，關鋒是鄧力群的人，都是黑綫上的，至少是路綫問題。

康生主要發言針對我，說我想當總理，我三五年十月入團，到東北軍工作是黨派的。一九年三月入黨，在東北軍萬毅部隊，萬毅是共產黨員，谷牧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可是那時他們說谷牧是特務，據說有真憑實據，已立了專案，既是日本特務，又是國民黨特務。這樣，我當然也是特務了。

在這之前，我帶着石膏綑帶住在釣魚臺，一般的會議不參加，重要的會議把我從樓上抬下來，所以消息很不靈通。後來我敏感到要出事了。姚文元透露了一點，說他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主席要加一段，針對現在的反革命兩面派問題。我知道是江青和康生對我的誣

陷已報上去了。要借陶鑄問題整我了。八月三十日，召開文革擴大會，張、姚專門從上海回來參加會議。參加的還有楊成武、吳法憲、葉群身體不好請假。江青最後宣布，王力與關鋒「請假檢討」。總理在會上聲明：這樣的問題，我連李富春都沒講。當時總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江青宣布開會，康生坐在總理邊上。陳伯達的發言主要對關鋒。康生主要對我。他們發言完了，總理除了上面講了兩句以外，就說了一句：你們也得聽聽王力的意見，叫他說說吧！我就哭了，說沒有什麼說的了，祇有一條，主席要我辦的第一個學習班——武漢地區學習班，我現在不能工作了，請中央指定另外一位同志負責。會上指定了謝富治。這次會議從下午三點開到下半夜兩點。然後就把我關在二號樓，隔絕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這是八月三十一日的事了。

江青在打倒我的第二天之後，九月一日就在接見安徽省群衆組織的講話中說：現在北京破獲了一個大的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有三大罪狀：一是破壞無產階級司令部；二是揪軍內一小撮，毀我長城；三是矛頭針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把我關起來以後，大字報滿天飛。一周後，總理就對外交部和二外的講話中說，第一、不準給王力貼大字報；第二、貼了要覆蓋；第三、王力的問題由中央管，不要下邊去搞；第四、王力問題不要無限上綱。

七零年大抓五·一六，總理也講了些厲害的話，這也是形勢如此。最初的時候北京公安局抓了一個「五·一六分子」，總理說立即釋放。總理還說：五·一六成立時，不過三十多

人，積極活動的祇有十多人。壞人祇有個把人。時間又很短，不過兩三個月。不要小題大做。後來全國搞了一千萬人，抓了三百五十萬人，成爲文革中整人最多的冤案。我原先不知道五·一六這個組織，祇是從武漢回來聽說快報記者到「五·一六」去，我聽說其中有人反總理，就叫記者立即撤回，不準派到那裏去。

在鬥爭我的會上沒有涉及戚本禹，江青說：「文革成員在北京的，祇有一個戚本禹是好人！」他是正確路綫代表。（當時張春橋、姚文元不在北京工作。）粉碎「四人幫」後，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叫「王、關、戚」的名詞。「九大」名單同毛主席六七年七月份和我談話時的想法完全不同，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成員大部分沒有了，竟然連鄧小平都沒有，大區、省委書記幾乎統統沒有了。因爲不讓我看任何帶字的書刊報紙，所以我看到九大文件很晚，看到以後，除了以上的驚異之外，還驚奇爲什麼政治局沒有戚本禹和楊成武？我不知道他們也被江青整下去了。

當時宣布我的問題時說我是鄧小平的人。這是江青宣布的。當時沒說五·一六問題。九月六日晚廣播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那篇文章，就講了五·一六的問題了。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後邊一小段話，說要警惕像陶鑄那樣的形「左」實右的反革命兩面派，組織和操縱了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這裏根本不是罵陶鑄，而是罵王力了。後我出獄以後，王光美同志對我講：你作了替罪羊。搞這麼亂，是要找一個人作替罪羊的。後來我聽

說，在宣布「楊、余、傅」問題的同時，也宣布了「王、關、戚」的問題，記錄俱在。總理、陳伯達、康生在講話中都說王力、關鋒問題是江青端出來，還說要向江青學習。

江青平日對我下請示，我總問：這是你的意見還是主席的意見？主席怎麼說的？我不同意她的意見的時候，我就引用主席的話來反對她。六四年我隨彭真向主席匯報工作，主席對我不滿意，說我是彭真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開始對我很信任，江青對我更不高興。文革小組會上她整總理的時候，我都支持總理。我當辦公室主任時，他們要打倒劉、鄧，可是在中央做正式決定之前，我照常發這幾個人文件。江青大罵。江青更不滿意的是，我一有機會，就在主席面前提醒他自己說過的鄧小平的好話。七·二零事件之後，我是反對百萬人歡迎大會的，本來是江青他們非搞不可的，搞了以後，加上各地部隊紛紛致電向我慰問，江青又後悔了，說王力威信超過她了，她再也不能容忍了，就向主席誣陷我了。加上八月底亂到極點了，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江青正好把我端出來當替罪羊。

我再談一點江青對總理的態度。七月底，我從武漢回來後，鄧大姐到釣魚臺來看我，還送了個毛主席塑像。爲這事我同江青吵了一架。江青知道鄧大姐來看我後，大罵說：鄧穎超來幹什麼？我說來看看我的傷。江青說：「統一戰綫統到中央文革來了！」說得那麼嚴重。我從武漢回來後先住到三零一醫院，不久又出來住在釣魚臺。那時葉群帶着林立果和林豆豆，楊成武的愛人帶着孩子們都來看我，爲什麼鄧大姐不能來看我？當時鄧大姐沒有接到通

知，沒去機場，所以才來賓館看我。江青這樣罵不僅是對鄧大姐的，主要是對總理的。

因為陳老總的問題，造成總理很大的被動。整陳老總的是江青。前面已經說過，陳總說了「是江青逼迫我檢討的」。江青大發脾氣，又挑動主席，主席也很惱火。江青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動造反派打倒陳總，後來發展為在外交部前面安營扎寨，就是恨陳總點了江青的大名。謝富治就住在東交民巷，每天經過這裏，是他第一個表態講：「揪陳大方向是正確的。」

當時外交部總理實際上已不能控制。林彪把局勢搞亂，自己拍拍屁股走了，把這亂攤子交給總理。八月份弄得總理焦頭爛額，犯心臟病也是在這一個月。江青把這一切責任推給我，總理心中有數。但是他們說我是國民黨，是敵人，而總理說過，他對敵我問題向來是不含糊的。

還有一件事，使江青惱火。在七月十八日的會上，我向主席說：主席還記得吧，第一個把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漢的陳再道，而是中央文革，把江西的一個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過去我曾向主席反映過，主席調過這個文件。主席說，回去後再把這個文件調給他看。這個文件是在軍委八條之後，中央文革在一份快報上批示，對江西的一個大群衆組織要「採取專政措施」。三個人——陳伯達、康生、江青都簽了自己的大名。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發明權也不是陳再道，而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回去後我說了這件事，江青說：這些文件

主席過去不是看過了嗎？我說：主席還要再看，要把文件寄到上海。我說主席還叫中央文革做公開檢討。（後來在處理江西問題的中央決定上作了檢討）。這更使江青痛恨王力。

開會批評我時，江青說：「王力，你眼裏就沒有我江青。」我當時沒有發言權，沒有說話。憑良心講不是這樣，我眼裏還是有江青的，因為她是主席夫人，又常常代表主席說話。我對她雖然疏遠，但還是尊敬的。

九月十日，主席有一個指示，給我看了，他還是稱我為同志，說：「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

江青並不隱諱她依靠的是上海。她多次講過主席最重視姚文元。江青自稱是「海派」，張春橋、姚文元也是「海派」。戚本禹是「京派」。江青對戚本禹也很好，但戚本禹對江青也不是象張春橋、姚文元一樣。江青決定要抓我時，康生很害怕。當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請示康生，聽康生的秘書李鑫說：不知為什麼，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我和康生相識二十多年，六零年後朝夕相處，他誣陷我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組織者之後，自己也害怕了，怕牽連到他。

其他十件事提問的回答

一、七·二零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布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認帳。

二、解決鞍鋼問題，總理本來要派李富春去。江青說李富春不行，要派關鋒去。總理說時機還不成熟，再等等看。江青催了幾次，總理都是這樣回答的，拖而不辦。最後關鋒也被關起來了，派軍隊對鞍鋼實行了軍管。

三、趙易亞的問題，是受關鋒的牽連。關鋒出了問題後，趙易亞在解放軍報被打成了「趙、王、周反黨集團」。趙易亞是陳伯達調來的。「文革」前，馬列研究院要調一個將軍作秘書長，便把他調來了。「胡痴小集團」問題出來後，林彪提出要調一個人負責軍報，這

樣又把趙易亞調到解放軍報了。六六年第一次打倒蕭華，是江青、陳伯達幹的。江青發了一頓神經病，大罵蕭華。陳伯達也附和說，蕭華是公子哥兒。第二次打倒蕭華時，主席要保，江青知道這個底。肖力當時在解放軍報，趙易亞動員她和自己聯名寫大字報。肖力問了江青，江青馬上變了臉，說趙易亞是壞人，他寫大字報還要把我們家的人牽進去，馬上查。康生便看了一夜的檔案，說趙易亞的歷史上有一兩個月不清楚，一定是特務。討論趙易亞的問題的時候把肖力叫去。肖力問江青：光是這個問題就是特務嗎？江青說：這是康老親自審查的，沒問題，一定是特務。我提出，突然宣布是特務，要作一些防範措施，自殺了不好。江青馬上變了臉，罵我說：你怎麼給特務說話？一個特務，自殺就自殺。陳伯達聽到這個消息後，搶先趕到江青、康生前面，到馬列研究院宣布「趙、王、周反黨集團」問題。後來趙易亞夫婦被關到秦城。

四、「文化大革命」中，主席離不開總理，同時對總理也不是充分信任。

五、六七年七、八月間，各地登報點名打倒成風。主席要我限制報紙點名，搞一個單子，列出已經被中央和各地報紙點名的省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委負責人的名單。主席說：已經點了名的沒有辦法，就算了，今後報紙上點名的不能再增加了，要控制，不能亂點了。再點省市委第一書記的名，要報告他。當時人民日報點的不多，主要是地方上點的多。我起草的單子，送審傳閱時，康生認為不够，批了要增加蔣南翔、呂正操。這個名單上沒有常委

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名單報到主席那裏，主席畫了一個圈，退回來了。以後這個名單成了中央文件，完全起了相反的作用。主席的意思是收縮，而名單一出，這些人都成了走資派。我跟主席多年經驗，感到凡是主席祇是畫了一個圈的，并不表示完全同意，祇是大家贊成，他同意的。如他覺得寫得好，往往批：很好，照發。至少也批一個「同意」。如果明確反對，他就壓住不發了，或者批上不同意見。我跟總理議論過，總理也有這個經驗。他說：凡是主席祇是畫圈的，說明他是在考慮之中，還不能馬上就辦。

六、主席晚年的錯誤是從主觀的好心起步，走向迷誤的，越陷越深。一直不回頭。他原想是作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習，要讓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可是魔鬼放出來以後，收不回來了。依靠小將，不行。依靠老將，不放心。依靠軍隊，又不行。依靠工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又不行。走馬燈，惡性循環。他自己也收不了場了。

七、六七年八月，我快被關前，去參加了一個林彪主持的常委會，討論專案問題，當時專案機構還不那麼大，江青提出要調軍隊主要負責幹部和大批團以上幹部建立龐大的中央專案機構。林彪說：從南看到北，從北看到南，從東看到西，從西看到東，軍區以上的軍隊幹部沒有幾個好人。會上決定調一些軍一級的幹部，叫總政馬上送幹部檔案，交康生審查，如果沒記錯的話，當時總政報送的名單中有李德生。

八、「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相互勾結而又相互矛盾。林彪繼續裝病，能不管就不

管，在劉志堅的問題上，林彪對江青的意見很大。葉群不參加批關鋒的會。林彪爲什麼信任關鋒？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關鋒寫給江青一個條子，說與劉少奇的鬥爭是路線鬥爭。江青轉給主席，主席批作大會文件。林彪看了，葉群找到關鋒，問他家裏的電話、地址。說林總隨時要找你。整關鋒時，江青說：你以爲你是第一個提出劉少奇是路線問題的人嗎？那是我告訴你的，這是主席的意見。當時關鋒夾在林彪、江青之間很難辦事。每次林彪找他談話了解情況，關鋒一定找上文革小組的兩個人一起去，他決不一個人給林彪辦事，怕沒有人證明。

九、主席對家庭的要求是嚴格的。江青很怕主席，也怕能直接見到主席的人。江青在主席那裏開會故意不說話，可一出了這個門，就都得聽她的了。

十、八屆十一中全會最後決定問題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但是江青竟然參預，并且起了重要的壞作用。主席開始把鄧小平排在第四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但江青不同意，才變成後來的排法。她起了相當大的牽制作用。主席對鄧小平評價極高，一有機會，總講鄧小平的好話。七月十五日同我的單獨談話中還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的話，還是要鄧小平出來。我知道，當時主席已經對林彪不滿意，流露出想用鄧小平換林彪的意思。可惜由於各種因素所起的作用，沒有這麼辦。但是，歷史却實現了主席原先的正確願望，主席去世後，鄧小平在收拾殘局、撥亂反正、恢復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方面，起了主導作用。

(下冊)

第四部

王力談毛澤東

把毛澤東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在中國，在全世界，它都成為一門最重要的科學。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對中國歷史進程和對世界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到二十世紀，甚至更長遠，還將有很大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幾代人行動的指南，已經融合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從世界觀一直到語言，有的已經成為自然的習慣。它是一門領導和群衆相結合，隨着實踐而發展的科學。

對毛澤東，成億的中國人，每天都在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語言，以不同的方法，表

達不同的看法。這不是任何個人和團體能够壟斷的。

對毛澤東，神化不對，鬼化更不對；美化不對，醜化更不對。至于造謠誣蔑，那是任何一個國家法律都不能允許的違法行爲。

世界上的反華反共專門家，他們把辱罵毛澤東，作為給中國人臉上抹黑的國際戰略。不少聳人聽聞的奇談怪論，充斥在國際市場，也在中國市場上傳播。

許多中國的老、中、青朋友，也有一些外國的朋友，都希望我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用現場歷史，用第一手材料談一談真實的毛澤東。我義不容辭。但是因為我患晚期癌癥，經過兩次手術，身體虛弱，祇能采用錄音整理再經過我修改和加工的形式。我歡迎對我這篇文章提出一切科學的批評意見。

毛澤東培育了一代人

我是一九三五年（那時我十四歲）十月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革命的。當時是遵義

會議以後，毛澤東實際上掌握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說，還有個很長的過程才真正掌握。）那時，紅軍已經到達陝北。但是我不知道毛澤東。我知道毛澤東，最早還是通過讀魯迅的文章。後來通過斯諾《西行漫記》，才比較多的知道一點毛澤東。

我直接讀到毛澤東寫的東西，第一篇是毛澤東寫的《反對自由主義》。當時是油印的黨內文件。好多同志第一次看到的都是這個文件。這對我一輩子都有用。當時並不了解它深刻的意義，但是我終生忘記不了毛澤東的名言。他說：「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表現」。自由主義有兩套貨色：「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什麼時候用得着馬克思主義了，就用一下。實際上他自己用的經常是自由主義。後來，越來越懂得這篇文章的意義，它是針對着黨內當時最重大的問題，路線鬥爭問題寫的，是為了解決正確對待兩條路線鬥爭的態度問題。

我精讀的毛澤東第一篇著作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緊接着就是《論持久戰》。在我心目中，毛澤東無愧于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說得好，說得對。全國人民，黨員也好，非黨員也好，大家當時最關心的問題都得到了回答。通篇思想性高，邏輯性強，無懈可擊。他的科學預見，逐一得到歷史證實。我自己，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都因為有毛澤東而覺得光榮。

我一輩子沒有上過黨校、抗大、陝公、軍政幹校，但是抗戰初期我曾在東北軍五十七軍萬毅部隊的一個新兵隊。那是一個學校性質的連隊。它的主要領導人是伍志鋼（同谷牧一起的。他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理論水平和文學修養都很高）。我要永遠紀念這位同志。他給我們講了抗大的講義：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法》（即《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我接受毛澤東系統的教育，是從這個講義開始的。其中主要的章節，包括《矛盾論》同《實踐論》，（後來改成兩篇獨立的論文），同時也講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些基本範疇。後來羅榮桓也認為在五十七軍萬毅的那個部隊裏，每一個連隊培養的知識分子政治幹部，比一一五師的連隊裏還多。確實是這樣。最重要的就是認真地學了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法》。伍志鋼培訓幹部抓住了最根本的東西——唯物辯證法。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华。

我是毛澤東間接地和直接地培養的一個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是通過毛澤東知道馬克思主義、知道列寧主義、知道十月革命、知道蘇聯、知道列寧、知道斯大林的。

這次陳雲去世的報導中，有一句重要的話：毛澤東培育了一代人。實際上是治黨、治國、治軍、治文的一代人。陳雲說他也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鄧小平在內。他們的歲數更接近毛澤東。我和田家英這些人，差的歲數就大得多。但是毛澤東也還是把我們看成是年輕的戰友。當然，我們把他看做是老師。

毛澤東時刻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

我認為從毛澤東那裏學的是真馬克思主義，不是假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停滯的、凝固不變的、象和尚念經一樣的那種馬克思主義。這是應該從毛澤東那裏學的基本功。我認為真正學毛澤東學得好的，或者願意學得好的，就是要抓住毛澤東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根本態度。毛澤東時刻要辨別真的還是假的，死的還是活的，發展的還是停滯的。

現在人家不是說「馬克思主義破產了嗎？」破產了的是假馬克思主義。假馬克思主義，它老早就破產了。假馬克思主義，這種破產的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在世時就有。馬克思主義這個詞最早就是假馬克思主義者發明的。馬克思自己並沒有用過馬克思主義這個詞，恩格斯用「馬克思的學說」，也沒有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世時就說過：我祇知道我馬克思不是你們說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也說過類似的話，他不贊成那種所謂馬克

思主義。

毛澤東在這方面講得更多。從他一接觸馬克思，一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一成爲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反復地講這個問題。毛澤東一直是嘲笑那種躺在馬克思、列寧詞句上睡覺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些尖銳的話，後來出版的毛選上把它給勾掉了。如他說過，這種馬克思主義，連狗屎都不如。狗屎還可以肥田，而這種馬克思主義，一點用處也沒有。很多這些生動的話，我一輩子都記得。這些沒有用的東西，毛澤東一輩子嘲笑的這種假馬克思主義，早應該破產，也早已破產了。在全世界大破產是最近這幾年。蘇聯的解體，蘇聯共產黨的崩潰，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不同于毛澤東思想的假馬克思主義大破產了。真馬克思主義不但沒有破產，還發展了。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幸福的：中國有毛澤東這樣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培育了一代真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接受的、我們學習的是經過毛澤東（作爲一個代表）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中國這個土地上播種、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馬克思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通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我年輕時最初敬佩毛澤東的時候，還沒有毛澤東思想這個詞。祇是知道經過毛澤東創立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生動活潑的，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

實踐之樹是常青的

在毛澤東看來，任何理論，不管它怎麼樣正確，或者近似正確，或者在一時一地是真理，但是這都不是絕對的，都不是無限的，都是有限的，都是相對的。這是不是成了相對主義了呢？不是。因為毛澤東承認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是絕對真理。毛澤東是以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他不承認馬克思主義這一個別結論或那一個別結論都是絕對真理，不承認有抽象的永恒真理，因為這個東西根本不存在。劉少奇也具有同樣的認識：由於人的認識的局限性，人都要犯錯誤。劉少奇在這個根本點上，跟毛澤東是相通的。他說不犯錯誤就不是人。不是人才不犯錯誤。所以，任何光輝的理論、原則、道理，有時候它會變成暗淡的，不能夠以為這些東西永遠都對，永遠都是那麼光輝，不是。常青的是實踐，實踐是常青之樹。毛澤東以及相信毛澤東、相信毛澤東思想、相信真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相信實踐，相信實踐是常青的。相信中國的實踐這棵樹是常青的。這個結論，那個結論，可能對了，中國

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對了，很對，很成功，因為它經過實踐檢驗了，但是，也有錯了的。錯了，實踐也會出來說話。個別結論，對了，錯了，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在肯定對的，經常在改正錯的。這貫串于毛澤東的全部生活之中。他多次講過：為什麼要修改文章？起草一篇文章要修改多少遍，不斷地修改，就是不斷改正錯誤。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個別結論是不斷地修改的。不但是個別結論，而且有時是局部有錯，甚至更大的問題上，在比較全局的問題上，也會被實踐證明是錯了。毛澤東把科學的社會實踐提高為認識論的基礎（參見《實踐論》）

毛澤東不保守

毛澤東把人在社會領域的實踐，在自然界的實踐，在科學實驗裏的實踐規定為改變世界的三大實踐。好多人傳言好象毛澤東保守，其實毛澤東不保守。在這三大實踐的範圍裏頭，一切最新的東西他都注意學習。不能說都學得那麼好，有的還學得不好，甚至很不好，但是

世界上一切新事物，都不能够處于他的關注、學習、研究和應用的範圍之外。不能因為毛澤東在業餘時間讀了大量古書，就誤以爲毛澤東的決策來源于古書，那是誤會了。其實，中國發生的一切新事，世界發生的一切新事，在這三大實踐範圍裏，一切東西，包括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毛澤東同馬克思一樣都是注意的。毛澤東對自然科學一切尖端成就都廣泛地涉獵，并常有獨到的見解。微電子、空間科學、生物工程，毛澤東在中國都是抓得很早的。劉少奇對原子彈氫彈這門科學，可以作出系統的研究結論和發言。毛澤東說過他從革命時期起，一輩子不停頓地主辦了兩種報，一種是各地區各部門向黨中央的電報和報告；一種是新華社把全世界各大通訊社報導的一切大事和新事，重要的都及時打出小樣送給他。這兩種報是他每天必讀的。這才是毛澤東決策的主要依據，才是毛澤東生活的主體。毛澤東思想的確立，就是建立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這個基本問題上。毛澤東思想爲全黨所接受，也正是把他真馬克思主義同假馬克思主義相比較，從比較當中來鑒別，從而爲全黨接受的。

毛澤東最重視馬克思很年青時講的、死後還刻到他墓碑上的那一段話：「哲學家們祇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貫穿于毛澤東一生。他相信馬克思的話。馬克思一生是如此，列寧也是，毛澤東也是。他的哲學貫穿于自己的整個生命當中，貫穿于自己的整個的生活、整個的革命生活當中，成爲他思想的核心。就是說人類要通過三大實踐改變世界。有人說毛澤東沒有發展哲學，那說明他不懂什麼叫發展。包括很權威的，在世界上很流行

的《毛澤東》那本書的作者施拉姆教授，這位態度也還基本上好的科學家，也不懂什麼叫發展。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就有人說馬克思沒有發展哲學，因為他沒有寫專門的哲學著作。馬克思說，我要光把哲學單獨抽出來寫的話，一個很薄的小冊子就寫完了，問題是要貫穿于全部著作當中，例如《資本論》，就從頭到尾是哲學的應用和發展。不但如此，而且還要貫穿于改變世界的全部生活和全部革命生涯當中。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哲學的靈魂。

毛澤東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既批判黑格爾，又批判費爾巴哈的。他說，黑格爾的完整的體系是可以繼承，應該繼承的。但是他頭朝下、腳朝上，他是倒立的。你把他倒過來就是了。你腳朝下，頭朝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毛澤東還說，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論是機械的，因而陷入了唯心主義。所以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黨內的實際，革命的實際，把教條主義當成主觀主義，也就是當成唯心主義，同時把經驗主義也當成主觀主義，也是唯心主義，是兩種唯心主義，兩種主觀主義，兩種都違反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哲學，既要反對教條主義，這是主要的；同時又要反對經驗主義，經驗主義經常成為教條主義的俘虜，在中國革命當中的危害也不小。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的真正確立，是在克服了這兩種表現形式的主觀主義之後。必須提高到世界哲學史範圍內認識毛澤東哲學。馬克思使黑格爾倒立的哲學，站起來了。列寧當然是，不但是站起來了，還走路了。真正改變世界取得成果的，是列寧。他按照這個哲學改變了世界。毛澤東繼續在中國走，更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走了一段

很重要的路程。這個哲學的發展貫穿于全部毛澤東思想的確立和發展過程當中。毛澤東哲學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毛澤東相信「懷疑一切」的格言

毛澤東是破除一切迷信的。你同他接觸就知道，他的一生，在他整個的革命生涯當中，整個的生活當中，那怕是在開玩笑、談話當中，他自己不迷信，他反對一切迷信。毛澤東相信馬克思最喜歡的那一句格言：「懷疑一切」。毛澤東是懷疑一切的。用毛澤東的語言來講，就叫做「凡事都要問個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

很多人大驚小怪，以為懷疑一切是個壞事。其實并不是壞事。陶鑄被打倒時，批判陶鑄，說是陶鑄講過一句罪狀很大的話，就是說他講過，「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外，總理以下都是可以懷疑的。」于是就被戴上了形「左」實右的懷疑論、反總理的帽子。其實，陶鑄的本意，主要祇是爲了表明，他本人是歡迎批評的。這一點，毛澤東也是清楚的。復雜的背景

不在這裏說了。毛澤東對我說過，陶鑄這句話講得還不徹底，為什麼毛澤東和林彪就要除外呢？為什麼他們的話就不可以懷疑呢？難道真的就句句是真理，就不能懷疑嗎？不管是誰的話，都不是金口玉言，總得問一個為什麼？是對呀，不對呀？自己要動腦筋，想一想。難道連懷疑一下也不行嗎？其實人們在内心裏也總會有懷疑，口頭上不說就是了。在毛澤東字典上，懷疑是沒有禁區的。不準你提為什麼，不準你懷疑，那就是迷信。

科學同迷信的最初的分別，就在于是懷疑還是盲從。連為什麼都不問，連懷疑都沒有，那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科學的發展。毛澤東的特性也就是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懷疑。如果說他不徹底的話，就是在晚年，對他自己有些東西，有些重大的決策，太不懷疑了。那就錯了。甚至一錯再錯，碰到南牆上也不回頭，也不問一個究竟為什麼。

毛澤東「批判一切」的科學態度

毛澤東除了懷疑一切，還把批判一切貫穿在自己全部生活中。一切可以批判，批判沒有

禁區。毛澤東常說，批判就是分析。分析就是批判。對一切人、一切事都要分析。世界上沒有不可分析的事物。毛澤東就是要批判一切。他說有分析，有批判，才有肯定，才有繼承，才有應用，才有發展。凡是人類的好東西，適合中國國情的，我就要拿過來，我就用，我就要實行。一切科學的繼承，都必須是批判的繼承。與之同時，我分析了，那個不對，不好，或者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就不要。這就叫揚棄。有揚有棄，發揚和繼承精華，批評和拋棄糟粕。把批判庸俗化就不對了。批判變成了機械的過火的鬥爭會，那不是科學意義上的批判，科學的批判就是科學的分析、比較、鑒別，要肯定應該肯定的東西，否定應該否定的東西。對任何事物，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不對。那種批判，亂戴政治帽子，一棍子打死人，本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可惜解放以後屢犯不改，幾乎歷次政治運動都或輕或重把批判偏離了科學，極左的思想和作法愈演愈烈。那個批判，不是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有的完全不叫批判，不是科學，不是毛澤東說的一切要批判的那種科學批判。

有人說毛澤東批判得太多了。毛澤東回答說，王明不是告狀告到斯大林那裏嗎？說毛澤東強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檢討，挨批判。其實他說少了，少說了百分之十，應該說百分之百才對。說百分之九十，哪裏有百分之十的例外呢？沒有例外。一切人，都要自我批評和接受別人批評。不光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那個時候應該採取這個態度，而且應該永遠採取這個態度，不能在整風以後就把它忘掉了，一輩子都不能忘，要貫穿在人的全部生活中。

全部生命中。毛澤東批判一切，堅定地把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的表現。他還把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推廣到全體中國人民中去，成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他堅信這是人民中國先進性的表現。

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自我批評是一切新生力量的武器。一切先進的國家，一切先進的政黨，一切先進的社會制度，都是有自我批評勇氣和能力的。用自我批評精神來自我調節，是一切社會進步和發展永恒的動力，階級鬥爭在歷史上是暫時的。毛澤東把批評自我批評經常提到這樣的高處。毛澤東說，對一切都要批判，這樣才能肯定，才能否定，才能否定之否定，才能有革命，有改革，有改良，也才能有進步，才能有發展。

我被打倒的早，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就被打倒了。當時我是四十六歲，毛澤東七十三歲。在他七十三歲的時候，他還是這樣。以後究竟怎麼樣我沒有直接接觸，就不知道了。我認為不能說他完全脫離了辯證法，完全拋棄了唯物辯證法。不能這樣說。那時候我們差不多天天都要在一起，天天都要去商量些問題，談些事情，幾乎天天都要找找他。你要留心的話，有兩句話他都是要說的。第一句話是：「不一定」，對任何事物，你給他講了，也不管什麼人講，他說他都要聽的，但他都要說一句：「不一定」。第二句話也是經常要說的，不管什麼問題給他說了，也不管什麼人說得，他總要說：「還得看」，「不一定」，「還得看」。這六個字是他常說的。我看他對待事物的基本態度，第一個，「不一定」，第二個，

「還得看」。這個我認為是唯物辯證法，也是實踐論。說毛澤東光聽什麼人的話，我不相信；誰的話都不聽，我也不相信。他不因人而廢言。但是他絕不會說哪一個人的話我都相信。他不會。他說過，就是在他信任任何人的時候，對這個人的話，他頂多聽三分。在我被打倒以前，我看他一直還是採取這個態度來對待人，對待事的。

毛澤東喜歡和而不同，不喜歡同而不和

他喜歡交心的人，他不喜歡那種拿着個本本去匯報的。誰帶着個本本去匯報，他就說以後我不要他匯報，照着那個本本念，不交心。交心，才可以聽；不交心，就沒法聽了。不知道你心裏究竟要說些什麼。他說過我不喜歡××。他給我匯報，總要帶個本子來，一、二、三、四、五的，我要你匯報這個幹什麼？以後我就不要他匯報了，他不交心。其實××不是不交心的人，××是很好的同志，很純的。他因為到了毛澤東那裏有點拘束，有點緊張，怕說錯了話，才帶個本本，這是很難免的。××不是不交心的人，毛澤東對××也很好。這裏

祇是說，你祇要帶着本子去，照本宣科，他就不高興。你說話走點火不要緊，他也不會怪你。相處長了，他的這個脾氣就知道了。他歡喜聽不同意見。他說過多次，他不喜歡同而不和，他喜歡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唱一個老調子，還要你說幹什麼？文件上都有了，還要你再去說幹什麼？你祇會照本宣科，那你就別講了。同而不和，好象是大家都很一致，其實并不是真一致，還可能是根本上不一致。因為實質的不和，被口頭上的「同」掩蓋着了。真正的一致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有各種各樣的意見，而在大的問題上大家一致。大家確定大的目標，大的原則，大家都為着一個共同的東西，這個東西定了，可以發表各種各樣的意見。象音樂一樣，祇有和聲，才能唱出歌曲，演奏出樂曲。單調是不成爲音樂的。他用這個道理，說他最不高興的就是鴉雀無聲。鴉雀無聲，就是說不同意見沒有了。

由于毛澤東威信很高，大家都願意發表或是不敢發表不同意見，他自己並不覺得這個很正常、很舒服。他很痛苦、很不舒服。因爲他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怎麼可能會相信你的看法同我的看法都一模一樣，那决不可能。人家以爲他真正高興你喊他那個萬歲。他說那些喊萬歲的人，誰知道各人心裏怎麼想？他并不是开玩笑的話，他是真不高興封他那四個偉大，他說祇承認一個，導師。導師翻譯成英文是Teacher，他說我沒有當過教授，我祇當過小學教員，那我就是Teacher，這個還可以接受。有人誤解他是想當「萬世師表」。據我同他相處所知，他不但不相信萬世，他認爲連第二世如何都難以預測，第三世就更管不了了。但是

他相信一代會比一代強。四個偉大，起草人是陳伯達，講話人是林彪，弄了那麼個四個偉大。這一點，毛澤東不是假裝的，他是真不高興。他一輩子相信，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他不相信什麼事情都是我說了都對。他說我這裏不過是個材料加工的工廠罷了。我這個材料加工工廠要有原材料，誰知道那個原材料怎麼樣啊？你那個原材料如果是假的，是錯的，我分辨不清楚，又怎麼能加工對了呢？說什麼我就那麼偉大，就什麼句句是真理，就什麼一句話頂一萬句，都叫我聽起來不高興。一句就是一句嘛，這一句也不一定對呢！哪能句句都是真理呢？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我同毛澤東永遠別離以前，他一直是這個態度。

當然在毛澤東認為是大問題、戰略問題的、經過反復思考和探索形成了的概念，他堅信是對的，是很難改變的。我直接接觸的這幾位都有這麼個特點，一個毛澤東，一個劉少奇，一個林彪，一個鄧小平，他形成了概念、定了的戰略性的大問題，很難輕易改變。確實都有這樣的特性。沒有這樣的特性，什麼大事也辦不成。處理大問題，沒有肯定不行，沒有否定也不行，沒有反復也不行。這是大戰略家的膽略和藝術。做得好更不容易。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

過猶不及和兩條戰線斗争中的「偏」與「正」

一切是可以批判的。批判不是肯定一切，也不是否定一切。否定那個該否定的，肯定那些該肯定的。任何事情都是矛盾的統一體，矛盾的兩個方面，總有一個方面是主要的，是代表事物本質的。所以毛澤東說，對待可以分析的事物，一定要有所偏，這個偏就是正。你既然要堅持一件事，就要偏于代表事物本質的這一方面。毛澤東爲了強調一個問題，常常采用偏激的語言，來引起世人的注意。但是對總的方向路綫，他還是堅持過猶不及都不對，堅持「無偏」的原則，也就是堅持進行兩條戰綫鬥爭，既反右，又反「左」。而在一定時期，又必須偏于一方。這是毛澤東在肯定事物、否定事物時經常采用的，他時常公然說我就是要偏到這一面。這種偏，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我同毛澤東直接接觸，主要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這十年國內國際發生的大事最多。從總體來講，他這樣一個哲學思想同態度，從理論上說來是對的。但是實踐上（也是不僅是他個人的實踐，而且是整個社會實踐），問題是很多的。過了是「左」，不對；不及是右，也不對。過猶不及，都不對。要既反右，又反「左」。當然毛澤東有時候也說，寧可叫他不及一點，也不要它過。但是事實上從五七年以後，不斷地是把所謂兩條戰綫鬥爭變成一條戰綫鬥爭了，差不多都是反右了。他也不斷地提要反對「左」，但是轉個圈又回來了，每次都是這樣，轉個圈又回來了。錯誤就是這麼犯的。而且越犯越大。這個付出了慘重代價的大教訓，我們也應該當做寶貴財富來接受。

從一九五七年「左」的苗頭發生，一九五九年形成了帶綱領性的「左」傾。「左」得不能再「左」了，還反右。雖然毛澤東反「左」並不比別人晚，也並不比別人少。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前本來是反「左」的，可是轉了一個圈，又反右了，而且升了級。一九六七年二月本來也是正兒八經地反「左」，堂而皇之地反「左」的，一下子弄了個懷仁堂的會，又變成了進一步反右了，而且變成了「反擊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了。原來開頭是毛澤東反「左」，不是別人反「左」，是毛澤東反「左」。毛澤東要批評陳伯達、批評江青的，是他點的火。這裏不是談「文革」，祇是談毛澤東，他並沒有拋棄兩條戰綫鬥爭。過猶不及，都不對，一直要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即使在「文革」中也還是如此。毛澤東總是在主

觀上力求保證事物按照代表它的質的軌道前進，而不致發生質的異變。他總的思路、總的原則是對的。但在實踐中證明他把這個偏估計錯了。後果的災難性不必多說了。

毛澤東反對『打倒一切』

毛澤東關於破除迷信、世界上沒有不可批判的事物的思想，并不錯。災難不是因為科學的批判造成的。毛澤東許多話，還是很有道理的。他常說任何龐然大物，都不要被他嚇住。他當時是按照他自己的經歷，主要是對斯大林來講的，在中國黨內是對王明、博古他們講的。他這個思想一直貫穿到最後，一直到我被打倒以前。他說不要迷信任何人。他說，好多人（這是他常說的話）祇是早晨的露水，雪堆起來的雪人，在陽光下，不就化了嘛？對龐然大物，不要那麼怕。好多人祇是政治舞臺上的匆匆過客。毛澤東不輕信任任何人。前面說過，即使是他最親密的人，最信用的人，也頂多聽三分。一切都要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分析和判斷，有批判地加以采納。

毛澤東反對一個人，並不是從個人恩怨出發。他對劉少奇也是這個態度。在我被打倒以前，他說，開九大的時候，少奇還是應該保留在中央委員會。他一直這樣說。對鄧小平他一直評價很高，說鄧小平至少是常委。而且他最後一次跟我談話，就說到，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這是武漢七·二零事件的前幾天，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在武漢跟我單獨談話時說的。他還給我說過，彭真被說成是叛徒了，那就不能進中央委員會了，也還得保留黨籍，分配一定職務的工作。

一切是可以批判的，懷疑一切，批判一切，都是對的，而且是先進政黨、先進社會、先進分子自我調節的動力。但是打倒一切那就不對了。毛澤東沒有打倒一切這一說，他從來不贊成打倒一切。批判不等于打倒。而批判是科學意義的批判，不是那種胡鬧的批判，更不是那種火燒、油炸、砸爛狗頭之類的無法無天的刑事犯罪行爲。

毛澤東說的話，也不是都能實行，有時很多事情並不以他的意志、不以他的話為準。有的人對所謂最高指示，也是合乎自己口味的就給你辦，不合乎自己口味的就不給你辦，話說了也不辦。有的是不辦，故意不辦，有的是不敢辦。因為他這麼說，還有別人那麼說，下面也就不敢辦了。而且在一定的空氣下，毛澤東自己也不能不那麼說。他自己也多次說，人家都這麼說，我也不能不這麼說。這麼說了並不等於他贊成。周恩來也給我說過，交換過經驗，說是凡是主席祇畫圈的文件，你可千萬要小心。他祇畫圈的不等於他同意。祇是表示別

人都看了，都說了那麼好，他也畫個圈。周恩來根據他的經驗，凡是毛澤東紙畫圈的文件，都要謹慎處理。因為他要說是「很好」，那是他經過思考了，認帳了；或者批了怎麼樣怎麼樣；或者說不行，壓住不發。凡是人家都那麼說，他祇畫個圈的，不能認為他同意了。以後可不要問他，你不是畫了圈嗎？他常常是不贊成的事，他也畫圈，畫圈祇是表示他看過了，他連個「已閱」都沒有寫，就畫個圈。或者是來不及思考，畫個圈，你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就是了。

毛澤東談遵義會議

在毛澤東那裏開會，都沒有正式記錄，都不準記錄，但是個人可以記。我過去有全部的記錄，如果當時沒有記的話，我回來以後追記，都整理成文字。現在一個字也沒有了，中組部對我說是找不到了。胡耀邦也批了，說王力的這些東西要退還給本人。但一個字也沒有退給我。毛澤東所有的講話，我全部都有記錄，還有整理好了的文稿。重要的例如，毛澤東在

武漢談了三次遵義會議，我都不但有原始記錄，而且有整理成文的。那是一九六三年七月在武漢，爲我們寫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綫的建義》（二十五條）定稿，還請了朝鮮的金日成，和越南的長征。毛澤東是跟我們這些人談的，在座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姚溱、範若愚和我，可能還有王任重。毛澤東講的遵義會議經過，我有經過整理的規規矩矩的記錄。

根據我的追憶，當時毛澤東說：「在長征路上，暴露出他們那一套不行了。這一套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每次政治局開會，我祇有一票。後來我病了，王稼祥負傷了，我們兩個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許多意見。通過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張聞天）的工作。洛甫也轉過來了。可是以後再作別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不動了。他們死抱着斯大林的聖旨。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我這一邊，我一個，稼祥一個，洛甫一個。他們那一邊，博古一個，李德（斯大林那邊來的軍事顧問）一個，××一個，××一個。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問題。後來軍事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們不要老是開這樣的會了，不行了，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這裏邊有贊成我的意見的人，也有贊成你們意見的人，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作決定吧！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會同意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我們在第三國

際會成爲不合法的了。還是要由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實踐證明，這樣作是對的。實際上並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這樣中國革命就開始走自己的路，不聽斯大林的那一套了。一

我的這個簡單的追憶，國內許多書刊上引用過，在國外也有的出版物中引用過。

毛澤東常講龐然大物，過去是指斯大林，指王明。我記得，第一次用龐然大物指劉少奇，是一九六五年，準備出席羅馬尼亞代表大會前，他召集幾個人談話。那是個很重要的會。代表團長是鄧小平，團員是康生、伍修權、王力、駐羅大使許建國（他不在北京）。還請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到會。他又大講不要迷信龐然大物。參加這次會議採取什麼方針沒有講多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沒有講，而是大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個人不行了，那個人也不行了，當初怎麼樣的威風，現在都不行了。還講到彭德懷。（這次會也算政治局常委會了）說彭德懷要分配工作。彭德懷這個人，他是不要挂名工作的人。要給他分配工作，他是真幹的。可以確定他擔任三綫副總指揮。總指揮是李井泉。大家也都同意，說就這樣分配工作吧。毛澤東還要同彭德懷談話，請他吃頓飯。

毛澤東說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骨氣

毛澤東常說，我是認貨不認人。我不看招牌，祇看貨色，不管你這個招牌多麼高，要看貨色，看事情對不對，話說得對還是不對，事情辦得對還是不對。盡管這一點有時他自己也搞錯了，但是他不要看招牌這一點還是對的。他對任何國家也是，國際上的人物也是，國際上的黨派也是，不看招牌，要看貨色。他也常說，你別看他叫社會主義，他那個招牌上挂着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貨色呢？那就知道了。招牌上挂社會主義，一定就比那個挂皇帝招牌的好嗎？不一定。一定比西哈努克那個國王好嗎？不一定。西哈努克是國王，國王就一定比挂社會主義招牌的差嗎？不一定。不能看招牌，要看究竟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

毛澤東說他是專門摸老虎屁股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我就偏要摸你的老虎屁股。他跟魯迅相通，沒有絲毫的媚骨。人不能有絲毫的媚骨，不能有奴才習氣，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骨氣。魯迅到死也沒挂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他比起某些共產黨員來，究竟誰是馬

克思主義者？誰是舉着文藝大旗，代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代表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是魯迅，而不是某些共產黨員。我們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骨氣。他喜歡魯迅，也是因為這一點。

毛澤東在考慮他的接班人的問題上，也是把必須要有中國人的骨氣放在第一位。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够不聽任何外國指揮棒的人，才能當毛澤東的接班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把握，就不能在中國掌舵，不能接毛澤東的班。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跟我談過，十八號那天也談過，在他的心目中，一個劉少奇，一個林彪，一個鄧小平，是能够在中國掌舵的人。他說「在中國掌舵，首先要有一個能夠獨立的把中國這個舵掌好。」不能讓外國人指揮中國人。不管你那個外國人是個什麼共產國際，是哪一國，是哪個人，你發號施令，我不聽。在歷史上第一個不聽話的是毛澤東，第二個是劉少奇，第三個是林彪，再就是鄧小平，中國人要走自己的路。沒有這樣一個精神就不能領導中國。」

毛澤東對他下面的人，他任用的人，他信任的人，他也是不喜歡奴才，不喜歡賈桂。有時候生氣了，罵了這個人，有時還贊成打倒一下子，但他對一個人總的看法並不輕易改變。喬木不是打倒了嗎？喬木打倒以後，報上還罵了他胡××。（在罵劉少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那篇文章裏也罵了他。）但是毛澤東還是對我講，「喬木是能够在理論上向我提出不同意見而對我有所幫助的人。」這個評價是很高的。對陳伯達也沒有做過這麼高的評價。

當然，陳伯達還是思考好多理論問題，提出過好多見解。那些沒有見解的人他確實不喜歡。他喜歡田家英，也是喜歡田家英能提不同意見。

毛澤東與《資本論》

毛澤東對於他喜歡的人，看到他的長處，也看到短處。他也說到喬木的短處，說喬木受讀書過多之害，沒有抓住重點，一些核心的書，他沒有讀。陳伯達也是。對陳伯達和喬木這兩位，毛澤東認為他們最大的短處都是沒有讀通《資本論》。別人他並不要求都要讀通《資本論》，而中國的大理論家，沒有讀通《資本論》是不行的。陳伯達讀了《資本論》第一章，就讀不下去了。毛澤東自己也吃了這個虧。因為《資本論》中文版出得晚，等到出版以後，毛澤東要處理大量的領導中國革命的事情，很難有時間來系統地讀。毛澤東講過，「我沒有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這不是謙虛之詞。對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卷，他讀得很認真。但是他說，要讀上卷，不要讀下卷。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上卷，下卷

成了政策匯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不講了，不是科學了。上卷的基本原理，是從《資本論》來的，但是這不是原文，祇是小冊子。他總是勸人讀《資本論》，要老老實實地讀下去。沒有時間去讀《資本論》，我以為毛澤東自己覺得是很遺憾的。直到晚年他還是經常將《資本論》第一卷放在身邊。

在這個問題上他不滿意劉少奇說用不着讀《資本論》。劉少奇跟郭洪濤的一個談話中說，《資本論》用不着讀，讀一讀什麼小冊子就行了。毛澤東說這個不對，他不贊成。他還不知道林彪也說過用不着讀《資本論》。一般幹部不大可能把《資本論》都讀通。現在要求黨內擔任繁重的領導職務的同志都能够把《資本論》讀通，也不現實。但是思想理論工作者不讀《資本論》，他不滿意。對陳伯達，對喬木，他都覺得有這麼一個缺陷，沒有坐下來系統讀。我們中國黨犯錯誤，從理論根源來說，也是在這個問題上，在對資本主義的科學研究上，對馬克思已經研究過了的結論並沒有消化。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看法

我們在三反、五反當中對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估計，不符合實際。毛澤東還是比較冷靜的，（不冷靜的批語也很多）。我們開展三反、五反時，中央派出欽差大臣，帶着尚方寶劍，揪出那麼多大老虎。貪污一億元以上的叫大老虎。大老虎有指標。第一個提出指標的就是我們華東區。當初定的是五千個大老虎。華東軍區系統要一千。這些東西就離譜了。毛澤東的批語說是好。他那個思想的來源又從哪裏來的呢？是一些不正確的東西，不正確的原料，經過他的頭腦來加工，又怎麼能產生正確的結論呢？

更重要的是，對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毛澤東的估計如何呢？這時候各部門和各個地方上的不冷靜的報告很多，思想理論上的不冷靜的文章也很多。這時不能說毛澤東離開了他原來對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估計。毛澤東還是冷靜的，他在三反、五反高潮中，批評了中宣部和《學習》雜志。毛澤東基本上肯定馮定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掌握

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這是毛澤東肯定的。當時主要的理論家，都在寫的或審定的文章中講資產階級祇有一面性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這正是那個高潮（大罵資產階級，揭露資產階級空前厲害的高潮）時，毛澤東冷靜地說這個不對，這脫離軌道了，脫離科學了，脫離中國實際了。馮定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的這篇文章，是比較正確，基本正確，還不完全正確。後來發表時又根據毛澤東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科學分析多次修改，觀點更鮮明了。這是黨史上很重要的事情。這個問題，一個說明我們犯錯誤從這裏開始，同時說明毛澤東還堅持正確對待中國資產階級的理論。後來中宣部向中央作了檢討，《學習》雜志作了公開的檢討。

三反、五反時，毛澤東肯定馮定的文章，批評否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的觀點。可是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在一個小會上他批評陶鑄：「為什麼到一九六二年以後你還講資產階級兩面性呢？」這說明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偏離了自己對資產階級的分析，偏離了他自己確立的科學規定了。也正是在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後來成為「黨的基本路綫」的全部思想也都形成了。我們犯的很多錯誤，都來自這樣一種根本性的失誤。在中國殘留的封建的東西還是不少。是不是毛澤東沒有看到中國還有封建主義的東西呢？不是。他看到了，但是他都把它戴到一個資產階級的帽子裏頭去了。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是不能用資產階級來概括封建主義的東西的。結果變成了什麼都是資產階級。資產階

級不但在社會上，而且跑到黨裏頭來了，跑到黨的最高層裏頭來了，各條戰線都有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了。

使毛澤東經常睡不着覺的問題

毛澤東很早就發現了，從中央一直到基層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它，一點事也沒有，還照常是模範，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祇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衆。究竟怎麼辦？這是使毛澤東經常睡不着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他多次說，這到底該怎麼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對內是三反，對外是五反，三反就是整風。）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麼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是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放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

就要被人民打倒了。于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毛澤東說，我什麼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把黨放在一邊，讓群衆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面，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嘗試。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災難已經是有目共睹。可悲的是，毛澤東至死還認為這是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堪與中國民主革命媲美的大事。

這樣一個嘗試，實際上證明是失敗了，不行。那麼毛澤東的這個問題提得對不對呢？問題提得是對的，中國究竟怎麼辦？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們黨同群衆已經有了很深的鴻溝了，鴻溝越來越深，怎麼辦？再這樣下去，黨要成了騎到群衆頭上的老爺了，共產黨就一定要被推翻，怎麼辦？文化大革命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能說文化大革命幾億人的行動都是發瘋了。不是的，確實是幾億人真心實意的要改變現狀，響應毛澤東親自發出的號召，解決黨脫離群衆的問題。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但他沒有看到，為什麼不能解決，恰恰在于他總是把自己排除在這個本質問題之外。

毛澤東是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它搞到底，結果他未能搞到底，越搞問題越多，搞到底，也搞不下去了。在這一點上，他至死也沒有從另外一個方面考慮，至少在我打倒的時候，他沒有。一九六六年國慶節晚上，在天安門上，當時有周恩來在場，有江青、我、還有文革小組幾個人。康生不在、陳伯達不在、林彪不在、陶鑄不在。毛澤東說我一定要搞到底。不管有什麼樣的阻力，我也一定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們一起槍斃，從我毛澤東槍斃。

一起。這樣的話都說了。當然，他反過來總是說，他總相信黨內領導人都是擁護他的，都會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他始終不相信會打倒那麼多人。他說過好多次，打倒那麼多人，我也不高興。有的人打倒一下祇是一時的。原來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的人，各省的第一書記，他相信絕大多數都還會保留在下一屆新的中央委員會裏。（後來「九大」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同他原來的想法完全不一樣。）毛澤東還說過，如果發生戰爭之類的突然事件的話，我就要大家一律官復原職，誰幹第一書記還是第一書記。他認為打倒是暫時的。他常常說這句話：打倒就打倒一下子吧，人家要打倒嘛，那就叫他打倒一下子，也沒有壞處。官做大了，打倒一下子，他不就更好了嗎？毛澤東真的跟哪一個人有什麼個人仇恨嗎？他不是，我看一個也沒有。他罵錯了人是常有的事，但是我没有聽到他真正從個人方面去罵誰。同時他罵了一個人之後，總還說這個人還有什麼好處。

他要走中國自己的路，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道路，原來想盡量少付出一些代價。現在看來，代價付出的也是很慘重的。這些教訓也是中國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

我在回憶毛澤東當中，不可避免要涉及一些人，我絕不是對這些個人有什麼個人恩怨。毛澤東也常常不是對某一個人，而祇是對這樣一個問題的態度。贊成什麼不贊成什麼，他是很鮮明的。

劉少奇談毛澤東

黨的主要領導人當中，第一個向我直接談毛澤東的是劉少奇。我聽劉少奇談毛澤東，是一九四二年，在山東。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一位是毛澤東，第二位就是劉少奇。在毛澤東心目當中，長期以來，也是這樣。這個話也不是他到後來才說，他一直是說「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劉少奇是黨中央代表，去檢查山東分局的工作。他到山東，化名胡服。當時山東分局的書記是朱瑞，分局的主要成員是羅榮桓、黎玉、陳光、肖華。陳光是一五師代師長。劉少奇後來同我講，他到山東的任務就是宣傳毛澤東。劉少奇檢查工作的結果，集中表現就是《山東工作四年總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毛澤東認為山東是具有最重要的戰略地位的地區，是關係中國革命成敗的地方，他把一一五師的主力，也就是過去中央紅軍的主力放到山東。當時山東分局的書記朱瑞，也是認真地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的，

是很有才華的理論家，很有才能的領導人。原來我對朱瑞是很敬佩的。劉少奇去了以後，我才大開眼界，才知道黨內有兩條路綫的鬥爭，不但有第一次王明路綫，還有第二次王明路綫。關於山東的四年工作總結，後來劉少奇對我講，實質就是要擁護毛澤東，不要擁護王明，要擁護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綫，批評違背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綫。

劉少奇說，有些擁護王明路綫的同志都是優秀的人材。他們犯的錯誤，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在蘇聯讀書，在第三國際在斯大林的指揮棒下犯的。他們祇要不聽王明的，聽毛澤東的，就會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智，把中國的事情辦得更好。劉少奇對待朱瑞的態度是對的，這也是毛澤東的態度。毛澤東也同我說過，劉少奇到山東去，他的任務是支持羅榮桓，批評朱瑞。對山東的工作，在主要方面是肯定的。山東的成績很大。山東在主力紅軍沒有到的情况下，黎玉為代表的土生土長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發動了徂徠山起義，建立了大量的部隊，組建了山東縱隊，黎玉是個大功臣。一一五師的主力進入山東，加強和鞏固山東的敵後根據地，這是毛澤東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下的最重要的一着棋。山東是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戰略區，要把這個地方搞好，獨立自主，由共產黨掌握領導權。劉少奇去的任務就是這個。四年工作總結在文件上沒有寫的最重要的話就是劉少奇說：你們要是再不改，就要送你們一塊匾，上面寫四個字，叫「機會主義」。劉少奇並沒有說山東已經是機會主義了，是說「再不改」的話，就要送一個匾，上面寫機會主義。朱瑞的態度是誠懇的。在劉少

奇面前是恭恭敬敬、誠誠懇懇地做檢討。不但在口頭上，而且立刻用行動來改正錯誤。毛澤東也同我說過，山東是以羅榮桓代替朱瑞。一個戰略地區，祇要換一個人，局面就改觀了，局面就大變了，山東很快就大變了。朱瑞後來調到延安，參加延安整風，沒有當選為七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不是說他是沒有才能的領導人，而是他不能在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地方掌舵。後來在東北，朱瑞找了羅榮桓。羅榮桓還是說朱瑞是很有才能的，還是應該做重要的領導工作的。朱瑞表示，他還是做技術性的工作比較合適。他在蘇聯學過炮兵，他在東北組建了解放軍第一支重要的炮兵部隊，後來在錦州戰役當中，在義縣犧牲了。這是我黨我軍的很大的損失。

在一九六一年搞《六十條》的那一年，劉少奇在湖南跟我閑談，說：「我在山東的時候，我的任務完成了。支持羅榮桓，代替朱瑞，就是要大家相信毛澤東，不要相信王明。也就是說，不相信斯大林。相信我們中國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把一些大的問題都講清楚了，最後就提出一個問題：總結報告誰來做啊？很明顯，我的意思本來很清楚，這個報告要由羅榮桓來做。但是朱瑞這個同志，他馬上搶過來說，我來做。劉少奇說，那就由他做吧，其實誰做是一個樣，當時由他做也有好處。這件事少奇是當作故事來說的，但這個故事包括很大的實質問題，當時毛澤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同王明——假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在幾個基本問題上有

分歧

劉少奇說，毛澤東路線和王明路線的分歧，第一個是掌握先機的問題。抗戰一爆發，劉少奇領導北方局，實行的就是毛澤東路線，脫下長衫，發動游擊戰爭，抓住時機，建立了晉冀豫和晉冀察抗日根據地。山東黎玉實行的就是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的正確路線，山東是抓住了先機，相反，長江局就喪失了先機。當時劉少奇在山東，大講掌握先機的重要性。先機喪失了，就不再來了。長江局喪失了時機，後來一直到皖南事變都是被動的。皖南事變以後去收拾局面的還是劉少奇。

第二個叫獨立自主，獨立自主地建立根據地。就是我們自己搞，中國共產黨要自己搞。這個問題也是批評王明路線。朱瑞不够明確，羅榮桓是明白的。

第三個問題是誰領導誰？不能夠一切都經過統一戰線。當然不要統一戰線是不對的，但是，不能什麼都經過統一戰線，把統一戰線放到不適當的位置。這同前面一個問題有關係。誰領導誰？跟頑固派的鬥爭，該打的還要打。這一點山東作到了，還是打了。跟國民黨在山東的那些頑固派的部隊打了。可是打又不能亂打，或打得過了。沒有節制地打，也不對。在這個問題上，山東還有點過火，還有點「左」。這不是批評朱瑞。這是二一五師本身有點左。這些總結上都沒有寫。

第四個問題，依靠誰？搞根據地，究竟依靠什麼？就是發動群衆。中心是減租減息。

還是要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以及一切可以團結的贊成抗戰的其他階層。依靠貧下中農，不搞減租減息不行。批評朱瑞不對，就是批評他不搞減租減息。光搞合理負擔不行。在幹部中樹立群衆觀點，真正把發動群衆作爲鞏固根據地的中心環節。我跟劉少奇說，少奇同志一去山東，就像趕鴨子一樣，把從朱瑞開始，包括我們都在內，統統趕下去了，都要到下頭去，不要飄在上頭。朱瑞也戴起了草笠，卷起褲腳子，也到下頭去了。去蹲點，搞減租減息。劉少奇到山東以後，最大的變化還是這個。大家都到群衆中去，都參加減租減息去了，有些知識分子幹部，要下去任職。有的擔任縣的工作，有的在區、鄉工作，有的參加工作隊。

這個時候在山東，劉少奇宣傳毛澤東，就是抓住這幾個根本的東西，也就是毛澤東路線同王明路線根本的不同地方。

除了根據地工作之外，我還知道了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在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以後，也確立了劉少奇作爲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他提出的正確方針，成爲毛澤東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還是有一個公開工作同秘密工作的關係問題，還有肅清立三路線——王明路線的殘餘的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當時對於我來說，也開了竅。有的問題過去想都沒想過，拿一二九運動來說，在我心目中是神聖的，可是劉少奇說，一二九還有立三路線殘餘。我大吃一驚。我是在一二九運動前後的革命高潮的影

響下參加革命的，一直很崇拜一二九。現在才知道那是劉少奇還沒有到北方局的時候搞的。他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份到達天津的。他對一二九當中有些做法當時就提出了批評。抬棺游行是錯誤的。那種飛行集會，暴露力量，不懂得公開工作、秘密工作的分別，不懂得後來毛澤東也肯定的劉少奇的隱蔽精幹、保存力量、長期埋伏、等待時機的方針。劉少奇也不贊成南下宣傳隊。他主張一個是把白區力量隱蔽精幹，保存下來。再一個是城市知識分子要下鄉，不是到國民黨那兒去，而是到農村去，發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或者是向根據地輸送幹部。這才是毛澤東路線。當時擔任北平市委書記的是李雪峰。他認為少奇同志的批評是對的，他是接受的，但有人是抵觸的。這也是正常的。

毛澤東和劉少奇，并不是因為是同鄉（韶山衝離花明樓祇有十五里路），而是因為他們兩個思想是相通的。

劉少奇後來說，我這一輩子就是要搞個人崇拜，因為大家不理解、不認識這個人，我就叫大家要認識這個人，叫大家要相信這個人。第一個宣傳的就是毛澤東，第二個就是鄧小平，第三個是林彪。因為大家對他還不了解的時候，還不知道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的時候，我要叫大家知道。叫他個人崇拜也好，我就是搞個人崇拜，就要崇拜毛澤東。後來我叫大家崇拜鄧小平，叫書記處多負點責任。不能把書記處當成過去的秘書處性質的單位。我叫大家崇拜一下子鄧小平（他年紀比較輕一點）叫他掌舵，多掌管一點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情。這是

劉少奇在五九年第一次廬山會議上講的。毛澤東，特別是劉少奇，有時故意把話說得那麼「難聽」，也就是很尖銳。你反對我，認為這個詞忌諱，我偏用這個詞。可是他把那個詞規定了科學的含義。毛澤東也說過：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迷信，不對；一種是科學態度，是對的。

劉少奇說，我到處宣傳毛澤東。他說當時宣傳毛澤東還是很難。雖然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實際上掌握了領導地位，瓦窑堡會議對政治路線做了清算，肯定了毛澤東，但是為全黨所接受，還不那麼簡單，還不那麼容易，還是得到處講。你不宣傳不行，他就是不聽。我到北方局（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第一個碰到的堅決反對我宣傳毛澤東的是柯慶施。他就不贊成，很堅決地不贊成。一九三六年二月瓦窑堡會議以後，劉少奇到北方局，他說我的任務就是宣傳毛澤東。一宣傳毛澤東，人家就是不贊成。劉少奇說八大二次會議以前毛澤東要增加政治局成員（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時，我不同意柯慶施。主席問我，你為什麼不同意柯慶施？我說，他在歷史上不是一般的反對毛澤東，瓦窑堡會議以後，我到他那裏去，從各方面講要擁護毛澤東，不要聽王明的，他堅決反對。當然他首先反對我劉少奇。（他們將劉少奇叫「老機」，老機會主義者。）劉少奇說，柯慶施不是一般的反對毛澤東，是在局勢那麼鮮明的情況下，他還反對，而且從來沒有檢討過。毛澤東說，這樣吧，我跟柯慶施談談，要柯慶施找少奇談一次話。後來柯慶施找了劉少奇，第一次做了檢討，說他不對，第一

他不了解形勢；第二不了解中央內部情況，所以他錯了。劉少奇說，他檢討了，也就行了，不檢討可不行。不檢討，你還會重復錯誤。這不是小問題，這是大問題。這樣我才同意增加柯慶施成為政治局成員。

「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 馬克思主義者」是毛澤東提的

劉少奇在山東，不但在政治路線方面宣傳毛澤東，而且還深刻地宣傳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劉少奇所做的《人為什麼犯錯誤》的報告，對我個人來說，一輩子得益很大。我進一步理解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而且認為，毛澤東思想同劉少奇的思想是相通的。毛澤東不是憑白無故地說，「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提法是毛澤東在文字上表達的。文中原來沒有劉少奇，毛澤東特別加了劉少奇三個字。

劉少奇在山東的時候，還沒有毛澤東思想這個詞，但是他講的東西跟毛澤東在基本點上是一致的。

劉少奇的哲學觀點同矛盾論、實踐論是一致的。他把人爲什麼犯錯誤歸結到主觀客觀的不一致，祇要是人就要犯錯誤，不犯錯誤就不是人。這個我一輩子都記得。他同毛澤東一樣的把實踐當成認識論的基礎。現在有些人認爲，毛澤東光重實踐、不重理論了，不對。劉少奇給我講過，什麼叫實踐，很多人也還沒有弄清楚。毛澤東真正懂得什麼叫實踐。毛澤東的實踐是思維的實踐，是實踐的思維。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什麼是人？毛澤東講的人，是作爲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要做階級分析，沒有錯。劉少奇也是重視階級分析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是資產階級理論家承認和發現的，有人把它說得那麼壞，那不對。以階級鬥爭爲綱，那就不對了。把階級鬥爭擴大化，那就不對了。但是階級、階級分析、階級鬥爭都沒有錯。人沒有抽象的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他講《人爲什麼犯錯誤》，實際上是從本質上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實踐是人的主觀的能動作用，因此，他是屬於人的感性的一方，你不承認人的主觀的能動作用是屬於客觀的過程，那就要陷于教條主義。爲什麼陷于教條主義不對？爲什麼經驗主義不對？都是把認識同實踐分割了，把思維同實踐分割了。沒有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他說的那個實踐本身就是主觀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要承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客觀性。這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和劉少奇的《人爲什麼犯錯

誤》對實踐本質的認識。

劉少奇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是象和尚念經那樣宣傳。一切科學都是歷史，三大實踐都是過程，都是歷史——社會發展的歷史，自然發展的歷史，科學實踐本身發展的歷史。因此，改造社會、改造自然以及改造人本身，這樣的實踐才能是科學的實踐，才叫實踐。劉少奇跟毛澤東一樣，認為實踐不是盲目的實踐。沒有預見，就沒有科學。沒有假想，也沒有科學。你不能說那種預見，那種假想，就不是個客觀過程了。要承認它的客觀性質。

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沒有指南不行。沒有指南就盲動。必須要有指南。沒有藍圖就沒有建築。蜜蜂做蜂房可以使得工程師自愧不如，但是任何一個最蹩腳的工程師也不同于蜜蜂，因為蜜蜂它是本能，它不能叫實踐。最蹩腳的工程師，最蹩腳的藍圖，它也叫實踐。它是人思維的藍圖的實踐。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這個科學命題是劉少奇提出的。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是研究黨史的核心問題。歪曲中國的歷史，也集中在歪曲毛劉關係上。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貌似真實的謊言

全世界不管是好意的、中立的、歹意的，都要把毛劉關係當成是最大的問題。我翻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的有關的地方。李志綏不值得由我去寫評論。因為那些所謂毛澤東同作者的談話，我看就知道，都是一些從小報上抄來的謠言。有的研究部門的專家告訴我，這本書是美國三十七個反共的中國問題專家幫他搞的，是他們編造出來的貌似真實的謊言。這些謊言從政治到生活，有的謠言太離譖了。他說因為劉少奇得了肺結核病，毛澤東就取消了高幹保健醫療，要置劉少奇于死地。這件事，原來負責經辦的人，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還活着，他知道最清楚，當時劉少奇特別囑咐他說，我的病不要告訴主席，不要讓他擔心。這說明毛、劉之間有着親密的戰友之情。這件事，好多人都知道。美國造謠專家的伎倆也太笨拙了。

在政治上，那些所謂毛澤東同作者的談話，差不多全部是謠言。有些事情我知道，別人

還不知道。祇要把這些事情真相是什麼，什麼過程，講清楚，流傳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自己出版的書裏也給共產黨抹黑。對於現在被認為是壞人的，就可以亂說，我看這個也不對。因為他是共產黨過去的領導人。你要真的是事實，當然可以說。瞎造謠就不好了，也是違法的。

劉少奇宣傳毛澤東的哲學思想 以及政治和組織路線

我一輩子都記得，劉少奇的《人為什麼犯錯誤》。他後來跟我說，他就是宣傳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現在《劉選》沒有收進這篇，還有一個《組織紀律的修養》，也沒收。現在祇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時叫《論共產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後來給我們印象很深的還

有一個《論共產黨員組織紀律的修養》、《論組織紀律的修養》牽涉問題很多，也回答了幹部當中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當時實際上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在組織上解決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要擁護毛澤東的思想、路線，不能那麼多人都代表中國共產黨，要強調組織紀律性。

劉少奇自己也重視他這兩個東西，都是講黨的步調要一致，要講組織紀律性。同毛澤東的那個「和而不同、同而不和」是一致的。不要各人吹各人的號，各人唱各人的調。毛澤東也一樣，從來都是說反對不要組織紀律。可是文化大革命當中他有個批語，把「無條件服從黨中央的領導」，改成「祇服從中央正確意見的領導」。我當時是有問號的（我沒有給他提），因為祇服從正確意見的話，那麼就產生這麼一個問題，我認為是正確，你認為是不正確，那怎麼辦？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講了幾次，有條件的服從。當時他是針對劉少奇的被認為是錯誤路線說的，錯誤路線為什麼還要服從呢？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一個小報上還有王力同毛主席對話的記錄（我手上還有，後被查抄）。主席說，服從要有條件。王力說，還是應該強調紀律性。他說，對。

就是說，毛澤東從沒有說過不要紀律，但是他這個「有條件服從」的提法，就常常容易造成自己認為正確才服從，自己認為不正確的就不服從，那就不好辦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十一中全會以後，歡呼一張大字報的時候，他的這個提法就成了語錄。

講毛劉關係，這是本質的關係。劉少奇宣傳毛澤東，要相信毛澤東，不要相信王明，除了政治路線，還要在思想上統一，組織上服從。思想上是指毛澤東最根本的思想——哲學思想，組織上要服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這兩個報告，在當時我們受的教育最大。後來他跟我閑談，他也認為他講的實質就是這個。

劉少奇走遍全國進行對毛澤東的宣傳。他在瓦窑堡會議以後，到了北方。在北方局（華北局）最早是劉少奇宣傳毛澤東、執行毛澤東的路線。然後，到華中處理長江局的問題。收拾了新四軍皖南事變以後的殘局。他把王明那一套變成毛澤東的一套。整個的華中局面就變了。下一步棋就是山東，處理山東分局的問題。山東問題解決以後又回北方局，又清理北方局問題，又把北方局納入毛澤東路線的軌道。李雪峰同志告訴我，當時在太行山的幹部中流傳一句話：「少奇一過，光芒萬丈。」然後回陝北，抓西北局的問題。劉少奇這一系列的實踐，正是中國革命最重大的實踐。毛澤東同劉少奇是不能分的。這樣的歷史不寫清楚的話，就不能夠理解為什麼毛澤東選劉少奇當接班人，為什麼毛澤東一直排除幹擾，堅持他對劉少奇的看法，堅持在中國革命中地位僅次于毛澤東的是劉少奇。盡管劉少奇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這樣那樣的不對的地方。

劉少奇幾乎把所有的戰略地區都從王明路線（不能說人家都是王明路線，那也不對）影響下，端正過來。這些大的戰略地區都還基本上執行的是毛澤東路線，不符合的地方把它端

正過來。

關於毛澤東思想，別人也用過這種提法。誰先提的？哪個刊物上先登的？這種咬文嚼字不科學。真正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的詞，而且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那是劉少奇。這個事別人也提過，王稼祥也提過，羅榮桓也提過。他們對於擁護、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雖然都有各自的貢獻，但是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的提法，把它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并且列入黨章，那是劉少奇。而且劉少奇他在沒有用這個詞之前，在政治上，在實踐中，都真正地、深刻地、科學地宣傳了毛澤東思想。劉少奇的這個歷史同毛澤東的這個歷史確實在這一段是分不開的。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有積極的一面，平分土地，發動貧下中農，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參軍支前，對於打敗蔣介石起了積極作用，這是主要的。但是土地會議也有很大的偏差。這一點，晉綏會議上毛澤東的報告是正確的，是糾正了土地會議的一些不適當的提法同作法。這些都不能作為毛劉分歧。誰都有在這個問題上那個問題上的對或不對，大家都有一個認識過程。土地會議並不是背着毛澤東的。土地法大綱還是毛澤東定稿的。某些文件先已定稿，後來在整個運動中證明是有偏差，一個是行動上的偏差，一個是條文本身不完備。在執行土地法中，關於階級劃分問題不明確，後來才參考毛澤東一九三三年那個《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文件定下來。至今這個問題還有理論上的意義，就是說什麼事情要有個關於量的規定性，任何的質必須要有量的規定性。所謂

調查研究，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找出代表事物的質的量的規定性，沒有量的規定性，就沒有界限，質就弄錯了。你弄了半天，什麼叫富裕中農，都沒有一個量的規定性的話，你就不知道富裕中農同富農是個什麼界限，富裕中農同中農又是一個什麼界限。一定要找出代表一定事物的質的那個量的規定性，才有政策界限。這樣一個問題，它不是毛劉的分歧，而是全黨的一個認識過程。

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

還有和平民主新階段，都說是劉少奇不好，說是劉少奇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說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後，中國要迎接和平民主新階段。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還要批判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陳伯達要我和關鋒寫一篇文章，批判和平民主新階段。我說恐怕不行吧，我說，毛主席並沒有反對和平民主新階段。你一定要寫，得送給主席看。我們寫出來了，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不贊成發表，不贊成批判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

和平民主新階段，本來就是毛澤東親自寫的中央文件，毛選四卷上就有。這個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國可能出現和平民主新階段。要出現，你沒有準備不行；不出現，我們再打，也不妨礙嘛。

各個戰略區軍隊要減員，華北晉察冀減得最多，但是這也是毛澤東定的。當時山東說減員根本不行，就在主席那裏說不行。那時羅榮桓還沒走，已經定了要走。羅一走，饒漱石因參加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未到任，由陳毅主持工作，也還是說不行。黎玉發表講演說不行，說我們不是減員的問題，還要加強。事實證明是他們看得對。後來毛澤東對山東評價很高。他說，實際上是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還動員了幾萬兵，都是從山東動員的。現在到處都有山東幹部，這主要是羅榮桓的功勞。抗日戰爭剛剛勝利，就從山東出兵到東北，坐船的，走路的都有，主要是從山東去的。率兵到東北主要是羅榮桓。黃克誠原來是帶一一五師的一個旅南下的，後來成爲新四軍第三師，到東北去，又歸還原一一五師的編制。林、羅就是林彪、羅榮桓。林彪沒有到山東去，羅榮桓的功勞很大。所以毛澤東對羅榮桓評價很高。

現在都在講是劉少奇搞了個和平民主新階段，這是不懂黨的歷史。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完全一致。

所以，毛澤東到重慶去了，家裏就是劉少奇管。毛澤東說，真是有個三長兩短，我不

怕，有劉少奇呀。他叫劉少奇要放手，不要管我，該打就打。那時劉少奇是書記，候補書記加了陳雲、彭真兩個。

劉少奇在抗日戰爭時期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奠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這個期間，毛澤東、劉少奇是根本分不開的。

羅榮桓、林彪、康生、王稼祥談毛澤東

第二個直接給我講毛澤東的是羅榮桓。這個問題我今天不多談。我那本《現場歷史》的書上，有一篇《毛澤東談羅榮桓》，國內《人物》雜志發表過，我是寫給中央的信，那封信胡耀邦批過。為什麼對羅評價那麼高？羅榮桓是最早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的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時，我是山東分局黨刊《鬥爭生活》的主編，歸山東分局宣傳部領導。羅榮桓主持山東分局工作以後，他非常重視宣傳工作，他就把山東分局的宣傳部跟一一五師的宣傳部合成為一個。他很重用陳沂（山東分局宣傳部負責人），也直接用我。領導山東整風的總學委

會，他是主任，我是秘書。所以我能够直接聽到他的一些看法。他是很明確的。羅榮桓說，什麼叫整風？（他不是在大會上，也不是跟一般部長說，而是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裏說的。）整風就是說要聽毛澤東的，不要聽王明的，不要聽斯大林的。這就叫整風。他說，整風，最重要的是要有的放矢。不要以爲山東工作四年總結，不叫整風。那就弄顛倒了。好好地學習山東工作四年總結。這才叫整風。

有一部《黨的路線問題選集》，是根據中央編的《兩條路線》，又根據山東情況由山東分局編的。書名是舒同題的字，一九四五年六月印發的。這是全黨爲七次代表大會做思想政治上的準備。我手邊祇保存了第二冊。第一冊上有《山東工作四年總結》。陳毅剛到山東時，讓我向他介紹山東情況，那一本書被他拿去了。

羅榮桓的話是講到本質了。他是真懂毛澤東思想。他不但是部隊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仗也打得好，是司令員兼政委。他去世後，毛澤東非常懷念他。當天我跟毛澤東，還有康生一塊去北京醫院，向遺體告別。毛澤東很悲痛。毛澤東同我談羅榮桓談過兩次，有一次就是遺體告別那天談的。

這裏附帶的講講林彪。林彪也是最早宣傳毛澤東的人。林彪從蘇聯回來以後，講得很明白，說斯大林不行，不如毛主席。要是毛主席，蘇德戰爭不是這麼個打法。在歷史上宣傳毛澤東、擁護確立毛澤東思想，羅榮桓和林彪是一致的。羅榮桓對林彪提過這個或那個意見，

都是正常的。流傳的一條最重要的意見，其實是我跟羅榮桓談的。我說：「羅政委，你跟林總談談，我不同意他那十六個字，不同意他那個立竿見影。讓他改一改吧。」（林彪的十六個字就是：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後來羅榮桓是跟林彪談了，他不接受。羅榮桓死了，林彪也很難過。最早林彪給羅榮桓的題詞是「良師益友」。對林彪這個第一次題詞，後來有幾個人說，林總你換個題詞吧。你現在地位這麼高，不宜用這個詞。林彪才改了後來的那個題詞。他還是以羅榮桓為老師。為什麼呢？因為羅榮桓是在正規大學讀過書的，文化高。毛澤東也對我說過，他是把羅榮桓和陸定一看做是紅軍裏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讀過正規大學。羅榮桓從秋收起義起，就跟毛澤東在一起，比林彪早。

再一個向我們直接宣傳毛澤東的領導人是康生。那是解放戰爭時期，康生從中央到山東渤海區。當時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跟康生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接觸就是在渤海區。我當時是華東局宣傳部教育科長。我在渤海區，擔任華東局渤海土改工作團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兼土改幹部訓練班主任。康生在惠民縣的何家坊，找我談過話，康生帶的什麼人呢？有曹軼歐、徐冰（邢西萍）、張曉梅、于光遠、凌雲、毛岸英、曾彥修。康生見了我，主要講我寫的一篇小說《晴天》，內容是減租減息、復查。他說，主席讀了這本書，說這是根據地第一本寫農民土地問題的書。毛澤東很欣賞這本書，康生自己也很欣賞。他同我講到毛澤東。他說，他從蘇聯回來時，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要他們回來擁護毛澤東。毛澤

東也一直懷念季米特洛夫。毛澤東講過共產國際兩頭好，中間不好。前頭好，指的是列寧；後頭好，指的是季米特洛夫。康生說，任弼時、陳雲、王稼祥和他回來都擁護毛澤東。這是很重要的。抗戰時期，他們都不擁護王明，都站在毛澤東一邊。康生同毛澤東還有特殊的私交。他一直照顧了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同毛岸青，是他去巴黎把這弟兄倆接到莫斯科，并一直照料他們。康生說，在輪船上毛岸青就犯病了。毛岸英從蘇聯回來，毛澤東又把他交給康生，讓康生帶他下去到農村學習，做勞動者，上勞動大學，教他讀中國的書。康生堅持要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提法，最早不是吳玉章提的。吳老是一九四八年提的。在抗日戰爭時候，在確定用毛澤東思想這詞之前，大體上是在一九四三年左右，討論毛澤東思想時，康生就提出用毛澤東主義。不過他沒發表文章，祇是口頭提出並且堅持用毛澤東主義。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是在選林彪當接班人的那個會上，曹軼歐站起來發言，又提出要用毛澤東主義代替毛澤東思想。當然毛澤東絕不會同意用毛澤東主義。

向我直接宣傳毛澤東的領導人，還有王稼祥。解放後我在上海，一九五三年底，中央決定派我到越南，在胡志明那裏作意識形態顧問組組長。從那時起，我就歸王稼祥領導。我從王稼祥那裏聽到了毛澤東戰略思想的一些事例，并且直接接觸到毛澤東。

黨的七大，劉少奇做了黨章報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定義為全黨所接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成為指導中國實踐的武器，并隨着中國實踐而發展。它同馬克思主義一樣，

并不是萬應靈丹。它也有區別真的還是假的，活的還是死的，發展的還是停滯的這一問題。它的命運也並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它的發展史中，有曲折有彎路，是不奇怪的。

毛澤東國際戰略決策和國內戰略 決策變化的原則

毛澤東、劉少奇這兩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是分不開的。提出來編劉選的是毛澤東。毛澤東說，編劉選先編下卷，從解放後編起。因為解放後代表中國共產黨講話的是劉少奇。許多重大問題，都是劉少奇出面講的。解放前是我出面講得多，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講話的是毛澤東。解放後即使是我毛澤東的東西，也是劉少奇出面講的。

解放以後，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不能把毛澤東和劉少奇分開。不管是正確的東西，還是錯誤的東西，毛澤東和劉少奇都分不開。

國際國內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大都在這個問題上陷入誤區。那些以反共反華為職業的所謂「中國通」，包括他們編寫的李志綏那本書，貫穿全局的造謠的重點也是毛、劉關係。罵毛澤東，毛、劉關係問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他們收羅片言祇語，或者是流言，或者是造謠，斷言劉少奇同毛澤東有矛盾，也斷言其他領導人同毛澤東有矛盾。他們脫離了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他們不知道，有些人根本不想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根據形勢的變化，發生了決策的變化。

毛澤東多次表達過這樣的思想，就是對於中國問題的決策，不光是從研究中國情況中來進行思考和決策，還必須把它放到整個國際戰略問題上來研究、思考和決策。同時，研究國際戰略問題時，又要以中國問題為主體，以中國問題為中心來研究。要始終把中國問題放到國際的、世界的一部分來研究。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都要作為世界問題的一部分來研究。歷史上有個共產國際，後來沒有國際組織了，但是我們的決策，長期以來是從國際戰略的高度來研究，而不是孤立的來研究。

毛澤東堅持研究國際問題要以中國為中心。反過來，研究中國問題一定要提到國際戰略的高度，要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隨着國際戰略決策的變化，來改變中國問題的決策。重大問題的決策，絕不是凝固不變的。大的形勢變了，這個不變不行。

現在國內外有些書常常是把這個人在這個時候說的話，同那個人是在那個已經變化了的

時候說的話對立起來，他就說這個人同那個人不一致，這個人同那個人有矛盾。有些外國的著名的觀察家，他們研究中國問題，就是這樣。這還算是科學態度，不是造謠。他是根據中國報紙、雜志上的材料來研究的。他們一般不懂得，這種差异主要是因為國際上大的形勢、大的戰略決策變了。因此，雖然他有些引語、資料好象都是確切的，白紙黑字寫着，但是這並不反映誰同誰的矛盾，誰同誰的對立，也不是毛澤東、中共中央自己反對自己。

毛澤東還反復強調：一切歷史材料都要利用、研究和總結，作為現實決策的參考和借鑒。所以幫助他作戰略決策的助手，可以調一切檔案。什麼檔案都可以調，沒有不可以調的檔案。但是，檔案要利用，使它變成對現實重大問題決策的依據。在毛澤東看來，作他助手的這個研究機構不要大，人也不要多，一切檔案都可以調，不能離開檔案，但是不能光看死檔案。

現在有的人對各種材料不加分析，不加鑒別，不加取捨，都羅列起來，這不是研究工作。

毛澤東在戰略決策的研究問題上還強調，一切的局部決策的研究，要服從于總的戰略決策的研究。總的幫助領導核心決策的研究機構不要大。各種局部問題的研究機構也要。各個部門的領導機關都應該是調查研究的機關，都應該掌握材料，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但是一切局部的研究都要提高并服從于總的戰略決策。當時釣魚臺就是個很小的機構，毛澤東直接

掌握這個機構，它實際上成爲智囊團。一切研究所、研究院，都有責任、也有義務向它提供材料，它要什麼給什麼。

一九八二年春節前，我當時剛從秦城出來，鄧力群傳達鄧小平要我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我說這個題目太大，不着邊際，我研究不了。當時中國改革初見成效的是農業，我的研究工作，就從農業開始。當時鄧力群對我說，第一全部文件都給你，第二你要哪個研究所提供資料，都向你提供。我先不研究中國的農業，我要先把世界上最成功的農業——美國的農業研究清楚。美國爲什麼成功？蘇聯爲什麼失敗？以及其他幾個主要國家發展的歷史情況，弄清楚，然後再由此及彼地研究下去。這也是釣魚臺的作用。當時的釣魚臺，除毛澤東外就是劉少奇、鄧小平直接掌握的。我的這種研究方法和研究條件，後來中斷了。但是我個人所作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間斷。

國際戰略研究以中國爲中心；中國問題的戰略決策，要隨着國際戰略決策的改變而改變；一切歷史材料要爲現實的戰略決策而服務；一切局部問題的決策要服從于總的戰略決策。這四點弄不清，分不清，就不會懂得毛澤東，也不會懂得劉少奇，也不會對中國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的結論。因此有的我們自己人寫的書，也歪曲毛澤東，也不公正地罵毛澤東，同時也貶低劉少奇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民主革命時期毛、劉是一致的，在大的戰略上是一致的。民主革命時期，我們付出很大

的代價，才找到了中國自己的道路。中國人要走自己的路，中國革命要走自己的路。這才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達到了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確立，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確立。總的方面，首先是毛澤東，其次是劉少奇，他們是對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產生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原來總想在中國經過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要少犯點錯，至少不要付出象民主革命那麼大的代價，就能找到中國自己的道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就是，第一我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第二能不能少付出一點代價。不付代價是不可能的。

中國革命不是孤立的。中國解放以後繼續革命和建設也不是孤立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在中國，第二篇文章（社會主義）怎麼做？除了毛澤東之外，主持這方面工作的是劉少奇。中國問題重大的決策，按照上面說的毛澤東講的那四條，最重要的就是密切聯系國際戰略問題的決策。整個國際戰略問題決策的直接掌握者是毛澤東。輔助毛澤東的第一個也是劉少奇。這一點不少人還不知道，為什麼呢？因為劉少奇那些東西現在還不能公布。當然有些東西也是可以公布的。有對的，有不對的，有的在當時是要那麼搞，以後不必那麼搞。現在我們黨內的同志，甚至有的高級幹部不知道外交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區別，以為一談到國際就是外交，不是。

外交部同中聯部不是一回事。中聯部是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這個部的長期的負責人是王稼祥。對誰負責呢？對劉少奇負責。劉少奇對誰負責呢？對毛澤東負責。外交上的重大問題都是毛澤東直接管。重大的決策，第一要請示毛澤東，其次要請示劉少奇。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這個問題，主管的、主持的，是劉少奇。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的劉少奇。包括代表毛澤東去跟斯大林打交道，都是劉少奇。現在黨內外許多人還不知道。許多研究工作者和寫書的人都不知道。中國人不知道，世界上的也不知道。

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制約因素

我知道的事情比較多，因為許多事情有偶然性，是偶然因素決定的。因為我被派到胡志明那裏去當意識形態組顧問，是一九五三年底決定的。我必須從一九五三年底就接觸這個問

題。所以我知道那些重大的決策。當時黨的主要領導核心，都是一致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最早的還有任弼時，再有陳雲、林彪、鄧小平，他們都是一致的。作爲中國人，作爲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我感謝他們，他們的決策是對的，不然的話，我們中國不知會走到哪裏去了。第一個是毛澤東，第二個是劉少奇。

當時我要去當胡志明的意識形態顧問組組長，我不能不更多地知道一些重大戰略性的決策的背景。首先我比較早的知道毛澤東在這方面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國革命的成功，是違背斯大林的意志的。中國革命是不承認他那個雅爾塔協議的，不能說全部不承認，可是我不能全聽你的。你們三家子就把世界分了，一個美國，一個蘇聯，一個英國，在雅爾塔開了會，就把歐洲分了，把世界分了，把中國分給了美國，一個羅斯福，一個斯大林，一個丘吉爾，就給分了。主要的部分是美國同蘇聯兩家子分了，英國同法國分到了那些原來的老殖民地。其他不屬於英法的殖民地，他們都分了。不準中國革命是從這裏來的。世界上祇有一個人，這個人叫毛澤東，其次是劉少奇，還有我們中國黨的其他的主要領導人，都擁護這個：我們不聽斯大林的指揮棒。他先是不準中國革命，然後又不準中國徹底革命，要想南北分治。因爲他們是把中國分給美國，東北也分給了美國了，蘇聯要老沙皇占的旅順口和中東路。在新疆的老沙皇和新沙皇的利益，也都要分給蘇聯。

打到了長江了，羅申跟孫科跑了，到廣州了，跟國民黨去了，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美國

人在這一點上比蘇聯聰明。抗日戰爭時期，住在延安的不是蘇聯人，是美國的軍事觀察組。當時以羅斯福為代表的美國政治家是比較有遠見的。他早已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是很重要的政治力量，認為同毛澤東是可以合作的。他的繼承者犯了歷史錯誤，武裝蔣介石打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他一看大勢已去，國民黨的情況他知道，共產黨的情況他也知道，共產黨不是不可以合作的，不一定比蔣介石差。可是由於美國的政治家幹涉別國內政的本性，他們一直犯錯誤，一直到今天還犯的，就是對於當時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今天所謂的「精英」），估計高了，他硬要依靠當時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這樣就搞崩了。很多事情都是美國自己弄壞了。要同中國合作，不依靠毛澤東怎麼行呢？

毛澤東就是看得比別人遠。劉少奇也看得遠。劉少奇不光是國內問題，國際問題也看得遠。在蘇德戰爭中，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提出「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日本」，那是毛澤東所思考的重大的戰略問題。那個時候劉少奇在華中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同毛澤東的看法完全一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在國際戰略問題上，既要看到世界上必然出現兩極對立的一面，又要看到還有統一的一面。就是不能光看到以美國為首同以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的對立，還要看到在這對立陣營的烟幕之下，存在着世界的各種基本矛盾，不能被兩極對立掩蓋住。「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蘇必戰」，世界上許多政治家，包括中國蔣介石在內，都唱這個調子，以為美蘇矛盾、兩大陣營矛盾是主要矛盾。有些共產主義者，也相信這

個，害怕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嚇得不敢革命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人說：這不對。世界的主要矛盾不是這個。第三次世界戰爭沒有現實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可能，是有可能性，但不是現實的可能性。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新獨立國家、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矛盾。民族解放運動的潮流，誰也擋不住。在中國，主要表現爲中國人民同代替日本地位的美國的矛盾。所以中國共產黨獨立地作出了自己的戰略決策。

以毛澤東爲代表的這樣的決策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決策，也真正是代表我們中國利益的，也符合全人類利益的。就是要這樣幹，人類的歷史才能前進。

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大的事件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從而引起一直沒有間斷的世界新的變化。兩極對立，冷戰時期，持續了那麼多年。在這個當中，開頭同結束，變化是非常顯著的。顯著的變化，人們容易看清楚。在顯著變化發生之前，人們常常看不清楚。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劉少奇也看得很清楚。對於各種矛盾的分析同看法，毛澤東和劉少奇是一致的。在這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幾個主要決策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是一致的。美國的反共專家，利用李志綏的書，辱罵周恩來，是別有用心的。周恩來也是非常重要的決策者。是毛澤東的最重要的輔弼者之一。當然從國際共產主義的這個角度，從國際戰略問題決策這個角度，除了毛澤東，主要負責人是劉少奇。不光國內問題是劉少奇管，

毛澤東退居二線以後，劉少奇主持常委工作，在外交上重大問題也提到劉少奇那裏作決定。劉少奇不能決定的，才由毛澤東決定。現在很多人不知道劉少奇的歷史地位。毛、劉、周、朱的排列，是歷史形成的，這樣的歷史排列絲毫不影響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的形象。他的歷史地位形成了，他是古今中外難得的輔弼之才。

為什麼不能在歷史上貶低劉少奇呢？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在解放以後，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毛澤東的大多是劉少奇。有人貶劉反毛，是爲了貶低中國共產黨，醜化中國共產黨。我們承認，我們在解放以後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這是我們在探索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中付出的新代價。這個代價比原來設想的要大得多。現在已經沒有王明博古了，你不能再說是王明博古的責任了，而是歷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自己的責任了。第一位是毛澤東，第二位是劉少奇。這個賬都算到他們兩個人頭上去了。另外臆造出這一個那一個人，作爲正確路線代表，對不對呢？不對。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在這一個歷史時期中，毛澤東思想已占了統治地位，毛澤東和劉少奇出面主持工作，黨中央的威信很高，在重大問題上全黨步調一致，不存在有一個人或幾個人老早就反對毛澤東的錯誤。這個不符合事實。你在這個局部問題上不同意毛澤東，那是有的；在那個問題上你正確了，那也是正常的。但因爲在這個問題上或者在那個問題上你有不同的意見，你就比毛澤東高明了，這種邏輯不行。我們必須從中國全局的決策，整個國際戰略的決策，從全部歷史的具體分析中，得出科學的結論。否則就不懂爲什

麼那時候必須那樣？爲什麼這時候又必須這樣？這首先是，中國問題的決策，經常要受國際戰略的制約。過去第一是蘇聯，第二是美國，是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中國革命勝利了，斯大林還是好的，他馬上承認自己錯了。他不說錯，在莫斯科向劉少奇敬酒時，他說是「爲學生超過先生幹杯」。劉少奇作爲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作爲毛澤東的代表，還是尊重斯大林的。他說，這杯酒我不能喝，這就是不能承認我們已經超過你。如果你真喝了，他還會真不高興。斯大林還有更重要的話：「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就是說你也不一定就那麼對，反正你勝利了就是了，那還有什麼話說。實際上事情并不是那麼好辦，還是很難辦的。

朝鮮戰爭

發生朝鮮戰爭，我也比較早地就知道朝鮮戰爭的內幕。現在我們中國的出版物中，朝鮮戰爭的機密差不多都暴露光了，都公布得差不多了。赫魯曉夫公布的，蘇聯方面公布的，還有我們中國現在公布的回憶錄，還有些什麼書，公布得差不多了，但是有兩個核心問題人們

沒有公布，大概連赫魯曉夫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兩個最重要的核心問題。第一，他不知道開頭毛澤東反對打這個仗。毛澤東對我講過，一個斯大林，一個金日成，一個毛澤東，這三家商量，首先是斯大林要打。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不準中國打，他不是不對了嗎？在朝鮮這個問題上，他又翻過來了，他認為中國能够打，在朝鮮也能打了。那時美國人走光了，南朝鮮沒有什麼兵，他認為一打就行了。他要打。這又不對。毛澤東反對，說不行，這同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一樣，不能打。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這證明毛澤東對。打幹什麼？不應該打，也不必你管嘛，這是朝鮮人自己來解決的事情。斯大林把北朝鮮看成是自己的殖民地，或者是附屬國，至少他看成和東歐一個樣，要聽他的指揮棒了。毛澤東反對，他聽不進去。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一個斯大林，一個金日成，一個毛澤東，祇有我一票，我反對。一個是太上皇，一個是當事人，兩家子都主張打，我也祇好說那就打吧，但是你要準備打不贏。美國人一定會回來，一定會在仁川登陸，北朝鮮頂不住。斯大林說：不怕。那就打吧。你中國出陸軍，我蘇聯出空軍。果然打了，一下子占了南朝鮮大片地方。美國人也果然回來了，在仁川登陸，北朝鮮的部隊也果然頂不住。斯大林馬上就讓中國出兵。現在暴露的材料中不知道，毛澤東原來是不贊成中國出兵的。後來因為美國人把朝鮮戰爭的性質改變了，才把不出兵改變為出兵。派周恩來去談，談什麼問題呢？原先想派周恩來去談中國不出兵，臨行前決定出兵，就談出兵了。毛澤東作為戰略決策是中國不出兵，很快因為形勢和戰爭性質的變化被迫改變為出兵。

兵。現在連電報都在一些書上公布了，但是都不知道這個重要的歷史背景。

為什麼從不出兵必須改變為出兵了呢？因為美國人的目標變了。他的目標如果限制在三八綫，到原來的分界綫為止，我們中國就不出兵。形勢變就變在，他宣稱不受三八綫限制了。美國人不受三八綫限制，戰爭的性質改變了。他宣稱鴨綠江也不成爲他的界綫了。這樣，他以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爲侵略的對象了，那當然不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是真實的。這個口號也是確切的。我們新中國受到了威脅。毛澤東決策是從這個根本點來考慮的。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的性質變了，變成侵略性質了，不但以北朝鮮，而且以中國爲目標了。我們中國直接受到了威脅，我們必須出兵。而且我們不等你打到鴨綠江，就要及時出兵，立即出兵。不然的話，等你打到了鴨綠江，我這個仗就不好打了。我不能讓你這個仗在中國打。這是多麼重大的問題，這都是最關鍵的問題。人們不知道，就公布一些東西，好像中國也是主張打的。爲什麼中國先主張不出兵，又改變爲必須立即出兵？好像是出爾反爾。說毛澤東多變，這個變的對呀！你戰爭性質變了。我要打，當然要打贏呀。九月三十日，南朝鮮越過三八綫試探一下，十月一日美軍就越過三八綫了。十月二日毛澤東就決定出兵了。中國出兵了，斯大林又賴賬，本來是他出空軍，他又不敢出空軍了。要賣飛機給中國，訓練中國的飛行員。飛機價錢還賣得很高。這些在毛澤東看來都是些小事。抗美援朝這個戰略問題的決策是毛澤東定的，歷史證明毛澤東是對的。先是斯大林要打，不對。毛澤東反

對，對，中國先是不出兵，對，美國人把戰爭性質改變了，毛澤東就是要出兵，又對。毛澤東原來的想法是不出兵，後來才改為出兵。這個總的趨勢證明都是毛澤東對，斯大林不對。這一點必須肯定，抗美援朝是對的，因為戰爭性質不同了，中國確實受到威脅了。我們的新中國必須抗美援朝。

毛澤東說的三家談，兩票對一票，第一次指的是朝鮮戰爭發生之前。毛澤東說還有第二次三家談，是停戰問題。毛澤東說，我主張再堅持一下，再打一年，美國人就肯定頂不住了，倒是可以有一個統一的朝鮮了。但是，又是一個太上皇，一個當事人，說不打了，要停。又是兩票都要停，我祇有一票。那好，就停戰吧。

越南問題

一九五三年底，中央決定派我到越南擔任意識形態顧問組組長。那年胡志明從斯大林那裏回來，胡志明是保大皇帝的叔叔，原名阮愛國，在越南，在整個印度支那，一直是象神一

樣被崇拜。打敗日本以後，保大皇帝是讓位給胡志明的。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在亞洲是最早的共產黨掌握的政權。比我們建立新中國早。但是這個政權，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自己的根據地，沒有自己的群衆組織，沒有自己的一切，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就不行了。胡志明還是到中國、到蘇聯來了。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他在我們的幫助下，建立了軍隊，建立了根據地，那時的根據地還是很軟弱。我們原已應他的要求，派軍事顧問同政治顧問團。斯大林逝世前，對胡志明的批評很粗暴。那時朝鮮戰爭停戰了，按照斯大林的邏輯，北朝鮮原來是他的，現在是中國出兵，仗主要是中國打的，就應該割歸中國了。毛澤東說，我不是斯大林，中國不是蘇聯，朝鮮是屬於朝鮮自己的。我們援助了朝鮮，朝鮮也援助了中國，援助是相互的。停戰實現以後，中國就撤兵。這樣，北朝鮮才不但趕走了美國，也擺脫了蘇聯的新式殖民枷鎖，真正得到了獨立。

在越南，後來越南同法國停戰，實行南北分治，按照斯大林把北朝鮮劃歸中國的同樣邏輯（赫魯曉夫還是這個邏輯），把越北劃給中國了。毛澤東的邏輯是與之相反的。越南是屬於越南人民的。援助是平等的和相互的。顧問是接受邀請的，必須接受胡志明和越南黨的領導。這次斯大林批評胡志明，要他土改。胡志明原來的意思是搞類似減租減息的東西，斯大林說不行，一定要土改。那時中國也進行土改，胡志明向毛澤東提出，要求中國加派土改顧問組和意識形態顧問組。中央就是這個時候派我去擔任意識形態顧問組組長的。土改顧問組

組長是廣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喬曉光。他還兼政治顧問團的副總顧問，總顧問是羅貴波。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是韋國清。土改顧問很難辦。人家國內的階級鬥爭，國內的土地革命，外人很難幫。胡志明這位老同志，也許他是對的，他很不願意搞激烈的階級鬥爭。我碰到的意識形態問題還好辦一點。按照中國的經驗，還是普遍真理同越南具體情況相結合。越南已有公認的領袖胡志明，誰都得接受胡志明。胡志明也有自己的主張和思想，宣傳胡志明就行了。在中國，毛澤東的地位，是經過種種困難和曲折才確立的，而他是現成的。這個總的方針，是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的。辦報，文化教育，向越南介紹中國經驗就行了，都比較好辦。祇有辦黨校、整風，就難辦了。胡志明也決定在越南學習中國黨的整風，解決幹部思想作風問題，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件事情外人就很難過問了。按照毛澤東、劉少奇、王稼祥的指示，千萬不能插手、幹預人家黨內的事，祇能介紹中國經驗，千萬不能過問人家黨內的問題。

我在這裏簡單地講一下越南的問題，祇是爲了說明我直接接觸的毛澤東，他的國際戰略思想和決策，是很對的。南北分治一實現，毛澤東就馬上決定，軍事和政治思想顧問一律撤退，祇派經濟顧問團，後來改爲經濟專家團，去援助越南恢復發展經濟，總顧問是方毅。

奠邊府戰役勝利了，開了個日内瓦會議以後，就實現南北分治。我們是堅決支持并主張南北分治的。爲什麼呢？毛澤東從國際戰略上考慮，讓法國人在南方維持住那個局面，絕不

能讓美國人進來。胡志明先把北方搞好，爭取用和平統一的方式統一越南。能和平統一更好，不能統一的話，暫時以十七度線為界分治。就是寧可讓法國人維持局面，不要美國人插手。這是毛澤東取得胡志明同意作出的決策。這是非常對的。原來按照蘇聯人的邏輯，越北的政治和軍事，應該劃給中國操縱了。可是毛澤東決定撤退。結果我們一撤退，蘇聯就乘虛而入，原來他不管，既不出錢，又不出力，一勝利，他立即就插手越北。你軍事顧問走了，他來了。你政治顧問走了他來了。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顧問走了，蘇聯的教條主義者來了。

我知道的背景比別人多一點，第一，因為我是意識形態顧問；第二，顧問團在後方原始森林，在前方幫助越南接管城市的總負責人是我。第一個接管的城市是河內，然後海防，然後鴻基。時間拖得比較長，是按照他們同法國人商定的撤退時間表。我們派了各部門的顧問，把中國接管城市各方面的經驗介紹給他們。我們過去走過的彎路他沒走，我們過去付出的代價他沒付。在前方總的負責人是我，在河內，越方的負責人是書記處書記黎文良，在海防，當時的市委書記就是現任越共總書記杜梅。

毛澤東思想，中國黨的主要經驗，在越南他們不但接受了，而且靈活地具體地運用了。杜梅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是很信任的，很尊敬的。接管城市他們是非常滿意的，中國的這一套經驗，對他們很實用。包括幫助他們印票子，把原來印度支那的貨幣兌換成越幣。城市一接管，最重要的物資都立即由中國提供。離開了法國貨，馬上就有大量的上海貨，質

量也不錯。沒有感覺到物資短缺，沒有感覺到糧食、燃料以及日用品的短缺。中國作爲他們的後盾，把這些方面都給他解決了。可是反過來說，我們過去沒有系統總結過，現在看起來，我們也把某些不對的做法傳播給他們了。當時在特定情況下，他們可以不那麼做的，也照我們的做了。對待法國人搞得太急了，比如稅，收得太重了，逼得法國人都走光了。這從長遠上看是不利的。我們的收稅的專家也有，銀行的專家也有。那時還叫顧問，還沒改爲專家，整個一個大的組歸我管。所以大的方針上的失誤，我應當負責。在北方，接管城市，越南是接受了並應用了毛澤東的全部的中國經驗，包括毛澤東制定的各項政策，連那個城市布告，約法八章，他們都根據自己的情況應用了。我們早就撤退了政治和軍事顧問，在南方的鬥爭，一直到同美國人打了仗，都是越南人自己獨立決定和進行的。毛澤東決不幹涉越南黨的內部事務，我們不會阻礙人家，我們不會不準革命，我們把援助越南作爲應盡的國際義務，並且認爲他們打敗美國也是對我國的重大援助，我們絕不要求得到任何私利，絕不要求得到任何回報。

我介紹了毛澤東對越南問題的全部國際戰略思想，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劉少奇、王稼祥、周恩來、鄧小平同毛澤東是一致的。這也是關係全球，關係中國問題決策的大事。中國問題的決策絕不是孤立的。這也是一個研究方法的例子。

不能抓住思維矛盾運動中的一個片斷，

研究毛澤東和他同別人的關係

現在一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家，中國通專家，咬文嚼字地說，這個人同那個人矛盾，那人同這個人矛盾。他們經常脫離國際戰略決策的背景及其變化，貌似科學態度，實則脫離科學。別有用心的反共專家，更是蓄意如此。所以，要駁斥李志綏他們這些人的東西，祇要把大的歷史背景講清楚，就很好駁，有些也不駁自破了。掌握了正確的方法，我們自己寫的書，也可以寫得更好些。有的寫得很好的書，有豐富的材料，有很高的綜合、概括、判斷、分析的水平，但也没有把一些重大決策同國際戰略決策聯繫起來研究，因而降低了指導價值。

在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歷史條件變化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活人，經常處在實踐運動的

過程中，他們時刻都處在概念的矛盾運動或者實踐中的思維運動當中。而這種思索，這種探索，這種概念的矛盾運動，主體是集體。歷史上的重大決策，都是經過集體做出的。每個人概念的矛盾運動，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說法，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矛盾運動。誰都每天在思考，我們中國的事情怎麼辦？已經決定了的事情怎麼辦？對，還是不對？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沒有否定也沒有新的肯定。這件事對，要肯定它，就這麼辦。這件事不對，不行，就否定它。否定後怎麼辦呢？就要反復，反回來。並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新的肯定。這個運動是螺旋形的發展，是無窮無盡的。每天都在運動過程中，中國的最高決策人，特別是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是把實踐中的思維貫穿于全部生活中的。

現在，有些所謂研究專家，所謂中國通，有的二道販子，出口轉內銷，常常抓住這些東西，說這個人同那個人有矛盾了，這個人發表的這句話，同那個人的那句話不同了。這個人是怎麼對，毛澤東又怎麼不對了。這個人就比毛澤東高明了。這種研究方法很多是低級的無聊的。他們不知道探索過程中不一致是經常的，是正常的。做出了決定，行動上要一致，組織上要一致，要服從。而思維上，對已決定的事情提出新的見解，新的建議，新的探索，那種不一致正是一致的表現形式，叫和而不同。這是在大的一致之下的不一致。怎麼單憑片言只語，就說這個人不對，或者說這個人就了不起，成了大聖人了。這種思維方法，我們不能採取，這不能反映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歷史。我不贊成現在有一些人挑出一兩句話來，就說什

麼某某人比毛澤東高明，這不對。要你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你當然要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你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要你幹什麼呢？你不提出新見解行嗎？當然要實踐，當然要提出新的東西。當時毛澤東為什麼欣賞羅榮桓，正因為他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好，能在重大問題上提出新的不同意見。為什麼欣賞鄧小平？鄧小平也是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好，不能够單從詞句上來研究，那就會離開本質，陷入迷途。

這種祇抓住毛澤東片言祇語的風氣，是對長期以來神化毛澤東的一種懲罰。其實毛澤東從來反對說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理。前邊講過，毛澤東的哲學，毛澤東的性格的特點，是懷疑一切，批判一切，沒有任何禁區。他經常對各種人物各種事物發表自己的看法。不少是對的，很精辟。看錯了，說錯了，也是常事。他是很聰明的人，祇要你向他指出，他哪個問題說得不對，他通常會接受的。當然，那些他根據歷史情況的變化、經過反復思索、已經定下來的戰略決策，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對一個人的看法，已經形成了的總概念，也是難以改變的。而對一人一時一事的看法，則是經常在變化之中。

毛澤東好唱反調。實則是辯證的思維。當別人都說這個人好的時候，他偏要說幾句這個人還有什麼不好的地方。當別人都說這個人壞的時候，他偏要說幾句這個人還有什麼好處。我們千萬不能把這個奉為聖旨。過去我們把它作為語錄，并且以此作為打倒一個人，或者解放一個人的「最高指示」，我們吃過大虧。今天我們要接受這個歷史教訓，不能沿用這個錯

誤的方法來研究毛澤東，來研究黨史。毛澤東是活生生的人，象常人一樣，是有感情的，是有自己的喜怒哀樂的，有時候發脾氣，說氣話。千萬不能把他說的氣話當成「最高指示」。

下面舉幾個例子：

(一)「文革」初期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鄧小平：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一直到我打倒的前夕，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在武漢的談話，他沒有在我面前罵過劉少奇。他還是講劉少奇的好處，講開「九大」時少奇還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在一「文革」初期，劉少奇的每一次檢討，他都說好，都想了結，讓他過關。他反對對劉少奇搞什麼面對面的鬥爭，說這種做法既不解決問題，又勢必發生武鬥，必須堅決制止。但是毛澤東的有些想法，在特定的空氣之下，也是不能實現的。毛澤東對鄧小平說的氣話，我聽到的祇是傳言。我一直不相信那是認真的。因為毛澤東多次對我談過鄧小平，對鄧的評價極高。他對鄧的基本看法是不會改變的。

(二)毛澤東對王稼祥：

毛澤東對王稼祥，在一定的空氣下，他罵了「三和一少」。但是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講：稼祥在歷史上立了兩大功，第一是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就沒有遵義會議的成功，也就沒有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第二是在毛、斯會談中，王稼祥站在毛澤

東方面，同斯大林進行了鬥爭。王稼祥協助劉少奇，對於新中國制定和實行獨立自主的國際戰略，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毛澤東始終是懷念和尊重王稼祥的。也關懷王稼祥的身體。

(三) 毛澤東對朱德和陳毅：

朱德和陳毅，是他在井岡山的老搭檔。特別是對陳毅，有時他很生氣，說過不少氣話。但是他公開講，我這一輩子，就是要保兩個人，一個是朱德，一個是陳毅。陳老總逝世，追悼會居然不安排在人民大會堂開，祇能在八寶山開。謝富治才够資格在人民大會堂開追悼會，下半旗。這種歷史現象是多麼可悲。毛澤東穿着睡衣去八寶山出席陳毅追悼會，是他的真情流露，是對世俗的安排的抗議。那時林彪已經出了問題，他這一行動也正是表示自己的反省，表明在對待林彪的看法上，陳毅是對的，他錯了。至于現在流傳的那段所謂語錄，我認為是不着邊際，不能反映他對陳毅關係的本質。

(四) 毛澤東對周恩來：

在延安整風以後，毛澤東同周恩來的合作是很好的，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輔助是很大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他是離不開周恩來的。在文革初期，他很尊重周恩來，他實際上是委托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和專案組的工作。對周恩來不滿意的話也說過。但是對林彪的不滿意的話說得重。例如他對着林彪說過：「我看現在還是同過去（劉少奇時期）一樣，對我實行封鎖。重大問題，不向我請示報告。」接着馬上補充一句說：「總理除外，凡是重大問

題，他是向我請示報告的。周恩來日子不好過時，他總是要出面保。至于對周恩來在歷史上的路線錯誤，周恩來自己從來不回避，從來是到處講，講得別人都不願意聽了。毛澤東也不避諱，當着周恩來的面，不但對中國人，也對外國人公開講。例如一九六五年會見印尼的艾地時，毛澤東就對着周恩來說，你領導的那個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部隊往海邊撤退，想得到蘇聯的接濟，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錯了。周恩來馬上接過來說，是錯了，主席上了井岡山，是正確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裏，知道他絕不準許任何個人和群衆組織傷害周恩來，後來流傳的那些所謂批周公的語錄，我就知道了。但是我一直不相信那是真實的。

(五) 毛澤東對胡喬木、田家英和王力：

對胡喬木，毛澤東不但有科學的評價，而且很有感情。在一「文革」發動初期，喬木受到了衝擊，毛澤東堅持親自到他家裏去看望，可惜喬木不在家，沒有見到。

對田家英，我知道毛澤東是說過一些難聽的話。但是在我所參加的大和小的會上，在他同我的多次交談中，我沒有聽到他說過田家英一句壞話。他是喜歡田家英的。我斷定他是懷念田家英的，對於田家英的死，他心裏一定是很難過的。我不相信他對田家英說的那些氣話，就是他的定論，就是不可改變的。

對王力，他也說過難聽的話（說王力是彭真的人），但是並沒有影響他又說了好話，又

重用了王力。王力突然被打倒，謠言滿天飛。我不相信那些關於王力的所謂語錄是真的。我以為是胡編亂造的。即使是真的，也是因為誤聽謠言所致。說周恩來把王力的所謂「八七」講話稿送給毛澤東，他就批了「大毒草」，馬上就把王力抓起來了。我不相信，我祇相信歷史事實。這個所謂八七講話記錄稿，王力早已送過毛澤東，其中一些不對的話，大都是毛澤東的原話。毛澤東在八月十七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也講了同樣內容的話，絕不可能在八月下旬把王力講話批成「大毒草」。如果真有這個批件，那也另有復雜的原因和背景。到了九月中旬，我還看到，他親筆寫了一個批語，稱關鋒和王力為同志，說「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我相信這個給我親眼看過的白紙黑字上寫着的，才是毛澤東的話。至于流傳很廣的毛澤東同葉劍英談所謂「二月逆流」問題時那段罵「王、關、戚」和「五·一六」的語錄，我也一直不相信是真的。因為它違背了起碼的常識和邏輯。老帥們和副總理們在二月裏的講話，怎麼可能是為了對付八月以後才發生的「五·一六」呢？這種所謂語錄直到今天還任其流傳，是不對的。「五·一六」問題是牽涉一千萬人之衆的大冤案，而且這個大錯誤早已人所共知，為什麼還要扯上毛澤東呢？謝靜宜對我說過：她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裏，沒有聽到主席說過王力的壞話。我相信這是真實的。

研究毛澤東，研究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研究毛澤東和其他人的關係，都不能單以片言只語為依據，而必須以全部歷史及其發展變化為依據。

把毛澤東同劉少奇的矛盾追溯到建國前後是不對的

上面談了戰爭年代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現在再繼續談建國前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

有些黨史研究工作者把所謂劉少奇同毛澤東的矛盾追溯到建國前後。人們把他們個別詞句的差异，作為研究的依據，這是不科學的。在建國前後，劉少奇同毛澤東是高度一致的，劉少奇提的論點是毛澤東決策的重要補充。這一段歷史是很重要的。有些毛澤東當時所說的話，現在重溫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建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制定了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綱領。毛澤東說：「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着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的生產）。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着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在城市工作中，「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衆」。

毛澤東提出了對基本國情的分析和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毛澤東明確地說，革命勝利後，我們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性質的，五種經濟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由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起決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既團結，又鬥爭。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們對民族資本的總方針。對內節制資本，對外統制貿易，是新中國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

同時，必須謹慎地、逐步地、積極地引導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

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向着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共同綱領》中未寫社會主義。因為在開國之初，毛澤東原來是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政協籌備會議上指出：綱領中祇說現階段的任務，如果再說得遠一點就變得空洞了。「共產黨的當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實現自己的最低綱領」。不寫入社會主義的前途，毛澤東是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當作今天要實行的政策，避免發生「左」傾錯誤。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毛澤東和劉少奇是一致的。劉少奇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所作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的報告，也是一個綱領性文件。毛澤東完全贊同，并作了補充。劉少奇說「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的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毛澤東特別補充說：「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十五年。」

毛澤東補充的插話還指出在中國「連資本主義工業在內，整個現代機器工業的生產量頂多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劉少奇認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當時還占着較大比重，「在目前整個國民經濟中，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適當發展，對於國民經濟也是有利的」。為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對那些不危害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還要允許其發展。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我們與民族資產階級至少「可搭伙十年至十五年」，如果過早消滅了，「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他請來的」。

劉少奇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既有社會主義因素，又有資本主義因素，「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狀態」。但是，社會主義成分雖然很小，却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與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矛盾，如何處理這一矛盾，劉少奇主張通過「經濟競爭」來解決。

劉少奇認為，「決定的東西是小生產者的向背，所以對小生產者必須採取最謹慎的政策」。他說，「單是給小生產者以土地，祇是建立了領導權，還須進一步使他們成為小康之家」。要通過合作社（主要指供銷合作社）的形式去團結他們。一合作社是勞動人民的集體經濟，與國家經濟相結合，建立同盟，走向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總結發言裏說：「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很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後，對這點可作宣傳。」

在建國後，劉少奇是提出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口號。他說：「中國共產黨的最

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鬥爭」。

人們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新中國的看法，對在新中國如何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綫和方針，是何等的頭腦清醒，是何等的正確喲！可惜因為種種不以任何個人、任何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形勢所迫，而一直不能具有實現的條件。這個大的彎路，時間長達三十年，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新的基礎上，取得了實現的條件。這不是歷史簡單的重複，而是螺旋式的發展。同時也可以看到鄧小平的理論，正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是肯定劉少奇天津講話的

劉少奇的著名的天津講話，是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繼續，設想中國要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時期。他宣揚毛澤東提出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并且

進一步具體化。他強調民族資產階級還不是我們今天的鬥爭對象，「如果當作鬥爭的對象，則是犯了錯誤，……這錯誤是路線錯誤」。他說，「資本家在生產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一保護他們，『實際上就是保護生產』。」

劉少奇設想，「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對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要加以保護和允許其發展，對國計民生的投機、壟斷行爲一定要制止，要把商業投機資本引向生產型的工業企業。他設想，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時期，工業逐步發展起來了，就「非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可」。關於過渡的方式，他多次講過，中國可以不採取蘇聯、東歐推翻資產階級的流血方針，而採取民族資本家「與我們一起走入社會主義」的方針。劉少奇想到了采用「和平贖買」的方法，防止出現「左」傾冒險主義，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長）。這正是毛澤東戰略構思的一部分。毛澤東同意「普遍宣傳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講解的各個問題」，劉少奇說「必須實行毛主席所指出的『四面八方』的路線，一避免重犯過去在土改中侵犯私營工商業的錯誤。」

劉少奇在天津之行結束不久的五月十三日，為中央起草了《關於對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給東北局電》，批評東北局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左」傾錯誤。他指出：「這是一個實際上

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和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根本相違反的。」毛澤東親自起草了按語，指出「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并要求各地黨委「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和對東北局的批評，在實踐中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對於保證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幹部統一于毛澤東思想和戰略決策，避免犯大錯誤，順利地接管城市，恢復發展生產，是很重要的。

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有一個觀點，叫「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在一「文革」中被作為大逆不道的反動言論進行批判。這個批判是不對的，它的消極影響至今還存在。據我所知，毛澤東對歷史上對這一論點的批判並不完全贊同，他祇是說「今天（一九六七年三月）批判一下這個觀點有好處」。在歷史上，具有極左思想的人就非難過劉少奇，當時毛澤東並不同意非難者，他從來沒有從原則上反對這個觀點，祇是在文字上表示過「不一定這麼講」。反過來也就是說，并不是一定不能這麼講，這麼講了也沒有什麼。很明顯，劉少奇在這裏所說的「剝削」，指的是現代的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勞動的「剝削」。這種「剝削」制度，不但比封建主義的「剝削」制度優勝，而且也比個體的小生產者的「個人所有制」優勝。小生產者的「個人所有制」，也是封建主義的墻腳跟。在中國當時歷史條件下，資本主

義性的雇傭勞動性質的「剝削」，的確是「有功」，的確是少了而不是多了，的確是「越好」。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共同的。

毛澤東和劉少奇對於這個問題的歷史局限性，恰恰表現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後來意識到，他本人和其他領導人都沒有時間精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個缺陷。據我所知，在「文革」前，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沒有時間精讀過《資本論》第一卷（它有獨立的科學價值），更談不到《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合起來，才有系統的科學價值。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很多是在第三卷中闡述的）。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兩個否定。第一個否定，是以機器化和社會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否定手工的分散的落後的小生產者的個人所有制。第二個否定，是以建立在現代化和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重建新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個人所有制。這是第二個否定，即否定之否定。這才是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從來不照搬蘇聯的模式。但是蘇聯的模式當時是唯一可以借鑒的模式。它除給我們以啓示，也束縛了我們的眼界。帝國主義的封鎖政策，隔斷了中國同世界市場的聯繫，迫使我們不能不一一邊倒”。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直接汲取世界上現代資本主義最新成果的條件，爭取突破封鎖，把新中國同世界市場聯繫

起來，是毛澤東從建國前就確立，一直到「文革」還為之奮鬥的戰略。但是歷史使他的願望不能得到實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的繼承者，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才解決了這個根本問題，完全擺脫了蘇聯模式，把新中國同世界市場聯接起來，汲取世界現代資本主義最新成果，建立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體系，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及其戰友和繼承者實行的許多大事，正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爭取實行而歷史條件不允許實行的遺願。我們分析任何問題，都不能忘記毛澤東的基本方法，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歷史。

我們決策的歷史背景，在國際戰略上，主要受到美國和蘇聯的制約，主要受到侵略和反侵略，顛覆和反顛覆，幹涉和反幹涉，控制和反控制，封鎖和反封鎖的制約。我們原定的戰略決策的改變，經常是不以任何個人甚至任何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

用不着多說，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我們原來準備建立和參加「聯合政府」的，我們原來是設想并爭取有一個「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但是美國代替了日本的地位，發動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的新侵略戰爭，我們的解放戰爭，實質上也是一場新的反侵略戰爭。結果美國人和蔣介石失敗了。

朝鮮戰爭轉變為美國以中國為主要對象的侵略戰爭時，我們原來設想的按步就班地經過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節奏，也不能不有所改變。毛澤東是最早考慮不要提「確

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不要提「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過渡時期是劇烈的深刻的變動，按其性質來說，比過去武裝鬥爭來得深刻……因為十年十五年後資本主義要絕種。」這一點，毛澤東最敏感。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其他主要領導人都立即表示同意，因而是致的。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矛盾時限規定 為「八大」是不對的

我們制定和實現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成功的。主流是正確的，錯誤也有不少。不管是正確還是錯誤，毛澤東和劉少奇以及其他領導人都是一致的。

國內的和世界上的許多專家，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和分歧的時限規定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會議。這種看法對不對呢？不對。

我們祇要讀一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文章，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科學的解答。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同一九五六年底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側重點是不同的。這兩篇都是毛澤東親自抓的，第一篇執筆者主要是陳伯達，第二篇執筆者主要是胡喬木。這是毛澤東的兩篇綱領性的文件。《一論》以反對教條主義為綱，《再論》則着重反對修正主義。

《一論》和《再論》的差异，絕不反映毛澤東同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矛盾。口徑都是毛澤東定的，重要的論點都是毛澤東提出的，也是毛澤東堅持不提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

在《一論》中，着重肯定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毛澤東和中國黨得到了一種從控制反控制鬥爭中的解放。這些都是毛澤東提的：

「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

「一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能夠設想它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

「當着斯大林正確地運用列寧主義的路線而在國內外人民中獲得很高的榮譽的時候，他却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誇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把他個人的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動和自己原來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處于相對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認人民群衆是歷史的創造者，承認黨必須永遠地聯系群衆，必須發展黨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這就使得斯大林後一時期在這個問題上陷于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矛盾。」

「個人崇拜不祇在剝削階級中間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者中間有它的基礎。大家知道，家長制就是小生產經濟的產物。……個人崇拜是社會現象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當像斯大林這樣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物也接受這種落後思想的影響的時候，就會反轉過來再影響給社會，造成事業的損失，有害于人民群衆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黨的生活，日益和個人崇拜這類精神狀態互相矛盾着，互相衝突着。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展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正是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阻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鬥爭。」

「一個矛盾將導致另一個矛盾，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有些人認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中消除掉，這個意見顯然是不正確

的 · —

「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

《一論》這個綱領性文件，也就是毛澤東為八大一次會議文件所定的基調。劉少奇在八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治報告，鄧小平的修改黨章的報告，都是按照這個精神起草的。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同樣是毛澤東定的基調。基調是有了很大的改變。為什麼呢？因為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國際形勢發生了大的變化。

毛澤東敏銳地看到：「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它對於社會主義陣營所進行的明目張膽的破壞活動，更成為世界政治中異常顯著的現象。帝國主義陣營的首腦美國，在幹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方面，作得特別凶惡無耻。」

「帝國主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動，是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以後對於社會主義陣營一次最嚴重的進攻。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復辟陰謀被擊退以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操縱聯合國通過反對蘇聯和幹涉匈牙利內政的決議，一方面在整個西方世界煽起瘋狂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浪潮。」

「杜勒斯從『哲學』上要求帝國主義世界把對於共產主義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為了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

「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後，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的原則。這裏提的是五條。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時是六條標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發表的《莫斯科宣言》中，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堅持並得到通過的是九項共同規律。這九項共同規律又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發表的《莫斯科宣言》中重申了。這種堅持普遍真理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四項基本原則。

文章還說：「我們認為，斯大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祇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斯大林的錯誤的一個嚴重後果是教條主義的發展。各國共產黨的隊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展開了克服教條主義的鬥爭。這個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產主義者由於對斯大林採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由於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口號，因而幫助了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的思潮無疑是有利於帝國主義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的。而事實上，帝國主義也正在積極地利用這種思潮。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

因此，八大一次會議是毛澤東確定的方針：就是不對蘇共二十大進行公開的批評。在內

部毛澤東和劉少奇都向蘇共領導進行了批評。在公開講話中，祇從正面、從原則上闡明自己的立場。毛澤東還說過，在八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並沒有全盤肯定蘇共二十大。在這個報告中，用論述中國革命經驗的形式，批評了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所謂「和平過渡」的理論。鄧小平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同樣不是全盤肯定蘇共二十大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的做法，而是用詳細論述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領袖和群衆的相互關係問題，說明中國黨一貫堅持的作風，用這種的形式，批評了蘇共的錯誤做法。

事實很清楚，白紙黑字，有據可查。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一開始起草，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上旬，毛澤東就提出了修改的意見。比如他在報告中講到七屆二中全會關於不以人名作地名等一系列規定時，他就批了：「要講一些理由，即爲了不要個人突出。」

其後，八月中旬，毛澤東又提出了修改的意見。他在文件中的一「階級還未消滅，在階級消滅以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殘餘還會存在一個時期」的地方，改爲「還會存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還加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殘餘消滅以後，社會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人們的主觀和客觀世界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這又是人們永遠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性的原因。」他還加了如此才能「少犯」錯誤和「盡一切努力爭取不犯極端嚴重的錯誤」的話。

八月二十一日做了多處修改。最重要的是用中國經驗不指名地批評斯大林，也批評蘇共

二十大：「在準備用戰爭奪取政權和在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兩個問題上，都是有過爭論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國的具體條件，他們在緊要關頭反對我們準備戰爭和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是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線。如果我們遵循這條路線的話，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不要以爲這是小事，這是一個關係到在一個六億人口的國家內，當着時機成熟了的時候，是否應當奪取政權的大問題。」

同時在「由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就真正出現了」的這段上補充：「這種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即用教育說服的方法，而不用強力壓制的方法。」他還加上了，「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將來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還會繼續有自己的許多特點。」

人們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八月二十四日的批語和修改。八月二十九日的批語和修改。八月三十日的批語和修改。八月三十一日的四次批語和修改。其中毛澤東還加了：

「祇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任何願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係。」

再往後，還有九月六日三次修改，九月七日五次修改，九月八日二次修改，九月九日，九月十日，九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三次修改。毛澤東的修改，一直持續到劉少奇九月十五日做報告和發表為止。

這怎麼能說八大一次會議是背着毛澤東的呢？怎麼能說是毛同劉、鄧矛盾的開端呢？也可見李志綏們的鬼話何等荒唐可笑！

毛澤東設想的「國際休戰時期」及其變化

由于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和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影響日益增強，中央估計可以出現十年到十二年的和平時期。毛澤東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可以設想，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對保守主義。

八大一次會議是處于這個「國際休戰時期」。我個人沒有參加八大，因為在八大前夕，美國人有邀請中國藝術團訪美的意圖。當時已經組織了一個第一流的大藝術團，團長是楚圖

南，副團長是趙楓，團員包括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李宗義、張雲溪、張春華、劉淑芳、趙青、劉慶棠、王鐵錘等著名藝術家。原來的任務是訪問南美的智利、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這是第一個訪問美洲的中國官方團體。得知美國的意圖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王稼祥臨時決定加派王力為副團長兼秘書長兼支部書記。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沒有秘書長），主任是王稼祥。本來是要我做八大的接待兄弟黨辦公室工作的。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就離京出國了。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就是要突破中美關係的僵局，先在美國的後院——南美，建立和發展反對美國控制的統一戰線。我們在南美各國，廣泛地交朋友，并建立官方的關係。我們破例地正式邀請美國駐各國的大使出席開幕演出。我們的政策的推行，本來是很順利的。不料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到最後一站阿根廷時，爆發了匈牙利事件。形勢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世界性反蘇、反共的烏雲密布。街上行人戴黑紗，天主教堂不斷敲喪鐘，電視二十四小時反復播送蘇軍鎮壓的鏡頭。美國是去不成了。藝術團回瑞士休整，等了將近一個月，反共風潮愈演愈烈，才奉中央指示回國。回國時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們乘坐的一架捷克飛機，從蘇黎士去布拉格，剛起飛到瑞士和西德的邊境，發生了爆炸。機上有藝術團的副秘書長、中調部負責美洲的局長、優秀的外事工作者李德椿及其三位助手，還有優秀的京戲演員吳鳴生（李少春妹夫）和李幼春（李少春之弟）等遇難了。這可能是一次政治性的破壞事故，但始終沒有查證出來。我幸免于難，是因為劉曉奉中央指示要我

提前直飛莫斯科面商問題。我親身感受很深。在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我國採取短視的但是很瘋狂的敵對政策和行動時，我們必須及時改變自己的國際的和國內的戰略決策。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改變了主要矛盾的提法，就反映了這種戰略決策的改變。

同樣的，有的黨史研究工作者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原來的稿子，比修改後的稿子好。我以為不能做這樣的類比。這篇文章修改的全過程，我是從頭到尾參加的。陳伯達主持修改，每次修改稿都經過毛澤東。毛澤東說過，他最重視的是王稼祥的意見。每次修改稿，王稼祥都召集中聯部部務會議集體討論，然後整理成文報陳伯達轉主席。我也是陳伯達的助手之一。我當時還是主管對外宣傳的，負責領導外文出版社翻譯成外文。這篇文章的修改過程，也是國際決策和國內決策相結合，隨着歷史情況變化而修改的一個例子。

一九五六年，在全世界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件，就是蘇共二十大，這對中國也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使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當斯大林的蓋子揭開以後，毛澤東就下決心創立中國的社會主義新學派。雖然一九五七年以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極左錯誤，但這不能抹煞毛澤東創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偉大貢獻。這些，我將在後面作專門的論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我以為，對那種確是違背六條標準的言論，特別

對於反對共產黨領導和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言論，進行科學的說理的批判是對的，今後也要進行科學的說理的批判。但是把它搞成政治運動，則是錯誤的了。後來把資產階級右派作為一個敵我矛盾的階級，那就更錯了。階級的科學定義，祇能根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來決定，而不能根據政治思想來決定。但是，反右派的錯誤，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是一致的，有的人比毛澤東還嚴重。

一九六二年的兩種不同意見

不等於兩條路線的斗争

一開始編《劉選》的時候，劉少奇提出，不要把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所做的八大二次會議政治報告編進去。劉少奇對我說過，因為這個報告把我黨犯的重大的極左錯誤系統化了。祇是還差一個人民公社問題。劉少奇還對我說，他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慶祝建國十周年

爲《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而作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這篇文章，也不能編進去。這篇文章把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的極左錯誤也寫進去了，成爲我黨犯極左錯誤的綱領性的文件了。劉少奇寫的這篇文章，我也是一個主要寫作助手。

同樣的，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寫的《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也同樣包含着有這種性質的錯誤。

這說明，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劉少奇還是一致的，在中央的領導層，也是一致的。

毛澤東對「三自一包」和 「三和一少」的批評

一九六二年，在國際戰略的決策上，在國內戰略的決策上，黨中央內部就有了兩種不同

意見，但是不能說是已經有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因為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包括我自己，毛澤東一批評，就立即作自我批評，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意見。

在一九六二年七月莫斯科裁軍會議以後，以王稼祥爲主，王力爲次，被毛澤東作爲「三和一少」的代表，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批評。

「三和一少」的來源是，一九六一年的春節期間，我在廣州參加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王稼祥因病正在那裏休養。我向王稼祥談了在湖南農村調查中看到的極其嚴重的情況。王稼祥同我抱頭痛哭了。他說：「我們革命這麼多年，新中國建立了，還餓死人，我們太對不起人民了。」他說：「我們國際國內的弦，都不能绷得那麼緊。對美國，對蘇聯，對印度，都要鬆動一點。對外國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保住新中國的政權，就是最大的國際主義。現在主席抓修改公社體制，正是考慮在國內的退却」。我同意王稼祥的主張，還提出「在國內要考慮退到新經濟政策」。後來王稼祥說的「人家說我右，有的秀才比我還右。」就是指的王力主張退到新經濟政策這件事。

回北京以後，王稼祥找了劉少奇，提出自己對國際戰略決策的主張。劉少奇同意王稼祥的意見。王稼祥起草了致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的一封叫「黨內通訊」的信。幫他起草的助手是李啓新和我。這封信在中聯部部務會議上討論通過。發信時王稼祥提議由正副部長中的三個中央委員簽名。王稼祥簽了名，劉寧一和伍修權也簽了名。

王稼祥認為一九六一年底，我國代表團在斯德哥爾摩會議上鬥得過火了，有些話說得不恰當，他制定了一個《統一對外宣傳口徑》的文件。我是他起草文件的助手。

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一系列文件，都經過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會議通過發出。一九六二年七月莫斯科裁軍會議的方針和文件，也都是王稼祥主持起草，經過由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會議決定和通過的。要我去參加莫斯科裁軍會議，是鄧小平臨時提出，經書記處會議決定的。因為一九六零年劉少奇同志曾同赫魯曉夫達成一個協議，在國際群衆組織會議上，先由中蘇兩黨協商一致，再經主要的兄弟黨協商一致，然後才開正式會議。這個協議是毛澤東同意的，而且正是貫徹和執行毛澤東提出的中蘇停止公開論戰建議精神的。鄧小平要我作爲主要的代表，去同安德羅波夫協商。這是第一次實行劉赫協議。我接受了任務，并提出要中辦翻譯組組長閻明復一起去，擔任翻譯。我同閻明復未等正式會議開完就回國了。一下飛機，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就在懷仁堂聽我們匯報。他們給予充分的肯定。當時閻明復對我說，他參加過無數次國際群衆組織會議，以這一次最爲成功。那知裁軍會議以後，有人在壓力下告了王稼祥的狀，這個狀是在中南海游泳池告的。毛澤東掰着指頭說：「這是對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爲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就叫『三和一少』。」

在北戴河會議上，在國內決策問題上批評了陳雲和田家英的「三自一包」；在國際決策

問題上批評了王稼祥和王力的「三和一少」。這次會，除陳雲因心臟病請假外，其餘三人都到會了。這四個人沒有堅持自己原來的意見。王稼祥和王力都做了檢討，並且立即改正錯誤。按照毛澤東的方針，制定了到日本參加禁止原子彈大會的方案，還基本上用原來出席莫斯科裁軍會議的原班人馬。祇因為方針改了，情況就不同了，在日本的會上鬥爭很激烈，當時認為這是成功，這是勝利了。毛澤東決定調劉寧一、廖承志、孔原、喬冠華加王力起草一個反對「三和一少」的國際問題的報告，由陳毅在會上講。在起草過程中，劉少奇、鄧小平和王稼祥都是積極參加的。陳雲、田家英也都没有堅持原來的意見。

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對劉少奇是有了意見。那不是對劉少奇的正式講話稿有意見。這個講話稿是經過毛澤東審閱過的。是因為劉少奇在會上說，稿子已經發給大家了，用不着我再念了，於是離開稿子講了一番話，批評極左，說現在的問題，不是天灾，而是人禍。毛澤東很不高興。當時在陳伯達支持下，鄧力群摘編了一本陳雲論經濟問題的小冊子。編輯這本小冊子，我也參加了。發的範圍很小，祇發政治局委員。在北戴河會上，毛澤東抬出了許世友在濟南向他的匯報，說現在形勢已經好得很，證明抓階級鬥爭就見效。毛澤東主要是批評陳雲和王稼祥，實際上已經是批評劉少奇了，陳雲論經濟問題的小冊子，也就收回了。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以後，在北京開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繼續這個精神，提出以階

級鬥爭爲綱。但是在會上沒有批評「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毛澤東本來想就了結了。因爲當時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和王稼祥都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意見，更不用說王力和田家英了。所以當時祇有兩種不同意見，但不能說已經有了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

『四清』運動中毛澤東同劉少奇 的矛盾及其發展變化

「四清」是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提出的。「四清」，原來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農村調查中提出農村社隊要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後來發展爲「清經濟、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的運動。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領導人都是擁護的。「前十條」原來是在北京，由書記處領導釣魚臺的秀才班子起草和修改的。由彭真送到杭州，請毛澤東審定。毛澤東提了意見，彭真找了正在杭州參加起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建議》（二十五

條）》的王力，幫助他修改。毛澤東還是不滿意，他自己直接領導陳伯達、王力和範若愚起草這個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講話的精神為依據的。原來彭真主持的稿子，總的精神也是這樣的，所以許多段落是可以采用的。毛澤東是畫龍點睛，突出重點。一頭一尾，都是毛澤東的原話。後邊那段是陳伯達、王力、範若愚引用的。前面那一段，是毛澤東在定稿時自己親筆加的，也就是後來獨立成文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這段話是很光輝的，毛澤東寫道：「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祇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祇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衆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文章又說：「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檢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祇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檢驗真理的辦法。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祇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够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毛澤東定稿後，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和其他中央領導和大區的負責人到杭州，

大家一致同意，立即通過發出並貫徹執行。

劉少奇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并且拿出主要精力來抓「四清運動」，毛澤東很高興。

毛澤東很不滿意的是下面這件事。就是秀才們特別是鄧力群，要陳伯達向主席當面提一個建議：因為「四清」經過主席一抓，已經走上了軌道，現在少奇同志已經作為中心工作抓得很緊，主席可以考慮騰出手來，把經濟工作抓一下。現在經濟工作還沒有走上軌道。「四清」有少奇同志抓就行了。毛澤東回答說，「這很好喲。中心工作少奇同志抓。我這個人不行。經濟工作也抓不好，那就還是請陳雲同志抓吧」。毛澤東說這句話的時候，好象是心平氣和的。其實說的是反話和氣話。陳伯達當做是真話，進行了傳達。後來在「文革」中毛澤東批評陳伯達「專門在我和劉少奇之間進行投機」，這是主要的事件之一。

劉少奇在「四清」中，搞了一個《後十條》，田家英是主要助手。陳伯達也是參與的。

《後十條》把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講話的精神進一步系統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也見諸文字了。在政策和界限的規定以及方法方式上具體化了。毛澤東不反對，但並不完全同意。

毛澤東常說一切大人物、「龐然大物」，都不用怕。「龐然大物」，過去是針對斯大林、王明和博古講的，後來就是指劉少奇了。一九六五年《二十三條》就是對劉少奇的了。主要是因為劉少奇做了一個關於桃園「四清」經驗的報告，江青告了狀。江青到毛澤東那裏哭了

一場。毛澤東一直不準她過問黨和國家的大事，特別是不準她過問最高領導層之間的事情。這是禁區，絕不允許江青插手。江青說這次是「拼着主席跟我離婚」，告了劉少奇。她哭着對毛澤東說，人家是斯大林死了，赫魯曉夫才做了一個秘密報告，反對斯大林。現在你毛澤東還沒有死，劉少奇已經做公開報告，反對你毛澤東了。本來毛澤東是肯定劉少奇指導下王光美總結的桃園經驗的，還批給江青，讓江青一閱，還印發黨內。後來翻過來了。就是因為江青告了狀。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接受江青最重大的政治性的意見。第一次讓江青正式幹預最高領導層的事情，得到了成功。江青告劉少奇，被毛澤東接受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北戴河，陳伯達也在北戴河，彭真也在北戴河，彭真要陳伯達同我把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做的那個報告整理一下，作為中央文件發。我們整理時就發現劉少奇有些話容易引起誤會。比如說不下去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政治局委員，不能當書記處書記，這樣的話我們給改了。劉少奇這些話並不是反對毛澤東的。他說對毛澤東的著作也不能教條主義，這也祇是爲了說，過去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不够了。所以改改詞句就可以發了。可是後來決定不發了。也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在北戴河開了個會，我也參加了。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到會，會上說李雪峰認爲「桃園經驗」有問題。并大講李雪峰的好話。當時毛澤東沒有明白地說，不發「桃園經驗」了，更沒有批評劉少奇。這件事情的内幕長期以來大家都不知道。是後來文化大革命時江青自己講出來的。黨中央領導層，沒有

一個人知道江青告狀的事。我和陳伯達整理了劉少奇講話稿，後來是劉少奇告知我們說，這個報告不要發了。在北戴河的小會上，毛澤東說了一句我一直認為是不對的話。他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李雪峰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怎麼能成了白區正確路線代表了呢？關於「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劉少奇同毛澤東爭論，是在一九六四年底，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一個包括大區負責人參加的一個範圍很小的常委擴大會上。劉少奇堅持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李井泉堅持的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他還說，這個提法的發明權，不是陳伯達在介紹天津小站「四清」向中央的報告中先提出的，是他先提出的。劉少奇說的話多了一點。本來大家以為這是正常的討論，沒有當成什麼問題。

到了一九六五年初，一天凌晨，天沒亮，陳伯達要我立即到他家去。他對我說，「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純的馬克思主義者。整少奇同志對黨對人民都很不利。主席要我起草一個「四清」文件。我吃的安眠藥還沒有醒，記不下來。怎麼辦呢？」我說，我們先把主席要搞的「四清」文件重點寫下來，你能記得多少寫多少。再想一下，整理出一個東西來。不然就忘光了。我們兩個人立即動手，整理了十三條，很簡略。當時最主要的要點是一、批評對「四清」運動的性質提法不對。二、要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為綱。三、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要糾正運動中「左」傾錯誤。五、蹲點不能否

定開調查會以及其他做法。六、要點面結合，分期分批。七、一個縣的工作組不要太大。八、不要搞黨員重新登記。九、《後十條》規定太繁雜，叫人記不住。這是「煩瑣哲學」，要批評。十、重申《前十條》的重要規定。這成爲第一次草稿，後來歷經修改和補充，成爲著名的《二十三條》。我們整理出一個短稿，天已經大亮了，就商量毛澤東要整劉少奇，怎麼辦？我說：「伯達同志，你一個人不行。你立即請彭真同志和陶鑄同志，同你一起去報告少奇同志，勸少奇同志向主席作一個檢討，表示同意主席的正確意見。我估計主席的氣是會消的。」陳伯達同意這麼辦。找了這兩位，陶鑄立即同意這麼辦。彭真先說他不去，想了一下，也同意一起去。陳伯達、彭真、陶鑄一起告訴了劉少奇。劉少奇馬上找了毛澤東，認了一個錯。毛澤東當時是消了氣，向陳伯達表示不整劉少奇了。在秦城我向鄧平等領導人報告過，說這是陳伯達做的一件好事，使中國發生的大災難推遲一年多，他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于後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更換接班人，打倒劉少奇，我所知道的內情，將在以後《王力「文革」回憶錄》中敘述。《王力反思錄》第一部和第二部中，也做了一些片斷的回憶和敘述。

我們把毛澤東和劉少奇關係的真實歷史研究清楚，說清楚了，那些混亂的說法，就可以澄清了。現在這個問題被說得最烏七八糟，一蹋糊塗。我們的高級幹部和研究工作者，他們是影響中國黨的輿論同幹部思想的人。他們把國際戰略和國內戰略決策問題弄清楚是很重要

的。

前面講了，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把極左的錯誤系統化了。夏天在北戴河，又通過了一系列極左的文件。但是在國際戰略決策的鬥爭中，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是毛澤東的大手筆，把整個世界都調動了，不但要把美國，而且要把全世界的輿論，從中東調動到中國的臺灣海峽來。美國的艦隊，也要從中東調動到臺灣這個地方來。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主要文章，就是金門打炮問題。打炮也好，不打炮也好，都是爲了支持蔣介石。我們不能夠讓美國人把臺灣拿去。不管它是單獨拿，還是用聯合國托管的方法，把臺灣拿去，都不行。那時美國人已經確定了對大陸以和平演變爲主。就是說不是用武力侵略了。蔣介石也懂得不能用武力來「反攻大陸」了。我們也不采用、也不大可能用武力去統一臺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與蔣介石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必須獨立，第二中國必須統一。蔣介石也懂得，金門打炮也好，不打炮也好，都是爲了反對美國人用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來吞并臺灣。這個問題，吳冷西的回憶錄很寶貴。那時我不在北戴河，留在北京，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爲《紅旗》雜志寫反美的文章。當時編入《毛澤東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本書裏的《紅旗》社論、評論員文章和用于兆力筆名發表的文章，我是主要的執筆人。凡是「于兆力」的文章，美國國務院都收進了它的《藍皮書》。

毛澤東創辦《紅旗》，鄧小平 是第一個編委

毛澤東辦《紅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中國人說話，全世界人都要聽。毛澤東認為，他的這個目的達到了。那時《紅旗》的重要文章一廣播，真是全中國人全世界人都要聽。《紅旗》正式標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澤東決定的。第一任編委名單是毛澤東一個一個擬定的。編委名單中第一個是鄧小平。然後是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群。實際主持工作的編委，除總編輯陳伯達之外，還有胡繩、鄧力群、王力、範若愚四人。

第一次會議是在居仁堂開的，鄧小平主持了第一次編委會。這次會議把李達通知錯了，來了兩個李達，一個文李達，一個武李達。武的李達來時，鄧小平說，不是你這個李達，既

來了就坐下聽聽吧。

編委會就開了這一次會，再沒開第二次會。這一點陳伯達不好，他撇開了書記處。他不跟鄧小平打任何交道，忘記了鄧是第一個編委，也不請示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劉少奇。《紅旗》的事情直通主席。陳伯達不通過書記處，不通過政治局，連劉少奇也不報告，祇直接向主席報告。這樣，劉少奇就很難插手了。八大一次會議以後，毛澤東強調書記處的作用。劉少奇也強調，要樹立以鄧小平為首的書記處的威信。鄧小平主持書記處工作，有事也是先請示劉少奇，經過劉少奇轉報主席。唯獨陳伯達，什麼事都直通主席。這個人毛病太大了。誰都不能傷害他，不能幹預他。表面上好象很謙虛，實際上不然。他的助手，沒有一個不被他整掉了。

毛澤東很重視《紅旗》。第一個編委不是陳伯達，第一個編委是鄧小平，第二個是彭真。八大二次會議上新增加的政治局委員當中，有柯慶施和李井泉，譚震林沒有列入編委的名單。

編委中有舒同。毛澤東重視舒同，因為舒同歷史上在黨內軍內地位很高，創建冀晉察軍區時，聶榮臻是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舒同就是政治部主任。在華東，舒同地位原來高于柯慶施。他又是長期搞理論宣傳的。還有陶鑄和王任重。這個名單是毛澤東反復考慮定的。

後來實際上我的工作既不在中聯部，也不在紅旗，而是釣魚臺。釣魚臺蓋起來不久，就

開了一個八號樓住秀才班子。毛澤東、常委、書記處直接抓這個班子，為他們起草國際國內的重要文件。

這個班子是從同蘇聯打交道開始。赫魯曉夫變臉了，毛澤東抵制了他的「對表」。中國要獨立自主，絕不能屈從蘇聯的指揮棒。這場鬥爭已經不可避免。釣魚臺是一九五九年蓋起來的。一九六零年二月，我跟康生去莫斯科參加華沙條約國會議。因為王稼祥病了，康生是臨時決定去的。這是中蘇第一次公開衝突。接着就是六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我是十下莫斯科，十次跟蘇聯人打交道。有九次都有康生。康生祇有一次裁軍會議沒有去，十次都有我。

布加勒斯特會議原來中央決定的團長是柯慶施，第一位團員是王稼祥。後來估計將發生嚴重爭論，把柯慶施改為彭真。王稼祥因為發燒不能去，又改派康生。

為對蘇進行論戰，在釣魚臺開了一個秀才班子。最早有陳伯達。他倒反而不常住在那裏。

引起蘇共抗議的三篇文章，主要是《列寧主義萬歲》。《列寧主義萬歲》是陳伯達主稿，我和朱庭光協助的。在北京開的工會國際會議上，鄧小平講了話。他因為犯了低血糖暈倒了。周恩來接着代替他講了。接着蘇共中央發出了一個給中共中央的通知書，鄧小平主持起草了答復書。然後是鄧小平帶隊，中蘇兩黨會談，接着開兄弟黨會議起草文件，年底是劉少奇帶隊，正式通過文件。出面爭論的主要是鄧小平和彭真。劉少奇跨年度，正式訪問蘇聯，那時《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已經發表了。

關於同蘇聯的交往和鬥爭問題，我將另有專門的回憶文章。

人民公社和「烏托邦」

我再倒過來說一九五八年。我們是犯了一系列大錯誤。在人民公社問題上也犯了大錯誤。但是，我不同意說毛澤東堅持走中國自己道路的社會主義，就是烏托邦，就是烏托邦主義。是的，毛澤東和劉少奇都講過烏托邦，講過空想的社會主義有些東西可以在中國實現的。但是，并不是倒退到空想的社會主義。他們是想到過，空想社會主義的有些東西，是在中國也實驗一下。本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中，是包含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改造。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潮是空想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不容否認，馬克思主義即使發展到今天，也還有空想的成份。

這個問題劉少奇說過一些話，不那麼妥當。毛澤東也說了一些不妥當的話。
人民公社問題，在八大二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上沒有講。

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中講了公社。他說：「毛澤東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幹鄉村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并將超過。我們的教育方針和其他教育事業，也將朝這個目標發展。」

在這之前，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向毛澤東匯報會議的準備工作和文件時，他們四個人在去廣州的火車上議論過。劉少奇講過：「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一階段為後一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陸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毛澤東說過，對人民公社我祇有建議權，沒有發明權。發明權是誰的呢？陳伯達說，發明權是他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陳伯達在《紅旗》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這

篇文章，第一次公開提出了「人民公社」這個名稱。在這之前，他在河南提出并大社，改名為「人民公社」。七月十六日，《紅旗》第四期，發表了陳伯達的《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正式號召：「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議論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裏不必詳細講了。

人民公社問題，沒有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系統敘述。其他的錯誤差不多都作爲正確的東西系統地敘述過。八大二次會議的文件容易找，在這裏也不必講了。而對於人民公社的問題，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中作了總結。在這裏，我介紹一段重要的話：「有人以爲，人民公社的性質祇能是共產主義的，必須完全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否則，就不能稱爲人民公社。因此，他們認爲，在現在條件下辦人民公社祇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空想。他們對於人民公社作了完全機械的理解。他們不了解，我國農村現在的人民公社是一種基層的社會組織形式，具有上述的各種特點，因而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可以容納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不同程度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不同水平的生產關係。對我國來說，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既適合于目前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

也將適合于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既適合于目前的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將適合于將來的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度。有理由相信，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在我國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後，也將是一種適當的基層社會組織形式。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公社制度是一種發展過程。在我國農村中，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能够推動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將反過來促使人民公社制度在內容和形式上得到發展。有了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以後，我們在實際上找到了在我國條件下從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以至將來在農村中由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如果認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能夠實現公社的全部理想，這是錯誤的。如果因為人民公社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就認為人民公社辦得太早，最好不辦，辦了也要讓它散掉，更是完全錯誤的。——今天看得很清楚了。實踐已經檢驗了。這個實驗是失敗了。劉少奇這段話今天看來，系統地表達了在人民公社問題上錯誤的性質，同時也可以證明，毛澤東和劉少奇并不是烏托邦主義者。

當時，劉少奇講過的問題，有兩條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是向劉寧一提出工會消亡。劉寧一徵求我的意見。我說：「你報告少奇同志，我認為不對。國家消亡是很長遠的事。工會消亡還會晚于國家消亡。」後來劉寧一告訴我，劉少奇同志同意不提工會消亡了。一個是婦聯一位領導人徵求我的意見，說少奇同志向她們提出消滅家庭問題。我說：「請報告少奇同志。

志，我不同意這個提法。我認為少奇同志的意思祇是家務勞動社會化。隨着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變為社會化的生產，古老家庭的性質必然隨之改變，但家庭仍是社會的細胞，不能提出消滅家庭的口號。」

把辦公共食堂當做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我當時就表示不同意。《人民公社六十條》的草稿，在公共食堂問題上開始鬆動了一下。我在湖南韶山向群衆徵求意見時，這成為最受群衆擁護的一條，並且立即就解散了這個公共食堂。

吃飯不要錢，不要貨幣流通，把戰爭時期的供給制當做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分配方式，這都反映了我們前輩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尚存有的空想因素，反映我們對於《資本論》沒有讀懂。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小時候信過菩薩，以後信過進化論，也信過烏托邦，可是他不是停止在空想的社會主義，而是變成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用這個科學武器為在中國實行自己的道路的科學社會主義開辟了道路。

就是在人民公社問題上，也不能說毛澤東就是烏托邦主義者。為什麼呢？因為最早覺察這樣做不行的，也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秋後，他經過胡喬木，要我帶幾個人到安國去看，這些做法到底行不行？我帶了中辦研究室的王愈明和《紅旗》雜志的張德成等幾個人，不以官方名義，去看了下。我回來後對喬木說，我們看不行。街上的飯館都不開門了，開門的，你要想買一塊白薯都困難。豐產方是假的。提倡共產主義勞動精神可以，但是還是要

實行按勞分配。我寫了一個報告。這證明毛澤東早已思考退却問題了。《六十條》退到了以生產小隊為基礎了，實際上解散了公共食堂，恢復自留地。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並向前發展，才徹底糾正了這個錯誤。

為什麼說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因為毛澤東一直堅持共同道路，六條標準，九項原則，這與現在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相通的。

那麼又為什麼犯這一系列的極左錯誤呢？最重要的還是出于上面說過的他至死也沒有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一直到我被打倒以前，我接觸毛澤東，他經常思考的大問題是，中國究竟怎麼辦？他常說，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帶有封建性的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問題也沒有。一摸，它都是獨立王國，不管它改換成怎麼漂亮的名字，也沒有用。怎麼辦？這個毛病究竟在哪裏？文化大革命時，他說我什麼辦法都用過了。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也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傾機會主義，又不行。一直到四清，還是不行，那怎麼辦？後來文化大革命，搞錯了，好多都是為解決這問題而搞錯的。又要搞北京公社，他說不要舊國家形式，不要舊的國家機器，許多弊端就是舊的國家制度形成的。因此他又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理論提出來了。人們記得，他的著名的「一五七指示」，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提出的，「一五七指示」是同人民公社的決議精神相通的。是打碎國家機器思想在全國城鄉範圍所做的時間很長的大試驗。後果是災難性的。而他思考的這個大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以新的形

式繼續和發展了這個弊端。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同 公社錯誤的理論是相通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正是人民公社理論在全國全面持續很長時間的試驗。毛澤東錯誤地應用馬克思說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并用新形式代替它」的原理。他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決定向全國廣播北大一張大字報時，就說這是北京公社宣言，要用公社這種新的社會政治形式代替被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篡奪了的那一部分舊機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發表的紅旗社論，正式公布了這個觀點。當然，毛澤東始終說祇是部分的，可是對所謂「被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和單位的估計，又那麼多，在實際上是各級普遍奪權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毛澤東改變了用公社形式代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提法，他並不認為是把馬

克思的這個論點應用錯了，而祇是因為怕涉及到外國的承認問題，所以決定普遍用所謂「革命委員會」的形式代替政府。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理論錯誤，還表現在他改變了過去對斯大林在《聯共黨史》上有關整掉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拉狄克等的態度。

斯大林把那時的政治局成員大部殺掉了，把中央委員會和黨政軍以及各地主要領導骨幹的相當一部分抓起來，也殺了不少。這種肅反擴大化，是斯大林的嚴重錯誤。本來，毛澤東對此一直是持批判態度的。毛澤東還根據蘇聯的教訓和歷次「左」傾路線的教訓，制定了中國黨的正確政策和制度。毛澤東還對後來的蘇共的一個領導人說過，這些人不但不該殺，而且還留在中央和政治局裏就好了。可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毛澤東改變了自己過去正確的觀點，他認為斯大林這是在實踐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在臨終前也開始吞吞吐吐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弄得不好還會出現復辟，祇是没有系統地解決這個理論問題。這段發表在《人民日報》和《紅旗》社論《偉大的歷史文件》上的有關的話，就是毛澤東親自寫的。這就是說，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倒是對的了，而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却是缺點。實際上相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會動亂很大。另一方面毛澤東的好處是他雖然沒有堅持「大部不抓」，但始終堅持「一個不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反復說：我黨七大後犯了三大歷史錯誤，其中第二條就是殺了一個王實味。毛澤東的「一個不殺」原則，

誰也破壞不了。

在一「文革」第一年中，我是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主要整理者和闡述者。我雖然祇參加了一年多一點的「文革」，但是我當時所知道的毛澤東的理論根據的基本點，十年並沒有變。後來增加的內容大概有兩點：一個是所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按勞分配、商品、貨幣、工資。一個是馬克思總結的一八四八／一八五零年法蘭西階級鬥爭提到的社會主義不斷革命論。那時馬克思總結的是布朗基的社會主義，雖有參考價值，但用作全面專政的理論根據，這就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更遠了。

經過多年的反思，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小生產為社會基礎的、帶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群衆運動，因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倒退性。我認為，文化大革命這一場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主要不是由於某個人的不良動機造成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我們所犯的理論上的錯誤和行動上的錯誤，都是從這裏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特別是土地改革以後，我們就誤認爲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其實，我們並沒有把自然經濟改變爲社會化經濟，並沒有把農民等小生產者變爲同現代生產相聯繫的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並沒有把大量的手工作業改變爲現代化生產，也就是說，封建主義的牆腳根並沒有鏟除。中國人民還是苦于封建主義，即苦于資本主義的不足，而並不是苦于對國民經濟有利的而不是對國民經濟有害的資本主義成分的

存在和發展（這本來是毛澤東自己說的話）。我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的二重性，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化和社會化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在有的問題上我們用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武器，時常祇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實質是帶着封建色彩的小生產者的觀點。我國沒有經過商品經濟這一個大課堂，人們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觀點，就難以為現代社會的文明的、科學的、民主的觀點所代替，更談不到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性質的錯誤還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現。

解放以後，特別是一九五七年以後，毛澤東常常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以後，並不檢查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這樣，臆造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以至無處不是敵人了，敵人不但跑到黨內來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領導核心中來了。于是，就要「天天講」階級鬥爭，就要「不斷革命」，並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了。這個深刻的、痛苦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

一九八一年我在致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過：「唐初政治家魏徵在總結歷史上開國者的教訓時說：『善始者實繁，克終者實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不幸，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國領袖，也沒有避免這個悲劇。」

「撥亂反正任務之所以艱巨，主要在於區別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而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犯嚴重錯誤時，也還有閃爍着光輝的思想。錯誤思想夾雜正確思想，都是我國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歷史時代的產物，而且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我國的社會意識和習慣。因此，這件區別工作，象斷指再植那樣，需要進行縝密的分析和縫合。《歷史決議》成功地完成了這歷史任務，成了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文件，我們沿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前進，就將無往而不勝！」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任何一次社會倒退，必然以社會進步作為補償，這本來說的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然而我們偉大的黨，却能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自覺地把挫折轉變為社會進步的開端，我為有這樣的黨和中央而自豪」。

同一年，我在另一封信裏還說過：

「對毛澤東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是一個對待馬列主義態度的根本問題，是一個關係我國人民命運和前途的根本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我黨將犯歷史性的大錯誤。感謝中央，這個問題處理得既有原則又合情合理，既有膽略，又有分寸，是成功地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對待斯大林問題的經驗教訓。堅持毛澤東思想，這是武裝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並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的最銳利的武器。很明顯，毛澤東思想是一門科學，它不包括任何人的錯誤思想，也不包括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同樣很明顯，它包括老中青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切

具有獨特貢獻的正確思想，也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思想，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黨建問題和法學問題上的正確思想。毛澤東思想充滿活力地發展着，以至無涯。」

前述毛澤東思考的大問題，經過他的繼承者，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找到了開這把鎖的鑰匙，找到了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道路，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制定并日益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政策、法律和方法。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相信一代會比一代強。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是光明的。

下面我就來談談毛澤東創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問題。

毛澤東決心創立中國自己的 社會主義學派

有人說，一九五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都是正確的，一九五六年以後毛澤東思想都是錯

誤的，因此他們祇擁護一九五六以前的毛澤東思想。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爲了更深一層正確評價毛澤東晚年的功過和是非，必須歷史地客觀地研究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下決心創立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學派。毛澤東國際戰略決策的變化，對中國問題戰略決策的變化，影響最大的是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四月，蘇共二十大以後，在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變化。蘇聯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這事有二重性。從積極方面來說，對我們中國有很大的好處。在毛澤東和他的戰友看來，我們中國從指揮棒下解放了。一九四九年，中國是從有形的、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統治下面解放了。一九五六年，中國是從蘇聯斯大林那種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式、用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式控制下獲得了第二次解放。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老早就不聽他的。要聽他的話，就沒有中國革命的成功。不聽他的，才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有中國式的革命道路，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但是，中國又不能完全不聽他的，一九四九年中國還不能算是取得了真正完全的獨立。而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他們自己不要斯大林了，他揭開斯大林的蓋子了，赫魯曉夫也需要我們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才得到了真正完全的獨立。這個中國第二次解放的意義，不亞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那些捆住了我們手腳的無形的枷鎖，無形的繩索，統統地打破了。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確犯了極左的錯誤，一九五九年就形成了

綱領性的「左」傾錯誤，到一九六二年，那些「左」的東西差不多就全了。中國人受極左的禍害和災難，是很沉重的，這用不着去隱諱。但是，我們還應更深遠地看到，人類的歷史，中國歷史的發展，從來不是象東西長安大街那樣筆直的，而是曲折的。歷史的進程，從來不是依任何個人的願望為轉移的。當然也是不依毛澤東和中國無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所走的彎路，對整個的歷史來說，還祇是一個小的插曲，這方面，我們也應該作為寶貴的財產來接受。絕不能因為這一點，就不承認一九五六年以後毛澤東思想的大發展和大普及。

有的中國的和外國的歷史學家不承認毛澤東思想在一九五六年或者一九五七年以後的繼續和發展，我以為是不對的。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毛澤東思想作為社會主義科學的理論，就很不完善，甚至就不能夠成立。所以必須研究一九五六年以後，毛澤東思想是怎樣同毛澤東直接領導的思維和實踐活動一起而向前發展的。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主要思考的問題，就是隨着中國第二次解放，發動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問題。至于後來他們把斯大林對的東西也搞掉了，那就不對了，那是另外一個極端。但是作為主體來說，毛澤東考慮中國怎麼從斯大林教條下思想解放的問題。毛澤東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創立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學派，創立不同于蘇聯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學派。要創立新學派，在中國發動新的思想啟蒙運動。對於過去的舊的東西，中國不但要從舊社會的那些封建主義的、帝國主義殘留下來的影響中，還要從蘇聯教條的影響當中取得思想大解放。所以，一九五六年在中國所發

生的問題，是整個人類歷史上的、世界歷史上的、中國歷史上發生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同時也不當黨的主席。他要幹什麼？他就是要創立新學派，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社會主義建設也有在反對蘇聯教條中 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毛澤東反復地說：中國革命是在反對蘇聯的教條主義當中，思想解放以後，才有中國革命的勝利。那麼在中國解放以後的七、八年當中，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當中，也還是有一個反對蘇聯的教條主義，思想解放的問題。斯大林蓋子揭開以後，我們必須考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怎麼搞法？要搞我們自己的，不要搞他的那一套。所以一九五六年以後中國有好多東西，是毛澤東解放思想的產物，是中國人民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是中國新的啓蒙運動的

產物。毛澤東新思想為全國人民所接受。于是就有一系列新的東西出現了。如果沒有這些新東西，還有什麼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呢？如果不承認這些同毛澤東相聯系的新東西，還有什麼毛澤東思想呢？

誰也不能否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毛澤東哲學思想，光有《矛盾論》、《實踐論》，够嗎？不够。沒有《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行嗎？不行。這是一九五六年以後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發展。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是一九五六年以後，批判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教條，確立中國式社會主義理論的綱要。

毛澤東的《工作方法六十條》，歷史已經證明還將繼續證明：凡屬正確的領導，都不能離開工作方法六十條。它已經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理論、路線和工作方法的準則，有的已經成為行為規範和習慣。

這時，毛澤東正式提出，對一切都不要迷信，沒有不可以懷疑的，沒有不可以批判的。教授要尊重，但不能迷信教授。其中也包括馬克思「教授」。馬克思就都那麼對嗎？為什麼不能批判馬克思，不能超過馬克思？為什麼不能批判列寧，不能超過列寧？為什麼不能批評蘇聯？為什麼要把蘇聯的東西都當成寶貝？蘇聯斯大林不是都不對，但是他搞的那一套就叫科學的社會主義嗎？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照搬蘇聯教條的表現

毛澤東認為，我們學習蘇聯沒有錯。今後還要學。但是要批判，好東西要學，拿過來用。不好的東西，要當做反面教材來學。學蘇聯不能照搬。照搬，就是教條主義，就吃了大虧。解放後這七、八年我們的教條主義，照搬蘇聯最嚴重的有四個部門。第一是計劃。這是最重要的體制問題，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問題。我們照搬了蘇聯貨。這能不能經受歷史的考驗？我看不行。我們一定要搞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

第二是重工業。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我們照搬了蘇聯的一套。這樣一種國營的體制，行不行？這種所有制，真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嗎？我看也不行。我們也必須真正有自己的中國式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有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科學管理制度，有自己的

一套規章制度，照搬蘇聯的國營制，是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的，在有些方面，比西方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要落後。

第三是銀行，我們也是照搬蘇聯貨。銀行成爲財政的附屬品。銀行既不能起組織和支配社會化生產的作用，又不能起社會公共簿記的作用。這種銀行比起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銀行來還落後，它很容易被掌權者個人所支配，成爲各個封建王國的小金庫。

第四是統計工作，也是照搬的蘇聯貨。它也不是獨立的社會化的科學部門，很容易爲掌權者個人意志所支配，很容易產生虛假的統計。它既不受社會監督，也不能爲社會所公開利用。

這四條是最根本的。同時還有兩個重大問題，第一是醫療衛生問題，也是照搬蘇聯的一套。這是關係到社會財產分配和再分配的最重大問題。第二是照搬蘇聯的教育制度，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重大問題。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也必須走出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的路子來。

在輕工業和商業問題上，因爲我們有團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因而利用了他們的經驗，所以不是完全照搬蘇聯的一套，教條主義就比較輕一點，也比蘇聯好。至于在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方面，我們不是搬蘇聯的教條，是自己獨創的。好的經驗，錯的教訓，都是自己總結的，所以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要比蘇聯好，要比蘇聯生動活潑。

毛澤東認爲，我們在新的啓蒙運動中，敢想、敢說、敢做，一定要不惜代價，創立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體系。在毛澤東看來，如果中國繼續按蘇聯的老路走下去，就面

臨着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已經是脫離群衆了，同群衆之間已經是有很大的鴻溝。除了自己的社會根源之外，搬蘇聯教條，也是重要原因。如果不改弦更張，就要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就要被人民打倒，被人民推翻了。必須創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才能够避免被人民打倒，被人民推翻。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說的話是被歷史驗證了。果然，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政權，真的是都給打倒推翻了。我們中國為什麼不被人民打倒推翻呢？正是因為我們第一有毛澤東，第二有鄧小平。鄧小平是毛澤東這一套理論的和實踐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不同于蘇聯的那一套教條主義。

現在包括一些很權威的書，對這個問題沒有弄清楚。他們祇知道引證，這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了什麼錯話；那一次會議上又說了什麼錯話。因為別人的文章大都是經過整理的，早已磨得四平八穩，而毛澤東的話都有原始記錄，而且檔案上都可以查到，于是就加以類比，錯的都成了毛澤東的，對的是別人的。這樣一種研究方法和結論，能不能成立呢？我看根本不能成立。為什麼？因為這是毛澤東和以他為核心的領導層的思維運動發展過程。作為個人，說錯了話是經常有的，單把這些錯話挑出來加以批判，這不是科學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現在國內外不少書，都有這個問題。毛澤東在創立中國式社會主義學派的思維過程中，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大一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等會上，毛澤東都說了一些錯話。但是，他總的思想是，我們中國人怎麼反對蘇聯的教條那一

毛澤東為什麼不同意反冒進？

在這個大的思維運動當中，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當中，他要堅持和保護那個主要的東西，保護空前意氣風發的群衆的積極性。當時毛澤東提出並且通過民主集中制做過決議的，主要有三個東西，一個叫多快好省，一個叫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個叫共產黨祇能促進、不能促退。在毛澤東看來，反冒進不對的地方，就在于把這三個東西抽掉了。這是不懂得要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習慣于過去的老一套，把保守和所謂冒進，各打五十大板，因而挫傷了群衆思想解放以後迸發出來的積極性。他認為既反對右傾保守，又反對急躁冒進，不是科學的辯證法，而是庸俗的辯證法。躍進這個詞，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他誇獎「躍進」這個詞的發明者。他接受這個詞，並且說「躍進」——反冒進——「大躍進」，形成一個馬鞍形。他描繪了這一個公式。

毛澤東說他從來不反對修改和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至于思考的不周到，錯了，主觀同客觀不一致了，那是不斷修正錯誤的問題。不能因此而損害中國社會主義學派的創立，挫傷中國人走自己道路的積極性。毛澤東自己要把主要的精力不放在處理日常的工作與事務上，這方面由劉少奇、鄧小平負責。他自己要多務虛。虛，也是從實中抽出來，還要回到實中去驗證。要把新思想為人民群衆所接受。哲學要走出課堂，在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實踐當中，中國要成為科學的辯證法大發展大普及的國度。

中國三代領導核心是社會主義新學派的 創立者、繼承者、發展者

毛澤東多次強調，歷史上創立新學派的人，都是二三十歲的人。孔子也是三十而立。馬克思三十歲，恩格斯二十八歲，寫出《共產黨宣言》。古今中外都是二、三十歲的人創立新

的學派。歷史上任何一個啓蒙思想的實現，沒有不經過曲折和災難的。盧梭的社會契約實現了，但是它是在法國大革命初期的恐怖時代實現的。丹東上了斷頭臺，他在被斬首的時刻，昂起頭說：「畢竟《人權宣言》是我寫的。」毛澤東提出創立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在中國發起新的啓蒙運動以後，曲折和災難也不小。主要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代價絕不是白費的。在中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層，正是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創立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及其實踐，并且還在繼續發展下去。

人的思維的矛盾運動中每一個過程的作法，每一個片斷都完全正確，那絕不可能，那根本就不是人。念稿子，也是解放以後從蘇聯搬來的。有的過去說過的話，後來悄悄地刪改了。這使得老百姓不相信共產黨，因為明明那個時代你是那麼說的，現在非說那個時候沒有那麼說，那不行，錯了不認帳，那怎麼行。錯了，就是錯了，改就是了。

回想起來，在毛澤東直接關懷下的釣魚臺秀才班子思想很解放，我們沒有那種裝腔作勢，有話便說，沒話便不說，長話則長，短話則短。可以爭吵得一塌糊塗，然後，你說得有理，聽你的就完了。

這是毛澤東提倡和欣賞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提倡和欣賞的，周恩來稱之為釣魚臺作風，在這裏，爭論沒有禁區。什麼人都可以批評，什麼話都可以講。毛澤東說過，為什麼黨

校就不能爭鳴？為什麼馬克思就不可以批評？為什麼黨中央決議就不能批評？這都是有文字可查的。為什麼不能提出不同意見？組織紀律是一定要有。不能是各人講各人，各人幹各人的，那當然不行。形成決議以後，不同意見也可以提，但是得有適當的途徑。這是組織紀律，也就是民主集中制，行動要一致。我一直以為，政治紀律的提法不必要，也不對，而組織紀律是不能不要的。

批判沒有禁區。但是這是指科學的批判。辱罵不是戰鬥，也不是批判。我不贊成隨便罵人。包括康生。沒有根據地罵康生，也是犯法的。也糟蹋了共產黨。人家會說共產黨領導人壞到這個程度，比蔣介石都壞得多。先打倒劉少奇、鄧小平，把他們罵得那麼醜，反過來又把另外一批人說得這麼醜。結果共產黨就沒有好人。

所以美國的反共反華專家就造這個謠，他們就用你們自己說的，劉少奇是那麼壞，林彪是那麼壞，康生更是那麼壞，用不着他們去說，祇把我們的這些文字編起來就行了。他們說現在你們還打着毛澤東的旗號，那麼就來集中醜化毛澤東。毛澤東就壞得不得了，萬惡的源泉就是毛澤東。另外，你們自己醜化毛澤東以後，還有個好人周恩來。好吧，現在我給你們描繪一下周恩來，也醜到什麼程度。後來你們又說鄧小平還不錯，那麼我就把鄧小平給你們揭露一下。祇要把你們過去誣蔑鄧小平的東西拿了來就行了。美國專家們編造的李志綏的那本書，就集中攻擊三個人：第一毛澤東，第二周恩來，第三鄧小平。因為鄧小平現在還活

着，對中美關係還有影響，他們就把大陸版罵鄧小平的部分刪節掉了，不翻譯。

李志綏一下子成了大英雄人物了，天天得獎了，美國人發獎，臺灣發獎。這個人在今年四月十三日死了。李志綏這本書成爲世界市場上暢銷的書，在國內市場上也在暗中流傳。它不值得我去逐篇批駁。但是我有義務用事實來爲毛澤東辯護，爲周恩來辯護，爲鄧小平辯護。爲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一切受到不公正的誣蔑的人辯護。這也就是爲真理辯護。

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不是

從天上掉下來的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以前，就思考怎樣走中國化的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毛澤東說：在一九五五年目前我國正處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着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進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時期。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爲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爲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業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爲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爲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不同于蘇聯的和平的方法。

毛澤東認爲，一九五五年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過去在農業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難情況現在已經基本上改變了。許多曾經被認爲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辦了。農業以外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迅速趕上，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新形勢。

毛澤東提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爲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够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我國人民還要同世界人民團結一起，爲維護世界的和平而奮鬥。

在一九五六年蘇共揭開斯大林的蓋子時，毛澤東明確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

的警惕；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衆。

毛澤東說，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裏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爲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衆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衆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毛澤東說，我們黨的歷史經驗，也是在自己同各種錯誤路線作鬥爭的過程中使自己獲得了鍛煉，因此取得了偉大的革命勝利和建設勝利的。至于局部的和個別的錯誤，則在工作中時常發生，僅僅是依賴黨的集體智慧和人民群衆的智慧，及時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們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沒有成爲全國性的和長期性的錯誤，沒有成爲危害人民的大錯誤。

毛澤東親筆寫下了：「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爲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爲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

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祇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祇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着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于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于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于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就根據大量調查研究中國的情況，批判蘇聯的教條主義，提出中國的十大關係。

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爲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爲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爲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他強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爲戒。」

毛澤東說：「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爲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强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計劃體制和兩個部類的比例關係

毛澤東首先提出的是計劃和兩個部類的比例問題，他認為在中國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他說：加重的結果怎麼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可以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毛澤東說：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是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毛澤東親筆寫的提綱說：「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

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帳是劃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一

中國工業布局問題

毛澤東接着提出中國的工業布局問題，解決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所謂沿海，是指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祇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祇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麼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

毛澤東認為：這不是說新的工廠都建在沿海。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輕重工業的擴建和改建，過去已經作了一些，以後還要大大發展。

毛澤東認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毛澤東說：「這也是一個對於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問題。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

國防工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

毛澤東又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毛澤東說：「國防不可不有。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

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怎麼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毛澤東寫道：「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
「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國家、集體、個人的關係 是最重要的生產關係

然後，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把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他說：「為此，就不能祇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于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

題一

毛澤東認為，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他說：個人是這樣，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也是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

毛澤東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鷄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但是就是這樣，如果粗心大意，也還是會犯這種或那種錯誤。鑑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合作社同農民的關係也要處理好。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毛澤東非常重視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他說：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

毛澤東寫道：「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他提出：「中央要發展工業，地方也要發展工業，就是中央直屬的工業，也還是要靠地方協助。至于農業和商業，更需要依靠地方。」

毛澤東認為，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

毛澤東說：「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

一。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這種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的爭權，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的爭權，不能叫做地方主義，不能叫做鬧獨立性。一

中國的民族政策不同于蘇聯

毛澤東的民族政策，一直是正確的成功的，是不同于蘇聯的，不同于斯大林的，毛澤東在指出民族關係問題時說，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我們着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

毛澤東說：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都作過貢獻。漢族人口多，也是長時期內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制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們無論對幹部和人民群衆，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

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經常注意檢查。

毛澤東寫道：「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

中國式的特殊形態的多黨制

關於政黨關係問題，毛澤東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是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毛澤東說，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鬥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團結又鬥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就是那些罵我們的，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

中國現在既然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就不會沒有各種形式的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都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毛澤東說：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

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決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已經過時」。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制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分清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 和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他主張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我們還不能宣布一個不殺，不能廢除死刑。毛澤東認為，「機關、學校、部隊裏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一百個反革命裏面，九十九個這樣處理。這就是所謂大部不捉，至于殺呢，就是一個不殺。」

毛澤東在正確處理敵我關係之後，提出正確處理內部的是非關係。他認為：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

過去，在以王明爲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

毛澤東說：「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準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準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

毛澤東說：「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的身上，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採取幫助態度還是採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學習一切民族和一切國家的長處

毛澤東最後提出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他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

的。

毛澤東說，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

毛澤東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天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毛澤東一貫主張：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黨內一些人有一個時期搞過教條主義，那時我們批評了這個東西。但是現在也還是有。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毛澤東認為，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

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

毛澤東同時敲警鐘。他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持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現在，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毛澤東指出，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麼不好呢？

毛澤東說，這十種關係，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但是，像我們常說的那樣，道路總是曲折的，前途總是光明的。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

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新學派哲學和 理論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提出了毛澤東創立新的中國社會主義學派的哲學的和理論的基本點。他說：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革命的表現形式一定有許多樣子。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就有許多不同。蘇聯是由城市到鄉村，我們是從鄉村到城市。

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

毛澤東說：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並不等於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地球上二十七億人，如果唱一種曲子是不行的。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東西。西方國家發展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現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漸轉向東方，東方國家不發展自己的東西還行嗎？

全盤西化，有人提倡過，但是行不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應該接受，不接受是沒有道理的，也不利。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

歷史總是要重視的。歷史久，有好處也有壞處。美國歷史短，也許有它的好處，負擔輕，可以不記這麼多東西。我們歷史久，也有它的好處。把老傳統丟掉，人家會說是賣國，要砍也砍不斷，沒有辦法。但是要回顧那麼久的歷史，是有些麻煩的。

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馬克思講過，首先要研究近代社會，就容易理解古代社會。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毛澤東強調要反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我們是吃過虧的。什麼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這就是因為不從實際出發，從教條出發的原故。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

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他們說中國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資產階級的命。照那樣辦，就搞錯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個道理他們沒有搞通。革命辦法沒有搞對，黨內關係沒搞對，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勝利。

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是不利的。對資產階級的辦法，中國就與蘇聯不同。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人數雖少，但是他們有近代文化，我們現在還是要團結他們。地主階級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幾句舊詩，做幾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但還不能當工程師，比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差。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們大多數不識字，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面，比其他階級要高，因此必須團結他們，并且把他們改造過來。

表現形式應該有所不同，特別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但是，應該是為群衆所歡迎的標新立異。為群衆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為八股。過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處一樣就不好。婦女的服裝和男的一樣，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勝利以後的一個時期內，婦女不打扮，是標志一種風氣的轉變，表示

革命，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還是要多樣化為好。

民族形式可以摻雜一些外國東西。要把外國的好東西都學到。但是要中國化，要學到一套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學了外國的，就對中國的沒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說不要學外國。

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中國的文化應該發展。外國作品不翻譯是錯誤的。像西太后反對「洋鬼子」是錯誤的。要向外國學習，學來創作中國的東西。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這樣爭論就可以統一了。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保守主義，這兩個東西對中國都是不利的。學外國不等於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

這不是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非驥非馬可以。驥子就是非驥非馬。驥馬結合是會改變形象的，不會完全不變。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

西洋的東西也是要變的。西洋的東西也不是什麼都好，我們要拿它好的。我們應該在中國自己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

的。不要學西洋的東西的人辦事，是不對的。要承認他們學的東西是進步的，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不承認這一點，祇說他們教條主義，不能服人。教條主義要整，但是要和風細雨地整。要重視他們，但是要說服他們重視民族的東西，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

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原則不能丟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議的發言中說：我們的黨在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曾經徹底地清算了一切嚴重的教條主義路線，團結了全黨同志，包括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內，發展了人民的力量，從而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如果不是這樣做，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保衛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者聲言要

「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變的正是這條革命道路。幾十年來，一切修正主義者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提出的修正意見，所傳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也正是想避開無產階級解放的這一條必由之路。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同蘇聯保守 的教條相反的方法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還反復說：毒草不是香花，教條主義也不是香花。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和它的敵對思想作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歷史上的香花在開始幾乎都被認為毒草，而毒草却長期被認為香花。香毒難分。馬克思、列寧、達爾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穌、路德、孔子、孫中山、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都曾經被認為是毒草。創立新學派，就不要怕被人家看做是毒草。

毛澤東反復說，馬克思主義應當宣傳，不能強迫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應允許互相批評。毛澤東說：「批評政府不犯罪。」

教條主義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學，都是毒草，都要批判，都要以治病救人的態度去批判。

毛澤東認為，中國化的真社會主義，永遠都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說：「放」，有利而無一害；「收」是錯誤的。

真、美、善、香是與僞、醜、惡、毒的對立統一，祇有通過放，前者才能分辨，才能發展。毛澤東提出，有兩個方法（政策）領導中國，還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我們將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發展真理，少犯錯誤，將一個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先進的中國。

在中國化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

毛澤東在中宣部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上，加了重要的批注：

《匯集》中說：不少科學家認為，如果工作條件沒有很好解決，就拿不出什麼科學成果，因此「百家爭鳴」對他們的實惠不大。這個看法在社會科學家中有（特別是經濟學家認為得不到調查統計資料，不能切實地做研究工作），而在自然科學家中更為顯著一些。他們對「工作條件」的興趣，比對「百家爭鳴」的興趣高。毛澤東批道：「他們是有些理由的。」

《匯集》中說：人們常問：「百家爭鳴」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國家的指導思想」兩者間的關係怎樣。毛澤東批道：「應當弄清這種關係」。《匯集》接着說：「同時關於允許哪些文章出來爭鳴，不允許哪些文章出來爭鳴，有各不相同的議論。有人認為科學界已有定論的事情就不再允許爭鳴。有人認為不是實事求是研究問題而是狂妄自大誇誇其談的文章不應允許出來爭鳴。有人認為討論問題態度不好的文章不應允許爭鳴。」毛澤東批道：「戒律太多」。

《匯集》中說：目前文藝界一方面「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傾向仍然很嚴重，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又確實有些抬頭。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險，在一些同志中間看法不一致。對這種狀況，應該怎樣估計？毛澤東批道：「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險，而應按具體問題處理。」

《匯集》中說：「有人指出黨校是有特殊性的，即學員都是黨員，因此，這裏的「爭鳴」，祇能限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不同之爭，不能容許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來爭鳴」毛澤東批道：「……何必怕爭鳴」。

《匯集》中說：「執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學習經典著作有無矛盾呢？有人說提倡百家爭鳴和獨立思考，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有妨礙的，因為這樣一來，大家不先去接受經典著作的內容，而是首先去懷疑經典著作了。有人說，『經典著作是不許懷疑的』」。毛澤東批道：

「不許懷疑嗎？為什麼不允爭論呢？」

《匯集》中說：「如何克服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學中的教條主義？」毛澤東批道：「就是允許批評、爭論」。

八屆三中全會正式修改 主要矛盾的提法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中寫道：這次會議明確方針，交流經驗，統一意志。

毛澤東正式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肯定了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前幾天在省代表大會上

的工作報告。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說：「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完全結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祇是這種矛盾主要地不表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而表現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既可以表現為敵我矛盾，也可以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前一種情況是比較少數的，後一種情況却是大量的」。「階級鬥爭形勢的發展是有起伏的。在這次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階級敵人被迫退却，鬥爭形勢可能在一定時期緩和下來」。「這種鬥爭的起伏形勢，將在若干年內反復地發生，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國內階級鬥爭，將通過這種起伏，逐步地減弱以至消滅」。報告批評了當時黨內看不到敵我矛盾仍然存在的右的傾向和誇大敵我矛盾，企圖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左」的傾向。這篇報告發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并加了編者按，指出：「這個問題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國性的。究竟什麼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怎樣認識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關係？為什麼黨在一個時期強調人民內部矛盾，而在另一時期強調階級鬥爭？這些重大問題是大家所關心的。」這裏所引的江華的報告和《人民日報》編者按，都是毛澤東說的和寫的原話。

在江華作上述報告半個月後，柯慶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

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毛澤東審閱了這一報告，并作了一些修改。柯慶施報告的第一部分說：「在階級矛盾消滅以後，正確和錯誤、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後、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仍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和各種不同的情況出現。而人類社會也就將在不斷地克服這類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前進。」毛澤東在這一段話後面加寫了「矛盾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一句。

南寧會議的歷史作用

南寧會議是毛澤東醞釀并表述創立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第一次重要的會議，毛澤東提綱中寫着：「發展真理，破除迷信」、「中國的共產主義」、「設置對立面，歡迎對立面」、「隨時都有兩種方法可以比較」。

毛澤東強調指出：「落後的勞動者階級表現積極起來；它的意義是什麼？」「馬克思用這點作標幟，證明革命到來了。」「一九五六年我們有些人不認識這一點。」

毛澤東認為：「一九五八年，人民對革命和建設所表現出來的積極性比過去任何时候更高。」

領導幹部要學理論是毛澤東講話的主要部分。他說：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要研究方法、考據、詞章。一個人每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辦了。蘇聯文件不重視理論，沒有理論興趣，不講哲學，文法也不對，光說些事務上的事情。

正是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問題。毛澤東還提出：「暮氣，我們都有些，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我們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氣是朝氣的對立面。要講革命朝氣。」

整風一定要堅持到底，全黨要提起幹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與人民打成一片，肅清一切作風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錯誤。

毛澤東提出：「不斷革命論」。他寫道：「奪取政權——土地革命（民主主義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術革命。」

從一九五八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着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當然是經濟與政治、技術的統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

階級消滅以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政治鬥爭或革命，繼續進行，但性質變了。國家權

力，在對內職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現在對勞動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說服而非壓服，打倒官氣，十分必要。

政治家，一定要懂一些業務，在農業是試驗田，在工業試制產品，兩者都用比較法，在同一條件下，先進與落後比較。企業與企業比，車間與車間比，個人與個人比。毛澤東歸結說：「上層建築是為基礎服務的，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即思想）是為經濟服務的」。

毛澤東認為，不平衡——平衡——再一個不平衡——再一個平衡以至無窮，這就是規律。毛澤東強調他的一貫思想：「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這也就是「大局與小局的區別」。「一般與特殊的區別」。所以要「抓住主流。抓錯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頭。」這是現實問題，也是邏輯問題。

毛澤東堅持認為「反冒進」的教訓是：反掉了三個東西，這也就是反掉了「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促進委員會」。

毛澤東認為，從邏輯上說：這是「概念、判斷和推理的形成過程，思想的形成過程，人腦反映客觀世界是不容易的。有了正確的思想，還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

南寧會議與《工作方法六十條》

毛澤東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條》的過程中，南寧會議很重要。毛澤東在會議上作爲新問題同大家商量的主要有：毛澤東認爲，我們現在看見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民群衆在生產戰線上這樣高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爲了適應這種情況，中央和地方黨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變的需要。工作方法六十條，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積累下來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這是毛澤東同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後在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上共同商量的結果。

毛澤東用文字的形式寫出：「現在要來一次技術革命，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

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

的着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毛澤東寫道：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將來政治這個名詞還是會有的，但是內容變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祇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現在一方面有社會主義世界同帝國主義世界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以後，這個政權同人民的關係，就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的關係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壓服而是說服。這是一種新的政治關係。這個政權祇對人民中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犯法分子採取暫時的程度不同的壓服手段，作為說服的輔助手段。

過渡時期完結、徹底消滅了階級以後，單就國內情況來說，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內部的關係。那時候，人和人之間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和革命一定還是會有的，并且不可能沒有。

對立統一的規律，量變質變的規律，肯定否定的規律，永遠地普遍地存在。但是鬥爭和革命的性質和過去不同，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人民內部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社會制度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科學技術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場鬥爭，是一個革命。進到共產主義時代了，又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發展階段，從這個階段到那個階段的關係必然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關係。各種突變、飛躍都是一種革命，都要通過鬥爭，「無衝突論」是形而上學的。

先進和落後是矛盾的兩個極端，「比較」是對立的統一。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後，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候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後再繼續量變的過程。

這一段的深刻的潛臺詞，也許至今很多人還不知道。毛澤東一九六三年七月在武漢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和王力等談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和小平在莫斯科，就看到北京的報上提出了『躍進』。我覺得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躍進，就是飛躍，就是突變，就是質變。沒有漸變和量變，怎麼會有飛躍和質變呢？回到北京

就成了大躍進了。這個詞大家都接受，都那麼說，我也就跟着說，跟着用了。」毛澤東還寫過一封信，誇獎提出這個詞的人，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但是他在同我們的談話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出發，他是不贊成這個口號的。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把質變和量變的關係科學地表述出來了。

毛澤東認為很重要的一條，即二十三條，是劉少奇提出來的，并由少奇主持召集一些人集體制定和修訂的。在一條中提出：「上層建築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門所制訂的各種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八年來積累起來的規章制度許多還是適用的，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進一步提高群衆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應該作出這樣一個總的規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下，在群衆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允許并且鼓勵群衆的那些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的創舉。」——這是制定和修改各種規章制度的群衆路線的方法。」

反對黨八股思想的新發展

毛澤東用文字形式表達了他關於「交心」問題的看法，提到這是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幹部和群衆的高度。他寫道：「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關係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學習魯迅。魯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讀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讀者共鳴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

毛澤東發展了他在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中反對黨八股的思想。他說，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把材料和觀點割斷，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觀點互不聯繫，這是很壞的方法。祇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觀點，不說明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這種方法更壞。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率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說明問題就行，解剖一個或者幾個麻雀

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應當掌握豐富的材料，但是在會上祇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須懂得，開會同寫大著作是有區別的。

毛澤東有針對性地批判地提出：「一般說來，不要在幾小時內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觀點，而這些材料和觀點又是人們平素不大接觸的。一年要找幾次機會，讓那些平素不接觸本行事務的人們，接觸本行事務，給以適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擺在別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幾小時內下幾百公厘的傾盆大雨。『強迫受訓』的制度必須盡可能廢除，『強迫簽字』的辦法必須盡可能減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語言，必須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報知識」。

毛澤東把自己基本的哲學觀點，認識論和方法論濃縮表述為：「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人腦是能够反映客觀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確很不容易。要經過反復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較正確，比較接近客觀實際。有了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思想，還要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告訴別人。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衆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衆中去』的過程。在我們的幹部當中，大概還有不少的人，不明白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任何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祇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祇能來自人民群衆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試驗中，他的頭腦祇能作為

一個加工工廠而起到完成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衆去考驗。如果我們的同志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到處碰釘子。」

毛澤東講話和寫作，一點八股腔也沒有。他總結了平生的經驗，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下了：「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準確性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問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第一，概念不明確；第二，判斷不恰當；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又缺乏邏輯性；第四，不講究詞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作經濟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時候，不但要注意準確性，還要注意鮮明性和生動性。不要以為這只是語文教師的事情，大老爺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一據我所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是這樣做的。」

《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

中國的和外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者，可能都忽略了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關於同意出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給蘇共中央的電報。毛澤東說：「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月刊，作為參加這一刊物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合刊物，也同意蘇共中央所提出的關於刊物的基本原則和出版經費的分擔辦法。」

這個雜志的中國版，在北京是由我在王稼祥領導下主辦的。派到布拉格的中國黨的代表是趙毅敏。這個雜志的編輯部，實際上部分地起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作用。

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許多代表團提出了關於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刊物的建議。當時約定，願意參加出版雜志的各國黨，在進行必要的協商和準備工作以後，即着手實現這個建議。蘇共中央認為，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需要了解哪些黨打算參加出版這個理論刊

物，并且就出版這個刊物有關的具體問題開始交換意見。這個雜志可作爲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合刊物。它不應當成爲發號施令的刊物；它將從事宣傳、研究馬列主義問題，並且是各兄弟黨交流經驗的國際講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則將是這個雜志的基礎。一九五八年八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正式出版。

毛澤東這個電報，證明他還是爭取赫魯曉夫，希望他能够實行兄弟黨之間新型的平等關係協商關係的。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九年秋天，老子黨的指揮棒又揮舞起來了，成爲公開反華的吹鼓手。我們同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六四年宣布退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編輯部。毛澤東後來認爲，過早地退出這個國際組織，這是在黨的七大以後，我黨所犯的第三個歷史性的錯誤。

成都會議是創立新學派的繼續

毛澤東反復講「是辯證法，不是片面性」。毛澤東認為有人口頭上講「理論與實際結合」，實際不承認。他認為判斷一切上層建築好壞的唯一標準是「解放還是束縛生產力？」

毛澤東說：「八年的教條主義，沒有吸取王明教條主義的教訓。」「有人說『祇能搬』，也不盡然。我黨歷史上祇有一部分人犯教條主義。我的目的，不是整人，而是總結歷史經驗。——屈服于斯大林的壓力，不能獨立思考，本質仍是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新的繼續。」

調整生產節奏（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綫基礎上，波浪式的前進，急緩的對立統一，勞逸的對立統一，苦戰與休整的對立統一），兩個戰役之間必須要有一次休整、補充和練兵，這是規律，每種都互相轉化（急轉為緩，緩轉為急，勞轉為逸，逸轉為勞，戰鬥轉為休整，休整轉為戰鬥，睡眠轉為起床，起床轉化為睡眠，開會轉化為散會，散會轉化為開會，團結轉化為鬥爭，鬥爭轉為團結，生產轉為消費，消費轉化為生產，播種轉

化爲收獲，收獲轉化爲播種，春夏轉化爲秋冬，生轉爲死，死轉爲生，女轉化爲男，男轉化爲女，壓迫者轉化爲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轉化爲壓迫者（對前時的老壓迫者），戰爭轉爲和平，和平轉爲戰爭，量變轉化爲質變，質變轉化爲量變，有限轉爲無限，無限轉爲有限。如此等等）。

毛澤東認爲，現在的路線正在創造中。路線由於群衆鬥爭和我們的思想反映已開始形成，但尚待完備，尚待證實，不可以說已經最後完成了。錯誤還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正是形成正確路線的必要條件，二者的對立統一。難免論是正確的，可免論是不正確的。祇有正確，沒有錯誤，無此事實，否定對立統一規律，是一種形而上學。

毛澤東提出要「勢如破竹」、「高屋建瓴」。他說：「精神不振，奴隸精神存在，迷信古典作家，又沒有學習到古典作家的勢如破竹的風格，他們風格較高，我們風格較低。不要怕教授，不是藐視他們，而是不應具有無窮恐懼。馬克思主義者不應恐懼資產階級教授。從古以來，創立新思想、新學派、新教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去就抓起新東西，同老古董戰鬥。博學家老古董總是壓迫他們，而他們總是能戰而勝之，難道不是嗎？」

老是四平八穩，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不好。敢于提出不同意見，敢說心裏話，不管對不對，都是可取的。當面不說，背後咮嘯，最不好。有話不說，則相當危

險。毛澤東提出有名的「六不怕」。他說：「怕戴機會主義帽子，怕撤職，怕開除黨籍，怕老婆老公離婚，怕坐班房，怕殺頭，六怕不好，都要準備。難道爲了這些就不說話了嗎？」他說：「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

毛澤東認爲成都會議，解決了大批問題，比南寧進了一步。但思想談得較少，似是缺點。毛澤東正式提出「創立學派問題」。毛澤東說，現在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而不自覺。」

毛澤東再次強調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他說，不要看不起青年，不要看不起資歷淺的人，不要看不起所謂沒有學問的人。他分析了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學問問題，青年列寧的學問問題，青年黑格爾的學問問題，青年達爾文的學問問題，青年牛頓的學問問題，青年孔夫子的學問問題。

毛澤東歷數了顏淵，曾參，賈誼，諸葛亮，王弼，玄奘，惠能和李世民；還列舉了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孫中山，章太炎和鄒容。毛澤東還歷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能獨立思考，創立了中國革命的新學派，擔負重要的領導工作。

毛澤東認爲，「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個道理未運用到經濟建設上。馬列主義的普通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唯物論。二者的對立

統一，就是辯證法。為什麼硬搬，就是不講辯證法。對蘇聯的經驗，祇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不是擇其善者而從之。什麼事情都要提出兩個方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學。」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創辦《紅旗》雜志。《紅旗》雜志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正式出版。

值得重視的是，毛澤東親筆寫了「從發展生產出發，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的標題，在成都會議上印發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論述商品交換的一段話。馬克思的那段話是：「近代生產方式最初的理論的考察——重商主義——必然會從流通過程及其獨立化為商業資本運動時的表面現象出發，所以僅僅把握了一個外觀。一部分因為在封建生產的最初的變革時期，即近代生產的發生時期，它（商業資本）曾經發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現代經濟的真正科學，是在理論考察由流通過程過渡到生產過程時開始的。」證明了毛澤東對馬克思《資本論》的重視和鑽研精神。還有一點，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他們雖然沒有時間通讀原文，但是，請專門研究者摘編原文的方法，也還是有用的方法。

八大二次會議前后新學派 思想的發展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及其前後反復論述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的創立新學派的論點。毛澤東講話中，明白地說，不要怕資產階級教授，也不要「怕無產階級教授，怕馬克思。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樓上，好象高不可攀，要搭很長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乎說：我這一輩子沒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馬克思也是兩祇眼睛，兩祇手，跟我們差不多，無非是腦子裏有一大堆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在樓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樓上的人。我們讀一部分基本的東西就够了。我們做的超過了馬克思，列寧做了；馬克思沒有做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實踐當中是要出道理的。馬克思革命沒有革成功，我們革成功了。這種革命的實踐，反映在意識形

態上，就是理論。我們的理論水平可以提高，我們要努力。」

毛澤東講話中，在說到我們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時，談了如何看待身體、神仙和洋人的問題。他說：「我們被帝國主義壓迫了一百多年。對外國人來說，我們不行，對孔夫子來說，我們也不行。這是什麼道理？我問過我身邊的同志：我們住在天上，還是住在地下？他們搖頭說是住在地下。我說，不，我們住在天上。如果別的星球有人，他們看我們不也是住在天上嗎？所以我說，我們是住在地上，同時也住在天上。中國人喜歡神仙。我也問過我身邊的同志：我們算不算神仙？他們說不算。我說，不對，我們住在「天上」，為什麼不算「神仙」呢？如果別的星球來人，他們不把我們當成神仙嗎？中國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說外國人才算「洋人」，我們不算「洋人」。我說，不對，我們把外國人叫「洋人」，在外國人看來，我們不也是「洋人」嗎？有一種微生物叫細菌，我看細菌雖小，但是，在某一點上它比人厲害。它不講迷信，它幹勁十足，多快好省，力爭上游，目中無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公斤的體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強嗎？」

毛澤東說，一舉這麼多例子，目的就是說明青年人是要戰勝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超過學問多的人，不要為大學問家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

毛澤東說：「許多科學發明家是出身比較窮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還有許多是農民，是小知識分子。搞出這些科學發明家的小傳，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可以幫助工人、農民、小知識分子、新老幹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農、林、水產部門、衛生部門、政法部門、文教部門都可以搞這樣的材料。」

毛澤東幾次說過：史家須兼「史才」、「史學」、「史識」三長，而應尤重史識。毛澤東講話中說：「唐朝有個劉知幾，是個歷史學家。他主張寫歷史的人要有三個條件：才、學、識。他說的識，就是辨別風向的問題。我現在特別提醒同志們注意的是，我們應該有識別風向的能力，這一點有極端的重要性。一個人盡管有才有學，如果不善于識別風向，那還是很遲鈍的。」

毛澤東還寫過這樣的批語：「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于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于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面同時並舉。如果能够有系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卞和獻璞，三刖其足；「函關月

「落聽鶴度」，出于鶴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一

毛澤東稱贊陸定一寫的《教育必須和生產勞動相結合》這篇文章，批給中央其他領導人看，說：「陸定一的文章極好，必須看，至少看兩遍。」

今天看來，這篇文章帶有時代的特徵，極左思潮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烙印是難免的。但是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着重肯定的原則是對的。毛澤東十分重視研究教育史。他指出，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研究的話，那當然有好處，可以知道幾千年階級社會時代教育的規律。但須知，這種階級社會歷史上教育的規律，并不等于社會主義教育的規律，更不等于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的規律。

毛澤東肯定陸定一說的，「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鎮、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的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側面說來，幾千年的教育，確是剝削階級手中的工具，而社會主義教育乃是工人階級手中的工具。」毛澤東補充道：從剝削階級「手中的工具到工人階級手中的工具，是教育的質的飛躍，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

毛澤東指出：「我們應當根據我國自己的特點，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

實踐結合起來，來規定我國的教育方針，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

毛澤東又指出：「我們也認真研究兄弟國家的經驗和認真研究歷史，但是目的不是去抄襲，去搬運，而是爲了了解歷史情況，了解教育方面的歷史唯物主義，以便有所借鑒，依照自己的情況，做好自己的工作。」

毛澤東肯定陸定一文章的主題：「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要是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這二者同智育是連結一道的。二者都同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毛澤東還概括地說：「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

毛澤東主張在教育史中，要批判蘇聯凱洛夫和斯大林。他親自寫了一段話，後來因爲有人不贊成，在發表時刪掉了。這段話今天看來還是光輝的。這個原則已經超越了創立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學的範圍，而是提出了創立中國式社會主義學派的問題了。

毛澤東寫的這段話的原文是：「兄弟國家，例如蘇聯的某些教育理論家，如同唯心論語言學的那些理論家一樣，他們的教育學，就是錯誤的。我指出的主要的是凱洛夫的教育學。中國人却迷信他，捧爲神仙，流毒非淺。斯大林的理論，也有一部分是錯誤的。他少談教育，多談政治學、哲學、經濟學，其中就有好些是錯誤的。他不自覺，他的方法論帶着形而上學

的某些成分，這就不能不影響教育理論、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

武昌會議是毛澤東「壓縮

空氣」的會議

正是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的著名論文，這是他的思想的新總結。他說：「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鬥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後的人們，化為紙

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中國人民爲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

毛澤東指出：「向階級敵人作鬥爭是如此，向自然界作鬥爭也是如此。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十二年科學發展綱要》，這些都是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宇宙發展的兩重性，關於事物發展的兩重性，關於事物總是當作過程出現、而任何一個過程無不包括兩重性，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的。一方面，藐視它，輕而易舉，不算數，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勝仗。一方面，重視它，並非輕而易舉，算數的，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不經艱苦奮鬥，不苦戰，就不能勝利。」

他接着說：「階級鬥爭，自然界的鬥爭，所遇到的困難，更不可勝數。但是，大多的人類，首先是無產階級，首先是共產黨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機會主義的先生們以外，總是將藐視一切，樂觀主義，放在他們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後才是重視事物，重視每件工作，重視科

學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個矛盾側面，鑽進去，逐步地認識自然運動的法則和社會運動的法則。然後就有可能掌握這些法則，比較自由地運用這些法則，一個一個地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處理矛盾，完成任務，使困難向順利轉化。」

毛澤東針對當時的形勢的分析提出了：同志們，我們就是作這些轉化工作的。同志們，可能性同現實性是兩件東西，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頭腦要冷又要熱，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衝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意做分析。祇愛熱。同志們，這種態度是不利于做領導工作的，他們可能跌筋鬥，這些人應當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頭腦。另有一些人愛冷不愛熱。他們對一些事，看不慣，跟不上。對這些人，應當使他們的頭腦慢慢熱起來。這些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原則，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

毛澤東確定，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不在北京開，在武昌開。這是毛澤東壓縮空氣的會議，但是，肯定成績是主要的，不能低估。不能潑涼水，要「保護廣大幹部的勞動熱情」。

毛澤東不同意「苦戰三年，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他說：「這個口號是否適當呢？能基本改變全國面貌嗎？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農村面貌，不是好些嗎？在南寧會議，原來就是這樣提的，何時推廣到「全國」去了的呢？沒有經過認真的分析和集體的決定。」毛澤東說：

「幾十萬幹部性急了一點，沒有作歷史的、全局的、國際主義的分析。衝天幹勁，革命熱情，極可寶貴。其缺點，可以在實踐中，同志們的辯論中，在幾個月內，大體得到解決。」

毛澤東提出應該作這樣兩方面的分析。毛澤東風趣地講要「學習曾希聖的機會主義」。他說：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開始計劃搞八億土石方，曾希聖提議翻一番，變成十六億。八億是「機會主義」，十六億是馬克思主義。可是沒有幾天又提高到三十二億，十六億就「有點機會主義」了，最後到了六十四億。我們把改變全國面貌時間說長一點，無非是當「機會主義者」，這樣的機會主義，我願意當，當了有味道。馬克思會賞識這種「機會主義」的，不會處罰我們。

毛澤東指出：「研究斯大林在目前有極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他同時提出研究辯證法問題。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國，在一九五八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輕工業同時並舉的思想，確立了。」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了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思想。也是在武昌，他提出「實事求是地制定一九五九年經濟計劃，又有熱又有冷，雄心與科學分析相結合，避免由於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而產生的不切實際的缺乏根據的三千萬（噸）鋼的可能是孫悟空式的危險，把我們的腦筋壓縮了一下，留有餘地。」

毛澤東指出：「黨的鞏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幾乎每天都有，無此不能發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暫時的。」同樣的，「人民共和國，或者勝利，或者滅亡，如果有滅亡的情況出現，它祇是暫時的，而世界上資產階級的滅亡，則是永久的。」至于每一個「個人要準備隨時有滅亡的可能」，但是世界和中國總是前進。他經常引用劉禹錫的詩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毛澤東還提出了：不忙于宣布消滅階級。也指出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情緒的危險性。提倡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的結合。

北京會議繼續反「左」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在北京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會議上提出「有幾個深切的辯證法問題要談，與總路線、大躍進有大關係。」

毛澤東說：我們所說的工作方法，看問題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辯證法。講有計劃

按比例發展，還要講主觀能動性，兩者結合起來講就好了。關於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問題，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觀符合客觀法則？斯大林曾提出俄國的革命熱情與美國的求實精神相統一。我們是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普遍與具體是對立的統一。客觀規律在每一個國家因歷史條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觀法則要研究它、認識它、掌握它、熟悉地運用它。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辦到的事情就要努力辦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義；不能辦到的就不辦，一定要它辦到就是主觀主義。主觀反映了客觀，就變成了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也有兩種，一種是脫離實際的，這是主觀主義；一種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符合實際的。要區別這兩種情況。凡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就要受挫折。現在沒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貨嚴重不足，就是因為我們脫離了客觀規律，過去的安排缺乏這一方面。搞經濟建設我們還是小孩，無經驗。同地球作戰，戰略戰術我們還不熟，要正面承認這些缺點和錯誤。關於反映客觀規律，按比例發展，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解決的。現在我們似乎開始在這裏接觸這個問題了。請大家接觸這個問題，研究研究。

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使群衆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并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幹部兩條正確的政策，并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

第一次鄭州會議正式提出 糾「左」的方針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二月在鄭州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講話中提出了：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還有三是豬鷄鴨無償歸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無償歸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歸公，這幾項中，有些是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則是不應當歸社而應當不動的，如全部鷄鴨和一部分豬，另一部分豬應當作價歸社，而不能無償歸社。

毛澤東概括地說：這樣共產風就刮起來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是不能被許可的。

毛澤東說，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

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後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

毛澤東還說，我們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同時，許多公社和縣從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提出了：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公社的積累應當適合情況，不要太高。必須堅決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費現象。

毛澤東鄭重地指出：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

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

除了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外，目前農村勞動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這就是用于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的勞動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業、服務業和行政的人員一般太多。

毛澤東在這次鄭州會議期間，對一個文件的批注中強調：應當批判祇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

對毛澤東提出反「左」的意見和做法，不少人還是有抵觸情緒的。在鄭州會議後期，三月初，毛澤東在給劉少奇、鄧小平等的信中提出：這是一個關鍵的時機，時不可失，機不再來。聽了昨天同志們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裏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啓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

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後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

毛澤東還在一個批語中說：「建議請同志們認真、仔細、熱情地讀一讀河南此次六級幹部會議的詳細記錄，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兩天的記錄，極有味，極有益，其中有許多批評我右傾和倒退的意見。」

毛澤東還提出警告說：「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中央發表的《鄭州會議紀要》中說：

(一) 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二) 規定了如下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

- 統一領導，隊為基礎；
- 分級管理，權力下放；
- 三級核算；各計盈虧；
- 分配計劃，由社決定；
- 適當積累，合理調劑；
- 物資勞動，等價交換；
- 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毛澤東抓各省的五級或六級幹部會議，他到天津，到濟南，到鄭

州，到武昌，到長沙，到南昌，同省委負責人交換意見，毛澤東批注了許多文件，主要都是認真糾「左」。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中寫道：「很多同志做了幾個月的調查，開過不少的大會小會，結果對於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因是方法不對，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大家都讀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辦起事來却在長時間內不認識公社的集體所有制要有一個由小到大、由量到質的變化過程，幾乎普遍否認價值、價格和等價交換的經濟法則。這不是很奇怪嗎？但却是事實。現在已有了鄭州會議的方針，祇須將六級幾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針一放，幾天工夫，情況就會明白了，思想就會弄通了。會議早開早結，于農事也有利。」

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又提出了：「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隊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

毛澤東很重視山西省委陶魯笳三月底送的報告和附件，他擬了《介紹山西經驗》為題加以轉發，并寫下了重要的批注：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頭昏病，還可以愈頭昏。」

「有些地方不是這樣，他們怕鬼，不敢將鄭州要點立刻一杆子通到生產隊、生產小組和

全民中去。他們懷着無窮憂慮，怕天下大亂，不可收拾。

「這三條辦法好。群衆一到，魔鬼全消。本來沒有鬼，祇在一些同志的大腦皮層裏感覺有鬼，這個鬼的名字叫做『怕群衆』。」

陶魯笳報告中提到：會議第一天就宣布「言者無罪」，「不戴帽子」，「允許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見」。毛澤東批注：「很好，必須這樣肯定。」

毛澤東還批注：「牢騷也罷，反動言論也罷，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覺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衆的眼睛裏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這一條法律。現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陶魯笳報告中提到：「情況證明，主席指出的舊帳要算，要處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是群衆的一個迫切要求。」毛澤東做了一個重要批注：「舊帳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裏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帳一般要算。算帳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祇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對群衆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一個公社竟可以將原高級社的現金收入四百多萬元退還原主，為什麼別的社不可以退還呢？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道是劫財，不是善

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

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

繼續糾「左」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央在上海召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把原來鄧小平擬定的六條，增加了八條，成為十四條提綱。毛澤東的講話，着重講了前面十二條。重點也是糾「左」。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中寫道：多謀善斷，留有餘地。波浪式的前進。他說過去我祇是不同意反冒進，同意依形勢改變計劃，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會，錢祇有這麼多，祇好壓縮計劃。我是歷來如此。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毛澤東還說，「一個人有時勝過多人，真理在他手裏，不在多數人手裏。」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權力集中到常委和書記處，我爲正帥，鄧小平爲副帥。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

曾經有人問，那麼劉少奇呢？這是誤解了毛澤東本意。在這裏毛澤東祇是說，常委和書記處要集中權力，常委是毛澤東主持，書記處是鄧小平主持。這裏絲毫沒有以鄧代劉的意思。相反，他早已想要劉少奇主持常委，爲正帥了。他真心要退居二線，不管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創立新學派。

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底五月初寫的《黨內通訊》中強調反對浮誇風，他說：「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毛澤東說：「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

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擬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的題目，強調：「恢復社員的自留地，仍然按照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鷄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毛澤東在五月二十二日，批轉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的報告。他批注道：「工農商并舉，提得很好，一定要這樣做。貶低商業，商不挂帥，工農兩業是不會發展的。」

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在五月底向中央報告中明確提出：「當前國民經濟出現的一些脫節、失調現象，主因是計劃指標高了。從工業方面講，首先是鋼鐵指標定高了。鋼鐵指標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各方面的要求分開看，似乎都可能達到，但加起來就超出了客觀可能性。工業生產是一個大協作，各工業部門和整個工業內部，都是彼此依賴、互相制約的。因此，計劃的制訂必須有細致的綜合平衡過程。」

毛澤東很高興，稱贊「此件好，有相當的說服力，是一個工業界有了改進的文件，可以一讀。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後覺得頭痛，沒有邏輯（內部聯系），沒有論證，因而沒有說服力的文件，以後千萬不要拿出來。」毛澤東批評國家計委黨組的一個報告「是一個壞透

了的文件，沒有內部聯系，沒有合理論證，已經證明毫無用處。寫這樣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腦筋，對於事物根本不懂，是個計劃經濟的外行，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法則，一竅不通，今後應當認真改正。多想多讀，多謀善斷。」

毛澤東說：我寫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認為必須說，應當說。我必須在這種時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則事情不好辦。我不向同志們封鎖我的意見，同志們對我封鎖，我是大不高興的，過去的封鎖，必須改正。

廬山會議把反「左」變為 反右是方向錯誤

黨中央從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到此次廬山會議，對於在自己領導下的各項當前重大工作中的錯誤缺點，在足夠地估計成績（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的

條件下，進行了嚴肅的批判。這種批判工作，已經有九個月了。必須看到，這種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見效和逐步地見效的。又必須看到，這種嚴肅的認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經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對於某些同志有些泄氣。錯誤必須批判，泄氣必須防止。氣可鼓而不可泄。人而無氣，不知其可也。我們必須堅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說的，在滿腔熱情地保護幹部的精神下，引導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錯誤者，存在缺點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錯誤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評，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評而泄了氣。必須顧到改錯與鼓勵兩個方面。必須看到批評、整改雖然已經進行九個月了，一切未完工作還必須堅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但是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一九五七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另一種情況是無產階級內部的思想性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這是我們和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點。但是這些同志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是有分歧的。他們的情緒有些不正常，他們把黨犯的錯誤估計得過大了一些，而對幾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所創造出來的偉大成績則估計得過小了一些，他們作出了不適當的結論。他們對於克服當前的困難，信心不很足。他們把他們的位置不自覺地擺得不恰當，擺在左派與右派的中間。他們是典型的中間派。他們是一得失相

當一論者。他們在緊要關頭不堅定，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却怕這些同志的搖擺。因為這種搖擺，不利于黨和人民的團結，不利于全黨一致地鼓足幹勁、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我們相信，這些同志的態度是可能改變的。我們的任務是團結他們，爭取他們改變態度。為要達此目的，必須對此種黨內動態作必要的估計。不可估計太高，認為他們有力量可以把黨和人民的大船在風浪中搖翻。他們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他們祇占相對的少數，而我們則占大多數。

毛澤東說我們黨三十八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作的論斷是錯誤的，當時反「左」，並沒有出右，反右是大錯特錯的，更談不到是必然性。毛澤東說，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不講團結不利，于黨于個人都不利。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如同我們在革命時期各次重大爭論一樣，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可能是沒有爭論，風平浪靜的。廬山會議可能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可惜它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上是反面的。）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在廬山會議所做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最後修改稿中，親筆寫了：我國現在還處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依然存在。對於舊的社會經濟制度雖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徹底完成……「城鄉資產階級反動的思想活動和

政治活動，雖經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鬥爭給了一次決定性的打擊，但是還遠沒有徹底消滅。他們的反動的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在一部分富裕中農和知識分子中間尚有市場，一遇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蠢動起來。總之，資產階級殘餘的思想政治活動既然存在，就一定會在共產黨內找到他們的代表人物。而現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員會內是四個人）代表他們說話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個人野心家；有的是歷史上犯了錯誤、受過批評、心懷不滿的分子；有的是動搖成性的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向黨的大多數、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總路線乘機進攻，這種進攻帶着猖狂性質，形成了我們同他們的尖銳矛盾。但是這種矛盾現在還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猖狂進攻那樣的敵我矛盾。除了那些查明屬實的暗藏在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需要開除出黨以外，對於一般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祇要他們善于自處，不走絕路，我們的政策恰當，把他們爭取過來，重新合作，還是可能的。這些人還有一種模模糊糊地要社會主義的傾向，他們對帝國主義對於我國的壓迫，是要反抗的。他們是機會主義者，慣于看風使舵，看見大勢于他們不利，他們感到孤立了，祇要我們留有餘地，他們又可以過來的。一部分共產黨人的悲觀主義思潮，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是社會上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思潮在黨內的反映。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鬥爭，是波

浪式的，高一陣，低一陣，再高一陣，再低一陣，直到這一場鬥爭徹底熄滅為止，那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政治影響最後消滅的時候。」

毛澤東對持有不同意見同志的分析和看法完全弄錯了。毛澤東把原定的反「左」，改變為反右了，而且升了級，變成全國範圍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了。實踐證明，這個運動是完全錯了。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罵了彭德懷，這是罵錯了。但是他聯系到自己所作的分析有的還是對的。他說：「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哲學（宇宙觀、方法論）極為重要。』

「要準備聽幾年閒話；要誠懇待人，不講假話；要靠攏大多數。如此就一定可能變過來。否則不能。」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改也，人皆仰之。」

「我也是一個甚為不足的人。很有些時候，我自己不歡喜我自己。馬克思主義各部門學問，沒有學好。外國文，沒有學通。經濟工作，剛剛開始學。但我決心學，不死不休。對於這些，我也要改，要進取。那時，見馬克思的時候，我的心情就會舒暢一些了。」

第一次廬山會議是一個悲劇。這種悲劇還不斷重演。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歷史作出了回

答，這主要是：由於對階級估量的錯誤和個人迷信的結果，毛澤東歷次大的錯誤，都是把黨內不同意見，誤認為階級敵人的復辟。第一次廬山會議是這樣，整劉少奇是這樣，對所謂「二月逆流」是這樣，連同意打倒王力，也主要是因為江青告狀，說武漢事件後王力「以為天下不是毛澤東的了，而是王力的了」。第二次廬山會議，無端打倒李雪峰，也是由於他斷定李雪峰專了他兩天半的政而做出的錯誤決定。

集中到一點，領袖個人的權力，必須受到各種機制的制衡，否則就會犯大錯誤，這在我黨的歷史上，是重大的歷史教訓。

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理論 和社會根源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被打倒以後，關在秦城，就開始反思，最後集中到一點，毛澤東

及其追隨者，包括我在內，我們把民主革命完成的徹底程度估計高了。中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徹底完成。因此對待農民問題，特別是對待資產階級問題，對待資本主義問題，我們估計不對，犯了很多錯誤。我們在奪取政權、土地改革以後，三大改造又取得勝利，就誤以為我國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的任務早已徹底完成了。三大改造本身就有好多問題。本來在中國革命時期毛澤東把這幾個問題都分析處理得很好。農民問題處理得很好。資產階級的問題，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分析和處理，毛澤東也是高于別人，優勝于別人。所以才有一中國革命成功。才有中國革命這一套戰略策略的思想。這些東西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的。在建國以後，好多大錯誤都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而且越來越離譜，離開了毛澤東原來自己創立和發展的科學，分析中國資產階級的科學。

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接力棒

研究毛澤東這門歷史科學，是爲現實服務的。毛澤東創立的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學派（理論和實踐）經常是曲折地向前發展的，在探索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是很重的，教訓是很大的，但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新學派還是創立起來了。和蘇聯的一套對比，就可以看出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重大意義。沒有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就沒有完整的毛澤東思想。

中國以毛澤東爲核心的第一代領導創立了這個新學派的基本原則，經過以鄧小平爲核心的第二代領導在實踐中的繼承和發展，以江澤民爲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又接過了接力棒。我在十四大以後寫給黨中央的信中這樣說過：

「我學習十四大文件後初步形成了以下概念：

第一，正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當于遵義會議一樣，黨的十四大相當于黨歷史上的七大。鄧小平的思想，鄧小平同志從實踐中總結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方針

和基本政策，以政治報告和黨章的形式，在全黨取得合法的統治地位，并成爲黨的憲章。還必將爲中國人民所接受，從而在中國迸發出無窮無盡的物質力量。

第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理論，就是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獨特理論。它是中國四十多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正反經驗的科學總結。它也是七十五年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它又是對當代發展程度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化方面新成就的批判地總結和應用。我們建立這一理論的方法，正是馬克思建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方法，也正是毛澤東建立中國式革命理論體系的方法。當然，我們建立這一理論僅僅是開端，切不可把我們已達到的水平估計過高，我們還要作許多艱苦的工作，使之更完善、更有說服力。

第三，開了一個很好的會，通過了一個很好的文件，現在中心問題便是如何正確地貫徹執行了。這裏問題還是很大的。因這是一場大革命，實際上關係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換腦筋，即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我們不能低估四十多年的習慣勢力，以及中國長期因缺少商品經濟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的濃厚的封建保守思想的影響。所以要正確貫徹執行十四大決議，必須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首位。

我還在另一封致中央領導人的信中指出：「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探索和堅持要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是對的，是真的。社會主義國家真正實行正確而有成效的改革的，祇有我們中國。我們是以四化建設亦即發展生產力（並改善人民生活）爲中心，堅持密切結合中國實

踐的、生動活潑的、不斷發展着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實行有方向的、有目標的、有軌道的既大膽而又慎重的改革開放。我國的改革開放的成果，主要表現有四條。

第一條是農村的改革。這是基礎。我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而且是以在農村實現現代化、產業化和社會化為戰略目標。

第二條是發展社隊企業，發展中小城鎮，它們一方面為農村和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提供社會化服務，另一方面接受大城市和外貿的輻射擴散，成為連接城鄉的樞紐，并把城鄉連接為統一的國內市場，加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改善城鄉人民生活的步伐。

第三條是建立和發展特區，並帶動大片的開放區。這就使我國的國內市場同世界市場相連接。我們利用和把握世界歷史上的老大的發達國家必然要向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和技術的規律性。「資本是天生的國際派」（馬克思語）。它不管社會制度的異同。特區還為內地的改革提供科學經驗。同時還為將來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創造了條件。我們在這一方面得到了舉世公認的偉大的成功。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在十年的時間裏，已變成為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僅次于上海的現代化大城市了。真是比魔術還奇異。

第四條，有了前三條成就，就推動了我國大企業的改革和全面的改革。大企業是我國實現四化的骨幹力量和領導力量，實際上已經開始從行政化向社會化轉變，開始實現從流通到生產到流通的獨立的循環過程，以擴大再生產。商品經濟是不可超越的。我國已經開始實現

並不斷完善着建立在價值法則基礎上的、市場和計劃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我國已經實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我國正在建立和發展沿海和內地統一的國內市場。我國也開始學會用金融作為幹預市場和調整計劃的經濟手段。我國已成為新的技術革命和新的產業革命時期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場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組成部分。這樣我國才有吃、有穿、有用、有外匯、有外國投資的環境。以此為基礎，各種改革都在前進。我們豐富的實踐經驗，需要上升為理論。

當然，我們不能過高地估計成就，我們面前存在的問題還很多，也很嚴重。但以上四條成就是主要的方面。這才保證了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生活向上，團結對敵（自然界的和社會的、國內外的敵人）。我國不同于蘇聯。中國革命是獨立進行的，是中國式的革命，而且是在反對蘇、美、英雅爾塔會議瓜分中國的協議中取得最後勝利的。中國建設也是獨立進行的，我們一直反對蘇聯的指揮棒和任何形式、任何方面的控制。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叫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才是真正的一生動的、不斷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我們要走的道路還很長，還會有曲折，但是總的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一

為社會主義唱挽歌的人，

必然成為遺囑執行人

我在《歷史捉弄人》這篇文章中敘述了：「資本主義革命以後的歐洲，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誰也擋不住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另一方面，又是不斷的、而且普遍地復辟。普遍地不要共和國，普遍地宣布恢復宗教勢力，普遍地宣布要舊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歷史，到現在僅僅才七十四年，東歐就更短。現在又發生一個普遍的現象，像過去要恢復帝制、恢復封建制、恢復帝王、恢復貴族地主一樣，今天從蘇聯到東歐，都宣布要恢復資本主義。歷史何其相似！我們復習資本主義的這一段歷史，難道就沒有教益嗎？把這一段歷史研究清楚，才能對我們現在生活的這一段歷史有個更透徹的了解。沒有歷史就沒有理論，沒有理論就沒有方向、沒有指南，就會瞎說，就會瞎動。」

要相信歷史發展的規律。一些不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東西，它就站不住。不管你打着什麼旗號，要看你的真貨色。你的貨色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誰也擋不住。你的招牌雖好，貨色是假的，不符合歷史發展，它就站不住，就要被淘汰。這不值得惋惜，不值得悲嘆。打著資產階級革命旗號的拿破侖，他所作的不好的事情，不對的事情，非正義的事情，就站不住。他作的符合歷史的規律的事情，就站得住。盡管把它的招牌換了，內容換不了，實質變不了。……歷史的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樣來看待歷史，我們的眼界就更亮堂一點。不能祇看招牌。叫社會主義共和國，就一定進步嗎？現在他說我不要社會主義招牌了，我就叫共和國了，或者叫資本主義共和國了，真的這樣嗎？歷史的發展，人民的選擇，是不可抗拒的。

馬克思曾多次分析，恩格斯也繼續作了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海外市場的爭奪、占領，也就是殖民主義的強盛和衰落，是此起彼伏的。首先強盛的是意大利、威尼斯，然後它衰落了，它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到荷蘭，荷蘭成為最大的殖民主義國家。荷蘭也象意大利那樣為英國的强大奠定了基礎。好多荷蘭發明的東西在荷蘭不能用，在英國才能用。一個是資本，一個是技術。當時馬克思在他的時代就預見到，英國必然而且已經開始一步步用它的資金、技術造成美國的強盛。美國沒有舊的包袱，沒有舊的殘餘制度的束縛。美國的革命是徹底的，美國解決土地問題是最徹底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

爲轉移的。因此雖然它當時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看到了，美國一定會代替英國的地位。歷史難道不是證明了這一點嗎？

那麼，現在的世界能够永遠成爲美國的一統天下嗎？絕不會。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除了蘇聯及蘇聯的勢力範圍以外，它的勢力逐步地延伸到全世界。在蘇聯解體後，它又成爲唯一的超級大國。本來是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現在蘇聯已經土崩瓦解了，一去不復返了。但切切不可被現象所迷惑。實際上美國老早走下坡路了。它已經造就了日本、西德（現在是統一的德國）。絕不能永遠維持美國的統治。它到處伸手、到處占領、到處幹涉，其結果是自己陷入困難的境地。有的情況是吞下了炸彈。實際上他現在已經無力來作世界警察，軍事上有強大的力量，經濟上沒有錢。如果從表面上看，社會主義在大多數國家是失敗了，倒退了，改朝換代了，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佔了優勢。但是社會的發展決不能永遠這樣，資本主義決不能永遠一統天下。

美國的社會制度自己就永遠不變了嗎？不會的。馬克思時代，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在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研究對象，當然主要是美國。美國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國家，美國離完全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比我們的路程要近。這是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他們都說解決社會化的問題要比解決所有制的問題和政權問題困難得多，花的時間要長得多，也要復雜得多。所以那些叫嚷社會主義已經

唱了挽歌的人，宣傳社會主義已經滅亡了的人，他們也必然違背自己的意志，成為那些已經死亡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遺囑執行人。這些歡呼者，這些送葬者，他們會成為、也必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遺囑執行人。

列寧看到了「先進的東方，落後的西方」。毛澤東看到了並且身體力行東方的崛起，中國的崛起。這個歷史發展趨勢已經得到了證實，還將繼續得到證實。

社會主義的思想，並不是馬克思發明的，也不是列寧發明的，更不是毛澤東發明的。社會主義這個思想，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當中產生的，特別是現代工人階級一產生，就暴露了，也使人們看到了資本主義除了它的積極的、革命的、前進的因素之外，還有黑暗的、骯髒的、消極的東西。因此，資本主義產生以後，就有社會主義思想萌芽的產生，就有建立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加合理的制度的思想。那時候並沒有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的時代，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產生于任何一個人、那怕是天才的頭腦中的，而是實際地不依賴人的意志和行動而客觀存在着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的衝突在人類思想上的反映。也就是說，社會化的生產，已經使得全部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而且日益不適用了。生產資料和社會生產，實際上已經革命化了。因為它已經變成社會化的生產了。這種革命化的、社會化的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它絕不會永遠服從資本主義的占有

和所有權的形式。在馬克思的晚年，他就說現在再也不能說資本主義是無計劃的了，它已經不全部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狀態了。生產的社會化的發展，已經迫使資本家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了。他已經把大量的生產資料推向股份公司那樣的社會化的形式。計劃和市場，壟斷和競爭，并不是互不相容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就明確地指出，股份公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否定。因為它使資本成為社會化的資本，而且把資本的所有權同企業的經營權分開了，掌握資本所有權的人，他們變成了剪股息的人，變成了露骨地對社會實行剝削的人，因為它並不從事經營管理，而經營管理的廠長經理，也變成社會的職員，變成社會化生產的雇傭勞動者了。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永久容忍有一小撮人專門靠剪股息來進行投機。

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把整個社會生產的管理職能擔當起來，已經不是資本家個人的、分散的、無政府狀態的經營管理了，而是社會化的生產管理了。這個生產勞動越加社會化，離科學的社會主義就越近。列寧有句名言：德國的卡特爾是高度社會化的組織，它同社會主義之間沒有任何中間階梯了。相反的，俄國雖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生產社會化的管理程度很落後，它離科學社會主義反而更加遙遠。因為社會化這個過程更長、更復雜。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化的程度更是無比的高了，生產方面，流通方面，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高度發展的社會化。作為一個科學社會主義

者，不重視、不研究、不學習這些國家的高度社會化的組織和經驗，不從這裏頭去吸取養分，不承認這個現狀，不懂得這個東西，是不行的。當然說這個東西就是社會主義，那是絕對的。但是這都是社會化，是對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的一種否定。拿馬克思的話來說，是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的投降。為什麼我們不講這些道理，還是像小孩一樣，像蘇聯的教條主義那樣講？在斯大林以後，也還是那麼僵化，那麼不接受新事物、不學習新事物、不分析新事物，一定把世界上的東西說成：我這叫社會主義，我就好，他那裏叫資本主義，他就壞，這是兒童的遊戲、吵架，不是科學，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那時並沒有現在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化生產，可是馬克思已經看到，已經作了科學分析。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呢？為什麼那麼悲哀呢？為什麼對世界發展前途覺得那麼茫然無措呢？

但是馬克思很清楚，股份公司也好，托拉斯也好，國有化也好，這不能叫社會主義，是在保存資本主義的原則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否定，但還不能叫社會主義。列寧說沒有中間階梯，但還有一步之差。這一步之差是本質的差別。因此，說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一個樣了，這種論調也是錯誤的。不是的。它的性質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馬克思時代就已經不得不承擔對社會生產的領導，但是它的性質，還是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正式代表，今天也是如此。馬克思也並不認為，國有化就一定好，就一定是進步的。祇有在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才意味着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着由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

方面向前進了一步，達到一個新的準備階段。但是相反的，如果不是在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情況下，而是人爲的國有化，把不應該國有化的也國有化，這就不意味着社會的進步，不意味着向科學社會主義前進。相反，甚至妨礙社會生產的發展。在馬克思時代，就有這種不合乎經濟規律的國有化，那就是在馬克思時代的俾斯麥實行的一些國有化，馬克思認爲它沒有進步意義，對它進行了嘲笑。它也沒有推動社會生產發展。這一點難道不值得我們作爲科學來研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確實有許多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的東西。我曾經專門研究過美國的農業，我當時寫的材料說：美國的農業是國家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和流通。我當時就說，美國的農業，比蘇聯那個打着社會主義招牌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距離科學的社會主義更近，而不是更遠。我們爲什麼祇重視招牌，不重視內容呢？我們爲什麼就認爲人民公社就是好？事實證明並不好。蘇聯的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就是好嗎？歷史實踐證明，也並不好。凡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的，它就不但不能推動生產發展，而且會障礙生產向前發展，它就不是向科學社會主義前進，而是倒退。這一方面，反過來看，也是值得我們總結的教訓。這就是說，許多我們自以爲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有的並不地道，帶有空想的成分，並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在馬克思以後，在列寧以後，在斯大林時代，碰到了一九二九年的大危機。這個大危機是馬克思、恩格斯想象不到的那麼大的危機。列寧雖然說過總危機到來，但他也沒有

見到。一九二九年的危機是對資本主義消極面的充分暴露。這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怎麼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呢？這一點，列寧、特別是斯大林，把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資本主義的生命力，資本主義無力來調節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一點，看得高了。這是馬克思主義者通常容易犯的毛病。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我不能離開這個時代，不能離開當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其他領導人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我總是把他們估計的太壞。我對《資本論》是讀過好多遍，但是很多地方沒有讀懂，特別是《資本論》第三卷，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化生產，以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自我否定，這方面的認識和研究是非常不够的。

長期以來，有的所謂社會主義的衛道士，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都看成是魔鬼，有的所謂自由世界的衛道士，又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看成是魔鬼。這都是不對的，這是歷史的特別是冷戰的產物。不能祇看招牌，要看貨色。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形成一種基本矛盾，它有相互對立的一面，但並不一定發展到對抗。同時也有同一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互相轉化。蘇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化，斯大林時代就埋下了禍根，赫魯曉夫時代就開始了這個過程。一九八九年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也正是對斯大林極左路線的懲罰。向全世界宣告，被斯大林扭曲了的社會主義，并不完全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破產是必然的。

我研究毛澤東的現實目的

我研究毛澤東的現實目的，主要是想為中國的安定團結、安定發展、安定過渡，即從冷戰世界向結束冷戰世界的過渡，從帶有非科學成份的社會主義經濟向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老一代向新一代的過渡，盡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

我個人長期思考的國際戰略問題主要有三個。中國的穩定發展，就是第一個占首要地位的國際戰略。

黨中央已經做出了開發浦東的戰略決策。這是關係到中國乃至大中華經濟騰飛的中心環節。以上海為龍頭，沿長江一直到四川，這條巨龍的發展是主體。南部廣東、海南、福建，包括香港和臺灣在內，是南翼。北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東北在內，是北翼。抓住主體，連結兩翼，帶動內地，中國的持續發展、深化改革、長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證。實現這個戰略目標，關鍵就是開發浦東。小平同志說開發浦東晚了十年。現在開發浦東

已經變成實踐，並且已經穩步地邁開了大步，這也不算晚。問題在於中央的這個戰略決策的含意，是不是已經被全黨和全國人民所理解？

上海不僅是中國的經濟中心，而且必將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之一。上海在歷史上曾經是與倫敦、紐約鼎足而立的三大經濟中心之一。抓住了以上海為龍頭四川為龍尾的長江流域的大發展這個主體，隨着大中華經濟穩步騰飛，它必然在世界經濟的發展中重占中心的和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一定要搞好，中國一定能搞好，而把開發浦東這步棋下好是關鍵。這是我經常思考與研究國際戰略問題中的第一位問題。

第二個大的戰略問題，就是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祇有一個統一的中國才是天下無敵的，才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和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這也是關係到開發浦東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的重大問題。必須承認中國歷史形成兩個大黨，一個叫共產黨，一個叫國民黨。過去國民黨占主導地位，現在共產黨占主導地位。歷史早已證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英明的決策。兩種制度，有對立性的一面，但處理得好就沒有對抗性。同時還要看到有統一性的一面，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許多好道理，還是兩黨可以接受的。反共不反華，是錯誤的口號。今天還要反共，就必然反華。從國民黨方面來說，必須把反共改為聯共。從共產黨方面來說，早已採取聯國而不是反國的政策了。這次新的聯合，是以共同發展大中華經濟為目標的。現在在臺灣和在海外華人中的巨額資金的老本，各方面的優秀人才，

大都是從上海和長江流域外流出去的。因此，國民黨和在臺灣的和海外華人中的一切有識之士，也應當看到開發浦東和發展長江流域經濟在發展大中華經濟中的戰略地位，也有責任回娘家投入和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三個大戰略問題就是中美的聯合。美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將在世界經濟中處于領先地位。美國的企業家和有識之士終將會懂得，同中國不是對抗而是聯合，對於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在當前和在未來都具有重要的和決定性的地位。政治家的覺悟也是或遲或早的問題。有頭腦的美國人，已經看到或者必將看到中國開發浦東和發展長江流域經濟，以及大中華經濟的騰飛，對於美國是何等重要。這種合作當然必須是平等互利的。殖民主義態度不對也不行，帝國主義態度不對也不行，霸權主義態度不對也不行。美國領導人需要也一定能學會如何平等地對待外國。損人不利己，而且損害最大的，還是美國自己的利益。所以吸引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聯合參加開發浦東，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發展大中華的經濟也是決定世界二十一世紀和平與發展的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

突出宣傳領導核心是歷史的必要

我過去一直是擁護劉少奇突出宣傳毛澤東的。我認為這是團結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設勝利的一個重要保證。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積極主張突出宣傳鄧小平。在秦城監獄開始過集體囚禁生活時我就寫了一篇短文。原稿是用鉛筆寫在一張《人民日報》的邊上的，這張報紙現在還保存着。當時我要求公安部長趙蒼璧讓我贖清後轉呈黨中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鄧力群向我傳達鄧小平稱贊王力的作品的評語（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時說，小平同志特別提出這一篇文章「寫的很好」。這篇文章我針對當時光強調所謂集體領導，不敢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群衆、政黨和領袖關係的原理，突出宣傳鄧小平為核心的領袖，這是不對的。沒有核心，黨心人心就會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數日，是不利于穩定和發展的。第一小提琴手祇能有一個。

十四屆代表大會以後，我認為突出宣傳江澤民，對於保證中國穩定過渡，避免發生社會動盪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中央領導人的信中說：「我擁護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這不但在當代對外關係上是必要的，而且對於當前國內貫徹基本路線，統一步伐，安定團結，加深改革，擴大開放，加快建設，尤其是必要的。在戰爭的重大關頭，根據地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是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保證。同樣的，我國正處于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重大關頭，實行一元化的領導，無疑也是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保證。天有二日，任何时候，任何國家，都是不成的。美國也是祇有一個總統。一元化領導同黨政分開不是一個範疇的問題，不可混為一談」。我很高興，李鵬宣布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已經順利完成穩定的過渡。

突出領導核心的作用，是歷史的必要，也是中國歷史經驗的總結。領導核心是歷史形成的，有一系列別人沒有的歷史機遇伴隨着他，這是經過實踐檢驗而不是自封的。這裏首要的條件是經過實踐證明他是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同時他又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反對自己並且在實踐中證明反對錯了的人。竭誠以待人，這樣像吳、越那樣的對立者，也可以團結為一體了。相反，如果傲慢以對人，那樣就連親骨肉也會各人走各人的路了，甚至互相殘殺了，核心也就成為空頭的了。這同樣是我們親歷的慘痛的歷史經驗。

歷史經驗證明，要做到這一點，不是一個道德修養問題，而主要是制度問題，要防止個

人濫用權力，必須探索建立和落實有關領導制衡的原則和制度。十八世紀法國啓蒙學者孟德斯鳩提出了「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的名言。三權分立是資產階級政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毛澤東不贊成中國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但是他和他的繼承者并不是對三權分立采取否定一切的態度。三權分立是制衡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它并不是不可批判的，也并不是毫無參考價值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在理論上並不否定，也不應當否定制衡的原則，并且一直在實踐中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國革命中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在批判蘇聯斯大林以後，進一步把它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內容。毛澤東探索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大民主的形式，來制衡個人濫用權力。一個政治運動接着一個政治運動，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全社會陷入了無政府狀態，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而毛澤東個人的權力反而膨脹到極端，使任何一個制衡機構都喪失了職能，結果使一批新的掌權者變本加歷地濫用權力了，毛澤東走到自己願望的反面。把「四大」從憲法中刪掉是正確的。以人民代表大會制為根本制度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在改革中前進。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在中國制定了《著作權法》，也就是國際上通用的版權法。英國安娜女王時代，在十八世紀初，由議會通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版權法，距今將近三百年了。它的實質是反封建，是革除皇帝（女王）金口玉言個人專斷。講民主，口頭上、背後罵皇帝是常事，這不算數，必須允許人民公

開寫文章，公開印出來，公開出版書、報、刊物，有言論出版自由，這就叫版權法，或者叫著作權法。那時英國能出版書的「人民」，就是資產階級。鄧小平把它應用到中國，就是用法律形式保護廣大人民群衆有用文字形式公開發表的權利。現在通常用的陽光法，也是結合著作權法的。公務員職務越高，就越不受個人隱私權的保護了。不僅個人，而且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一切都應當是透明的，都應當允許在書、報、刊物上曝光。不必怕誣陷，無事不怕鬼敲門。因為誣陷是違法行為，判定是否犯法，那是法院的職能。這是鄧小平——江澤民對於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行制衡個人濫用權力的新發展。現在正在起步，步履維艱，還必須排除幹擾，大力宣傳貫徹。但從大的方面說，以民主和法制來約束個人的制衡的路子已經開闢了。

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在中國，離開了黨內民主，社會的各種民主都祇能是一句空話。在黨內不講民主，個人專斷，隨意破壞民主集中制，那就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和法制。在黨內真正發揚民主，不是自欺欺人，不是形式主義，首要的就是要保護黨員個人的民主的權利。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保護黨員權利的條例。這是中國黨歷史上第一個用來保護黨員權利的黨內法規。我在八月七日致中央領導人的信中，認為這是黨的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熟的標志。黨的組織和紀檢部

門應把保護廣大黨員權利放在第一位，而不應把處分個別違紀黨員放在第一位，正像包青天既保護秦香蓮，又剷陳世美的二重性一樣，我們的政法部門也應具有保護人民權利和制裁犯罪分子的二重性。秦香蓮是廣大的，陳世美是個別的。廣開言路，發揚民主，用金子買批評意見，依靠人民，保護人民權利，爲民（包括幹部）申冤，爲民（包括幹部）除禍，是最得人心的大事。這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毛澤東的威望，除去其他以外，他爲大批在王明路線下受害者平反，興利除弊，是一個重要因素。鄧小平的威望，除去其他以外，他爲大批在歷次政治運動，包括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受害者平反，興利除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今天和今後，當然也是如此。以江澤民爲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公布保護黨員權利法規和堅持反腐敗，爲什麼受到人民（包括幹部）熱烈歡迎，道理也在這裏。

毛澤東與鄧小平

要把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談清楚，還必須把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的基本點聯繫起來研究。

我在文革前曾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做過十年的「秀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在秦城一有紙筆，就從未間斷向小平同志寫信，提出自己對歷史的和現實的問題的看法和建議。十多年來，提供的成文的研究成果或者資料，約計數百萬字。但是，我沒有在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中直接參加中央的決策。

我從直接或間接經歷的社會實踐中，形成了以下的概念：

第一，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蘇聯教條主義統治下受打擊的時期，鄧小平也是被打擊的領導幹部之一。

第二，在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方面：即堅持走中國式革命道路、確立毛澤東在全黨

的領導核心地位、確定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行動指南等等，在這個關係中國革命成敗的最重大的問題上，鄧小平是堅決擁護毛澤東和劉少奇，始終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的。

第三，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在中國革命戰爭過程中，鄧小平是實踐毛澤東思想、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代表之一，并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杰出的貢獻。

第四，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毛澤東抵制斯大林的指揮棒、堅持獨立自主建設新中國方面；在採取聯合資產階級、適當發展資本主義，而不同于蘇聯和東歐對待資產階級實行流血鎮壓政策方面；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鄧小平是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站在一起的。

第五，在蘇共二十大斯大林蓋子揭開以後，毛澤東認定中國獲得了第二次解放。過去是從有形的三座大山的枷鎖下解放，這次是從所謂「國際」所謂「陣營」名義下，從斯大林教條的無形的繩索下的解放。這時新中國才得到真正的完全的獨立和解放。毛澤東提出創立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學派，提出了新的啓蒙運動，提出對於過去的七、八年的一切都要重新加以審查和檢驗，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還面臨反對蘇聯教條的嚴重任務。同時又提出堅持共同道路（即基本原則）反對修正主義的任務。《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新學派的理論基礎。《十大關係》是破除蘇聯教條創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綱領。《工作方法十六條》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方法、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規章制度、領導方法及其相互關係的規

範。鄧小平跟劉少奇一起，都是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重要的參預者和制定者。鄧小平對於促進毛澤東思想的大發展和大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無需諱言，我黨一九五七年以後在實際工作中犯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極左錯誤。小平同志說過一句很得人心的話，他說毛主席犯的一些大錯誤，都有自己的一份。但是，要創立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歷史作用是不可磨滅的。鄧小平成爲第二代領導核心，是歷史形成的，也是毛澤東在思路清醒時不止一次向我表露過的而在歷史上未遂的願望。

第六，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繼承並發展了毛澤東創立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思想，完成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理論，并且在實踐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外國的歷史學家所流傳的「中國以鄧主義代替了毛主義」的論斷是不對的。鄧小平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什麼叫發展？要發展必定有批判。肯定毛澤東創立中國式社會主義新學派的基本思想，破除蘇聯教條主義的非科學的假社會主義，同時也肯定共同道路即基本原則。否定毛澤東晚年在創立新學派中犯的錯誤，主要是否定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這種極左路線實際上是毛澤東偏離了自己提出的創立中國社會主義新學派的基本思想而走向反面，自己重新陷入蘇聯教條主義并加以惡性膨脹。鄧小平的撥亂反正，正是對毛澤東提出的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繼續和發展。

第七，鄧小平對毛澤東的發展是同時代的變化分不開的。因爲時代不同了，許多是毛澤

東和劉少奇當時就提出過但是沒條件實行的，現在具備實行的條件了。鄧小平的杰出貢獻就在於他最早地敏銳地看到了和預見到了時代的變化。在第二次世界戰爭勝利以後，世界上出現兩大陣營。全世界的政治家，祇有毛澤東，最早看到了它除了有對立的一面，還有統一的一面。看到了兩大陣營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美蘇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蘇熱戰，沒有現實的可能性，必然出現一個在冷戰烟幕下美蘇爭霸的時代。主要矛盾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同被壓迫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看到了預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有中國革命的勝利。鄧小平是最早看到了和預見到了世界將出現冷戰結束的時代，這個新的世界必然從兩極對立走向多元化。在世界的政治家中，鄧小平看到了世界除了向多元化發展的一面，還有向一體化發展的一面，看到了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存在與發展，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將是最重大的政治關係和外交關係。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不同于「四小龙」，它們是世界潮流的產物，而中國則是鄧小平順應潮流的國際戰略決策的產物。中國很快就參加並促進世界市場向一體化發展。鄧小平這一思想，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所接受，美國的商業部長最近也認識到並談到這一點。鄧小平全面地發展了毛澤東創立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而江澤民在十四大的報告和五中全會的講話，則是把鄧小平的理論和實踐加以系統化，並寫入黨章，作為指導全黨全國人民行動的指南。

把我的看法總括起來，為了人民和祖國的最大利益，第一是毛澤東的旗子不能倒；第二

是鄧小平的旗子不能倒；第三，鄧小平的繼承者，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權威要樹立和維護。同時要建立和健全各種制衡個人權力的機制。錯誤一萬年都會有，那是采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去解決的問題，絕不能再在中國發生動亂。

《王力談鄧小平》，這將是我下一步要研究的主題，這裏講的基本點，祇是作為《王力談毛澤東》的結語。

我談毛澤東，也包含概括地介紹中國黨取勝的重要歷史經驗以及失敗的教訓，溫故鑒新。但願能對我們偉大的祖國和人民有一點用處。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印發初稿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五日印發徵求意見稿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印發第二次徵求意見稿

附錄

王力與文物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我是個文物愛好者，够不上收藏家，也够不上鑒賞家。但在解放以後的生活中，收集文物占據我除緊張工作以外的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回顧自己一生走過的歷程，除去參加革命、參加戰爭、參加建設、參加對外活動之外，文物占據了我業餘生活的主要時間。文物是我調劑自己精神生活唯一愛好。我收藏文物主要是買舊書和買字畫。

對我這樣一個從事實際工作，又是從根據地出來的人來說，為什麼會同文物結下不解之

緣呢？這要從我自己的身世談起。

我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陰歷是七月初八。正好錯過了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日子。我的出生地是江蘇省淮安縣崔堡鎮。我很早離開了崔堡，在崔堡生活的時間很短。但崔堡是我終生難忘的故鄉。

崔堡地處南溪河邊，河兩岸的垂楊柳直接大運河堤，溪河水和大運河相通，向東經過湖湖蕩蕩和水網，可以入海。鎮南鎮北各有一座大橋，橋下可以過船。北邊橋頭有座廟叫東庵，是和尚廟，崔堡小學就占用它一部分房子。還有一座廟叫西庵，是道觀。西庵連着王家的祠堂，庵裏有古老的松柏和銀杏樹。廟裏的主持是我的本家叔父。崔堡同當時北方和山東的小鎮不一樣，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又是蘇北的里下河地區，是魚米之鄉。鎮上有許多商店和手工作坊，工匠的手藝高超，以至于我至今都記得當時崔堡的糕點比現在北京做的都精致。抗戰時期崔堡在新四軍與國民黨韓德勤部的一場戰鬥中毀于戰火，最終成爲廢墟了。一九八九年，離家後五十一年，我回到崔堡一看，都不認得了，它已經從鎮變成農村。

我的家庭是所謂的「書香門第」，我的父親和伯父都是清朝的秀才。到他們這一代，家裏已是五代秀才了。五代人中沒有一個中過舉，做過官，都以讀書、教書為業，所以可稱得上「教書世家」了。家史上的第一位秀才曾主持興修過水利，修建了崔堡的太平堤，擋住了從東臺、興化來的洪水，做了件流芳百世的大事。後來他發了財，置辦了些產業。不過，到

我曾祖父時，就敗了家，到我這一代，這些產業早已同我們無關了。我們的家門對着南溪河，門外有三間草房，叫「南溪草堂」，是我伯父教書的地方。父親名宗沂號印梅。他在我九周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們家和伯父家同住三間堂屋，屋很舊但還是瓦房，後牆已經是土坯了。兩家共用的堂屋中擺着一塊很舊的木頭牌位，上書「天地君親師」，意思是要敬天敬地，忠君孝親，尊敬師長。伯父曾說，應把君改為國，要忠于國。每到過年時，全家都要對着牌位磕頭行禮。父親一生以教書為業，他是清朝秀才，贊成戊戌變法，擁護君主立憲。他創辦過崔堡第一個學堂，叫南溪高等小學堂，他是首任校長。他在清朝末年民國初年走南闖北，下過江南，到過北京。我的一位表叔郝硯樵在北洋軍閥時期是國會議員，父親曾為他幫忙，起草文稿、詩詞、對聯挽聯之類的東西。父親當時被譽為才子，詩寫得清新脫俗。七八年前，老友樊心如先生送給我一套他收藏的由伯父編的《南溪草堂詩略》，上有父親的兩首詩。一首名為《過嘉興》：「清晨蠶婦怕蠶饑，采得柔桑力已疲；錦綉萬端來海外，却從何處賣新絲？」描寫了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造成的中國農民手工業者的破產景象。另一首名為《頤和園》，是他在北京時作的：「殿閣參差接九霄，海軍帑項已全銷；地靈似較圓明勝，八國兵來土不焦。」反映了他反帝反封建，諷刺腐朽的清朝的思想。

父親到四十九歲時才生我。他以前有一房姓嚴的妻子，不到二十歲就去世了。他曾想把伯父的二哥三姐過繼過來，不再娶妻。他四十八歲那年到寶應汪老太家教館，汪老太成人之

美，把她的丫環許配給了父親。這就是我的母親。那時母親才十九歲。第二年，就是民國十年，我出生了。父親晚年得子，對我特別疼愛，用別人的話講，我是父親含在嘴裏長大的。從小，我的第一位老師就是我的父母。

母親從小就給人家作了丫環，她的身世我一直無從查詢。她從未回過娘家，家在哪裏也不知道。她祇知道自己姓朱，因為是丫環，她從小就受到人家的欺侮和蔑視。但母親是非常勤勞樸素的勞動者，能吃苦耐勞，深得父親的尊重。我就是從母親那裏學到了勤勞的品格，也學到了她反對舊社會反對不平等的思想。母親很聰明，看人看事很敏感，她看透了舊社會的黑暗，在不知不覺中給了我許多教育。我要感謝她培育了我勤勞的習慣和反抗的性格。

父親因經常在外教書、做事、當職員，結識的朋友很多，眼界也很寬闊。但他沒能接受五四運動的思想。我也没有能直接從他那裏接受到五四運動的思想。五歲時，我離開母親隨父親到淮安城裏的一個大戶人家教館。城裏的生活使我大開了眼界。這一時期，父親對我的愛護無微不至。每天晚上都要給我講一個故事，主要是《三國演義》、《水滸》、《東周列國志》、《二十四孝》裏的典故和人物故事。這家人家，上學的學生祇有一個女孩子，與我同歲。父親教我們倆認字，背三字經，也教算術和新學堂的課本。還教我讀詩，背詩，講平仄，講韻律，對對子。從父親那裏，我學到了一輩子有用的基本知識。那時正值大革命初期，淮安城裏也吹來了國民革命的東風，街上到處是宣傳革命的演講，空氣異常活躍。父親

給我買了一個上有「天下爲公」的孫中山紀念像戴在胸前，也帶我聽過演講。我還從一個「大學長」那裏學會了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大革命失敗後，父親開始教我讀古文，他特別欣賞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五柳先生傳》，也教我讀鄭板橋的道情和詩文。除了讀小學課程外，他又給我買了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故事集》和一套小三國演義、小水滸、小五義、小西游記，教給我許多歷史知識。父親閱歷豐富，對人生社會有很多議論。他善于同人友好相處，樂于助人，這一點對我有很大影響。他愛針砭時弊，不隨波逐流，既潔身自好又嫉惡如仇。他常常通過故事教育我要分清假醜惡、真善美，要做好事，不做壞事，對國家要忠，對朋友要義，對父母要孝。雖然父親過早地離開了我，但他給我的教育很深。父親去世後，除了幾畝地，兩樁舊書以外，沒有留給我們什麼東西。父親去世後，由於伯父的照料，我們家祇要不遇灾年，還不愁溫飽。因此當我上中學填寫登記表時，伯父一再強調說，工農商學兵，我們家是讀書人，是學，不能填農，生活境況不能填清貧，祇能填小康。那時我就知道有「小康」這個詞。

父親在世時，給我講過不少鄭板橋的故事。但是，都不是從文物的角度上講的。主要是講他如何清廉，如何關心民間疾苦，如何反對權貴，如何爲窮人撐腰，如何罵財主，如何罵昏庸的官員，當然也講到鄭板橋愛吃狗肉，被人騙去了畫的故事。後來我知道這些故事，除了民間傳說以外，出自曾衍東的《小豆棚閑話》。祇有一件事，使我第一次接觸到文物。我

有一位前娘家的嚴姓舅父，在淮安城開了一個薰燒店，賣香腸一類的熟肉。一個夏天，他突然病故了，因為他的繼配夫人沒有生孩子，於是本家的侄兒們就來爭遺產，不許收尸，尸體已經生了蛆。我父親以姑太爺的身份去調解了。到他們家裏一看，東西都已經砸得一塌糊塗了。地下有一大幅撕碎了的鄭板橋的畫。這幅畫是有名的《叢蘭棘刺圖》。上邊題滿了字，就是：「東坡畫蘭，長帶荆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漢之棘衛也。三
人既誅，漢高過沛，遂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慨。……予畫此幅，山上山下皆蘭棘相參，而蘭
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畫畢而嘆，蓋不勝幽并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悲耳，以無棘刺故
也。」這篇題畫詞，父親原來就教過我，他非常欣賞鄭板橋那種想為國效力而被拒之不用的
感嘆，大概他自己也抱着同樣的心情吧！父親把這幅畫從地下撿回家，到當鋪裏當了朋友贈
送的一件紫羔皮襖，把這幅畫裝裱起來，挂在家裏，很是得意。哪知請文物商鑒定，一口咬
定是贗品。可憐的父親祇好以廉價賣給他了。自己那件珍惜的紫羔皮襖，也就永遠贖不回來
了。這件事使我終身難忘。大概就是這件事在我心中播下了喜愛文物的種子吧。

在淮陰師範上學時，我遇到了我的第二個老師。他名叫于在春，是我初一時的國文教師。一年之後，他因被懷疑是共產黨被校方解聘了。還有一位教師叫顧民元，他是老共產黨員，抗戰時是南通縣第一任人民政府的縣長，在肅托時被自己人誤為托派殺了，後來平了

反。那時我才十一歲，在這兩位老師的啓蒙影響下，我接觸到了魯迅思想，培養起了濃厚的對新文藝的興趣。當時我學習成績不是很好，主要時間用來把圖書館所有的小說和文藝書籍都看了。魯迅的、創造社的、文學研究會的雜志，茅盾、巴金、鄭振鐸、王統照的小說我都讀了，蔣光慈和丁玲的作品，我也很喜歡。這使我從陶淵明、鄭板橋的思想境界中脫離了出來。從此，我再也不能回到他們的思想境界中了。一九三五年，淮陰師範把我開除出校，在親友的幫助下，我轉入淮安中學。但因為通過文藝接觸了革命思想，我再也不能安心學習舊的教育內容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從徐州來的睢寧人程雲鵬和淮安人陳大山。他倆是共產黨人。這時正是抗日氣氛高漲時期，他們給我講共產主義，給我看共產主義的書，十四歲時，程雲鵬介紹我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陳大山的領導下工作。第二次國共合作，共青團改名「民先」。我剛十七歲，被派到東北軍中工作。我所在的這支部隊是萬毅（後來是我黨七大候補中央委員）所管轄的五七軍一二二師三四四旅六六七團的新兵隊，這裏是抗大式的學校，有很多高水平的教師，共產黨的活動也是公開的。老師裏面有伍志剛、谷牧等一批大革命前後的老黨員，他們有很高的馬列主義素養，因此這個訓練班的教學水平，使得從八路軍來的同志都吃驚。一九三九年三月，在伍志剛、丁先聲的介紹下，我加入共產黨。後來，我奉命撤出東北軍回到根據地。審幹時，第一次正式填表，組織決定我填寫入党介紹人是谷牧。

和張枕戈。從根據地到解放後，先後直接受到羅榮桓、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些領導同志的教育。但是所有的人都沒有教過我鑒賞文物的知識。

上海解放之後，我調到上海。那時實行供給制，後來又改為包幹制，到一九五二年才改為薪金制。但因為我常給解放日報寫社論和別的文章，有點稿費，手頭比較寬鬆。當時，許多有錢人因為遷居或生活的壓力，常拿些值錢的東西出來擺攤變賣。有一天，逛地攤時，偶爾發現了兩張畫，一張是張書旗畫的紅蘿卜、白菜和鱈魚，一張是徐悲鴻畫的農婦趕豬圖，標價都是三元。因為張書旗畫的靜物，西洋畫味道濃，色彩艷麗，同我學生時期的趣味相投，所以就掏錢買了回家。這是我第一次買畫，但就是這第一次買畫時，却與徐悲鴻失之交臂了。後來感到遺憾時，已是可遇不可求了。

一九五三年底，我到了越南，那裏正在打仗，在原始森林中，談不到什麼文物，空閑時祇是聽聽音樂，照照像。回國後，才開始有意識地接觸文物。這時我有了較高的工資，稿費收入也很可觀。比如我為蘇聯文學報上寫的《一個農婦的選票》，國內接連就有三家報刊予以刊登，而且每家都給了我二百元的報酬。手裏的餘錢多了，就全部用來買文物了。當時正值公私合營的高潮，許多私營店主紛紛拋賣店裏存貨，很便宜的就出賣了。初買文物時，我的興趣很窄，祇買同家鄉淮安有關的畫家的作品，如邊壽民、姚儀、黃葉村等。後來買了楊州八怪和高風翰等人的字畫。以後興趣逐漸拓寬，眼界逐步開闊，買來各種工具書，開始收

集一些明清著名畫家的作品。雖然我的經濟條件還算寬鬆，但比起夏衍諸公就差多了，一遇到超過百元的字畫，就要費躊躇了。我結合着自己研究清史的興趣，把收藏範圍定在上限從晚明下限到李苦禪、王雪濤這一段時期，以畫為主。我不看戲，不看電影，把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和剩餘錢財都用在了收集舊書、字畫和篆刻作品之上。為了節省費用，我摸到了一個

「到書店買畫」的竅門。當時的舊書店常在收購舊書時夾帶收了一些字畫，但賣書和賣畫是兩個行當，隔行如隔山，他們不懂字畫，有些精品，他們標價低廉。我就是用這種方法買到了一些名家的精品的。例如：我從書店裏買到了孔尚任的手書，後贈送給友人田家英，現此件尚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在興趣上我一直傾心于由徐渭開創、後來為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濤、金陵八家、揚州八怪直到齊白石等人繼承的寫意畫派。在我看來，在中國畫史上，徐渭是一位大變革家。到他這裏中國畫才如同歐洲畫實現了古典主義到印象派飛躍式的巨變。他是一代巨匠。鄭板橋有枚圖章自稱是「青藤門下走狗」，還說「青藤門下牛馬走」，表達了他對這位大師的恭敬實服。

十幾年的精心收集，我收藏的名畫也很可觀了。在我收集的書法中，值得一提的有近代史的著名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嚴復、翁同龢、張謇、蔡元培、陳寶琛、孫中山、何香凝、胡漢民、陳蘭甫、俞曲園等人的書法作品。我所收藏的篆刻作品，有文彭、何震、西泠八家，直到趙之謙、吳昌碩、王福庵、齊白石、陳半丁。其中有

一些是經過文物鑒賞家鑒賞的精品。但是文革中我精心收集的文物散失殆盡，十不存一。我收集文物時沒有清單，也沒有打個鑒賞章。所以也無處找尋了。對我來說，文物是我的興趣所在，它豐富了我工作之外的業餘生活，但它對我祇是身外之物，不過是過眼雲烟，得之何喜，失之何憂？但願它們還在世上，不要毀掉，使後人還可以觀賞研習，那也就好了。

由于對文物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黨內許多對文物有興趣的收藏者、鑒賞家成了朋友。鄧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還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對康生同文物的關係，我有必要說清幾個問題。

我在秦城的時候，中紀委曾問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麼問題，我寫了材料，說在我和他接觸的年代裏，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沒有什麼大問題，也沒有什麼值得揭露的罪狀。康生收藏文物，愛好文物，是我們黨內在這方面的杰出的專家。我同他曾在相當長的時期朝夕相處，了解他的生活情況和性格特點。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國的最高工資，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資，每月收入超過七百元。那時物價很低，文物價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國，不用自己花錢買衣服，加之生活簡樸，吃得簡單，所以他手頭總是很寬裕。另外，康生有一種怪思想，說存錢是骯髒的，他從不存錢，多餘的錢全部用在購買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購買兩類文物：硯臺和善本書。他不藏字畫，偶爾碰到喜歡而便宜的才買一些，買來後多半是送給鄧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康生每天工作很長時間，睡覺時間很

短，祇有幾個鐘頭，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并用朱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稱「今聖嘆」。工作閑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賞文物。他會加工、雕刻硯臺，常跑琉璃廠。他的司機李存生也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會拓片，會制作硯臺，能做細木工。

黨內高層領導中收藏文物的人，與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陳伯達、郭沫若、田家英、鄧拓、陳老總。陳老總喜愛文物，但他從不逛琉璃廠。他常在郭沫若家鑒賞。郭沫若請客吃饭，特別是吃陽澄湖螃蟹的時候，康生、郭沫若夫婦、陳伯達、陳老總都要即興揮毫。

康生在別的方面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文物上沒有什麼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對中紀委說過，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說他賣過一個銅錢。有一次他裱字畫，榮寶齋結賬時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時拿不出來，就把一個南北朝時期皇帝玩過的銅錢賣給了慶雲堂，作價三千元，支付了裱畫費用，剩下的錢存在店裏，作為日後支付買文物的用費。我看這也不違背政策。因為收購者是國營文物店，他們還可以賺大錢。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鄧拓事件。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幹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畫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後，斷定畫是假的。後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迹。後來賣畫人以三千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并說，我

不求錢，祇求有人識貨。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面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後傳到康生，他用朱筆批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現任榮寶齋香港分店總經理）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志後，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當時領導層中祇有康生才有這樣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琉璃廠在四清中得以正常運轉，也是因為康生、鄧拓和田家英等的保護。

文革開始後，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爲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贊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動亂的年代裏，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爲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做了報導。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別是善本書和部分字畫都很值錢。據谷牧同志介紹，康生在死前自

己刻了枚「交公」字樣的圖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一「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獻給國家，一分錢沒要。可現在却有人說，康生是文物盜竊犯。例子是康生把一個人家中被沒收的一個有一百根柱子的硯臺據為已有。還說硯臺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硯譜》，邊上刻有乾隆的題字，康生把乾隆的題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會那樣幼稚無知嗎？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寶貴嗎？這個人以為一百個眼做成柱子的硯臺就名貴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說的這種造型的硯臺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見過這塊硯臺，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硯臺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長王治秋還在紅樓展覽過。然而就憑着這個人的這一番話，有關方面竟然就把這塊硯臺給了他。他又把這塊硯臺捐獻給國家，又得到了一筆錢。真可謂是名利雙收。更嚴重的是他通過這件事，達到了誣蔑共產黨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時至今日，中國文物報、人民日報還有人津津有味地寫這件事。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別的事情上犯了錯誤，在這個方面究竟犯沒犯錯誤？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沒有錯？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後，為什麼還要盜竊別人的東西？這些人真可以說是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通，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的無知。

馬克思講：「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願這些人僅僅是無知，而不是在偏見或比偏見更卑鄙的東西驅使下這樣做的。上面講到的這一作法在我們國家竟習以爲常，不以爲耻，反以爲榮，這種惡劣的作風必須改變。

還有一件怪事，人民日報上載文說康生不會寫字。我讀了哈哈大笑。康生不會寫字，誰會寫字？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國最大的文物鑒賞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陳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商務印書館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而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他家從明清時就是大地主，家裏有很多文物，他們從小就有臨寫真本真迹的條件。他參加革命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開的職業是開藝術照像館，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閉門寫字。他在第三國際當執行委員時，閑暇時也是寫字。他寫字寫了一輩子。在延安時他騎快馬摔了一跤，損傷了腦神經。解放後，腦病發作，就覺得四周都是嘩啦啦的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治病的同時，他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連寫了十幾本，居然就治好了腦病。後來他把這些抄本都進行了裝裱，我估計至今尚存。按陳叔通的說法，真草隸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開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陳叔通家中就有康生書的真草隸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寫得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欽佩。但毛主席不是書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隸篆皆通。毛主席讀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書和草書。毛主席不臨帖，祇是讀帖、看帖。他是絕頂聰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東西自創一體，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嚴格意義上

的書法家。

在文物問題上，我特別提到了康生。因為許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在內都把康生說成是盜竊文物的罪犯。這是不負責任、違背事實的，也是不講良心的。康生在別的問題上有錯誤，特別是在傷害幹部上有重大錯誤，包括對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為他曾經迫害過我，就不顧事實，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罵康生。看到一個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顧法律的、道義的任何責任，無理地辱罵他從娘肚子裏起就是壞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壞，這種風氣很不好。康生在別的方面所做的事，在這裏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問題上，我是最有發言權來評判他的。我的結論是：康生在文物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還很大。此外，文物和藝術品是要受歷史考驗的，作為書法家的康生，歷史永遠不會把他磨滅，他一定會得到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承認。

王力簡歷

原名王光賓，江蘇淮安人，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生。

一九三五年十月 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一九三八年底 受黨委派到東北軍做友軍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 加入中國共產黨。

派員、編輯主任。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五月 在山東《大眾日報》工作，歷任記者、編輯、特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九四四年冬 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幹事，黨刊《鬥爭生活》編輯。

一九四四年冬～一九四五年底 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教育科科長。

一九四五年底～一九四八年底 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科長。

一九四八年冬 任中共渤海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 一九四九年三月 ~ 一九五零年三月 任中共渤海區黨委委員、宣傳部部長。
- 一九五一年年三月 ~ 一九五三年 任華東局宣傳部秘書長兼宣傳處處長。
- 一九五三年 ~ 一九五五年 任中共赴越南顧問團宣傳文教組組長。
- 一九五五年 ~ 一九五六 年 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
- 一九五六 年 ~ 一九六一年 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對外宣傳處處長。
- 一九五八年 任《紅旗》雜志編委（主管國際問題），後任《紅旗》雜志副總編輯。
- 一九六零年 開始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
- 一九六一年 ~ 一九六四年 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秘書長。
- 一九六四年 開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 一九六四年 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 一九六六年六月 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 作為替罪羊被打倒，宣布「請假檢討」，實際被隔離。
-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一九八二年一月 被送入秦城監獄，未被起訴，於一九八二年一月恢復自由。
-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凌晨病逝于北京。

王力親屬根據回憶整理。

『死不了』贊歌一束

王平權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死不了」是民間普遍種植的一種草本小花，生命力極為頑強，不怕摧折、不怕旱澇，不需施肥，無求於人，而不斷向人民貢獻繁花。其花雖小而連片成行，燦若錦綉，生機勃
勃，振奮人心。

一、初培「死不了」

慷慨獻繁花，清廉世共誇。
雖無傾國色，却熱庶民家。
屢抗雨風擊，又臨霜雪加。
送君歸大地，來歲發奇葩。

注：秋季結籽，餘將其連莖帶籽，埋之地下，來歲花必更繁。

二、「死不了」二次盛開

不怕摧殘不怕傷，無肥無水志昂揚。
繁花簇簇紅如火，不是葵花也向陽。

三、贊白色『死不了』

繽紛五彩鬥鮮艷，蝶舞蜂狂色互傳。
唯爾英雄真本色，要留清白在人間。

四、贊紅色『死不了』

紅心似火出天然，蜂蝶傳媒不改顏。
餘力猶能搞赤化，斑斑紅點落花間。

注：『死不了』有多種顏色，經蜂蝶傳播，其色互變，唯大紅與白色不變，紅色且能點染其它淺色花。

五、「死不了」遇灾

驕陽無力百花殘，滅頂之災抗拒難。
清骨紅心俱泯滅，却留萬籽在人間。

注：大澇之年，「死不了」亦不能免，但其籽已普入大地，終將再發。

要留清白在人間

——《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出版後記

王曾軍

我的父親王力是于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病逝的。二十日十九時三十分左右，他的病情突然惡化。他把我們子女招到病床前，想對我們說些最後的話。我們圍到他床前時，祇看到他喉嚨節一動一動的，却發不出一點聲音。這時泪水從他眼角流淌下來。其實我們都知道他想說什麼。他是想說希望黨中央能對他有個公正的結論，實現「要留清白在人間」的

願望。隨後他被推進了搶救室。他與死神抗爭了四個多小時，終因搶救無效而去世。當我們進去和他作最後告別時，發現他的眼睛還在睜着，眼角的泪水還未幹。這麼不清不白地死去，他死不瞑目啊！

父親去世後，母親爲了實現他「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願望，對他的遺稿、錄音作了大量整理、編輯、校對的工作。日以繼夜、過度的辛勞終使她心臟病復發，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去世。作爲有近六十年黨齡的老黨員留給組織的最後一個字條，寫的是「王力是好人，不是壞人。」沒有看到父親問題的解決，母親也是死不瞑目！

作爲長子，實現父母生前願望就成了我的責任。一九八零年初，在胡耀幫同志親自批示下，我才獲得到秦城監獄探望已被「四人幫」關押了十二年之久的父親的權利。沒想到他對久別的兒子的頭一番話竟是這麼說：「你是我們這個家庭的第三代共產黨人。你姥爺王翔千是山東第一個馬列小組成員。黨的「一大」後，他和王盡美、鄧恩銘建立了山東第一個黨支部，所以姥爺是第一代共產黨人。我和你母親是抗日戰爭時期入黨的，是第二代共產黨人；你是六十年代入黨的，是第三代共產黨人。你要教育下一代，努力成爲第四代共產黨人。我們這個家庭要世世代代跟隨共產黨，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聽了父親這一番話，我一時無話，暗自心傷，心想：「你自己的問題至今未解決，還要管那麼多……。」我父親十四歲入團，十七歲入黨，對馬列主義信仰終身不變。他對毛主席的敬佩近乎盲目崇拜；他對黨的

忠誠近乎愚忠，但是黨內外又有多少人了解你，理解你呢？嗚呼！這正是我父親一生悲劇之所在。

由於王力的書在國內暫時不能公開出版，他給黨中央的上書，也祇有少數親朋好友知道。所以黨內外對真實的王力並不了解。一般人都認為王力是中央文革的骨幹成員，是「四人幫」的同伙，是迫害老幹部的幫凶，罪行累累、罄竹難書。誰要為王力說句公道話，就有為文革翻案之嫌疑。以至于鄧小平同志對王力作出「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評價之後，也沒有人敢真正地去認真落實王力的問題。

而在「四人幫」一伙人眼裏，「王力是彭真、鄧小平的人。」文革開始時，中央文革小組名單裏並沒有王力。祇是因為黨中央的「秀才」通通打倒了，中央起草文件全是生手也不行，才把王力留下了。江青說：「留一個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這樣，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以後，作為右傾的王力才成了文革小組的正式成員。不過江青從來沒有信任過王力，她宣布：「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專案組。」王力實際是被排除在專整老幹部的「專案組」之外了。這也使王力在文革中沒有參與迫害老幹部的罪惡活動，這真是王力不幸之中的大幸了。但廣大老幹部對此並不知情。正因如此，一提到王力，人們就把他和迫害老幹部的其他文革成員聯繫在一起，氣不打一處來，這也是王力問題還遲遲得不到解決

的重要原因。至于王力和江青一伙在文革中的矛盾和衝突就更不被外人所知。王力和江青一伙在文革的衝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最重大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決定政治局召開生活會批評劉少奇。而江青却背着毛主席，要把會議矛頭指向鄧小平。江青說，劉少奇一張大字報就打倒了，現在主要危險是鄧小平。江青指派張春橋去動員王力批鄧。張春橋對王力說：「其實你是鄧小平的人，是我們在主席面前保了你。這次你可以用口頭或書面發言批鄧，以表你和鄧劃清了界限。」王力當晚求見毛主席，說：「您不是經常說劉、鄧要分開麼！」毛主席及時阻止了江青一伙公開批鄧的陰謀。第二次是一武漢七·二零事件」之後，毛主席正在氣頭上，批武漢軍區和陳再道的的調子很高。當主席講到武漢軍區，陳再道是第一個把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時，王力插話，說第一個把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漢，是江西，是中央文革批的，毛主席在看過由江青、陳伯達、康生簽署的文件後，降低了批武漢軍區和陳再道的調子，并要文革小組作公開檢討。江青爲了這件事對王力更加不能容忍，這才是江青一伙要打倒王力的真正原因。外人總認爲江青一伙打倒王力是一「狗咬狗，是假打倒真保護。」其實，江青一伙對王力恨之入骨，不僅要打倒王力，甚至要致王力于死地。王力在獄中受到最慘無人道的折磨和虐待。特別是頭五年，五年不給任何帶文字的東西看，包括毛主席語錄。每天二十四小時有一人從門上的小洞裏看着王力。五年睡覺不許翻身，必須面對那個小洞。特別殘酷的是，江青一伙多次叫人把窗子用布擋起來，使

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時用喇叭放噪音，不給看病，還強迫灌一種藥，吃下去使你造成幻聽幻視，一天在喇叭裏宣布槍斃多少次，每次宣布槍斃，王力就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唱國際歌。然後又宣布不槍斃了。顯然江青一伙是要把王力折磨死，至少要把王力的大腦破壞。他們害怕王力知道的事很多，對他們不利，所以採取這種世界上法西斯也很少有的野蠻辦法對待王力。這些情況更是外人所不了解的。

當然，我父親在文革中是犯有嚴重錯誤的。父親曾多次和我交談他在文革中的錯誤。他說：「毛主席曾說過，用文字表達我思想最好的是王力。但是作為毛主席的理論秘書，文革期間黨的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我不如田家英同志。田家英同志對毛主席理論上有不同意見時，能够查找資料，寫出東西和毛主席商討。而我對毛主席的崇敬近乎盲目。毛主席提出的東西，我能在馬列著作裏找到依據的，就認為是主席繼承了馬列主義；而在馬列著作裏找不到依據的，我則認為是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主席讓我系統表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我就是照這樣的思維，經過整理，提出了『三個里程碑』的說法，得到了主席的認定。這一學說給黨和人民帶來巨大損失。毛主席講：『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覺得這個提法在邏輯上有問題，就改為『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這個提法又得到主席認定，并作為黨的基本路綫寫進了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黨章裏（雖然我早已被打倒），這個錯誤基本路綫對黨和國家造成危害更深更遠。」至于我

父親在文革中起草的社論、文件中的錯誤就更多。由於他當時是黨內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的特殊位置，所以這些錯誤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但是我的父親在文革中的錯誤是屬於思想上、工作上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有些是他本人無法抗拒的。他的錯誤和「四人幫」一伙搞陰謀詭計、篡黨奪權、迫害老幹部的罪惡活動有本質的區別。對我父親錯誤的審查，最實事求是的時期是胡耀邦擔任組織部長的時期。當時，胡耀邦同志派得力幹部到秦城監獄，對被關押的老幹部逐個重新審查。當專案組查找到「武漢七·二零事件」中我父親親筆記錄的周總理傳達的毛主席「關於處理武漢問題的四點意見」的筆記後，就認定我父親在「武漢事件」中沒有任何責任；一開始專案組並不審查「二月逆流」問題，說：「這是中央已定了性的問題，這個案不能翻。」在我父親的堅持和提示下，專案組查找到了我父親在「懷仁堂會議」上作的會議記錄原文。正是這個記錄，忠實地反映了老帥們同「四人幫」一伙激烈鬥爭的原貌。專案組認為我父親對揭發江青、張春橋在所謂「二月逆流」中的陰謀起了關鍵作用，立了大功。當時，曾志同志曾過問我父親的問題，她看了有關我父親的材料後對王力說：「看來你的問題屬於冤假錯案，具體屬於那類，中央還要研究。」在我父親出秦城的「免于起訴書」中「二月逆流」、「武漢事件」都沒有列入我父親的問題之中。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父親和我永遠感謝胡耀邦同志！

無論是「四人幫」一伙的殘酷迫害，還是受到黨內對他的嚴重誤解，我父親始終沒有放

弃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和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他對黨的唯一要求是能爲黨和人民再做點工作。

當他在秦城監獄剛剛獲得讀「人民日報」的權利時，就拿起筆在報紙的夾縫裏寫下給鄧小平同志的兩封信，題目是「關於對毛澤東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之後又陸續給黨中央寫了十餘封信。鄧小平同志在看了這些信後批示「耀邦同志望望」，并要鄧力群同我父親談一次話，告他「什麼話都可以講。」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鄧力群受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委託，同王力談話歷時七小時半，傳達了鄧小平批示原話。王力在三中全會以後寫的東西我都看了。我認爲：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爲黨工作的。一并要求我父親出來後「再爲黨工作十五年」。在被關押了長達十四年後我父親出獄了。我父親出獄後，鄧小平交給他一個研究課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是如何發展了馬列主義」。我父親對國內外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同時也對文革進行了深刻地反思，總結經驗教訓。他給黨中央的建議信寫了一封又一封（通過中辦溫家寶同志轉送），表達了他對改革開放的擁護和對黨的忠誠。他的建議有的已被中央採納。鄧小平還特別指示「中辦」：「王力寫的東西都要送我看，都要進中央檔案館保存。」在我父親完成「王力談周恩來」（即文革第一年）和「王力談毛澤東」的寫作後，鄧小平通過鄧辦轉達，希望父親再寫一個「王力談鄧小平」。可惜，在我父親開始着手收集資料，準備動手寫作時，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馬克思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在他的回憶錄中，還有《十下莫斯

科，穩坐釣魚臺——中蘇論戰記實》等，都沒有來得及動筆。這是我父親一生的遺憾。

由于黨內的嚴重誤解，特別是中央某主要負責人的堅決反對（他與王力並沒有個人恩怨，祇是不了解真實的王力），我父親始終沒能正式安排工作。更令人不解的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兩案」領導小組辦公室給我父親送來《關於王力問題的審查報告》，並傳達中紀委意見：第一是同本人核對事實；第二是聽取本人對判斷（結論）的意見；第三是聽取本人對處理的意見。但後來辦案人員沒能執行。雖然我父親再三請求，始終沒有同父親本人核對情況。有次辦案人員被父親催急了，祇得說：「你的問題太大，結論是中央已經定的，我們不敢去核對情況。」顯然他們也清楚，祇要真核對情況，《審查報告》裏給父親安的罪名均不能成立，他們無法交差。在不同本人核對情況，不徵求本人對處理的意見，也沒有本人簽字的情況下，「兩案」辦公室一九八四年二月匆忙作出開除王力黨籍的決定，上報書記處，這種作法完全違背了黨章。

《審查報告》不僅把胡耀邦時期專案組已經否定了的「武漢七·二零事件」、「二月逆流」等罪名重新加在王力身上。而且還把「四人幫」時期專案組羅列的罪名也一一加在王力身上。例如，竟把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我父親起草的社論當作製造反革命輿論的罪證；又如《審查報告》說「王力支持劉結挺、張西挺翻案，奪權，搞亂了四川」。這就更加荒唐。我父親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打倒。王力打倒之後，四川省才成立革

委會，劉結挺才擔任副主任。在王力被打倒二年後，才召開「九大」。劉結挺還當選為中央委員，張西挺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我父親在被打倒了的情況下，怎麼為「二挺」翻案？如果王力真為「二挺」翻案，他們怎麼沒有隨王力一起被打倒，反而高升了呢？此類荒謬的罪名在《審查報告》裏彼彼皆是，就不一一列舉了。就這樣，我父親糊裏糊塗，莫名其妙地被「開除」了黨籍。父親對我說過：「曾子不曾殺人，但傳謠多了連曾母也不得不信。江青一伙散布的謠言太多了，一時也無法澄清。好在歷史證明曾子的清白，歷史也會證明我的清白。」我感到父親是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是黨內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父親雖然遭此沉重打擊，但他仍然沒有改變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和對黨的忠誠。他一方面向黨中央申訴，要求按黨章規定的程序處理本人問題；另一方面仍然不斷向黨中央「上書」，提出自己對改革開放的一系列建議。「戰略轉移不可動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反對自由」、「中國的改革與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實行政改開放的文物政策」、「醫院改革之路」、「和平統一的新思路和新策略」等一系列文章都在這種背景下寫出的。他對我說：「黨不要王力，照樣興旺發達，王力離開了黨，就象魚兒離開了水，瓜兒離了秧，就無法生存。無論黨對我有多大誤解，我忠于黨的信念不變，為黨工作的意願不變。」我父親一直到去世前二周仍然沒有停筆，自覺自願，無怨無悔地為黨工作着。由於有父親「我們這個家庭要世世代代跟隨共產黨」的家訓，我不會埋怨黨對父親的處理，但我却很難理解為什麼黨要這麼對待

忠誠于自己的老共產黨員。劉少奇同志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之所以公布父親的遺稿，就是為了讓黨內外認識了解一個真實的王力。「王力遺稿」約八十萬字，這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在坎坷道路上的足跡，這也是審查王力歷史的重要一章。我相信廣大讀者會通過這部書自己去判斷王力的清白是非，我堅信父親「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願望一定會實現，歷史終將作出公正的結論。

「王力遺稿」第一、二、三部，都是父親生前親筆寫成，或是母親根據父親口述錄音，整理打印成文，再由父親校對後成稿的。可以說這部書是父母兩人的心血共同成稿的。父親把書名定為「王力反思錄」。「反思錄」第一部的內容是「詩詞及其背景」、「要留清白在人間」；第二部內容是「上書文選」、「文革第一年」；第三部內容是「未完成的文革回憶錄」。父親生前多次囑咐，第三部要等他死後才能公開。因為第三部「未完成的文革回憶錄」是父親以忠于歷史原貌為原則，客觀如實地記錄了文革初期黨中央，特別是毛主席對一些重要事件決策的內幕及過程；包括偉人們在氣頭上說過的過頭話，「做出過的錯誤判斷和決策的最原始的資料」。為了讀者閱讀方便，我把原稿第二部的第二部分「文革第一年」放到第三部「未完成的文革回憶錄」之後，為的是形成一部按時間順序寫下來的「完整的文革回憶錄」。另要說明的是，「要留清白在人間」和「上書文選」中的小部分內容曾由牛津大學出版過。書名是《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記實》；「文革第一年」曾在《傳記文學》雜

志上發表過。這次出版的是我父親的全部遺稿。我又把父親後期寫的「王力談毛澤東」作為「王力遺稿」的第四部。父親寫的「王力與文物」，我們整理的「王力簡歷」及我母親在我父親臨終前寫給他的一首詩一并匯集在一起作為本書的附錄。

我的這篇短文趕在一七·一前夕寫成，一是爲了紀念黨的八十周年生日，表達了我不忘「我們這個家庭要世世代代跟隨共產黨」的家訓，二也是爲了父親八十周年誕辰（父親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生人，他生前經常講「我是黨的同齡人」），實現他「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願望。

「王力遺稿」是在我一些老同學和一些不知名的朋友們無私無畏、大力相助下出版的。我代表父母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我對於敢于出版「王力遺稿」的北星出版社，這種勇于對歷史負責的精神表示敬佩。在此，我也代表父母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零零一年「七·一」前夕